

俄国革命

彼得格勒，1917年2月

〔日〕和田春树 著

杨玲 林墨 等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二月革命既是为 19 世纪拉下帷幕的最后的
世界革命，也是将世界战争的世纪——20 世纪大幕
拉开的反战反军的人民革命的开始。

——和田春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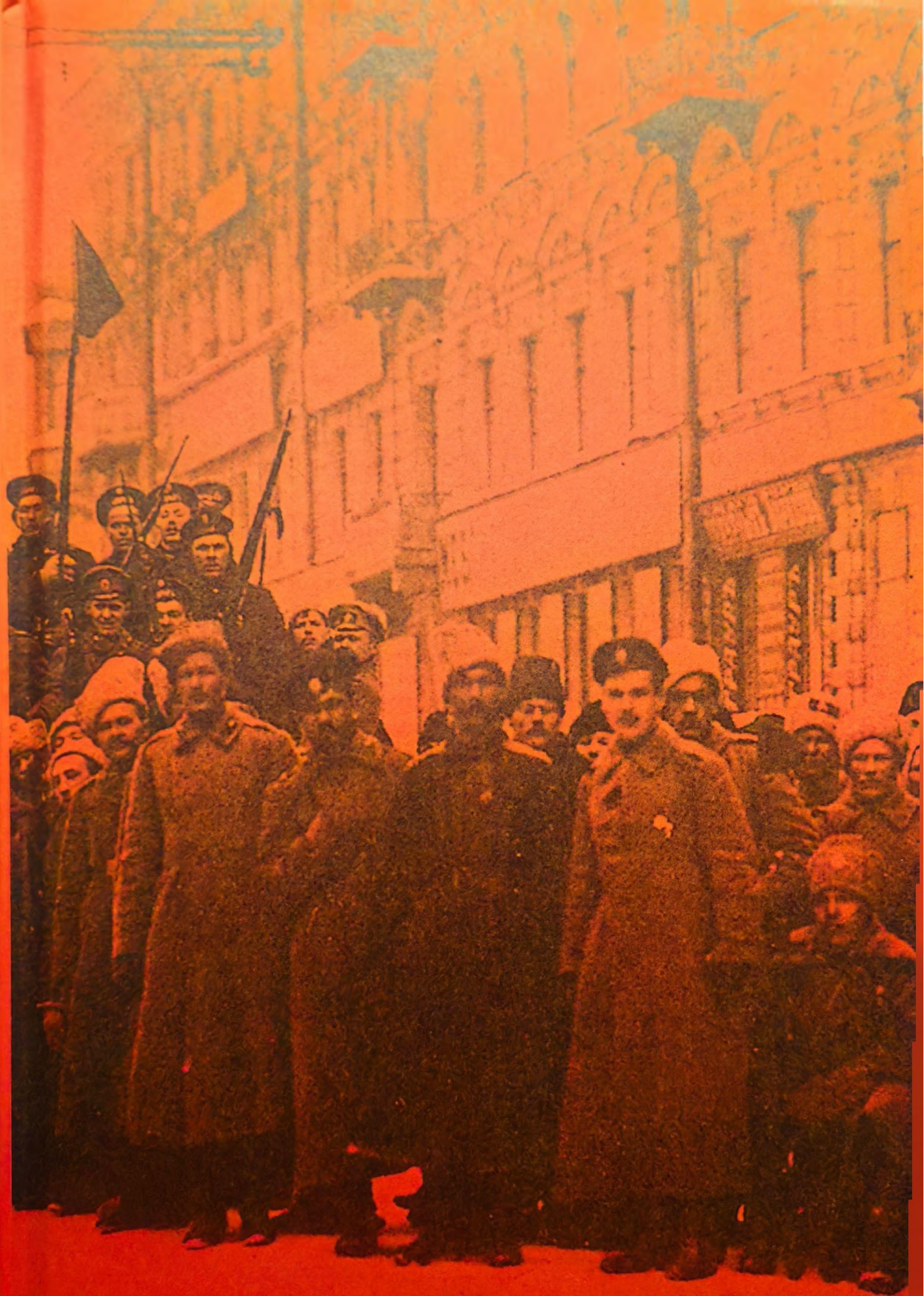
和田春树是日本著名的俄国近现代史和朝鲜现代史专家，本书是他继《日俄战争》之后的又一部重量级力作，是他近六十年从事俄国革命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不同于一般只关注俄国的“十月革命”，和田春树在一战的国际视野和罗曼诺夫王朝内部危机的大背景下，聚焦 1917 年的二月革命。作者在充分获取档案资料 and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二月革命”的缘起、进程、结果与历史功能做了脉络清晰、细节丰富的全新理解与叙述，全景再现了一百年前那个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它不仅左右了俄罗斯民族此后的命运，也改变了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



定价：128.00 元





和田春树

1938 年生于大阪府。1960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西洋史学科。曾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助手。1985 年为该所教授。1996—1998 年任该所所长。1998 年从东京大学退休。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特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近现代史、朝鲜现代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其著作超过 60 部，主要著作有：

《尼古拉·罗素——超越国境的民粹主义者》（上、下），中央公论社，1973 年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革命》，劲草书房，1975 年

《金日成与满洲抗日战争》，平凡社，1992 年。本书被译为韩文，创作和批评社，1992 年

《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岩波新书，1992 年。本书被译为韩文，创作和批评社，1994 年

《朝鲜战争全史》，岩波书店，2002 年

《东北亚共同的家——新地域主义宣言》，平凡社，2003 年。本书被译为韩文，一潮阁，2004 年

《恐怖政治和改革——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前后》，山川出版社，2005 年

《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上、下），岩波书店，2009—2010 年。本书获 2013 年度坡州图书奖

《北朝鲜现代史》，岩波新书，2012 年。本书被译为韩文，创作和批评社，2014 年。被译为中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 年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owan & Littlefield, 2014

《“和平国家”的诞生——战后日本的原点和变迁》，岩波书店，2015 年



俄国革命

彼得格勒，1917年2月

〔日〕和田春树 著
杨玲 林坚 等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2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ROSHIA KAKUMEI Petorogura-do 1917 nen 2 gatsu〕

Copyright © 2018 by Haruki Wad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kuhinsha Co., Ltd. Tokyo,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hard-cover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Shenghuo-Dushu-Xinzhish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Haruki Wada arranged with Sakuhinsha Co., Ltd. Tokyo, Japan

through Hui-Tong Copyright Agency, Jap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国革命：彼得格勒，1917 年 2 月 / (日) 和田春树
著；杨玲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 2. — ISBN 978-7-108-07942-8

I . K512.46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9RZ536 号

责任编辑 张 娟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校对 陈 格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2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9.25

字 数 488 千字 图 147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2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 1

翻译说明 · 1

序 章 与世界大战对抗的革命 · 1

俄国革命·彼得格勒, 1917年2月

世界大战与民众 · 1

革命的开始 · 2

沙皇专制统治倒塌·临时政府成立 · 3

对二月革命评价的变迁 · 4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 · 5

列宁领导的“第三次革命” · 7

第1章 俄罗斯帝国与世界大战



君主专制制度——过于漫长的统治 · 2

世界大战——一点即燃的火药桶 · 25

大战的现实 · 34

“大撤退”的冲击 · 41

俄罗斯帝国的危机 · 49

协约国与德国 · 49

沙皇·皇后·拉斯普京——权力中枢的崩溃 · 50

兵源枯竭 · 60

“违抗命令”的士兵 · 63

边境的起义军——吉尔吉斯人 · 67

第2章 革命的序幕



- 重启国家杜马 · 76
- 宫廷革命——暗杀拉斯普京 · 79
- 发动军事政变的各种尝试 · 103
- 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路线的出现 · 116

第3章 首都彼得格勒的民众



- 首都彼得格勒 · 134
- 工厂工人 · 137
- 大中学生 · 152
- 士兵 · 157
- 水兵 · 163
- 城市工人 · 167

第4章 首都的民主党派



- 布尔什维克党 · 180
- 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 · 192
- 区联派和初始派 · 198
- 社会革命党左派 · 204
- 无党派知识分子 · 207
- [专栏] 民主党派及社会主义党派 · 211

第5章 首都的革命



- 开端——1917年2月14日 · 216
- 潜伏期——为期一周 · 242
- 2月23日——激流飞扬 · 251
- 2月24日——罢工规模扩大 · 265
- 2月25日——街头冲突 · 273
- 2月26日——军队开枪镇压 · 291
- 士兵起义——2月27日 · 301

第6章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



- 国家杜马被迫休会 · 316
- 设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 · 320
- 呼吁成立苏维埃 · 323
- 国家杜马两派的努力 · 334
- 成立苏维埃与执行委员会 · 340
-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掌权欲望 · 347

第7章 两大革命——多种路线



-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为行使权力
而做出的努力 · 354
- 苏维埃与群众 · 364
- 地区苏维埃和工人民警 · 369
- 大公诏书的拟定与罗江科 · 373
- 罗江科与沙皇 · 377
- 苏维埃与权力问题 · 378
- 3月1日的苏维埃大会及《一号法令》 · 381

基里尔大公访问国家杜马 · 387

3月1日傍晚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 388

第8章 军部与沙皇



首都的革命与最高统帅部 · 394

沙皇的决定 · 396

派军镇压 · 398

前行的沙皇专列 · 402

罗江科的电报——涟漪微泛 · 405

席卷皇村的紧张氛围 · 406

伊瓦诺夫军的结局 · 407

3月1日的最高统帅部 · 409

莫斯科革命 · 409

喀琅施塔得的革命 · 411

最高统帅部和司令们 · 413

沙皇到达普斯科夫 · 414

第9章 成立临时政府与废除帝制



国家杜马和苏维埃的谈判 · 418

塔夫利宫之外 · 421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要求沙皇退位 · 425

3月2日的最高统帅部和北部方面军

最高统帅部 · 430

苏维埃大会与权力问题 · 434

米留科夫的演讲 · 438

退位诏书草稿 · 439

沙皇反悔 · 440

古契柯夫使节的到来 · 442

废除沙皇专制统治	• 444
临时政府宣布成立	• 446
说服米哈伊尔大公	• 448
米哈伊尔大公的备忘录	• 450
米留科夫与古契柯夫放弃辞职	• 452

第10章 革命胜利的日子



万千感想	• 456
大赦及废除旧政权的压迫	• 462
临时政府宣布战争方针	• 464
逮捕沙皇一家	• 468
承认芬兰的独立诉求	• 470
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的忧虑	• 471
“赋予妇女选举权”	• 475
废除宗教歧视及民族歧视	• 477
为革命烈士举办葬礼和追悼会	• 479

代后记 我的二月革命研究之路 • 486

俄国革命年表	• 497
注释	• 512
参考文献	• 558
人名解说与索引	• 575

图表目录

彼得格勒市区地图（1917年） · 前插

罗曼诺夫王朝谱系图 · 6

第四届国家杜马党派及议席情况（1912年） · 19

国家杜马内的党派变动（1915年夏） · 48

彼得格勒周边铁道路线图 · 404

表1 参加政治罢工的首都工厂 · 172

表2 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构成

（1917年1月1日） · 177

表3 1910年首都的经济自给人口 · 177

彼得格勒市区地图 (1917年)



致中国读者

俄国革命是一场迟来的革命。世界上真正推翻自近代以前便已存在的国王、皇帝权力的革命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自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俄国几代人为追随法国革命的脚步而不懈奋斗。然而，无论俄国人如何努力，他们始终未能追赶上法国革命的步伐。中国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朝的皇权统治。在中国辛亥革命六年后的1917年，俄国人终于通过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皇权。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成功的130年后，当俄国人通过革命推翻自己皇帝的权力时，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世界大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试图发动革命推翻本国政权的革命者，必然要与世界大战的时代这一世界历史条件进行斗争。其结果，便是俄国革命成为第一个与世界大战战斗、与世界大战交锋、抵抗世界大战的革命。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再将随后出现的美苏间的冷战视为准世界大战的话，可以说世界大战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了不久之前。因此，作为一场反世界大战的革命，俄国革命可被当之无愧地称为“大革命”。

“二月革命”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第一幕。彼得格勒爆发的二月革命推翻了皇权的统治，但作为反世界大战的革命，它尚未完成，正如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所述。在同一年的同一地点——彼得格勒爆发的“十月革命”完成了这场反世界大战的革命，这是俄国革命的第二幕。因此，“二月革命”是俄国革命的开端、起点乃至全部。

我自1957年起便立志研究俄国革命并一直努力至今。1968年我撰写的第一篇论文《二月革命》是我科研工作的起点。从那时起，我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资料、深入思考、不断凝练后的成果就是在2018年成稿的这本书。完成第一篇论文时，我才30岁，而完成此书时，我已80岁高龄。我的好友、日本学者长谷川毅先生赴美后成为研究二月革命的世界级专家。我们在日本时同属一个研究小组，我先开始做研究，三年后他加入进来。1981年，长谷川先生出版了第一部学术巨著《二月革命：彼得格勒，1917》（*The February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巧合的是，他在我出版此书的前一年，将前作重新修订，出版了第二部学术巨著《二月革命，彼得格勒，1917：沙皇统治的终结与二元权力的诞生》（*The February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 The End of the Tsarist Regime and the Birth of Dual Power*）。可以说，两个花费毕生心血研究二月革命的历史学家以各自的方式将研究成果呈现给世人。长谷川先生的书是用英文写成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将两书对照阅读，我将深感荣幸。

俄国革命的第二幕是“十月革命”，其后的第三幕便是“列宁革命”。虽然本书仅探讨了第一幕，但我衷心希望读者能通过本书找到

思考俄国革命发展到第三幕的线索。

三联书店在2018年鼎力支持了敝人专著《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上下册）的翻译出版工作，今次再度协助本书译事续推，我倍感欣喜，谨向三联书店各位同仁致以最诚挚的谢忱。同时，向倾注心血完成这部译作的诸位老师致以由衷的感谢，更愿借此译本向中国的读者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和田春树

2024年12月



翻译说明

1. 关于军队编制，原作均采用日式说法。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译者参考和田春树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及国内关于俄国二月革命的相关著作，译为现用通行名称。以下内容译为译者整理，仅供读者参考。

关于军队编制、职衔和等级：

1914—1917年沙俄军队建制

俄语	日语	汉语
Фронт / Front	方面軍	方面军
Армия / Armiya	軍	集团军
Корпус / Korpus	軍団	军
Дивизия / Diviziya	師団	师
Бригада / Brigada	旅団	旅
Полк / Polk	連隊	团
Батальон / Batal'on	大隊	营
Рота / Rota	中隊	连
Взвод / Vzvod	小隊	排

1914—1917年沙俄军队职衔体系

军官层级	将官	元帅（沙俄名义上的最高军衔，但实际上没有授予过沙俄的任何军官） 上将/大将（一战沙俄时期俄军队实质上的最高军衔） 中将 少将（将官级别的最低级）
	校官	上校（校官级别的最高级） 中校 （1884年，沙俄政府取消了少校，其后，所有少校强制晋升为中校，故这一时期，沙俄军中就没有少校）
	尉官	上尉（尉官级别的最高级） 参谋上尉（和上尉属于同一级别，地位相同。两者主要区别在于担任的职务不同） 中尉 少尉（尉官级别的最低级） 准尉（准尉级别的最高军衔，类似现代军衔制度中的少尉） 中级准尉（只在战时进行动员时才可被授予。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长期服役经验丰富的士官在战时可申请授予此军衔。该军衔的地位和准尉级别的最高军衔“准尉”地位相同） 副准尉（准尉级别的最低级，介于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军衔，可以理解为候补军官）
士兵层级	士官	军士长 高级士官 低级士官
	列兵	上等兵 列兵（最普通的士兵，最低级别军衔）

1914—1917年的沙俄部队，按照规模由大到小的顺序为：

方面军：由3—5个集团军构成，50万—100万人，指挥官为大将或元帅；是最高级别的战役战略军团，负责一个广大的战略方向。

集团军：由3—5个军、独立骑兵师、预备队构成，10万—15万人，指挥官为上将；是方面军下属的主要作战兵团，通常由数个军组成，负责一个战役方向的作战。

军：由2—3个步兵师、1个炮兵旅、工兵营构成，人数4万—5

万人，指挥官为中将或上将；是集团军下属的合成战术兵团，通常由2—3个步兵师、1个炮兵旅及其他部队组成。

师：步兵师由2个旅（4个团）、炮兵旅（48门炮）构成；骑兵师由4—6个骑兵团、骑炮兵营构成，人数1.6万—2万人，指挥官为中将。师是军下属的主要战术兵团，其核心是步兵师。

旅：由2个步兵团或骑兵团构成，人数8千人（2个团），指挥官为少将；是师或军直属的部队，如步兵旅、炮兵旅。

团：由4个营、炮兵、工兵分队构成，人数在4千人（4个营），指挥官为上校；指旅或师下属的基本战术部队，通常以地名或编号命名。

营：由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8挺机枪）构成，人数在1千人（4个连），指挥官为中校；是团下属的基层单位。

连：人数在200—250人（4个排），指挥官为上尉。

排：人数在50—60人（4个班），指挥官为少尉。

班：人数在15—20人。

2. 原书有大量用片假名表示的人名、地名、舰船名、报刊名等其他专有名词，译者尽可能译为通行名称。为避免错误，特请作者标注了其俄文或拉丁文拼写，敬请参看人名解说与索引。

3. 二月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前的沙俄政府的官员职衔仍延其旧，如仍将“外交大臣”译为“外交大臣”；而二月革命临时政府官员的职衔，为以示区分，译为现在的通行名称，如“海陆军大臣”译为“海陆军部长”。

与世界大战对抗的革命

俄国革命·彼得格勒，1917年2月

世界大战与民众

1916年年底，整个欧洲都变成了巨大 13
的战场。

除了欧洲之外，战火还蔓延到亚洲和美洲，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破坏与杀戮宛如《启示录》中记载的末日浩劫一般，毁灭了人们的肉体和生活，撕裂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残酷的阵地战中厮杀的两军士兵，在战壕里迎来了战争中的第三个圣诞节。对后方的妇孺来说，这也是没有丈夫和父亲陪伴的第三个圣诞节。既然士兵们还在前线浴血奋战，后方的人们就必须忍耐这一切。

欧洲各大强国也都悉数卷入战火。前线和后方充斥着悲伤、愤怒与绝望，然而，人们只能选择忍耐。

但是，在东部战线一角的俄军战壕中，

士兵们开始反抗。1916年10月1日（俄历，下同），西南方面军某部士兵拒绝发动进攻，主谋者遭到枪杀。随后，周围部队的士兵也陆续开始反抗上司的命令。到了11月，同属于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中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反抗运动。根据史料记载，士兵们拒绝执行进攻命令，明确表示：“我们不会进攻”“我们将死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我们不会主动攻击”“在战壕里连续作战九个月，大家都筋疲力尽了”。他们还大声抗议：“换班，让我们休息！”“我们可是光着脚在战斗啊！”因为参与这次反抗而被军事法庭起诉的士兵多达197人。尽管陆续有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士兵们的反抗始终没有停止。

厌倦了战争和军队的士兵们将内心的强烈诉求付诸行动，引发了上述反抗运动。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考察其背景和原因。首先，沙俄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推动战争，遭到士兵的反对。其次，士兵对沙皇与皇后存在不信任感。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上级军官流露出的等级制度特权意识的反抗。民众厌恶战争，同时也不再信任沙皇。

革命的开始

1917年2月，在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彼得格勒，爆发了二月革命。

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向工人们呼吁，在2月14日国家杜马重启的这一天，停止工作，在各大工厂集合，向国家杜马所在的塔夫利宫行进，提出自己的诉求。当天，众多工厂里的工人都选择了罢工。但是，由于当局严密警戒，游行运动几乎完全受阻，仅有一部分学生在彼得格勒市中心的涅瓦大街试图举行游行。

工人们在愤懑中沉默了九天。2月23日，适逢国际妇女节，首都东北部维堡区五家纺织工厂的女工决定罢工。她们高喊着

“给我们面包！”走上街头，呼吁附近工厂的工人一起参加行动。工人纷纷响应号召，开始了爆发性的斗争运动。人们放下工作，走上街头，突破警察的包围，试图向涅瓦大街行进。24日，工人罢工运动席卷了首都的所有工厂。25日，罢工运动发展为真正的总罢工，涅瓦大街上充满了工人的身影。他们与警察发生冲突，¹⁵在各处举行集会。

26日，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导致多人死亡。被迫向自己同胞开枪的士兵忍无可忍，终于在27日早晨开始反抗命令，调转枪口朝向军队军官，发动了叛乱。接下来，他们袭击监狱并释放了囚犯。当天，位于彼得格勒的沙皇政府完全停摆。

国家杜马所在的塔夫利宫成为革命的总部，当天下午“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另一方面，工人与士兵代表也在此集结，于深夜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国家杜马决心掌权，力图建立临时政府。而苏维埃政权为了实现军队民主化，于3月1日发布《一号法令》，获得了士兵的支持。

沙皇专制统治倒塌·临时政府成立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由克伦斯基等资产阶级市民革命力量所掌控，而苏维埃则代表了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力量。前者为了继续战争而主张废除专制，后者则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二者处于对立关系。

此时，首都彼得格勒已经完全变成了革命的据点，其态势进一步扩大到莫斯科和喀琅施塔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向沙皇和军方高层所在的最高统帅部提出交涉。他们向军方高层提出，为了继续战争，有必要让沙皇退位，让位给皇太子，任命米哈伊尔大公为摄政王。军方高层全盘接受了这一意见。可以说，这

场首都革命获得了最高统帅部的认可，取得了胜利。

3月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但在最后一刻，他没有把皇位让给身患血友病的儿子——皇太子阿列克谢，而是选择让弟弟米哈伊尔大公继位。临时政府不承认这一做法，转而主张废除沙皇统治。沙皇专制统治由此倒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由李沃夫领导的临时政府。3月11日，临时政府获得了英法等协约国的承认。

16 对二月革命评价的变迁

二月革命包括资产阶级市民领导的革命以及工人、士兵领导的革命，二者的结合使其获得了最终胜利。在世界大战中，二月革命成功推翻了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可以说，二月革命是一场最为重要的革命，它开创了俄国革命的时代。

对于二月革命的意义，历史学家众说纷纭。自由主义思想家兼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在二月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他也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米留科夫在革命结束后出版的第一部专著《第二次俄国革命史》（索非亚，1921年）中写到，只有完成了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二月革命才是俄国革命的精髓，之后就走上了“权力的倒塌”和“俄国的崩溃”之路。

稳健的社会主义者兼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在二月革命后回国，出任临时政府的官员，并在十月革命中当选为立宪会议主席。切尔诺夫在《俄国二月革命的诞生》（布拉格，1934年）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二月革命之后的一系列动向，是二月革命孕育的民主共和国走向解体的过程。

与此相对，自从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柏林，1931—1933年）出版以来，还有一种观点占据主流地位。这种观点认为，

二月革命不过是俄国革命的初期阶段，它最终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超越。托洛茨基指出了“二月革命作为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失败的命运”，认为“二月革命只是一层外壳，其中内蕴着十月革命这一核心”。

由波克罗夫斯基主编并于1927年在苏联国内发行的《十月革命史概论》（第二卷）中，收录了格列金纳的论文《二月的变革》。1938年出版的《全苏联邦共产党史》将二月革命的性质定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分别加以论述。也就是说，二月革命不过是通向十月革命所经过的一个阶段。

17

这一观点在1990年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解体后趋于冷落，而与前述米留科夫相近的评价重新活跃起来。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

实际上，二月革命后的革命动向到底如何呢？

4月，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向协约国发出照会（日期为18日），上面明确写道：“将世界战争进行到底，直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俄国全体国民的意志。所有国民都自觉意识到共同的责任，使得这份意志更加坚定。”消息传回国内后，首都民众爆发了激烈的抗议游行（“四月危机”），米留科夫被要求下台，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主动辞职。5月，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所谓的“联合政府”，二月革命中的英雄克伦斯基担任陆海军部长。6月，克伦斯基按照协约国的计划，对德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六月攻势”）。但是，这个决定却越发加剧了临时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7月，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走上街头，高喊“打倒临时政府”，发起了武装示威游行（“七月流血事件”），但遭到临时政府镇

压，以失败告终。针对违抗军令的前线士兵，克伦斯基恢复了死刑制度。到了8月，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要求强化政府和军队体制，以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并向克伦斯基提出在后方也恢复死刑等要求。克伦斯基没有接受这些要求，并依靠苏维埃势力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军事政变。

临时政府为了建立新政府雏形，召开“民主会议”，成立了“预备议会”。但这些组织都劝说临时政府退出战争。不论是在临时政府周围，还是在立宪民主党内部，都充满了停战的呼声。在苏维埃政权中，对临时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的左派占到了多数，这
18 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这场新革命的爆发。

十月革命与列宁所希望的不同，并不是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这次革命以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权主席托洛茨基为中心，通过加固防卫体制，保护苏维埃机构免受攻击，从而架空临时政府，实现了革命的胜利。

10月25日早晨，首都所有重要地点都被宣誓效忠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军事委员会的部队所掌控。临时政府的官员们被困在冬宫，首相克伦斯基先一步逃走了。这天夜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接管了冬宫，临时政府其余官员的人身自由遭到限制。那些“十月武装起义”“革命军向冬宫发动总攻，推翻临时政府”等，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夸大的说法。苏维埃大会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苏维埃政府成为独立的权力主体，并决定实施以下五项政策。

- (1) 提议立即进行民主主义性质的和谈并立即停战；
- (2) 没收地主所有土地并交给农民委员会；
- (3) 实现军队的完全民主化；
- (4) 由工人统管生产；
- (5) 召开立宪会议。

大会持续了26天，首先通过的就是《和平法令》。法令通过后，全体成员起立并高唱《国际歌》。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描述了这一令人感动的瞬间。

之后大会又通过了《土地法令》，并最终选举产生了以列宁为领袖的苏俄临时工农政府。

由此可见，二月革命所展现出的工人、士兵革命中的乌托邦式志向一路高歌，在十月革命中达到了顶点。十月革命希望能以理想中的民主主义方式结束世界大战，但未能如愿。不过，十月革命彻底实现了军队的民主化。11月，军事人民委员会成员克里连科明确表示，下一步将把废除军官选举制、废除阶级和军事法庭提上日程。12月，克里连科提出了《关于全体军人权利的法令》以及《关于军队选举制与权力组织的法令》。这两个法令一直实施至1917年年底。十月革命作为一场反战反军的革命，从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看，是二月革命所开创的反战反军、追求和平的革命的完成之作。¹⁹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十月革命延续并完成了二月革命。正因此，俄国革命点亮了人们的希望之灯，使全世界为之震撼。

如此看来，可以说二月革命才是俄国革命中最为根本性的革命。

列宁领导的“第三次革命”

然而事实上，俄国革命并没有像民众所期望的那样带来和平且没有军队的社会。和平议案没有得到欧美的响应，德、奥还在大举入侵俄国。战火不断，但是军队已经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发动了“第三次革命”，认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动革命战争，才能将俄国从世界大战中拯救出来。列宁通过十月革命掌握了政权，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并以社会主义之名发动了政变。

内战逐渐展开，列宁政权组成红军，通过“契卡”，建立了强有

力的共产党专政国家，平息农民起义，构建了国家社会主义、战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基础架构，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此诞生，取代了俄罗斯帝国。此后又以苏联为根据地创建了共产
20 国际和世界共产党，正式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宣战。

发展到这里，不得不说俄国革命已经偏离了二月革命的初衷，开启了新的篇章。

俄罗斯帝国与 世界大战 ²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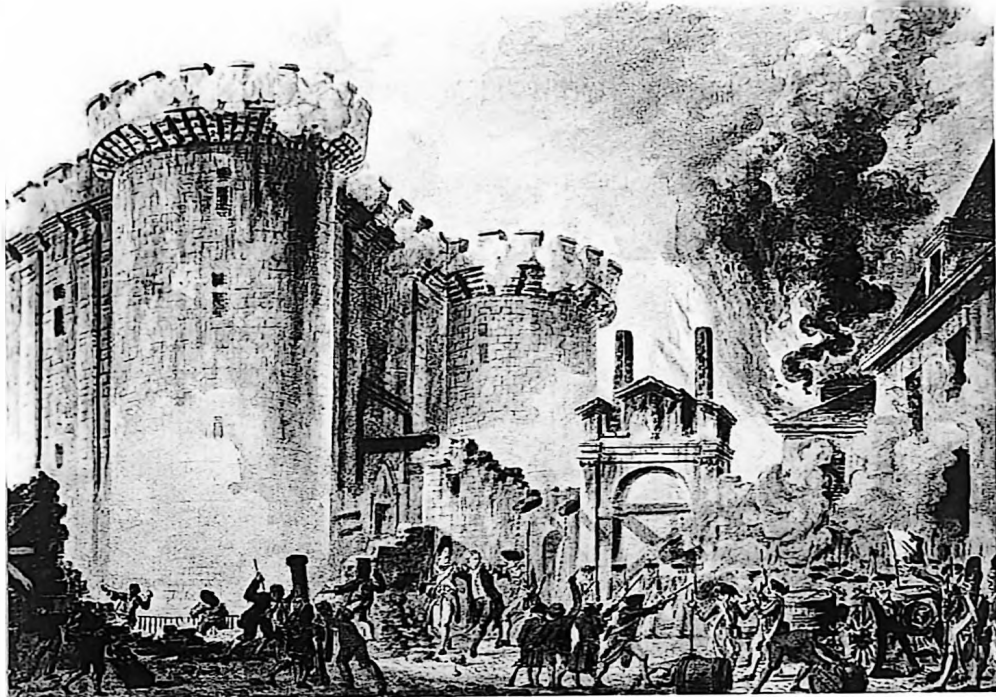
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庆典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此后十年，整个欧洲都为之震荡。革命爆发的起因是国王召集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国民议会不满国王关闭议会，进行抗议，并宣布在立宪完成之前坚决不予解散。对此，巴黎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突袭并攻占了巴士底狱。8月26日，国民议会通过《人权宣言》，宣布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至此，等级制度遭到否定，基本人权获得了承认。

1791年6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企图逃往国外，在出逃途中被拦截。同年9月30日，立宪会议制定了君主立宪制宪法，立法议会召开。立法议会向保守的奥地利、普鲁士王朝发动了革命战争。法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唱起《马赛曲》，蜂拥而至巴黎的联盟军与巴黎市民共同发起了“1792年8月10日起义”。杜伊勒里宫被攻占，王权宣告结束。拥有新的立宪权力的国民公会成立，并于9月21日宣布实行共和制。在国民公会中，最初吉伦特派占据优势，但随后雅各宾派的势力得到发展。1793年1月，原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被押上法庭，在巴黎广场的断头台上被公开处刑。吉伦特派日渐式微，雅各宾派发动民众于6月逮捕了吉伦特派，建立起独裁统治。此后，法国大革命进入血腥时代，恐怖统治开始发挥强大的威力。1794年7月，热月政变爆发，罗伯斯庇尔一派遭到逮捕，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正式结束。1789—1794年这六年，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1]

- 23 当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俄国还处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统治之下，属于启蒙性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农奴制国家。叶卡捷琳娜女皇具有纯正的德国血统，却成为俄国的专制君主。对于俄国国家权力的本质，她曾表示：“治理俄罗斯帝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



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上）
及《人权宣言》（1789年）（右）



家，只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舍此皆为下策。因为其他统治形式很难使皇命迅速付诸实施。”^[2]

因此，对于从法国传入的自由思想，叶卡捷琳娜自然是虎视眈眈，意图阻止其传播。第一位牺牲者就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年）一书的作者拉吉舍夫。该书由于批判农奴制度而成为禁书，拉吉舍夫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叶卡捷琳娜女皇死后，她与丈夫彼得三世所生的大儿子保罗一世继承了皇位。保罗一世不满母亲为了登基而操控的一系列宫廷斗争，如推翻彼得三世，制定了新的皇位继承法，规定皇位只能由直系男性后裔继承。然而保罗一世性格古怪，言行荒诞，于俄历1801年3月11日（以下均为俄历*），在城堡中被发动宫廷政变的贵族联合近卫军刺杀，而由叶卡捷琳娜十分疼爱的长孙亚历山大继承了皇位。

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俄国遭到了在法国革命中崛起的拿破仑军队的侵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的贵族们视死如归，奋力击退了法军，攻入欧洲，并于1814年攻陷巴黎。然而，获胜的
24 俄军将领接触到弥漫在欧洲的解放氛围并为其所感召，回国后开始了反抗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斗争。他们成立了秘密组织，主张革命。这就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爆发的历史背景。

1825年12月14日，亚历山大一世去世，皇位继承人迟迟未登基。十二月党人的军官们趁着这一权力的空白期，率领3000名近卫

◆
俄历 本书原则上根据俄国历法来记录日期，但在必要时也会采用公历，或者俄历、公历并用，届时将予以说明。19世纪时，俄历比公历晚12天；20世纪时，俄历比公历晚13天。

十二月党人 指俄国一批从事革命活动的贵族军官。他们因在12月发动武装起义而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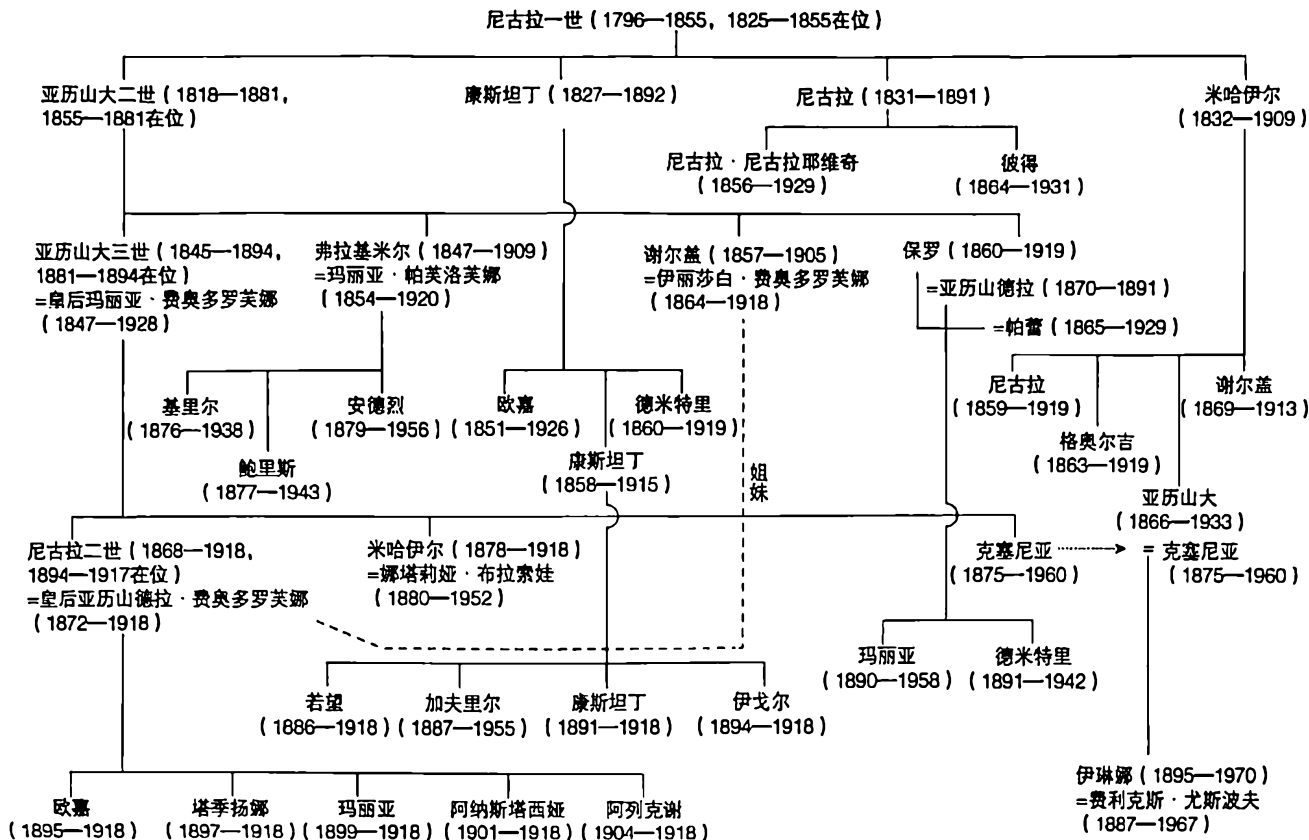
1825年12月14日，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包围了集结在元老院广场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军。正面深处即是元老院广场（克里曼作于20世纪30年代）

军在首都的元老院广场集合。但起义军并未进攻，迅速即位的尼古拉一世（先皇最小的弟弟）调集军队包围起义军并进行炮击，起义遭到镇压。1826年7月13日，彼斯捷尔等五名起义军统帅被处以绞刑，一百多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也纷纷放弃贵族身份，追随丈夫而去。

一年后，在一座可将莫斯科全市尽收眼底的山丘上，两名贵族少年紧紧相拥，誓要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遗志，倾其一生与君主专制制度做斗争。这两名少年便是赫尔岑和奥加廖夫。^[3]这说明俄国的贵族和知识青年仍然在继续战斗。

与权力做斗争的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压。赫尔岑在其之后的著作《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中这样写道：

罗曼诺夫王朝谱系图



我们国家那令人发指的黑暗命运笼罩在所有人头上，冲击着想要在沙皇统治下努力抬起头来的人们。不容喘息的命运将诗人、市民、思想家们逼向死亡。 26

.....

雷列耶夫被尼古拉处以绞刑；普希金38岁时死于决斗；格里鲍耶陀夫在德黑兰被斩首；莱蒙托夫27岁时在高加索死于决斗。……别斯图热夫在经历了西伯利亚劳役后，年纪轻轻就死在了高加索。《圣经》中说：“那些欲用石头攻击预言者的民众会招致灾难吗？”不过俄国的民众无须担心，因为除了不幸的命运，他们一无所有。^[4]

1848年，欧洲再次掀起革命的浪潮。从巴黎开始的革命席卷柏林和维也纳，战火最终蔓延至匈牙利。这时，俄国沙皇派遣反革命军队前往欧洲。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死于哥萨克骑兵的枪下。尼古拉一世的权力成为镇压欧洲革命强有力的关键武器。马克思将沙皇俄国称作“欧洲宪兵”。赫尔岑同反动的俄国抗争，在流亡途中加深了自己的思想，深刻剖析了俄国的农村公社，并构建了村社社会主义理论。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十年，俄国就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了英、法、土（土耳其）联军。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农奴制度，在欧洲的现代国家以及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经济实力面前，都不得不甘拜下风。虽然农奴出身的士兵英勇抗战，在经历了349天的鏖战后，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还是未能免于沦陷。俄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官僚中批判现有体制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撰写政论并在国内传播。这些政论被刊登在了赫尔岑在国外出版的《钟声》和《北极星》等报纸和期刊上，并再传回俄国国内。

塞瓦斯托波尔沦陷后，1855年8月25日，库尔斯省的省长瓦卢 27

耶夫立即撰写了一篇政论。

战争进行到现在，我们已经把半个欧洲拱手相让。和敌人相比，我们的实力差在哪儿，有多差，已经不言自明。政府的自诩自夸，已不再能掩盖这些事实。我们的海军没有舰船，我们的陆军没有大炮，根本不具备同等作战能力。……说到调配兵力，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铁路。可我们不仅没有铁路，甚至连街道都不够用。

……

我们的国家，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5]

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2月突然离世，亚历山大二世继承皇位成为新的沙皇。他签署了屈辱的《巴黎和约》以结束战争，并在停战诏书中宣布了改革路线。同月，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省的贵族表明了解放农奴的决心。他劝说众贵族道，地主与农奴处于敌对状态，而这一状态“迟早”要被打破，“与其等着底层造反，不如由上层领导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所领导的一系列改革，被统称为“大改革”。在此期间，沙皇俄国废除了农奴制，推进铁路建设和工业化，并引入了法庭陪审、地方自治、大学自治等一系列现代社会制度。可是，
28 这些现代化改革均是以专制君主拥有至高权力为前提而进行的，因此未能触及专制制度本身，无法掀起政治改革。换句话说，由于保守贵族试图通过建立立宪制来阻止改革，人们愈加认定，沙皇专制才是改革的牢固保障。^[6]

俄国专制政府对激进的反对派进行了疯狂镇压。1862年，反对派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现代人》杂志主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并被永久流放到西伯利亚。1863年，波兰起义爆发，也遭到当局镇

压。仅在立陶宛省，负责镇压的军队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就将128名波兰人处以绞刑，并将9423人流放至俄罗斯与西伯利亚地区。^[7] 1866年4月4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像往常一样在夏宫散步，离开之际，原喀山帝国大学学生卡拉科佐夫持枪向沙皇射击。一名路人临机应变，迅速按住了卡拉科佐夫的手臂，使得子弹射偏。卡拉科佐夫被押至沙皇面前，沙皇问：“你是波兰人？”路人因拯救了沙皇性命被封为贵族，犯人卡拉科佐夫被处以绞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倡导农奴解放，被赞颂为“解放者”，而革命派对这位“解放者”的首次刺杀活动，为“大改革”时代画上了句号。

19世纪60年代末，首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但无一例外遭到了镇压。在探讨未来举措的过程中，民粹派青年革命运动爆发。学生们在“大改革”中获得了利益，普通民众却一无所获。民粹派青年革命运动便是要替民众讨回公道。他们要求解放农村公社，给予公社土地和自由，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前进。1874年的“到民间去”运动掀起了第一朵浪花，之后“土地与自由社”成立，1879年民意党（“人民意志党”）执行委员会诞生。该党以暗杀沙皇为主要斗争手段，首要目的是召开立宪会议。

1879年4月，一名前小学教师在冬宫广场枪击沙皇。同年11月，沙皇乘火车前往莫斯科，民意党人在列车即将到达莫斯科之时引爆了炸弹。1880年2月，民意党人在冬宫（现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放置并引爆了炸弹。

沙皇政府任命洛里斯-梅里科夫将军领导打击针对沙皇的恐怖活动。梅里科夫将军还筹划出一份政治改革方案，得到了沙皇的认可。该方案虽然称不上立宪制方案，但依然透出了些许民主的亮光。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在首都再次发起暗杀行动，从路旁向沙皇投掷炸弹，亚历山大二世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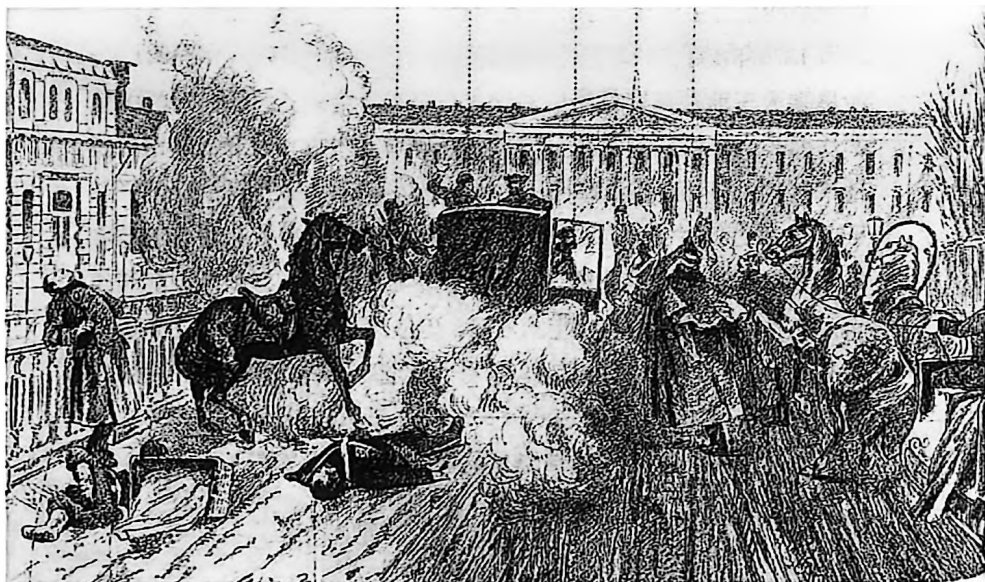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向新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寄信，表示只要召

开立宪会议，便停止恐怖活动。但不知为何，这封信没能交到亚历山大三世手中。新沙皇对热利亚博夫、佩罗夫斯卡娅等五名主要参与刺杀行动的民意党人进行审判，并将五人处以绞刑。继被处死的五名十二月党人之后，这五名民意党人成为新的不甘压迫的知识分子的神圣象征。亚历山大三世撤回了父皇亚历山大二世认可的政治改革方案，并于1881年4月29日发布诏书，维持原来的专制制度。^[8]

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政局回归了平稳。然而，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突然去世。皇太子尼古拉二世即位，并很快与未婚妻——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的女儿完婚。1896年5月14日，加冕大典举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从此走上政治前台。

就这样，沙皇俄国在一如既往的专制体制下，经历了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时期，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东洋岛国日本兵戎
30 相向。日本虽然与沙俄当时同为落后国家，却是拥有宪法、议会、

民意党人在首都从路旁投掷炸弹，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3月1日）





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1894年）

首相的天皇制国家。1904年1月27日（公历2月9日），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沙俄与奉行天皇制的日本排兵布阵，日俄战争打响。俄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屡战屡败，最终军事重地旅顺陷落。旅顺的陷落，极大地动摇了沙皇政府的专制权威。^[9]

同一时期，在俄国国内，1905年1月9日，东正教加邦神父率领首都工人及其家属数十万人浩浩荡荡地向冬宫进发，以寻求“真实与正义世界的实现”。加邦神父所领导的工人组织是获得警方认可的工人亲善团体，他一直希望能通过这一组织向沙皇请愿，只是苦于没有契机。在听到旅顺陷落的消息后，加邦认为此时正是时机，于是起笔撰写了请愿书并广泛募集签名。他在请愿书中将立宪会议的召开描述为“真实与正义世界的实现”，并表示，如若沙皇不同意这些要求，那么请愿民众将不惜死在冬宫前面。工人们从首都各地赶来，向冬宫集聚。他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军队的威压面前也毫



1905年1月9日，“流血星期日”事件（马格夫斯基作于1905年）

不退缩。士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死伤甚众（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00人左右）。普通民众对沙皇的崇拜开始坍塌，罢工浪潮很快席卷全国。“流血星期日”事件成为“1905年俄国革命”（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开端。¹¹⁰¹

5月，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终于完成环球航行，挥师北上，前往日本海。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率领联合舰队迎击。在对马海峡战役中，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沙皇政府的威信自

此一落千丈。6月，在波兰的罗兹爆发大罢工，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也发生了海军叛乱，这些对沙皇政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俄日代表在朴次茅斯坐在了议和的谈判桌旁。俄方代表维特无视沙皇意志，决定采取妥协态度，将南库页岛割让给日本。8月23日，双方签署和约。

在此期间，俄国众高校因不在警察监视范围内，成为革命的解放区，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也扩大到全国。革命热情不断高涨，终于在10月达到了顶峰。10月7日，在莫斯科爆发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发展为全国性的政治大罢工。除工人外，学生、教师、市民、公职人员等也纷纷加入进来。在圣彼得堡，工人们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即工人苏维埃。维特从朴次茅斯和谈归国后，为稳定政局，建议沙皇给予公民自由并开设国家杜马。沙皇尼古拉二世起初犹疑不决，最终在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和叔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劝说下，于10月17日颁布了《十月诏书》（又称《十月十七日宣言》），承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可侵犯，公民拥有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以及法律未经国家杜马通过无法生效等。诏书还宣布设立首相一职，由维特就任。³¹

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基本上都对《十月诏书》及后续举措表示满意，但工人苏维埃认为应当继续推进革命，农民也进一步推进了反抗地主的斗争，因此在人民内部出现了裂痕。俄国当局逮捕了弗鲁斯塔列夫·诺萨利和托洛茨基等圣彼得堡苏维埃的骨干。

1906年2月至3月，国家杜马第一次选举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该选举采取了分类别、分阶段的形式，首先将全国选民分为地主、市民、农民、工人四类，各类别内再分阶段进行选举。在革命派内部，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宣布抵制选举，最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则选择无视。最终，继承了解放同盟衣钵的立宪民主党获得448个议席中的153席，稳健的农民劳动派获得117席。国家³²

杜马设置在塔夫利宫。

1906年4月23日，俄国颁布钦定宪法，即《基本法》。在革命浪潮逐渐退却的大背景下，可以说这部宪法显得极为保守。该宪法第4条规定“俄罗斯沙皇拥有神授的最高专制权力。对此不只要畏惧，还应衷心服从”，明确表示坚持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国体。第7条规定“沙皇陛下与国务会议及国家杜马一同行使立法权”，第44条（最终版第86条）规定“所有新法律须经国务会议及国家杜马审议通过，并经沙皇陛下同意后方能生效”。国务会议即上院，由沙皇任命的议员和各团体选出的代表组成。国家杜马即下院，由国民选举的代表组成。沙皇拥有立法和召开议会的权力（第8条），以及绝对的统治权（第10条）。此外，沙皇是外交谈判的最高指挥者（第12条），拥有宣战及媾和的权力（第13条），同时担任俄国陆海军的最高统帅（第14条）。这样的制度，似乎将其称为专制立宪制更为恰当。马克斯·韦伯称其为“伪立宪”。

这部宪法首次明确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虽然等级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这是俄国在历史上首次跨越了等级差别，将全体国民统一视作臣民。不过，在该宪法中，臣民基本上并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义务的主体。^[1]

在这一体制下，首相斯托雷平主持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斯托雷平出身名门贵族，思维理性，曾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后在西部及农民较多的省份担任省长。他的核心理念是实行土地改革，促使农民从农村公社中脱离出来。于内，他对革命运动进行无情镇压；于外，他展现出亲英、亲德的和平姿态，试图系统性地推进改革。

但是，斯托雷平的改革之路并不平坦，屡屡陷入被称为“斯托雷平综合征”的窘境。下院（国家杜马）总是认为他的改革法案过于保守，于是频频做出修改。然而法案递交到上院（国务会议）以

后，他们认为哪怕是原本的草案都显得过于激进，于是要么再次修改，要么干脆束之高阁，任其蒙尘。为了打破僵局，斯托雷平不得不剑走偏锋，搬出宪法第87条（当时的第45条），将国家杜马暂时关闭，在此期间以颁布沙皇敕令的形式公布法律。1910年，他运用该手段颁布了有关在西部诸省扩大地方自治制度的法案。这种做法不仅压制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甚至沙皇的权限也成为其工具，无疑会引发沙皇的不满。1911年9月，在基辅的一家剧院里，斯托雷平在沙皇眼前被一名曾做过特务警察的犹太青年枪杀。但事实上，斯托雷平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1906年宪法体制已经明显步入死局。

对1906年宪法体制的猛烈抨击首先来自军队内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失败后，从1906年开始，军人们对军事思想及军队体制展开了批判性讨论，之后更是愈演愈烈。1906年，陆军大学的优秀军官亚历山大·涅兹纳莫夫（时任参谋）出版了《从日俄战争的经历谈起（一个参谋的观察）》，原西伯利亚第三军团参谋长耶夫盖尼·马鲁图伊诺夫出版了《惨痛的日俄战争》等书。^[12] 军人们呼吁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对俄国整体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造。他们认为，俄国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和国家体制，才能夺取20世纪战争的胜利。然而，由于俄国军人发誓效忠沙皇，受到严格制约，所以军队内部的批判没能像奥斯曼帝国末期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那样成为由改革派军官领导的广泛运动。

对1906年宪法体制的另一股本质性的批判潮流，则来自莫斯科的资产阶级。批判自1910年便已公开出现，其核心人物是莫斯科纺织产业大亨巴维尔·里亚布申斯基和亚历山大·柯诺瓦洛夫。里亚布申斯基家族除拥有纺织工厂外，还开设私人银行，形成了类似财阀的垄断性联合企业。1913年，里亚布申斯基就任新设立的纺织产业工厂主协会会长。^[13]

里亚布申斯基和柯诺瓦洛夫在1905年革命期间，属于莫斯科资

本家中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青年派”，不过最终他们选择了支持1906年宪法体制。^[14]但是，在1910年开始的“资产阶级左翼化”运动中，他们成为中坚力量。1911年1月至2月，在如何处分参加追悼托尔斯泰的罢课运动的学生问题上，莫斯科帝国大学与文化教育部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校长马努伊洛夫等人辞职，并被逐出校门。107位教授和讲师辞职以示抗议）。在此期间，柯诺瓦洛夫和里亚布申斯基获得了66位莫斯科资本家的签名，联名进行抗议。^[15]

1912年，资产阶级活动的方向更加明确。里亚布申斯基早在1907年开始，便与弟弟布拉基米罗以及托勒柴科夫、斯密鲁诺夫、布鲁伊斯基等人一起出版日报《俄国晨报》，而在1912年1月1日，该报这样写道：

值此新年之际，让我们举杯，致敬当代俄国的第三股力量，致敬资产阶级！……贵族们日渐没落，官僚们依然在指点江山，而不管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财富上，资产阶级都已经远远地甩开了他们。为了这股力量光明的前途，干杯！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日趋强大的资产阶级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欢迎健全的、具有创造性的自我主义，欢迎致力于个人物质富足并力争建立集体组织的社会理想。只有这种创造性的自我主义、国家的自我主义、个人的自我主义，才能将俄国从战败、衰颓、苦痛的泥沼中拯救出来，才能建立崭新强大的俄国，才能为我们带来胜利！^[16]

- 35 里亚布申斯基于1月30日和2月1日主持了旧礼仪派的第十二届大会。旧礼仪派是17世纪从俄罗斯东正教分离出来的宗教派别，但在19世纪又被俄罗斯东正教所接纳。莫斯科的很多商人都是旧礼仪派的信徒，过去始终支持保守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即十月党的古

契柯夫。^[17] 不过此时，他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4月，莫斯科工商业界代表举办宴会，迎接科科夫佐夫首相，里亚布申斯基在宴会上的致辞颇受赞赏。他在致辞的最后举杯提议：“不为政府，而是为了苦难深重、祈盼真正解放的俄国人民，干杯！”^[18]

1912年4月4日，西伯利亚勒拿河金矿的170名工人被残忍杀害。此事一经报道（《红星报》4月8日），便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工人罢工抗议的浪潮，促发了工人运动的新一轮兴起。里亚布申斯基认为，这场罢工是工人“公民义务”的体现，是“当下极度需要的政治因素”，主张从精神上支持工人运动。^[19] 这场罢工斗争的规模在1914年上半年便已经超越了1906年的水平，其中参与政治罢工的人数甚至可以与1905年相匹敌。^[20]

另一方面，在1912年1月的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上诞生的、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国内“革命危机愈加严峻”，喊出了“民主共和制”“日均劳动八小时”“没收全部土地”的口号，积极开展活动。到“一战”前夕，他们已经掌控了首都工人斗争的领导权。

36

虽然当时的俄国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转向左翼、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左翼政党愈加活跃等动向，但1912年9月至10月举行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并没有体现出十分明显的变化。右派议席由46个增加到65个，保皇派和稳健右派的议席从102个增加到了120个。换言之，右派势力由148个议席大幅增加到185个。与此相对的是，十月党领袖古契柯夫落选，议席由120个降至98个，显示出中道衰落的迹象。此外，虽然立宪民主党议席涨幅甚微，仅由52个增至59个，但进步派议席由36个增至48个，而且柯诺瓦洛夫首次当选，显示出时代的前进方向。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党和进步同盟的势力压制了十月党，并扮演重要角色。左派政党中，劳动派的议席从14个减少到10个，但社会民主工党议席由13个增至14个，基本

维持原状。更值得注意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在所有的工人选区大获全胜，一举获得6个议席。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劳动派的克伦斯基、社会民主工党的斯科别列夫等人也都首次当选议员。此外，三个民族党派的议席从27个减至21个，略有下降。^[21]无党派则拥有7个议席。（详见后表“第四届国家杜马党派及议席情况”）

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召开之前，11月11日至13日，柯诺瓦洛夫等人召开了进步同盟成立大会。这是莫斯科委员会（以里亚布申斯基、柯诺瓦洛夫、格奥尔基·李沃夫等人为代表）与圣彼得堡委员会（以旧地主议员叶夫列莫夫、市议员费奥多罗夫、国务会议议员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经过一系列磋商后决定成立的新政党。此后，里亚布申斯基的《俄国晨报》成为进步同盟实质上的机关报纸。^[22]

俄国人民大东方共济会 这一秘密政治团体的相关记录在1955年出版的米留科夫回忆录中首次出现（P. N.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 II, New York, 1955, p.332），之后在库斯科巴等人的私人信件中又被明确提及。1963年，克伦斯基在回忆录中确认了该共济团体的存在（A. Kerensky, *Russia and History's Turning Point*, New York, 1965, pp.88-90）。从1965年开始，列奥波尔德·海姆森和乔治·卡特科夫等多位历史学家均曾在论述中谈及该历史事件〔L. Haims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Stability in Urban Russia, 1905-1917”, *Slavic Review*, Vol. XXIV, No.1 (March 1965), pp.13-16. G. Katkov, *Russia 1917.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London, 1967, pp.163-173〕。笔者在1968年的论文中认为该组织的存在是事实，并将其作为立论的基础（和田春树，《二月革命》，见江口朴郎编《俄国革命研究》，中央公论社，1968年，325—326页）。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并未对该组织给予太多关注。不过，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后，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被捕的涅克拉索夫的笔录于1998年完全公开，斯塔尔切夫以胡佛研究所的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调查为基础推进研究，已基本查明该共济团体的相关活动（V. I. Startsev, *Tainy russkikh masonov*, Sankt-Peterburg, 2004）。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资料也已公开出版（B. I. Nikolaevskii, *Russkie masony i revoliutsiia*, Terra, Moscow, 1990）。

【右派】

右派..... 65 议席

马尔可夫、普利斯科维奇等人。

反对《十月诏书》，要求全面恢复专制制度。

保皇派和稳健右派..... 120 议席

舒尔金、巴拉绍夫等人。支持斯托雷平改革。

【自由派】

十月党..... 98 议席

罗江科、多米托留科夫等人。该党主席古契柯夫落选。

支持《十月诏书》，支持1906年宪法体制，以斯托雷平执政党自居。

立宪民主党..... 59 议席

米留科夫、申加廖夫等人。主张立宪主义，谋求君主立宪制。

【进步派】

进步派..... 48 议席

叶夫列莫夫、柯诺瓦洛夫等人。新党，采取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

【左派】

劳动派..... 10 议席

克伦斯基、韦尔希宁等人。民粹派，要求土地改革。

（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党..... 8 议席

齐赫泽、斯科别列夫等人。马克思主义右派。

（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 6 议席

彼得罗夫斯基、巴达耶夫等人。马克思主义左派、列宁派。

【民族三派】

穆斯林团体

立陶宛·白俄罗斯团体

波兰科洛派 共21 议席

无党派..... 7 议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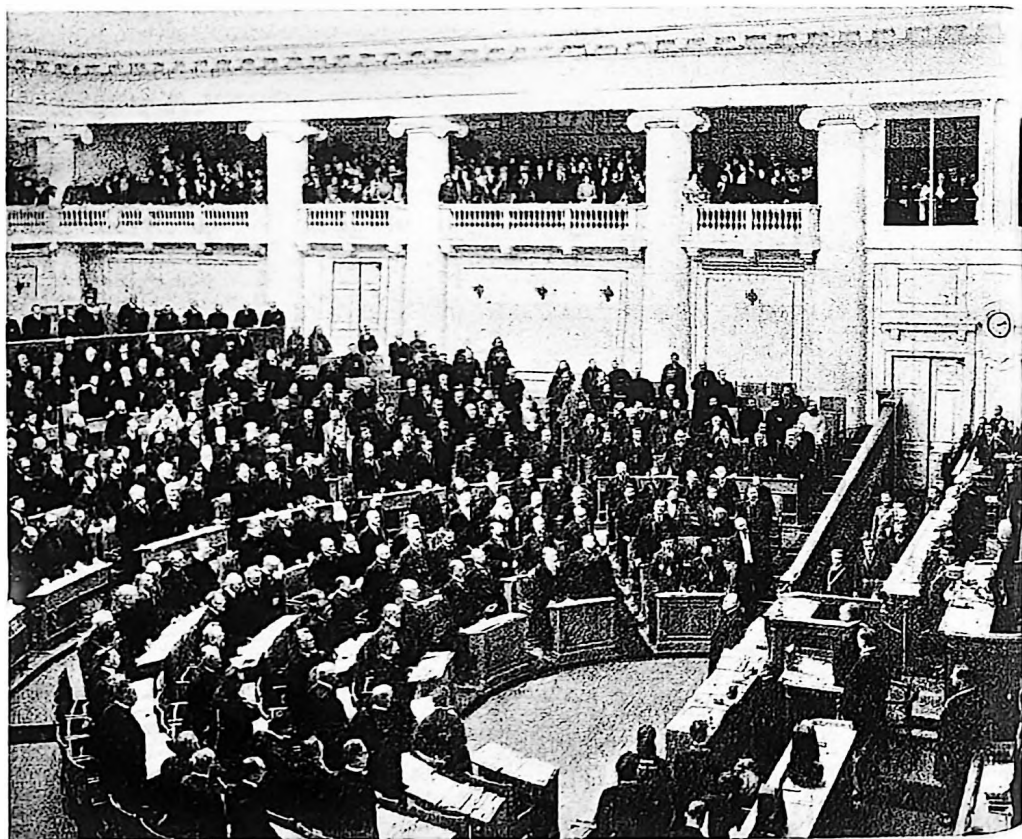
议员总数 442 人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ОЕ ОБОЗРѢНІЕ.

Безплатное приложене къ г.
„Головъ Москвы“.

ИЗДАНА ЦѢНА (съ перес. и дос.): на 12 мѣс. 2 р., на 6 мѣс. 1 р., на 3 мѣс. 50 к. ♦ АДРЕСЪ: Москва, Леонтьевская, 5. ♦ ЦѢНА ЗА ОБЪЯВЛЕНІЯ: за строку печати (вѣд.) послѣ 10 дн.

Открытие 4-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莫斯科之声》对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召开做了报道，图为该报的画报附刊（1912年12月2日）

更值得注目的是，1912年，“俄国人民大东方共济会★”成立并开始招募会员。此处必须提到一个人，即该共济会的第一任最高会议主席涅克拉索夫。正是他，使得原本只是法国共济会俄国支部的小团体，壮大成为独立的俄国共济会组织。涅克拉索夫是托木斯克理工学院教授，在第三届全国杜马中担任立宪民主党议员，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继续连任。^[23]

关于成立该组织的政治目的，涅克拉索夫在1939年7月的供述³⁸中说，是“为了祖国的解放以及巩固解放而斗争”。他认为，“1905年革命的最大失误就在于进步势力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四分五裂，让沙皇政府趁机各个击破。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24]。柯诺瓦洛夫、叶夫列莫夫（进步同盟）、克伦斯基（劳动派）、普罗柯波维奇、库斯科巴（原社会民主主义者）、齐赫泽（孟什维克）、加尔珀兰、索科洛夫（律师）等议员和活动家也纷纷成为该组织成员。^[25]1912年，克伦斯基在刚当选国家杜马议员之后便加入进来。他指出，“舆论并不看好将多个政党朝向共同目标统一起来的联合组织”，因此只能采取这种共济会秘密结社的形式。^[26]这一秘密组织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领域分设机关单位，如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城市设立分部，面向议员、作家等人群成立相关团体等。各机关单位的代表构成了该组织的最高评议会。

在这一阶段，柯诺瓦洛夫等人还于1914年与莫斯科的孟什维克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组成了情报委员会，并一度答应了听命于列宁的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的请求，向布尔什维克党提供大会举办时的资金支持。斯切帕诺夫是共济会的成员这一点也并非秘密。^[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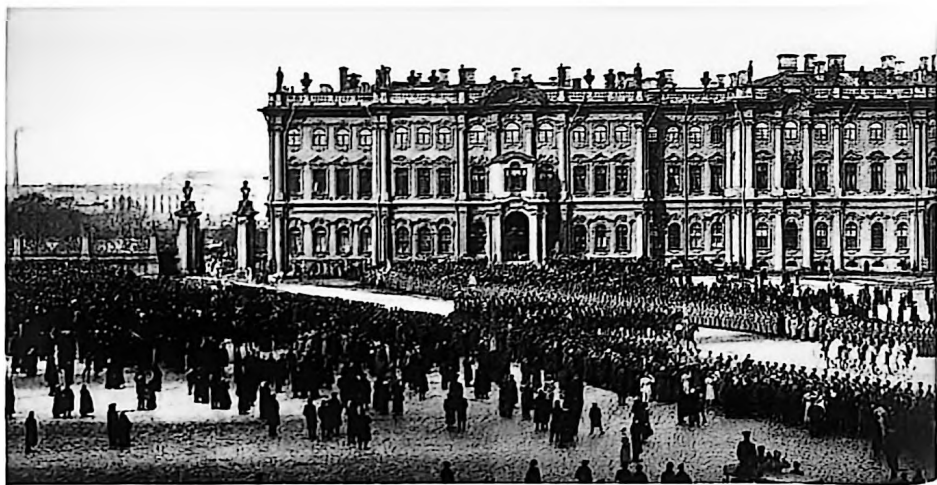


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共济会最高会议主席

当然，这条囊括了从左翼自由主义人士到革命民主派的路线至此还称不上是明确的政治路线，只能说诞生了相应的氛围和人际关系。

39 1912年11月15日，第四届国家杜马召开，前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十月党成员）再次当选。1912年所展现出的新变革尚处于萌芽阶段。要打破1906年宪法体制，结束专制政体，依旧任重而道远。

君主专制制度仍在宣告自己的力量，举行了“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庆典”。1913年2月21日（公历3月5日），晴空万里，春风和煦。12时15分，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太子阿列克谢坐进了带篷马车，皇后亚历山德拉和皇太后玛丽亚乘坐轿式马车紧随其后，最后的大马车上坐着四位公主，车队前后配有骑兵排。队列从冬宫出发，朝着位于涅瓦大街的喀山大教堂行进。沿途挤满了军队和臣民，高喊的“乌拉”（万岁）声不绝于耳，迎接着沙皇一家。首都教会和教堂的钟声也被敲响，绵长而肃穆。众位达官显贵早已在喀山大教堂恭候，
40 沙皇随后与他们一同参加了祈祷会。从东方安条克正教会应邀而来



“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庆典”当天的冬宫广场，皇家马车队整装待发（1913年2月21日）

的总主教格力高用希腊语诵祷词，首都主教弗拉基米尔用俄语诵祷词。他们感谢神灵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庇护，祈祷王朝千秋万代。下午4时起，百官在冬宫敬贺祝词，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也位列其中。是夜，市议会大厅举办了隆重的宴会，空中的焰火令人目不暇接，街道上人山人海，一派喜庆景象。^[28]

但是，喜庆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很久。斯托雷平曾将“国内外二三十年的和平”作为国内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但这一前提已经无法确保，因为战争正不断地向俄国逼近。早在公历1908年10月7日，奥匈帝国强行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俄国不得不予以承认，但将此事视为奇耻大辱。1911年，围绕利比亚问题，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俄国受到强烈刺激，获取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支配权的欲望愈加高涨。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保加利亚取得了胜利。俄国起先乐见土耳其的实力被削弱，但战争结束后，俄国不满保加利亚对两条海峡的虎视眈眈，因此试图将其注意力引向西侧。1913年6月，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和希腊之间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果，保加利亚战败，塞尔维亚成为胜者。大塞尔维亚主义不断高涨，俄国成了它的保护伞。

在君主专制制度的威压下，俄国依然保持森严的等级制度，没能成为民族国家。虽然有国家杜马，却无法实行真正的立宪主义。所有的大臣都由沙皇任命，只对沙皇负责。虽然有所谓的首相，却不具备首相领导下的内阁政府。尽管尼古拉二世暂且维持着国内政局，但一旦卷入与德国、奥匈帝国的战争，俄国的政体便难以为继。军人们在日俄战争时遭遇过这一局面，而如今，这已成为全体俄国人民面临的重大问题。1914年2月，右翼政要、前内务大臣彼得·杜尔诺沃撰写了著名的意见书呈给沙皇，将这一问题付诸书面，并予以了解答。⁴¹

右翼反对自由主义，主张维护沙皇专制。此次在联合英法对德

作战的问题上，他们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杜尔诺沃这样写道：

未来的英德战争……将很可能发展为两大强国集团之间的战争。……

到目前为止，与英国的密切关系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将来，这会不可避免地将我们拉进与德国的军事冲突中。……

战争的主要负担，无疑会落在我们身上。（俄国还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战败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社会革命。若是革命热情过盛，可能还会波及战胜国。……在俄国，人民群众都在无意识地追捧社会主义，这无疑会为社会震荡提供最为舒适的温床。……尽管俄国民众具有一定的反政府倾向，但俄国是不可能发生政治革命的。一切革命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国的政府反对派其实势单力薄，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毕竟在人民眼中，（革命派）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并无二致。……

42 若是在战争中取胜，那么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倒也并非无法克服。……可是……若是战败，那么等待俄国的必将是极端形态的社会革命。^[29]

若是俄国战败，便无可避免地会发生严重的社会革命——这一预言正是右翼人士自欺欺人的写照。他们对更为严重的事态视而不见，那就是，危机其实潜伏在战争过程当中。最严峻的事态不是战后爆发革命，而是战时爆发革命。俄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君主专制体制能否存续到战争结束。

世界大战——一点即燃的火药桶

欧洲大战，或者说世界大战，本来就不是俄国所期望的，俄国只是被迫卷入其中。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就这样踉踉跄跄地踏入了战火。

大战的导火索在公历1914年6月28日（俄历15日。在本节即“世界大战”部分，均使用公历日期进行表述）被点燃。这一天，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波黑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51岁的弗朗茨·斐迪南是年迈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侄子，在政治上表现出反俄、反塞的强硬立场。他主张建立将塞尔维亚人也囊括在内的南斯拉夫王国，以此将奥匈帝国扩展为由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组成的三元帝国。^[30]曾任塞尔维亚情报局参谋长的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绰号“阿皮斯”，公牛之意）在奥匈帝



Následník trůnu arcikníže František Ferdinand a jeho choť Žofie obětí atentátu.

Ve Sarajevu, 28. června, 1914, zavražděn následník trůnu a jeho manželka. Vrahové byli zavražděni a jejich těla uložena v hrobě. Vrahové byli zavražděni a jejich těla uložena v hrobě. Vrahové byli zavražděni a jejich těla uložena v hrobě.



První zavraždění následníka trůnu a jeho manželky. Vrahové byli zavražděni a jejich těla uložena v hrobě. Vrahové byli zavražděni a jejich těla uložena v hrobě. Vrahové byli zavražděni a jejich těla uložena v hrobě.

První zavraždění následníka trůnu a jeho manželky. Vrahové byli zavražděni a jejich těla uložena v hrobě. Vrahové byli zavražděni a jejich těla uložena v hrobě. Vrahové byli zavražděni a jejich těla uložena v hrobě.

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公历1914年6月28日）

左：正欲乘车前往医院的皇储夫妇二人。之后在途中遭遇暗杀

右：捷克的日报对暗杀事件进行报道

国吞并波黑之后，创建了秘密组织“黑手会”（正式名称为“统一或死亡”），并策划了对塞尔维亚的敌人——弗朗茨·斐迪南的暗杀行动。^[31]

斐迪南大公此次前往波斯尼亚，是为了检阅在当地举行的军事演习。弗朗茨·斐迪南与妻子索菲亚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的贵庶通婚，未得到皇帝的认可。但此次出行，斐迪南大公决意偕妻子同往。两人的访问日期定在6月28日（俄历15日），然而这一天也正是塞尔维亚人民的国耻日。因为在1389年的6月28日，土耳其军队在科索沃大败塞尔维亚军，迫使塞尔维亚臣服。奥匈帝国皇储选择在这一天访问萨拉热窝，被视为一种挑衅。波斯尼亚总督波蒂奥雷克在邀请斐迪南大公来访时，不负责任地承诺能够保证萨拉热窝市内的安全。然而，与“黑手会”暗中有联系的波斯尼亚当地塞尔维亚民族团体，已经摩拳擦掌做好了恐怖袭击的准备。^[32]

6月28日上午9时45分，斐迪南大公一行人抵达萨拉热窝火车站，之后乘车前往市政厅。10时10分，恐怖分子向斐迪南大公乘坐的汽车投掷炸弹。不过炸弹投偏，斐迪南夫妇安然无恙。到达市政厅后，斐迪南大公提出要去医院看望被炸伤的副官，让妻子在市政厅等待，但妻子索菲亚执意同行。10时45分，夫妇二人再次经过市区，前往医院。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路边，第二拨恐怖分子正持枪以待。在斐迪南夫妇的车辆减速转弯时，普林西普正等在那里。他打出三枪，夫妇二人身负重伤，双双殒命。^[33]

44 6月28日（俄历15日），俄驻奥大使谢贝克给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发去电报，汇报了这一惨剧。29日（俄历16日），收到电报的萨佐诺夫将此事上奏沙皇。^[34]然而，沙皇尼古拉的日记中完全没有关于这一消息的记述。^[35]也许是出于对奥匈帝国的反感，沙皇对奥匈帝国皇储横死异国一事表现得非常冷淡。当时各国的领导人也都没有想到，这起事件会引发整个欧洲的大战。

之后三周的时间里，奥匈帝国政府与塞尔维亚政府之间频繁交换文书，火药气息日愈浓厚。但尼古拉二世对此并未挂心，日记中也没有任何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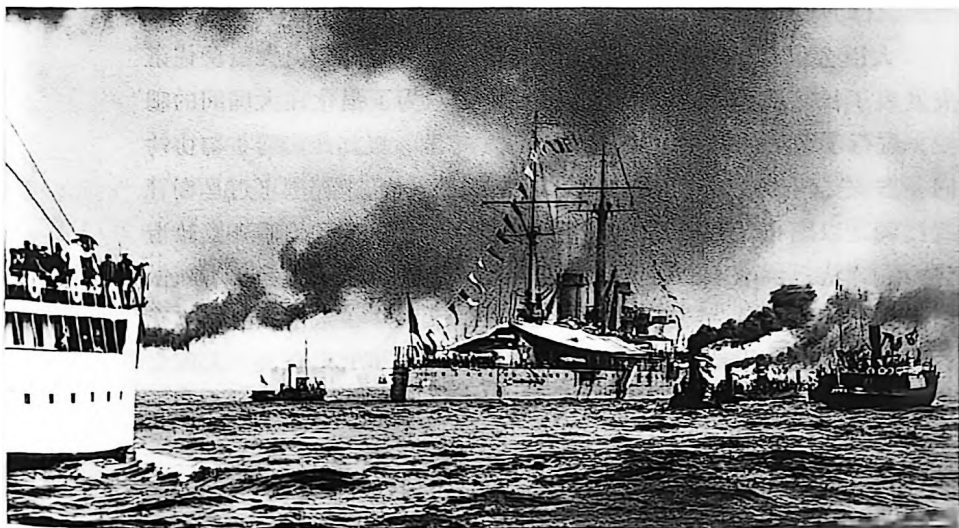
7月20日（俄历7日），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按计划访俄，抵达喀琅施塔得。尼古拉二世前往迎接，并对普恩加莱的到来表示了欢迎。此时奥德之间已是剑拔弩张，但尼古拉二世当天并没有向作为盟国的法国表现出丝毫求援之意，似乎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已迫在眼前。不过，普恩加莱的话倒是意味深长：

陛下尽可放心。法国将一如既往地与盟国紧密合作，为和平与文明，也为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幸福继续努力。¹³⁶¹

三天后，7月23日（俄历10日），普恩加莱启程回国。在告别致辞中，他这样说道：

连日来，针对那些两国共同面临的、需要两国外交官配合

法国总统普恩加莱乘坐军舰抵达喀琅施塔得港（公历1914年7月20日）



行动的问题，两国政府全部达成了共识。相信以后，两国政府也一定会并肩同行。……法俄两国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建立在实力、名誉及尊严基础上的和平。

尼古拉二世的致辞也变得积极起来：

在和平这一共同理想的鼓舞下，两国的外交合作更加顺畅，两国海陆军的友情也更加深厚，这有利于进一步守护两国政府同盟和两国人民的利益。^[37]

直到这时，尼古拉二世似乎才终于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

45 事实上，就在这一天，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48小时内禁止其国内一切反奥运动，解散所有反奥团体，安排奥匈帝国政府代表参加对暗杀相关人员的审讯。

7月24日（俄历11日）上午10时，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得知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后，低语道：“这是要开始欧洲战争了。”有记载表明，沙皇在听取外交大臣的报告后喊到“这太不像话了”^[38]，并下令召集大臣会议。沙皇在第二天的日记里记载道：“（最后通牒中）有八项作为独立国家难以接受的条款。”^[39]

大臣会议于下午3时在耶拉金岛召开。首先，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发表了长篇演说，主要内容包括：德国“为了强化在大国间的霸权，进行了系统的筹备”；同盟国一方（德国、奥匈帝国等）与协约国一方（英国、法国、俄国等）的对立根深蒂固，“德国不过是在寻找托词，以图在最有利的时间，通过武力来建立自己的军事及政治势力”；“从日俄战争的时候开始，但凡发生冲突，俄国都在不断做出让步，德国的行为方式也变得越发厚颜无耻。在塞尔维亚面临存
46 亡危机之时，如果俄国无所作为，将可能在国际上完全丧失大国之

权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恐怕是在德国直接的压力下发出的。若塞尔维亚屈服，则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主权，完全隶属于奥匈帝国”。对于此等要求，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而此举早在德奥意料之中；奥匈帝国或许只是在等塞尔维亚拒绝，然后发兵攻之，任意蹂躏。“俄国不可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巴尔干民族成员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视若无睹。”俄国政策素来不遗余力地拥护斯拉夫各民族，若背弃这一传统，则将“沦为二流大国”。

他认为，如若在德国铁拳之下不断让步，未来难免遭受武力攻击。如此下去，德国只会越来越偏执于强权，变本加厉施以恫吓。这样，俄国一定会被卷入战争。

萨佐诺夫表示，外交大臣的职责在于尽最大努力寻求和平解决的道路，但从已有的信息来看，德奥两国似乎决心摧毁塞尔维亚，给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威信以致命打击。他在演说的最后总结如下：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信，留给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采取比以往更加坚决的态度，声援塞尔维亚。并且，我们应有充分心理准备，那就是如果坚决维护塞尔维亚，则很可能会陷入与中央大国（德奥）的战争。因此，对于帝国政府应采取何种政策，陆海军大臣的决定显得尤为重要。^[40]

继萨佐诺夫之后，农业大臣克里沃申发言。他回顾了日俄战争后俄国的悲惨状况，认为虽然经历了社会性危机，但俄国“完成了改造纲领中最大的部分”。俄国1906年起实行了立宪制，成立了国家杜马，财政也得以健全；但是军队的重建尚未完成，在最新装备方面，能否与德奥进行对等交锋仍是问题。“在俄国，没有人希望战争爆发。因此我们的政策方针必须指向降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这一方面。”⁴⁷

但是，考虑到俄国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不能达成目的，因此克里沃申主张，维持和平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比以往更加坚定的政策。^[41]

他的讲话给大臣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海军大臣格里戈洛维奇相继发言。两人均承认军备重建项目尚未完成，但同时也指出“政策的动摇”对帝国政府绝非好事。在与德奥的外交谈判这一点上，两人均不反对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

之后，财政大臣巴尔克被点名发言。他认为，目前财政稳定，但战争需要巨额资金支出；然而不能仅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事关俄国的名誉、尊严，甚至危及俄国作为大国的存在，那么自己会同意内阁多数派的意见。其他大臣与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及农业大臣克里沃申持相同意见，最后首相戈列梅金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42]

这样，萨佐诺夫的谈判方针获得了内阁的全体赞成，全员就以下内容达成一致：促成维也纳政府放宽时间限制；说服塞尔维亚采取和解姿态；陆军大臣向沙皇请示在必要情况下动员或部分动员敖德萨、基辅、喀山、莫斯科四个军区的兵力等。^[43] 这一结论在当天便汇报给了沙皇，决定在第二天召开有沙皇出席的大臣会议。

会后，萨佐诺夫同塞尔维亚公使进行会谈，表达了俄国对和平的希望以及对塞尔维亚独立的支持。这极大地鼓舞了塞尔维亚政府。

次日，7月25日（俄历12日），六大臣会议于红村召开，尼古拉二世亲自出席。萨佐诺夫再次陈述了前一天的报告内容。尼古拉二世表示有必要和平解决外交问题，但是对军事方面的准备并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请求能够获准进行部分动员。此外，他还主张尽快任命士官学校学生，也得到了沙皇的批准。^[44]

48 至此，俄国进入了战备状态。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其他强国的军队兵员补充是通过地区体系进行的，而俄国并不进行各军区动员，而是采用复杂的方式从其他多个地区补充兵员。因此，

部分动员给之后的总动员带来了极大困难，按理是不应该采取这一方式的。¹⁴⁵¹ 沙皇想避免开战。正是因为了解这一点，大臣们才提出了部分动员的方案，但是陆军大臣应该在大臣会议上就其困难之处进行说明。然而他并未这么做，而是持赞同意见。应该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而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也误解了这一点。

同一天，即7月25日（俄历12日），塞尔维亚给了奥匈帝国一个极具妥协性的回答。¹⁴⁶¹ 另一方面，26日、27日，萨佐诺夫认为奥匈帝国的谈判态度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认为仍然可以努力争取以回避战争。对此，大臣会议也表示支持。¹⁴⁷¹

7月27日（俄历14日），沙皇从萨佐诺夫的汇报中得知奥匈帝国听说了俄国的军事措施后表现得很敏感¹⁴⁸¹，便在当日给塞尔维亚国王发去了电报。

（希望陛下能够采取）决定，既保全塞尔维亚之尊严，又可防止新的战争带来的惨祸。……请陛下相信，无论何时，俄国都不会对塞尔维亚的命运置若罔闻。¹⁴⁹¹

7月28日（俄历15日）晚上8时半，萨佐诺夫拜见沙皇，告知当日奥匈帝国已向塞尔维亚宣战一事。¹⁵⁰¹ 之前塞尔维亚已经充分表达了妥协态度，也正因为如此，大家对宣战一事尤为震惊。此时，萨佐诺夫获得沙皇批准，可进行部分动员。沙皇向德国皇帝发去电报称：“这场宣战是向弱小国家进行的卑劣之战。在俄国国内掀起了熊熊怒火，朕亦深以为然”；在此压力之下，战争迫在眉睫；故而“（望）陛下规劝盟国勿行之无度”¹⁵¹¹。

7月29日（俄历16日），沙皇在日记中留下了如下记录：

今日史无前例地惴惴不安。不断接到来自萨佐诺夫、苏霍 49

姆利诺夫、亚努希科维奇等大臣的电话。此外还一直与威廉二世通过紧急电话商谈。^[52]

沙皇召见侍从武官伊利亚·塔齐西切夫，决定派其前往德国。

当日上午11时，德国大使普塔莱斯拜访了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表示同意促成维也纳政府让步，但希望俄国就此事保密，并且提出不希望俄国草率开始动员，以免给德国的游说工作带来困难。外交大臣和其他高官们分析后一致认为，这不过是德国的托词，旨在拖延俄国的动员安排，赢得时间。

下午3时，德国大使普塔莱斯再次拜访萨佐诺夫，朗读了德国首相的电报内容，表示俄国如不停止战备，德国将动员兵力进入战争。萨佐诺夫也反击称，“现在我对奥匈帝国态度强硬的真正理由已经没有丝毫怀疑”。双方不欢而散。^[53]

之后，外交大臣接到了沙皇的紧急电话，得知德国皇帝发来电报，希望不要让局势升级为战争。外交大臣传达了刚才德国大使的话，并指出与该电报内容的出入。沙皇表示马上和德国皇帝确认，但是批准了外交大臣与陆军大臣、总参谋长协商动员一事。就在此时，奥匈帝国军队炮击贝尔格莱德的消息传来。外交大臣、陆军大臣、总参谋长三人在会议上得出结论，认为德国皇帝所言不可信，俄国应下决心进行总动员。这一结论很快汇报给了尼古拉二世，沙皇最终批准颁布总动员令。^[54]

然而，就在当日晚上9时20分，德国皇帝又发来一封电报，威胁称：奥匈帝国的行动不能称为“卑劣之战”；塞尔维亚不可信；俄国如果仅做两国纷争的“旁观者”，则可免于欧洲战争；但是如若俄国执意进入战备状态，给奥匈帝国带来威胁，事态必然恶化，自己也无法停留在仲裁者的位置上。^[55] 接到此消息，沙皇于当夜11时前要求陆军大臣取消总动员令，仍执行原来的部分动员。^[56] 晚上12时，

部分动员令下达至基辅、敖德萨、莫斯科、喀山四个军区司令。^[57] 50

次日凌晨1时30分，沙皇又发电报给德国，表示即将派遣侍从武官塔齐西切夫少将访问威廉二世，并辩解称此前军事决定系五天前的决定，希望此举没有妨碍德国的调停工作。^[58]

翌日，7月30日（俄历17日）一早，外交大臣与农业大臣通过电话进行商谈，对总动员令的取消表示担心，一致同意劝谏沙皇。之后，外交大臣又于上午11时与陆军大臣、总参谋长谈话，他们二人也表示强烈希望实施总动员令。此后，陆军大臣与总参谋长致电沙皇，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了严厉拒绝，沙皇最后甚至表示此事到此为止。总参谋长又说：“外交大臣现在也在这里，他有话想和您汇报。”沙皇沉默了一会儿后表示可以。萨佐诺夫提出上奏，沙皇回答说：“下午3时和塔齐西切夫一起吧。今天时间很紧。”

下午3时，外交大臣与塔齐西切夫一起谒见沙皇。外交大臣劝谏沙皇称战争不可避免，故而需要早做准备，但沙皇一直未听取其意见。这时，塔齐西切夫插嘴说“确实难以决断”，沙皇则毫不客气地说“进行决断的人是我”，让他闭嘴。不过，经过一小时左右的劝说，沙皇终于决定反对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一事，下达总动员令。外交大臣将此事以电话传达给了总参谋长。^[59]

总动员令的电报于当日下午6时至7时之间发出。预备役出动的时间定在了31日（俄历18日）。^[60]

但是关于这件事，沙皇在日记中并未提及。他内心对此并不满意。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依然在寻找回避对德战争的道路。在命令武官塔齐西切夫带给德国皇帝的信中，他表示，自己也认为对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的暗杀是一部分塞尔维亚人的“大罪”，但并没有证据表明此事与塞尔维亚政府有关，因此不赞成奥匈帝国对塞宣战，支持塞尔维亚政府的回应。“因此，这场战争在我国才会引起极大的愤怒”，自己也无法阻止；虽然对德国作为“和平仲裁者”寄予

51 厚望，但也理解其困难之处。¹⁶¹¹

翌日，即7月31日（俄历18日），大臣会议在佩切卢果夫的农场召开，此时战争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会议最后，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如果开战，自己将亲自担任总司令。他说，在日俄战争期间，自己曾认为“最高统帅应与士兵共同接受命运之考验”，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对此他难以原谅自己，这一次将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大臣们对沙皇的话惊愕不已。首相戈列梅金提出反对，称一旦爆发欧洲战争，国内统治也会变得极度困难；还称如果陛下离开首都，会导致出现的各种问题无法解决。农业大臣克里沃申也表示反对，认为必须避免出现将战争指挥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沙皇的情况。其他大臣也全部表示反对。尼古拉二世似乎受到了打击，但他什么也没说，宣布会议结束。¹⁶²¹

8月1日（俄历7月19日），沙皇在用过早早餐后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宣布任命他为最高总司令。晚上7时，德意志帝国向俄国宣战。

大战的现实

俄历7月20日（公历8月2日。以下日期采用俄历），在冬宫的圣乔治大厅，会集了文武高官及各国公使五六百人。大厅中央设置了祭坛，供奉着喀山圣母像*。早在1812年，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为歼灭拿破仑远征军，在出征斯摩棱斯克之前，曾在此圣母像前祈祷。在进行祝愿俄国胜利的祈祷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宣读了开战诏书：

* 喀山圣母像：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圣像，早在1612年就被视为军事胜利的庇护神。——译者注（凡以此星号标注，均为译者注，不再一一注明。——编者）

如今各国深受不公之伤，当务之急绝非仅援至亲之国，亦应维护吾国名誉、尊严、领土及在大国中之地位。朕深信朕之忠良臣民将为卫吾国土而集结，为之不畏牺牲，一往无前。⁵² 在此严峻考验之时，愿吾国臣民捐弃前嫌，君民戮力同心，凡吾国民皆挺身而出，定能击退蛮敌之攻击。朕在此，深信吾辈事业之正义，歌颂全能之神意，祈祷神佑神圣俄国，佑吾勇敢将士。¹⁶³¹

宣读完诏书后，沙皇走近祭坛，面向画像，举起右手，缓缓说道：

列位近卫军*军官，朕向诸位致意，祝福全军将士。朕在此庄严宣誓：倘国土内尚有敌军一兵一卒，朕决不议和。

这一誓言效仿了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的宣誓，获得了一片“乌拉”（万岁）的呼喊之声。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拥抱了法国大使帕雷奥洛格。周围的人高呼“法国万岁，法国万岁”，冬宫广场也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当沙皇出现在正面阳台时，满广场的民众齐齐下跪，开始高唱俄国国歌，“神啊，请保佑我俄国”。

“这一瞬间，对于跪倒在地的几千人而言，沙皇是神派遣的专制君主，是臣民的军事、政治、宗教领袖，是他们身体和灵魂的绝对主人”——法国大使帕雷奥洛格在日记中如此写道。¹⁶⁴¹

翌日7月21日（公历8月3日），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宣战，法国对此也早有准备，立即宣布向德意志帝国开战。次日，俄国首都圣彼得

* 近卫军：特殊的精锐部队，是军队中的核心力量，由沙皇直接组建，常常负责皇帝的贴身侍卫。

堡的马林斯卡亚广场上的德意志帝国大使馆被暴乱民众破坏。^[65]

开战使得俄国国内空前团结。在7月26日召开的临时国家杜马
53 上，主席罗江科称赞“沙皇与俄国臣民团结一致”，各党代表、各民族代表纷纷发表演说，发誓为战争贡献力量，为政府提供支持。^[66]7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地方自治会，成立了全俄救护伤病将士地方联合会，由原立宪民主党国家杜马议员李沃夫公爵出任负责人。李沃夫出身地主贵族，1913年曾被提名为莫斯科市市长候选人，但被政府否决。8月8日、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全俄市长大会，基于同样目的，成立了全俄城市联盟，曾为第三候选人并最终担任莫斯科市市长的立宪民主党人恰鲁努克夫担任该联盟负责人。政府迅速承认了这两个地方联盟。^[67]

54 8月18日，首都圣彼得堡因其名带有德意志帝国风格，改称彼得格勒。^[68]

俄国的总动员令于7月18日（公历31日）开始实施。俄军兵力在开战前约为142.3万人，总动员令发布后，共有311.5万人新加入进来。此外，还有40万名青壮年男子组成的第一类国家民兵编入了预备役。这样，新入伍人员的总数达到了约350万人。^[69]其中，220万人被补充进各部队，达到了战时编制的最高限额，剩下的130万人则进入了预备役和后方部队。^[70]以步兵为例，在动员令发布后的第15天动员了27个师，第23天动员了20.5—23个师，第29天动员了3—5个师，第30天到第60天之间动员了6.5—11.5个师，第60天以后又动员了2—4个师，动员部队总计达到了59—70.5个师。^[71]虽然总动员令对全军来说实属意外，但俄军的总动员可以说相当顺利。

然而，虽然俄国与法国在1892年承诺在对德战争中相互支援，但当1908年苏霍姆利诺夫担任陆军大臣后，俄国开始对法国有求必应，会承诺些自己很难做到的事情。1911、1912、1913年的协议中，双方达成一致，法国在动员的第10天派兵130万进攻德国，俄国则



开战当日，支持战争的民众聚集在冬宫前（1914年7月20日）



位于马林斯卡亚广场的德意志帝国大使馆。开战次日，遭到暴乱民众破坏（1914年7月21日）



战时公债海报“购买公债 支援我军”

55 在动员的第15天派兵80万进攻德国。在1912年的协议中，俄总参谋长日林斯基承诺俄军或向东普鲁士方向或向柏林方向进攻。但这些都是俄军难以真正做到的事，是不负责任的承诺。因为从俄国所处的利害关系来看，应该以打击奥匈帝国为主要作战方针。1912年，军区参谋长会议决定向奥匈帝国调遣48.5个师，向德意志帝国调遣30个师的兵力。如此一来，在动员后的第40天，仅能向德意志帝国调遣45万兵力而已。

开战后，在德意志帝国的闪电攻击下，法军连连败退，强烈要求俄军履行承诺，尽早展开对德进攻。无奈之下，最高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不待军队集结及布阵完毕，就下令对德进攻。^[72]

7月31日（公历8月13日），西北方面军总司令日林斯基命令第一集团军司令伦南坎普夫、第二集团军司令萨姆索诺夫立即进攻东普鲁士。^[73]然而，这两位司令在日俄战争之时便有过节。在沙河会战中，萨姆索诺夫请求伦南坎普夫支援未果，痛失已经占领的据点。战争结束后两人在奉天车站的月台上相遇时，还曾大打出手。而本次战争中的致命之处就在于，德军参谋正是当年的观战武官，深知其中渊源。^[74]

初战还是颇为顺利的。北方的第一集团军、南方的第二集团军均向东普鲁士发起了快攻。8月4日（公历17日）第一集团军向柯尼斯堡（现加里宁格勒州）进发，8月7日（公历20日）在贡宾嫩（现加里宁格勒州古谢夫）地区大败德军第八军的两个集团军。德军仅步兵就损失1000人，军官伤亡200人。^[75]德军感受到了危机，迅速于8月9日（公历22日）任命鲁登道夫为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兴登堡为司令。辅佐二人的正是日俄战争时的那位观战武官霍夫曼。有了名将坐镇指挥，德军开始迅速反攻。随着部队深入，德军发现俄军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之间渐行渐远，于是集中兵力进攻靠近

南方的阿伦施泰因（又名奥尔什丁）地区的萨姆索诺夫率领的第二集团军，并将其包围。第一集团军司令伦南坎普夫对友军并未施以援手。最终，在8月17日（公历30日）的坦能堡战役中，萨姆索诺夫部队全军覆没。萨姆索诺夫自杀，第十五军和第十三军遭遇灭顶之灾。据苏联正史记载，在这一战中，俄军损失将士3万人、炮200门。^[76]而据德方资料记载，俄第二集团军的俘虏人数达到9.2万，被缴获的火炮300—500门，死亡及失踪将士据估算有3万人。^[77] 56

之后，8月24日（公历9月6日），德军第八集团军开始向伦南坎普夫的第一集团军发起进攻。3天后，德军在马祖里湖附近给予俄军致命一击，大获全胜。^[78]

至此，俄军对东普鲁士的进攻以惨败告终，牺牲巨大。但这也减轻了在马恩河作战的法军的压力，使之免于覆灭。

另一边，进攻奥匈帝国领属加里西亚地区（现乌克兰西南部）的俄军则给予了奥匈帝国军队毁灭性的打击。8月21日（公历9月1日），鲁兹斯基率领第三集团军占领了利沃夫据点，9月初又占领了普热梅希尔这一要塞，全面占领了加里西亚。^[79]

如前所述，开战前俄军兵力为142.3万人，开战初期动员了350万人，到1914年年底之前又召集了160万人，总人数高达652.3万。1915年年初至4月，又征集了第一类国家民团兵108万人，新兵70万人，至此总兵力已达830.3万人。^[80]

为了推进战事，国家机器将如此庞大数量的父亲和儿子从日常生活拉入战场，而残酷的命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从开战至1915年4月末，俄军损失惨重，其中阵亡者124987人，伤者612119人，被俘及失踪者454996人，总数为1192102人。^[81]这个人数达到了总兵力的14.4%，也就是说，大约每7人中就有1人伤亡。

在苦难之时，沙皇出巡各地，向民众宣传获胜的信念，表达与民同在的决心。9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了位于巴拉诺维奇车站的

57 最高统帅部，24日前往位于罗夫诺的欧嘉女大公主管的部队医院探望。10月开始，沙皇视察了西部前线各地城市。22日赴明斯克，26日赴霍尔姆，29日赴罗夫诺，30日赴柳布林。在柳布林地区，沙皇访问了近期三次击退德军进攻的伊万哥罗德要塞。^[82] 11月，沙皇再次访问最高统帅部，20日赴斯摩棱斯克，21日赴图拉，22日赴奥廖尔，23日沿着哈尔科夫及中部一路南下，前往与土耳其作战的最前线高加索视察。11月24日，沙皇到达了叶卡捷林诺达尔（现克拉斯诺达尔），26日进入梯弗里斯（现第比利斯），30日到达了俄土战争的古战场卡尔斯要塞。12月4日，沙皇抵达捷列克州的中心城市弗拉季高加索。至此，对高加索的视察告一段落。5日，进入顿河地区，抵达罗斯托夫。之后途经沃罗涅日、坦波夫、梁赞各地，于12月8日返回莫斯科。^[83]



战地野战医院。主教正在看望士兵

“大撤退”的冲击

早在9月9日，开战还未满50天之时，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便认识到自己面临着兵员运输和炮弹补给这两大“难以置信”的困难。他说：“第二个灾难就是炮弹。炮弹的消耗量十分可观，简直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我们冶金工厂的生产能力还很薄弱。虽然工厂已经实现产量翻番了，但与消耗量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84] 58
几日后，总参谋长亚努希科维奇答复说：

我们的步兵不用枪，向前推进愈发依靠炮兵的掩护。在刚开始的时候，炮兵哪怕是面对巡逻队或者单个的敌人也毫不犹豫地开炮，但是现在严令我们节约炮弹，使用枪支。我们对炮弹的需求，是在连备用弹药都考虑在内的基础之上计算得出的。如果再要求我们控制炮弹消耗，那我们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停止进攻”。^[85]

次月，总参谋长又写道：

但是，一个巨大的噩梦就是炮弹。极端地说，这简直是在“鲸吞炮弹”。威胁也好，哄骗也罢，均不奏效。^[86]

不仅是炮弹生产难以满足战场需求，所有军需物资的生产都赶不上消耗的速度。到了年末，前线已彻底陷入危险境地。12月6日，总参谋长向陆军大臣做了汇报。

很多士兵没有长靴，双脚被冻伤。没有外套和棉衣，许多战士开始患上重感冒。现在的后果是，如果军官战死，就会在

准尉带领下开始出现集体投降的现象。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连靴子都没有，还要忍冻挨饿地接连送死？大炮在暗处虎视眈眈，我们如同蝼蚁般被射杀倒下。还是德意志帝国那边更好，不如去那边吧。”¹⁸⁷¹

在这种状态下，战争难以为继。在火力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德奥军队于1915年4月19日（公历5月2日），于奥匈帝国领属加里西亚地区从戈尔利采到克罗姆尼克这一段突破了俄军的防线。5月20日普热梅希尔沦陷，6月9日利沃夫沦陷。7月初之前，俄军从加里西亚开始全面撤退。¹⁸⁸¹紧接着，波兰境内的撤退也拉开了序幕。7月23日，俄军从华沙撤退。8月5日，科夫诺（沙皇俄国时的一个省，现大部分位于立陶宛）沦陷。8月19日，格罗德诺沦陷。在波兰境内，俄军被全面驱逐。德军侵入俄国本土，9月19日（公历10月2日），德军占领布伊利诺。¹⁸⁹¹这就是“大撤退”的结局。

在大撤退开始之前，3月，与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私交甚好的宪兵上校格里高利·米亚索迪夫被迫对开战初期的战败负责，他被以间谍罪¹⁹⁰¹（此罪名纯属污蔑）处以极刑。这件事受到广泛关注，对军队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915年5月到7月的三个月内，俄军损失惨重，其中阵亡63519人，负伤277110人，被俘及失踪52231人，总计392860人。然而到了8月，仅一个月就阵亡33054人，负伤146820人，被俘及失踪405057人，总计584931人。¹⁹¹¹开战以来，俄军人员损失总计高达2169939人。⁶⁰这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承受的痛苦和悲伤难以估量。

大撤退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苦难。许多地区曾经是战场或被德军占领，那里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波兰和加里西亚地区，居民包括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波兰人姑且不谈，俄国人为了躲避德军而成为难民，而犹太人的境况则更为复杂。在波兰，波兰人



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右）与沙皇

域。为揭发其间谍行径，可扣留人质。人质适用绞刑。^[93]

这样一来，犹太居民开始被强制驱逐，出现了大量难民，还有很多人被当作人质逮捕。1915年4月，德军逼近俄国的科夫诺省、库尔兰省时，俄国更是强制性地驱逐犹太人。其中，库尔兰省驱逐了4万人，科夫诺省驱逐了12万人，格罗德诺省驱逐了3万人。所有人都被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94]

面对这一残酷事态，俄国国内的犹太人律师斯里奥斯伯格等人对俄国政府采取了行动。讨伐尼古拉大公和总参谋长亚努希科维奇的声音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沙皇耳中。^[95]

在危机重重的状况下，为了满足军需物资的生产需求，俄国开始进行工业动员。1915年5月，政府终于设立了旨在开展工业动员的新组织。在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和俄国亚洲银行、普契洛夫工厂实权人物普契洛夫的提议下，国家建立了强化枪支炮弹补给特别审议会。该组织的核心人物除了普契洛夫外，还有手握一系列军需

各种途径 向沙皇反映犹太人社会处境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担任拉斯普京秘书一职的犹太人西马诺维奇呈送。参见和田春树《拉斯普京、皇后、沙皇——读皮库里的历史小说》，载《俄国史的新世界——书籍与史料的读法》，山川出版社，1986年，102—112页。

工厂大权、隶属国际银行的维斯内古拉奇，借贷银行的乌廷，所罗门·布奥科洛姆纳集团的梅西切尔斯基等。^[96]俄国的重型机械工业是与国家铁路建设相结合，在国家大力庇护下依托机车制造业发展而来。1905年革命后，这些企业纷纷与成长为兼营银行的首都大银行进行金融资本融合，引入外国资本，转型为军需企业。例如，首都的巨型工厂普契洛夫、亚洲最大的银行俄国亚洲银行、以俄国亚洲银行为媒介的法国军需企业施耐德以及巴黎的大银行之间相互融合渗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阿列克谢·普契洛夫身上。他原来是财政部副部长，后来离开国家部门，担任俄国亚洲银行行长。^[97]以首都为中心的这类产业资本家渴望垄断政府订单，十分盼望现有政治体制存续，因此对沙皇也最为忠诚。

5月23日，该审议会设置法提交内阁会议进行审议。莫斯科资产 62
阶级代表保罗·里亚布申斯基掌控的《俄国晨报》主张：“刻不容缓，动员整个工业，让所有工厂全力以赴为战争做好准备。”这一主张旨在号召还没有参加军需生产的企业也加入进来。三天后，第九届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采用并充实了里亚布申斯基的提案，决定由工业家牵头，联合学会、技术界、铁道、全国地方自治和城市联盟等组织代表，设立中央及地方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推动工业动员。关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原本的计划是由南部煤炭资本的代表阿布达科夫出任，也就是说，由老牌产业的实权人物来掌控新组织的领导权，但这一人选遭到了来自莫斯科资本的强烈反对。在7月25日到7月27日召开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莫斯科资本方面提出应该在委员会中加入工人代表，确保在工业动员中获得工人的积极配合。这一意见获得了采纳。8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组建规则得到认可，工人代表获准加入该委员会。9月，阿布达科夫去世。之后，由莫斯科资产阶级老一辈代表、第三届国家杜马十月党领袖、现任国务会议议员古契柯夫接任新一任主席，莫斯科纺

织资本的代表柯诺瓦洛夫就任副主席。另外，莫斯科地方委员会主席由里亚布申斯基担任，副主席由特列恰科夫、斯米尔诺夫担任，基辅地方委员会主席则由捷列先科担任。这样，军事工业委员会就成为一个由柯诺瓦洛夫和里亚布申斯基掌握大权的全国性组织。这一组织与前述强化枪支弹药补给特别审议会形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那里聚集了许多老牌的重工业及军需产业资本家。^[98]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推进特别审议会的体系建设。^[99]6月中旬，遭受强烈批评的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下台，波利瓦诺夫接替他成为新任陆军大臣。之后，波利瓦诺夫向7月19日重启的国家杜马提交了相关法案。该法案要求对特别审议会进行全面改组，设立新的国防特别审议会，由各政府部门、立法机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地方自治和城市联盟等的代表组成。国家杜马对法案内容进行了修改，
63 对燃料、粮食及运输问题，也分别设立了单独的特别审议会，并于8月1日通过了该法案。罗江科、米留科夫、申加廖夫、李沃夫、恰鲁努克夫、古契柯夫、柯诺瓦洛夫等都是国防特别审议会的成员^[100]，而普契洛夫等军需工厂的资本家均被排除在该组织之外。虽然无法明确这个新机构到底对扩大军需物资生产做出了多大贡献，但可以肯定的是，整体产量实现了迅猛增长。仅从官营工厂来看，1915年1月的产量还仅仅是步枪34760支、机关枪219挺、子弹4980万发，而12月
64 的产量迅速增加到了步枪84835支、机关枪524挺、子弹10710万发。在炮弹方面，包括官营、民营工厂在内，1月份的总产量仅为514800发，到了12月份就增加到原产量的3.5倍，达到1848600发。^[101]

在“大撤退”的背景下，从7月底开始，要求政府改组的呼声越来越高。8月13日，里亚布申斯基掌控的《俄国晨报》发布了“国防内阁”名单，成员包括主席罗江科、内务大臣古契柯夫、外交大臣米留科夫、财政大臣申加廖夫、交通大臣涅克拉索夫、工商大臣柯诺瓦洛夫、陆军大臣波利瓦诺夫。18日，莫斯科市议会通过了组

建“信任内阁”（即“受国家信任的人组成的政府”）的决议。^[102]进入8月后，在国家杜马及国务会议内部，以米留科夫为中心的中间派领导的统一团结工作进展迅速。在国家杜马422位在职议员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立宪民主党54人、国权派进步同盟28人（博布林斯基为代表）、中央派34人（弗·尼·李沃夫为代表）、地方自治机构十月党人议员60人（多米托留科夫为代表）、十月十七日联盟22人（希德洛夫斯基为代表）、进步同盟38人（叶夫列莫夫为代表）等共236人，再加上国务会议中的学者组织（格林为代表）和中央派（莫勒为代表），共同组成了“进步同盟”。这体现了立法机构两院议员内部未曾有过的大团结。国家杜马中未加入该同盟的只有国权派右派和稳健右派的一部分、民族三派、左翼的劳动派以及孟什维克党（详见后表“国家杜马内的党派变动”）。8月25日，进步同盟发布纲领，宣称“只有强力的、坚定的、灵活的权力才能引领祖国走向胜利。我们坚信，要想获得这种权力，必须依靠民众信任，并获得全体市民的积极协助”。基于这一信念，“为了获得国家信任，最快实现纲领目标，由与立法机构协调一致的人组成了统一的政府组织”，实现了组建“信任内阁”，并提出了一系列极其稳健的自由主义改革要求。柯诺瓦洛夫领导的进步同盟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即由国家杜马组建内阁，该内阁不对沙皇负责，而对国家杜马负责。但这一主张未被采纳。改革要求中，没有关于政治自由的要求，然而，进步同盟对此妥协了。^[103]

在政府部门内部，由于沙皇明确表示希望罢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由自己亲自担任最高总司令，因此沙皇、首相、大臣之间产生了强烈对立。在8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八位大臣联名上书进谏，但沙皇并未理会。8月23日，沙皇正式成为最高总司令。^[104]26日的内阁会议上，以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为首的大臣们提出进步同盟的纲领需要讨论修改，最终决定与同盟协商。^[105]28日的内阁会议汇

国家杜马内的党派变动（1915年夏）

〔右派〕

右派·····	65 议席
国权派与稳健右派·····	74 议席

〔中间派〕····· 共计 236 议席

加入进步同盟的党派

国权派进步同盟（博布林斯基等），28 议席

中央派（弗·尼·李沃夫等），34 议席

十月十七日联盟（希德洛夫斯基等），22 议席

地方自治机构十月党人议员（多米托留科夫等），60 议席

立宪民主党，54 议席

进步同盟，38 议席

〔左派〕

劳动派·····	10 议席
（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	8 议席
（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0 议席
（其中有 5 人于开战时被捕，1 人被告发为警方间谍后失踪）	

〔民族派〕

民族各派·····	21 议席
-----------	-------

报了协商结果，农业大臣克里沃申表示，“我们对进步同盟，不管说什么，还是承诺什么……都完全不信任。因为国家杜马和全国的要求并非纲领，最终还要归结到被授予权力的人的问题上”，他主张向沙皇提出国家杜马休会的请求并同时内阁改革。大部分的大臣都赞同这一主张并定下了这一行动基调。^[106]但在 9 月 2 日的内阁会议上，首相戈列梅金汇报说，沙皇仅同意从翌日开始停止召开国家杜

马会议。大臣们围着首相表达了愤怒之情，但也无济于事。^[107]

就这样，沙皇拒绝对国家杜马让步。经过此事后，沙皇中断了与大臣的沟通，处理政务也只听信皇后与拉斯普京的意见。但在军队领导方面，沙皇作为最高总司令罢免了亚努希科维奇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在军队内部颇具威望的阿列克谢耶夫担任这一职务，并给予了事实上的实权，所以在军事指挥方面还是有所改善的。

俄罗斯帝国的危机

协约国与德国

1914年7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6年夏天时，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欧洲主战场分为西部战线（德法战争）与东部战线（俄对德奥战争）两条战线。1916年，在西部战线的凡尔登和索姆地区，英法军队与德意志帝国展开了殊死战斗，战线基本没有变化。东部战线则从波罗的海海军基地里加西部开始，几乎垂直南下，经过杜布诺、切尔诺夫策、布勒伊拉，一直延伸到了黑海。从俄罗斯帝国来看，当时的战况是波兰全境失守，科夫诺省、维尔纽斯省、明斯克省也有一半失守。⁶⁶

双方在战线两侧挖了战壕，开始对峙。双方大炮水平不分上下，仅靠步兵的进攻均无法突破对方防线。虽然布鲁西洛夫率领的西南方面军在1916年夏天成功突破了加里西亚，但总体来看，从1915年夏天开始，战局一直处于胶着状态，战线也是不变的。之后，双方纷纷研发新武器，采用了战机轰炸、坦克突破、毒气屠杀等各种手段，但以战壕为防线进行对峙这一基本态势没有改变。战壕作战使得士兵的厌战情绪不断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到1916年年底，俄罗斯帝国陷入巨大的危机之

中。一是世界性战争带来的对专制君主制的危机，二是世界性战争带来的对俄国国家及社会的危机。

沙皇·皇后·拉斯普京——权力中枢的崩溃

此时的俄国仍然是建基于1906年宪法体制的君主专制国家。沙皇作为专制君主，根据宪法确定的原则，与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构成的两院制国家杜马共同协商，行使立法权。沙皇统领首相及大臣，行使行政权，开展外交活动。沙皇拥有军队的最高统领权，这一时期在名义上还是俄军最高总司令。但是沙皇的统治由于其个人的无能、皇后和拉斯普京的干政出现了混乱和瓦解，最终完全停摆，陷入绝境。

出生于1868年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这一年48岁，正值壮年。1894年父亲去世后，他立刻与未婚妻——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大公的女儿阿历克丝成婚。皇后全名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婚后每隔一年就诞下一个孩子，1895年长女欧嘉出生，1897年次女塔季扬娜出生，1899年三女玛丽亚出生，1901年四女阿纳斯塔西娅出生，四个孩子全为女孩。在俄罗斯帝国，只有男孩才能继承皇位，⁶⁷ 皇后自然非常希望能诞下皇太子。

因此，沙皇夫妇在1901年遇见了一位预言将有皇太子诞生的法国神秘学学者菲利普时，便对他十分推崇。尽管俄驻巴黎安全局的负责人曾提醒他们，菲利普是一个多次入狱的骗子，但沙皇夫妇仍把菲利普称作“我们的朋友”，并将他召进宫中。沙皇在日记中写到，1901年7月10日到21日与菲利普共度了一段“奇迹般的”时光。在菲利普的指引下，沙皇夫妇一同祈祷奇迹的到来。¹⁰⁸ 终于，如菲利普所预言的那样，1904年7月30日，沙皇夫妇盼望已久的男孩降生了。

然而，这个男孩经由他的母亲遗传了他的外祖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所携带的血友病基因，出生后不久就出现了病状。血友病⁶⁸ 患者在出血时很难止血。看到自己的爱子阿列克谢承受着巨大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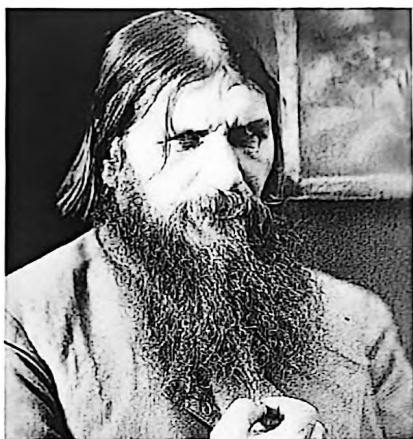
沙皇一家（1906年）。从左依次为欧嘉、玛丽亚、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亚历山德拉、阿纳斯塔西娅、阿列克谢、塔季扬娜



皇太子阿列克谢

皇后亚历山德拉陷入绝望的深渊。就在这时，一个宣称能用巫术来为皇太子治愈痛苦的农民宗教家格里高利·拉斯普京出现在了皇后面前。沙皇在1905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们结识了一位神一般的人物，他就是来自托波尔斯克省的格里高利。”^[109]

1869年，拉斯普京出生于俄国托波尔斯克省秋明地区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他曾经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嗜酒成性的暴徒。但在乌拉尔地区的维尔霍图里耶修道院修行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宗教家。据推测，他的信仰比较接近名为Khlysty（鞭身派）的新兴教派。1904年起，他开始在首都活动。当时沙皇夫妇的非正式告解神父费奥凡在见到拉斯普京时，认为他身上有一种“教会长老”的气质，将他引见给了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夫人。在为皇太子的血友病苦恼的皇后眼里，拉斯普京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神一般的人物”。每当皇太子受伤出血，痛苦不已时，他总有办法让皇太子平静下来。特别是1912年10月初，病情危重的皇太子据说只是用额头轻轻地碰了一下拉斯



上：拉斯普京

中：拉斯普京与皇后（右）、皇太子等

下：众多女性信徒环绕中的拉斯普京

普京从西伯利亚发来的电报，就立即出现了好转。自那以后，皇后便开始了对拉斯普京的绝对崇拜。^[110]

沙皇本来有三个弟弟，但其中两个很早就去世了，只剩下1878年出生的米哈伊尔大公。他比沙皇小10岁，是沙皇最小的弟弟。如果皇太子有什么三长两短，米哈伊尔大公将会自动成为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然而，米哈伊尔在1910年爱上了一个名叫娜塔莉娅·舍基维奇·布里费尔特的美女，并开始与她同居。事态一下变得严重起来。这名女子是一位律师的女儿，并非贵族出身。她经历过两次离婚，第一任丈夫是个歌手，第二任丈夫布里费尔特是一名骑兵军官。1910年时还有传言说她其实是个犹太人。很快，她与米哈伊尔就有了孩子。毫无疑问，沙皇是绝不可能容忍这种关系的。两人于1912年秋天私奔到了国外，并不顾众人反对在德国的疗养地举办了婚礼。由于这桩婚姻属于贵庶通婚，同年12月30日，沙皇宣布正式剥夺米哈伊尔大公的摄政资格（即如果皇太子阿列克谢在未成年时继承皇位，在其成年之前，米哈伊尔大公将作为“国家统治者”摄政），这也意味着米哈伊尔大公将不再拥有皇位继承权。之后，米哈伊尔作为一名普通人继续在国外生活（他的妻子虽然被赐姓布拉索娃，并被授予伯爵头衔，但并没有入宫晋谒的资格。“一战”爆发后，米哈伊尔申请重返彼得格勒，担任了高加索师的师长）。^[111]

由于米哈伊尔丧失了皇位继承权，继承顺位向沙皇的旁系亲属转移，皇太子祖父亚历山大三世的二弟弗拉基米尔大公之子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生于



米哈伊尔大公与其妻子布拉索娃夫人

1876年)，成为排名第二的皇位继承人。

一方面，皇太子血友病缠身，另一方面，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又因为贵庶通婚而丧失了摄政资格，罗曼诺夫王朝从世界大战开始前就面临可能无人继位的危机。

从1915年夏天开始，沙皇亲自就任俄军最高总司令。同时，他任命在军队中颇具威望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为总参谋长，并将实质上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因此，从作战指挥的方面来看，沙皇是总司令这一点并没有问题。但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部设在了距首都彼得格勒700公里之外的莫吉廖夫。沙皇每个月有20天以上都在最高统帅部里度过。当沙皇不在宫中期间，他每天都会和留在皇村的皇后互通信件。这就造成一个局面：皇后操控着位于首都的首相与政府，并向驻留在最高统帅部的沙皇建言献策。

这一时期，皇后对国政的干涉明显达到了反常的程度。的确，皇后是一位意志力很强的女性，很早以前就表现出了对沙皇的控制欲，但她一直没有表现出干涉政治的欲望。然而，随着1915年6月初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被罢免，以及遭受强烈批评的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东亚教事务管理局总监撒布雷尔、司法大臣谢格洛维托夫等人下台，皇后开始干涉国政。

拉斯普京最初插手的人事安排，就是阻止撒布雷尔被解职一事。为此他在皇后面前做了很多工作。受拉斯普京的影响，皇后认为，所有这些安排，都是“神一般的人物”拉斯普京的敌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唆使沙皇的结果。在她看来，这是无法容忍的事情。1915年6月10日，皇后在给沙皇的信件里这样写道：

我最心爱的人啊，您正独自背负着一切，是那么英勇无畏！请允许我助您一臂之力吧！我想即使是女性，也有派得上用场的时候。我一直想办法从各方面为您减轻负担，但大臣们



上：皇后亚历山德德拉和皇太子
阿列克谢（1913年）

下：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太子

却在给您添乱。他们本应不计个人得失，彼此之间和睦共处，为沙皇和祖国效命。但现在，他们却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简直让我心急如焚。换句话说，这等同于背叛。因为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知道政府内部不睦，左翼政党还会趁机扰乱政局。您一定要给这些大臣一点颜色看看——我最心爱的人啊，您必须这么做——必须让他们听到您的声音，看到您眼中的不满。……他们必须学会在您的震慑下瑟瑟发抖。您应该还记得Ph先生（菲利普）和Gr先生（拉斯普京）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吧。您不要问大臣们某个事情是否能实行，您必须直截了当地命令他们必须去做哪些事情。^{〔112〕}

请听取我们的朋友（our friend）的意见吧。请相信他（He）吧。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将您的利益和俄国人民视若珍宝。神不是平白无故将他派遣到我们身边——我们只需要多加留意他的话语就可以了。^{〔113〕}

这封信中的“他”（He），指的就是拉斯普京。6月中旬以后，皇后和拉斯普京的介入成为沙皇统治中不变的要素。如前所述，沙皇在大撤退之时，趁机解除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职务，⁷²宣布由自己担任最高总司令，由此引发了与全体大臣的冲突。之后，当诞生于国家杜马的联合势力“进步同盟”希望建立信任内阁时，

沙皇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在政府中受到孤立的沙皇和皇后及拉斯普京勾结在一起，频繁任免大臣。赫沃斯托夫被选中担任内务大臣，并被寄予厚望，但他企图灭掉拉斯普京。1916年1月，施蒂默尔担任首相，同时兼任外交大臣及内务大臣。然而，这位首相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理所当然地受到猛烈抨击，所以在1916年9月，又改换普罗托波波夫接手处理内务大臣事务。这一切人事安排，都是沙皇在皇后和拉斯普京的推荐下实施的。在这一背景下，俄国的大臣走马灯似的不停上台下台。仅从1915年9月到1916年12月的16个月时间里，沙皇就任命更换了3位首相、4位内务大臣、3位农业和国有财产大臣、2位外交大臣、2位陆军大臣、2位司法大臣、2位交通大臣、2位东亚教事务管理局总监、2位国家监察大臣以及1位教育部大臣。没有发生变动的只有海军大臣、财政大臣和工商大臣3个职位。^[114]

在这一系列不正常的人事更迭中，普罗托波波夫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一事最能体现权力的危机。普罗托波波夫1866年出生于西姆比鲁斯库省的大地主家庭，先后毕业于第一士官武备学校和骑兵学校，之后进入近卫选拔骑兵团，是一位正统的贵族。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他在5年后辞去军务，在自己领地的一个县里负责贵族团的工作。《十月诏书》下达后，成为十月党人。他虽然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落选，但在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当选为议员。从1914年开始，他在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手下担任副主席一职，也是进步同盟的成员。同时，他还经营从叔父处继承的毛呢织物工厂，1907年成为伏尔加地区行业团体的负责人。该行业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国家部门订购的军服和囚服，行业团体的作用主要就是与相关政府机关进行沟通谈判。在战争期间（具体时间不明），普罗托波波夫进入了南部重机工厂哈特曼的经营管理层。在1916年2月末到3月初召开的第一届金属加工业代表会议上，普罗托波波夫和所



左：首相施蒂默尔；右：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二人均受皇后和拉斯普京推荐获得任命

罗门·布奥科洛姆纳集团的梅西切尔斯基二人对国防特别审议会的排挤不满，表达了对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不信任，这也是大会主流的意见。之后，普罗托波波夫担任了新组成的金属加工业代表会议的主席。^[115]

然而，这位名士在1903年接受了藏医巴德马耶夫的治疗，在思想上受到了他的影响。据说普罗托波波夫在成为国家杜马议员后，私下里悄悄告诉巴德马耶夫自己想成为大臣和首相的梦想，向后者寻求建议。巴德马耶夫向他介绍了拉斯普京，两人在大战前就认识了。拉斯普京从很早开始就跟皇后和沙皇提到过普罗托波波夫。^[116]

1916年春天，普罗托波波夫作为国家杜马议员海外视察团团长，对英、法、意三国进行了访问。归途中，他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银行家华尔布鲁克。由于华尔布鲁克同当地的德国大使关系密切，此事在回国后招来了不少非议。^[117]

回国后，普罗托波波夫马上于7月20日拜谒了沙皇。沙皇在给

皇后的信里写道：“我很喜欢他。”^[118] 皇后在9月7日的一封信里首次记录了关于普罗托波波夫的内容：

74

对于内务大臣这一职位，施蒂默尔……希望举荐欧波伦斯基公爵，但Gr先生（拉斯普京）对普罗托波波夫的举荐更加富有说服力。您应该也记得普罗托波波夫吧，就是让您印象极佳的那位。



藏医巴德马耶夫。他为皇族和实权人物治病，有政治影响力

信里接着写道：

他（拉斯普京）的意见请您一定要听取。他一心期盼做对您有益之事。所有的军人加在一起，也比不过神赐予他的强大的预见力、睿智及洞察力。他对您和俄国的爱是无与伦比的。神把他作为您的助手和指导者送到了我们身边。^[119]

9天后，即9月16日，普罗托波波夫被任命为内务大臣。9月27日，皇后写信告知沙皇，翌日普罗托波波夫将赴最高统帅部进行首次上奏，希望沙皇明确告诉普罗托波波夫要听取拉斯普京的意见，信赖拉斯普京的建议。拉斯普京所期望的六个事项也在信中列明。^[120]

在国家杜马，大家一度赞成普罗托波波夫担任内务大臣，然而很快便出现了反对之声，连同对首相施蒂默尔的反对一起，使得国家杜马中不信任的气氛愈发高涨。11月9日，施蒂默尔被解除职务，特列波夫被任命为首相。新任首相特列波夫又与大臣们一起，请求

沙皇解除普罗托波波夫的职务。^[121]沙皇产生了动摇。11月10日，沙皇向皇后表明了对普罗托波波夫的不信任。

据说他在数年前患上那种众所周知的病之后，就完全不能说是个正常人了（他曾求医于巴德马耶夫）。在这种时期，还继续把内务部交到这样的人手里是很危险的。^[122]

看到沙皇改变想法，皇后和拉斯普京开始向沙皇强力施压，反对解除普罗托波波夫的职务。11月11日，皇后写道：“我恳请您，请不要现在替换掉普罗托波波夫。……请让他能够管理粮食供应事75务。”“他非常尊敬我们的那位朋友，所以神与他同在。”^[123]次日，皇后再次写信给沙皇，称前一天已经与普罗托波波夫认真谈过，“他非常健康”，再次恳请“不要替换掉普罗托波波夫”。皇后甚至在当天去了最高统帅部。在最高统帅部，她虽然感受到这里充斥着对她的不满情绪，依旧拼命劝说沙皇，打消了他罢免普罗托波波夫的念头。^[124]皇后在最高统帅部一直待到11月25号，才与沙皇一同回到皇村。^[125]

12月4日，皇后再次写信给返回了最高统帅部的沙皇。

我深信，您的统治与俄国的永存这一伟大而美好的时代即将来临。您只需保持精神的活力。请不要受到谣言或他人信件的影响。……您要向众人显示您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您的意志必须获得执行。

您必须告诉他们究竟何为服从，因为他们并不理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您的善良和宽容，让他们肆无忌惮。他们之所以憎恨我，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具有坚忍的意志，一旦认定的事就决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他们无法容忍我。^[126]

沙皇与皇后的关系^{*}，此时已经完全处于异常的状态。

兵源枯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第三年，俄国社会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可动员的兵力已经到达极限，战争难以为继。

从开战到1915年年末，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内，俄军共阵亡
76 317574人、负伤1537849人、被俘及失踪1547590人，兵力损失总计达到3403013人。1916年共阵亡269783人、负伤995106人、被俘及失踪1172448人，兵力损失总计2437337人。^[127]二者相加，到1916年年底，俄国兵力损失高达584万人。

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俄国进行了极其彻底的征兵动员。如前所述，“一战”前俄军兵力为142.3万人，从开战后到1914年年底共动员了510万人，总数达到了652.3万人。

大战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15年，俄国从第一类国家民团兵（指暂未参军的青壮年男子）中动员了148.5万人，新兵征兵223.7万人，从第二类国家民团兵（指未通过征兵检查以及享有第一级征兵豁免特权的男子）中也动员了132.5万人。这一年共动员了504.7万人，累计动员人数达到1157万人。

1916年，俄国又从第一类国家民团兵中动员了32万人，新兵征兵90.8万人，从第二类国家民团兵中动员了172万人。这一年的总动员人数为294.8万人。截至1916年年底，累计动员人数已高达1501.5万人。^[128]日俄战争时，俄军征召的预备役兵员人数仅为117.5万人^[129]，而这次动员兵力数量之庞大，与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1501.5万兵力中，如上所述，已经折损了584万人，占到总数的38.9%。现有兵力（即动员人数减去损失人数之差）在1915年年底为817万人，1916年年底基本维持在917万人。

但此时，俄国的兵力资源濒临枯竭*。在1916年年底的国防特别审议会上，以弗拉基米尔·苏契新斯基（国务会议议员），鲍里斯·恩格勒格特、尼古拉·舒尔金（国家杜马议员）等人为首的国家杜马及国务会议28位议员向沙皇提交了意见书。^[130]

意见书中进行了如下计算：在战争过程中，截至1916年年底，⁷⁷动员总人数为1450万人。俄国法定参军年龄是18周岁到43周岁，当时符合条件的青壮年男性有2600万人，从中减去动员总人数的话，未参军人数仅剩1150万人。

沙皇与皇后的关系 这些书信往来中所透露出的沙皇与皇后的关系，是当时的人们无从得知的世界。然而在老百姓心中，沙皇和皇后的形象相当不堪。在大战开始之前，坊间就有各种传言，称皇后对拉斯普京言听计从，并与他有不正当关系。“一战”开始后，皇后身为德国人，被传有通敌嫌疑，这一传言愈演愈烈。人们对沙皇的印象，是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软弱可欺的丈夫。这使得沙皇丧失了应有的威严，是非常致命的。二月革命后出版的宣传册《皇后与妖僧的风流韵事 头戴绿帽子的沙皇》虽然是一种典型的反沙皇统治宣传，不过也可以说明沙皇的这一形象早在二月革命前就已经深入人心。这个宣传册收藏于纽约市立图书馆。圣彼得堡欧洲大学历史学家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的论文““Tragicheskaja erotika”: Obrazy imperatorskoi sem' 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莫斯科，2010）是关于沙皇与皇后形象的唯一研究。

俄国的兵力资源濒临枯竭 笔者在1968年曾进行过如下计算：从开战到1916年11月1日，包括第二类国家民团兵（未通过征兵检查者以及家庭唯一男劳动力）307万人在内，加上开战时的现役军人，俄军一共征召入伍了1429.3万人。在战争开始前，应服兵役者（16岁到43岁的男子）有3366万人，也就是说，入伍者占到了应服兵役者的42.5%。而截至同一天的俄军伤亡情况如下：阵亡531620人，毒气致死28402人，负伤2298772人，俘虏或失踪2512033人，总计5370827人。当时，符合参军条件的人中，接近一半的人都已应征入伍，而这些人员当中折损人数高达三分之一。

其中，有200万人是被占领区的居民、流亡者、拒绝服兵役者，有500万人因身体原因无法入伍，还有300万人供职于军需产业、铁路、政府机构，也无法入伍。因此，在剩下的未参军人口中，能够动员的只剩150万人。而这150万人中，一半是将在1919年服兵役的18岁青年，剩下的一半是40多岁的身体不健康的男性以及第二类国家民团兵。

78 因此，如果每个月向我军补充30万人，5个月以后，便没有兵源可补充，那时就只能调动预备营，才能将战争维持下去。

显而易见，作为战争国家，俄国已经陷入绝对危机。上述意见书指出，虽然可以考虑将之前未纳入征兵范围的“异族人”及一些伊斯兰教徒也动员进来，或者让43岁以上的高龄人群应征入伍，但这些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意见书指出，军队兵力资源的枯竭，还关系到另一个重大问题。

需要民众参与劳动的所有最重要的部门，尤其是在需要满足各种大量且多样的军需要求的生产部门，都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在全国上下愈演愈烈。最近，国防特别审议会为了这些军需产业部门如何增产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最终都绕不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劳动力不足。……

总之，国家整体运行与整体国民经济正在经历人人都看得见的人手不足问题。

意见书在最后提出了五项解决方案。一方面，提议将18岁的青年纳入征兵范围，以及动员其他民族人群及第二类国家民团兵，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提出解除熟练技术工人服兵役的义务。归根到

底，就是为了避免战斗中的兵员损耗，希望沙皇能够进行慎重考虑。换言之，这封意见书未能提出解决危机的措施。

在议员们向沙皇提交意见书时，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因身体原因正在高加索修养。代行总参谋长职权的瓦西里·古柯（他也是这封意见书上第一位署名议员的兄长）于1917年2月8日回复，称各方面军的司令已经看过这封意见书。除此之外，该回复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这也说明，此时的司令们人心惶惶，已经无话可说。^[131]

军需物资生产方面也出现了危机。1915年成立的国防特别审议 79
会召集了国家杜马、国务会议、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国家监察部、工商部、交通部、地方自治机构、城市联盟、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其他有识之士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商议协调。从1916年年底开始，每次会议中，都有汇报称军需物资生产处于危急状况；民用工业生产也面临同样问题；大量军需物资的运输导致铁路处于瘫痪状态；与此同时，还发生了粮食及燃料危机。总之，俄国经济正在加速解体。

“违抗命令”的士兵

1916年10月，已难以忍受世界大战之苦的士兵开始拒绝执行上级的进攻命令，公然进行抵抗。在前线，士兵频繁开小差，还有个别士兵进行反抗或集体哗变。最能直接反映广大士兵心态变化的“违抗命令”行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16年10月1日晚，有消息称西伯利亚第48狙击团中有士兵拒绝执行上级的进攻命令，第二天，一名被认为是这次行动主谋的士兵被枪决。^[132]这支部队隶属西伯利亚第7军第12师，是西南方面军的一部分。10月3日，在进攻指令下达后，第48团第1连、第47团第11、13连再次出现拒绝执行命令的情况。第48团中的两人在第二天的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当日执行。第47团中有两人在10月7日的军

事法庭上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还有一人在10月13日的军事法庭上因为教唆同伴不进攻而被处以死刑。10月9日，第22步兵师师长汇报称该师第85、87团中出现了不稳定情绪，士兵表示不愿进攻。^[133]

在首都也发生了士兵直接反抗的事件。10月17日，首都步兵第181团预备营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士兵袭击警察事件（参见第3章第149、162页）。这些预备营士兵系应召入伍，当时正在接受训练，随后将被送往前线参战。他们看到警察镇压工人，非常气愤，冲出军营并对警察暴力相向（参见第3章第157页“士兵”部分）。⁸⁰

另一方面，进入11月以后，前线士兵违抗命令的情况持续发酵。11月16日，从预备营补充到第9集团军诺沃佩尔斯基第409团中的士兵不服从长官命令，称如果不改善伙食就拒绝进攻。长官以枪毙威胁他们服从命令。12月3日，违抗命令者被带上军事法庭，其中3名士兵被枪决，16名士兵被判处徒刑，其他32名士兵也受到了处罚。^[134]11月17日，西南方面军贝鲁格拉斯基第326步兵团的第1连和第3连在战壕中违抗命令，拒绝进行进攻准备。士兵们叫喊道：

我们不会进攻！

我们会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干，但不会发起进攻！

我们在阵地待了9个月，已经很累了！

我们请求轮流休息！

我们连鞋都没有！

最终，这197名违抗命令的士兵被送上了军事法庭。^[135]11月18日，同属西南方面军的第7狙击团的第3、4、5、7连的士兵拒绝执行占领1222高地的进攻命令。士兵们叫喊道：“我们不进攻”，“我们会坚守阵地，但不做更多的事情”。此次违抗命令事件的主谋共7人，军事法庭做出裁决，其中4人被枪决，1人被处以两年半的监禁。^[136]



上：战壕中佩戴防毒面具的俄军士兵



左下：战壕中的死者

右下：野战医院



12月下旬，北部方面军对里加南部地区米陶的德军发起攻击，欲夺回米陶。此时，作为主力部队的第12集团军西伯利亚第2军发生了大骚乱，军方高层开始密切关注第12集团军的动向。12月17—18日，在最高统帅部召开的会议中，北部方面军总司令鲁兹斯基⁸¹称：“里加和德文斯克是北部方面军的不幸，特别是里加，情况非常糟糕。这两个地区完全被负面宣传洗脑，陷入了罪恶的巢穴。”之前在该区域驻扎的西伯利亚第7军向罗马尼亚方面军移动后，与之对接的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布鲁西洛夫也回忆说，该军在来的时候就已经处在“完全被负面宣传洗脑”的状态。他说：“士兵们拒绝发起进攻。有的人公然反抗命令，甚至还有一名连长被士兵用刺刀顶着。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枪毙了数人，更换了指挥官。”¹¹³⁷¹

在第12集团军第15、16、17、18、19团的士兵中，存在着反战、反军的宣传活动。特别是第17团，从12月中旬就开始流传写有“不要进攻”内容的书信和传单。12月20日，该团第2连的士兵间纷纷传说，战线右翼的两个师及左翼的一个团拒绝进攻。12月21日，第⁸²9连拒绝进入战壕作战。12月22日，某营公开宣传反对进攻。

12月23日，第12集团军收到米陶作战指令，开始向德军发起进攻。23日傍晚，第17团第1营开始进攻准备。但就在此时，第1营士兵公开抗议，拒绝进攻。营长与连长彻夜不休地劝说他们服从命令，但是士兵们回答说：

我们可以防守，但不会进攻。

到处都在叛变。你们要在白天把士兵们送出去吗？

这与3月和7月的战斗有什么区别？

我军内部到处都是与德国勾结的司令。

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被剥削。我们的家人还在饿着肚子。穷人们仅剩的最后一点东西都被夺走，但富人们仍然坐拥一切。

里加已经被卖掉了。为什么至今没有实施责任内阁制？我们要永无止境地被出卖吗？

四个连的士兵断然拒绝营长下达的攻击命令。团长赶来训斥士兵，但没有效果。12月24日，违抗命令的士兵宣称：“我们不会前进。但是面对德军，我们也一步不会后退。”这一天，只有第3连被孤立并被解除了武装。军方逮捕了24人并打算将他们送往军事法庭，但因军官的动摇没有审判他们。最终在12月31日，军方对167人进行了审判，其中24人被判有罪，估计被枪决了。^[138]

与此同时，第14师第55西伯利亚狙击团里也发生了违抗军令的事件。12月22日，上峰下达了进攻指令，但第15连拒绝执行。之后这支部队被调整为预备役部队。12月24日，第5连与第7连拒绝执行命令。对此，团长波波夫应对手段不够强硬。师长多波尼姆斯尼茨基亲自出马，直接指挥审讯。共有13名士兵被认为是主谋，没有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枪决。此后，两个连共有68人被逮捕，61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37人被枪决。^[139]

米陶作战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俄军未能如愿夺回米陶。^[140]

在世界大战陷于危机之时，俄军的最前线部队里充斥的却是士兵们拼死反抗的声音。“我们可以防守，但不会进攻。”“如果德军进攻，我们决不后退，但我们不会主动前进。”——呼声中蕴含着深意，那就是反对世界大战，主张“专守防卫”。

边境的起义军——吉尔吉斯人

为了解决兵力及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俄国政府根据1916年6月25日敕令发布了告示，要求此前不用服兵役的中亚各民族，阿斯特拉罕省、西伯利亚、堪察加、库页岛地区的异族人以及居住在外高加索（南高加索）的伊斯兰教徒居民也必须参与修建军事设施、铺

设军用铁路和其他国防工程的工作。^[141]该动员令使得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居民群情激愤，引发了激烈叛乱。这场叛乱从7月上旬一直持续到了年底。1917年2月22日，库罗帕特金总督在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对叛乱的情况做了如下概述。^[142]

撒马尔罕州

叛乱首先开始于撒马尔罕州。7月13日，吉扎克县已经发展为公然的叛乱，地区领导卢金上校、警官佐托洛格夫上尉因此丧命，包括警官索伯列夫和俄国居民、守林人、农业部的统计官等在内共计83人被杀。此外，还有20人受伤，70人被当作俘虏掳走，其中大部分妇女遭到强暴。对此，政府从塔什干地区派遣军队进行镇压。直到8月1日，叛乱才得以平息。^[143]

在撒马尔罕州的其他地区，针对官员的袭击事件也接连发生，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叛乱分子还破坏铁轨，在车站纵火，共有40栋政府建筑、9栋民宅被烧毁，俄罗斯居民饲养的150匹马、255头牛、1000头猪羊遭到掠夺。

锡尔河州

塔什干地区也于7月11日发生骚乱。虽然规模较小，仅造成2名警察受伤，但中心城市的骚乱具有扩散效应，可以认为对吉扎克地区的叛乱也造成了影响。塔什干附近地区掀起了抗议运动，反对政府制作工人征兵名单，共有6名官员被杀。在阿姆河地区，7月24日，一对警官夫妇被吉尔吉斯的暴徒杀害。在与七河州相邻的奥利埃阿塔（今称塔拉兹，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东部地区，8月11日爆发骚乱，到了八九月，暴乱分子开始袭击邮局和村落，杀害俄罗斯农民。骚乱后果尤其惨重的是位于奥利埃阿塔与皮西涅克县交界处的新特罗伊茨克村，

这里共有近40名居民被杀。政府派出军队前去镇压，直到9月24日，骚乱才得以平息。锡尔河州的卡扎林斯克县在11月中旬也弥漫着吉尔吉斯人带来的危险气息。整个锡尔河州共有3名俄国官员、6名本地官员、45名俄罗斯居民遭到杀害。^[144]

费尔干纳州

这里的暴乱最初发生于7月9日。包括经学院学生在内的民众大喊“砍死所有当官的！”，向警察和哥萨克骑兵投掷石头，并用棍棒袭击他们。警方开枪镇压，造成22人受伤，之后暴乱⁸⁵民众散去。7月11日，在纳曼干市发生的暴乱中，民众散开之后，军队仍然继续开枪，造成12人死亡、38人受伤。^[145]

七河州

首次得知该州发生叛乱是在8月6日。这一天，地区领导助理来到阿拉木图东南部地区制作征兵工人名单，遭到了暴力反抗。位于阿拉木图以西80公里处的萨姆瑟车站周边的电线杆被砍倒，邮局也遭到破坏。到了8月9日，从库得罗伊到阿拉木图之间的邮局全部遭到破坏。皮什彼克（今比什凯克）及托克马克地区六个乡的吉尔吉斯人发动叛乱，切断了和普热瓦利斯的联系。同时，在普热瓦利斯克附近也发生了叛乱。武装起来的吉尔吉斯人大军出现在各主要河流流域的河谷地区，袭击俄罗斯居民村落，掠夺财产。可以看出他们的行动有一定的组织性。叛乱者挥舞反旗，并在帽子上别有金属徽章。此外，他们使用信号来相互通报政府军的行动动向，并在山里建造了生产火药和刀枪的工厂。在发动叛乱之前，吉尔吉斯人还在普热瓦利斯克地区袭击了运输队，抢走了170支枪和4000发弹药。他们还从中国购买了一部分武器。

叛乱的中心位于皮什彼克南部、普热瓦利斯克全县和加尔肯特南部，这些地区的俄罗斯居民村落全部遭到了破坏。仅在普热瓦利斯克一地，就有6024户居民遭到掠夺，任地区领导助理的一位中校、警官及39名哥萨克骑兵、8名士兵被杀害。虽然在七河州的其他县内没有发生如此激烈的叛乱，但吉尔吉斯人整体呈现出一种亢奋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民众想要移居中国，但遭到阻拦。人们只能表示顺从，返回原居住地。

为了镇压七河州的叛乱，政府从其他州调遣了预备狙击兵团的7个连、5个骑兵连，还派遣了西伯利亚和哥萨克的2个连。军队出动之后，吉尔吉斯的叛军仅进行了微弱抵抗，随之便逃往边境的深山之中，弹尽粮绝之后宣布投降。有39个乡的吉尔吉斯叛乱者带着俄罗斯俘虏逃往山中，最后又逃到了中国境内。

在七河州的这场叛乱中，不少普通民众失去了生命，其中阿拉木图有16人死亡，加尔肯特有32人死亡、20人失踪，皮什彼克有98人死亡、65人失踪，普热瓦利斯克有2179人死亡、1299人失踪。俄军则折损了3名军官及52名士兵，此外47人受伤、75人失踪。^[146]

外里海州

这里的居民平静地接受了1916年6月25日发布的敕令。梅马内县地区的土库曼人甚至提交了请愿书，请求作为士兵参战，而不是在后方工作。然而，在克拉斯诺沃茨克（今土库曼巴希）地区，民众的不满之情日益高涨，最终引发了叛乱。8月15日和16日，阿托列克河地区的民众暴力反抗警察执法，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到了8月下旬，大批伊奥姆德人逃往波斯（伊朗）的草原。到了9月，逃亡者的帐篷数高达2000个。从9月20日左右开始，他们全副武装，于阿斯塔拉巴德（今戈尔甘，

当时波斯一方的城市)的周边地区对俄军巡逻部队发起进攻,占领了阿库卡拉的要塞。俄军为了夺回此地,通过炮击将土库曼人赶了出去。但是,这场冲突一直持续了整个秋天。最后,俄国政府组建了一支由6个营和15个骑兵连组成的镇压部队,由马德里托夫将军率领,从阿斯塔拉巴德和奇科西利亚尔进发(日俄战争前夕,鸭绿江林业公司被视为俄国侵略朝鲜的尖兵,而马德里托夫将军正是当时该防卫部队的指挥官)。12月6日,叛军舍弃阿库卡拉要塞,镇压军占领此地。之后,镇压军途经格姆贝托,向莫拉瓦特佩发动进攻。12月28日至31日,经过4天的战斗,军方彻底消灭了叛军。

在上述汇报中,土耳其斯坦边区库罗帕特金总督如此写道:

87

现在土库曼人(伊奥姆德人)已经投降,他们的最大头目库鲁奇也已归顺,这可谓标志着整个土耳其斯坦地区骚乱和叛乱的终结。^[147]

库罗帕特金就骚乱的原因做了以下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动员令,仓促的动员造成了各种困境;该地区19—31岁的青壮年男子极度缺乏,连人口造册都十分困难;谣言四起,有些恶意的谣言称此举是为了下一步的秘密征兵;也有谣言称此举意在把工人暴露于炮火之下赶尽杀绝,把他们的土地交给俄罗斯人。

当地教徒也推动了骚乱。吉扎克县的叛乱者殴打俄罗斯人,声称不想再做俄国的臣民,要做“日耳曼人”,阿富汗会帮助自己等。原贾努达林斯克地区首领的儿子被选为吉扎克的首领,为了建设独立国家而向吉扎克派兵。苦盏管区的人们推选了特鲁达贝科夫为首领,桑恩管区的人们推选了卡斯姆·郝加为首领。

此外，德国和土耳其的俘虏和奸细也对当地人产生了影响。库罗帕特金暗示说，德国俘虏中有一部分人为了分裂俄罗斯帝国而接近穆斯林，煽动了反俄活动。

更直接的一个原因是，1886年颁布的《土耳其斯坦地方行政法》有不完善之处，行政官员少，导致当地行政官员权力过大。^[148]

土耳其斯坦地区共有261.5万名吉尔吉斯人处于无权使用土地这种最为悲惨的状态。根据当时的法律，吉尔吉斯人从事游牧、赖以生活的土地被认定为国有土地，当地人可以使用，剩余土地则归国
88 库管理。然而法律对“剩余土地”的解释范围不断扩大，自1904年以来，吉尔吉斯人的土地被大面积剥夺，建起了俄罗斯人聚集的村落以及官营牧场、林场。吉尔吉斯人仅余的可使用土地也被畜牧者占用。库罗帕特金指出，这是叛乱的前提原因。土库曼人原本还算风平浪静，但由于俄国政府安保部门欠缺考虑地从梅马内县选取未受过教育的居民充当奸细，使得安保部门的行动掺杂了当地百姓的内部冲突，造成了混乱。采取了最过激行动的则是在波斯领土内过冬的土库曼人，他们甚至武装起来反抗动员。^[149]

叛乱导致在土耳其斯坦地区共有3709名俄罗斯人死亡，其中2325人被虐杀、1384人失踪。7名俄罗斯行政官员以及22名当地行政官员身亡，9000多户房屋被毁坏。政府派出14.5个营和33个骑兵连携42门大炮、69挺机关枪镇压叛乱，军方最终的损失是97人死亡、86人受伤、76人失踪。

镇压中，有3376名叛乱者被杀。其中七河州105人、锡尔河州（包括阿姆县）744人、费尔干纳州134人、撒马尔罕州811人、外里海州1582人。

在对叛乱分子的惩处方面，截至1917年2月1日，共有347人被判处死刑，168人被判处徒刑，357人被判处监禁。但是，库罗帕特金总督把叛乱头目和参加者区别对待，仅对其中的51人真正执行了

死刑。在土地方面，吉扎克县共有近2185公顷的土地被没收；七河州的吉尔吉斯人被勒令离开当地；由于有些俄罗斯居民对归顺的吉尔吉斯人非常仇恨，杀害了放下武器的吉尔吉斯人，所以并不允许吉尔吉斯人返回故土。¹¹⁵⁰¹

不知道库罗帕特金总督的这份报告是何时送到首都的沙皇面前的。也许沙皇在退位之前并没有读到这份报告。

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帝国国内体制脆弱不堪，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如果此时瓦解了东部战线，就可以把兵力集中到西部战线，使战局起死回生。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从开战伊始就策划的“革命化政策”（Revolutionsierungspolitik）一直在谋划之中¹¹⁵¹¹，至于这一行动与叛乱的关系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土耳其斯坦地区的叛乱诱发了正在进行新一轮动员备战的俄罗斯帝国的内部矛盾，从最底层点燃了帝国解体的导火索。这场叛乱预示着大变动即将来临。

第 2 章

革命的序幕

拉斯普京遗体的头部



1916年10月末，在彼得格勒的市议会大厅召开了关于重建俄英联盟的会议。在会议主席罗江科的敦促下，时任英国大使布坎南发言，声称俄国境内的“德意志党”正在开展危险的活动。他说：“在欧洲战场，战争必须坚持到胜利。同时，对于那些在（俄国）国内的，更加不可忽视的敌人，我们也必须夺取最终胜利。”^[1]这不仅是露骨的警告，也是一种施压。

协约国一方（英法）认识到俄国正陷入政治和社会的双重危机，担心俄国接受德方的条件单独议和。在他们看来，如果沙皇政府没有持续作战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哪怕是推翻沙皇政府，也必须迫使其与自己共同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协约国的计划是，在战争第四年即1917年展开强大攻势，迫使德奥最终投降。正因为如此，他们非常关注俄国的动向。

11月1日，国家杜马重启。当天，米留科夫发表演说，其中多次重复了一句话，即后来著名的“这是无能还是背叛”^[2]。米留科夫表示，这个演说是对此前英国大使发言的明确回答。

开战至今，已经过了27个月。“我们仍然希望获取全面胜利，仍然在付出必要的牺牲，仍然在力图保持国民团结。但是，让我明确地告诉大家吧：形势已经变了。我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份权力会引领我们走向胜利。”

- ⁹³ 米留科夫引用了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地方自治会联盟代表会议声明中的一段话。他说，有“令人窒息的、可怕的怀疑和传言称，一股黑暗势力正在蠢蠢欲动，试图背信弃义，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战，破坏国民团结……进行可耻的议和”，使得人心惶惶。对于私通德国的行为，米留科夫特意强调布坎南大使也公开指责了这种行

为，要求必须进行司法调查。他还引用了德奥《新自由报》上的文章，指出这股“黑暗势力”就是马纳塞维奇·马努伊洛夫、拉斯普京、皮特林、施蒂默尔等人，目的在于让施蒂默尔当上首相。这是“聚集在年轻皇后周围的宫廷党人的胜利”^[3]。米留科夫的发言，是在国家杜马讲台上首次发出的对于皇后的攻击。

然而，对于所要采取的行动，米留科夫主张的仍然是进步同盟的宣言，即：“我们会与你们一直斗争，采用一切合法手段与你们斗争，⁹⁴直至你们消亡。”很明显，这种空洞的承诺不会让事态有任何改变。

在演说临近结束时，他重复了三遍“这是无能还是背叛”，很有气势。米留科夫具体举出了三件事情：一是对罗马尼亚坐视不救；二是批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答应波兰自治；三是国家杜马呼吁团结而政府却希望制造混乱。这三件事情基本上都与“背叛”无关，但是米留科夫三次使用了这个词，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场演说似乎很对协约国的胃口。得知米留科夫引用了自己的发言，英国大使布坎南显得很高兴。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感觉那一天仿佛是an English day^[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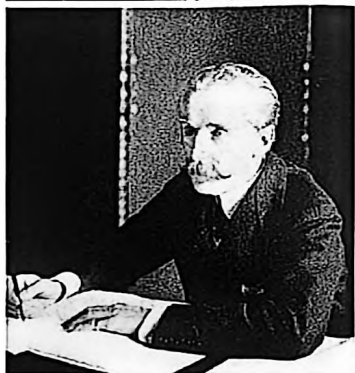
当然，仅凭米留科夫的演说，国家杜马并不会发生改变。10天后，也就是11月10日，施蒂默尔首相遭到罢免，进步同盟的主流派又将希望寄托在新任首相特列波夫身上。此时，社会上对拉斯普京支配下的皇室政治的批判之声愈发高涨。最终，极右势力提出弹劾“黑暗势力”。12月1日，第十二届贵族联合会通过了弹劾“黑暗势力”的决议。

一直以来，贵族联合会都忠诚于自己的专制君主。然而，在第十二届大会上，我们却怀着莫大的悲怆，在俄国正迎来狂风暴雨之时，在君主制对国家的强大团结显得尤为重要之时，注意到这个国家数世纪以来的基础正逐渐脱离其本来的原

则。一股非法的、不负责任的黑暗势力，正在插手国家统治。这股势力迫使最高权力服从于自己的支配，甚至把魔掌伸向了教会管理。……我们必须坚决排除黑暗势力对国事的影响，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取信于民的、能与立法机构通力合作并且只对君主一人负责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带领我们取得战争的完全胜利。国民情感不会接受战败之下的议和。^[5]

95

列夫·吉霍米洛夫^[6]曾经是主张暗杀沙皇的恐怖分子党派民意党的理论家，之后其政治立场发生转变，成为右翼君主主义的政论家，担任《莫斯科新闻》主笔。现在他辞去了所有职务，成为一名具有批判精神的市民。吉霍米洛夫赞成第十二届贵族联合会的决议，在12月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拉斯普京）这个不足挂齿的丑恶小人竟然动摇了君主制的根基。”他也已经预感到可怕的结局必将来临。“换言之，我们现在的状态没有出路。人民体内最为……反抗的本能已经孕育成熟，恐将血流成河。……全体国民的精神异常也许只有在流血的狂热中才能得到疏解。”^[7]五天后，他又明确写道：“没错，革命的时候



上：十月党人、第三和第四届
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
中：英国大使布坎南
下：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

机正在逐渐成熟。现在上层阶级正在将其变为现实，而最大的责任人便是拉斯普京。”^[8]

在这样的状况下，那些最为了解并痛恨拉斯普京和皇后关系的皇族及其周围的人，必然会通过暗杀拉斯普京掀起一场宫廷革命。

宫廷革命——暗杀拉斯普京

宫廷革命是君主制的必然产物。只有通过宫廷革命，才能铲除无能愚钝的君主，扶持有能力的新人上位。在俄国，尤其是在18世纪，这一手段曾多次出现。俄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宫廷革命发生在1725年。当时，彼得三世遭到暗杀，拥有德国血统的皇后强势上位，她就是叶卡捷琳娜女皇。叶卡捷琳娜女皇死后，她的儿子保罗一世即位。保罗一世不赞成母后的做法，废除了由沙皇指定皇位继承人的制度，制定了新的皇位继承法，规定皇位由沙皇的直系男性后裔自动继承。然而讽刺的是，1801年3月11日，大贵族掀起了一场宫廷革命，杀害了保罗一世，将皇太子亚历山大一世扶持上台。^[9] 96
后，俄国历史上便再没发生过宫廷革命。

此后的四任沙皇，在性格和能力方面都没有太大问题。然而，1894年即位的尼古拉二世，在执政20年后明显暴露出其个人性格与能力上的极大缺陷。他被崇信拉斯普京的皇后控制，允许后者插手人事任免及政治事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纵然是在20世纪的文明国家，也必然会发生宫廷革命。

要想在1916年年末的俄国宫廷有所行动，计划的第一步必然是“清君侧”——通过除掉危险的奸臣拉斯普京，让盲目相信拉斯普京的皇后失去精神依靠，使意志软弱、唯“京”是从的沙皇恢复理智。如果在情理上难以动手暗杀沙皇和皇后，那么除掉拉斯普京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计划。

实际上，这个计划首先来源于宫廷内部逐渐升温的反皇后情绪，这一情绪主要集中于齐娜伊达·尤苏波娃公爵夫人及其亲信。尤苏波夫公爵家族堪称名门，其先祖是14世纪末的金帐汗国乞颜部鞑靼人军事贵族也迪古。15世纪，该家族中出现了诺盖汗国的统治者穆萨，16世纪王公优素福家族的后人投奔伊凡四世成为其臣下，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成为尤苏波夫公爵。19世纪80年代，尤苏波夫公爵的独生女齐娜伊达与德裔伯爵费利克斯·苏马罗科夫·埃尔森结婚。埃尔森是一名陆军中尉，曾任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的副官，1915年由莫斯科军区司令升任莫斯科总督。埃尔森出身平凡^[10]，但齐娜伊达·尤苏波娃作为名门后裔，性格高傲霸道，在家中处于主导地位。1910年画家赛洛夫创作的肖像画中，齐娜伊达眉峰上扬，传神地表现出她性格中强势的一面。^[11]

齐娜伊达·尤苏波娃与伊丽莎白关系极好。伊丽莎白是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于1905年革命前夜被暗杀）的妻子，也是皇后亚历山德拉的亲姐姐。因为这个原因，齐娜伊达与皇后的关系最开始也很亲近。但随着伊丽莎白对自己妹妹的批评日渐加深，齐娜伊达也逐渐看不惯皇后，并在1912年3月9日这一天，直言不讳地向皇后指出了关于拉斯普京的问题。她对皇后说，整个社会都非常不满拉斯普京出入皇宫，试图劝说皇后认识到拉斯普京是“一个不道德的人”^[12]。从此，她和皇后形同陌路。因此，齐娜伊达之子、公爵家的次子费利克斯成为这场宫廷革命的中心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费利克斯出生于1887年，当年29岁。从画家赛洛夫1903年为其绘制的肖像画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长相清秀的美男子。费利克斯从中学时就沉迷女装，有同性恋倾向。他既没有考大学，也不工作，在声色犬马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他曾经穿着女装在夜总会唱歌，没少让位高权重的父母操心。^[13]1908年6月，费利克斯的哥哥尼古拉在决斗中丧命，费利克斯决定洗心革面，之后

远赴英国，于1910年至191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4]他是在母亲齐娜伊达和皇后产生激烈冲突之后回国的。不过，他回国之后，与亚历山大·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的女儿、绝世美女伊琳娜公主的婚事便提上日程，并于1914年2月正式完婚。因此，尤苏波夫家族和沙皇、皇后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伊琳娜的母亲克塞尼亚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妹妹，也就是说，费利克斯迎娶了沙皇的亲外甥女。^[15]二人结婚之后很快便有了一个女儿，有推测认为，费利克斯可能是双性恋。

但是不久，尤苏波夫家族便发生了一件大事。费利克斯的父亲、时任莫斯科总督的苏马罗科夫·埃尔森在开战后，下令将外国人及德国人驱逐出莫斯科，导致1915年5月27日莫斯科市内发生了反德集体性暴乱事件，埃尔森为此不得不引咎辞职。作为尤苏波夫家族一家之长的埃尔森及妻子齐娜伊达认为处罚不当，十分愤怒，便隐居到了克里米亚的领地。^[16]与此同时，拉斯普京在莫斯科的胡作非为愈发明显，这使得齐娜伊达心中对皇后和拉斯普京的愤怒愈发强烈。

齐娜伊达对拉斯普京的愤怒深深影响了儿子费利克斯。由于哥哥已不在人世，这时的费利克斯成了家里的独苗。因为可以不服兵役，战时费利克斯在医院工作，但他对此并不满足，特意去专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军校贵胄军官学校学习相关课程。^[17]

费利克斯·尤苏波夫在1927年出版的最初的回忆录中提到，自己是在1915年听到妻子和母亲的对话时产生铲除拉斯普京的想法的。^[18]但在1952年出版的第二本回忆录中却并未提及此事，只是谈到一切源于1916年夏天，当时母亲齐娜伊达向皇后进言，抨击拉斯普京。据说皇后态度冷淡，得知齐娜伊达的来意后便要送客。但齐娜伊达态度十分强硬，表示非说不可。听完齐娜伊达的陈述，皇后起身说了句“我不会再见你了”，便转身离去。^[19]铲除拉斯普京的



左上：齐娜伊达·尤苏波娃公爵夫人。暗杀拉斯普京行动的核心人物

右上：齐娜伊达的肖像画（赛洛夫作，1910年）

右：皇后亚历山德拉的亲姐姐伊丽莎白夫人（左）与丈夫谢尔盖大公



想法，或许是从这个时候正式产生的。

费利克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结识了奥斯瓦尔德·雷纳。雷纳作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SIS）的一员，于1915年年底来到彼得格勒任职。^[20]他和费利克斯走得很近，必然对费利克斯产生影响。在母亲⁹⁹的影响下，费利克斯反皇后和反拉斯普京的想法愈发强烈，并最终成为宫廷革命的主谋。可以认为，在这件事情的背后，雷纳的推波助澜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齐娜伊达在1916年11月18日给儿子费利克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段日子，问题非常严重。我从未如此悲观地看待整个事态。毒瘤正在胀大，一旦破裂，无人能够阻止。梅德韦杰夫（熊公）（代指时任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回去时心情沉重，然而我却毫不吃惊。我确信，一切都毁在她（皇后）的手里。她支持l'interier（内务大臣），因为他（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是某人（拉斯普京）的信徒，没有某人，他就很危险。如果我们不干掉某人（拉斯普京），不控制皇后，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请务必将这一点转告给你的米哈伊尔舅舅（尼古拉·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必须要求他把某人（拉斯普京）驱逐出首都。这是非常必要的。梅德韦杰夫不想认清这一现实。^[21]

齐娜伊达与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的夫人安娜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罗江科夫人出身于戈利岑公爵家，她的姐姐玛丽亚与罗江科的哥哥保罗是一家。保罗是近卫骑兵团的军官，和皇后也有交情。^[22]费利克斯在自己的信中也称罗江科称作“叔叔”。

费利克斯·尤苏波夫在决定暗杀拉斯普京之后，首先告诉了他的密友、近卫军官谢尔盖·苏霍金中尉，把他拉了进来。^[23]谢尔盖因在战场上受伤，此时正在接受治疗。之后费利克斯又向好友德米

100 特里·巴甫洛维奇大公阐述想法，说服他加入这个计划。德米特里是沙皇的小叔保罗大公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之一。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后来与平民再婚，所以根据沙皇诏书，他和姐姐玛丽亚一起由父亲的哥哥谢尔盖大公及其妻子伊丽莎白收养。伊丽莎白没有子嗣，丈夫又于1905年被暗杀，所以她对于姐弟两人尤其是德米特里倾注了很多心血。^[24] 德米特里也受到沙皇夫妇的关照，可以自由进出皇宫。他当年25岁，从骑兵学校毕业后，担任近卫骑兵连的军官，可以说是皇室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德米特里受到伊丽莎白的影 响，认为让拉斯普京和皇后勾结在一起非常危险。但是他认为暗杀计划难以顺利实施。^[25]

费利克斯与谢尔盖·苏霍金商量后，决定要先和拉斯普京相识然后交好。这是费利克斯的长项，他很轻易地获取了拉斯普京的信任。

接下来，费利克斯计划要让国家杜马议员也参与其中。他看了国家杜马议员中的大人物——瓦西里·马克拉科夫。马克拉科夫精通法律，曾是立宪民主党人。比他小一岁的弟弟尼古拉官运亨通，在开战前后担任内务大臣，所以马克拉科夫在国家杜马中的政治地位也比较特殊。1915年9月，马克拉科夫在报纸《俄罗斯新闻》上发表了著名的随笔《悲剧的状态》，描绘了一个在山路上开车狂奔的男人万事俱休的状态。开车的人明显已经无法正常驾驶，却仍然紧紧握着方向盘。如果硬让他放弃驾驶，汽车可能会跌入谷底。人们只好劝他先冷静下来，打算从旁给出主意，但车上同行的母亲却责备道：“我可能马上就要死了，你却什么也不做吗？”这篇随笔中“疯狂的司机”影射的正是沙皇和皇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26]

11月中旬，费利克斯见到了文章作者、国家杜马议员马克拉科夫。费利克斯认为，虽然施蒂默尔被解除了首相职务，但不能就此安枕无忧。只要拉斯普京还在，国家杜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

事。“所以，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收买拉斯普京，让他成为自己人，要么就杀了他。”马克拉科夫举出种种疑虑，没有明确表态，费利克斯则劝说他，表示会由自己来实施暗杀拉斯普京的行动。在这个阶段，两人未能达成共识。^[27] 101

11月19日，右翼议员普利斯科维奇在国家杜马进行了爆炸性的演讲，其激烈程度远超之前的米留科夫。他在演讲一开始就说道，“我想谈一谈俄国现在令人悲哀、令人心痛的严峻现状”，“统治权力的无序状态，使我们处于现在的困境”。他斥责大臣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个人私利，举出皇宫警卫司令沃耶科夫、前农业大臣博布林斯基等人的名字，并历数内政大臣普罗托波波夫的各项罪状。

然而，在座各位，我说的这些还都是细枝末节。……罪恶的根源，并不是普罗托波波夫。……

我谨在此，站在国家杜马的讲坛上表达我的观点。那就是，所有的恶，都来源于一股黑暗势力，来源于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以给各种各样的人许以地位，让无能的人也能爬到高位。它，就是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影响力。…… 102

我要向大臣会议请求。各位大臣，如果你们认为责任比经历更为重要……就务必进谏沙皇，阐明这一切必须做出改变。这不是对权力的联合抵制，而是各位对于沙皇陛下应尽的责任。……请敦促陛下正视可怕的现实，请拜托陛下将俄国从拉斯普京及其爪牙的控制中拯救出来。……

几个世纪前，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曾动摇了俄国的根基。今天，他化身格里高利·拉斯普京重现阴魂。然而，这个阴魂在完全不同的境况中生存，比起当年的奥特列皮耶夫更加危险。

他提到的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在17世纪的动乱时期，曾冒充被害的皇太子德米特里发动战争。普利斯科维奇在演讲的最后，面对在座的大臣，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道：

各位都是陛下的臣民，为实现陛下的意志而接受任命，对俄国这艘大船的航行负有责任。各位必须和我们团结一致，向身在最高统帅部的陛下请愿，不能再让格里高利·拉斯普京担任俄国内政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28]

11月20日，费利克斯写信向母亲描述了前一天国家杜马讨论时的场景。普利斯科维奇的演讲让他激动不已。“特列波夫首相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说话时有五次都出现了结巴。普利斯科维奇的演讲非常棒，给大家很大的震撼。”^[29]

费利克斯当天就着手安排，于次日早上9时拜访了普利斯科维奇。他对普利斯科维奇的演讲赞不绝口，表示必须除去拉斯普京。他告诉普利斯科维奇，自己将与另一个人一起实施暗杀。之后，他邀请普利斯科维奇当晚去家里做客。普利斯科维奇很喜欢这个年轻人的率直，晚上如约而至。德米特里大公和苏霍金中尉也加入进来，¹⁰³ 四人一起谋划暗杀计划。^[30]

读完儿子费利克斯寄来的信，尤苏波娃在11月25日的回信中写道：“说这些都为时已晚。没有丑闻，就很难解决问题。在战争期间，只有铲除统治者*（upracliaiushchii）并要求那个皇后不干预国事，才能平息一切。我再强调一遍，如果不解决这两人的问题，用和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31]

费利克斯将具体的暗杀计划告知了三位同伴。他打算以将拉斯普京介绍给妻子伊琳娜为借口，邀请拉斯普京上门再伺机杀掉他。他已经对拉斯普京发出了邀请，拉斯普京欣然应允。根据相关文件的

记录，关于暗杀方式，费利克斯和普利斯科维奇都认为毒杀是第一选择。因为尤苏波夫家的府邸位于莫伊卡运河旁边，附近有警察驻守，枪声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普利斯科维奇提议将自己管辖的红十字火车上的医生拉索维利特也拉入暗杀行动小组。第二天以及11月24日，他们又仔细斟酌了暗杀计划，细节部分已经基本商定。^[32]

就在这段时间，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11月22日（公历12月5日），罗马尼亚首都沦陷。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抓住这个机会，在一周后向协约国方递送了提议讲和的信函。紧接着，非参战国的总统威尔逊也在12月5日（公历12月18日）发表备忘录，询问交战各国和平停战的条件。^[33] 协约国各国政府都密切关注着俄国的动向。沙俄内部的亲德势力是否会有所行动？沙皇政府又会如何应对？俄国境内的各协约国秘密情报机构都对此十分关注。 104

12月1日，暗杀行动小组成员进行商谈，决定在12月16日深夜实施对拉斯普京的暗杀行动。^[34] 12月3日，皇后的姐姐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大公夫人访问了皇村的皇宫，希望面见沙皇。沙皇称次日清晨要出发去莫吉廖夫的最高统帅部，没有时间，所以大公夫人仅仅见到了皇后。她向皇后说明了拉斯普京的危险性，劝说皇后改变想法。皇后非常恼怒，此时，姐妹俩彻底决裂*。皇后以命令的口

统治者 尤金在档案馆挖掘出该信，认为其中提到的 *upraclaiushchii* 指拉斯普京，而“两个问题的清算”一句与费利克斯暗杀拉斯普京无关，齐娜伊达也与本次暗杀阴谋无关。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E. E. Iudin, *Iusupovy i Nikolai II* (1890-1916 gg.), VII, 2009. No.7, p.131]。根据斯皮里多维奇的看法，这封信曾被秘密开启，并汇报给了沙皇夫妇。

姐妹俩彻底决裂 皇后在12月5日的信件中谎称“已经成功说服了”姐姐 (*Perepiska Nikolai I Aleksandry*, Vol.V, p.160)。



暗杀拉斯普京计划的实施者，由左至右分别为费利克斯·尤苏波夫、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大公、右翼议员普利斯科维奇

吻对姐姐说：“你不要再说了，回去吧。”大公夫人在临走前扔下了一句话：“你们想一想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命运吧。”^[35]这句话究竟是真有其言，还是姐妹冲突的传言在莫斯科流传开来时被添油加醋传成了这样，真相不得而知。

12月8日，费利克斯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已经三天没去过梅德韦杰夫那里。不过我和普利斯科维奇倒是见了好几次，交情甚好。”^[36]

这期间，费利克斯与国家杜马议员马克拉科夫见了第二面。马克拉科夫对行动不再质疑，而是开始建言献策。马克拉科夫认为，暗杀行动须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如果被逮捕，参与者便会被送上法庭。这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得暗杀事件“成为革命的序幕”，因此无论如何都要避免这种结果。费利克斯请求马克拉科夫参与16日在自家府邸实施的暗杀行动。马克拉科夫说，“我在莫斯科有场演讲”，但费利克斯表示“希望您能够推迟演讲”^[37]。马克拉科夫应允了他，并往莫斯科发电报，告知演讲推迟一事。但不久之后，费利克斯又联系他表示不来也可以。据说，这是因为德米特里大公

认为，应将此次暗杀行动作为“真正具有献身精神的君主主义者的行为”，不应该让立宪民主党的马克拉科夫参与进来。^[38]

此外，关于费利克斯等人的暗杀计划，英国的秘密情报组织（SIS）是知情的。该组织负责人塞缪尔·霍尔回忆说，自己从普利斯科维奇那里听说他和同伴们决心要“解决拉斯普京问题”，但并未相信。^[39]虽然仅有上述几句描述，但事实上，作为情报组织负责人，他如果知道暗杀计划，应该会与属下商量如何应对，也不可能不向本国及大使汇报。更何况费利克斯在牛津时的好友奥斯瓦尔德·雷纳也在该秘密情报组织工作，霍尔不可能不知道他俩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出，塞缪尔·霍尔的回忆是在含糊其词。 105

费利克斯在第二本回忆录中，首次提到在暗杀拉斯普京后的第二天傍晚与“同学、英国士官奥斯瓦尔德”见面一事。“他知道了我们做的事情，是来听消息的。”他说，第二天深夜，自己筋疲力尽，便与奥斯瓦尔德通了电话，希望他能陪陪自己。^[40]很明显，回忆录里的这番叙述，隐瞒了他和雷纳的关系以及雷纳曾参与暗杀行动。

现在英国的很多研究认为，雷纳当时就在尤苏波夫宅邸，并参与了暗杀拉斯普京的行动。雷纳是费利克斯回忆录的英译者，但在死前他将自己的材料悉数烧毁。讣告中也写到，事件当时他在尤苏波夫宅邸。此外，英国研究者卡伦·不仅认为雷纳参与了暗杀行动，而且还介绍了其女儿（现已是一名90多岁的老人）的证言^[41]，那就是她听说雷纳的同事约翰·斯凯尔上尉也参与了这项计划。虽然暗杀事件发生时约翰被派到了罗马尼亚，但他也知晓并参与了暗杀拉斯普京计划。

卡伦 前伦敦警察厅高官，退休后作为独立人士，力图挖掘暗杀拉斯普京事件的真相。他曾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特别节目合作，在网上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不过，此前提到，德米特里大公主主张只有君主主义者才能参与
106 行动，甚至反对立宪民主党议员马克拉科夫加入，考虑到这一点，应该不太可能允许英国情报人员参与此次暗杀行动。因此，我本人不同意这位英国研究者的说法。但是，在塞缪尔·霍尔的允准下，雷纳协助并监视了此次行动，这一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此时，对于德国抛出的和平提案，俄国政府异常迅速地做出了反应。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2月12日（公历12月25日）向陆海军官兵下达了命令。

俄国还有几项战争带来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占领君士坦丁堡及两个海峡；合并三个分散区域，创建自由波兰。如果现在讲和，就意味着我们英勇的陆海军战士的功劳将失去意义。更何况那些战死沙场的勇敢的俄国将士，他们的神圣记忆……在迎来对敌人的最终胜利之前，我们决不讲和。^[42]

1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支持沙皇命令的示威游行。^[43]

12月16日（公历12月29日），晚上11时多，费利克斯以将拉斯普京介绍给妻子伊琳娜这个早已找好的借口为名，用车将他接到莫伊卡运河边上自己的家中。开车的是医生拉索维利特。伊琳娜并未出现。费利克斯将拉斯普京带到改造过的地下小客厅，以妻子正在楼上接待客人为由，让他稍等片刻。德米特里大公、普利斯科维奇以及近卫军军官苏霍金等人潜伏在一楼。

暗杀经过如下：在地下的小客厅，费利克斯劝拉斯普京吃下含有氰化钾的糕点，又让他喝了含有氰化钾的酒。然而几个小时过去，拉斯普京依旧安然无恙。于是，费利克斯从一楼自己的桌子掏出手枪，去地下朝拉斯普京开了枪。听到动静后，潜伏在一楼的三人到地下确认拉斯普京已死，返回一楼。众人欣喜之际，拉斯普京竟

突然出现，并趁大家惊讶之时逃往楼外。普利斯科维奇抓起自己的手枪追向他连开四枪，拉斯普京才终于倒地不起。然后他们将拉斯普京的尸体搬回宅邸中。^[44] 107

整个谋杀过程有不少疑点。服用氰化钾之后仍安然无恙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也许只是为了强调拉斯普京的神奇力量。当代的英国研究者推测，他们有可能是哄骗拉斯普京喝下含有安眠药的酒，等他不能自由活动后，把他绑起来拷问，获取他的供词。^[45]

这些推测主要是依据科索罗托夫教授的尸检报告。据俄国研究者称，这份尸检报告于20世纪30年代下落不明，而英国研究者卡伦的著作中却引用了其中的说法。^[46] 但是，卡伦并没有明示是从哪里获得的这份资料。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拉斯普京的三张尸体照片被保管并展示在圣彼得堡的原革命博物馆中。^[47] 普利斯科维奇传记的作者伊瓦诺夫发现，这份神秘的尸检报告中有一段内容，被引用在1917年出版的揭露拉斯普京罪行的宣传册中。^[48]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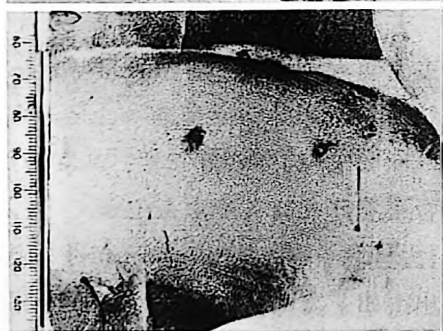
解剖时发现了非常多的外伤。大部分是死后造成的。右侧整个头部由于从桥上掉下来时受到强烈撞击，呈粉碎状态。死因是腹部枪伤造成的大量出血。据我观察，子弹几乎都是从正面射出，从左到右，穿透胃和肝脏，击碎了肝脏的右半部分。出血量极大。尸体的背部和脊梁骨部位均有枪伤，右侧肾脏粉碎。从正面看，额头上也有枪伤（可能是死后或濒死时留下的）。胸部器官正常，从表面观察，没有溺死的痕迹。肺部没有胀气，气管中未见水或气泡性液体。拉斯普京入水时已经死亡。……我认为，拉斯普京是中枪而死。有一颗子弹已被取出。之后的枪击都是近距离射击，子弹穿过了身体。……很明显，拉斯普京是在烂醉状态下被杀。尸体上还散发着白兰地的味道。^[49]



暗杀行动现场，尤苏波夫邸的地下小客厅



尤苏波夫邸正门（笔者摄于2018年3月）



从河中打捞出的拉斯普京尸体以及其腹部的枪伤

熟悉宫廷情况的俄国安保部门高官斯皮里多维奇也在书中写道：科索罗托夫教授确认尸体上有三处枪伤；尸体散发着酒味；没有发现下毒的痕迹。^[50] 三处枪伤通过尸体照片也得到了证实。

英国研究者卡伦著作里引用的科索罗托夫出具的尸检报告中，也多次出现上述内容，但最大的区别在于，卡伦的著作中提到拉斯普京的“生殖器官遭到毁坏”这一点。^[51] 英国研究者据此认为暗杀行动中存在拷问，也说明英国情报部门人员雷纳参与了暗杀活动，但俄方表示没有保存尸检报告，因此关于这一点疑问很大。

由于拉斯普京的身上有三处枪伤，因此利用氰化钾进行毒杀这一意图也是疑点重重。人们普遍认为，费利克斯等人劝诱拉斯普京喝完毒酒，待其晕倒后将他捆起来进行逼供，但是没有成功，最后开枪打死了动弹不得的拉斯普京。拉斯普京身上的三处枪伤分别来自不同的手枪。最后一处枪伤在额头，使用的是英国制造的0.455英寸口径的韦伯利转轮手枪（英寸，长度单位，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编者注）。英国研究者认为，这是雷纳的手枪。^[52] 但即便如此，也不排除费利克斯借用雷纳手枪的可能性。因此，不能据此就采用英国人的说法，认为英国的秘密情报组织成员雷纳参与了暗杀行动。

拉斯普京的尸体被用外套裹住装进汽车，由德米特里大公、普利斯科维奇、拉索维利特、苏霍金等人运出宅邸。他们将车开到彼得格勒郊外的彼得罗夫岛上，从桥上把拉斯普京的尸体扔进了小涅瓦河的冰窟窿中。^[53]

次日凌晨3时，拉斯普京的犹太人秘书西马诺维奇因为无法联系上拉斯普京，感到非常不安，便前往拉斯普京的住宅，叫起了拉斯普京的女儿玛拉，让她给皇后的密友、宫廷女官维鲁博娃打电话。^[54] 17日早晨，维鲁博娃得知拉斯普京前去费利克斯家中后就音信全无，立刻将事情禀报给了皇后。^[55] 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也致电皇宫，

皇后得知拉斯普京有可能遭到了暗杀。这时，宫里已经有传言说德米特里大公与普利斯科维奇参与了此次行动，皇后受到了巨大打击。她在给沙皇的信的开头处用铅笔增加了一段很长的内容说明事情经过，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朋友不在了”。^[56]

下午4时37分，皇后又给沙皇发了电报。

能否让沃耶科夫（皇宫警卫司令）马上回来？我们需要他的帮助。因为我们的朋友从昨晚开始就下落不明。希望神能保佑他。费利克斯和德米特里参与了此事。^[57]

皇后在下午还召唤了皇宫护卫武官德恩的夫人莉莉，让她去维鲁博娃家并留宿在那里。莉莉到了维鲁博娃家时，秘密警察已经加强了那里的警备。据说暗杀皇后和维鲁博娃的计划已经暴露。^[58]

110 费利克斯在当天上午10时拜访了特别市市长巴尔克和司法大臣，表示自己是清白的。但他在拜见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夫夫妇时说出了实情。罗江科夫人流着眼泪为他祈祷，罗江科也肯定了他的行动。^[59] 费利克斯为了骗过皇后，请求拜见。皇后当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回复说如果有想说的话就写在信里。费利克斯与德米特里大公、普利斯科维奇一同草拟了信件，谎称自己在16日晚与德米特里大公一起宴请宾客。晚上12时左右，拉斯普京打来电话，邀请自己去吉卜赛人的店里，但是自己因为还有客人在，便回绝了他的邀请。客人离开后，自己听见了枪声，便出去查看，发现原来是德米特里大公开枪打死了一条狗。^[60]

皇后没有相信这封信上的内容，发布命令禁止费利克斯离开首都。费利克斯傍晚来到车站，这里已经有宪兵严阵以待，阻止他离开首都。^[61]

17日晚，《交易所新闻》报道了拉斯普京的死讯，皇后最后的

希望也破灭了。晚上8时5分，沙皇给皇后发送电报。“我知道事情很严重，但是沃耶科夫乘坐的火车明天才能出发。能不能拜托加里宁？吻你。”^[62]加里宁是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的呢称。沙皇从皇后那里得知了拉斯普京的死讯，但在电报里却对他只字不提，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首都的游艇俱乐部里，尼古拉·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等人正在聚餐，这时，德米特里大公来了。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吓了大家一跳。德米特里大公否认自己参与了此次行动。^[63]

到了18日，普通报纸上也开始刊登相关新闻。《俄国晨报》在第四版以“谜一般的事件”为题，对此进行了大幅报道。^[64]

下午2时，警察在横跨小涅瓦河的杜奇科夫桥附近发现了血迹，于是派潜水员到河里搜寻遗体，但是一无所获。皇后得知费利克斯藏身于德米特里大公的府邸，遂命宫廷事务大臣代理马克西莫维奇发出逮捕德米特里大公的通告。德米特里大公请求拜谒皇后，却被拒之门外。^[65]

当天，皇后的姐姐伊丽莎白夫人结束了在萨罗夫修道院为期一周的祷告归来，当即给德米特里大公发去电报，希望他能写信告知事情的来龙去脉。电报最后写道：“对于费利克斯的爱国之举，希望神能赐予他力量。”她还给齐娜伊达·尤苏波娃也发去电报，对“您的重要的儿子的爱国之举”表示祝福。这两封电报都被普罗托波波夫秘密截获，并将其内容汇报给了皇后。^[66]

18日，在最高统帅部的早餐结束后，后勤部的负责人鲁科姆斯基中将正打算在上奏后汇报拉斯普京的事情，沙皇却打断他说：“我们没有时间了。”军事会议后，下午3时，沙皇与皇太子阿列克谢在皇宫警卫司令沃耶科夫陪同下，一起离开最高统帅部所在莫吉廖夫。^[67]

19日，警察继续搜寻拉斯普京的下落，中午12时30分，终于

发现了他的遗体。下午6时，沙皇抵达皇村，见到了皇后。沃耶科夫也同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谈了话。内务大臣最开始接受了沃耶科夫的提议，即将拉斯普京葬在西伯利亚，但在与沙皇夫妇商讨后，决定按照皇后的意思将其安葬在皇村。沃耶科夫又劝说了皇后的密友维鲁博娃，最终决定将拉斯普京葬在维鲁博娃的私人礼拜堂。晚上10时，在切斯马教堂墓地的帐篷中，科索罗托夫教授进行了尸检。^[68]12月21日，拉斯普京下葬。冬宫圣堂主教瓦西里耶夫主持仪式，沙皇、皇后以及维鲁博娃参加了葬礼*。沃耶科夫没有出席，并且劝说沙皇也不要出席，但沙皇没有听从他的建议。^[69]

暗杀拉斯普京的事件在沙俄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著名的政治讽刺漫画家卡利奎*在日记里记录了大众的反应。^[70]12月19日，卡利奎记下了在这一天听到的某位分析人士的看法。

112

打倒拉斯普京只是阴谋的一环。他们还计划进行彻底的改革，拥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上台，而后想方设法缔结和约。尼古拉大公早就认定战败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能再继续打下去。实际上这也是他之前被免去最高总司令职位的原因。施蒂默尔现在正在去马德里的路上，就是打算在那里进行

参加了葬礼 安德烈大公在日记里记录说，普罗托波波夫也参加了拉斯普京葬礼（KA, 1928, Vol.1, p.188），但被证实有误。

卡利奎 瓦雷利·维利亚莫维奇·卡利奎，出生于1869年，曾受到高尔基的赞誉。1905年，加入讽刺杂志《业火》（*Zhupel*），之后又参与杂志《森之精》（*Leshii*）的相关工作。他还是英国的俄国史学家帕雷斯的好友（Bernard Pares, *My Russian Memoirs*, London, 1931, pp. 421, 489）。

和谈的。可恶的英国人把我们卷入了战争，所以我们现在才会食不果腹。^[71]

这样逻辑混乱的言论比比皆是。卡利奎又继续记录道：

坊间甚至传言“拉斯普京还活着，尸体不是他本人”。我认识的“法西”酒店里的男服务生就对此笃信不疑。这些传言越传越真，大有蔓延开来的趋势。……据说皇后在事发当天给沙皇发去了两封电报。一封写道：“我十分不安，我们的朋友不见了”；另一封写道：“我要疯掉了，我们的朋友被暗杀了。你快回来”。^[72]

同样是在这一天，保罗大公召集皇室成员聚集到安德烈·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的病榻前，决定由保罗大公和亚历山大大公奏请沙皇，请求停止对德米特里大公等人的审讯。^[73] 12月22日，亚历山大·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来到皇村，闯入沙皇处理政务的房间，表示皇室成员一致要求停止对德米特里大公等人的审讯。据说大公的声音非常大，一直传到了屋外。^[74]

皇室成员的努力起到了一定效果。12月23日，沙皇通知皇后停止对德米特里大公等人的审讯。当天，宫廷事务大臣代理传唤德米特里大公，告知沙皇命其到波斯边境执行军务。当日下午2时，德米特里大公被送上了火车，出发前往目的地，保罗大公等人在车站为他送行。^[75] 113

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沙皇召见戈利岑公爵，任命其为首相。这是因为之前的特列波夫首相强烈要求罢免普罗托波波夫，引起了皇后的不快。新任首相戈利岑时年57岁，是内务部的官僚，之前仅仅担任过省长，但从1915年起开始担任皇后掌控的俄国战俘救

济委员会主席。很明显，这次的首相任命也是皇后操控下的人事变动。^{*1761}即使拉斯普京不在了，皇后依旧有能力迫使沙皇接受自己的人事安排。这说明之前的宫廷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2月29日，在玛丽亚·帕芙洛夫娜夫人（弗拉基米尔大公夫人）的宫殿里，皇室成员们联名为德米特里大公起草了请愿书。为请愿书执笔的是保罗大公再婚的妻子帕蕾^{*}。¹⁷⁷¹这封请愿书在开头写道：“沙皇陛下，我们作为在信末署名的所有成员，强烈希望您能够回心转意，收回对德米特里大公的严厉处置。”请愿书指出，大公现在“身心俱疲”，他从心底热爱着沙皇和祖国，而波斯边境的军务工作使他日渐虚弱，因此大家联名向沙皇请愿，请求改变处置决定，让德米特里大公在自己的领地关禁闭。这封请愿书丝毫没有提到拉斯普京的暗杀事件，也没有指责德米特里大公的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间接表明大家支持德米特里大公的立场。

在这封请愿书上署名的有：欧嘉（康斯坦丁大公的女儿，希腊王后）、玛丽亚·帕芙洛夫娜大公夫人、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维多利亚·梅里塔（基里尔大公夫人）、鲍里斯·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安德烈·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保罗大公、玛丽亚（保

皇后操控下的人事变动 戈利岑在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上的陈述中，提到了自己与皇后在工作上的关系（*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I, pp.250-251）。

帕蕾 侍卫卡尔诺维奇的女儿，曾是陆军中将皮斯特克里斯的妻子，后离婚。1891年保罗大公夫人去世后，帕蕾成为大公的情人，并于1902年和大公结婚。由于二人门不当户不对，所以婚事最初遭到了反对。1904年帕蕾获得沙皇恩准，被授予了爵位，1915年正式称为帕蕾公爵夫人。帕蕾的侄女格罗维娜非常崇拜拉斯普京，帕蕾和前夫生的儿子与安娜·维鲁博娃的妹妹结了婚，后者也是拉斯普京的追捧者（*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VII, pp.393, 396）。

罗大公的女儿)、伊丽莎白·马维利亚(康斯坦丁大公夫人)、若望·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及夫人埃蕾纳、加夫里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伊戈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尼古拉·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谢尔盖·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之后,请愿书被送到了皇村。^[78]

基里尔大公夫人梅里塔最初和皇后亚历山德拉娘家的家主——黑森公国的末代大公恩斯特·路德维希有过一次婚姻,之后两人离婚。在他们离婚之时,原黑森公国大使、时任英国大使的布坎南曾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命从中斡旋。从这层关系上说,基里尔大公夫人是英国大使布坎南的朋友,是黑森大公的妹妹亚历山德拉皇后的敌人。^[79]

这一天,皇后的姐姐伊丽莎白大公夫人给沙皇写了信。她在信中写到,自己在萨罗夫修道院待了十天,“为陛下,为您的军队、国家和属下,为身心孱弱的人们”进行了祈祷。得知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费利克斯“杀了那个人”,“我认为这是他在爱国之心驱使下,决心将陛下和祖国从引致这一苦难的人手中拯救出来的表现”。“犯罪固然不容赦免,可是这次的事情实属特别,可以看成决斗,更可以看作爱国之情的体现”,人人都为之欢欣鼓舞。“阻隔在我们和陛下之间的壁垒终于被打破。”大公夫人深情地呼唤道:“所有人都流着悲伤的泪水,向神明祈祷。主啊,请指引我们的陛下踏上光明正道。”“亲爱的二世,我的话没有半点虚假,请相信我的话。……请相信我和你说的都是真相。”^[80]伊丽莎白大公夫人已经和自己的皇后妹妹断绝了关系,这是她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出的最后呼唤。

12月30日,沙皇派人送回了皇室成员的请愿书,并在上面批奏:“无论是谁,都没有被赋予杀人的权力。我知道,良心不会给多数人带来平安。因为参与事件的不止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一人。我为诸位向我提出这样的诉求深感震惊。尼古拉。”^[81]这是沙皇与皇室

成员的断交宣言。第二天，尼古拉·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收到了沙皇的命令，被勒令在自己的领地禁足两个月。大公在日记中写到，皇后放话说：“你们这些畜生，有什么可得意的？你们能掌权吗？”^[82]确实，沙皇的做法意味着大公们的落败，是沙皇和皇后对皇室成员的阴谋和反抗发出的胜利宣言。

1917年1月1日，据沙皇的日记记载，这一天“虽然是阴天，却平静而暖和”。下午3时，在皇村大殿中，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大臣们、宫中百官、军队高官、外交官们举行了新年招待会。^[83]英国大使布坎南和沙皇进行了简短交谈。布坎南大使对沙皇说，自己听闻沙皇怀疑费利克斯的大学同学，即一名“年轻的英国人”参与了刺杀拉斯普京一事，但是这个传言完全是无中生有。对此，“陛下向我道谢，表示听了这句话深感欣慰”^[84]。

116 拉斯普京暗杀事件带来的影响在年后持续发酵。如果宫廷革命的第一幕没有带来任何效果就黯然落幕，势必会再上演第二幕。人们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1月10日，政治讽刺漫画家卡利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昨天，城里到处都散布着有关“暗杀”的流言：维鲁博娃被杀了，陆军大臣勃列艾夫被杀了，陛下本人被杀了，皇后被斩首了，等等。今天却完全没有听到这样的流言。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开始议论以尼古拉·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为首的“十七人的阴谋”。据传其目的是将皇后软禁在修道院。……这几天，又有传闻说1月12日还会有一场宫廷革命。^[85]

1月20日，原民意党领导人吉霍米洛夫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因为被诅咒的拉斯普京，权力在精神上遭受了多重打击。

这是无法用文字表述的耻辱。如果大臣的任命竟然能由拉斯普京决定，那么信任将从何谈起？这个肮脏之徒终于不存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任的回归。如果是陛下亲自灭掉了他，或许还能让人们相信陛下最后能够亲自除去病灶。可是，暗杀事件却让谁是俄国真正的掌权者这一可怕的问题浮出水面。而且，如果洗脱国家耻辱的唯一手段竟是杀人的话，这也将成为令人发指的先例。肮脏的拉斯普京，即使在死后也仍然是王朝的威胁。……

我常常冥思苦想，究竟要如何才能使皇权政治得到拯救，却终究百思不得其解。最重要的一点是，陛下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性格。……他永远都在动摇，只会不断从这个计划改变到另一个计划。

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灭亡。除非 117
有神明的旨意*介入。^[86]

早在1881年，民意党人就在首都的街道上发动恐怖袭击，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作为民意党的理论指导者，吉霍米洛夫表示虽然情非得已，今后却仍然有可能采取暗杀手段。然而，宫廷革命的第二场却并没有拉开帷幕。

2月4日，亚历山大·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将自己从前一年12月25日开始撰写的长篇书信汇总后呈给了沙皇。

神明的旨意 本人在1987年的论文中主张将“神明的旨意”理解为“除掉沙皇”（Wada Haruki, “Lev Tikhomirov, His Thought in His Later Years, 1913-1923”,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No.28, 1986, p.14）。对此，研究者列普宁科夫在翻印了吉霍米洛夫的日记后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改变思想立场后的吉霍米洛夫将沙皇视作神明，不可能会有除掉沙皇的想法（Aleksandr Repnikov and Oleg Milevskii, *Due zhizni Lva Tikhomirova*, Moscow, 2011, p.481）。但本人认为这一论断较为浅薄。

来说说结论吧。如今，政府竟成了准备革命的机构，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人民并不希望如此。但政府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感到不满，用尽了一切手段，并且获得了成功。革命往往是自下而上的，而我们所面临的却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前所未有的光景。^[87]

2月11日，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请求上奏的要求终于获得了批准。沙皇很不耐烦地让他“快点儿说，我没有时间”，罗江科则坚持“请陛下务必听完”。他表示国家杜马议员们“对普罗托波波夫这种人居然能担任政府要职极为不满，这种不满也是有道理的”，希望沙皇能够解除普罗托波波夫的职务。但沙皇对此置若罔闻。罗江科感到，¹¹⁸ “不管怎么说，怎么劝，都已经没有用了”^[88]。

罗江科的夫人安娜听闻此事后，写信告知了暗杀拉斯普京事件的核心人物齐娜伊达·尤苏波娃公爵夫人。在这封信的最后，她写下了这样一段决定性的内容：

统治一切的这伙人失去了所有的谨慎，越发地为所欲为。这一点如今已经十分明确。这不是皇后一个人的责任，那个人（指尼古拉）作为俄国的沙皇负有深重的罪孽。我也问了与那件事相关的事情。据说有106名嫌疑人，我们、古契柯夫、尼古拉·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都在其中。听说审问了普利斯科维奇，但他全部给予否认。^[89]

2月14日，刺杀了拉斯普京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在给尼古拉·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的信中写道：“有一些事情必须自上而下发动，如果不做，就会自下而上地爆发。那时将会有太多无辜的人因此而丧生。”如果利用沙皇去最高统帅部的机会，在玛丽亚皇太后的

帮助下，“和帮助她、支持她的人们一起去圣彼得堡，和阿列克谢耶夫、古柯一起逮捕普罗托波波夫和谢格洛维托夫……将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和安娜·维鲁博娃流放到克里米亚——倘若能够采取这些措施，趁着为时不晚，这个国家尚且有救”^[90]。

这个暗杀拉斯普京的主谋，此时仍然顾忌谈到沙皇的责任。而他的岳父亚历山大大公虽然和沙皇的妹妹结了婚，但此前已经向沙皇发去了断交的书信。皇室成员发动的宫廷革命，在第一幕时就已遭遇了挫折。

119

发动军事政变的各种尝试

在皇室成员和上层贵族通过刺杀拉斯普京拉开宫廷革命的序幕之时，另一群人也同时展开了行动。他们试图发动军事政变，通过动员部队的方式迫使沙皇退位并建立新政府。他们认为，利用军队的力量一举转移权力中枢，就像外科手术一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混乱。

对此，第一当事人古契柯夫的回忆录可以算是相对可信的唯一资料。古契柯夫的回忆录于1936年8月至9月在著名的流亡者报纸《最新消息》（*Poslednie novosti*）上连载。^[91]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历史学家唯一的资料源，直到苏联瓦解后的1991年秋天，《历史诸问题》杂志公开了胡佛研究所收藏的古契柯夫采访的原始内容。这是1932年11月到1933年4月，由原俄国外交部的尼古拉·德·巴齐利对古契柯夫进行采访的记录。^[92]报纸上的连载是将采访内容编辑后的版本。关于军事政变的想法，1936年版的回忆录和原始内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不过本书将再次依据原始版本探讨相关内容。

120

亚历山大·伊巴诺布奇·古契柯夫1862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旧礼仪派的商贾之家，家里经营着毛纺织工厂。他从莫斯科帝国大学

毕业后，成为莫斯科市议会议员。古契柯夫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从19世纪末开始辗转于远东、中国西藏、南非、马其顿等颇具争端的地区，对时事有着敏锐的嗅觉。日俄战争时期，他作为俄国红十字会的总代表活跃于中国东北。

古契柯夫在1905年革命时期积极参与和政府的谈判，《十月诏书》颁布后，主导创建了十月党，并成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在斯托雷平执政时期，古契柯夫作为支持政府的执政党领导人，具有重要政治地位。他宣誓效忠沙皇君主制，支持1906年宪法，即立宪专制体制。

在国家杜马审议会上，围绕军队改革及军事问题等专题，古契柯夫与军队内部的改革派进行了谈判。然而，由于在国家杜马中提到了拉斯普京问题，这导致了他与沙皇、皇后的对立。然而即使如此，古契柯夫仍然坚持维护1906年宪法体制。最终，他在莫斯科失势，在1912年的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中落选。但在此后的大战时期，他仍然是保守自由主义派的重要人物，并于1915年东山再起，担任资产阶级组织——军事工业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同年9月被任命为国务会议议员。^[93]

古契柯夫开始筹划军事政变，始于1916年秋有关政治问题的议会高层会议。古契柯夫在9月时，从十月党议员萨维奇那里听说了这次会议。虽然萨维奇拒绝出席，但古契柯夫听说这次会议由米留科夫策划，并且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也会参加，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进步同盟成员、全俄城市联盟官员费奥多罗夫的事务所举办，与会人员包括费奥多罗夫、米留科夫、古契柯夫，以及希德洛夫斯基、申加廖夫、戈德涅夫、弗·尼·李沃夫、涅克拉索夫等国家杜马议员，还有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捷列先科等。^[94]米留科夫在会上提出，现在的形势有可能爆发人民革命，“我们是要打压它，还是支持它？”。政府无法镇压革命，那就只能二选——是选择让政府垮

台，还是选择政府向具有权威的社会势力和以国家杜马为中心的势力要个说法？或者说，是选择1848年方案（参见第1章第7页），还是1905年方案？对于米留科夫提出的上述问题，古契柯夫事后回忆自己当时表明了怎样的想法：

我们是选择被革命浪潮推动呢，还是选择受到最高权力的召唤而行动？我们固然无法拒绝，但是我们知道，要想平息民众的浪潮，只有在主要责任人即沙皇退位这一条件下才能实现。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确，那就是，只有做出陛下退位这一牺牲，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权力的成功诞生提供机会。并且，其中还要有立宪民主党这样具有共和主义心态的成员。然而，谁也不打算触碰政体的问题。因为在每个人的心中，体制就必须是保持君主制。

古契柯夫写到，自己当时查了费奥多罗夫事务所里的《基本法大全》，看到了有关摄政的规定。如果陛下让位给儿子阿列克谢，此后都可以按照法律行事。“大家都非常明确地希望，尽可能不要动摇根基。”

古契柯夫还隐约谈到，一股势力去发动革命而另一股势力去创造新权力，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变革的发动者当然希望站在变革的顶端。然而一旦权力瓦解，就会由街头民众掌握这一权力，这势必带来“权力、俄国及前线战线的崩溃”，而这是必须避免的。^[95]

古契柯夫回忆说，在费奥多罗夫事务所一共开了两次会。之后他由于身体不适在休息时，涅克拉索夫前来拜访，打探他的真实想法。古契柯夫告诉他，自己考虑的是“宫廷革命”（dvortsovaia revoliutsiia）。具体来说，就是发动军事政变，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动用军队力量，强迫沙皇退位，由皇太子继承皇位，并指名由米哈

122

伊尔大公摄政。两人就推进此变革计划达成了一致，后来捷列先科也加入了进来，三人一拍即合。

对于古契柯夫的上述回忆中三人达成统一意见的时间点，负责在采访中提问的巴齐利曾经问道：“到底是9月末，还是10月初呢？”并试图确认“这是在费奥多罗夫事务所最后一次会议的两三天之后吧”^[96]，但古契柯夫都没有回答。估计是10月中旬左右的事情了。

政变的实施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在皇村的大宫殿内迫使沙皇退位，第二种是在最高统帅部迫使其退位，第三种是在从皇村到最高统帅部的火车上迫使其退位。第一种不太可能。第二种方案则需要动员整个最高统帅部，以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为中心发动军事政变。古契柯夫也探讨过这一方案的可行性。最高统帅部的一位参谋军官莱姆凯在1916年2月的日记中写到，古契柯夫给阿列克谢耶夫写信说，自己本想作为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访问最高统帅部，但由于身体状况无法成行，因此将派副主席柯诺瓦洛夫前往。日记中还写道：“我开始觉得，在古契柯夫、柯诺瓦洛夫、克雷莫夫、阿列克谢耶夫这些人之间正在酝酿着一场阴谋……果真如此，这样的阵容只会招致灾难，俄国将无可期待。”^[97]最高统帅部内部还是有些希望的，但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没有一点行动的可能性。在各方面军司令这个层面，只有西南方面军司令布鲁西洛夫对宫廷持批判态度，但他离最高统帅部比较远。

这样，第三种方案入选。在调查了沿线地区的部队，接触了这
123 些部队的军官之后，古契柯夫认为可以调动这些部队作战。在这里，古契柯夫收获了最重要的伙伴——德米特里·乌科夫·列奥尼多布提·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当时，一位难得的伙伴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就是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具体的契机我记不起来了）。在大战中，我和他之所以

私下关系密切，是因为他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卫生部队……的一位全权代表。（他的部队）装备优良，人才辈出。^[98]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父亲是副宫廷事务大臣。他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曾供职于最高法院，担任土耳其斯坦的监察工作，后来在首都附近某县贵族团任团长助理。大战一开始，他参加了红十字部队，在西北方面军的区域活动。^[99]

“他虽然身体上不再是壮年，但品德高尚，视野开阔。”

维亚泽姆斯基认为自己作为公爵家的一员，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由于他的家世，和军中军官们也有来往，可以利用这一点达到目的。

古契柯夫回忆说，自己很快又获得了另一位军官的支持。这非常不容易。“但不管怎么说，地下工作取得了进展。我们需要再往前推进一步。”^[100]

然而世事难料，计划本来已



上：古契柯夫；下：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二人阴谋策划军事政变

经推进到了这个程度，却由于古契柯夫患病而陷入困境。历史学家迪亚金认为，古契柯夫因病曾于1916年10月13日到12月20日期间在基兹洛沃茨克静养。^[101]虽然迪亚金没有举出相关论据，但据《俄国晨报》报道，古契柯夫结束了在克里米亚疗养后于12月19日回到彼得格勒^[102]，所以迪亚金所说的时间应该是正确的。

按理说，古契柯夫不在期间，地下工作也应该照常进行。他回到首都后和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商议时，应该也对地下工作的进展进行过确认。但是，古契柯夫的回忆里完全没有提到的一点是，根据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身边亲人的证言，公爵于1916年年末在战场作战时胸部受伤，随后入院治疗。公爵姐姐里佳的丈夫伊拉里奥维尔西利奇科夫回忆说，在二月革命爆发时，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枪伤仍未痊愈，一直和家人待在首都的家中。^[103]正因如此，古契柯夫的地下工作在1917年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

当古契柯夫和维亚泽姆斯基的地下工作一筹莫展时，基辅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捷列先科却十分活跃。古契柯夫回忆说：“捷列先科的活动不受约束。他有一支他母亲组建的近卫军部队，他也有去那儿的义务，所以和军官们都认识，可以逐步开展选人工作。”^[104]

事实上，当时也有一些军人抱有军事政变的想法，克雷莫夫少将就是其中一员。他于1917年1月来到首都彼得格勒，拜会了国家杜马相关人士，阐述了发动军事政变的想法。亚历山大·米哈伊尔诺维奇·克雷莫夫生于1871年，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开始担任公职

在二月革命爆发时，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2月28日，正值二月革命的高潮时期，维亚泽姆斯基应古契柯夫的同行请求，乘车来到市内，却不幸身中流弹，翌日去世（I.S. Vasil'chikov, *To, chto mne vspomnilo*, Moscow, 2002, pp. 124-125）。参见第9章429页。

人员，1892年从尼古拉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毕业后，在该校短期执教。他的学生中就有后来在克伦斯基首相手下担任陆军部长的维尔霍夫斯基。^[105] 克雷莫夫曾作为西伯利亚第4军参谋部的特聘军官参加过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结束时，他在西伯利亚看到退伍军人叛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认为“必须在战争中完善机制。一旦复员，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了”。克雷莫夫担任上校后，从1909年开始在总参谋部工作了三年，官至总参谋长。1911年，担任外贝加尔哥萨克团¹²⁵的团长，1913年开始，代理萨姆索诺夫的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职务。在代理该职务期间，部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萨姆索诺夫率领的第2军几近覆没，但他幸存了下来，后升任少将。1915年，克雷莫夫成为乌苏里骑兵旅旅长。1916年，他率领的部队被全部整编进西南方面军。^[106]

克雷莫夫经过百般权衡，来到首都，多方阐述军事政变的必要性。为此，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将实力派国家杜马议员及相关国防机构的人员请到自己家，听取克雷莫夫的想法。克雷莫夫明确指出，俄国不可能在“一战”中取得最终胜利。他表示自己非常理解当年日俄战争中深感绝望的军人们的心情。“坦白讲，妨碍战争的是不愿战争发生的后方民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最初的成功也会化为泡沫。”

军队里，现在人人都乐于听到变革的消息。变革势在必行，前方战士也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如果各位决定采取非常手段，我们都会支持。很明显，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我想在座各位以及很多相关人士此前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是，皇后对沙皇的恶劣影响远超有识之士的诚恳谏言。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对此，立宪民主党议员申加廖夫表示：“将军所言极是。变革十



捷列先科（左）和克雷莫夫。两人于1917年3月初策划了政变

分必要。但是谁能来做这个呢？”十月党议员希德洛夫斯基也赞同：“原谅或者怜悯那个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正在使俄国走向灭亡。”^[126]但反应最强烈的当属捷列先科。对此，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显得非常不安：“对于沙皇退位后该怎么办，您并没有考虑。希望大家不要再在我家里谈论这件事了。如果军队能让沙皇退位，我希望由将军们来完成这件事。我本人直到最后一秒钟，都不打算诉诸暴力，我还是希望通过劝说采取行动。”^[127]

捷列先科回忆，克雷莫夫“多次来到首都彼得格勒，历陈军事政变的必要性。他是我国数一数二的骑兵将领，对军事了如指掌，发言很有权威性”^[128]。该团属下的尼布楚哥萨克第1团团团长弗兰格尔也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克雷莫夫与部下们商量军事政变的情景，指出他的目标就是打倒沙皇。^[129]

尽管国家杜马的议员们在听了克雷莫夫的提议后并没有采取行动，但捷列先科决定与克雷莫夫合作。由于古契柯夫的地下工作停滞不前，此时的捷列先科忧心如焚。古契柯夫回忆说，自己当时并没有把克雷莫夫纳入自己的计划里^[130]，所以可以认为，捷列先科的决定应该只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

然而，在捷列先科的支持下，以克雷莫夫为核心的军事政变计划日趋成形，并决定在1917年3月初实施^{*}。^[111]此时，克雷莫夫已决定进京。很明显，古契柯夫之前设想的军事政变第二方案已不再可行。

根据维尔霍夫斯基的证言，二月革命后担任陆军部长的古契柯夫对他的新部下这样说道：

我一直想在不发动民众的前提下实现政变。当时设想的是，在三月一日发动一场内部的宫廷政变，由一拨踏实稳健的人（这时，邻座的人悄悄地在我耳边说：“领头的是克雷莫夫、古契柯夫，还有捷列先科。”）聚集在彼得格勒，待沙皇乘坐的列车进入皇村到首都这一段时，进入车内逮捕沙皇，并立即把他送到国外。^[112]

127

这段发言到底是为了证明古契柯夫的确推动了军事政变，还是在为军事政变派发声，对此尚无定论。

此外，也有其他人在谋划军事政变。全俄地方自治会联盟主席——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就是其中之一。

李沃夫生于1861年，比古契柯夫年长一岁，是名门贵族的后裔。他在图拉州的领地内出生，在莫斯科读完中学后，进入莫斯科大学，

3月初实施 斯皮里多维奇在书中提及，根据随行在玛丽亚皇太后身边的多尔戈鲁基公爵的证言，捷列先科说会在2月8日采取行动逼迫沙皇退位，然后就离开了基辅。但是几天后，他回来宣布计划失败了（A. I. Spiridovich, *Velikaia voina 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4-1917gg.*, Vol. III, New York, Moscow, 2004, p.477）。这个描述不甚可信。



全俄地方自治会联盟主席李沃夫公爵，也在期待发生军事政变

毕业后在图拉州从事领地的经营管理，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地方自治委员会工作，1900年担任图拉州地方自治机构委员会主席一职。日俄战争期间，李沃夫作为俄国地方自治会联盟救护团体的总代表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他作为地方自治会联盟自由党派的代表积极参与活动，国家杜马成立后，又代表立宪民主党参加选举，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战争期间他作为全俄地方自治会联盟的领导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首相

人选，李沃夫的名字屡屡登上进步同盟拟就的信任内阁名单。^{〔113〕}

1916年12月9日，全俄地方自治会联盟会议被禁止召开。李沃夫坚决抵制警察发布的举办大会禁令，并在集会上通过了一份非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政府被黑暗势力握在手里，俄国正在走向灭亡，沙皇的宝座摇摇欲坠。在这个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们必须对民众及民众代表负责，建立起一个符合大国国民愿望的、强有力的政府。”李沃夫在最后高呼“请相信我们必胜！”，将与会代表的情绪推向巅峰。^{〔114〕}

128 是夜，李沃夫的家中迎来了柯西金、费奥多罗夫、哈提索夫等人。柯西金医生是莫斯科市议会议员，也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费奥多罗夫在之前已经提到，他是进步同盟成员，在城市联盟担任要职。哈提索夫则是亚美尼亚人，担任第比利斯市长，并与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关系密切。李沃夫

向他们几人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废黜沙皇；将皇后幽禁或逐出国境；拥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沙皇，由他提议组建信任内阁；举荐自己担任首相。大家都表示赞成这个提议，决定在哈提索夫返回第比利斯后，由他说服尼古拉大公。

1917年新年之际，哈提索夫去军区司令尼古拉大公的府邸拜年，并向尼古拉大公介绍了李沃夫的提议。大公听得非常仔细，但并未发表意见，只说让他明天再来一趟。翌日，哈提索夫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大公及大公夫人安娜斯塔西亚、大公的参谋长亚努希科维奇已经在候着他了。哈提索夫再一次介绍了李沃夫的提议。对此，喜欢冒险的大公夫人“表现出了一定兴趣”，亚努希科维奇没有表示赞成还是反对，仅仅表示了怀疑，而尼古拉大公是否表示了意见则未有提及。古契柯夫评论说，“这个提议就此不了了之”，“他们选错了人，提出的方案也不合适”^[115]。

后来，斯皮里多维奇于1930年12月10日在巴黎见到了哈提索夫，他也记下了这一段内容，和古契柯夫的话基本一致。唯一的区别是，在斯皮里多维奇的描述中，尼古拉大公在第二次会面中回答说：“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参加这个计划。”^[116]这个过程与梅里古诺夫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117]

李沃夫的提案是让前任俄军最高总司令发动军事政变，而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还是皇室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这相当于同时劝说他发动宫廷革命。这是借他人之力成自己之事，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李沃夫的设想仅仅是一个小插曲，并没有溅起太大水花就烟消云散了。

其实，当时还存在一种动向，可以称作第三种政变方案，只不过之前没有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这个方案是在国防特别审议会的内部逐渐产生的。如前所述，国防特别审议会是在1915年改造时设置的机构，其代表来自国家杜马、国务会议、陆军部、海军部、财

129

政部、国家监察部、工商部、交通部、全俄城市联盟、全俄地方自治会联盟、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再加上其他人士，每月召开会议八次左右，进行相关事务的协调商定等工作。国防特别审议会在1916年11月共召开了六次会议，分别在2日、5日、9日、12日、23日、30日；12月召开了八次，分别是3日、7日、10日、14日、17日、21日、28日、31日；1917年1月召开了八次，分别是4日、7日、11日、14日、18日、21日、26日、28日。固定出席该会议的人员包括罗江科、萨维奇、恩格勒格特、阿杰莫夫（以上来自国家杜马），苏契新斯基、古柯（以上来自国务会议），马尼科夫斯基（来自陆军部），格鲁斯（来自海军部），涅克拉索夫（来自城市联盟），古契柯夫、柯诺瓦洛夫（以上来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可以说，国防特别审议会会聚了极其重要的人物，是推进战争的指导性机构。^{〔118〕}

此前笔者在第一章（第61页）已经提到，1916年年末，以古柯、恩格勒格特为首的28人提交了关于兵源枯竭的意见书，国防特别审议会的议事录上对此却没有记载，说明当时这还仅仅是一部分有识之士的行为。但进入1917年以后，可以看出国防特别审议会的全体成员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危机意识。在1月7日的会议上，俄陆军部中央炮兵局局长马尼科夫斯基上将指出，与火炮相关的弹药兵器制造厂面临燃料危机，可能出现产量的大幅缩减。负责钢铁材料供给的全权代表穆易希拉夫斯基上将也发言称，整个钢铁业都面临着同样的危机。^{〔119〕}

1月28日的会议上，交通部管理局局长鲍戈晓夫抱怨称，交通部和煤炭界关系不佳，部分铁路在1月20日就已经陷入煤炭储存枯竭的危机状态。中央炮兵局局长马尼科夫斯基指出，官营的国防产业工厂中现在也有一部分不得不停产，“这一危机很可能使得炮弹生产量显著减少”。虽然中央炮兵局竭尽全力采取对策，但钢铁业已经处在危机状态。对此，古契柯夫认为，“造成现在铁路运输状况不佳

的根本原因，与政府相关部门有很大关系。他们缺乏先见之明，这是非常有问题的”，他主张追究政府责任，抨击他们在当前这一困难时期对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体成员进行逮捕一事。国家杜马议员、国权派的库鲁潘斯基提议，为了打破僵局，特别审议会的所有联席会议都应争取让沙皇出席。对此，古契柯夫立即表示支持。^[120]

库鲁潘斯基的提议在接下来的2月1日的会议上，获得了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的支持，并展开了进一步讨论。但陆军大臣勃列艾夫表示不能轻易赞成这一提议，所以未能当场就提议做出决定。^[121]

在2月4日的会议上，古契柯夫发表演说，称现在俄国的粮食、燃料、原料等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匮乏，而沙皇对此毫不知情，因此自己支持库鲁潘斯基的提议，即在沙皇出席的情况下召开联席会议。斯塔霍维奇表示支持，而陆军大臣勃列艾夫则表示反对。会议进行了投票，该提案以18票赞成的结果获得了通过。其中罗江科、古契柯夫、古柯、申加廖夫、恩格勒格特、库鲁潘斯基、恰鲁努克夫、涅克拉索夫、柯诺瓦洛夫等人投了赞成票，谢格洛维托夫等9人投了反对票，马尼科夫斯基等5人则持保留意见。^[122] 上述投赞成票的18人，除了罗江科之外，都在递送给沙皇的信上签署了名字。^[123]

据二月革命后质询恩格勒格特的听证会，在要求沙皇出席会议的背后，其实潜藏着军事政变的图谋。马尼科夫斯基曾多次表示如果不在后方建立独裁政权，就无法应对国家性危机，为此有必要以行动支持。恩格勒格特称自己作为军人，处于这一行动的核心。表面上是提议沙皇出席特别联席会议，背后的意图则是借此机会胁迫沙皇同意由马尼科夫斯基进行独裁统治，或者采取某种方式拘禁沙皇，以求打破危机局面。^[124]

然而，这一方案也只停留在极其不确定的层面，同样未能付诸实施。

131 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路线的出现

到了这样的时刻，开始出现了与民众运动相联系，谋求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人士和路线，这就是“第三条道路”。这场革命的中坚力量是涅克拉索夫、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他们三人是1912年创立的共济会组织的中心人物。米留科夫指出，这三个人再加上捷列先科，组成了一个“四人团”。米留科夫去世后，他的回忆录于1955年得以公开出版，其中有如下记述：

这四个人无论性格、经历、政治作用等各方面都非常不同，但他们不仅仅是因为都持有激进的政见而团结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们在政治上、道义上也存在某种个体间的亲近。他们基于相互的义务团结在一起，而这种相互义务宛如出自同一源泉。^[125]



谋求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路线的克伦斯基（左）和柯诺瓦洛夫（右）

这段话被学者解读为米留科夫在暗示上述四人是共济会结社时的元老，也有观点认为这段话就是其字面意思，即他们四个人组成了小集团。但是，1998年公开的一份资料中有着重要的证言。在1939年对涅克拉索夫进行审判的资料中，记载了涅克拉索夫1939年7月13日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官说的内容。

132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届临时政府中有三位共济会成员，即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柯诺瓦洛夫。”^[126]

俄罗斯共济会组织“俄国人民大东方”成立于1912年，涅克拉索夫担任首届最高会议主席，1916年克伦斯基继任主席，而柯诺瓦洛夫自始至终都是该最高会议的成员。^[127]有推测认为捷列先科可能也是成员之一，但尚无确凿的相关证言。因此本部分的论述以前述三人为核心，并适当加入捷列先科的内容。

此前曾提到（第1章第21页），关于该团体的政治目的，涅克拉索夫在供述中称是“为了祖国的解放以及巩固解放而斗争”，克伦斯基则表示其目的在于“建立基于广泛社会革命及联邦国家制基础上的民主主义”。

之所以成立该秘密组织，一般认为是为了超越传统的俄国自由主义和以立宪民主党的米留科夫为代表的对开展革命持否定态度的合法主义，通过与工人运动、革新派、民主势力的联合，探索推翻专制政府的群众革命道路。变革的目标不仅要使沙皇退位从而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且要废除专制，建立共和制。

三人组合中的第一号人物是尼古拉·维萨里奥诺维奇·涅克拉索夫。他1879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神甫家庭，1902年从高等交通工程学校毕业后，由于成绩出色，直接被招聘至托木斯克工业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并派往德国留学两年。在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俄国革命党和自由派，参加了解放同盟。1905年革命之际，他回国参加了托木斯克工业技术高专的校内运动，1906年成为桥梁建设讲

座的教授。之后因其妻子生病疗养，他在雅尔塔逗留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他作为塔夫利省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参加了1906年4月的第三次立宪民主党大会。此后，涅克拉索夫作为政坛新星迅速崛起，1907年成为托木斯克地区选出的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同年当选为立宪民党中央委员。^[128]

1908年，涅克拉索夫加入了法国的共济会。在这里，他深刻认识到共济会这种形式的组织的有效性，并试图将其应用于俄国的改革。1912年，他在俄国创建了独立的相关组织。也是在同一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并在议员中发展了共济会组织的成员。

“一战”开战后，涅克拉索夫主张与政府斗争，这与主张举国一致的米留科夫产生了矛盾。因此，他奔赴前线参加了城市联合救护队。由于与米留科夫隔阂加深，涅克拉索夫离开了立宪民主党的议员团，致力于院外团体的活动。但是在政治上，他仍然属于立宪民主党左派。

三人组合的第二号人物是亚历山大·伊瓦诺维奇·柯诺瓦洛夫。他1875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州，是当地最大的棉业家族的大少爷。从莫斯科的中学毕业后，他升入莫斯科大学的物理数学系，后来又在德国米尔豪森的纺织产业学校学习。19世纪末期，他继承了家族产业。作为一位开明的企业家，他重视提升工人的福利待遇。1905年，他担任了科斯特罗马州工商委员会主席，1908年成为莫斯科交易所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当上了莫斯科市议员。柯诺瓦洛夫在政治方面也非常积极，1905年加入稳健进步同盟，1906年加入和平革新党，1911年加入进步同盟。1912年他首次成为莫斯科选区选出的国家杜马议员。他与莫斯科的棉业大亨保罗·里亚布申斯基既是盟友，也是同志。柯诺瓦洛夫在行动时的身份是进步同盟成员。^[129]

三人组合的第三号人物是克伦斯基。他出生于1881年，父亲是辛比尔斯克中学的校长，曾在列宁中学毕业时为后者颁发过金牌。克伦

斯基在父亲新上任的工作地点塔什干完成中学学业之后，1899年升入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的历史文学系，后又转入法学系，1904年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1905年，他的学长——人权辩护律师索科洛夫委托他担任政治审判的辩护工作。以此为契机，克伦斯基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克伦斯基在政治立场上偏向社会革命党，但他也替其他党派政治人物的诉讼担任辩护，由此声名大噪。1912年，他被举荐参加国家杜马议员选举并胜出，成为劳动派的议员。之后他被共济会看中并加入其中。¹³⁴但究竟是受涅克拉索夫之邀还是受索科洛夫之邀，还有待考证。^{130]}

关于这三个人什么时候彼此结交并开始合作，目前没有任何记载。一般认为，国家杜马议员的活动与共济会的活动有联系，所以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在1915年的政治危机之际，涅克拉索夫和柯诺瓦洛夫都属于进步同盟成员。进步同盟要求组建信任内阁，却遭到了沙皇的拒绝（参见第一章第65页）。8月28日，柯诺瓦洛夫在莫斯科的恰鲁努克夫宅邸举行的集会上说，“社会活动家要求大臣们自己把自己换掉，这种做法当然是错误的，必然走进死胡同”，认为有必要采取新的策略。他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意识到“底层人民的心情已经接近于绝望”，“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心理，那就是认为暴力和过激行为是唯一的可行之道。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种对策，以防出现这种局面”。柯诺瓦洛夫和叶夫列莫夫提议，如果国家杜马遭到解散，那就诉之于民，拒绝解散并坚持召开会议。^{131]}

虽然这一提案没有被进步同盟的主流成员所采纳，但在这一时期，柯诺瓦洛夫等人尚没有放弃进步同盟的想法。而且，以恰鲁努克夫为代表的莫斯科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受到几起事件（9月4日来自31家企业17794人的大罢工和市内公共交通大罢工，以及9月14日发生在警察和民众之间的街头流血冲突）的影响，主张采取稳健的策略。^{132]}9月上旬召开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联盟驳回了激进派的主

张，决定派出请愿团，向沙皇请求重启国家杜马及组建信任内阁。

这一时期，柯诺瓦洛夫正在积极推进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成立，并成为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7月到11月间，他一直在努力促成让工人代表也能加入军事工业委员会。

克伦斯基没有加入进步同盟，没有牵扯进夏天发生的政治危机中，但他也有自己的行动。7月16、17日两天，他在自己宅邸召集了来自全国的民粹组织代表。这次会议以结束战争为最终目标，但是同时也指出：目前主要任务是保家卫国；沙俄政府无论是在保证军队补给还是在防止经济崩溃方面都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应该通过普选成立新政府；当前需要将国家杜马的讲台用于宣传和组织活动。上述决议十分接近“工人团”组织领导人格沃兹杰夫等人的想法，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克伦斯基实际参与了柯诺瓦洛夫的行动，因为柯诺瓦洛夫正是想要按照这样的想法来组织民主党派。

据说，在这次会议上也有如下提议，那就是要在工人中传播国家变革的思想，一旦时机成熟，就能以调查劳资纠纷为名，在工厂内建立像1905年革命时工人苏维埃那样的中心组织。^[133]众所周知，“工人团”这个组织中有社会革命党，显然，克伦斯基从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1916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联盟大会上，新的激进主义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路线开始公开登场。大会提出了实行责任内阁制的要求。也是在这个时候，涅克拉索夫和柯诺瓦洛夫首次公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3月大会召开期间，涅克拉索夫在莫斯科的布拉格酒店向参加宴会的80名地方自治和城市联盟相关人士发表了演说。他说，米留科夫认为无法建立责任内阁，但有机会建立信任内阁。对于这种消极的态度，涅克拉索夫给予了反驳。

毋庸置疑，如果压力没有完全成为现实性的威胁，无论是责任内阁还是信任内阁，都不可能建立。我们能获得的，只能是一个施蒂默尔或赫沃斯托夫之流牵头的新内阁。因此，和政府进行你来我往的博弈毫无意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明确地提出我们的要求。既然提出了要求，我们就不能守株待兔，被动等待政府回应，而要尽全力组建一个组织，让政府必须接受我们的要求。

关于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涅克拉索夫在大会的分论坛上进行了阐述。现在，地方自治机构和城市自治机构已经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盟，工业界也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但是商界还没有相应的组织。工人阶级在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庇护下，刚刚踏出了第一步。合作社还只是小小的基层组织。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成员涵盖工人、合作社、商界的全俄联合组织。 136

涅克拉索夫说：“如果能建立这样一个全俄联合组织的话，所有的团体……都要选出代表进入组织的最高机构。这个最高机构统合整体行动的方向，可以说是全俄社会势力的总的最高统帅部。”（134）

柯诺瓦洛夫也在全俄地方自治会联盟大会上，作为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代表发表了演讲。

虽然我们对俄国的各方社会势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如今社会团体的活动，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取得事业胜利的广泛规模，在这一点上我们深感遗憾。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今手握权力、位居高位的那些人，其实并不能够激发起国内民众高昂的热情。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给国家带来的是破坏、内乱与纠纷，使国家混乱不堪、国力衰微。他们是妨碍民众在最大程度上发

挥力量的绊脚石。

在演讲的最后，柯诺瓦洛夫指出，只有对国家负责的政府，才能让祖国脱离困境，才能通过重建国家内部实现对外成功御敌，对内确保后方秩序。^[135]柯诺瓦洛夫接下来又在城市联合大会上，代表军事工业委员会发表了讲话。

“政府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将国家推向毁灭的深渊。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团结起来。这不仅是为了战胜外敌，更是为了打败人民的所有敌人，使国家重获新生。我们必须并肩战斗、步调一致，建立起井然有序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规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还动员大家说：“在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旗帜下，工人组织正在重新活跃起来。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工人大会上，必将诞生全俄工人阶级联合组织。它将以各地区的基层组织为起点，发展为像工人苏维埃一般的最高机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组织。”^[136]

显然，涅克拉索夫和柯诺瓦洛夫有着同样的主张。这些主张也获得了其他人的支持。原莫斯科大学校长马努伊洛夫、普罗柯波维奇以及劳动派工会活动家柴可夫斯基等人也赞同这种设想，他们还提出建立全俄农民联盟。^[137]但是，沙皇政府当然不会允许建立社会团体的联合组织。

就这样，危机不断深化。1916年9月，柯诺瓦洛夫访问莫斯科。他向资本家和企业家们发出警示，提醒他们革命运动是不可避免的。出于爱国之心和对战争目的的清晰认识，工人阶级此时尚能抑制自己的行动，但是在农民群众中，已经存在着“彻底的无政府迹象”。他说：“一旦讲和，第二天就会爆发内战，国内将会血流成河。这场内战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自发性和无计划性，在无任何人的指导下盲目前进。这就是无政府状态，是民众起义，是痛苦不堪的民众的可怕爆发。如今，俄国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在那

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形势将会进一步恶化。一旦革命爆发，惊慌失措的政府最终会将整个俄国的未来交由命运决定。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意识到战后我们必将面临的问题，就必须考虑该如何拯救，思考怎样才能避免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可怕后果。拯救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我们自己要组织起来，另一个是要将工人联合起来。”^{〔138〕}

10月上旬，柯诺瓦洛夫又邀请相关人士到自己莫斯科的宅邸，向他们阐述自己的主张，主题是“争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阶层民主派”的必要性。他批判首都立宪民主党主流派的“消极性、教条性和守旧性”，尤其批判他们“遭到民主派的疏远，以及对民主派的恐惧”，主张在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党、劳动派之间搭起“桥梁”，推动三党共同合作。普罗柯波维奇与库斯科巴等经济派代表人物，人权律师穆拉维约夫、尼基京等人也都积极参加了这次集会。除了穆拉维约夫之外，其他人都是共济会的成员。柯诺瓦洛夫还指出，现在农业大臣由博布林斯基担任，内务大臣由普罗托波波夫担任，民众对这样的任命极为不满，认为这是让贵族地主和大资本家为所欲为的表现，从而决定性地民众推到了反政府的、革命性的立场。柯诺瓦洛夫最后对沙皇政府进行了总结。他说：“如今，莫斯科社会的变革情绪已经远比1905、1906年的时候高涨。在这里，以前帝政派的势头已荡然无存，反对沙皇王朝的势力正蓄势待发。”¹³⁸

柯诺瓦洛夫主张：“国家杜马重启之日，应当是我们对权力和官僚发动决定性的最后总攻之时。”^{〔139〕}

8月到9月末，克伦斯基巡访了中亚及土耳其斯坦，了解当地的叛乱情况，于10月1日回到首都。10月9日，克伦斯基出席了在议员齐赫泽家中召开的集会，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参加这次集会的有民粹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13名知识分子和1名工人，其中包括律师索科洛夫和佩舍霍诺夫。集会围绕“中央权力呈现出的无条件的

放任状态”及“国家杜马中进步同盟的完全破产”这两个中心话题，批判了立宪民主党和国家杜马的软弱无力，认为有必要联合自由主义左派和民主各派，建立“左翼同盟”。“为了能在最合适的时机实现国家的政治解放，决定为建立‘左翼同盟’而努力。”^[140] 克伦斯基与共济会成员及索科洛夫一起，准备为民主党派造势。

当然，11月1日重启的国家杜马并没能对政府发起总攻。应该说，正是从国家杜马重启的这个时候开始，涅克拉索夫、柯诺瓦洛夫和克伦斯基的三人组合才不得不终于下定决心，动员工人，为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进行准备。他们所依靠的，便是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团”^{*}。

随着11月国家杜马的重启，“工人团”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11月2日，“工人团”在与劳动派及孟什维克党派议员举行会谈后，

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团” 关于该组织展开的新的活动，笔者在1968年的论文中首次提及，此后苏联的丘秋金在1972年也有所论述，但他仅简单指出“工人团”的活动是他们“为了挽救自身日趋危险的处境而做出的最后尝试”，这一评价较为消极（S. V. Tiutinkin, *Voina, mir, revoliutsiia, Ideinaiia bor'ba v rabochem dvizhenii Rossii 1914-1917 gg.*, Moscow, 1972, pp.223-225）。1975年，斯洛尼姆斯基将“工人团”的左翼活动与柯诺瓦洛夫联系在一起加以解释，较丘秋金而言更加触及了其本质（A. G. Slonimskii, *Katastrofa russkogo liberalizma: Progressivnyi blok nakanune i vo vremia Fevral'skoi revoliutsii 1917 goda*, Dushanbe, 1975, pp.155-163），但这一认识仍然有其局限性，即认为“工人团”的意图在于将工人运动纳入自由主义-进步同盟的范畴。在这一点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学家库利科夫2012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将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与“工人团”的活动看作二月革命的“开端”。但另一方面，他将古契柯夫视作活动的中心人物，未能将“军事政变”路线与“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路线加以区别，导致表述较为混乱（S. V. Kulikov, “Tsentral'nyi Voenno-promyshlennnyi komitete nakanune i v khod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1917 goda,”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2012, No.1, pp.69, 90. “开端”见p.79）。

通过了要求建立“救国政府”的决议，并将这一决议的结果与米留科夫等人批判政府的演讲内容（被政府禁止发表）一起，向工人们广泛传播。11月14日，“工人团”决定在各个工厂召开支持国家杜马的工人集会。据“工人团”公报的第5期报告记载，虽然集会的规模尚不明确，但在普契洛夫兵工厂、彼得格勒金属制造厂、炮弹厂、奥布霍夫工厂、新兵工厂、爱立信工厂、圣加利尔工厂、帕尔维艾宁工厂及其他工厂都召开了工人集会，并通过了根据“工人团”11月2日决议内容所制定的决议。^[141]“工人团”还在彼得格勒金属制造厂等根据地开始建立工人团支援委员会。^[142]在位于利特尼大道47号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本部，他们也多次召开工人集会。据经常出入这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犹太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正式名称为“犹太人驻立陶宛、波兰、俄国工人总同盟”）的成员拉菲斯回忆，有时来参加集会的工人多达500人。^[143] 139

这一时期，由古德科夫担任会长的彼得格勒消费合作社正在准备发行新杂志《劳动》，编辑由伊·格·沃尔科夫、卡佩林斯基及埃尔曼斯基担任，其中埃尔曼斯基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总编。一般认为该杂志是向工人进行广泛宣传的重要方式，对此埃尔曼斯基并未说明。^[144]

涅克拉索夫于1916年11月6日当选为国家杜马副主席。这样一来，克伦斯基的发言便自由了许多，他开始在国家杜马的讲坛上大谈“革命”。12月13日，克伦斯基在国家杜马进行了如下演说： 140

诸位，也许在此之前，“革命”一词让大家联想到的是某种反国家的、破坏国家的行为，然而，世界历史却向我们证明，革命是拯救国家的唯一手段。如今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我们要和这个使国家濒临灭亡的无能政府进行斗争……我们决不会（向旧政府）做出任何妥协。

克伦斯基还称，那些想要通过合法手段与当前权力进行斗争的人，就像和风车战斗的堂吉珂德一样。^[145]

克伦斯基在院外活动中也在不断地宣扬革命。同年12月，他在莫斯科向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派人士发表演讲。“我们现在正置身于革命之中。我能够全身心地感受到这一点。政变能够取得成功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国家已经无法阻挡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推进。”^[146]

12月13—15日期间，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在彼得格勒召开。参会的工人代表又单独举行了一次会议，参会人员包括：来自彼得格勒的代表15人，来自莫斯科的代表3人，来自基辅、乌法、彼尔姆、叶卡捷琳堡、萨马拉、阿尔马维尔、喀山、鄂木斯克、察里津的代表各1人，来自巴库的代表2人，社会民主工党的右派议员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两项重要决议。

第一项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坚决反对战争，并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战争发生”，同时对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团”的立场进行了说明，即当面临“被他国兼并的危险”时，“工人团”认为，“国家防卫”是“在民主派所能接受的条件下结束战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此基础上，既然德奥已经提议开展¹⁴¹ 和平谈判，就应尽快开始谈判，创造有利于和平的条件。

面对国家灭亡的危机，无产阶级在完成自身的国际使命时，一方面要与资产阶级的征服观念做斗争，另一方面还要致力于废除导致国家灭亡的政治体制，这是非常必要但又极为复杂的。

会议主张，基于这一点，在为和平而战之前，必须先进行“与（现）政治体制之间无可避免的斗争”。“（现）政治体制是在官僚贵族的统治下建立起来的。它和人民进行着无情的斗争，在战争中不

仅未能进行基础防御，还导致国家走向灭亡。”“如今的政治体制是在国际民主派所能接受的条件下进行战争清算的最大障碍”，“并且今后可能一直持续”。决议给出的最终结论是：“世界大战向国际无产阶级提出了许多待解决的课题。只有国家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实现自上而下的彻底的民主化，才是俄国工人阶级解决课题及发挥影响力的不可或缺的前提。”^[147] 决议呼吁人们为了实现和平，要积极推进革命，打倒专制体制，决定性地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二项决议有关政治课题，也是第一条决议的延续。“彻底废除旧体制以及国家彻底的民主化——这是现阶段俄国工人无产阶级应该提出并直面的课题，而不是所谓同‘黑暗势力’做斗争这种胆小模糊的表达。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不会放弃11年前为了谋求俄国的完全解放所提出的口号。但同时，我们认为，当前刻不容缓的课题是彻底废除现有体制，逐步建立一个独立的、取信于自由人民的临时政府。”

决议具体指出，“国家首先应该成立一个能够考虑人民实际利益、听取民主意见的权力机构”，这就要求俄国的全体工人阶级、城乡所有民主派别都加入进来。国家杜马必须对皇室权力采取坚决否定的政策，放弃模棱两可的态度。决议明确表示，国家杜马面临两种选择：“是响应现阶段业已成熟的要求，成为人民运动的中心，还是让人民无视国家杜马的存在，自行踏上解放之路？”^[148] 142

在实际行动方面，“工人团”动员首都的工人组织召开了集会。最先响应的是社会民主工党右派活动家所主导的一些合法团体，以及消费合作社、疾病互助基金会的相关人士。据悉，合作社的切列万宁、伊·格·沃尔科夫、卡佩林斯基等人也出席了集会。这些集会开始都谎称为“委员会”，后来改称“工人中心”^[149]。

12月19日，在拉斯普京遭到暗杀的三天以后，集会讨论了在国家杜马重启的这一天（即1月12日）进行总罢工的方案。^[150] 但是

因为国家杜马重启延期到了2月14日，这个方案的讨论也就中止了。于是，“工人团”决定执行替代方案：首次参加1月9日的统一行动。在1917年1月9日的纪念“流血星期日”大罢工活动中，之前从未参加过此类活动的工厂也参与进来，罢工人数从原来的7万人倍增到14万人。毫无疑问，“工人团”的新方针从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初次参加活动的人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1·9罢工并没有对公众运动产生丝毫作用”。因此，他们决定，“与其向国家杜马主席派遣代表团，不如采用更契合工人阶级心理的形式，同时也要考虑到非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的心理”，呼吁工人阶级采取决定性的行动。^[151]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方针，即号召工人在2月14日国家杜马重启当天，在召开国家杜马的塔夫利宫外举行游行示威。

国家杜马办公厅主任科马宁的报告，可以说是对危机时期国家杜马及政府的历时性观察记录。1916年年末，这份资料记载了立宪民主党的议员马克拉科夫在莫斯科的演讲内容，以及柯诺瓦洛夫一派对此的反对意见。针对拉斯普京被暗杀后的时局，马克拉科夫在莫斯科做了如下演讲：

143

毫无疑问，现在民众认为，俄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最恐怖的革命。然而这并不是革命，而是破裂的局势。民众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观正在逐渐瓦解。从前，沙皇权力的正当性在于他的权力是神赋予的，现在民众对这一观念的信任正在逐渐消失。究其本质，制造出这场悲剧革命的不是一部分具有恶意的革命家，而是失去了理智、受某种命运操控的“权力”。……1905年，虽然那时的主要问题也是废除专制体制，但那时沙皇的权力依然不可动摇、高高在上。如今，这种权威、观念和数个世纪以来民众的世界观都在坍塌。而这一切都是皇室咎由自取。^[152]

听了这场演讲的莫斯科的听众当中，有一部分人参加了在柯诺瓦洛夫宅邸召开的会议，他们认为这个悲剧有明确的解决途径。

在柯诺瓦洛夫宅邸举办的会议上，立宪民主党、进步同盟和劳动派成员都有出席。其中除了国家杜马议员外，主要是彼得格勒的社会活动家。会议的整体基调是战斗性的，对政府决不妥协。在这场会议上，立宪民主党的立场偏右，认为无论是一部分民众对国家杜马职能持有的轻蔑态度，还是立即开展积极的反政府斗争的主张，都是欠考虑的。用马克拉科夫的话说，持有后者想法的正是进步同盟。进步同盟的领导人叶夫列莫夫、柯诺瓦洛夫、鲁杰夫斯基则明确表示，在现今的条件下，“无论如何都要守住国家杜马，意味着将（保护国家杜马）这个观念本身置于危险之中”。尽管戈利岑内阁是由沙皇任命的，但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实质上，都不能与之有任何关系。国家杜马将于2月14日重启，届时必须立刻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如果政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就不重启国家杜马进行审议。进步同盟¹⁴⁴认为，这种战术能够争取到俄国广大社会阶层的舆论支持。即使国家杜马遭到解散，民众也不会谴责议员，反而会相当支持。在民众看来，与其让一个软弱无力的国家杜马成为政府愚弄的对象，还不如干脆没有国家杜马。如果没有国家杜马，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问题可以更加凸显出来。现如今，我们反而看不清政府是如何挑拨的。——以上是柯诺瓦洛夫在会议上展开的一个命题。^[153]

12月30日，在里亚布申斯基公馆召开的会议上，莫斯科市议会成员及产业界大亨们齐聚一堂。他们首先对交易所委员会主席人选进行了讨论，之后开始探讨时局问题。对此，首都安保部门高官的

汇报如下：

市议会议员切斯兰考用热烈的语气说，现在正处于“公开对决的前夜”。他指出，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反政府派，正如社会团体的决议中所见的那样，为了与“将国家引向战败的权力做斗争，所采取的所有合法手段”都已经用尽。切斯兰考认为，现在已经迎来了“与彼得格勒和皇村进行对抗”这一积极行动的时机。在讨论戈利岑内阁可能采取的行动时，所有会议都通过了内容相同的决议：

1. 政府与国家杜马的对立不可避免；
2. 无论是进步同盟还是国家杜马主席团，都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与部分妥协；
3. 因此，国家杜马将遭到解散，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4. 一旦国家杜马遭到解散，大多数议员将宣布解散无效，将国家杜马的议事场所转移至莫斯科，尤其是转至莫斯科某位企业大亨家中。

145 这位安保部门高官指出，虽然没有明说，但柯诺瓦洛夫的府邸也被考虑用作国家杜马新的议事场所。¹¹⁵⁴

在“工人团”提出革命行动方案和以莫斯科自由派为中心提出向革命性国家杜马前进期间，克伦斯基发表了他最终的看法。《北方杂记》杂志1917年新年特刊上登载了克伦斯基的随笔《浅谈谣言》。该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民众沉溺在“谣言的麻药”中，自欺欺人。

现在，人们应该从古老童话一般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清醒过来，呼吸新鲜空气，找回自由人类的思想。心系俄国的人民很

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羞愧与痛心。^[155]

克伦斯基呼吁，必须下定决心发动革命。



首都彼得格勒 的民众

147

涅瓦大街



随着世界大战愈演愈烈，俄罗斯帝国的危机也不断加深，人们开始预感到革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民众自发而起的革命，只可能在首都彼得格勒首先爆发。1905年的革命也是爆发于首都。当时，从首都各处涌来的多达10万名工人及其家属向沙皇所在的冬宫行进，途中遭到军队阻挡，很多人中弹身亡。这就是著名的“流血星期日”事件，也是1905年革命的开端。那场革命（第一次革命）之后又过了十二年，如果首都民众再次爆发革命运动，应该向着哪里进发呢？

1905年的这一天，工人们上街游行，宣称将向沙皇请求实现“正义与真实的世界”。如果诉求得不到满足，除了死在皇宫前外别无他法。但事实上，沙皇当时并不在冬宫。因为尼古拉二世仅在举办国家正式活动时才使用冬宫，一般情况下，他与家人生活在郊外的皇村。不过，在“一战”迈入第四个年头时，沙皇作为俄军最高总司令，一个月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距首都700公里的最高统帅部莫吉廖夫，首都只剩下一个“没有沙皇”的沙皇政府。因此，革命一旦爆发，革命势力不仅要与这个“没有沙皇”的沙皇政府斗争，还要与远在最高统帅部的沙皇和军方高层及军官们对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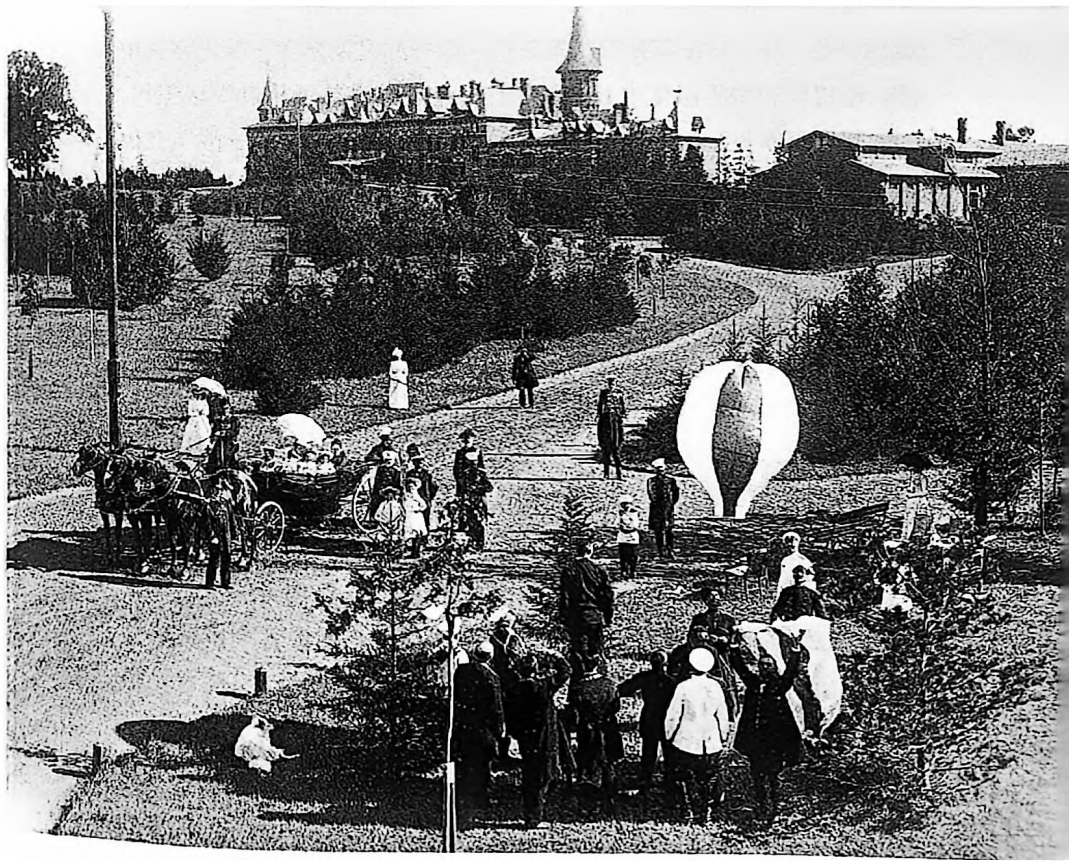
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彼得格勒，始建于幅员辽阔的俄国西北部波罗的海之滨的沼泽地带。此前的首都是莫斯科，它位于俄国自古以来149 来的领土中心，无论是对内创造财富，还是对外防御，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莫斯科相比，彼得大帝一手建造的“欧洲之窗”彼得格勒，虽然有利于吸收西方文明，但在调集国内物资时运输路程过远，一旦爆发战争很难防守。尽管如此，这个壮丽优美的人工城市，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

1905年革命时期，这座城市的人口是1635100人，“一战”前夕



站在涅瓦河岸远眺冬宫

沙皇尼古拉二世仅在举办国家正式活动时入住冬宫，平时与家人居住在郊外的皇村



为2217000人，1917年革命前夕为242万人。同一时期，俄国第二大城市莫斯科的人口为2017000人^[1]，相比之下，首都地区的人口聚集程度可见一斑。这座城市东西宽10公里，南北长16公里，总面积102.4平方公里。^[2]它不仅是俄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家机械工业及军需产业的中心。这一地区的工业在战前依赖煤炭进口以及原料进口，运输粮食和出口货物主要依靠三条铁路以及涅瓦河的水运。在战争时期，由于海上运输线路遭到封锁，大量增加的原料、燃料和粮食需求只能依靠国内路线运输。同时，由于运力资源大部分用于军需，因此在这座北方之都，全国性的粮食匮乏及物价高涨问题显得尤为严峻。

战争打响以后，首都进入戒严状态，由彼得格勒军区司令负责首都的警备工作。1916年秋天，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谢尔盖·哈巴洛夫中将。哈巴洛夫中将出生于1858年，1886年开始在彼得格勒军区工作，1900年调至军校，1903年至1914年一直担任军校校长。“一战”开始前，他担任乌拉尔州军事总督。目前尚不清楚他为何会在“一战”爆发后被调回首都，并担此重任。^[3]彼得格勒军区原本听命于北部方面军总司令，但在1917年首次独立，由陆军大臣直接管辖。^[4]从哈巴洛夫的履历来看，很难认为他具备应对首都民众运动和革命的能力。

彼得格勒的警察则有多个主管部门，不过都统一听从内务大臣指挥。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之下是内务部警卫安保局局长，彼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1869年生），全国的安保部及宪兵队都由他指挥。在普罗托波波夫就任内务大臣时，同期任命的副大臣库鲁洛夫举荐瓦西里耶夫担任警卫安保局局长。^[5]尽管瓦西里耶夫在1917年革命中几乎未发挥任何先导作用，但正是他调动了首都宪兵队的力量。首都警察和行政部门直属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负责人是彼得格勒特别市市长。1916年11月，担任这一职务的是亚历山大·巴尔克少将（1866年生）。在华沙被攻陷之前，他

一直担任波兰地区的警察局代理局长，而将他提拔至特别行政长官的人，正是普罗托波波夫本人。^[6]特别行政长官负责指挥各区的警察厅，统管警察活动。另外，警卫安保局局长瓦西里耶夫之下还有一人，就是彼得格勒安保部长。1915年3月，康斯坦丁·格洛巴乔夫少将（1870年生）开始担任这一职务。格洛巴乔夫此前在塞瓦斯托波尔尔宪兵队担任负责人，受内务副官钩科夫斯基提拔来到首都^[7]，所以并非普罗托波波夫的亲信。安保部长的工作是将大量特务秘密安插进社会各阶层及团体，收集情报并传递给高层。 151

工厂工人

在彼得格勒的市民构成中，最重要的当数工厂工人。1917年年初，首都彼得格勒的242万居民中，工厂工人就有384638人。^[8]假设这一数值把工厂工人的配偶、子女包括在内，按10万人计算，那么首都人口的五分之一都是工厂工人及其家属。

早在1913年年末，即“一战”前夕，首都的工人数量为242580人，之后战争过程中又增加了142000人。也就是说，工人数量增长了58.5%，增长极为显著。全国矿工工人数量*的比率，同一时期也相应从7.8%增加到了11.4%。^[9]

这些增加的工人几乎全都集中在军需产业化所需的金属加工

全国矿工工人数量 1913年年末，俄国矿工工人总数（除芬兰）为3114900人（A. G. Rashin, *Formirovanie rabocheho Klassa, Rossii*, Moscow, 1958, pp.64-65）。1917年1月1日，除去被德国军队占领的波兰十省及西部三省，俄国领土范围中矿工工人总数达到3383600人。这一数字是在中央经济委员会所提供的数字（IA, 1961, No.5, pp.159, 160）的基础上，加上石油工人数量（Rashin, op.cit., p.64）而得出的。

和机器产业，人数从100600人增加到235900人，激增到原来人数的2.35倍。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该行业人数在工人中所占比例由
152 41.5%增加到了61.3%。而另一方面，战前工人数量分别处于第2、3、4位的纺织、印刷、食品行业中，此时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人员减少以及排序下降的现象。与此相反，原先在“一战”前仅排第5位的化工行业工人人数一下子倍增到42900人，超越纺织行业，上升到第2位。^[10] 综上可以看出，首都已成为军需产业的中心，相关行业的工人在首都工人当中的主力军地位也更加突出。

由于军需产业工人可以延期入伍，因此在首都工人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战前就是首都工人*。

战争时期首都新增的工人*主要包括：从各地招募来的工人、来自波罗的海沿岸或者波兰的疏散人员或难民、妇女儿童、首都其他行业从业者、普通难民、农民等。其中，来自其他行业的工人应该占了大部分。

战争时期，女工人数急剧增加。这主要是因为1915年9月29日国家发布敕令，取消了妇女儿童在军需产业中的就业限制。^[11] 1913年，在省内工厂检查官所负责的工厂里，女工仅占全体工人的25.7%，而到了1917年年初，这一比例提高到了33.3%。在金属机器制造产业，女工占比也从2.7%激增到了20.3%。^[12]

俄国金属机器制造工厂的工人多由三种类型组成：具有多年经验的熟练工、十多岁的实习工、从事零件制品搬运组装的杂工。第三种工作尤其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俄国较为常见。在官营奥布霍夫工厂，1911年到1915年之间以农民身份进入的664名工人中，高度熟练工占27.3%，一般熟练或者不要求熟练度的工种工人占6.4%，实习工、学徒占28.3%，杂工则占38%。^[13]

首都工业的特征之一，是工人高度集中在大型企业中。1913年，工人规模超过1000人的工厂有46%，这些工厂的工人人数占工人总

数的54.8%。^[14]但是到了革命前夕，大型工厂占比提高到了69%，其工人人数占比提高到了66.4%。^[15]而500人以下工厂的工人总数占比还不足20%。^[16]

除此之外，首都工业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官营工厂非常集中。战争期间，由于最大的民营企业普契洛夫和其姐妹工厂涅瓦造船厂被接管，官营工厂的占比愈发提高。到了革命前夕，官营工厂达到31家，工人人数为134664人^[17]，占到工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1905年革命后，由于推行了九小时劳动制，官营工厂的工人待遇比民营工厂的工人要优厚一些，其中还出现了部分享有高收入和特权的工人阶层。^[18]此外，军需工厂由军人管理，罢工活动受到严格管控。因此，官营工厂的工人*无论在战前还是战时都没有积极参与过革命斗争。

很大一部分人在战前就是首都工人 在战前首都的24万工人当中，据估测原本应服兵役的工人为116200人，但其中有7万人满足延期入伍的条件，实际应召入伍的只有4万人（占比为17%）。因此，有20万工人无论在战前还是战时都是工人，这部分人数的比例占到了革命前夕工人总数的52.1%（I. P. Leiberov and O. I. Shkaratan, *K voprosu o sostave petrogradskikh promyshlennykh rabochikh v 1917 godu*, VI, 1961, No. 1, pp. 47-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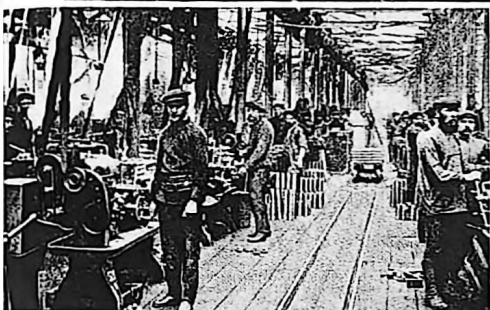
首都新增的工人 虽然很难确定具体比例，但从菲尼克斯机械工厂的男工比例构成来看，战前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的工人占比为49.4%，新雇用的工人占比为50.6%。后者当中，疏散而来的工人为3%，未成年人为8.9%，城市其他行业阶层为29.2%，农民为9.5%（Z. V. Stepanov, “Voprosy chislennosti i struktury rabochikh Petrograda v 1917 g.” In *Rabochii klass i rabochee dvizhenie v Rossii v 1917 g.*, Moscow, 1964, p. 85.）。

官营工厂的工人 战前，官营工厂中只有奥布霍夫工厂参与了工人斗争。参见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 124.。

154 民营企业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有深刻的劳资矛盾，并且这些首都企业家通常还和沙皇政府、垄断银行、外国资本势力相互勾结。企业家成立了彼得格勒工厂主协会这一强有力的团体，对工人运动进行严酷镇压。该协会成立于战前的1912年6月，协会会员的《协议》规定了各个工厂主的义务，即不得实施工长制等“固定工人代表制度”，不得接受工会等“外部团体”的调停。^[19] 协会对罢工采取了如下惩罚措施：1. 处以罚金；2. 根据《工业法》第105条第1项规定，如果出现“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天旷工”的情况，工人将被全员解雇（封闭工厂不让工人进入）；3. 参与罢工的人将被记入黑名单，禁止其他企业雇用；4. 请求当局对活动家进行逮捕或驱逐。^[20] 这些手段在战时与权力紧密结合，并不断强化。1914年8月，最高总司令宣布在戒严令下解散所有工会，此后几乎未批准成立任何新的工会组织。同月12日，陆军大臣发布命令，禁止工人擅自离职或去其他工厂工作。^[21] 军需工厂的罢工被认为是对国家的背叛。1915年夏天，罢工再次爆发。7月11日，军区司令发布告示，命令停止罢工，宣布对继续罢工的工人采取相应处罚，包括取消延期入伍，处以3个月以下的拘禁，征收3000卢布以下的罚款，或者逐出首都等。^[22] 9月2日，军区司令再次发布命令，禁止所有罢工行动，对罢工行动的煽动者及参与者将进行军事审判，判处无期徒刑以下刑罚。^[23]

在劳动时间方面，民营企业的工人战前为每天工作10—10.5个小时，只有印刷工人为9个小时。但实际上，特别是金属制造行业的工人常被迫加班，真实劳动时间超出了上述统计。^[24] 在战争时期，军需行业系统地推行“两班倒”制度，为了适应部队的节奏，工人的劳动强度明显加强。

工资方面，表面上看，在战争时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工商部的数据显示，1914年到1916年，工人工资上涨了1.4—1.96倍。然而这一时期的物价飞涨了3倍以上，这种增加无异于杯水车薪。尽管



彼得格勒的男工

155

上：金属工厂；中：普契洛夫工厂；下：机车制造工厂。工厂工人是彼得格勒市民构成中最重要的部分。1917年年初，242万居民中，工厂工人为384638人。假设这一数值中也包括了其同为工厂工人的妻子及子女，且以10万人计算，可以说工厂工人及其家属占到了首都人口的五分之一



工厂多少会有一些口粮补助，但在整体粮食匮乏的情况下，工人普遍营养不良，生病率、工伤率、死亡率都在增加。^[25]

关于首都工人的政治面貌，可以通过国家杜马议员选举中“工人阶级代表的党派分布”（参见第1章第13页）这个综合性数据加以分析。当时，在男工超过50人的工厂，总人数不足1000人时可推选1人，超过1000人时，每1000人可推选1人作为工人代表参加议员选举。1912年秋天，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共有82名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代表参加。其中，“明确的反取消派”即布尔什维克党等左派有26人，“明确的取消派”即孟什维克主流派有15人，“纯社会民主主义者”有41人。在代表集会上，布尔什维克党提议的委托要求书虽然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当天上午公布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中，6人中仅有3人是布尔什维克党，其余3人均是取消派。在最终选举大会上，当选为工人阶级议员的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巴达耶夫。^[26] 可以认为，在1912年，布尔什维克党相比于孟什维克主流派处于优势。

关于战争时期工人的政治面貌，还可以通过1915年9月关于选举工人代表加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时的资料数据加以了解。共有首都500人以上规模的101家工厂中的219036名工人参加这次选举。选举规定，1000人以下的工厂可推选1名候选人，超过1000人的工厂，每增加1000人可再选出1人，之后召开选举大会，从中推选工人代表。共有93家工厂进行选举，选出了218名工人代表，其中，198人出席了9月27日的选举代表大会。这当中，孟什维克取消派与社会革命党右派81人，布尔什维克党60人（可能也包含其他左派），无党派57人。但是，在无党派人士中，有35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提案，反对战争，抵制选举代表，其他人则表示弃权。选举结果为95：81，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获得了采纳。^[27] 因此，当局宣布该选举结果无效，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一派的参选者。在11月29日重

新召开的选举人会议上，仅有153人出席。此时，有50名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提议的选举人退场，会场仅剩的103人进行了代表选举。^[28]在第一次选举中持保留意见的8名工人代表，这次倾向于取消派的社会革命党。最终结果为（第二次选举的）右派103对（第一次选举的）左派95。孟什维克党主流派（主战派）与布尔什维克党（反战派）的势力发生了逆转，右派占据优势，但左派的支持者仍然保持了一定数量。

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时，首都工人都是工人斗争的先锋及中心。根据工厂检查官所辖工厂的数据，彼得格勒占据了1914年全国工人总罢工人数的56%。在战争期间的1915年，这一数据降至22.8%，低于莫斯科及弗拉基米尔地区，但是1916年又升至38.2%，处于主要地位。^[29]

157

我们可以从战前的1914年年初起简要回顾一下这一年的联合斗争。首先，在1月9日，11万人参加了纪念“流血星期日”的罢工活动，在城市主干道的涅瓦大街上，包括学生在内的二三百人试图举行游行示威。3月6—12日，为了抗议对工人报纸和工会的镇压，共有20662人次参加了一日大罢工。3月13日，为了支持布尔什维克党议员在国家杜马对连纳惨案*的质询，共有114家工厂的53000人参加了罢工。维堡区发生了示威游行，群情激昂，人们试图越过涅瓦河直奔国家杜马。3月19日，为了抗议特列高利尼克橡胶厂工人集体中毒事件，120家工厂的73000人参加了工人罢工。为了对付工人罢工，3月20—24日，资本家关闭了26家工厂。^[30]4月4日，为了纪念勒拿河金矿大屠杀，工人们在涅瓦大街举行了示威游行，有51人遭到拘

* 连纳惨案：1912年4月17日（俄历4月4日），俄国政府枪杀连纳金矿工人，死250人，伤270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特大惨案——连纳惨案。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抗议性的罢工，俄国国内又开始出现了新一轮的革命高潮。

捕。^[31]4月23—26日，为了对禁止国家杜马左翼议员参加全体大会这一处罚表示抗议，共有164家工厂的58500人参加了一日大罢工。^[32]在接下来的5月1日，罢工活动达到了战前最大规模，共有346家工厂的12.5万人参加了罢工，占到了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没有参加罢工的工厂主要是钢管厂、枪弹制造厂、大炮厂、波罗的海造船厂、海军造船厂、奥夫塔火药厂、国家印刷局等官营工厂（奥布霍夫工厂有半数工人参加）以及大型纺织工厂等。从地区来看，维堡区参加罢工的人数超过7成，成为斗争的中心。涅瓦大街上也进行了示威游行。5月19日，为了对1913年因参加奥布霍夫工厂罢工而受到起诉的14名工人复审一事表示抗议，共有超过155家工厂的72000人参加了罢工。^[33]6月6—11日，为了对钢管厂工人因杀死工头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结果表示抗议，共有26640人参加了一日大罢工。^[34]

这种持续性的联合斗争不断积累发酵，推动了七月斗争的爆发，这也是“一战”爆发前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这场斗争开始于7月4日（星期五）。由于警察在俄国最大的民营企业普契洛夫工厂的工人集会上向工人开枪，人们举行抗议罢工，共有152家工厂的70937人参与其中。经过周六、周日两天，到了7月7日（星期一），参与罢工的工厂增加到334家，罢工人数也增加到11万人。在维堡区，工人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示威游行，导致电车停运。涅瓦大街上也出现了示威游行。到了7月8日，示威的规模有所减小，但程度更为激烈，电车被示威群众掀翻在地。哥萨克骑兵奉命出动，开枪镇压，工人中有人受伤。到了晚上，维堡区的工人们砍倒电线杆，在上面缠绕上铁丝，开始做路障。当天晚上，俄国警察带上了步枪，这也是1905年革命以来警察首次配枪出动。7月9日，示威游行活动达到了最高潮，共有259家工厂的11.7万人参与其中。工人们没有向市中心进发，而是坚守在工人集中的地区，采取了强行关闭商店、隔着路障投掷石块、零星开枪射击以及烧毁桥



彼得格勒的女工。上下两图均为国家印刷局

“一战”中，女工人数急剧增加。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1915年9月29日颁布的敕令解除了军需产业中妇女和儿童的就业限制。受此影响，在彼得格勒的工厂检查官所负责的工厂中，女工人数在全体工人总数中的占比从1913年的25.7%迅速增加至1917年年初的33.3%



梁等行动。警察和哥萨克骑兵则对工人进行了猛烈射击，至少有9名工人遭枪杀。10日，工厂主协会宣布关闭工厂。由于8—10日的游行队伍中有185人遭到拘留，游行活动开始逐渐平息，不过到11日为止，罢工规模仍然维持在11万人左右。12日，从9日开始的报纸印刷工人罢工宣告结束，报纸发行开始重启。此后，返岗工人逐步增加，14日的罢工人数降至7.5万人，15日进一步减少到5万人。16日，持续了9天的工人斗争运动宣告结束。^[35]

据统计，七月斗争的参加人数达到11.7万人，其中，金属行业工人为6.1万人，纺织工人为2.1万人。^[36] 这些数字分别占首都工人总数的48.2%、金属行业工人总数的60.4%以及纺织工人总数的50.5%。反过来说，约有一半的工人没有参加五一罢工和七月斗争。

七月斗争结束后，工人开始回到工厂上班。第二天，也就是7月18日，首都各地贴出了总动员令。^[37] 工人中的先进分子（21家工厂的27000人）在19日再次发动了反对战争的罢工行动。在维堡区，警察带领约100名应征入伍人员前往工人集合地点，但遭到游行队伍包围。工人们高呼“反对战争”，高唱《马赛曲》，要求将应征入伍者送回家。之后游行群众开始围殴警察，并夺走了他们的手枪。骑警赶来后，混乱情况才得以平息。在涅瓦大街上也出现了50人左右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38] 此外，也有工人加入了支持战争的示威游行，这些示威者主要是第一市区的西屋器具制造厂和圣加利尔工厂的工人，不过人数远远少于参加反战游行的工人人数。^[39]

160 很多工人完全没有参加任何行动，他们尚处于恐惧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康德拉季耶夫这样写道：

宣战布告对工人们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预备役及第一类国家民兵征兵布告的公布以及紧接着实行的戒严令，最终击垮了工人们的斗志，使他们从内心深处害怕第二天的到来。

很多工人不敢离开机器。他们想尽可能留在工厂，留在机器旁，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40]

从这时开始，大约一年内，首都工人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

但是，在1915年的夏天，情况迎来了转机。首都的工人们也紧随着中部工业区的工人们站了起来*。格里高利·米亚索迪夫事件和大撤退事件（参见第1章第42页）使得权力失去权威，让工人们可以无所畏惧地发起斗争。有的工人受到反德情绪影响，把对工厂经营者的不满化为对德国人及奥地利人的憎恶。这种情况出现在普契洛夫工厂，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不少德国人及奥地利人进入普契洛夫工厂的管理层这一特殊情况。^[41]大多数工人并没有因此就陷入战争狂热。

具体来说，紧随着7月的经济罢工浪潮，8月17日，为了抗议在科斯特罗马州和伊万诺沃州实施的屠杀，伊瓦苏工厂展开了罢工。翌日，新莱斯内尔工厂等11家工厂举行了罢工，19日有5家工厂、20日有1家工厂也相继举行了罢工。总计有19家工厂的2万多人参加了一日大罢工，但工人们并没有进行示威游行。^[42]8月29日和31日的晚上，市内的普契洛夫工厂、彼得格勒金属制造厂等工厂的疾病互助基金会的30名活动家遭到逮捕。^[43]为了抗议此次逮捕行动，从31日开始，普契洛夫工厂的250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到了9月2

首都的工人们也紧随着中部工业区的工人们站了起来 雷伯洛夫的调查显示，从1914年8月至1915年6月，共发生了33起政治罢工（8744人参加）及43起经济罢工（11342人参加）。但在1915年7月，仅这一个月就发生了29起经济罢工（17934人参加），8—9月则发生了94起政治罢工，参加人数达到105906人。Leiberov, Stachechnaia bor'ba Petrogradskogo proletariata v period pervoi mirovoi voiny, In *Istoriia rabochego klassa Leningrada*, vyp. II, Leningrad, 1963, pp.166, 177.

日，已经发展成有19366人参与的正式罢工。这一天，在普契洛夫工厂的集会上，通过了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决议。决议指出：“政府对卖国行为无所作为，我们对此表示抗议，并要求建立责任内阁。”当天，维堡区的新莱斯内尔工厂也决定通过罢工表示对逮捕活动家这一行为的抗议。次日（3日）起，有15家工厂开始罢工。新莱斯内
161 尔工厂的工人们试图进行示威游行，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工人们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则拔枪予以还击。这一天，全市共有27家工厂的44247人参与了罢工。第二天（4日），有4家工厂退出罢工，但又有32家新的工厂加入进来。5日傍晚，罢工活动结束，共有59家工厂的69817名工人参与了此次斗争。^[44]

1915年秋到年末，斗争的热潮稍有减退*。1916年1月9日，首都工人再次掀起了大规模斗争，共有55家工厂的66767人参加了“1·9斗争”。普契洛夫兵工厂的工人这次没有参加。工人们在维堡区的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道上举行了火药味十足的示威游行。新莱斯内尔工厂工人组成的示威队伍和警察的队伍发生了冲突，被强行解散。就在这时，一辆途经此处的军用汽车冲向一队宪兵排，一名宪兵躲闪不及，连人带马摔倒在地。见到此状，工人们高呼“乌拉”（万岁），坐在军用汽车内的六名士兵也脱下军帽，高声回应“乌拉”。^[45]

进入2月以后，普契洛夫兵工厂多次举行经济罢工，6日和23日，工厂经营方两度宣布关闭工厂。^[46]25日，在新莱斯内尔工厂举行的集会上，有人号召要开展支援普契洛夫工厂的总罢工^[47]，但在2月内，工人们未能发起支援行动，直到政府在3月1日宣布由国家接

◆
斗争的热潮稍有减退 雷伯洛夫的调查显示，10—12月，每月发生政治罢工5—10起，参加人数为9000—11000人。经济罢工则有1926起，约6800—13300人参加。Leiberov, Stachechnaia bor'ba Petrogradskogo proletariata, p.177.

管普契洛夫工厂后，工人们才以维堡区为中心举行了罢工，共有28家工厂的32854人参与其中。此次罢工一直持续到了3月3日。在罢工的最后一天，发生了群众向警察开枪的事件。^[48]

首都工人的革命热潮始于1916年年初，结束于当年的“三月斗争”。坚持进行后卫战的则是新莱斯内尔工厂的工人们，他们始终冲在运动的最前线。3月下旬，工厂杂工强烈要求加薪，该工厂的工人共6100人进行了罢工。工厂经营方以关闭工厂相要挟，由于工人们缺乏团结，罢工以失败告终。最终，500名工人积极分子被驱逐出工厂，其中包括200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新莱斯内尔工厂也被认为“在政治上死亡了三个多月”。^[49]之后，工人运动进入了“表面风平浪静，内部暗流涌动”^[50]的状态。

但是，工人们的不满和愤怒也一直在郁积。1916年秋，也就是战争的第三年，俄国的国家危机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阶段，工人斗争运动再次爆发。从10月初开始，首都谣言四起，诸如“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地区发生了大事”“莫斯科爆发了武装起义，警察也开始罢工，赶来的部队拒绝开枪”“某处工厂发生坍塌事件，死了好几百名工人”“某处发生爆炸，造成数百人死亡”等。^[51]不管这些流言蜚语来自哪里，它们都反映出工人们高度紧张的情绪。从10月13日开始，维堡区的各工厂就物价问题同时召开了集会^[52]，17日，新帕尔维艾宁、雷诺（俄国）、新莱斯内尔这三家工厂举行了罢工，其中，雷诺和新莱斯内尔的工人还举行了示威游行。正当警察的队伍打算阻止工人游行时，雷诺工厂对面兵营中的步兵第181团预备营的士兵们向警察投掷了石块砖头。警察队伍边后退边拔枪射击。一名在附近站岗的警察听到枪声赶来，示威人群将其拦住，抢走了他的佩刀和手枪并用刀具刺伤了他，还殴打了他的头部。第二天（18日），以维堡区为中心，共有28家工厂举行了罢工，示威游行队伍和警察的队伍发生了冲突。19日，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共有44家

工厂的59125名工人加入其中，并持续在维堡区示威游行，其间发生了工人投掷石块、警察开枪、面包店和杂货店遭到砸抢等恶性事件。20日，罢工行动逐渐平息，21日完全结束。^[53]然而没过几天，26日，政府开始对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布尔什维克组织中的相关人员进行审判。为了对此事件表示抗议，旧帕尔维艾宁、旧莱斯内尔、诺贝尔、爱立信等9家工厂的17237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其中有3家工厂在第二天被资方宣布关闭。再加上新加入的新莱斯内尔等工厂，这一天共有33家工厂的46122人参加了罢工。28日又有10家工厂被关闭。此时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人数已经达到了61902人（共58家工厂）。29日有工人返岗工作，罢工随之结束。被关闭的13家工厂也终于在31日解除了封闭。以此为标志，10月斗争告一段落。^[54]这次斗争基本只发生在维堡区，普契洛夫工厂的工人没有参加。但是，在本次斗争的第一阶段，工人和士兵联合起来对抗警察；在第二阶段，工人们表现出了和水兵团结一致进行抗争的意愿。这两件事都体现出了民众激进情绪的高涨。

进入1917年以后，工人斗争规模显著扩大，这在年初的“1·9斗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此之前，规模最大的时候只有55—58家工厂，参加人数也不到7万人。但到了“1·9斗争”时，共有111家工厂的14万5301名工人参加。这个数字创下了“一战”前1914年5月1日以来罢工人数的新高。包括普契洛夫兵工厂以及其他之前从未参加过罢工运动的工厂在内，新参与罢工的工厂有50多家。由于许多印刷厂也加入进来，因此罢工的第二天（10日），许多报纸都没有出刊，在维堡区和莫斯科区还发生了示威游行，不过据说游行人群并没有和警察发生冲突。^[55]

“一战”时期首都工人的斗争活动中，有20家工厂自始至终都是斗争运动的核心力量，推动着斗争的发展。它们是维堡区的13家工厂、诺瓦亚·新村地区的1家工厂、彼得格勒区的4家工厂、莫斯

科区的2家工厂（参见本章末尾第172页表1。普契洛夫工厂有时主导斗争运动，有时又完全不参加，摇摆不定，因此未纳入此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上述较活跃的工厂中工人们的政治面貌。新莱斯内尔工厂的工人总是冲在斗争最前列，工人中孟什维克取消派及社会革命党力量虽然相当强大，不过这里却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大根据地（75—80人），布尔什维克党在其中完全掌握着主导权。¹⁵⁶¹ 接下来是旧莱斯内尔、俄国波罗的海飞机制造厂、新帕尔维艾宁这三家工厂。前两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根据地（各30人），第三家在1915年时曾有20名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掌握着主导权，但该组织在革命前夕瓦解。¹⁵⁷¹ 布尔什维克党的另外两大根据地则是罗森克兰茨工厂（80人）和旧帕尔维艾宁工厂（45人），可以看到这两家工厂的罢工参与率相对较低。罗森克兰茨工厂的工人中虽然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及最高纲领派，但可以说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具有一定力量。¹⁵⁸¹ 在旧帕尔维艾宁工厂的工人中，虽然同时存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孟什维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但三党是联合斗争的关系。¹⁵⁹¹ 与此相反，伊瓦苏工厂和彼得格勒金属制造厂是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国防派的根据地，但是这两个工厂违背国防派的基本方针，也参与了罢工。主要原因有如下两点：一是受当地其他工厂罢工的影响，二是伊瓦苏工厂的孟什维克党比较独立。此外，在爱立信、诺贝尔、杜富隆、菲尼克斯等工厂，布尔什维克党人虽然人数不多（爱立信工厂有15人，诺贝尔工厂次之），但其活动积极性高，且与其他左派进行合作。在杜富隆工厂，布尔什维克党、区联派（参见第4章第197、213页）、初始派（同上）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这四派共同推进斗争。¹⁶⁰¹ 在菲尼克斯和爱立信工厂，取消派与布尔什维克党旗鼓相当，布尔什维克党处于优势地位。¹⁶¹¹ 在诺贝尔工厂中，区联派有8人。在巴兰斯基工厂，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似乎较为薄弱，但其中包括了区联派的地方党员（15人）。¹⁶²¹

“一战”时的首都工人根据其政治面貌，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受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影响的18家激进大工厂的工人，以及聚集在大工厂周围不到40家中小工厂的工人，人数约7万人，他们是具有斗争经验的先进分子。第二类是在1917年“1·9斗争”中首次或正式参与斗争的工人，他们来自50—55家工厂，人数约75000人。普契洛夫工厂也可以算入这一类。第三类则是完全没有参与过战时斗争的工人。他们分布在约900家工厂，约有24万人。他们虽然同为工人，承受着同样的苦难，却没有喊出自己的不满与愤怒，一直保持沉默。这一类人占到首都工人的六成以上。

165 大中学生

一直以来，与首都工人一道成为大众运动主力的是俄国中高等教育机构的大中学生。首先来看一下当时中等学校的学生。

在首都，有80多所男中（包括国立、官立、私立的普通中学36所，实业学校20所，商科学校20余所，教会学校7所）和79所女中（官立34所，私立45所）。在学生人数方面，1910年男中在校学生为48000人^[63]，女中在校学生应该少于这个人数。普通中学为9岁入学，学制8年，实业学校为6年制。普通中学毕业后可以继续升入帝国大学等高校，而实业学校的毕业生没有这样的资格。商科学校开办较晚，多为私立，学生毕业后如果能够通过拉丁语考试，也可以获得参加帝大入学考试的资格。因此，普通中学及商科学校的学生多为贵族、官吏、商人、自由职业者的子女，而实业学校的学生多为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女。^[64]

中等学校的学生从第一次革命前夕开始，就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05年10月罢工时，很多中等学校的学生都参与其中。但是后来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如果有老师在课堂上讲述涅克拉索夫诗的社

会意义，学校就会把老师“请”走。此外，颓废的气氛也给青少年易感的心灵造成了影响。^[65] 苏联知名作家斯洛尼姆斯基曾在书中写到，自己在中学时代曾是“自杀社团”的成员。这些中学生的自杀动机不明，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66]

当然，也有一些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中学生。1912年年末，维特梅尔女子中学召开了首都各中学左翼团体代表会议，45名参会者全部被警察逮捕。在这些被逮捕的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活动家的塞缪尔·罗谢利。^[67] 不过，这样的中学生毕竟是少数。

随着“一战”开始，中学生成为积极的战争支持派，参加了宣扬排外主义的游行。^[68] 作家斯洛尼姆斯基当时还是学生，也申请提前参加毕业考试，作为志愿兵奔赴战场。^[69]

首都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兰特夫斯卡亚私立中学，很多名人比如立宪民主党国家杜马议员申加廖夫、民粹派评论家佩舍霍诺夫、文学家安德烈夫等人的子女在战时都就读于该校，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很大。^[70]

接下来看一下大学生和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1914年，首都彼得格勒共有60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名校包括历史悠久的圣彼得堡帝国大学（学生人数超过7000人）、女子高专（学生人数6000人）、矿业高专（学生人数2000人）、综合技术高专（建于1902年，学生人数5000人）、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建于1907年，1911年学生人数1142人）等。在“一战”前，60所学校的学生总数约为4万人。^[71] 学生从普通中学毕业后，如果顺利的话，17岁进入大学，在大学学习5年后毕业。但是，由于俄国大学要求学习的必修课程极多，每年只有5%—7%的学生能够毕业，很多学生成了“老留级生”^[72]。这也使得入学考试的竞争程度提高^[73]，而且新生和留级生在心态上有着显著区别。

关于学生出身于哪个阶层，据1913年俄国教育部的统计报告



166



彼得格勒的大中学生

上图：第九中学的学生

下图：圣彼得堡高等交通工程学校的学生

俄国中高等教育机构的大中学生与首都工人
并肩战斗，是大众运动主力

显示，在圣彼得堡帝国大学，贵族官员及军人子女的比例为28.3%，城市平民子女占24.2%，农民家庭出身（包括哥萨克）的学生占13.6%，荣誉市民、商人的子女占10.9%，神职人员的子女占10.3%，具有世袭贵族身份的学生占7.7%。^[74]而根据更早之前（1909年）对首都综合技术高专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该校学生中，神职人员、官吏、军人的子女最多，占29.7%，其次是工商业界资产阶级的子女，占25.6%，农民、工人、手工业者的子女略多于地主的子女。^[75]当然，首都的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首都学生早在20世纪初，便通过全国大罢工等活动开展了开创性的斗争。他们于1905年公然在大学校园内召开数千人规模的政治集会，并于8月27日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大学自治权，甚至给人们造成了“大学才是革命中心”这一印象。^[76]但是在革命低潮期，学生运动遭到严酷镇压，发展陷于停滞。有的学生放弃政治运动，返回象牙塔。学生的思想也逐渐趋于保守。根据上述1909年对首都综合技术高专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28.2%的学生认为自己属于无党派，15.5%的学生支持立宪民主党左派，与此相对，23%的学生支持社会民主工党，12.2%的学生支持社会革命党。^[77] 167

1910年11月，在首都所有高校及高专举行了“追悼托尔斯泰，反对死刑”的示威游行，但遭到了残酷镇压。首都共有734名学生遭到逮捕，1860人受到退学处分，2374人受到警察审讯。这些学生都被驱逐出了首都。1911年1月11日，内阁会议颁布决定，禁止在校园内举办除学术会议以外的一切集会。即使大学没有主动提出请求，警察也可以随时进入大学校园搜查。^[78]“追悼托尔斯泰，反对死刑”的斗争在俄国历史上堪称孕育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但就学生运动来说，这却是参加了1905年革命这代人最后的斗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后的一代人没有经历过1905年革命的洗礼，而是在革命低潮期颓废的氛围里度过中学生活，然后进入大学或高专。 168

大战前夕，仅有一部分学生参与了政治斗争。1914年3月13日，为了支持布尔什维克议员就连纳惨案向国家杜马提出质询，工人们展开了联合行动，学生们也策划了相应行动。当天下午2时，共有400名学生在综合技术高专的主楼门口召开集会，抗议勒拿河大屠杀，并通过了“向全体学生呼吁，与沙皇专制做斗争，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决议。其中200名学生在走廊高唱革命歌曲，试图迫使学校停课。据安保部长报告，“几乎所有学生都不希望罢课”。该报告称，14日，在林业高专和圣彼得堡帝大有集会计划，圣彼得堡农业高专也有罢课计划。^[79]总之，当时的学生运动大致就是这样的规模。

因此，“一战”开战自然受到很多保守学生的热烈欢迎。和平时期，学生可以暂缓服兵役，但在暑假结束后，1914年10月8日，政府宣布陆军大臣有取消这一项规定的权力。这天，各校举行了支持此项政府决定的大型集会。圣彼得堡帝大有约500名学生打算召开反战集会，但被迫中止。综合技术高专也在13日进行了同样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80]有的女生参加了护士培训班，在伤兵服务机构工作。^[81]因为没有正式开始动员，男生们在这一时期主要是义务服务，比如在社会救济署为有士兵出征的家庭提供援助以及照顾难民等。^[82]

但在1916年4月政府正式开展学生动员后^[83]，男生数量骤减。安保部长在这一年10月的报告中汇报说：“由于形成了特殊的统一集团，¹⁶⁹ 紧凑而强有力的学生团体已经不复存在。”房租和伙食费的涨价，使得学生们的生活变得相当艰苦，对征兵召集工作也越发反感。安保部门的报告指出，关于战争问题，“现在学生之间不存在统一的意见”。虽然暂时还看不出学生对革命党的宣传有“特别的共鸣”，但和平口号“在广泛层面也多少获得了一些共鸣”，“不想参加战争的心情”已经成为“一般现象”。对政府的不信任则毫无疑问地普遍存在，人们一致认为“变革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目前的主流是自由主义倾向，

即与地方自治会联盟、城市联盟、军事工业委员会有共鸣。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心情和关心的层面，目前看不出学生对这些社会团体所产生的共鸣有什么实质性的表现。……但是，如果粮食问题变得更加尖锐的话，可以预想，学生的这种广泛的消极情绪将会被某些积极的革命行动所取代。^[84]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配合工人们十月斗争掀起的第二次浪潮，10月29日，圣彼得堡帝大约300名学生在大学正门举行集会，抗议物价上涨，反对政府处决支持工人的士兵，宣布29日和31日两天罢课。学生们一边高唱革命歌曲，一边在校内游行，试图罢课。不过，当天只有一个教室停课。此外，女子综合技术高专的学生也举行了罢课，反对判处士兵死刑。^[85]虽然学生活动规模很小，但工人活动家所希望的工人、士兵、学生团结一致的愿望在这个时候露出了些许曙光。

士 兵

首都居民的第二大构成要素是士兵。1956年，列宁格勒的历史学家科恰科夫发表了关于首都士兵的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他指出，截至1917年2月1日，首都共有271100名士兵。此外，沙皇一家常住的皇村有69800名士兵，皇室别邸所在的彼得霍夫、奥拉宁鲍姆、斯托雷利纳三处共有70300名士兵，皇室的另一处别邸所在的加特契纳有21700名士兵，近卫军的演习场地红村有33900名士兵，再加上周边地区的176700名士兵，总数可达466800人。^[86]再看工厂工人，首都周围只有24200人。即使把首都和周边地区的工人人数全部加起来，算作408838人的话，也远低于466800名士兵这个人数。我在1968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是根据科恰科夫的上述研究强调这群士兵

对于首都的意义。^[87]

但是，在我的论文发表之前，历史学家布鲁杰罗夫出版了一部研究二月革命的名著，指出科恰科夫的数字过大。根据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资料，首都士兵有17万人，周边地区的士兵有152000人，共计322000人。^[88]1985年，列宁格勒的历史学家索伯列夫试图阐明这两个数字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89]他举出的是科恰科夫的另一张一览表。科恰科夫认为，在革命前夕，位于首都和周边区域的是下面的这些部队：

1. 近卫步兵团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猎兵、谢苗诺夫斯基、伊兹马伊洛夫斯基（第1旅）、巴甫洛夫斯克、莫斯科、掷弹兵、芬兰（第2旅）、库尔斯哥林姆、立陶宛、沃利尼、彼得格勒（第3旅）各团预备营，近卫狙击兵旅的四个预备营（两个营在首都，两个营在皇村）。上述共计16个预备营，1917年2月实际人数为99000人（一个预备营有4500—7500人）。

2. 线列步兵团

步兵第1团、步兵第180团（以上均在首都）、步兵第3团（驻扎在彼得高夫）、步兵第176团（驻扎在皇村）、机关枪兵第1团（¹⁷¹驻扎在奥拉宁鲍姆）、机关枪兵第2团（驻扎在斯托雷利纳）六个团的预备营。1917年2月实际人数为85000人（一个预备营有10000—15000人）。

3. 骑兵团

骑兵第9预备团（4700人），顿河哥萨克第1、4、14团（3200人），其他若干，共计8400人。

4. 工兵营

工兵第6预备营（4600人）、近卫工兵团预备营（800人）、架桥预备营（1600人），其余若干，共计17100人。

5. 电气部队、汽车部队

电气预备营（4600人）、装甲汽车预备营、第1·第3汽车预备连，其余若干，共计22000人。

6. 铁道部队

五个预备营，共计12400人。

7. 交通部队

15000人。

8. 飞机部队

一个预备营和一个预备连，共计5500人。^[90]

但是，以上人数总计只有258900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包括了驻 172
扎在皇村、红村、彼得高夫、奥拉宁鲍姆、斯托雷利纳等地部队的人数。

索伯列夫认为，首先，在上述第1组的近卫步兵团中，截至1917年2月15日，大体上达到了10万人。但是，关于第2组的线列步兵团，上面所写的“85000人（一个预备营为10000—15000人）”只是名单上的数字，实际人数要少得多。比如，名单上写的机关枪兵第1团有15000人，实际上只有约1万人，机关枪兵第2团也没有17500人，只有7700人。不过，索伯列夫关于具体人数没有写更多的

内容，只是笼统地指出首都士兵的总数在20万人以上。^[91]

综上所述，关于首都及周边地区的士兵总数，一共存在四种说法。科恰科夫最先给出的数字是466800人，而从他的另一份一览表中得出的数字是258900人，布鲁杰罗夫提供的数字是322000人，索伯列夫提供的人数是20万人以上。说法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部队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根据“一战”前的《军事统计年鉴》（1913年），圣彼得堡军区附近配备了近卫军中选拔的两个团（4个师、16个团）和两个线列步兵团，之外还有骑兵、炮兵、工兵等，总计驻扎了132000名士兵。^[92]他们主要负责维持首都治安。与俄国陆军整体相比，圣彼得堡军区中农民出身的士兵比重更高（60.2%，高于58.1%的平均值），工厂工人出身的比重偏低（3.1%，低于3.4%的平均值）。^[93]特别是从近卫军中选拔的16个团，均是由边远各州农民中选拔出来的根红苗正的士兵组成。他们在贵族学校出身的近卫军官的领导下，严守军队规章制度，是保卫国家和沙皇的忠实屏障。^[94]

173 然而，随着“一战”爆发，这些精锐部队悉数奔赴前线，留在首都的是由各团新兵组成的预备营，而这个人数比战前增加了一倍。

在总动员体制下，征兵不再采取以往的政策，这就使得首都及周边城市预备营的士兵中很多是首都本地的士兵，其中甚至包括因为参加罢工而受到处罚、被迫参军的首都工人。在近卫团的7万名士兵中，虽然绝大多数还是从其他军区应召入伍的士兵，但彼得格勒当地的士兵仍然有4500人左右。至于线列步兵团以及其他骑兵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等，在1916年5月和1917年2月3日进行的新兵招募中，招收的全部都是彼得格勒军区当地的居民。^[95]新兵的训练周期一般为6周，训练结束后就会派上前线^[96]，所以预备营里总是流动着新面孔。

如上所述，预备营主要由新兵组成。他们没有战斗经验，对即

将奔赴战场充满不安，内心里仍然把自己当成普通人。此外，还有一些士兵因为负伤或生病从前线回来，治愈之后还会再被送去前线。这些士兵主要集中在第四连。他们亲历了战争的痛苦，所以非常厌恶战争。¹⁹⁷¹

在战争期间，下士军官紧缺，急需培养。军队军官会在部队中选出会读写算术的士兵进行考试，合格的人就被编入教导营进行特殊培训。每个团的预备营都成立了教导营。¹⁹⁸¹教导营的队员一方面享有特权，是军官最信得过的士兵，但另一方面，他们需要高度自律，同时要接受最艰苦的训练。在这部分队员中，有的人自杀，也有的人请愿尽早去前线。¹⁹⁹¹

战争情况下，军官层的组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近卫团中，大多数军官仍然是贵族出身。在线列步兵团中，平民出身的军官在20世纪初占50%，但之后比例大幅增加。为了弥补军官的紧缺，战时还出现了速成的准尉。准尉一般都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士兵，之后在战时军官培训学校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当然，同之前的军官相比，这些人多出身平民。不过，准尉也可以晋升为连长，再过不久还可能升为少尉*。在前线接受过炮火洗礼锻炼的准尉中，有的人和士兵一条心，但在后方的准尉中，也有些人没有实力、滥用权力而为士兵所厌恶。当时在首都装甲车部队担任教官的文学家什克洛夫斯基这样回忆道：174

◆
升为少尉 例如，伊万诺沃州的工厂职员格拉西莫夫于1915年1月提前应征入伍，去了前线。由于毕业于商业学校，所以从夏天到秋天在准尉学校培训了三个月以后，他成为一名准尉，不久就晋升为少尉。1917年3月晋升为中尉。参见 M. N. Gerasimov, *Probuzhdenie*, Moscow, 1965。

至少在圣彼得堡卫戍部队中，准尉比正规军官的态度要差。尤其是有些在后方工作的准尉极其差劲，紧紧抓着预备营，口碑非常不好。士兵们给他们编了两句歌词：“昨日的菜农大哥，今天的军官大人。”^[100]

在近卫团中，为了保证准尉的出身，会尽可能征收那些从贵胄军官学校提前毕业的学生。

军官和下士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团规模暴涨到1000人以上^{*}。由于难以对士兵进行监管，部队经常采取禁止外出或限制会面等措施，试图切断士兵和市民的联系。^[101]这是因为兵营大多都位于首都中心地区，有一部分甚至就建在工人聚集地区的正中心。士兵外出时，宪兵队会以他们乘坐电车时不交钱为借口，进行巡查，要求部队严加管束。什克洛夫斯基写道：

……不让休假，只能待在兵营，兵营又是那么沉闷无趣，阴暗疲惫，上街还要被赶回来，非常让人生气——我相信，这一切比起军事上的不断失败和长期以来的“背叛”传言，更加促进了圣彼得堡卫戍部队的革命。^[102]

175 更准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前线的失败以及与沙皇、皇后、拉斯普京有关的致命谣言，共同推动了革命”。士兵们在入伍时宣誓效忠“信仰、沙皇和祖国”^[103]，这是他们服从军纪的信仰起点。因此，一旦对沙皇产生不信任感，他们对军队的忠诚也会大打折扣。

首都士兵的反抗始于前面提到的1916年“1·9斗争”期间。当时，宪兵企图阻拦工人进行示威游行，这时，一辆路过的军用汽车冲向了宪兵队。同年10月，步兵第181团士兵公然袭击警官，由此反抗进入新的阶段。10月17日，该团士兵先是在兵营里面隔着栅栏

向外扔石头，后来干脆翻过栅栏跑出大门，一边高喊“打倒警察”，一边投掷砖块和棍子。这一天，士兵们没有携带武器，直到下午5时以后才回到兵营。第二天，该团的士兵在军官率领下上街游行时，讽刺警察是“法老”•“蠢猪”，表现出明显敌意^[104]。这是士兵们在面对工人和警官队伍冲突时自然的感情流露。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士兵受到了怎样的处分，但该连在第二个月即奉命调往加利奇，离开了首都。^[105]然而其他团的士兵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对此，本书之后再予以讲述。

水 兵

176

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位于距离首都彼得格勒40公里外的科特林岛上。由于首都也有海军部队，因此水兵也是首都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106]

第1海军兵团和半个海军兵团驻扎在喀琅施塔得，第2海军兵团和近卫海军兵团则驻扎在彼得格勒。^[107]

从1917年2月23日的报告可以看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共有30705名士兵。其中陆军19567人，海军12138人，海军又可再分为沿岸部队的水兵4779人、教导营和舰队成员7098人、士官261人。

喀琅施塔得的海军兵团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部分。波罗的海舰

◆
团规模暴涨到1000人以上 根据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的陈述，巴甫洛夫斯克团平时有1770名士兵，而战时仅第四团就有1500名士兵。参见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1, p.196。

法老 该词原指古埃及的法老，在俄国用于揶揄飞扬跋扈的巡警。



彼得格勒街头的水兵

队在赫尔辛福斯（即赫尔辛基）设有最高统帅部和参谋部，列威利（现称塔林）是其第二基地，芬兰堡和奥布（图尔库）为要塞，而喀琅施塔得为第三基地。赫尔辛福斯设有战列舰、巡洋舰舰队，列威利也设有巡洋舰舰队。喀琅施塔得只配备了训练舰，但在平时状态下，所有舰船都会在这里停泊逗留。

这里有一份波罗的海舰队全体水兵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组成结构（参见177页表2）。大部分水兵是在1912—1916年应征入伍的年轻人，他们多在20岁到25岁之间，思想敏感大胆。从波罗的海舰队水兵构成（1917年1月1日数据）来看，这部分士兵占到64%。位于第二梯队的士兵经历则稍微复杂一些。他们多在1904—1908年应征入伍，1909—1914年退役，但在开战后又再次入伍。这一部分人在当时占了士兵总数的16.6%。他们是海军中尤为需要的技术型水兵，经历过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也经历过1905年革命（第一次革命）。位于第三梯队的则是1909—1911年入伍的水兵，

由于开战时人在部队，而不得不延长服役。他们的年龄在26—28岁，很多也是由于掌握了海军技能而被留下的。他们既有判断力，也对海
177
军抱有强烈不满，这部分人占了整体的15.5%。此外，还有一部分志愿人员，其中有未满19岁的志愿者，也有超过40岁而自愿入伍的士兵，占到了整体的0.9%。最后就是长年服役的水兵，占了3%。剩下的是下士。据记载，波罗的海舰队共有下士1245名。^[108]

在1913—1916年入伍的48853名水兵之中，机械工、锅炉工、车床技工、金属技工、铸工等工厂工人占28.5%，木工、裁缝、工匠等手工技师占7.7%，商船船员、渔夫占15.3%，农民占23.2%，从事其他职业的占25.3%。^[109]水兵主要来自工厂工人或商船船员等城市居民，因此识字率较高。

指挥水兵的军官则无一例外全部毕业于海军士官学校。在1910—1915年进入海军士官学校的1128名学生之中，有1033人出身于贵族，占学生总数的九成。贵族出身的士官与工人出身的水兵共同构成了俄国海军的阵容。^[110]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士官与水兵的关系势必非常紧张，其紧张程度甚至超过陆军。而且，军官中很多人都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到了俄国与德国开战的时候，这一情况就亟须重视了。

水兵没有任何权力。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在喀琅施塔得港
178
内公园的入口处有一块告示，上面写着“水兵与狗不得入内”^[111]。

喀琅施塔得的革命斗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当时，在对《十月诏书》抱有强烈不满的社会民主党的暗中运作下，该地10月26—28日爆发了起义。冲突共造成11人死亡，110人受伤（其中6人后来伤重身亡）。军事法庭最终判处9人徒刑，判处67人监禁，其余84人无罪释放。^[112]紧接着，1906年7月18日开始，起义再次爆发。此次起义由俄国社会革命党主导并发动，旨在呼应芬兰堡要塞发生的暴动，抗议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这次起义中起义者占领了武器库及

一处要塞堡垒，但也许是由于事前消息泄露，部队的镇压行动非常迅速，到20日时起义就已经遭到完全镇压。当局共逮捕了3000人，36人被枪决，228人被判处徒刑，1032人遭到监禁。¹¹¹³此次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对士兵造成了沉重打击。

“一战”开始后，水兵们遵守规定，保持平静，但在“大撤退”之后，他们对德国人士官的反感情绪喷涌而出，再加上对战争及军中事务的不满，一时之间事件频发。在刚修理过的“普吉切利”号鱼雷艇发生事故时，因为舰长是德国人，水兵们便叫嚷着“干掉德国人”，与赶来的巡洋舰部队的司令发生了对峙。除此之外，在“保罗一世”号战列舰与“俄国”号巡洋舰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¹¹¹⁴1915年10月19日，在“甘古特”号战列舰上，因为伙食方面的问题，水兵们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众人叫嚷着“干掉德国人”并发动了哗变。此次事件共逮捕了95人，34人被送上军事法庭。虽然有两人被宣布处以枪决，但实际只有1人被处死，还有24人被判处徒刑。对于此次事件，赫尔辛福斯最高统帅部的革新派军官雷格尔特恩中校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感想，“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具有象征意义。¹¹¹⁵

到了1915年年中，波罗的海舰队的大多数舰船上都有了水兵的活动家。他们开始组织团体，希望与首都的革命党派互相联合，并试图找到印刷传单的方法。他们之中既有社会革命党人，也有布尔什维克党人。10月，宪兵总部发现从第1海军兵团逃走的水兵（同时也是社会革命党活动家）佩利霍夫同喀琅施塔得的活动家有秘密接触，而这些活动家既包括社会革命党成员，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党成员。¹¹¹⁶同年年末，喀琅施塔得水兵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被告发。该组织的核心领导人有斯拉特科夫、库兹涅佐夫·罗玛金、皮萨雷夫、乌里杨佐夫等。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与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有联系。12月末，在驶入喀琅施塔得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号战列舰上，印有社会民主工党党名的传单被大量散发。斯拉特科

夫是这艘战列舰的炮兵下士，该战列舰上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达到了11人。12月28日，斯拉特科夫被逮捕。1916年1月25日，在第1海军兵团内开始了清查革命分子的行动。^[117]

1916年7月，“喀琅施塔得军人组织中央集团”这一组织被当局发现。该集团通过伊瓦苏工厂的疾病互助基金会书记、布尔什维克党的艾格利特，与布尔什维克党的首都组织取得联系，又被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琅施塔得军人组织中央集团”。^[118]然而，随着1916年7月艾格利特的被捕，该组织也走到了尽头。^[119]后来有报告称其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的水兵共同活动的组织”，“在形式上为无党派组织”。^[120]该组织于同年9月被揭发，共有107人接受了调查，其中水兵约30人，士兵约70人。最终只逮捕了6名水兵和8名士兵。^[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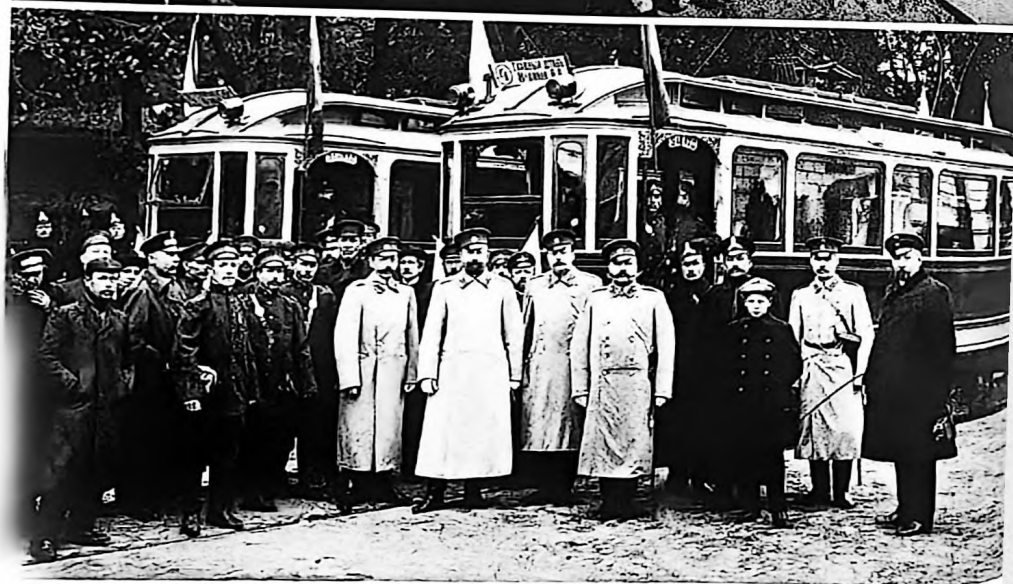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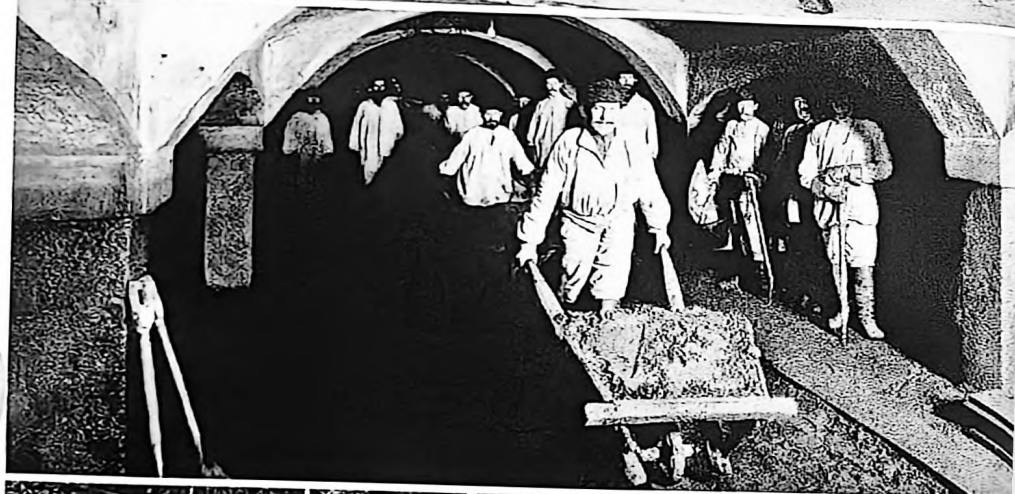
从10月26日至11月1日，喀琅施塔得军事法庭对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布尔什维克政党组织的20名成员做出判决。乌里杨佐夫被判处8年监禁，斯拉特科夫及布雷恩金被判处7年监禁，艾格洛夫被判处4年监禁，15人被无罪释放。^[122]

总之，此后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革命活动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之中。 180

城市工人

除了工厂工人以外，首都还有许多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包括铁路职员、市区电车工作人员、汽车司机、马车夫、手工艺人、商店与餐厅酒店等各类服务行业的服务员、医院护士、药店的药剂师、

15人被无罪释放 其中一人由于精神出现异常，被送入医院治疗。参见 N. A. Khovrin, *Baltiitsy idut na shturm*, Moscow, 1966, p.45。



除工厂工人以外，首都还有各
种各样的平民
上：街头揽客的马车夫
中：建筑工地上的工人
下：市营电车公司的职员

女仆、用人、马夫、杂役、保安、木匠、泥瓦工、石匠、水泥工、油漆工、邮政电信行业从业者、政府机关与公司、银行基层员工、小学教师等。这些人的具体数字难以统计。1910年俄国曾做过一次人口普查，之后未再普查过。

我们可以通过1910年的这个唯一的数据，了解到首都经济自给人口（靠自己的收入生活）的职业构成状况（参见177页表3）。^[123]

表3中的“工业”一栏，除工厂工人以外，还包含手工业者及建筑行业工人。这个数字中如果将1914年的工厂工人去掉，还剩约10万人。虽然其中有不少是商店的店员，但值得注意的是，女仆、用人、杂役、保安等从业者的数量极为庞大。营业及非营业性职员中也有一部分应当归类为工厂人员。但即使不把这一部分人员计算在内，这部分城市平民的数量也达到44万人，远远超过工厂工人的数量。

不过，在1910—1914年期间，首都总人口增加了约31.1万^[124]，¹⁸²所以城市平民的数量相应有所增加。但是，战争时期男子必须应征入伍。与适用延期政策的工厂工人不同，城市平民并不享受该项优待政策，他们必须奔赴战场。另外，为了躲避应征入伍，很多人选择进入工厂就业，因此，战争时期城市平民的人数应该下降了不少。但即便如此，在革命前夕，该阶层的人数也相当可观。

战争时期物价高涨，给予这一阶层群众沉重打击*。工人尚可以通过罢工取得加薪的胜利，而城市平民却没有这样的方式。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能像工人那样获得一定补助，这使得他

给予这一阶层群众沉重打击 莫斯科安保部长在1916年10月的报告中指出，与获得涨薪的工厂工人相比，官吏的薪资没有上调，“他们生活困顿，食不果腹，连最基本的需求也得不到保障”（IA，1960，No.1，p.209）。

们的生活更加困苦。其中最可怜的是出征士兵的家属。为此，市议会成立了统计局进行调查，对于生活特别贫困的家庭，由当地的社会救济署每月发放3—5卢布的补贴，但这完全是杯水车薪。主妇们会干一些缝制士兵内衣之类的副业，但这并不能增加多少收入。^[125]战争期间，苦于饥饿的妇女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卖淫频次增至平常的4—5倍，部队营房周边的性病患者增加了10倍。^[126]这些女性大多来自贫困的城市平民家庭。

城市平民一般不具备参选国家杜马议员的权利。铁路职员、邮政电信行业职员在1905年革命时曾积极参与活动，但此后罢工及结社活动遭到禁止，之后就再未参加过工人运动。虽然他们也曾尝试过建立店员、建筑工人、公司职员的联盟组织，但他们的尝试影响范围极其有限。一般来说，城市平民是最为卑微的阶层。在政治方面，他们盲目崇拜沙皇，对工厂工人也有抵触，有时会成为俄国国民同盟等右翼团体的群众基础之一。^[127]

在开战初期，很多参与排外反德示威以及打砸德国大使馆的民众就来自这一阶层。7月19日，有50名革命群众在涅瓦大街上高呼“反对战争”，挥舞着红旗，高唱《马赛曲》（法国国歌），示威游行，而当时正是这些城市平民阶层的人冲着示威者大喊“叛徒、卖国贼……”，并殴打了他们。^[128]

但是，生活的危机也逐渐呈现在他们眼前。1916年10月，首都安保部长呈给警卫安保局的报告书，就很好地反映了城市平民的心情。

今年9月初，首都居民的各个阶层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的愤怒情绪，人们的言语中也越发频繁地出现对当局的不满以及对政府政策的无情批判。到了月末，这一反政府的氛围……甚至超过了1905—1906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人

们公开表示“当局被收买”，也开始毫无顾忌地谈论战争带来的痛苦以及对每天艰苦生活条件的不满。^[129]

不可忽视的是，他们那些在工厂工作的家人将工厂的氛围带回到了城市平民的家庭之中。^[130]但是，他们几乎未将这些不满表达出来，而是直接走向了革命。

表1 参加政治罢工的首都工厂（人数大于500人的工厂，标*者为官营工厂）

工厂	革命前夕的 工人人数	1915年8 月和9月	1916年 1月9日	1916年 3月	1916年 10月	1917年 1月9日	1917年 2月14日	1917年 2月23日	1917年 2月25日
I 维堡区	75743	00	0	0	0	0	0	0	0
伊瓦苏机械制造厂	4087	00	0	0	00	0	0	0	0
新莱斯内尔工厂（机）	7720	00	0	0	00	0		0	0
巴兰斯基工厂（机）	5043	0		0	00	0		0	0
旧帕尔维文宁（机）	2613		0		00	0	0	0	0
雷诺（俄国）汽车制造厂	1695	0	0	0	00	0	0	0	0
爱立信通讯机制造厂	2211	0	0	0	00	0		0	0
诺贝利机器制造厂	1597	00	0	0	00	0		0	0
旧莱斯内尔（机）	1111	00	0	0	00	0	0	0	0
新帕尔维文宁（机）	4919	00	0		?	0	0	0	0
普罗梅特钢管厂	3189	00	0	0	0	0	0	0	0
菲尼克斯机械工厂	1940	0	0		?	0		0	0
罗森克兰茨钢及合金铸造厂	3094	0	0	0	0	0	0	0	0
彼得格勒金属制造厂	6704		0	0	0	0		0	0
彼得格勒电装工厂	992					0		0	0
俄国光学厂	987							0	0
彼得格勒枪弹制造厂*	8237					0		0	0
新兵工厂*	4669		0		0			0	0
尼古拉斯卡亚纺织品厂	1498				0	0		0	0
维堡纺织厂	950		0		0	0		0	0
涅瓦棉线涅夫卡工厂	2700				0	0		0	0
列别杰夫亚麻厂	998				0	0		0	0
桑普索尼耶夫卡亚纺织厂	1591								
科尼格制糖厂	650								
（上述23家工厂）合计	69195								
II 诺瓦亚·斯村地区	3083								
俄国波罗的海飞机制造厂	500	0	0	0	00	0	0	0	0
列别杰夫飞机制造厂	987	0			00	0	0	?	0
薛提宁飞机制造厂	662	00			00	0	0	0	0
谢苗诺夫木材加工厂	646		0						0
（上述4家工厂）合计	2894								
III 彼得格勒区	37840								
杜富雄电机厂	823	00	0	0	0	0		0	0
谢苗诺夫机械厂	808	0	0	0	0	0	0	0	0

续表

工厂	革命前夕的 工人人数	1915年8 月10日	1916年 1月9日	1916年 3月	1916年 10月	1917年 1月9日	1917年 2月14日	1917年 2月23日	1917年 2月25日
兰拔吉源机械厂	1495	○			○	○	○	○	○
伏尔铿器具制造厂	2907	○○	○	○	○	○	○	○	○
赫提宁飞机制造厂	1933	○		○		○	○		○
费菲列破甲弹厂	960		○	○	○	○		?	?
彼得格勒锅炉厂	3383								
普耶尔电机厂	947								○
洛伦兹通讯机制造厂	800				○	○			○
詹姆斯·贝克纺织厂	1257		○		○	○		○	○
列昂诺夫印花厂	607		○			○			○
军用服装厂*	3149								
克斯滕洗衣店	2528							○	○
科恩装订印刷厂	1613					○			○
基尔捷纳纸烟厂	930								○
兵工厂*	1059								
库默·罗森菲尔德煤炭厂	912								
(上述17家工厂) 总计	26111								
IV 瓦西里岛区	51876								
顿涅茨克宇里斯科公司制钉厂	1852								○
S&H电机厂	1863				○				○
西门子-舒克特军需工厂	3095				○				○
西门子-舒克特发动机厂	1847								
彼得格勒锯木厂*	17076								○
波罗的海造船厂*	7107								○
联合织染厂	2700						○		○
军用长筒厂	2654								○
北部纺织品厂(旧)	1013								
北部纺织品厂(新)	783								
沃罗宁·利切·切恩尔印花厂	908								○
奥西波夫皮革厂	1281								
帕瓦诺夫皮革厂	554								○
拉费尔烟厂	2363								○
马库斯印刷厂	619								○
俄国文具厂	797								
(上述16家工厂) 总计	46512								

续表

工厂	革命前夕的 工人人数	1915年8 月和9月	1916年 1月9日	1916年 3月	1916年 10月	1917年 1月9日	1917年 2月14日	1917年 2月23日	1917年 2月26日
V 纳尔瓦区	38784								
安加拉器具制造厂	544								
布拉哥达列夫(机)	664								
安萨尔器具制造厂	600					○	○		
雷斯皮拉特尔防毒气体厂	7000								
特列高利尼克橡胶厂	15338								
沃罗宁·利切·切思尔印花厂 列涅比乌工厂	500								
涅瓦第二棉线厂	1609								
俄国纺织厂	1131								○
马克思石版印刷厂	699								
国家印刷局*	8242								
(上述10家工厂) 总计	36327								
VI 贝加尔格夫区	36148								
普契洛夫工厂(机)·	26097	○		○		○	○	○	○
北部器具锅炉厂	1549	○○				○			○
兰根吉潘铸造厂	868	○							○
勃伦铸钢厂	1370								
奥德纳尔器具制造厂	500					○			
叶卡捷琳堡纺织厂	920								
佩伦化学工厂	698					○	○		○
(上述7家工厂) 总计	32002								
VII 莫斯科区	21078								
迪拿摩电机厂	2307	○	○	○	○	○			○
西门子-舒克特发动机厂	2006	○	○		○	○			○
彼得格勒车辆厂	1918		○	○		○		○	○
亚瑟科·佩尔器具制造厂	640	○			○	○			○
西格尔器具制造厂	692				○	○			○
斯科洛赫德制鞋厂	4900				○	○			
涅瓦制鞋厂	1344	○	○						○
(上述7家工厂) 总计	13707								
VIII 科洛姆纳区	10480								
法俄合资机械制造厂	6658		○		○	○		○	○
海军造船厂*	4500								○
乔治·博尔曼点心厂	685								
(上述3家工厂) 总计	11841								

续表

工厂	革命前夕的 工人人数	1915年8 月和9月	1916年 1月9日	1916年 3月	1916年 10月	1917年 1月9日	1917年 2月14日	1917年 2月23日	1917年 2月25日
IX 阿米拉切、喀山、斯帕斯克达利尼地区	5660								
新海军造船厂	6141								
X 第一市区	32769								
彼得格勒大炮厂*	2716							○	○
圣加利尔铸造厂	1212					○	○		○
西堡器具制造厂	904	○				○			○
大学联合工厂	1200								
北部钢铁厂	1055					○			
精密设备	604				○	○			○
科杰夫尼科夫制棉厂	683	○							○
新棉纺织厂	1857								○
阿拉夫佐夫斯基制服制造厂	734								
雷曼印刷厂	705								
波格丹诺夫烟厂	1916								○
科洛彼夫 & 博布洛夫烟厂	804								○
沙波什尼科夫烟厂	1718								
布里特·罗宾逊点心厂	1109								○
(上述14家工厂) 总计	17217								
XI 涅瓦区	38208								
奥布霍夫(机)*	10598					○	○		○
涅瓦造船厂	6141	○				○			
阿特拉斯·彼得格勒器具制造厂	713					○	○		○
尊亨器具制造厂	931					○			○
维尔希器具制造厂	508					○			○
珀拉器具制造厂	738								
彼得格勒器具制造厂	1072								
贝尔棉织厂	1939								○
彼得罗夫斯卡亚纺织厂	1651								
斯帕斯卡亚纺织厂	1371								
桑顿毛织厂	2641								○
涅瓦文具厂	500								○
涅瓦硬脂酸加工厂	1173								
罗斯切亚叶夫砖瓦厂	521								
(上述14家工厂) 总计	30497								

续表

工厂	革命前夕的 工人人数	1915年8 月和9月	1916年 1月9日	1916年 3月	1916年 10月	1917年 1月9日	1917年 2月14日	1917年 2月23日	1917年 2月25日
XII 奥夫塔地区	4273								
奥夫塔纺织厂	900	○				○		○	○
XIII 波利斯特洛沃—火药工厂 地区	18931								
奥夫塔火药厂*	5157								
奥夫塔炸药厂*	10102								
普洛梅特公司替罗斯特罗布 工厂	753	○	○	○	○	○		○	○
(以上3家工厂) 总计	16012								
XIV 罗日杰斯特温斯克区	10233								
涅瓦纺织厂	2285								○
涅瓦第一绕线厂	2001								○
谢夫谢洛烟厂	814								
(以上3家工厂) 总计	5100								
XV 所属地区不明									
泽勒诺夫·基明金属工厂	633								
利亚诺泽夫自动弹药工厂	500								
摩切莱耶夫化学工厂	1060								
(以上3家工厂) 总计	2193								

1. 地区分类和革命前夕各个地区的工人数量参见 Z.V. Stepanov, *Rabochie Petrograda v period podgotovki i provedeniia Oktiabr'skoi vooruzhennogo vosstaniia*, Moscow-Leningrad, 1965, p.30。但是, 雷斯诺伊区归入了维堡区。如果从与行政警区的关系来看, 莫斯科区属于纳尔瓦区第四警区, 第一市内地区包括利切伊娜亚和莫斯科、亚历山大·涅夫斯卡亚这三个警区, 涅瓦地区包括什利谢利堡和亚历山大这两个警区。
2. 工人人数规模超过500人的工厂、工人数量、所在地区参考的是 *Istoricheskii arkhiv*, 1960, No.1, pp.79-116 中公布的全国工厂一览表的数据, 根据所在地区, 分区域进行了分类。工厂一览表由苏维埃政府统计局于1918年1月以工厂检查官1916年的资料为基础制作而成。之后笔者又根据 *Istoricheskii arkhiv*, 1961, No.5, pp.163-165 中公布的1916年12月1日的全国官营工厂一览表补充了数据。
3. 关于是否参加了斗争, 基本上可以通过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gg. Dokumenty i materialy*, Leningrad, 1958 获得证实, 并且根据本章注释中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进行了补充。关于2月23日和25日的数字, 基本源自 A. Shliapnikov, *Semnadtsatiy god*. Kn. 1, pp.318-324, 324-326 中公布的首都安保部长报告中的“参加罢工工厂一览表”。
4. [?] 表示的是理论上应该参加了罢工的工厂, 但尚无相关资料可以证明。

表2 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构成（1917年1月1日）

1909—1911年入伍	12760	15.5%
1912—1916年入伍	52650	64.0%
1904—1908年入伍·再入伍	14044	16.6%
长年服役	2466	3.0%
志愿者	704	0.9%
总计	82625	100.0%

(V.V.Petrash, *Moriaki Baltiiskogo flota v bor'be za pobedu Oktiabria*, Moscow- Leningrad, 1966, p.17.)

表3 1910年首都的经济自给人口

职业类型	单位（1000人）	%
工人	504.0	42.5
其中 工业	350.2	
商业保险业	77.0	
运输业	51.6	
饮食店	25.2	
女仆、用人、杂役、保安	189.0	15.9
小计	693.0	58.4
雇主	44.3	3.7
个体经营者	76.0	6.5
营业性职员	40.7	3.4
非营业性职员	66.0	5.5
自由职业者	14.6	1.2
依靠利息生活者	39.0	3.3
依靠抚恤金生活者	55.8	4.7
军人	47.5	4.0
其他	71.3	6.1
暂时性待业	38.5	3.2
总计	1186.7	100



首都的民主党派 189

布尔什维克党的施略普尼柯夫



“工人团”的格沃兹杰夫



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在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地下党是如何推动首都民众参加革命的呢？在俄国，站在民众一方的各政治派系被称为“民主党派”（demokratiia），其活动内容与社会主义党派相同。在首都民众中开展活动的民主党派中，势力最强的要数布尔什维克党。它的正式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准确地说应该是“列宁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大派别中的一个党派，成立于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全党大会，该次大会也是社会民主工党实质上的建党大会。1904年，随着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进一步分裂，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与孟什维克党具有不同革命路线及独立的中央及地方组织的派别，迎来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革命）。然而，从1905年10月开始，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趋势不断增强。1906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与孟什维克党再次组建为一个统一政党，二者作为党内的不同派别一直保持团结。

在革命理论方面，孟什维克党主张非连续两阶段革命理论，即把确定资产阶级的权力作为当前的革命目标，与此相对，布尔什维克党主张连续两阶段革命理论，即把确定工农民主专政作为当前的革命目标，其农业纲领是要求土地国有化。在革命战术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主张以工人武装、“战斗队”为核心的武装起义论；孟什维克党认为不应加入临时革命政府，而布尔什维克党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允许加入临时革命政府，并且必须向其施加“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不断带来的压力”。¹⁹¹ 对于在1905年革命高潮时诞生的工人

191 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最初对其持否定意见，但在1906年将其定位为“一般性革命斗争机构”，要求必须加入，并视情况掌握组建的主

动权，尽可能广泛地使工人、农民、士兵、水兵代表加入其中，最后甚至将自身的公开路线定为将苏维埃建设成为依附于革命军队的临时革命政府。^[2]但无论是列宁，还是布尔什维克党，一直都想建立一个与苏维埃这个超党派组织相抗衡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3]顺便提一下，孟什维克党基于“革命自治论”，即在全国以不合法的方式构建一个人民代表机关网，通过其压力获取召开立宪会议的胜利，由此掌握组建工人苏维埃的主动权。孟什维克党将工人苏维埃定位成“为夺取革命胜利而斗争的超党派大众性工人组织”，把它和全俄工人大会这个设想联系在了一起。^[4]

1907年的后半，在革命的急速衰退与反弹中，无论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再次组建的统一政党还是布尔什维克党，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迅速瓦解。孟什维克党分裂为取消派（代表：波特列索夫）、“《呼声报》”派（代表：马尔托夫）、托洛茨基派、普列汉诺夫派（护党派）四个党派；民族组织分裂为立陶宛、波兰、在俄犹太工人总同盟（崩得*），拉脱维亚地区社会民主工党，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中有人退出政治运动，剩下的活动家分裂为三派，分别是左翼的“社会主义联盟”、右翼的布尔什维克党调停派、列宁派（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5]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把目标转向了列宁派和普列汉诺夫派勉力支持的残留在各地的非法组织。1911年夏天，他把自己在巴黎郊外的隆瑞莫党校教过的学生奥尔忠尼启则等人派往俄国各地，9月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在该组织委员会的号召下，1912年1月，有11个地方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布拉格协商会议。该会议决定，承认取消派的退党，重建非法党，并组建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奥尔忠

* 崩得（Bund）：全称为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世俗犹太人社会主义政党，活跃于1897年至1920年期间。

尼启则、马利诺夫斯基等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除去国内的普列汉诺夫派和布尔什维克调停派的部分成员，其他派别都不承认该会议。¹⁶¹ 因此，该会议表面上采取了重建旧党的形式，实质上却可以理解为创建了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党。

以这种形式重生的布尔什维克党，在1914年“一战”开战前夕已经具备了相当雄厚的组织力量，掌握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工人革命领导权。首先，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在书记处工作）组成的中央指挥部，转移到了比首都晚3天才能看到报纸的波兰的克拉科夫附近，在那里指导国内的党派活动。¹⁷¹ 在国内指导工作的中央委员中，布拉格协商会议后又增加了委员斯大林和加里宁等5名候补委员，此后，彼得罗夫斯基等另外2人也增补为中央委员。¹⁸¹ 由于他们屡遭逮捕，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从主要的工业六省的工人阶层（参见第1章第13页）中选出的6名布尔什维克议员对之加以协助，并成为国内布尔什维克党活动的中坚力量。其中的马利诺夫斯基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并担任了第一届议员团团长。但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俄国安保部门的密探，这在后来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布尔什维克党合法发行了日报《真理报》和3种机关报。《真理报》从1914年年初到6月，发行数量从2万份增加到4万份，远远超过孟什维克派日报（1.6万份）和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每周发行3次，共1.1万份）的发行量。截至1914年7月1日，订阅《真理报》的读者中，有3125人来自首都，有8409人来自其他地区。¹⁹¹

另外，布尔什维克党也在多家工厂的疾病互助基金会理事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成功使知识分子党员担任书记员一职，并把这些理事会发展成了工厂内党员的活动据点。¹¹⁰¹ 1914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47—53个工厂互助基金会中35—37个互助基金会的支持，并在中央保险委员会、首都和各省保险审查会的工人委员选举中获

得了绝对胜利，拿下了绝大多数席位。^[111] 工会方面，在1914年的20个工会（工会人数为2.2万人，组织率约10%）中，布尔什维克党包揽了14个工会的执行部门，其中包括最大的金属工人工会。^[112]

开战前夕，布尔什维克党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由施密特、安奇波夫、费奥多罗夫、伊奥诺夫、舒尔卡诺夫、伊格纳季耶夫、塞斯茨基等7人组成。然而，后面这3人都是俄国安保部门的密探。^[113] 193

在没有政治自由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能有这样的组织能力，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正是在这样的力量下，1914年，布尔什维克党或单打独斗，或与社会革命党一起，呼吁并指导了工人斗争。^[114]

开战前夕的“七月斗争”（参见第3章第143页）充分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力量，同时也可以明显看出其局限性。在斗争开始之前，党中央没有认识到奥匈帝国王储被暗杀会引发世界战争这一危机，忽视了巴库石油工人的长期罢工，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党大会的准备上。^[115] 首都的党组织独自开展活动，通过合法日报的宣传以及布尔什维克议员的暗中帮助，充分发挥其力量，使工人们参加到斗争之中。^[116] 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是进行三天的总罢工，在最后一天举行示威游行。然而，工人活动脱离了既定方针，发展为激烈的斗争。刚从列宁身边回来的新任中央委员基谢廖夫错误地认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有力量的组织来指导运动，也没有武器，因此，斗争就像烟花一样会很快消散”，他听信了掌权者正准备实施大屠杀这一谣言，主张党组织要保持谨慎。^[117] 在当权者猛烈的镇压下，斗争者接二连三被捕，《真理报》也在斗争的第五天被停刊。^[118] 最终，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未能在斗争达到高潮时给予正确指导，在斗争第

* 布尔什维克党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1914年8月18日，沙俄首都圣彼得堡改称彼得格勒（见第36页）。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因反对首都名称变更，故没有更改自己的组织名称，依旧沿用原名称“圣彼得堡市委员会”。

七天，以地方支持、运动组织性以及自卫手段等方面存在不足为由，宣称现在不是进行决战的最佳时机，呼吁结束斗争。¹¹⁹¹对此，由青年党员组成的团体认为应该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市委员会的这一号召，并自称“左翼多数派代表委员会”分发传单，但当即遭到逮捕。¹²⁰¹布尔什维克党在斗争期间，始终未能将其与世界战争爆发这一危机联系起来，未能明确斗争的意义。

但是，就在大战爆发前夕的17—18日，布尔什维克党终于意识到战争会一触即发的危机，并印刷了写有“反对战争，以战反战”
194 的宣传单发出警示。¹²¹¹这份宣传单虽然没有明确具体行动方针，但至少发挥了让先进工人做好开战准备的作用。

“一战”的爆发给在七月斗争中受到打击的布尔什维克党带来了毁灭性的一击。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列宁被奥地利政府逮捕，经多方努力后才获得释放并逃往瑞士。首都实行严格戒严，工会及工人教育协会被迫解散，仅存的合法机关报也全部被禁止发行。开战后，许多活动家遭到镇压，而在翌年2月上旬，中央委员会代表加米涅夫和5名国家杜马议员被逮捕。至此，布尔什维克党被迫完全转入地下活动。

“一战”使得首都的党员干部及合法的活动家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在7月26日的国家杜马会议上，布尔什维克议员与孟什维克议员一同宣读了反战声明并退场，这一声明中提到：“（无产阶级）保护国民文化财产不受任何侵害，不管其来自外部还是内部。”这可以说是在原则上对国防义务给予了承认。¹²²¹8月1日，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发布的传单宣称，“无论战争给俄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是失败还是胜利，我们都以打倒专制为目标”，却并没有提出“反对战争”的口号。¹²³¹进入10月初，比利时社会民主主义者王德威尔得呼吁与政府进行合作，对此，四名议员以及加米涅夫、律师索科洛夫等人经过多次讨论，最终以“德国的半封建军国主义”和“俄国绝对主义”是工人阶级和民主主义派的两大敌人作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孟什

维克党主流派则称赞王德威尔得的内阁是“自我防卫的正义事业”，回应称“不在俄国开展反战活动”。从这一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党确实与孟什维克党有所不同，但在没有对英法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做出批判这一点上，双方并没有区别。^[24]

另一方面，列宁于8月23日到达瑞士伯尔尼，召开当地党员会议，并于会上通过了著名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决议》。该决议将战争的性质笼统地定义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但值得关注的是，决议谴责第二国际领导层的“背叛”，并认定“沙皇君主政府和它的军队战败为害最小”。^[25] 加米涅夫后来被捕，在预审陈述时，他表示自己是反对列宁的这个纲领的，彼得罗夫斯基在法庭上也没有反对他的律师克伦斯基提出这样的陈述。^[26] 另一位候补中央委员加里宁转向国防派，支持战争，在战争时期退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活动。^[27] 残酷的镇压和思想上的动摇，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党员脱离了党的活动。据悉，有名的政治律师、布尔什维克党议员团的顾问索科洛夫也倒向了国防派。^[28] 195

与此相对，基层的工人党员则较少出现动摇。开战之后，最先行动起来的，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等聚集在第一市区的里高夫斯基国民会馆夜校的工人党员，以及在那里开展文化活动的工人诗人马希洛夫等人。他们早在7月末，就开始以“护党派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的名义印发传单，指出反战的唯一手段是巩固阶级组织，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呼吁相呼应，号召在军队和工人农民中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他们成立的第一市区委员会，为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的全面重建奠定了基础。^[29] 后来，他们在读到列宁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时，曾非常自豪地说，他们“离开党中央向前摸索”，但万幸走了“正确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曾经一度被区联派吞并，但终于在1915年春天走上了重建道路。7月19日，以第一市区、维堡区、纳尔瓦区为

中心，布尔什维克党再次召集了约500名党员，召开了全市会议。^[30] 9月，除了上述三个地区外，又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科洛姆纳三个地区召集了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组织以及学生组织。施密特、扎莱西斯基、巴格达吉耶夫等一批活动家也回到首都，在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开展活动。^[31]

在此期间，党内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于1915年2月重新恢复出版杂志《保险问题》，叶列梅耶夫、波德沃伊斯基、阿尔斯基等人加入
196 编辑部，组成了编辑部的核心成员。如果撇开波德沃伊斯基曾与普契洛夫工厂党组织的关系，就可以避免被政府认定是非法活动。

10月，从国外秘密回国的施略普尼柯夫从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和《保险问题》杂志编辑部中选出人员，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32]

如前所述，重建后的首都党组织首先在1915年9月开展了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工人代表的选举斗争（参见第1章第45页）。最初，彼得格勒市委员会在选举的第一阶段，即在工厂召开选举集会选举代表时，采取了让人们提出“反对选举”口号的方针。该方针在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点——新莱斯内尔工厂惨遭失败，导致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选为代表。之后，党组织将方针改为“在全市选举人会议上提出布尔什维克主张”，终于在9月27日的选举人会议上，成功使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反对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决议案获得通过。这一决议案虽然在之后的重新召开的集会上被否决，但显示了布尔什维克顽强斗争的精神。^[33]

与此次代表选举相关，当年秋天，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再三研究了组建工人苏维埃这一方案，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虽然我们暂时无从得知详细情况，但可以看到，在9月罢工时（参见第3章第147页）成立了全市罢工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于10月开展支持菲尼克斯工厂工人统一大罢工的计划时，再次受到民众的瞩目，并大有逐渐取代工人苏维埃的趋势。^[34] 但是，这个方案似乎首先遭遇了

基层党员对苏维埃的不信任。1915年夏天，彼得格勒金属制造厂党小组以“武装起义时社会民主工党的作用”为题召开了会议。报告者主张，在党领导下的工人苏维埃应该掌握全部权力，但反对者称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才应该拥有权力和领导权，因此应该与其他党派代表建立委员会。持有上述反对观点的是别洛乌索夫。他批评1905年的圣彼得堡苏维埃并未完成被赋予的使命，反而成了“所有政治潮流与倾向的代表的一个大谈话室”，也没有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党小组的大多数成员都支持别洛乌索夫的意见。^[35] 另一方面，身处 197 国外的列宁知晓了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关于成立苏维埃组织的尝试，在10月《社会民主党人报》47号上发表的《几个要点》一文中，加入了有关苏维埃的如下内容：“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其他类似机关应当被看成是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机关。只有同群众政治罢工的发展联系起来，与起义联系起来，才会带来……实在的好处。”^[36] 另外，列宁在给身处斯德哥尔摩的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到，要特别重视苏维埃的规定，“必须慎重对待不切实际的大话”^[37]。施略普尼柯夫回国后，传达了列宁的这一指示。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在2月份分发的传单中，全面认可了列宁的意见。^[38]

1915年夏秋之际，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了战时最大的组织规模，一直到年末由于遭当权者镇压，组织规模受到破坏。尽管如此，在1916年的“1·9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仍然继续呼吁士兵和水兵实现“革命军队和革命无产阶级、全体人民的一体化”^[39]。1916年1月，在中央保险机构工人委员的补选中，布尔什维克取得完全胜利^[40]，但《保险问题》杂志社、施略普尼柯夫与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切尔诺马佐夫之间的对立日趋严重。新莱斯内尔工厂疾病互助基金会的书记员切尔诺马佐夫主张极左方针，获得了主战的劳动党员、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成员们的支持，但他其实是政府安保部门的特务。^[41]

1916年2月发生在普契洛夫工厂的斗争（参见第2章第148页），

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小组的倡导下开展的。^[42]然而在号召开展斗争的传单中，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却提出了“革命性的街头示威以及与军队的联欢”这一前所未有的方针。^[43]但由于没有具体的实施方针，二月斗争未能开启革命运动的新阶段。不仅如此，普契洛夫工厂斗争的失利和三月新莱斯内尔工厂斗争的失利，对以这两个工厂为活动点的纳尔瓦和维堡区的党组织造成了打击。此后，从春天到秋天，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的活动逐渐沉寂，不再活跃。^[44]

198 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再次积极采取行动是在1916年10月。这是因为在老党员安奇波夫和印刷工吉洪诺夫的努力下，布尔什维克党具备了相当强大的印刷能力。^[45]10月上旬，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抓住物价和重税问题，在工厂召开集会，向党员发出指令，让他们宣传这些问题的解决与“旨在建立民主共和制和立即终止战争”的斗争密不可分。^[46]10月13日以后，各工厂的集会都是党员基于这一指令展开的。但是到了17日，三家工厂的罢工以及有第181团士兵参与的游行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之后罢工和游行规模继续扩大，事态的发展开始超出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的预想。《呼声报》第4期活动报告称，几天后，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判断“罢工的示范效果已经完全显现。如果继续扩大……将会在工人间敲响革命的钟声，散布幻想，让他们以为与沙皇制度进行决定性斗争的最后时刻已经来到”。然而，“工人大众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还没有团结起来，地方的工人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因此斗争需要在此告一段落。^[47]在20日分发的呼吁结束斗争的传单上写着：“现在进行战斗还为时尚早，请大家不要受欺骗，那些都是警方活动散布的谣传和挑衅。”^[48]由此可见，圣彼得堡市委员会认为当时广为传播的流言是因警察挑拨而出现的，并对其加以防范。

这一指导方针暂且让工人们在当天重返了工作岗位，但也让民众产生了相当大的不满情绪。前述活动报告也指出：“17日站在工人这一

边的士兵同志们的命运，使他们心潮澎湃。”圣彼得堡市委员会迫不得已采取措施，于23日召开的委员会上决定，在即将于26日对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中布尔什维克分子进行审判的三天之内号召群众进行一日大罢工。^[49]工人们响应这一号召，展开了第二波斗争。

这次斗争后，10月份回国的施略普尼科夫在首都重建了党的领导机构。施略普尼科夫是金属工人，1905年革命后亡命他国，之后在国外当工人。1914年4月，他回到首都，在党中央开展活动。“一战”开战之际，他出现了思想上的动摇，但1914年9月，他在瑞士与列宁会面交流，接受了列宁的思想，1915年成为中央委员。他于1915年11月返回俄国，1916年年初去往美国。1916年10月，他接受列宁的指示，为了重建领导机构返回俄国。施略普尼科夫和从流放地逃出来的扎鲁茨基及莫洛托夫一起，重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扎鲁茨基是工人出身，曾作为首都党组织代表参加过布拉格协商会议。莫洛托夫是知识青年，在战前就读于综合技术高等专科学校的时候，就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1913年遭到逮捕。他们三人分工各有不同，总部则设在维堡区。施略普尼科夫负责与国外和外地的联络工作，扎鲁茨基是首都的党的组织者，莫洛托夫负责出版工作。^[50] 199

不久之后，原中央候补委员斯塔索娃流放期满回到首都，在施略普尼科夫的请求下担任了书记员一职。^[51]这一时期，和国外的联络极度不畅，12月和2月都寄出了报告，但只收到了一次回信。^[52]与外地的联络工作则是通过莫斯科、特维尔、诺夫哥罗德、喀山、哈尔科夫、顿巴斯等地的党组织进行的，只有与莫斯科的联络可以称得上是有组织的。^[53]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将切尔诺马佐夫和支持他的斯塔克等人排除在党的活动之外，避免了党内人员的对立。^[54]在扎鲁茨基的领导下，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增加了不少成员。除了在年末、年初时遭到逮捕的安奇波夫和吉洪诺夫两人外，执行委员会成员在最开始的三人基础上，还增加了战前派布尔什维克党成员修托

格、综合技术高专毕业的土耳马乔夫、战时派布尔什维克工人奥西斯·奥泽利、原孟什维克党护党派成员丘格林、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罢工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斯科罗霍德夫五人。其中，修托格是学生出身，1915年在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工作时遭到逮捕，但于翌年秋天从流放地逃出。土耳马乔夫自开战以来就在学生党员组织内开展活动，1916年成为执行委员。奥西斯·奥泽利来自瓦西里岛区，丘格林曾在列宁的隆瑞莫党校学习。^[55] 不过，这一组织架构最致命的弱点是，担任会计和军队工作的奥西斯·奥泽利是政府安保部门的密探。

200 1916年年末至1917年年初，在警察的集中攻击下，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失去了地下印刷组织^[56]，无论是1月9日的斗争还是2月23日的斗争，都未能印刷传单分发。此外，1月2日的全会上，纳尔瓦、科洛姆纳、瓦西里岛、彼得格勒四个区的代表以及市营电车职工、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塞斯特罗勒茨克组织的代表均被逮捕^[57]，彼得格勒与各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明显被削弱。

其结果是，到了1917年2月，维堡区组织成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唯一的基础。该地区委员会由梅德韦杰夫、莫塞耶夫（新莱斯内尔工厂）、安邱金、朱可夫、纳尔丘克（爱立信工厂）、斯维什尼科夫（旧莱斯内尔工厂）、埃菲莫夫（旧帕尔维艾宁工厂）、洛博夫（罗森克兰茨工厂）、伊凡诺夫（菲尼克斯工厂）、阿列克谢耶夫（彼得格勒电装工厂）、阿加贾诺瓦（普罗梅特工厂）等人组成，和当地先进工厂的工人联系密切。^[58]

从1916年年底党费的缴纳情况来看，旧莱斯内尔工厂和旧帕尔维艾宁工厂交纳的党费最多，俄国波罗的海飞机制造厂和爱立信工厂交纳的党费为前者的三分之二，新莱斯内尔、罗森克兰茨、诺贝尔工厂交纳的党费为最高数额的三分之一。不过，新莱斯内尔的募捐款额非常多。^[59]

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堡区的活动家中，有不少人曾经作为布尔什

维克党成员在诺夫哥罗德省的索尔莫沃工厂参加过1905年革命。他们包括巴甫洛夫（列别杰夫飞机制造厂）、卡尤罗夫（爱立信工厂）、丘格林（伊瓦苏工厂）、斯维什尼科夫（旧莱斯内尔工厂）、斯科罗霍德夫（杜富隆工厂）等。前面三人曾经是索尔莫沃战斗团的核心人物。^[60]

接下来是完全由普契洛夫工厂党员所组成的纳尔瓦区组织，其核心是工厂的疾病互助基金会。据说在1916年年末，在那里工作的40名工人中有25人是党员。其中包括安德烈夫（后来成为斯大林的政治组织成员）、雅戈达（之后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为斯大林服务，后被枪决）。^[61]在1917年1月2日的逮捕行动中，地区代表、市委员塔拉索瓦及地区委员雷米歇夫遭到逮捕，之后由阿法纳谢夫负责与中央联络。根据他的回忆，年初时候的党员人数大概为115人，但在1月份的逮捕行动后锐减到了40—50人。^[62] 201

除此以外，包括彼得格勒区在内的地方组织在1月的逮捕行动之后，悉数遭到破坏。^[63]只有以律师斯图奇卡为核心的拉脱维亚人组织（140人）、以律师波利拉为核心的立陶宛人组织以及爱沙尼亚人组织（75—80人）作为独立性强、团结紧密的组织幸存下来。^[64]以伊凡·拉希亚、泰米等芬兰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也得以存续。^[65]

此外，当时还存在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独立组织。^[66]库拉希柯夫、加里宁等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不胜枚举。库拉希柯夫^[67]曾在瓦西里岛区担任工人律师，是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党时代的活动家，加里宁则是战前的活动家，因为对战争持有不同意见而一度离党。二月革命后，四月举行了党协商会，施密特在会上对革命结束后的党员人数做了汇报。其中，维堡区500人，瓦西里岛区300人，纳尔瓦区800人，小地区的党员人数为40—70人。^[68]整个首都的党员人数约为2000人，这个数字既包括在狱中服刑的人，也包括独立派以及在革命后入党的原布尔什维克分子。革命前夕，全市布尔什

维克党的组织力量明显削弱，在这一背景下，这些独立派的存在值得瞩目。

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与资产阶级市民革命力量关系密切的重要组织——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这是一个在首都民众间开展地下工作的政治组织。

在1915年11月29日再次召开的选举人集会上，被推选出的工人代表组成了这一团体。成员包括格沃兹杰夫（爱立信工厂）、阿布罗西莫夫（普罗梅特工厂）、布洛伊德（莱斯内尔工厂）、古德科夫（列别杰夫飞机制造厂）、叶梅利亚诺夫、库兹明、耶夫·雅科夫列夫（以上3人来自钢管工厂）、科马洛夫（奥布霍夫工厂）、埃姆·雅科夫列夫（普契洛夫工厂）、阿诺索夫斯基（奥夫塔火药厂）等。此外还包括了进入彼得格勒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代表，²⁰² 他们是波捷勃利诺夫、瓦西里耶夫（以上2人来自伊瓦苏工厂）、埃尔晓夫（波罗的海工厂）、卡恰洛夫（普契洛夫工厂）、奥斯塔潘科（奥夫塔火药厂）、希林（彼得格勒金属制造厂）6人。上述中央机构的10人中有9人，地方机构的6人中有5人是金属机械工厂工人，而且一半都是官营工厂的工人。其中科马洛夫、希林、奥斯塔潘科属于社会革命派，剩下的成员均为孟什维克主流派、取消派成员。^{◆1691}

剩下的成员均为…… 近年，社会革命派研究者梅兰科得出结论，认为中央机构的叶梅利亚诺夫、科马洛夫、埃姆·雅科夫列夫以及地方机构的6人均为社会革命派。参见Michael Melanco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Russian Anti-war Movements 1914-1917*,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98, 302-303。

格沃兹杰夫出生于1882年，在1905年革命前一直是社会革命派，但在革命后转投孟什维克。他1909年开始在首都工作，参与了金属工人工会的创建，并担任工会主席。孟什维克的领导人马尔托夫在列举受孟什维克影响而产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高素质工人知识分子”及“杰出的社会民主工党工人”时，首先提到的就是格沃兹杰夫的名字。¹⁷⁰ 阿普罗西莫夫也在该工会担任书记员，曾作为首都孟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参加了1912年8月的维也纳会议，是一名耀眼的活动家，但实际上他也是政府安保部门的密探。¹⁷¹

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10名工人代表根据选举人会议的决定，组成了“工人团”，对该选举人会议负责，并设置了书记处。孟什维克主流派的马耶夫斯基和博古达诺夫也加入了书记处。马耶夫斯基是1905年革命时孟什维克首都组织的成员，也是圣彼得堡苏维埃的组建者之一，后来成了孟什维克主流派的评论家。博古达诺夫则在1915年年初创刊的《我们的事业》杂志（取代了之前的《曙光》杂志）编辑部工作。¹⁷² 他们两人与主席格沃兹杰夫共同组成了“工人团”的领导层。

“工人团”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孟什维克党的主流。孟什维克党拒绝接受1905年革命的成果——1906年宪法体制。1907年，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马尔托夫发表了如下主张：虽然需要新的变革，但为此“多少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以积累有组织的力量”；这就需要通过“民众的压力”，让国家杜马成为革命的直接工具，使得国家权力机关发生变化；要通过合法范围内的活动，为跨越合法框架创造条件；要开展这样的运动，过去的党组织已经派不上用场，要203 从新的合法活动中创建新的政党。这些其实也是老一辈领导人波特列索夫的主张。布尔什维克批判这种想法是“取消主义”“取消派”，而孟什维克主流派索性直接使用这一称呼作为自我定位。¹⁷³ “一战”前的孟什维克党，除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中心的“护党派”以及非

法组织维持派之外，“取消派”占压倒性多数，并且的确实现了“取消”。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孟什维克党进一步分裂。有很多党成员支持俄国与德国交战，这一派别被称作“国防派”（oborontsy），当然，也有反对战争、期望和平的派别存在。在反对战争的“国际派”（internatsionalisty）中，存在各种微妙的差异。

191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军事工业委员会大会首次允许工人代表加入。这是莫斯科的资本家们促成的。他们最初也许是想以此获得与工人的合作，推进战时工业动员。然而，在经历了1915年夏天的政治危机后，到了秋天，无论是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政治态度，还是应邀加入的工人代表的性质，都迅速发生了变化。

从格沃兹杰夫等工人代表的角度来说，加入军事工业委员会可谓正中下怀，因为这样可以推动战时遭到禁止的合法工会运动。他们对于战争的态度，既是“国防派”，也是“国际派”。1915年11月29日的选举人集会通过了工人代表提出的决议。决议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争夺新的市场、压迫弱小落后民族、夺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战争”，只有“争取尽早结束战争……以‘不吞并，无赔偿’为目标的国际无产阶级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一说法与“国际派”的立场相同。但是决议接下来又指出，“工人阶级比有产阶级更加迫切地关心如何从破坏和毁灭中拯救国家”，只有与“应承担一切灾难责任”的“不负责任的政府”进行斗争，才是摆在“工人阶级、所有民主派、所有衷心爱国的救国派面前的课题”。这是从“国防派”的角度对政府进行的批判。关于斗争的开展方式，决议主张“支持资产阶级的一切实际行动，同时积极批判自由主义立场中所有优柔寡断、半途而废及妥协主义的成分，推动资产阶级向现有体制发起决定性的斗争”¹⁷⁴。这又是典型的孟什维克想法的体现。

对于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柯诺瓦洛夫等人来说，自己身边能够有这样的团体当然是求之不得。因此，1915年12月3日，工人代表首次出现在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活动方针。这些应该都是事先与柯诺瓦洛夫等人进行磋商的结果。

格沃兹杰夫在会上宣读了第一个宣言，内容如下：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既然“在国防的旗帜下，实际上……有着征服的计划”，那么其现在的情况既“担负不了保家卫国的责任”，也无法“对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负责”。尽管如此，工人阶级代表仍然决定参加该委员会，“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将与我们利益攸关的、我们所理解的俄国，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受任何侵犯”。

基于这一主张，工人阶级代表提出了“定期召开选举人会议”及“召开全俄工人大会”这两项要求。^[75]后一项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保罗·阿克雪里罗得就已经提出这一主张，并在1906年得到孟什维克党的大力支持。

第二个宣言是关于战争的。宣言指出，“诸民众手足相残的杀戮”导致“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之日”愈来愈远；工人从一开始就认为“战争无益于国家的解放”；要求“立刻结束战争”，实现“没有吞并的议和”以及“基于民族自决权，由人民进行的议和”，签署“国际裁军协定”；“不负责任的俄国政府，在参与世界战争的同时，对本国人民也进行了残酷战争，将国家推向覆没的深渊”；“国家一方也有责任”；因此，“工人阶级及所有民主势力所面临的课题是……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为此我们要“支持正在为国家解放而努力的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切实际举措”^[76]。可见，“工人团”已经不再掩藏其革命的意图。

205

此后，“工人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工人代表加入军事工业委员会。1916年2月，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共有

来自全国20个城市委员会的45名工人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分别来自首都彼得格勒(16人)、莫斯科(7人)、基辅(2人)、鄂木斯克(3人)、罗斯托夫(2人)、乌法、萨马拉、新切尔卡斯克、塔甘罗格、察里津(现伏尔加格勒)、诺伏尼古拉耶夫斯克(托木斯克州)、奥伦堡、阿尔马维尔、格罗兹尼、喀山、维亚特卡、谢尔普霍夫、伊丽莎白格勒(现基洛夫格勒)、雷西瓦(彼尔姆省)、尼古拉耶夫(赫尔松省)(以上15个城市各1人)。^[77]这45名代表从2月25日到3月2日之间,每天都开会进行讨论。马耶夫斯基起草了工人代表在第二届大会上要提出的宣言,但地方代表认为其过于激进而提出了反对意见。草案在修改后获得一致通过,并由格沃兹杰夫在大会上宣读。^[78]

这份宣言在强烈否定战争的同时,坚持无产阶级参加“自卫”。宣言认为,“俄国工人阶级被阻挡在农奴制度这一密不透风的墙壁之外,农奴制不允许他们参加自卫活动”,因此“我们必须摆脱警察制度的桎梏,实现解放”。宣言具体列举并批判了国家的各种压迫政策,斩钉截铁地指出,“在俄国当前的背景下,为人民争取参加自卫的权利,意味着只能立刻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政治条件,权力由人民赋予,由人民将权力交给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除此之外,其他方法均无意义”,主张召开“工人阶级组织”的“全俄工人大会”。^[79]

206 宣言还提议通过决议,同意举办“全俄工人大会”这一要求。该大会由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召集,全国的工会组织、工人文化教育团体、工人协作组织等100人以上的组织均可选出代表参加。^[80]

召开全俄工人大会这一提议,在3月召开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联盟大会上,由柯诺瓦洛夫及涅克拉索夫等人推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建立涵盖各社会团体的全俄联合组织这一更大的设想。当然,不论是全俄工人大会的计划,还是全俄联合组织的设想,都不可能获得政府的同意。

在第二届大会之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古契柯夫向格沃兹杰夫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俄国光明的未来只取决于对德战争的胜利；自己相信“工人阶级高度的辨别能力和旺盛的爱国之情”；“只要我们一天不作为，就是对拿刀抵着我们的敌人的间接或最实际的袒护”，并要求遏制工人的罢工行为。^[81]对此，格沃兹杰夫立即给予了回复。他表示不能接受古契柯夫“社会性和平”的主张，这如同“在爱国主义旗下对人民大众进行冷漠无情的压榨”，绝不能削弱工人阶级这一最活跃的群体的社会力量。^[82]

但是，古契柯夫的要求不容忽视。1916年2月、3月斗争期间，“工人团”向工人发出呼吁，承认工人的不满是合理的，但也批评他们的抗议罢工活动脱离了“社会其他所有进步阶层的运动”，只会“削弱和分散全俄公众与权力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83]在1916年十月斗争时，“工人团”继续发表声明，表示工人的不满情绪是有根据的，但“这种零散的斗争行为游离于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及其他进步阶层运动”，反而“弱化了全国人民与权力间不断高涨的斗争，使其遭遇挫折”，提出召开工人代表选举人集会。^[84]考虑到有传闻称当月在其他城市发生多起骚乱，为了减少“因困苦生活焦虑的人民群众无组织性的、无序的爆发行为”，“工人团”呼吁工人开展“更为有力的、有组织性的行动”。^[85]

然而，这种呼吁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工人团”接下来又从经济层面对经济罢工进行干预和仲裁，开展相关活动，力图成立劳资双方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以及扩大工长制（参见第3章第140页）等。²⁰⁷经济方面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柯诺瓦洛夫等军事工业委员会高层的协助下，采取与首都资方团体进行谈判的形式展开的，但取得的成果几乎为零。^[86]

“工人团”尤其致力于建立工人组织，以在未来的行动中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建立消费合作社，这也是“工人团”最为成功

的一项活动。格沃兹杰夫*担任了1915年2月成立的维堡区职工消费合作社的主席。据说,该合作社的会员数在1917年初增加到了11300人。此外,1916年3月成立了彼得格勒消费合作社,“工人团”在其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古德科夫担任第一任主席,其他两名“工人团”成员担任理事。¹⁵⁷¹在战争时期的严格管控下,“工人团”通过合作社这一形式,扩大了组织根基。位于利特尼大道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总部的“工人团”会议室里,工人们常常齐聚一堂召开会议。

就这样,“工人团”等待着开展决定性行动的時刻的到来。

区联派和初始派

其他的社会民主党派还包括区联派和初始派。

区联派的正式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圣彼得堡市地区联合委员会”(Peterburgskii Mezhduraionnyi komitet),简称为PMRK或mezhraiontsy。这一称呼中地区联合(Mezhduraionnyi)的说法旨在表达对地区组织的重视,谋求建立联合团体。此外,该党派在初
208 期也称为Mezhduraionnyi komitet Ob'edinennykh s.-d(统一社会民主主义地区联合委员会),这当中包含了期盼社会民主党统一的愿望。

该组织成立于1913年2月,核心人物是尤列涅夫(本名康斯坦丁·科罗托夫斯基,波兰人)。他曾作为德文斯克市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成员参加过1905年革命。此外,该组织的成员还包括在《红星报》报社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诺沃谢诺夫、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

格沃兹杰夫 柯诺瓦洛夫在1917年2月17日的国家杜马演讲中,特别强调了格沃兹杰夫领导的生活合作社运动(Gosudarstvennaia Duma, IV - I sozyv, col.1526)。

维克党议员艾格洛夫、“前进派”的弗拉罗夫斯基等人。他们不承认布拉格协商会议，设法“从底层消灭分支派别”，他们希望组成“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团体”，主张重建政党。在当时的众多分支流派中，该组织与普列汉诺夫派结盟，为共同发行《统一报》做准备工作。^[88]

这个组织对“一战”开战进行了具体回应，在思想上，虽然“在最初的一段较短时间内……曾有过迷茫和动摇”，但在7月20日该组织就确定了基本立场，表明将与英、德、法三国的无产阶级开展联合行动，“毫不留情地发出战争宣言”，并立即制作了以“推翻专制，反对战争”为口号的传单。^[89]

在组织层面，骨干成员有圣彼得堡帝国大学学生卡拉汉、阿·艾丽·波波夫，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讲师切尔诺夫等孟什维克党人以及大学生康斯坦丁·苏汉诺夫〔后来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苏维埃主席〕。在布尔什维克党正处于混乱和虚弱之际，他们在瓦西里岛和纳尔瓦两个地区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到1914年年末，其成员达到了300至350人^[90]。

在国外联系方面，该组织与托洛茨基及其周围的国际左派人士结成了联盟。由于托洛茨基是“曾经的孟什维克党人”，秉承“中间路线”原则，且与普列汉诺夫处于敌对状态，所以该组织与托洛茨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在“一战”开战后普列汉诺夫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防派，因此该组织就开始接近托洛茨基等人。乌里茨基（托洛茨基派）甚至主动提出要帮忙把在国外印刷出来的宣传单等物品运回国内。托洛茨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左翼孟什维克）、曼努伊尔斯基、洛佐夫斯基还向成立于1915年夏天的区联派合法杂志投了稿。^[91] 209

他们在稿件中大书特书了“一战”时如何与布尔什维克党开展合作，共同反对选举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代表之事。在1915年11

月29日重新召开的选举人会议上，退出选举的选举人所宣读的稿件——一份84位选举人拒绝参与选举的声明，就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和区联派委员会共同撰写的。^[92]

区联派还开展了一系列行动争取士兵，他们曾以“PMRM军人组织”的名义印发传单^[93]，不断对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驻扎在奥拉宁鲍姆和红村的部队士兵进行宣传。^[94] 在一张现存的发给士兵的传单上，不仅描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以及期盼士兵归来的家属们的痛苦，还明确指出“专制制度的土崩瓦解是不可避免的，广大人民的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追问士兵：当广大劳动人民奋起决战之时，如果沙皇命令你们镇压人民起义，你们将做何抉择？

各位兄弟，各位士兵，你们会怎么做？你们难道想用劳动人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双手吗？不，不能这样，你们绝不能犯下该隐之罪（弑亲之罪）。你们并不须如此，你们也无须扔掉手中的武器，只须把它对准沙皇的专制体制。^[95]

区联派的活动特点是频繁出版刊物，其在1915年夏天出版了3期合法杂志《纺织工人》，还于同年10月成功出版了非法机关报《前进报》的第一期。

1916年3月之后，通过其成员的一个亲戚所经营的印刷厂，区联派开始印刷非法传单。直到革命爆发之前，这种传单都在持续不断地印发着。^[96]

在此期间，区联派不断地遭到警方的搜捕，诺沃谢诺夫、艾格洛夫、卡拉汉、苏汉诺夫等干部陆续被捕，不知所终。弗拉罗夫斯基和波波夫脱离了组织，切尔诺夫由于主张应该与格沃兹杰夫等的“工人组织”进行合作而被除名。^[97] 最高领导人尤列涅夫曾于1915年2月被捕，但在1916年年初的军事法庭上，由于证据不足，他被



尤列涅夫。区联派领导人。旨在统一左翼

无罪释放。趁着检察官提起上诉的间隙，尤列涅夫从首都逃至遥远的辛菲罗波尔开展革命活动。但在当地他再次被捕，作为一名“逃兵”被编入军队中。当尤列涅夫又一次成功逃脱回到首都后，他便以非法身份掌握了区联派的指挥权。^[98]

1916年年末，以伊沙赫·克鲁斯基为首的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的学生团体在该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9]安保部密探于1917年2月21日提交的报告中记述道：“普遍来看，区联派委员会最近趁着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发展乏力，在工人、学生之间显著提升了其影响力。该委员会

现在管辖着已经成立了地区委员会的四个地区：纳尔瓦、涅瓦、瓦西里岛、维堡区，与15个宣传组织以及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煽动家集团……”^[100]

随着革命危机的不断升级，作为社会民主党“统一派”的区联派越来越担心社会民主主义者内部会产生分裂，其间它甚至与更加右倾的孟什维克国际派初始派就统一组织的问题进行过商议，但并未取得成效。^[101] 区联派1916年10月印发的传单上印有“现在并不存在权威性的中央委员会，有的只是可怜的宗派主义和试图用自己的组织来代替党的野心”的字句^[102]，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其对布尔什维克党似乎进行了强烈批判。

区联派在1917年1月9日印发的传单上发出号召，“同志们，人民的愤怒之日、复仇之日、制裁愚弄人民大众的腐败政府的时候即将来临”，并呼吁建立临时革命政府。^[103]

初始派的全称为“孟什维克社会民主主义者圣彼得堡市初始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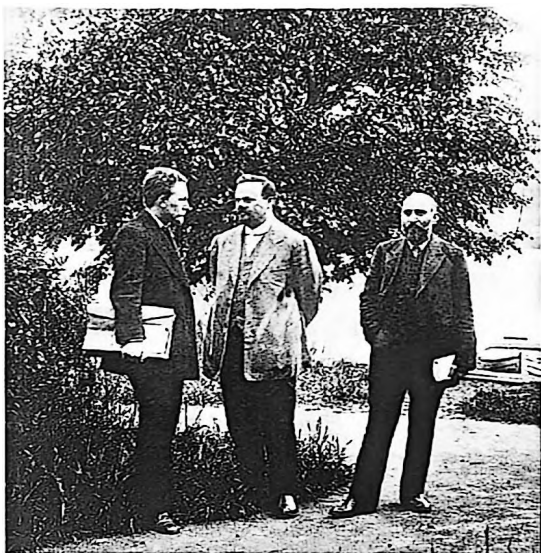
以这一名称命名的组织最早建立于1912年，是首都一个由孟什维克党的主流党派“呼声派”和取消派共同组成的组织。^[104]该组织的领导者们本想建立一个合法组织，但是“一战”爆发后，他们便站到了反对战争的国际派立场上，还印发了以“反对战争”“推翻专制制度”为口号的传单^[105]，因此不再可能成为合法组织。

孟什维克作家埃尔曼斯基（本名柯岗，1867年生）于1913—1914年辞去在土耳其斯坦的灌溉水渠建设调查队的工作，回到首都后便加入了孟什维克党，之后成了组织的领导者。当时，孟什维克党的成员包括工人曼科夫、西伯科夫斯基，知识分子库洛夫马里（加利福斯塔特）、格林纳维奇（修科特勒）等人。埃尔曼斯基还为组织争取到了索科洛夫斯基（谢特勒夫）这名成员。当时，首都的“孟什维克党里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阶级的成员都加入了国防派的阵营”，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该组织成了国际派唯一一处活动点。^[106]

1915年1月9日，初始派还散发了印有“向战争宣战”“反对战争”等口号的传单。^[107]同年秋天，在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工人代表选举大会之时，该组织遵循孟什维克党的主流思想，对选举代表一事持支持态度。但到了1916年8月时，“工人团”违背了当初的约定，初始派批判其为“‘扬扬得意’地高举帝国主义和防卫旗帜之徒”，并印发传单，宣布与他们断绝关系。^[108]

初始派虽与国外的组织毫无联系，但是在俄国国内与流放于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采勒切利、丹等国际派孟什维克党成员保持着联络。丹从流放地逃回首都后与埃尔曼斯基有过面谈，但是埃尔曼斯基在事后写到，二人并没能进行深入沟通。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也并非那么亲密。相反，萨马拉的孟什维克党组织对战争持反对态度，为如何应对军事工业委员会选举工人代表一事伤透了脑筋，最后他们向首都的初始派组织寻求解决方案，也因此加深了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埃尔曼斯基也在萨马拉的杂志上发文批判军事工业

孟什维克议员团成员。从左至右依次为斯科别列夫、契恒凯里、齐赫泽



委员会“工人团”，以此来声援孟什维克党组织。^[109]1916年，波特列索夫编辑并出版了文集《自卫》，埃尔曼斯基对此进行了批判，并拉开架势与之辩论。^[110]

在双方对峙的过程中，截止到1916年年末，初始派一共印发了三种传单，口号包括“反对战争，和平万岁”“打倒专制体制”“民主共和国万岁”“争取召开全国人民宪法制定大会的斗争万岁”。该组织遵循了孟什维克派的传统，并不主张成立临时革命政府^[111]，这一点也是其与左派的区别所在。

初始派和齐赫泽、斯科别列夫、契恒凯里、格契科夫、豪斯托夫等孟什维克议员团成员保持着某些联系。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孟什维克议员共有七人，其中议员团团长齐赫泽曾在自己家乡格鲁吉亚长期担任市会议员，且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开始连任过两届国家杜马议员。^[112]斯科别列夫来自外高加索的新宗派莫罗勘派，1905年革命后开始逃亡，其间他虽然作为托洛茨基派成员开展活动，但是回国后被外高加索的俄国居民团体推选为议员。^[113]齐赫泽和斯科

别列夫两人与契恒凯里、格契科夫都曾是共济会的成员。齐赫泽表示争取并介绍其他三人加入组织的人正是他自己。^[114] 我们知道，在战争开始时，孟什维克议员团和布尔什维克议员曾一起开展过行动。但是在那之后，虽然有传言称议员团中的某些成员转为了国防派^[115]，但是齐赫泽和斯科别列夫态度暧昧，一直保持着国际派式立场。然而，埃尔曼斯基对议员团这种死气沉沉且不负责任的态度感到相当不满，特别是对齐赫泽畏惧失败、行动路线不明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称其“在面对重大问题时，极其惧怕承担做出果断决策的责任”^[116]。

最终，孟什维克圣彼得堡初始派究竟拥有何种程度的组织力量这一问题也成了个未解之谜。1916年年末，该组织比较知名的干部是埃尔曼斯基和索科洛夫斯基。安保部的报告称，这两位活动家分别是谢苗诺夫机械厂、帕尔维艾宁工厂的工人，也是疾病互
213 助基金会的职员。^[117]

社会革命党左派

社会革命党左派是指以1916年回国加入该组织的亚历山德罗维奇为核心组成的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团体，这个组织没有专门的名称。

创建于1901年的“社会革命党”（准确来说是“革命社会主义者党”）继承了19世纪俄国的革命传统，是俄国最大的革命党，其特点是主张农民社会主义，成立的战斗组负责策划实施恐怖暗杀。该党派在没有纲领的情况下参加了1905年革命，后于1906年党的第一次大会中制定了纲领。该纲领规定“无产阶级、勤劳农民、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主体。^[118] 与社会民主工党不同，该党自称是一个同时推动农民和工人活动的全民党。1905年革命进入尾声

时，该政党得到了四成首都工人的支持。1907年春天进行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是唯一一次社会革命党没有进行联合抵制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首都市区的工人法庭（curia）推选出的选民代表里，有四成是社会革命党人。^[119]

但是，社会革命党缺乏根本上的统一管理，组织松散，所以在革命低潮期“加速了自身的解体进程”^[120]。1909年1月，党中央宣布：自建党以来一直担任党的干部的战斗组负责人阿泽夫是安保部的密探。至此，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121]

“一战”开战前夕，社会革命党虽然对其首都的组织进行了一定重建，但是开战给该党派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据社会革命党的批判主义知识分子回忆：“说起彼得格勒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几乎全都是彻头彻尾的爱国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信徒。”据说当时只有评论家伊瓦诺夫-拉兹莫尼科一人反对战争，但那也是“孤掌难鸣”^[122]。劳动派议员团在国家杜马中共有14人，克伦斯基作为议员团代表在1914年7月26日的国家杜马会议上宣读了“亲爱的农民和工人朋友 214 们……让我们合众人之力，保卫国土，解放国土”的号召宣言^[123]，但这被认定为国防派宣言。社会革命党工人中有反战声浪，故而反对该宣言。

克伦斯基此前一直致力于重建社会革命党。1915年7月16日和17日，克伦斯基在自己家中召开了全国民粹主义者组织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我们会为停战而努力，但是当前的要务是保卫我们的国土；所有政府都应该放弃扩张领土的野心，承认民族自决；不论是在军需补给方面还是在遏制经济崩溃方面，俄国政府都暴露出了它的无能，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普通选举的方式创建一个新政府；现在，我们应该使用国家杜马的讲台进行宣传及组织工作。^[124]

这一决议的主旨倡议社会革命党的工人支持1915年秋季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代表选举，但与此同时，工人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对立。有的成员积极支持选举代表，但有的成员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展开联合行动。左派的代表议员在布尔什维克党人之后发表声明，并退出了于11月29日重新召开的选举人会议。^[125]在那之后，意气昂扬的左派甚至还向布尔什维克党发出了团结合作的信号。^[126]

社会革命党全市协商会议于同年12月8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克伦斯基起草的有关战争的决议。1915年9月5—8日（公历）在瑞士召开了齐美尔瓦尔得国际会议，决议遵循了这次国际会议的精神，号召大家为了实现无吞并、无赔款、民族自决的议和，为了和平而去掌握权力。该决议的结尾处是这么写的：我们要团结所有民主力量实现和平斗争，和平斗争万岁！革命万岁！立宪会议万岁！社会革命党万岁！但是，这份决议遭到了社会革命党工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份决议瞻前顾后、四平八稳。^[127]克伦斯基提出的路线虽然与国防派提出的基本路线相去甚远，但遭到了社会革命党工人的强烈反对。因是否支持1916年1月9日行动一事，新生的社会革命党内部出现分歧，左派和右派互不相让^[128]，这个组织在不久后便瓦解了。此后，社会革命党左派通过与布尔什维克党联合行动的方式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29]

215 在社会革命党工人中，存在着反对战争、批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左翼势力，其对知识分子信任度也很低。另外，安保部的密探曾有计划地潜伏到社会革命党之中，所以即使想重新组建地下组织，最后也会是无疾而终。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斯瓦茨基曾这样写道：“多年以来，社会革命党就仿佛是一间破旧的屋子，它既没有牢不可破的地下组织，也没有像样的指挥部，大家在行动时都是自成一派。”^[130]

1916年夏天，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国外回来之后，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团体。他是日内瓦社会革命党国际派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由切尔诺夫、纳坦松、卡姆克夫等人组成。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是这个组织派来的极富斗争意识的人。^[131] 亚历山德罗维奇与斯瓦茨基会面后，在后者的帮助下与莫斯科区的工人社会革命党联合，不久便成为莫斯科区组织的代表。亚历山德罗维奇曾激烈反对过克伦斯基^[132]，最终在他的努力下，社会革命党的地下组织再一次在战时获得了新生。

1916年10月，安保部长的报告之中有一份关于社会革命党国际派的内部文件，这份文件可能是由亚历山德罗维奇身边的人撰写的。文件里写道：“虽然俄国现在已经无法像1905年那样发动革命，但是却有可能发生由士兵和无产阶级大众发动的联合革命。”该文件还称：“社会革命党在军队内部进行的宣传取得了成功。”^[133]

这个组织没有能力印发传单，它以涅瓦区和莫斯科区为中心开展活动。^[134] 但是，与该组织有关联的伊瓦苏工厂的社会革命党左派成员斯林却是安保部门的密探。^[135]

无党派知识分子

在战争年代，因为政治党派受到政府镇压，许多曾经参与过政治运动和非法活动的人纷纷离开组织，以个人身份继续进行活动。组织瓦解后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成员与支持者们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例子。此外，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无法遵循党就战争制定的方针的人也都离开了党。

216

尼古拉·索科洛夫就属于这类人员，但是他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作为政治犯的律师为各党派的成员辩护，所以深受各党派的信任，被他们尊为进步派知识分子。他

生于1870年，是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第一批马克思主义青年中的一员^{〔136〕}，毕业之后成为一名律师，始终坚守在人权派律师的道路上。此外，他在圣彼得堡苏维埃相关人员的审判中担任过律师^{〔137〕}，还邀请过克伦斯基成为他的搭档。众所周知，他与布尔什维克党走得很近，曾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候选人。^{〔138〕}此外，他还是创建于1912年的共济会的成员之一。虽然有说法称他在战争中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党，加入了支持战争的国防派，但其实他对战争的真实想法无人知晓。也许他是为了作为无党派人士继续活动，才没有明确表明自己反对战争的态度。他一边加强与克伦斯基和齐赫泽等议员的合作，一边充任布尔什维克党议员、海军士兵的律师，承接相关诉讼案件。此外，他还负责在首都民主党各派之间充当调停人的角色，经常将各党派的干部召集到自己家中进行会谈。^{〔139〕}

此外，说到文人政客，就不得不提起高尔基。高尔基的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是社会革命党成员。1905年，高尔基为支持革命前往美国筹集资金时，同行的则是他的情人——莫斯科艺术团的女演员玛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一名布尔什维克党成员。^{〔140〕}在那之后，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党走得很近，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革命后发生了分裂，他便与“前进派”保持着一致的步调。但是在大战前夕他又逐渐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靠拢。1913年年末，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国300周年大赦，高尔基因而从美国回到了国内。虽然战争带来的强烈打击曾让他一度有过动摇，但他及时纠正了自己的想法，站在了反对战争的国际派一方。^{〔141〕}1914年11月，他批判了沉浸于反德热潮中的几位文学家：阿尔志跋绥

圣彼得堡帝国大学 马尔托夫曾是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的学生。他曾写到，在他看来，当时的前辈索科洛夫就是革命的化身。

夫、安德烈夫、索洛古勃、库普林等，并表示：“众所周知，贪婪的不是人民，策划战争的不是哪个民族。德国的农民和俄国的农民 217 一样，他们不追求殖民政策，更不会去考虑怎样瓜分非洲才会对他们更有利等问题。”^[142]

高尔基于1915年4月成立了孤帆出版社，计划请波克罗夫斯基编纂出版一套名为“战前和战时欧洲”的丛书。高尔基还约请了在海外的列宁为这套丛书撰写总论，这篇总论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又称《帝国主义论》）。此外，高尔基还在12月创办了杂志《记事》^[143]，并任命苏汉诺夫担任该杂志的实际主编，他是原《现代人》杂志的编辑之一。苏汉诺夫是原社会革命党党员、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主张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统一。他曾因写过一本宣传册而闻名，该宣传册引用沙皇开战诏书上的内容，批评了米留科夫等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帝国主义性质战争的观点。他的妻子是布尔什维克党成员卡里娜·弗拉克斯曼，两人是在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时候结的婚。^[144]

此外，参与杂志《记事》的编辑和执笔工作的还有：原前进派成员巴扎罗夫、沃利斯基、波克达伊夫；布尔什维克党合法机关报的相关人员阿维洛夫、法贝尔维奇、阿尔斯基等；农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奇米拉扎夫；革新派文学家马雅可夫斯基和什克洛夫斯基等。孟什维克党成员埃尔曼斯基也加入了编纂队伍。可以说，这本杂志具有稳健的国际派风格。^[145]

据悉，高尔基曾凭借民粹党的关系建立了民粹党选区，旨在为将于1916年和1917年秋季结束任期的国家杜马议员的改选做准备工作，他邀请了各界人士并与他们进行洽谈。该选区的负责人是克伦斯基，还有社会革命党的森吉诺夫、苏维彻茨基，人民社会党的苗科钦-卡尔诺夫斯基、斯纳曼斯基，以及劳动派的布拉姆森、柴可夫斯基、贝雷金。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选定了13名预备候选人。^[146]提名 218



森吉诺夫。原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曾帮助过克伦斯基

者中大部分人都只是有着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已，完全没有参与过党组织内部的政治活动。

其中一名预备候选人是森吉诺夫，他在1909年到1910年之间担任过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一职，是一名资深干部。但在第三次流放期满后，他于1914年回到了首都，1915年开始与克伦斯基走得很近并以个人名义为后者提供帮助。除此之外，他也只是向《人民报》投过稿而已，并没有参与过党派内部的相关事务。^[147]

民粹主义党派

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党、革命社会主义者党）

该党于1901年12月达成建党共识，1902年1月发表建党声明。机关报为《革命俄国》。同年4月，社会革命党战斗组发表了刺杀内务大臣的声明。

社会革命党是民粹主义传统的接班人，旨在发动以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致力于恐怖斗争活动。1905年革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尝试在各个阶层建立组织，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905年年末至1906年年初，该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确定了党的纲领。

然而，在1906年宪法体制中，由于该党没有制定开展合法活动的方针，党的活动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局面。1908年年末，有人告发主管战斗组的阿泽夫是安保部密探，这一消息最终被证实，社会革命党因此遭到毁灭性打击，进而解散。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社会革命党的多数党员成为支持战争的国防派（oborontsy），以切尔诺夫为中心的少数人成为反对战争的国际派（internatsionalisty）。但是，在因世界战争而受苦受难的工人和士兵中，出现了一批高举社会革命党旗开始战斗的人。他们是由工人组成的社会革命党左派团体，核心人物是彼得格勒的亚历山德罗维奇。该团体与国外的切尔诺夫等人建立了联系，并得到斯瓦茨基的帮助。

国际派中的稳健派存在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社会革命党成员中。代表人物是艾弗拉姆·戈茨。

原社会革命党干部后来变成了国防派。森吉诺夫是其中当时身处圣彼得堡的成员。

人民社会党（人民社会主义党）

220 1905年革命之后，民粹党和社会革命党中主张进行合法活动、反对恐怖袭击的党员于1906年建立了人民社会党（人民社会主义党）。向杂志投稿的知识分子安年斯基、米亚科钦、佩舍霍诺夫等人是党的中心成员。该党帮助了名为劳动派的议员团体，两者在战争中几乎实现了一体化。在这一时期，党的中心人物是柴可夫斯基和卡尔诺夫斯基等人。

劳动派

该党派是由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当选、且主张维护农民利益的议员组成的国家杜马派，名为劳动派（劳动人民组织）。该党派在第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当选人数超过100人，在选举法修订后，该党在第三、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当选人数减少到了十几人。该党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领导人是克伦斯基。

社会民主党派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该党于1898年发表建党宣言，但由于相关人员全部被捕，所以实际上是在1903年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时才得以建党。当时，该党围绕党员资格问题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严格治党，一派寻求自由治党。前者被称为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后者被称为少数派（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人是列宁，孟什维克派的代表是马尔托夫。在1905年革命中，列宁派以

工人武装起义为目标，马尔托夫派则采取了促进工人和市民自发成立组织的方针。

1905年革命后，两派旨在通过党的统一进行重建，但在当时政治反动的局势下，两个派别又进一步分裂。孟什维克派中一部分人主张解散地下组织，集中力量开展合法活动，因而被称为取消派。取消派的代表是波特列索夫。与此相对，还有一部分主张应该保持地下组织的孟什维克派被称为护党派。普列汉诺夫是护党派的成员之一。

1912年，列宁派吸收了孟什维克派中的护党派，在布拉格召开了只有自己党派成员出席的党代表协商会议（布拉格协商会议）。列宁派在会议上把取消派从组织中除名，并发出了重建政党的宣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列宁派，即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大会。

布尔什维克党成为首都工人的主流党派，在开战的同时，该党虽然失去了开展一切合法活动的可能性，但仍继续代表着首都工人的左翼势力。党的核心领导人中，在国外的有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首都的有施略普尼柯夫，在流放地的有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这个政党中有些人远离了政治活动，也有些人像加里宁一样支持战争。 221

1913年，一个不承认布拉格协商会议精神、谋求自下而上进行统一的团体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市地区联合委员会，并将其称为区联派（地区联合派）。这个委员会的核心人物是尤列涅夫。该团体反对战争，主张进行斗争，虽然与社会革命党左派共同开展活动，但也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着合作。该团体同时还一直与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派保持着联系。

1912年，孟什维克派中产生了一个由孟什维克社会民主主义者组成的圣彼得堡市初始派。该组织对俄国参战秉持着坚定不移的反对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继续开展活动。古列维奇和埃尔曼斯基等人是该组织的中心人物。他们与身处流放地的丹和采勒切利

等人保持着联系。

1912年，孟什维克党在选举出的国家杜马中拥有了议员团，核心人物是齐赫泽和斯科别列夫。他们对战争持坚定不移的反对态度，与初始派关系密切，两者为合作关系。

在孟什维克党的工人中，支持战争的国防派居多。他们中有人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的组建。经由选举，组成了以格沃兹杰夫为核心的首都“工人团”，成员们积累了合法活动的经验，最后与左翼自由主义企业家合作，走向了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道路。这个组织还希望战争早日结束。资深的孟什维克党员马耶夫斯基、博古达诺夫等人都加入了这个“工人团”书记处。此外，“工人团”还与开展联合工会运动的卡佩林斯基和伊·格·沃尔科夫等人保持着合作关系。

第 5 章

首都的革命

二月革命时向警察开枪的叛乱士兵



历来对二月革命的评价均是：这是自2月23日（俄历）开始的为期5天的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活动达到高潮的结果。但是，2月爆发的一系列民众运动的革命本质为：工人上街示威游行、表达政治主张的行为与试图驱散、镇压游行队伍的警察队伍、军队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而孟什维克党邀请工人在2月14日国家杜马开会那天到杜马所在地举行和平示威却遭镇压事件，是引发工人们上街示威游行、表达政治主张的导火索。所以，关于二月革命的叙述*应该从2月14日的国家杜马示威游行开始说起。

开端——1917年2月14日

1917年1月中下旬，协约国在彼得格勒召开会议。1月16日（公历29日），英、法、意三国代表到达彼得格勒。英国的代表是劳合·乔治战时内阁的不管部大臣阿尔弗雷德·米尔纳，他在担任英属开普敦殖民地总督时发动了布尔战争，是一个完全代表英国帝国主义利益的政治家。另外，英国的代表还有列维斯托克、威尔逊将军。法国代表是原殖民地部部长、开战之前的总理杜梅格，与他同行的是卡

关于二月革命的叙述 描述二月革命过程的第一篇文章为《1917年的2、3月》，是首都某报社记者谢苗诺夫在1917年《历史通信》的3月刊上发表的。这篇文章还带有一个副标题“一位小记者的日记”，正式内容从“2月14—24日”这一节开始。“我从这里开始说起”，要求举行国家杜马示威游行的呼声因内务大臣的戒严措施而被镇压，但愈发激烈的民愤和内务大臣推行的严厉措施“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到处都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和镇压。……‘宣传’自然而然，逐渐走向高潮”。谢苗诺夫在开头这样写道（E. P. Semenov, *Fevral'skie i martovskie dni, Istoricheskii vestnik*, Vol.147, No.2, March 1917, p.2）。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被淡忘的日子。

斯特诺将军。意大利代表是不管部大臣夏洛伊亚，与他同行的是卢杰里将军和卡洛蒂将军。在这一天，举行了由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主持的预备会议，三国驻俄大使也出席了会议。俄方出席的代表有炮兵部监军谢尔盖·米哈伊尔诺维奇、财政大臣巴尔克、陆军大臣勃列艾夫、代理总参谋长古柯、海军大臣格里戈洛维奇等。^[11]

18日，参加协约国会议的37名代表来到皇村拜见沙皇，之后终于召开了正式会议。21日（公历2月3日），沙皇在皇宫内为三国代表举办晚宴。^[12]英国大使布坎南被安排坐于沙皇右侧。当晚，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就粮食问题向沙皇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俄国的部分省市存在粮食储备不足的问题，两个月之内可能出现断粮危机。之所以造成这种后果，原因在于农业部和交通部没有很好地完成工作上的对接协调。因此，他提议农业部需要进一步用好地方自治这一制度。沙皇对此表示首肯，并指出：如果工人们吃不上面包，就有可能罢工。布坎南还就如何确保俄军人员数量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俄国并没有彻底使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可以效仿德国的做法，要求全国人民履行兵役追加条款上所要求的义务。沙皇表示正在斟酌这一问题，且有可能采取类似的办法，因为战争问题属于国家层面危机，举国上下应该全力以赴，为国家效力。英国大使在之后回忆道：没想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和沙皇交谈。^[13] 225

确实，此次协约国会议的基本目的是由英法两国对俄国实施援助，让俄国在春季一举发起对德国的总攻击。讨论物资运送和军事补给问题的军事分会是最重要的。但俄方的代理总参谋长古柯在最初发言时提出了如下疑问：“1917年的战斗是否具有决定性意义？难道不应该放弃‘年内必须取得最终胜利’这一想法吗？”这些问题对英法两方代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杜梅格和米尔纳、威尔逊、卡斯特诺等人表示强烈反对，称一定要在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14] 对此，古柯阐述了俄国人力资源枯竭的问题。之所以提及这一问题， 226

是因为考虑到国防特别审议会委员们所提交的意见书。他提到，俄军动员了1400万人，由于死伤200万人，被俘200万人，现存兵力中在前线的为750万人，预备役部队200万人，并表示在新师成立、训练、装备得到保障前，俄军不能进攻，目前只能通过次要作战来牵制敌军的行动。¹⁵¹

在法国代表看来，虽然俄方所要求的武器数量多得过分，但英法两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做出妥协，同意下来。法国的卡斯特诺将军希望俄国在4月15日之前进攻，代理总参谋长古柯却表示俄军会进攻，但在4月15日前进攻是不可能的。¹⁶¹

各位代表，特别是军人代表还慰问了前线部队，但这次慰问给他们留下了消极的印象。不过，英国将军认为法国人的观点过于悲观。¹⁷¹另外，米尔纳等英国代表访问了莫斯科。代表莫斯科自由主义势力的李沃夫公爵和恰鲁努克夫与他们会面，并警告英国人：如果沙皇不改变他的态度，三周后将爆发革命。¹⁸¹

2月8日（公历21日），各位代表在会议结束后离开了首都。会议期间，沙皇、内阁和各部门日以继夜，精心准备了豪华的晚宴、招待会，但作为东道主的俄国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感到俄方的努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样的午餐和晚餐给代表们留下的印象绝不会好。可以想象这种事对外国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没有国家像我们这样大手笔，就好像战争结束了，而且是胜利者似的，仿佛国内物资丰富，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与会的代表都很清楚。”¹⁹¹

法国大使帕雷奥洛格拜托回国的杜梅格和卡斯特诺将军捎了口信。

请代我向共和国总统和总理转告，留在当地的我现在感到很不安。俄国的革命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这场危机本可能在五

周前爆发，现在只是被延后了而已。俄国民众对战争的兴趣日益减退，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在各个阶层乃至军队中蔓延。…… 227

我的结论是，时代已离我们而去，至少对俄国而言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做好这种联合体制遭遇失败的思想准备。^[10]

正在这时，支持皇权与支持革命的两派开始交锋。从1917年年初起，当权者注意到“工人团”有危险倾向，开始对其进行直接镇压。1月3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给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古契柯夫主席送去信函，称“工人团”召开的政治集会是非法的。之后，他会让警察出席这类会议，因此集会前要事先提出申请。若拒不执行这一规定，将禁止集会召开。在那之后，发生过两次所属部门的部长闯入位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总部“工人团”所在房间的事情。^[11]

这时，1月16日，“工人团”终于决定呼吁民众在2月14日，也就是国家杜马再次召开之时前往国家杜马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成立了宣传小组，并派发了自制的宣传文件。^[12]很明显，事务局的孟什维克党人马耶夫斯基、博古达诺夫等人加入了这个宣传小组。这个宣传小组是考虑到当局会进行镇压而设置在“工人团”这个合法团体中的秘密组织。

呼吁大家到国家杜马示威游行，就是在战争时期呼吁在首都中心开展一场和平示威活动，具有划时代意义。其深层含义是再现1905年革命的序幕——东正教加邦神父率领工人及家属数十万人举行的冬宫请愿活动，也就是呼吁公开发起革命运动。这项呼吁应该是在和柯诺瓦洛夫等人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的。1月末，安保部门的特工也在给时任警卫安政局局长的内务大臣的报告中表示，这一阴谋是由柯诺瓦洛夫推动的。^[13]自然，这项决定对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柯诺瓦洛夫而言，并不容易。因为他必须让主席古契柯夫认同

“工人团”的行动，同时向其隐瞒自己的真正意图。

228 宣传小组准备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的宣传文件，在署名时采用了“有组织的工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会议”等说法作为障眼法。详细内容如下：

同志们啊，专制制度扼住了国家的咽喉。专制的政策已经落到了无产阶级的头上，就算不是这样，专制政策也加深了残酷战争所带来的痛苦。……

如果清算战争的不是人民自己，而是现有的专制政权的话，这个疲惫的国家就无法实现她所渴望的结束战争、国家和平，无法脱离苦海。……

工人阶级和民主派不能再等了，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在这个肩负重大责任的时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君主制的支持者们想通过拉斯普京暗杀事件挽回正在急速瓦解的人民对君主权力的信赖。但是实际上，这一事件也让无数人睁开了双眼，看到问题并不在于拉斯普京……而在于手握权力的那一群人。……第四届国家杜马也与政府彻底断绝了关系。政权现在已经孑然一身，孤立无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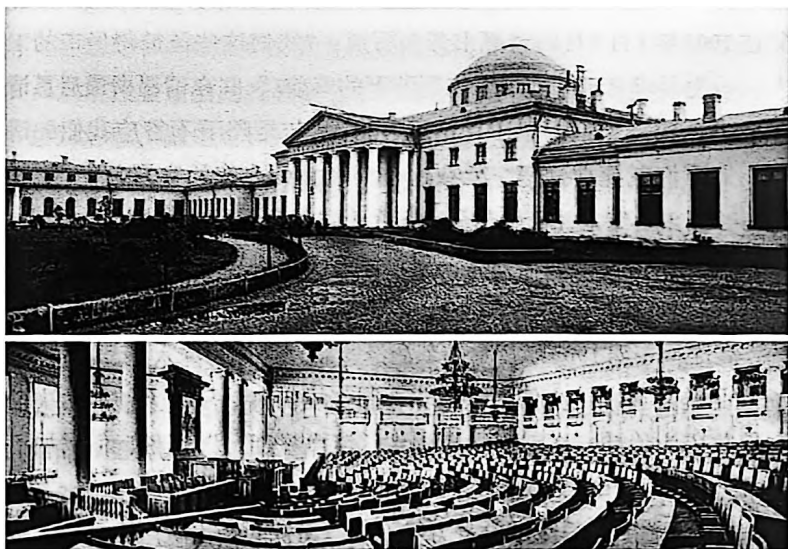
资产阶级的目的是实现政治改革，建立自由体制。无产阶级没有阻碍资产阶级与我们共同的敌人——专制进行斗争，而是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实现国家的完全民主化。资产阶级认为，把国家从危机中解救出来的将是现在对国家杜马负责的政府。工人阶级声明，为了拯救这个濒临解体的国家，不仅仅需要国家杜马，还必须以为了斗争而组织起来的人民为依托，必须立刻成立临时政府。……

现在，仅靠罢工已经远远不够了，同志们啊，我们必须要走上街，提出自己的抗议和要求！……

同志们，想想十一年前的“流血星期日”吧！十一年前，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像天真的孩子一样相信了沙皇，他们因为这份信赖而集结起来，为了寻求真理而踏上了前往冬宫的路。现在，我们已经长大成熟了；现在，我们已经不会再去冬宫了。但是……我们要像“流血星期日”那时一样，通过“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兄弟誓盟集结起来，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正义……在国家杜马召开的当天，我们必须全部走上街头，向着塔夫利宫（指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式开会的场所）进军。我们并不是去向国家杜马请愿，我们是为了提出自己强有力的要求，是为了让全国人民以及穿着军服的数百万人民听到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声音。……

229

来自各个地区，各个工厂，来自首都四面八方的数十万工



塔夫利宫及宫殿内的国家杜马会议大厅

人们！让我们井然有序，不扰乱居民的生活，不影响任何人的情绪，也不挑衅警察引发暴行，向着唯一的中心，向着国家杜马前进吧！……

向着国家杜马进军吧！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家杜马前，在这个全国瞩目的地方，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这样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专制正在毁灭这个国家，毁灭这个国家的人民。专制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专制只会让我们的几十万兄弟在战场上殒命。”只有以为了斗争而组织起来的人民为依托立刻建立临时政府，才能将国家从死胡同和分崩离析中解救出来，才能在国内确立政治自由，才能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承认的前提下实现和平。^[14]（重点号为原文所加）

230 这份文件呼吁工人们为打倒政府而采取上街示威行动。第一次革命（1905年）的导火索“流血星期日”示威游行的策划人加邦神父在1905年1月9日的请愿书开头写道：“我们这些圣彼得堡市的工人……为寻求真理和庇护，来到陛下的座前。”并在请愿书最后恳请沙皇下令实现他们的要求，结尾写道：“若是陛下不答应我们的请愿，那我们就死在这里，死在这个广场，死在您的宫殿前吧。”^[15]这一呼吁工人赌上性命的革命宣言在十二年之后再次被提起。

起草这份宣传文件的人，只可能是“工人团”事务局的马耶夫斯基。马耶夫斯基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研究系列书籍（共五卷）的作者之一，对1905年革命的革命经验研究得最为深入。^[16]

另外，该宣传文件还被简化，制作成供各工厂工人使用的决议文件并广为传播。文件中没有提到“流血星期日”事件，但增加了要求各个工厂选举工厂委员会的内容。

“立即着手动员团结自身力量，组建组织。选出工厂委员会，与其他工厂的同志们联系并达成一致。召开一系列会议，向所有同志

说明现在这一时间节点的重要性。将我方的决定告知其他工厂。”而建立“以为了斗争而组织起来的人民为依托的临时政府”，“由人民来组织，由人民组织来组建临时政府”的要求则没有变化。^[17]

直到此时，宣传文件中提及的“临时政府”的意思仍不明确。但是可以认为，其指代的是由工人代表联合组织、工厂委员会联合组织或者工人代表苏维埃建立的资产阶级市民临时政府。

该宣传文件及简化版的决议文件通过“工人团”旗下的消费合作社联合会和疾病互助基金会，在工人中广泛流传。^[18]

当局加强了对“工人团”的监视，他们马上发现了这份宣传文件并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1月26日晚，时任内务大臣的普罗托波波夫下令对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总部建筑物内“工人团”的房间进行搜查，同时还逮捕了格沃兹杰夫、布洛依德等八名成员以及宣传小组的博古达诺夫。其中格沃兹杰夫因病申请了保释，担保人为古契柯夫。宣传小组书记马耶夫斯基藏了起来。^[19]剩下的阿波罗西莫夫等三名成员中，阿波罗西莫夫是安保部门的密探。²³¹

政府搜查逮捕的行为激怒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干部及其同盟者。一接到消息，副主席柯诺瓦洛夫当即动员主席古契柯夫，于当晚前往首相戈利岑的住处表示抗议。他们称“工人团”并未考虑举行武装起义或发动革命，政府的怀疑与事实不符。^[20]1月28日，军事工业委员会以主席古契柯夫之名向首都各个工厂的疾病互助基金会发送了同样内容的书信，呼吁抗议抓捕“工人团”的行为。^[21]

1月29日，中央及莫斯科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国家杜马议员、国务会议议员、地方自治和城市联盟的代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首先由古契柯夫致辞。米留科夫做了发言，他特意说道：“除国家杜马以外，任何人、任何阶级、任何社会团体都没有权利擅自提出口号，随意发动反政权的斗争”，“因此，我完全不能理解‘工人团’的政策，也不知道要如何将这一切与发生的事态联系起来”。米留科

夫的发言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出席者的强烈反对。立宪民主党议员阿杰莫夫称“我们撞上了南墙，没有出口。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从政治意义和性质层面来解决已经发生的事”。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事务局的塞尔洛夫教授表示：“我们已经写了很多流于纸面、不痛不痒的决议。行动的时刻来临了。我们有必要统一社会各阶级的活动，阻止国家杜马的召开。”进步同盟议员布勃利科夫也支持塞尔洛夫的意见，认为对“工人团”的攻击，就是对俄国所有社会势力的攻击。一位未报上真实姓名、被称作“杜茨基公爵”的人物表示，因为报刊被政府控制，当天举行的这场会议不为人知，必须找到公开此类会议及其决议的方法。身为警方眼线而未被逮捕，留在“工人团”中的阿布罗西莫夫主张这场抓捕行动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克伦斯基则主张受到政府镇压是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荣耀，希望大家做好不惜解散组织的心理准备，进行彻底的斗争，希望城市联盟、地方自治联盟全力支持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齐赫泽对米留科夫进行了批判，称自己发现对方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长此以往，米留科夫只会尾随于大部队之后，因为站在政治行动前沿的只有工人，他主张：“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攻击。请记住，工人阶级瓦解了，你们也就完了。”

232

此时，古契柯夫因故退场，或许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在场会更好。接任主席的柯诺瓦洛夫围绕克伦斯基“为战斗到底，不惜解散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发言发表评论，表示这是“需要十分认真进行讨论的问题”，虽然委员会也有可能被政府解散，但眼下要尽全力“营救‘工人团’”，展现了稳重的一面。最后，莫斯科律师佩列维尔泽夫宣布支持“杜茨基公爵”，这一发言把会场氛围再一次推向高潮，阿杰莫夫、塞尔洛夫均表示赞成。最终决定再次召开会议，探讨如何与政府力量展开更加坚决的斗争、发行非法机关报、选拔作为斗争指导中心的绝密团体等问题。^[22]

政府于1月30日在各个报刊上发表了抓捕“工人团”行动的相关报道。

1915年11月成立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相较于成立之初的“工人团”，委员会内部支持独立的呼声更大了……终极目标是让俄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随后发展成一个企图在帝国内部准备、实施工人运动的中央组织。……近期，该组织阴谋分子的行动越发大胆、一意孤行，收集到的证据表明，该组织无疑具有非法、危险的性质。……本次搜查不仅佐证了此前的嫌疑，还坐实了一系列意义极为重大的事实。依据刑法102条之规定，²³³ 为对犯罪特征进行调查，该案将交由检察院负责。^[23]

在俄罗斯帝国，逮捕革命家群体是家常便饭，但逮捕通常都是秘密进行的。从这一点来看，这篇报道非同寻常。法国大使帕雷奥洛格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次政府没有保密，大张旗鼓地通过各个报刊宣布逮捕了11名工人。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大概是想通过这一方式来夸耀自己正从事着拯救沙皇专制和社会的事业吧。”^[24]

不管内务大臣是何打算，这篇重磅报道表明政府所承认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出现了触犯刑法第102条，即企图推翻国家的团体。

第二天（31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反驳声明，强调这些都是“工人团”的温和性及对国防组织热心援助的表现，并做出如下声明：

如果说近期“工人团”加强了政治性活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所面临的严峻的总体政治形势。现在的政治体制只能指引国家走向灭亡，这一确凿无疑的想法逐渐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



234

克伦斯基。国家杜马议员。
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派发言人

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认为，将“工人团”推向政治舞台这一条件本身，已经对所有社会团体产生了相同的影响，而且现在还在继续产生影响。有时政治性观点与社会性观点会有所不同，但我们委员会对当前政治体制及政府路线的评价与“工人团”一致，我们认为当局无法确保俄国打败外敌，取得胜利。^[25]

这表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和“工人团”的宣传步调一致。这份声明意义重大，它彰显了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推翻政府的决心。

安保部门的密探报告称，1月29日的会议表明，对“工人团”的逮捕“从其突然性和给众人留下的印象来看，都是令人意外的实质性打击”^[26]。2月2日其他报告记载，他们“已经束手无策，感觉自己的立足之地岌岌可危”^[27]。对自由主义左派来说，失去“工人团”确实意味着失去了向民众运动施加影响的通道。但不论是柯诺瓦洛夫还是克伦斯基，都不可能就这么“束手无策”地沉浸在失败带来的挫折感之中。

国家杜马示威游行的推动派召集左翼政党相关人员举行了会议。施略普尼柯夫的证词可以证明，他们聚集在律师加利弗林的住所，讨论在国家杜马召开当天举行示威游行的提案。加利弗林是涅克拉索夫和克伦斯基创办的共济会的成员，他的出现表明共济会内部也有人参与了国家杜马示威游行计划的制订。参加会议的有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议员齐赫泽、斯科别列夫等国家杜马成员，社会革命党国际派的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什维克党的施略普尼柯夫等活动家，律师索科洛

夫，当然还有加利弗林本人，此外还有几个人参加了这次集会。^[28]孟什维克国际派的埃尔曼斯基的记录称集会在高尔基府邸举行。据他说，其本人和区联派的尤列涅夫也参加了这次集会。^[29]

会上，当被问到布尔什维克对2月14日行动的态度时，施略普尼柯夫回答，他们否定自由主义者支持的这次行动。反对“用工人对国家杜马和自由主义阵营抱有的期待来欺骗他们”，基本表现出自发的抵触态度。克伦斯基与其站在对立立场，拥护国家杜马示威游行计划，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与齐赫泽共同向施略普尼柯夫提出质疑：“既然你们否定示威游行计划，那你们认为应该怎么做呢？”施略普尼柯夫承认目前还没有计划，最后终于表示无意阻止示威游行，并且也会考虑参与其中。亚历山德罗维奇支持施略普尼柯夫的意见^[30]，尤列涅夫当然也对示威游行持怀疑态度。埃尔曼斯基回忆了对这次会议的整体印象，记述道：“虽然所有人都发言了，但没有一个人提及当时的局势可能令革命提前爆发。没人表达过这样的期待。”^[31]可能左翼对示威游行的反对最终给他留下了这种印象。

克伦斯基和加利弗林认为这次会议是没有意义的。很明显，“工人团”的提议没有得到左翼阵营的支持。

那么工人们倡议在国家杜马前示威游行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虽然施略普尼柯夫写到，普通工人对“工人团”被捕一事没有什么反应^[32]，但安保部门的密探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报告，称匿名呼吁2月14日举行示威游行的呼吁书广泛传播，在工人之间引发了强烈反响。安保部门密探已确认，剩余的呼吁书以及用胶版誊写法*印刷的

◆
胶版誊写法 俄国研发的一种印刷法。在明胶版上用苯胺墨水写字后把纸贴上去再印刷出来。

传单被分发给了消费合作社和部分疾病互助基金会。^[33] 密探在2月2日的报告中称，在普契洛夫、奥布霍夫、斯科洛赫德等工厂的工人集会上，工人们决定支持这些倡议。^[34] 彼得高夫警察局局长在2月3日的报告中写到，当天晚上6时下班时，普契洛夫工厂的工人召开
236 集会，并进行了如下演讲：“2月14日停止工作，去国家杜马支持国家杜马吧。因为仅靠国家杜马不能斩断锁住俄国人民的铁链，工人必须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自己去斩断这条铁链。打倒专制权力！”雷斯诺伊警察局局长在2月9日的报告中写到，所有工人聚集在伊瓦苏工厂，并“决定先像往常一样工作到2月14日早晨，到了中午，如果有必要的话，全体工人将前往国家杜马”^[35]。这些都是在“工人团”的根据地工厂开展的活动。

随着工人对国家杜马示威游行和革命行动的倡议做出呼应，左翼各党派认为他们也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初始派首先发表声明，反对“工人团”为支持“资产阶级和国家杜马”而进行的宣传活动，他们认为国家杜马是“反人民的”，是“反动的”，“他们想让战争永远持续下去”，“不能让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手里没有思想的工具”。他们强调，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和“为纯粹的无产阶级的课题和利益进行决斗”，目前需要开展相关准备工作。^[36]

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反对“工人团”提出的倡议，但在多次感受到工人们激昂的情绪后意识到，仅仅反对倡议是完全不够的。安保部门的密探在2月2日的报告中写到，在莫斯科、纳尔瓦、涅瓦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开始有人认为应该参加2月14日的行动。对此，施略普尼柯夫等人决定在审判布尔什维克议员的2月10—12日之间，采取和总罢工相对立的计划。^[37]

圣彼得堡市委委员会决定在2月10日集中开展活动，并印制了12000张传单。传单上严厉批判了国家杜马，认为2月14日国家杜马示威游行倡议是“背叛性”的，呼吁以“推翻沙皇君主制，用战争

抗衡战争，临时革命政府万岁”等为口号，在审判布尔什维克国家杜马议员的2月10日当天罢工一天。^[38]

很明显，这个计划只有罢工而没有呼吁民众上街游行，这导致它没能替代“工人团”的倡议，而且这个计划提出时在日程上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它没有考虑到这一年的2月9日、10日、11日将举办谢肉节。^[39] 237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考虑到这一点，号召人们在13日（周一）开展一日罢工活动。“如果组织认为现阶段适合开展更大规模的行动，我们便号召大家开展口号中提到的示威活动。”若斗争可以持续到14号，便可以扩大、深化运动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从格沃兹杰夫派的手中夺回斗争的主导权。”^[40] 根据施略普尼科夫的回忆，起初，中央委员会主张在市内开展示威活动，为回应在国家杜马示威游行的呼声，采取在涅瓦大街开展示威活动的对策。^[41] 但是，这一表述十分可疑。因为他的陈述中还提到，是否开展示威活动取决于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当时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也只是为回应示威游行的号召，倡议大家进行一日罢工^[42]，并且一直坚持这个决定。

战争前夕，首都布尔什维克所发起的运动的一般形式是：一天罢工，或是三天大罢工加上涅瓦大街示威。但由于处在战争时期，为了避免出现伤亡事件，布尔什维克严格执行战时戒严令，从未号召民众在涅瓦大街开展示威活动。这一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没有考虑进行街头示威，不得不说有些过于保守。

区联派（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国际派组织）强烈反对号召民众举行国家杜马示威游行，分发传单支持2月10日（审判布尔什维克议员纪念日）运动，反对“工人团”“不负责任”的呼吁号召活动。他们以工人阶级没有被完全组织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严重的组织危机”、“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行动尚未统一”、军队和工人组织分离等现象为自己论证，认为要防止出现“不成熟的

早期运动”。区联派表示：“同志们，2月14日不是工人阶级的节日，
238 是敌人的节日。我们不会在这一天走上街头，不会在这一天示威游行。”^[43] 区联派对局势的研判比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更加消极，因此建议采取更加消极的运动形式。

然而，年轻一代活动家的思想和尤列涅夫等老一派活动家还是不一样的。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的女学生、犹太人拉希尔·科瓦纳多是区联派的新成员，从她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她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国家杜马延期至2月14日召开，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高度活跃的状态。各个小组、社团、区联派委员会内部都在讨论是否要呼吁工人开展运动，以及工人运动展开的话，组织又将如何应对等问题。最终我们得出结论，不鼓励工人开展运动，但如果发生了自发性的工人街头运动，就努力将斗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44]

无论从哪方面看，左翼政党的“2·10”罢工、“2·13”行动论都过于保守，与“2·14”国家杜马示威游行的号召不可相提并论。但有一点很明确，这些活动都是在对抗、抑制“工人团”号召的活动。

从社会层面来看，有关示威游行的号召得到了首都各阶层以及民众的响应。政治讽刺漫画家卡利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2月1日，皇后眼看着就要控制沙皇，听说她打算在2月14日国家杜马召开当天以保卫皇村为由，从前线召回几个团的军队。有人计划在2月14日当天开展罢工运动，抗议逮捕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成员。但是也有消息称工人们没有上普罗托波波夫的当，盲从于他的挑拨。他们决定无论发生什么，在

战争结束前都不会开展任何运动^[45]。到了2月5日又出现了这样的谣言：“大家都在期待着2月14日将发生的‘事件’”“为了击退‘国内的敌人’，从前线调回了两个师”。昨天谣言又传进了交易所。“工人阶级的大规模示威运动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2月14日将会举行游行，去往国家杜马，将请愿书递交国家杜马主席团。”我自己也看到了两张传单，一张是号召士兵坚持作战，直到战争取得胜利；另一张是号召首都的士兵加入起义军。“传单本身所号召的行动无异于叛乱”。传单被公然分发到士兵之中，“据说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46]

239

在这样的局势下，当权者绷紧了神经。2月5日，安保部长在报告中提到了粮食储备进一步恶化的问题：“居民们现在没有因饥荒而发起暴动，不代表在不久的将来不会爆发。毫无疑问，饥饿的民众自发起义……是无政府革命的最初也是最后的阶段。”^[47]2月6日，彼得格勒军区脱离了北部方面军总司令的指挥，开始直属最高统帅部，军区的大部分权限授予了军区司令哈巴洛夫中将。^[48]2月8日召开了首都治安对策特别会议，在特别市市长巴尔克少将的主持下，围绕2月10日至13、14日在国家杜马示威游行的计划，做出了部署警官、宪兵、哥萨克骑兵、骑兵的决定，分别部署哥萨克骑兵11个或12个半连以及2个排、2至3个骑兵连、2个宪兵连。特别对示威游行做出了详细指示：封锁涅瓦河上的主要桥梁和通向国家杜马的道路。^[49]

2月8日（公历21日），协约国会议闭会。第二天（9日）市内各处张贴了哈巴洛夫中将的布告：

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啊，首都的一部分工厂决定在国家杜马召开当天开展罢工运动，号召工人们高举政治旗帜一齐向塔夫利宫进军。俄国真正的子民们是不会上当的。……

一定要牢记，没有国民意志的统一和后方全员的防卫工作，军队的所有胜利以及人民的所有牺牲都是徒劳。每一次罢工行动都是在减少我方的炮弹数量，都是在从我们军队的手中夺走武器。……

我想向诸位的健全理智呼吁，向诸位的良心呼吁，不要听信煽动你们背叛的有罪者的教唆之言。不要从你们工作的地方离开，不要离开那些机器。要履行对军人兄弟应尽的义务，因为他们正代替你们在战场上战斗。让我们保护我们共同的母亲——祖国俄罗斯。我要向对我的倡议充耳不闻的人发出警告。彼得格勒现已进入警戒状态，我们将采取武力手段制止一切暴力行为和抵抗合法权力的企图。^[50]

这份公告成为对国家杜马示威游行的一大宣传。首都全体市民都通过这份告示知晓了2月14日的行动。当然，他们也对上述用武力手段镇压反政府行动的威吓印象深刻。2月10日，首都进入戒严状态，市内各地都配备了警察和军人。卫戍部队的士兵中，有人对镇压群众的行为表示不满。同一天，安保部门的密探上报了在市內听到的士兵和市民的对话内容。

上级为了让我们镇压罢工运动，下令给我们每人分配200发子弹。我们已经厌烦、厌倦了，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射击的命令一下，我们就把枪口转向费奥凡（警官，参考163页注），开始射击。……秋季诺贝尔工厂工人罢工的时候，我们的伙伴拒绝向群众射击，开始向费奥凡开枪，他们因此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但是这次很难得，我们每人分到了200发子弹，我们将去惩罚那些坏家伙。^[51]

2月11日，漫画家卡利奎在日记中记录了人们对于哈巴洛夫公告的反应。

一位从市场回来的主妇说道：“丈夫滔滔不绝地告诉我，沙皇在公告上写着让大家在14号去国家杜马，据说想在那里宣布希望结束战争的想法……”另外一位主妇说道：“大道上张贴了命令文书，是有关罢工的。”传言称在2月14日，有几位大臣会卸任换人。^[52]

241

然而，担心关注这一情况的不仅是当权者。国家杜马进步同盟的领导人米留科夫于2月10日在立宪民主党机关报《言语报》上发表了他自己的声明，并且这份声明紧挨着哈巴洛夫的公告。米留科夫表示，有人在工厂自称国家杜马议员米留科夫，煽动进行“2·14”国家杜马示威游行，但此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他表示这是“来自最黑暗的地方的发声”，“听信他们的煽动，就意味着上了敌人的当”，呼吁大家不要参加“2·14”运动。^[53]人们得知米留科夫的声明明确反对的内容，倒使得“工人团”的倡议获得了较高的评价。^[54]

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从米留科夫那里了解到情况，认真考虑了事态的发展情况，在国家杜马重新召开前于2月10日获得了上奏的机会，赶赴皇村。

罗江科回顾了国家杜马设立以来11年的种种情况，称“这是政府与拥护新立宪体制的人们不断斗争的11年”，并指出大战在即，政府害怕国家杜马的团结程度会超越党派，所以想要扑灭它的星星之火。“战争的现实说明，如果没有人民的参与，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统治的。”“政府权力已失去这种权威。官僚政府……没能成功治理这个处于困苦岁月的国家，它已无法在经历这一可悲的失败后获得权威。”

罗江科预感战争即将结束，所以主张如果没有“受国民信赖的

政府”，会进一步加深社会的不安定，并指出这是因为在议和会议上没有得出靠得住的结论。“政府与国家杜马之间的隔阂正在逐渐加深。”他以自己无法与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一起工作为由，指责他镇压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的行为是不当的。“国家杜马面临解散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杜马主席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按照政府的指示推进国家杜马的工作。罗江科的上奏内容总结如下：

242 国家杜马失去了国家的信任。此时此刻，恐怕人们会不堪忍受生活之苦，把注意力转向政治层面的混乱，为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自发地奋起斗争。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阻止其发生，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根本问题。^[55]

上奏结束后，沙皇询问罗江科“是否要求罢免普罗托波波夫内务大臣”，罗江科回答：“我以前是在请求，如今是在要求您这么做。”并质问沙皇：“为什么在战争期间，要用革命来动摇国家呢？”沙皇答道：“我按上帝的旨意行事。”罗江科表示，“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向陛下上奏”，并放下狠话：“陛下，种下什么样的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沙皇回复：“上帝保佑。”于是罗江科发出最后通牒：“神不会给予我们任何东西，陛下与陛下的政府已经彻底垮台，革命势在必行。”^[56]

2月10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号召人们开展行动的日子，但这一天几乎什么也没发生。只有部分工厂在谢肉节的第一天，即9日开始停工，大部分工厂都是在10日下午2时之后才开始停工的。另外，仅有几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根据地工厂召开了集会。^[57]安保部门的密探证实：2月10日的行动完全失败。^[58]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2月11日的文件中记载：“第二批传单的发放和13日的罢工行动将缓和这一行动失败带来的‘打击’。”虽然

这里没有迹象表明委员会已发放第二批宣传单，但从下文有关综合技术高等专科学校的指示来看，2月10日行动失败后，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确实提出了方针：建议2月13日进行罢工，2月14日发动游行。

同时，据说初始派在2月14日提出新提案，撤销了之前的决议，²⁴³决定将2月14日定为“我们的群众行动日”，并且用胶版誊写法印刷出来后四处分发。虽然区联派的尤列涅夫愤怒地指出此举“极其可悲”，但对于主张示威游行的派别来说应该备受鼓舞吧。¹⁵⁹¹

2月13日工人们也没有罢工。安保部门的密探在报告中写道，当天从早上开始到下午1时，纳尔瓦、科洛姆纳、涅瓦区支持2月14日罢工的群众取得了胜利。¹⁶⁰¹这意味着2月13日罢工的支持者们失败了。

对此，13日起学生们开始独立活动。他们欲响应“工人团”的号召，举行示威游行。特别是位于维堡区北部偏远地区的学生运动中心——综合技术高专，开展了引人注目的活动。据安保部门密探的报告，下午1时，校内播放广播，发布了《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宣言》，号召学生集会，组织罢课，抗议政府对布尔什维克议员的审判，但明天不进行示威游行。到2时30分为止，约300名学生参与了集会，无党派学生谢尔吉耶夫斯基担任会议主席。布尔什维克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委员土耳其马乔夫在会上发言。

他说道：“资产阶级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因此邀请我们明天进行示威游行。但是，如果我们去的话就是帮助他们实施征服计划，那我们自己将一无所获。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的目的是立即停止战争，而不是入侵加里西亚和博斯普鲁斯。”

最后他提出以下决议：（1）学生拒绝参加明天的示威活动；（2）抗议审判布尔什维克，向他们表达合作意愿，宣布进行三天的罢课。

接着发言的是谢尔吉耶夫斯基，他反对“明天不参加示威游行”，主张“利用好一切机会和契机”。此外加穆巴罗夫也明确呼吁

大家参加第二天的示威游行。集会最终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但在第一项“2月14日不参加示威游行”上，投票票数有分歧。²⁴⁴ 绝大多数人对于开展三天罢课活动表示支持。因此，根据会议主席谢尔吉耶夫斯基的提议，决定于次日中午11时在学校召开集会。谢尔吉耶夫斯基与阿穆尔罗夫在会议上发表煽动性演讲，商议如何让学生前往市内展开活动。

学生们在集会后将教室包围起来，企图叫停正在上课的课堂，但高年级学生表现出“非常不友好”的态度，从教室里将门锁住，阻止罢课学生进入。^[61]

首都东南部偏远地区还有一所学生活动先锋校——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布尔什维克党的记录中提及，共有800人参加了集会，通过了“我们的决议”和罢课一日计划，但笔者对这份记录的真实性存疑。因为安保部门的报告显示，虽然一开始有人提议要参加14日的游行，也有人表示支持这项提议，但一名自称是社会民主工党的人突然要求发言，表示2月14日的示威游行是政府的阴谋，不应该参加，地下组织计划在近期举行独立的示威游行。他的发言得到了全体与会人员的支持。

除此之外，林业高专在集会上宣布开展为期两天的罢课活动，斯切布特女子农业高专宣布罢课一日，莱斯卡夫特女子医科高专宣布罢课三日。^[62]从1910年开始，五校罢课之类的学生起义从未间断过。

但是，在国家杜马召开的前一天，有一件事情最为重要。首都西部的科洛姆纳区，500多名应征入伍的国家民兵（不确定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以莱蒙托夫斯基大道为中心，一边唱着《马赛曲》，一边游行。他们高喊着“反对战争，反对警察，打倒奸诈无德商人”的口号，举行了游击式示威游行。游行中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沿街和附近一带的钟表店、面包店、茶馆的玻璃都被砸破，示威者赶走了当值的警官，围攻了前来阻止的官吏，引发了一场骚乱。^[63]莱蒙托夫斯基大道起于马林斯基剧院以西两个街区处，最后经圣保罗运

河，到达波罗的海车站。恐怕兵役办事处就在莱蒙托夫斯基大道上。这场示威游行参与人数众多，政治口号明确，革命歌曲响亮，因此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自发运动，而是一场有政治工作者参与的运 245 动。同时引人注目的是，这场游行对那些舍不得出售生活必需品和面包的商店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安保部门的密探在关于这场游行的记录中提到，莱蒙托夫斯基大道和萨多瓦亚街上90%的面包店都歇业了，开着的店到下午5时面包就售空了，下班回家的工人什么也买不到。^[6] 这场游行拉开了2月14日国家杜马示威游行的序幕，也直接预示了2月23日的罢工游行。

当晚，左翼三派的活动家召开了联络会议。布尔什维克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孟什维克的初始派，还有区联派的尤列涅夫出席了会议。联络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区联派一名女性活动家的家中。会议最终决定三派均不响应2月14日的活动，但如果有工人去国家杜马

波罗的海车站



示威游行，他们将会指导工人的行动。这段内容是根据这里的居民科夫纳特的回忆记录下来的。¹⁶⁵¹一向死板的左翼党派也迫于形势改变了自己的方针。

因此，即使其他地方的活动家持有其他想法，也不足为奇。当晚似乎就有人提议在涅瓦大街举行示威游行。2月14日，综合技术高专的布尔什维克党学生将采取和前一天不同的行动，在菲尼克斯工厂的集会上，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的丘格林提议到涅瓦大街举行示威游行。¹⁶⁶¹

终于，2月14日这天，国家杜马第五次会议召开。会议伊始，1月上任的农业大臣立契夫就粮食问题做了说明，但是国家杜马主席
246 罗江科把对农业大臣的演讲的讨论推迟到下一次会议，让进步同盟代表希德洛夫斯基发言。希德洛夫斯基认为，为了打完战争，必须要有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为此，政府的组成人员必须是那些人民公认的领导人，政府必须得到立法机关和人民的支持；其他协约国拥有这样的政府，但沙俄没有，所以治理混乱，在战争的推动上频频受阻。他的发言虽然只是重复了以往进步同盟的言论，但仍然引发了与会者的讨论。社会民主工党的齐赫泽和进步同盟的叶夫列莫夫发表了批评意见，但未能提出新的主张。给众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普利斯科维奇，他站在讲台上，激动地说道，就算冒着国家杜马被解散的风险，也绝不能向政府低头。拉斯普京的行刑人并未被问罪，也登上了国家杜马的讲台发言。他说：“第四届国家杜马不是涅鲍加托夫舰队（在日本海海战中投降）的军舰，不会在可怕的暴风雨中做出只让自己活下去的可耻之事。”¹⁶⁷¹他的意思是，这是一场挑战，如果想解散国家杜马，那就试试看吧。

这一天，首都工人爆发罢工运动。据安保部门数据，参与人员来自58家工厂，多达89576人；据特别市市长报告的数据，参与人员来自52家工厂，共有84164人。参加罢工运动的除了维堡、彼得格勒两区的15家先进工厂外，还有普契洛夫工厂（现为基洛夫工厂）、奥

布霍夫工厂、联合缆绳厂、圣加利尔工厂、阿特拉斯工厂、安萨尔工厂、佩伦化学工厂等其他区的7家工厂。^[68]15所先进工厂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曾进行过罢工，但此次他们不顾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进行罢工，表明工人对行动有着强烈的意愿，“工人团”的行动挣脱了布尔什维克的阻拦。另外，以前从未参加过罢工的7家工厂也进行了罢工，这显然是“工人团”的工作成果。区联派的尤列涅夫评价道：“‘工人团’组织的2月14日罢工取得了巨大成功。”^[69]

但是，游行、示威被警察部门制止。此时引人注目的是“工人团”的根据地——奥布霍夫工厂的动向。安保部长在报告中叙述道：“离开工作岗位的工人们尝试了示威。但最终他们被警察驱散。”²⁴⁷此后，奥布霍夫工厂的一部分工人进入皇家造纸厂和铸铁厂，试图举行罢工。12时左右，150人聚集在一起，举着两面红旗。一面旗帜上写着“民主共和国万岁”，另一面旗帜上写着“打倒背叛人民的政府。第二革命万岁”。这次示威游行也被警察驱散。^[70]区联派的女性活动家现场确认发现，普契洛夫工厂工人在试图进行示威时遭到了哥萨克骑兵的镇压，甚至有人牺牲。^[71]从这些事实来看，当天罢工的工人开展的示威和游行活动在工厂前便已被破坏。大多数警察在报告中汇报罢工工人已“平安回家”。

其中，斯帕斯卡亚区第一警察局在报告中称，警察在利切伊娜亚区两次驱散了想要前往国家杜马的100—200人群体。^[72]安保部门在报告中称，下午2时，100多名工人聚集在利特尼桥旁边，试图进行示威，但被驱散。在国家杜马前和涅瓦大街上有聚众游行的趋势，但也被驱散了。特别市市长的报告中提及，工人尝试进行的示威有三场，另外还列举了涅瓦大街上的学生示威。^[73]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在2月26日发出的第二号《通报》中写到，维堡区各工厂的工人们走上了街头，但由于警察队伍出动，只有200多名新莱斯内尔工厂的工人叫喊着“给我面包”“反对战争”，

穿过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桥，继续前往利特尼大道方向。¹⁷⁴¹《真理报》复刊后的第一期刊登了“事件的经过”。文章写到，下午2时，工人出现在通往国家杜马的西帕雷尔那亚大街上，到了3时，人数达到150—200人，但被宪兵驱散。工人为“饥饿大王”前来，他们呼喊“宪兵也是工人”。宪兵回答说：“话虽如此，但总之大家先解散吧。”之后，群众数量不断增加，他们来到涅瓦大街，一边高歌《马赛曲》和《同志不要倒下》，一边举行了数次示威。¹⁷⁵¹

248 综上所述，维堡区的布尔什维克根据地的工厂、新莱斯内尔工厂有200人在示威时试图穿过大桥，另有150—200名工人前往国家杜马。但不知道新莱斯内尔的200人是想通过大桥前往国家杜马，还是要去涅瓦大街。

另外，学生们也开始了独立行动。上午11时，在综合技术高专的校园里，200多名学生聚集在学校中央楼梯处。土耳其乔夫的同志，一名布尔什维克人士发表演说称：“学生不应该去国家杜马，而是应该去喀山大教堂前广场，在那里和工人示威队会合。示威工人将在那里要求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全体学生热烈鼓掌，赞同这一提议并乘坐电车前往市中心。实际上，在这次演说之前，谢尔吉耶夫斯基等人就和布尔什维克党人进行了长期商议，大概已经事先讨论过在涅瓦大街举行游行一事。低年级学生“全员”罢课，高年级则“几乎都在上课”¹⁷⁶¹。当天，医科高专宣布罢课两天。安保部在报告中称，圣彼得堡帝大300多名学生聚集在校内的主干道上，其中1人支持“工人团”的号召，宣布罢课一天，并主张参加示威。据说，聚集的学生中大部分人都走出了学校，聚集在涅瓦大街，但被警察驱散。¹⁷⁷¹施路普尼柯夫在报告中写到，帝大一部分学生前往国家杜马游行，另外一部分则参加了涅瓦大街游行。¹⁷⁸¹在女子文科高专，大约400人参加了前一天未能举行的集会，多数人的意见一致，表示“今天的行动是政府策划的。这是一种挑衅”，“我们对政府没有任何好的期待，众所周

知我们必须斗争、罢工……但为了出其不意，让政府毫无准备……我们必须再准备一至两个月”^[79]。这所学校的学生应该没有参加游行。

当天下午，综合技术高专、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音乐学院的男女学生，实业学校、商业学校等中等学校的学生们在涅瓦大街上高唱《马赛曲》，多次尝试示威。报告中称，在大约下午4时半的第三次尝试中，年轻的军官（中尉）发挥了重要作用。安保部门的密探称，当天中午，在《俄罗斯意志报》报社的一个房间里，与社会革命党工人和两名准尉举行集会的学生团体组织了此次示威活动。^[80]另外也有其他密探指出，在彼得格勒，以阿克洛夫为核心、开展劳工运动的社会革命党学生和以塔拉卡诺瓦为核心、追随布尔什维克党的女学生组织联合策划了这次游行。恐怕有许多游行活动的目光都瞄准在涅瓦大街吧。“2·14”行动就如安保部门特务描述的那样，不得不说是以“相对失败”告终的一次行动。其原因可归结为如下几点：一、这些安保部门的特务认为，呼吁举行示威游行的“工人团”作为“国防派”的一员没有号召力；二、因对抗三大左翼党派团体（布尔什维克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区联派、孟什维克的初始派），“工人团”分散了力量；三、当局组织了镇压行动。^[81]

研究者们认为，第二点对行动有一定的影响，而第三点的镇压是最具决定性的原因。

为了获悉工人的反应而前往维堡的社会革命党国际派的斯瓦茨基看到当地工人们高举红旗，尝试起义，记录道：“总体来看，我觉得广大工人在这天没有精神，行动迟缓。”^[82]从纳尔瓦区前往普契洛夫工厂活动的女性区联派活动家回忆道：“即便如此，那时的气氛让人预感到将有什么事要发生，期待着发生些什么。”^[83]

虽然呼吁去国家杜马示威游行作为一个革命口号被扼杀在摇篮里，但对具有战斗意志的工人们来说，这样反而引发了他们对斗争过程各党派意见不一致的不满，激发出他们难以遏制的积极行动的

意愿。受到学生们呼吁进行示威游行的鼓励，人们在涅瓦大街积极尝试游行的行动可谓具有重大意义，也颇有孤注一掷的感觉。

不知那天沙皇、皇后的内心做何感想。根据沙皇的日记，那天，他只接受了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和陆军中将勃列艾夫的求见。^[84]

250 潜伏期——为期一周

2月14日晚，在律师索科洛夫的家里召开了民主党派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席间，克伦斯基厉声斥责施略普尼柯夫：“你们就这样把民主党派辛辛苦苦准备的运动破坏了。”^[85]但是，批判克伦斯基等示威游行派阻碍了国家杜马示威游行的不只是左派，对这一结果拍手称快的还有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的官方报纸《言语报》在2月14日这一期的时评中表示：“今天国家杜马的论战给人留下的政治印象是，我们没有被社会矛盾或自发性的民众暴乱所干扰。”以国家杜马为中心的社会运动中体现的民众的团结是从1905年10月17日运动爆发的前夕开始的，他们表示“不允许反复上演1905年‘一月事件’和‘十二月事件’”。但在15日的时评中，他们欣喜地表示“自己昨天的预言很荣幸全部命中”，“伟大的挑衅失败了”，“统一的大众战线”得以保留。^[86]

2月15日，国家杜马再次召开的第二天，米留科夫登上了演讲台，他仍然在重申相同的方针。即便是他，也做出了如下发言：

伟大的国民如果牺牲在无能、满怀恶意的掌权者手中，会被推入危险的境地，我们所有居民会成为市民，我们的祖国将陷入险境，我们应该宣誓，将祖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各位，我们正在迈向这最后的时间点！

然而，米留科夫攻击了呼吁示威游行的声音，夸耀自己阻止了一场“畸形的街头暴动”。结果，最后他这番发言到底要表达什么，令人难以理解。“但实际上，就算政府这时候向国内灌输‘俄国必败’的想法，也无法阻止俄国的胜利。无论如何，俄国终将迎来胜利。”^[87]

接下来上台演讲的是克伦斯基。他的发言如当头棒喝，在强烈批判政府的同时，也批判了米留科夫提出的路线。他在演讲开头谈道：“大家也许认为国家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和被视为儿戏的1613 251年的动乱相比，我们正在经历我国历史和人民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动乱。”他也谈道：“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种混乱不仅是一种政治意识的体现，不仅是粉碎权力，粉碎政党组织和民众政治意识的力量，也是它，让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混乱，破坏了国家社会生活的基础。”“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与法国大革命那时的社会十分相像。”他提到了苏霍姆利诺夫、谢格洛维托夫、施蒂默尔、普罗托波波夫、特列波夫等人，认为他们是将俄国带入谷底的罪人，他还认为这次逮捕“工人团”和开战之初逮捕布尔什维克议员一样是不合理的。“我们的国家现在存在一个比德国的影响及个人间的勾结、背叛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体制。和欧洲现代国家不同，不负责任的专制政治体制是以中世纪国家观为基础的，这种国家观念由主仆关系构成，类似领属地关系。”

在官方的会议记录中，之后的数行叙述被删去了。克伦斯基继续问道：“经过三年战争，现在各位公爵、议员和我们这样的‘民主派代表’难道不应该已经达成共识了吗？”“现在大家应该醒悟，应该相信，眼下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历史性难题就是打破中世纪旧体制的束缚，能解决这一难题的是坚定的信仰，是呼吁改革的英雄的牺牲。”如果真是如此，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里谈到的“我们只需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这句话？此时，议员席传来了米留科

夫“这里可是国家杜马啊！”的奚落。克伦斯基不以为意：“你的敌人并不把法律放在眼里，那么你自己在放手行动时又何须顾及法律呢？……与法律的蹂躏相斗争，只有剥夺实权这样一条道路，别无他法。”^[88]

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第二年，主席询问他“在这一点上需要注意什么”，他回答：“我所说的正是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斯所做²⁵²的事。”^[89]涅克拉索夫主席同他有相同的志向。谁都知道政治家布鲁图斯用短剑杀害了恺撒。恐怕这是他没能在开会期间说出口的话。

克伦斯基在演讲的后半部分谈到了战争的目的，并借此表达了对米留科夫的指责。他抨击众多国家杜马议员，表示从未指望他们能与旧政权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同样隐藏着和旧政权一致的帝国主义的野心。他果断表示，现在正是应该彻底抛下这些野心的时候。他在演讲的最后宣告，人民站起来的时候到来了。

我看到一些人在这里发表侮辱工人运动的讲话，我不会去反驳你们。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必须慎重对待民众的想法，不应用私通、背叛、受到外国势力挑拨这些说法去指责他们。他们和你们一样，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默默承受过不平等的待遇，都毫无怨言地将头颅放在了东西交界线上。甚至，他们还过着你们从未体验过的难耐的无聊生活。他们想要发声，想要在自己的未来被决定时发出声音，想要得到市民应有的待遇。……如果你们愿意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他们，会和你们一同前进。……请至少为他们留下一点发声的可能性。请不要总是进行子虚乌有的诽谤，不要把枪对着你们的战友。^[90]

主席涅克拉索夫没有阻止克伦斯基发表这番革命性的演讲。这

一演讲可以说是针对沙皇政权宣战的公告。

克伦斯基的演讲登上了第二天的报纸，当然，一些关键性的部分被审稿人删除了。但是，“我们的国家现在存在一个比德国的影响及个人间的勾结、背叛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体制。和欧洲现代国家不同，不负责任的专制政治体制是以中世纪国家观为基础的，这种国家观念由主仆关系构成，类似领属地关系”却保留了下来，而且演讲结尾的几段话基本上也都保留了下来。^[91] 克伦斯基在国家杜马表示“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人民站起来的时候到来了”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各地。 253

另一方面，原计划在2月14日开始的工人运动没能如期开展。因而许多人，尤其是工人感到自己的诉求未被满足，情绪没有得到宣泄。就连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感受到了这样的氛围，并在《通报》中写道：“普通工人对于这次决定性的运动的期盼落空了。”^[92] 20家工厂，114840名工人将罢工延续到了第二天的15日。^[93] 学生们也将罢课运动延续到了这一天。在圣彼得堡帝国大学，学生们迫使财政学教授米格林停课，学生们在中央通道举行了集会，他们对是否继续罢课展开了讨论，但尚未得出结论就被迫解散了。为了阻止学生再次组织集会，警察冲入了校园。^[94]

不过，布尔什维克党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仅满足于成功阻止国家杜马示威游行，没有充分认识到人们尝试在涅瓦大街上游行的意义。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在一份纲领性传单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诸君因怀揣着对‘2·14’的好奇心而在这里等待”，但最终，人们只是在国家杜马前发表了“很多有深意的演讲”来表达对工人们的支持。而沙皇政府也只是把机关枪摆放在各个地点，做好了镇压的准备。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最锋利的武器一定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敌人哪里，我们的朋友是谁”。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提出的目标是：为了“打倒沙皇，建立临时革命政府”，要“用社会民主工党

秘密组织的大网覆盖工厂和军营”。不过，圣彼得堡市委员会仅仅把工人进行斗争的各个事件，如“议员审判日、连纳惨案（4月4日）、劳动节、七月事变、十月的艰辛岁月、1·9事件等”，定性为了“行动的旗帜”^[95]。

从这份传单可知，下一次行动的时间是4月4日。但是根据圣彼得堡市委员会丘格林的回忆，他们其实计划在劳动节这天发动决定性的运动^[96]，并且也从未想过要在即将到来的2月23日国际妇女节²⁵⁴开展工人运动。考虑到“大众昂扬的斗志”，维堡区委员会开始以“直接叫停煽动工人罢工的活动，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持纪律和持续遏制即将到来的行动”为方针。也可以说，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全党的方针。

然而，2月15日以后，工人斗争仍在继续。2月16日，伊佐拉工厂*被关闭，这家工厂位于城外的科尔比诺，由国家经营。这家工厂里布尔什维克氛围浓厚，在他们的指导下，工人们提出了经济上的诉求，在9日，工厂里开始了隐性罢工（人为破坏产品和生产秩序）。假期结束后的13日和14日，他们举办了连续几天的大型集会（第一次500人，第二次数千人），社会革命党左派的煽动者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巴罗夫指责了“工人团”发起的示威游行，提出应该根据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发放的传单上的精神，提倡基于民主共和制、立宪会议提出经济层面的诉求，并以实现这些诉求为目的开展罢工运动。集会最终通过了这一提议。虽然两次集会均被负责周边警备的哥萨克骑兵驱散，但是哥萨克骑兵对工人态度友好，好像充分认可工人们提出的这些要求。14日晚，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的代表来到了工人运动的现场，在众人面前公开批评哥萨克骑兵：“这太无耻了，军官先生们。你们正在毁灭俄罗斯，老百姓只是希望获得面包。”之

* 伊佐拉工厂：音译，位于彼得格勒东南26公里处，主要生产船舶相关部件。

后，政府在16日关闭了工厂，最终，9000名工人丢了饭碗。^[97]

2月17日，国家杜马就粮食问题和逮捕“工人团”问题展开了讨论。柯诺瓦洛夫就逮捕“工人团”一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政府对“工人团”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工人运动是非常温和且具有建设性的，并对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此外，他举了两个例子，阿诺索夫斯基和奥斯塔潘科两人发表了停止罢工的讲话，免于被逮捕。他在最后这样说道：

人民大众对于“工人团”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工人团”本来可以借此成为公众对抗其他势力的支柱，但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完全不管是谁在背后操控，一味地要消灭这个组织。……那些对“工人团”的攻击，从本质上看其实就是对俄国民众的攻击。国家杜马和俄国人民都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尊严。我想人民会履行他们的义务，俄国政府也会带着这份荣誉，结束这场斗争。^[98] 255

这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的辩护词，也是对沙皇政府的批判。

克伦斯基再一次响应了革命的号召，他呼吁国家杜马议员行动起来：

各位，旧政权以及被旧政权桎梏的我们都无法将俄国从当下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如果你们明白这一点的话，就必须坚定地宣誓自己是解放国家的拥护者，不仅仅从口头上，更要从实际行动出发，将我们的国家从被束缚几世纪之久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必须立即从“说”落实到实际行动。如果落实不到实处的话，各位所做的、所说的都只是一番空论，没有任何实质性效果，悲剧就一定会突然来临——

现在，仅凭借口头说辞已经不能阻止悲剧的到来了。即便政府……粉碎了民主派团体等组织的所有尝试，民主大众团体以及民主团体也只能采取必要举措，直接行动。

.....

各位，我认为虽然通向成功的道路千千万万，但是每一条道路都会引发这一冲突。有政权可以毫不在乎地把国家置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草芥，而把自身的存续放在第一位。这样的政权势必走向灭亡。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人及时地、十分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最后克伦斯基引用了十二月党人尼古拉·屠格涅夫的话。

256

他在十二月党人被摧毁并被处决后写道：“权力通晓万物，却有一事不知，那就是结社的力量。它如雷鸣般强大，它让专制的君主时刻感受到威胁。但是，团体和结社不会因专制权力而瓦解。结社是全体人民针对背叛和出卖人民自由的背叛者时所形成的团结，是所有诚实的人类的团结。”我也这么认为。我国的人民团体这个如雷鸣般强大的存在从100多年前开始便震慑着我国的专制统治权力，而最终它必将从影子进化成具备生命力的具体存在，也就是现在的形态。^[99]

克伦斯基在国家杜马的演讲台上呼吁：始于十二月党人的旨在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已经进行了近一个世纪，这场战斗即将迎来尾声，我们将迎来革命胜利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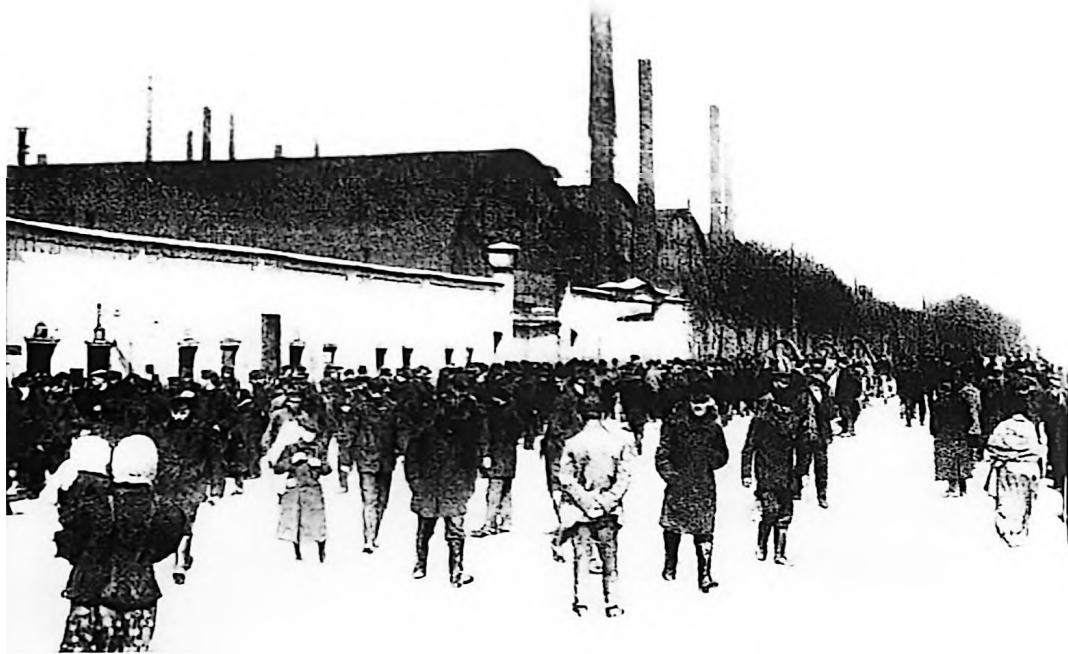
克伦斯基在15日和17日的两番演讲成了皇后内心拔不去的尖刺。一周后，也就是2月24日，皇后在给沙皇的信中写道：“国家杜马的肯多林斯基（原文如此）大放厥词，应该判他绞刑。”^[100]

如果不看克伦斯基的演讲，那么2月再次召开的国家杜马会议比11月召开的会议还要不值一提，它没什么约束力。就连《新时报》也写道，如果不加分辨，就会有一种“国家杜马一直都在开会的感觉”，“政府对年轻的农业大臣，与其说饱含敌意，还不如说是带着善意”^[101]。罗江科也坦率地承认，“国家杜马的无能为力以及毫无成效的斗争带来的疲惫感”弥漫于重新召开的国家杜马会议当中。^[102]

2月18日，官营普契洛夫工厂炮架冲切车间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他们要求重新雇用被解雇人员，并且提薪50%。厂长德布尼奇少将发布命令，拒绝了工人的复职要求，并且禁止再次雇用已被解雇的人员。这次罢工扩大至其他车间。2月21日，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加入了罢工行列。普契洛夫造船厂在当天也爆发了隐性罢工运动。军队于2月22日关停了这一拥有3万名工人的大型工厂。实际上，这次罢工是自1916年2月以来的一年时间内普契洛夫工人们自发斗争的一个高潮。普契洛夫工厂的工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据说还向其他工厂寻求了支援。^[103]

经社会革命党人森吉诺夫引荐，普契洛夫工厂代表得以拜访克伦斯基。²⁵⁷ 2月22日，普契洛夫工厂代表见到克伦斯基后表示这是大型政治运动的开端，并且他有责任就此事警告国家杜马议员，他不知道这场运动的结果如何。但是，从工人们的状态来看，他预感应该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104] 克伦斯基承诺会向国家杜马报告这件事。

2月19日，沙皇告诉沃耶科夫他将于三天后前往最高统帅部。尼古拉说，因为总参谋长即将从克里米亚的疗养院出院，所以必须和他商谈此事，而且内务大臣的消息称“完全没有理由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沙皇决定前往最高统帅部。沃耶科夫对于1月份以来的事态发展深感不安，所以和内务大臣通了电话，但是普罗托



彼得格勒最大的军需工厂，官营普契洛夫工厂。2月18日，该厂一个车间开始了罢工运动。2月21日，工厂所有车间都开始罢工

波波夫却说不用担心，一切都非常顺利。^[105]

2月21日，沙皇收到了陆军大臣勃列艾夫以及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的奏文。^[106]虽然事态发展最终证明这是他们俩最后一次向沙皇呈递奏文，但是和罗江科的情况不同，不管是沙皇还是两位大臣做梦都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外交大臣询问沙皇是否需要在最高统帅部听取他们的再次奏禀，沙皇回答说十天左右就能回来，所以不需要如此。^[107]这一天夜里，普罗托波波夫前来向沙皇上奏。或许他告诉沙皇一切都没问题。回去的路上，他去了沃耶科夫那边，并且重复了同样的话。^[108]

258 皇后已不再相信普罗托波波夫所表现的愚蠢的乐观主义。对于沙皇要前往最高统帅部一事，皇后感到担忧。维鲁博娃也向沙皇报告此行有危险，并说明了原因，但是沙皇并没有听进去。^[109]

2月22日，沙皇离开皇村，前往最高统帅部。

2月23日——激流飞扬

2月23日（公历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是在1910年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的，俄国从1913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1914年以后将国际妇女节定为2月23日。1914年2月23日，召开了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中心，由跨党派的筹备委员会主办的纪念集会，会后大约50人进行了示威游行。此外，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正式杂志《妇女工人》也得以创刊。^[110]第二年，即1915年国际妇女节这一天，散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妇女-女子工会”传单，1916年散发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和学生组织制作的传单。^[111]可以说，这一天已经成为积极参与工作的女性工人活动日了。

这一年，在区联派的主导下，妇女节筹备会成立，布尔什维克党、区联派、初始派的代表也加入其中。各派别代表在标语内容问题上互不相让，虽然经过多番讨论达成了一致，但是却决定按各自派别分发传单。^[112]而布尔什维克党没能成功分发传单^[113]，被传播开来的只有区联派传单。传单上写道：“管理层过去经常利用女性的无知和胆怯，并且现在还在这么做。借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尽早打败我们的公敌——资本家吧。”传单还对战争带来的社会凋敝进行了如下控诉：

在大后方，工厂主以一切为了战争为借口，一心盘算着奴役工人供自己使唤。城市物价的飙升令人咋舌，饥荒席卷了所有家庭。各村最后的口粮、家畜被以满足作战需要为由悉数没收。我们为了得到救济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我们的孩子们都

259

在挨饿。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此后再也不能受到任何庇护呢？孩子们的内心非常不安，很多人因此走上歧途。由于饥荒，很多女孩子，甚至还很小的孩子都不得不卖身以求生计。

而且，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也和我们遭遇一样，有罪的是政府和资本家，现在是批斗他们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受够了！让我们打倒罪恶的政府，打倒这个强盗和杀人犯团伙吧！和平万岁！

但是这则传单并没有号召大家在2月23日开展行动。^[114]据安保部门的文件记载，24日被逮捕的工人都持有落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国际委员会（RSDRP: Petrogradskii Mezhdunarodnyi komitet），写着“反对战争，2月23日罢工吧！”的传单。^[115]虽然有可能在落款部分印错了区联派的名字，但是内容和区联派的传单并不一致。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传单落款错误，抑或存在其他组织。

但是，1917年首次发行的彼得格勒消费合作社的杂志《劳动报》第二号、第三号特辑则以出版物的形式对外宣传了国际妇女节。孟什维克党初始派的埃尔曼斯基曾任该杂志主编，9篇文章都与国际妇女节相关，其中4篇是由这位主编一人易名执笔完成的。《经济发展和女性的命运》这篇文章结尾处说道：“现在的情形虽极其悲惨，但是人类正朝着新生活迈出一大步。确实，这是一条非常长而艰险的路，且悲剧性的冲突不断上演。但是，生活却正朝着崭新形态（既非母权又非父权的形态）下人类的新生迈进。”这本杂志发行于2月260 23日前，不知其具体发行量以及是否具体记录了呼吁大家展开行动的内容。但是，和“工人团”合作的合作社所创办的杂志专刊有可能被用作号召大家在国际妇女节发起运动的渠道。此外，埃尔曼斯基留下的笔记中记载初始派也派发了传单。^[116]

区联派领导人尤列涅夫列举了三个为庆祝国际妇女节举办的

集会，分别是在帕宁娜伯爵夫民众文化馆举行的400名女性工人集会、伊瓦苏工厂集会以及在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举行的集会。据说在第一场集会上，区联派伊特基纳做了精彩的演讲，第三场集会上也有区联派代表发表了演讲。除以上三场集会外，在雷斯诺伊区，还有由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共同举办的集会。¹¹¹⁷⁾

最后一场集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卡尤罗夫之前提到的于22日晚在维堡区的北雷斯诺伊区召开的妇女集会。维堡区委员会的卡尤罗夫出席，并就妇女节的意义发表了演说。在集会上，卡尤罗夫按照地区委员会的决定，“说明了现在的局势，呼吁大家避免仓促采取行动，一概听从党委员会的指令”¹¹¹⁸⁾。这次集会并非由布尔什维克党单独发起，所以他说的“一概听从党委员会的指令”的说法也许不太准确。但是，“目前应等待时机，避免分散行动”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区联派的共同方针，所以从这点来看他的演讲内容并不矛盾。

但是左翼党派的活动家完全没有认识到维堡区的女性工人正处于何种紧迫的局面。如果我们看一下维堡区警察局第二分局局长在2月22日向特别市市长巴尔克提交的报告，就可以知道事态的严峻性。

在我负责的地区，因为面包供应不足，工人们怨声载道。几乎所有的警察每天都能听到老百姓抱怨说自己已经两三天没吃到面包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在街头会发生大骚乱。当人们排着长队，终于买到两普特（32.76公斤）²⁶¹面包时，甚至会画着十字放声大哭，事态的严重性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之所以出现面包短缺，是因为面包店买不到小麦粉，做不出白面包，而黑面包也做不出来是因为缺少烤

面包的师傅。几个月前，义务兵中有人向当局请愿，希望能
在每个面包厂留下一名烤面包的师傅，但是并没有得到政府
正面的回应。^[119]

因为兵力不足，首都开始进行全方位且彻底的参军动员。就连
首都面包厂的面包师傅也被强征入伍，从而陷入无人制作面包的境
地。2月13日，由于面包短缺，科洛姆纳区的民众发起了示威游行
运动。同一时刻，维堡区面包供不应求的情况更为严峻。在这种情
况下，女工趁着国际妇女节集体罢工，一边高呼“我们要面包”的
口号，一边进行示威游行就不稀奇了。她们加入到集会的队伍中，
和同伴联络，试图让大家行动起来。或者，有些政治势力注意到变
化，在“2·14”国家杜马示威游行失败后一心想组织工人们再次发
动街头游行。可以看出，2月23日的那场游行是基于一定的方针策
划进行的，但是在历经革命后的苏联，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己参
与策划了这场行动。总之，维堡区的女性工人在左翼党派相关人员的
阻止下，依然发起了“2·23”行动的倡议。

1917年2月23日（公历3月8日），这一天始于一个平和的清晨。
天气绝佳，虽然寒冷，但好在没有风。警察当局万万没有想到工人
们会在这一天发起行动。^[120]

262 维堡区的涅瓦河河畔有五座纺织工厂，从北边开始分别是尼古
拉斯卡亚纺织品厂、维堡纺织厂以及涅瓦棉线涅夫卡工厂，再往下
一点是桑普索尼耶夫卡亚纺织厂和列别杰夫黄麻厂。这些工厂的女
工几乎没有参与过其他地区纺织厂工人在战时发起的行动，在这种
情况下，她们参加了1916年的十月斗争以及1917年的“1·9斗争”
运动。但是她们并没有参与“2·14”国家杜马示威游行。这也就是
说，女工们一直遵循着布尔什维克党以及维堡区工人所制定的方针。

这些女工在国际妇女节一起自发地提出了罢工倡议。在上述五个工厂中，列别杰夫黄麻厂从22日便开始罢工。^[121]女工们迫切希望其他工厂的工人也能一起加入这场斗争。

23日上午，这些纺织厂的女工各自在自己所属的工厂召开集会，进行罢工，还各自派代表或以团体的形式前往附近的金属机械厂、新莱斯内尔、爱立信以及诺贝利等工厂呼吁大家一起罢工。

爱立信工厂的工人罢工开始后，布尔什维克党成员紧急讨论对策以控制局面。卡尤罗夫一直相信“下级组织会执行地区委员会做出的决策”，因此对此感到十分气愤。他认为女工们的行为是无视地区委员会方针政策的表现，也是对他昨晚下达的指示的漠视，他认为工人之所以会罢工，除了买面包的队伍又延长了之外，没有任何目的以及契机可以解释。“但是，事情既已发生，就必须采取对策。”卡尤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也参加了商讨，最后，为了“平息愤怒的民心”，还是决定实施罢工。他提议说，既然要抗议，就要抓住一切机会，让全体工人都走上街头，让每一个人自发地走在示威、罢工队伍的前头。他把这项提议汇报给了地区委员会，并且立即得到了许可。爱立信工厂的所有工人纷纷加入了罢工运动，就好像在等着这一刻到来似的。^[122]

263

但即便是一直积极响应斗争、站在反抗队伍前列的新莱斯内尔的工人中，也曾有人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反对参与罢工，但

卡尤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而且，同样是这家爱立信工厂的工人，也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米柳契科，在这天早上召集了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孟什维克党的活动家10—15人来到工厂的疾病互助基金会，并决定自发开展罢工运动。”（I. Mil'chik, *Rabochii fevral'*, Moscow-Leningrad, 1931, pp.61-62）恐怕卡尤罗夫所说才是真实的吧。

在涅瓦棉线厂的女工以及青年工人的强烈鼓动下，终于还是加入了罢工运动。^[123]

桑普索尼耶夫卡亚纺织厂的女工涌入诺贝利工厂，在门口挥手呼吁这里的工人“放下手中的工作，加入游行”。有人认为，这天是国际妇女节，让女工参加游行就可以了。但布尔什维克党的戈尔坚科等人对此表示反对，并积极加入罢工行列。^[124] 纺织工厂附近的雷诺（俄国）汽车制造厂、巴兰斯基、旧莱斯内尔、旧帕尔维艾宁等工厂可能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早上毅然加入了罢工。

这些工厂的工人里，或许有一部分参与了“2·14”国家杜马示威游行，但是苦于未能冲到示威前线，所以一直静待机会，发起行动。坚决实行罢工的工厂工人一边高呼着“我们要面包”的口号，一边涌上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道，往南行进。但是，最初的示威游行队伍遭到警察的镇压，并被强制解散。^[125]



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道

上午，维堡区第二警察分局管区内大约有3万人参与了罢工运动。下午1时，他们再次组织游行队伍，继续沿着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道往南行进。但警察早已在诺夫哥罗德大道和芬斯基小巷的交叉口做好了准备。游行队伍为了阻止交通运行，逼停了电车，并从司机手中夺过了操纵杆。警察第二分局代理局长卡尔加里斯正准备逮捕夺取操纵杆的工人时，遭到游行队伍中工人的袭击，他的头顶部位被硬物击中

受伤，当场昏倒。失去意识的局长被送往医院，而游行队伍从交叉
口左转，朝着芬兰车站方向前进，并在附近袭击了警官古罗特古斯，
致其后脑勺出现撕裂伤。^[126] 264

当游行队伍顺着辛比尔斯克大道前行来到新兵工厂时，新兵工厂的工人们刚好吃完午饭。为防止游行队伍进入工厂，当局关闭了工厂大门。但有一名年轻女工从其他入口潜入工厂，她呼喊道：“同志们，我呼吁大家，请放下手中的活。让我们一起去为了粮食，为了面包斗争吧。我们都饥肠辘辘，这样是无法工作的。”

新兵工厂的4600名工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罢工。兼任代理厂长的将军站在门前大叫道：“醒醒吧，你们在干什么？难道想倒戈去帮助我们的敌人德军吗？你们这些俄国的叛徒！”工人们反驳道：“这位将军，你们才是祖国的背叛者，你们才是间谍。回你的陆军老窝去吧！”“宫里面的那位皇后才是祖国的间谍！”^[127]

工人们继续前进，当他们到达菲尼克斯工厂时，发现那里的2000名工人早已候在工厂外面。附近的罗森克兰茨工厂和普罗梅特工厂分别在下午2时和3时发动了罢工。彼得格勒金属制造厂虽然早上10时就召开了集会，但最终没能讨论出结果。午饭过后，该厂再次召开集会，终于在3时发动了罢工运动。^[128] 就这样，到了下午3时，第一警察局管辖范围内几乎所有的主要工厂都实施了罢工。

维堡区最北面的伊瓦苏工厂于下午2时召开了集会，会上提议“把今天当作妇女平等权利日进行庆祝”。工厂方面承诺，面粉今天到货，当地面包店明天就能增产面包，同时工厂也会生产面包。对此，工人们一开始要求工厂将承诺事项张贴公示，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罢工。^[129]

罢工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下午4时回到了契夫宾斯卡亚大道，最后，从未参与过罢工的官营彼得格勒枪弹制造厂也有5000名工人加入罢工的队伍。^[130] 由此，维堡区彻底进入总罢工状态。 265

彼得格勒区隔着涅瓦河，与维堡区遥遥相望。这里，那些一直积极响应维堡区号召，敢于革命的工厂也加入了罢工运动。从具体参与人数来看：詹姆士·贝克福织厂有1300人，谢苗诺夫机械加工工厂750人，兰根吉潘机械加工工厂1200人，杜富隆电机厂700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加入游行队伍。下午3时，4000人规模的游行队伍从维堡区出发，经由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桥进入彼得格勒区。在大多沃利昂斯卡亚路和小多沃利昂斯卡亚路交会的十字路口，警察队伍迅速拉起了围栏警戒线，阻止游行队伍前进。虽然部分工人想转向平等桥[※]方向，但是那边也被警察封死了。^[131]

这一天，只有维堡和彼得格勒这两个区进行了罢工和游行。在其他区，市外的伊佐拉工厂、市内纳尔瓦区的普契洛夫工厂均处于关闭状态。由于有加薪诉求，莫斯科区的彼得格勒车辆厂的工人们也发起了罢工运动。除此之外，在其他区，如科洛姆纳区的法俄合资工厂仅于傍晚6时召开了集会，并没有真正罢工。3000名工人参加了集会，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解决面包供应不足的问题。关于战争问题，工人们各持己见，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并存。也有人发表演讲，认为应该支持维堡区的同伴们。科洛姆纳区警察局第二分局的局长汇报如下：

大多数人都反对引起任何形式的骚乱，因此他们决定今晚继续工作。明天早上将再次召开集会，决定今后行动的走向。集会和平解散。^[132]

这样来看，从早上到午后时分，维堡区的罢工范围整体呈不断扩大趋势。到了下午4时，维堡区完全进入总罢工状态，事态危急。

※ 平等桥：即圣三一桥，1918年更名为平等桥，1934年更名为基洛夫桥，1991年恢复原名。

然而，市中心地区一直到傍晚都风平浪静。后来，特别市市长巴尔克在1929年的亲笔回忆日记中写道：

上午10时，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向我报告说，有群众聚集在利特尼桥、平等桥、利特尼大道以及涅瓦大街游行示威。我当即意识到这次和以往不同，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征召广场、涅瓦大街和市议会所在区域。聚集的群众中女性较多，尤其以老年女性、大学生以及中小学生居多，和以往的游行活动相比，工人所占人数较少。……聚集在一起的群众缓慢而有序地向前行进，熙熙攘攘，有说有笑。到了2时左右，便可以听见慷慨激昂的高呼声——“给我们面包，给我们面包”，如洪水一般，势不可当。这样的光景每天随处可见。^[133] 266

也就是说，巴尔克在他的回忆录中丝毫未提及工人们在维堡等地发起的激烈斗争运动，只记录了这种不知所然的奇怪游行。这明显是在掩饰自己的应对不力。安保部长格洛巴乔夫的记录也如出一辙。在他的回忆录中，23日发生的事情被草草带过，“维堡区的部分工厂发生了一些由薪资引发的罢工”^[134]。或许这也是出于为自己开脱的心理。关于首都中心地区发生的事情，巴尔克记录的内容都是其主观歪曲、粉饰后的产物。虽然历史学家加奈林曾引用过该回忆录中的描述，但这并非一段真实的内容。^[135]

这一天，维堡等地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越过涅瓦河，毅然决然朝着市中心进发。这是最值得人们关注的举动。这一举动表明，“2·14”在国家杜马示威游行的号召以及涅瓦大街的示威游行已经深深铭刻在他们的脑海中。从上午开始，警队就加大了利特尼桥附近地区的警备力量，全力抵抗游行队伍的进攻。游行队伍中一部分



上：涅瓦大街
左：二月革命时在利特尼大道修筑的路障以及士兵们
下：位于利特尼桥附近的彼得格勒大地厂



群体穿过彼得格勒区，并试图经由平等桥进入市中心，但如前文所述，遭到了警方的阻挡。

然而，到了下午4时左右，工人们有的一个一个过桥，有的穿过结冰的涅瓦河，纷纷向市中心前进。下午5时，200人左右的游行队伍突破了利特尼桥，冲进了彼得格勒大炮厂（原兵工厂）的更衣室。早已处于警戒状态的警察拔出军刀、举起手枪驱赶闯入者。但游行队伍从其他入口进入工厂内部，成功让工厂内1900名工人加入到罢工队伍之中。此外，另一个游行队伍进入该工厂的其他楼栋，动员了以女工为主的3000名工人参加罢工。一个小时后，游行队伍从利特尼桥出发，向涅瓦大街方向前进，但在途中遭到警察拦截，被强制解散。^[136] 268

下午4时40分左右，来自维堡区的千人游行队伍进入相邻的奥夫塔区，动员奥夫塔纺织厂工人加入罢工。^[137] 游行队伍渡过涅瓦河，进入罗日杰斯特温斯克区，接着沿斯沃罗夫斯基大道南下，向涅瓦大街前行。工人们在这里逼停了电车，从司机手中抢过操纵杆。

涅瓦大街也出现过几次游行队伍，但立刻被警察队伍及骑兵巡逻队强制驱散。进入涅瓦大街的游行队伍来自北方，想必他们几乎都来自维堡区。不过，由于被捕人员中有普契洛夫工厂的员工，所以可以推测该工厂的工人也参与了游行。

许多报告都显示，游行队伍的主力军是“妇女和未成年人”。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面包”。游行队伍的暴力行为至多表现为逼停有轨电车，与警察的冲突很少（游行队伍对警察的暴力行为仅有4例），共21人被捕。在维堡区，破坏商店的行为也少之又少。有报告称，在彼得格勒区，一家名为菲利波夫的知名面包店遭到破坏。但真实情况其实是，200多名客人排队买面包，轮到他们的时候面包却已售罄，由此激起了大众的愤怒，三个橱柜及店内的镜子被砸得粉碎。这件事给民众带来了不小的冲击。^[138]

关于这一天市中心的罢工情况，安保部的数据显示，有43家

工厂参与罢工，共计78443人；警卫安保局的数据显示有50家工厂，共计87534人；雷伯洛夫的研究显示有49家工厂，共计128388人罢工（似乎包含普契洛夫工厂和伊佐拉工厂在内）。^[139] 这次罢工规模稍逊于1917年的“1·9斗争”，却具有划时代意义。自1914年后，
269 游行队伍现身涅瓦大街并逼停有轨电车的情况还是首例。

原本应由特别市市长巴尔克少将负责镇压示威群众，然而军队收到报告，得知维堡区的两名警官遭遇了暴行，以此为由头，下午2时，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宣布全域进入“二级警戒状态”，让军队全权维护首都治安秩序。哈巴洛夫担任警卫长，作为他的代理人，帕布雷恩科夫上校立即进入特别市市政府办公大楼。自此，特别市市长巴尔克在警卫工作中只能充当观察员的角色。^[140]

驱赶示威队伍的任务主要由警察、巡逻队以及宪兵负责，此外

特别市市政府办公大楼



还出动了一部分哥萨克骑兵的巡逻队及两个骑兵小分队。警卫长哈巴洛夫不希望出动步兵，而是考虑先派骑兵。他从红村召集了骑兵第9预备团，随后又从巴甫洛夫斯克团召集了近卫军混合哥萨克团的一个连。^[141]

国家杜马当天本来计划审议设立国家卫生总局的法案，但是雷恩局长表示法案已被撤回，因此改为讨论粮食问题。讨论持续了整整一天。下午5时半，国家杜马转而讨论普契洛夫工厂和伊佐拉工厂解雇工人的问题。会议就是否通过齐赫泽和克伦斯基等人的提案展开了讨论。斯科别列夫结束发言后，克伦斯基谈及市内的情形。他说：“在我们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是现在，街上站着上千名饥肠辘辘的妇女和儿童。他们上街游行的缘由只有一个，那就是面包。”这是此次杜马会议第一次提及市内的情况。之后，克伦斯基又表示，在大战爆发之时，“值此民众水深火热之际，作为一个欧洲化国家，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机构，必须把人民组织起来。但正由于完全没有做到这些，才导致了今天的危机”。他进而 270 强烈要求政府全体辞职下台，他说道：

我们要求权力必须无条件服从国家的要求。我们要求诸位立刻离职……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涅瓦大街已被群众淹没，这是最明显的信号！救亡图存，更待何时！必自今日始！市民们！守护你们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你们是俄国人！^[142]

经米留科夫修正后，克伦斯基的提案以117票赞成、111票反对获得通过。^[143]

当天夜里，工人们举行了两次重要集会。一是在彼得格勒区谢苗诺夫机械加工厂的疾病互助基金会办公室举行的集会，由“工人



喀山大教堂。前为涅瓦大街

团”的活动家召开。消费合作社和疾病互助基金会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经过商讨，他们一致同意“尊重人民的愿望，让群众以‘面包与和平’为口号上街游行，并引导群众向市中心和国家杜马进发”，即借助群众游行的势头，实现向国家杜马进发的最终目标。^[144]

二是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维堡区委员会的联合会议，由布尔什维克党召开。托洛茨基也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动员军队，并筹备武器；继续罢工活动，于24日在涅瓦大街举行示威；向各工厂派遣同志，通过简单集会来尽可能动员人们参与游行；以“打倒专制”（Doloi samoderzhavie）、“反对战争”（Doloi voynu）为口号；示威游行的目的地为喀山大教堂前。^[145]供职于安保部的奥西斯·奥泽利反对军队卷入斗争，并大力支持朱可夫（爱立信工厂）的提案，即破坏监狱，而不是到涅瓦大街举行示威游行。他企图打乱计划，但没能得逞。

另一方面，在城市南部、西部设有活动点的区联派好像对23日发生的、以北方维堡区为中心的行动毫不知情，他们还在派发传单，号召工人从24日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罢工，抗议资方关停普契洛夫工厂。但这样的动员已经跟不上形势了。^[146]



特别市市长巴尔克的回忆录中写到，当晚11时，在市长办公楼大会议室召开了警卫部队负责人会议，但该内容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巴尔克写到，在会议上，哥萨克骑兵没有配备皮鞭的问题被提上议程，警卫长哈巴洛夫下令立刻为哥萨克骑兵调配皮鞭。这也与事实不符，历史学家加奈林曾把巴尔克所写的内容当作真实事迹加以引述，这是不准确的。根据巴尔克的回忆，“会议结束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离场。军人们坚信，只要军队一出动，社会秩序立刻会恢复稳定”。安保部长格洛巴乔夫向巴尔克报告说，第二天应该是风平浪静的一天。用巴尔克的话说，“夜晚一片静谧”。^[147]这一记述的真实性也让人怀疑。

2月24日——罢工规模扩大

272

2月24日，市内贴出了一张哈巴洛夫下令颁布的告示。

彼得格勒配给面包工厂的面粉保持着和往常一样的供给量，我们绝对不允许出现面包售罄的情况。如果一部分店家出现面包短缺的情况，恐怕会引起巨大的恐慌，从而导致群众大量囤积干面包。彼得格勒有充足的黑麦粉，并且后续供给充足。^[148]

早晨，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邀请农业大臣立契夫一起前往市内会见戈利岑首相和陆军大臣勃列艾夫，希望能召开会议，让市政府全权掌管粮食调配事宜。^[149]

但是，当天民众斗争运动规模愈发扩大。^[150]彼得格勒以及纳尔瓦区的罢工浪潮向其他工厂蔓延开来，甚至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地区。科洛姆纳区的法俄合资工厂全面罢工，罢工狂潮甚至蔓延到了海军造船厂。从早上开始，瓦西里岛区，维堡以及彼得格勒两地的工人

大批加入，西门子-舒克特军需工厂、国家波罗的海造船厂、联合缆绳厂、S&H电机厂以及拉费尔姆烟厂等战时均未参与过斗争运动的企业纷纷投身罢工潮。在第一市区，西屋器具制造厂和新棉纺织厂等工厂也纷纷加入了罢工行列。安保部数据统计显示，当天有131家工厂、158583人参与罢工。而根据雷伯洛夫的研究，这一数据猛增至224家工厂、214111人。¹¹⁵¹到了第二天，经过斗争前夕以及斗争的持续发酵，罢工运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当天早晨，队伍内部就示威游行的发展方向以及方针产生了争执。在伊瓦苏工厂，活动家在早晨的集会（3500人）上向大家呼吁：
273 “让国家杜马推翻现政府，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并且不断号召大家下午3时在国家杜马所在地集合。虽然集会上已经确定了“推翻现政府”的方案，但是并没有讨论决定是否向国家杜马寻求帮助。¹¹⁵²在彼得格勒区的薛提宁飞机制造厂，罢工运动领导人吉洪诺夫致力于与维堡区的工人同心协力推进运动。他主张“首先应该获得面包”，但如不能以合法手段获取，则需要诉诸暴力。于是，他提议以“推翻政府，打倒君主制，反对战争”为口号，呼吁大家以手边之物“武装自己”。但是他同样也把示威游行的目的地锁定为国家杜马。¹¹⁵³

另一方面，在这一天，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了一贯的方针，游行示威在涅瓦大街举行。毋庸置疑，这一行为符合现实情况，同时也是民心所向。

在维堡区，游行队伍从早上开始便大举进攻，占满了整条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道。起初工人们不得不和哥萨克部队对峙，局势一度非常紧张，不过这并没有演变成激烈的骚乱，军官只不过带领部队骑马冲进了队伍，穿行而过。工人们纷纷欢呼“乌拉乌拉”，游行声势浩大。¹¹⁵⁴部队出动第一天，哥萨克骑兵就对镇压游行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态度，这引起了警察当局的不满。

上午9时，维堡区游行队伍发展至约4万人，并大举涌至利特尼

桥。当时负责加强大桥戒备的除了警察和巡逻马队外，还有哥萨克骑兵的两个半连以及莫斯科团的两个连。工人群众被多次击退，但没有停止攻势。终于^[155]，在10时许，大约有5000名工人突破防线，涌进了市内。工人们见警察拔剑，纷纷投掷冰片对抗，并逃至位于左手边的河岸大道以及西帕雷尔那亚大街。之后，游行队伍卷土重来，武器不再局限于冰片，而是抓着什么算什么，把木铲等纷纷扔向警察，部分警察头部负伤。最后，游行队伍被控制在大桥上，无法行动，他们大喊着“吸血鬼”“给我们面包”，但最后还是宪兵队的紧逼下步步后退，而一部分队伍则穿过结冰的河流，向着涅瓦大街前进。

关于这支游行队伍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的戈尔坚科说是“反对战争”“工兵同盟万岁”“打倒专制”“消灭吸血鬼”“革命万岁”²⁷⁴等，但是在卡尤罗夫的记述中，其口号仍与“面包”相关。相关证言显示，虽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指导下，工人们“打倒专制”和“反对战争”的口号上做了大量准备，但是工人们对于“反战”的态度则“更加复杂”。^[156]总之，从警察的报告来看，与“面包”相关的口号应该出现在更早之前。

在彼得格勒区，示威队伍同样从早上开始便朝着市中心前进。虽然队伍行进到了平等桥，但最后还是被巡逻马队和哥萨克骑兵击退了。游行队伍中除了工人，还有“相当多的大学及初高中生”。此外，上午11时左右，6000—7000人的游行队伍由少年男女打头阵，顺着卡门诺奥斯洛托夫斯基大道南下，遭到了巡逻马队的阻拦。这时，出现了向警察开枪的枪击事件。当天在同一地区，还出现了另一起枪击事件。另外，在游行进行过程中，一名17岁的实业学校学生散播谣言，称巡逻队射伤一位妇女，因此遭到逮捕。所以，当天的游行有两大特征：发生枪击以及有学生参与。^[157]

这天，瓦西里岛区也爆发了示威运动。上午9时，处于罢工状态的S&H电机厂的工人们尝试举行示威游行，但被警察强制解散。

之后，5000名工人再次组织队伍卷土重来，沿着中央大道向西挺进。警察仅凭巡逻马队的力量无法镇压，便向赶来的哥萨克巡逻部队寻求帮助，希望能通力合作，一起镇压游行群众，但是哥萨克部队落荒而逃。^[158] 中午12时，由4500—5000名女性和未成年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拐过中央大道和军用铁蹄厂的交会处，到达军用铁蹄厂。他们一边大声呼喊“放下工作”，一边试图冲进工厂里。警察力图阻止，游行队伍便投掷冰片反抗。于是，工厂的工人也开始叫喊“给我们面包，给我们面包”，并纷纷罢工。附近的食品店遭到破坏，面包散落一地。有轨电车也被逼停，甚至被推翻在地。之后，芬兰团士兵加入镇压大军，游行队伍终于在下午4时得到控制，现场秩序也得以恢复。在这一过程中，一名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的学生在军
275 用铁蹄厂附近被抓，因为他随身携带着写有“反对战争，和平万岁，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的文书。^[159]

首都面包店协会的代表找到哈巴洛夫司令，向他抗议，具体时间不明。当天早上张贴出来的告示给面包店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人们指责面包店的人将面粉隐藏起来或者拿到黑市贩卖，让他们头

跨越涅瓦河的平等桥。对面是彼得格勒区。但是，二月革命时河面结冰了



疼不已。他们声称最少需要拿到5000普特（约82吨）面粉，但实际只拿到了3000普特（约49吨）。为此，哈巴洛夫向他们承诺，会提供3500普特（约57吨）的面粉。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烤面包的面包师全被征兵入伍了，面包店协会的代表希望哈巴洛夫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哈巴洛夫马上向指挥部通报，希望能够解除1500名面包师的兵役。接着，圣彼得堡工厂主协会的代表也来找哈巴洛夫，要求增加分配给工厂食堂的面粉。哈巴洛夫便立马向军队的会计部门汇报，请求后者迅速妥善处理。^[160]于是这天，首都警卫的负责人不得不埋头解决粮食问题。

哈巴洛夫召集了市长列下诺夫、代理官朱姆金、粮食负责代表贝伊思、特别市市长巴尔克、安保部长格洛巴乔夫以及帕布雷恩科夫上校，在家中召开了专题会议。哈巴洛夫要求市领导解决当前的粮食问题。但是会议只商讨并决定对面包店进行监督，让面包店将所有的面粉都用来烤制面包，并保证面包的出售。从民众在街头袭击面包店时起，之后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在这次会议上，安保部还决定逮捕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的革命家，并且要从诺夫哥罗德省调来近卫骑兵预备团的部队，因为首都的部队已经不可信任。^[161]总之，他们对当时的情况已经束手无策了。 276

这一天，中午11时以后，在涅瓦大街以及通往涅瓦大街的路上，又发生了多次示威游行。第一次示威发生在中午的11时10分。妇女和未成年人聚集在喀山桥上，共计有1000人，但只过了30分钟便解散了。中午之后，又有3000人聚集在市中心的喀山大教堂前，坚持示威了1个小时左右。群众高唱着《马赛曲》和《国际歌》，呼喊“给我们面包！”“打倒沙皇！”的口号。最后，这场示威的群众增加到了5000人。下午4时20分，又有3000人左右的群众聚集在教堂附近，齐声高唱《马赛曲》，这一次，示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162]在示威活动解散之前，有活动家发表了以“打倒

现存制度”为主题的演讲。该活动家还号召大家次日中午12时在喀山大教堂前集合。¹¹⁶³ 另一个示威活动的中心是位于涅瓦大街东端的征召广场。示威队伍从涅瓦大街一路前来，驱逐了15名巡查人员，聚集在广场中间的亚历山大三世铜像之下。他们打出“共和国万岁！”“反对战争！”“打倒警察！”的标语，高呼“哥萨克万岁”。有报告称，哥萨克骑兵还对此做出了回应。¹¹⁶⁴ 这场示威活动以口号“给我们面包”为开端，下午还加入了“打倒专制”“反对战争”等口号。这天晚上8时之前，还有1000人聚集在喀山大教堂，但只过了5分钟便解散了。¹¹⁶⁵

当天，除了示威活动之外，商店打砸事件的数量也不断激增。犯事者以未成年人为主。这些事件多发生于彼得格勒区及莫斯科区，在奥夫塔等斗争落后地区也时常可见。

示威队伍赢得了越来越多市民的支持。在瓦西里岛区，有一名女性因冲着一名警官破口大骂而被捕，她声称：“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笑不出来了！你们马上就会完蛋！”¹¹⁶⁶ 布尔什维克党人曾在书中记录下这样一个场景：在叶卡捷琳娜运河（现为格里博耶多夫运河）旁，有一名年轻的装甲骑兵排查一位中年男子，男子看上去并不像工人。他对男子说：“大叔，你有什么事吗？”那个男子却突然扯开衣服，露出胸膛，说道：“小子，你不是要吸贫苦群众的血吗，来吧，吸啊！”¹¹⁶⁷

在这天，步兵已经按照之前的部署计划守卫重要机构和建筑，但这并没能阻止示威活动的进一步扩大。这一事态加重了当权者的忧虑。陆军大臣勃列艾夫提出，要开枪警告那些越过涅瓦河的人，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哈巴洛夫的反对。¹¹⁶⁸ 这位陆军大臣在1月3日刚从副职升上大臣的位置。当时，他代表陆军部参加了皇后领导的委员会，所以在皇后的推荐下当上了陆军大臣。¹¹⁶⁹ 但他仍然只是个无能的废物。



上：征召广场（右边为尼古拉车站）



下：革命时期于该广场举行的集会

但让哈巴洛夫等人更加头疼的是骑兵及哥萨克骑兵对示威队伍的消极态度。帕布雷恩科夫上校要求驻扎在总部的顿河哥萨克*第一团团长特洛伊林下达强制指令，命令士兵去镇压示威人群。而特洛伊林回应称，因为没有给哥萨克骑兵分配皮鞭，无法有力镇压群众。于是，哈巴洛夫终于决定，向哥萨克骑兵每人发放50戈比的补助，并每人配备一条皮鞭。^[170]但是，有人认为哥萨克骑兵不可信任，也 278

• 顿河哥萨克：俄罗斯帝国时期哥萨克人军事武装的一支。在19—20世纪，顿河哥萨克部队是俄罗斯帝国最大的一支非正规军。

有人提出意见，要求哥萨克骑兵撤退到芬兰。帕布雷恩科夫决定先按兵不动，进一步观察形势。另外，特别市市长巴尔克还提出，因为发生了袭警事件，所以他申请停止警官的巡逻。但哈巴洛夫不仅否决了这一想法，反而下令将巡逻警官的人数增加到2倍。巡逻队伍原为4人一组，现在则变成了2人一组。^[171]

根据巴尔克的回忆录，那一天，直到中午都还风平浪静。他从利特尼桥出发去维堡区进行视察，然后经过彼得格勒区，最后又回到了特别市办公大楼。到了中午，工人们已经过河进入市中心。于是，巴尔克向哈巴洛夫请求出兵镇压。随后，在当天下午，决定把军区最高统帅部迁到特别市办公大楼。^[172]这一切其实发生在23日，可是在记录时却写成了24日。有人认为巴尔克是有意为之。

另外，那天也正逢国家杜马会议的最后一天。虽然官员们在会议上就粮食问题进行了商讨，但并未得出结论。当晚，由罗江科主席领导主持的参众两院及政府会议在马林斯基宫召开。会议通过决定，将由市政府负责解决粮食问题。^[173]但是，这一决定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意义何在，都无从得知。

而皇后在给沙皇的信中，首次描述了当天首都的状况：

昨天，在瓦西里岛区及涅瓦大街发生了骚乱。这场骚乱始于贫民们袭击面包店。他们在菲利波夫面包店肆意打砸破坏，于是哥萨克骑兵被叫到现场。而我则是通过小道消息得知这一切的。

皇后或许是知道菲利波夫面包店的，所以对此事件特别关注。上文已经讲过，在这封信中，皇后还表示，克伦斯基发表那些过激的演讲，应该被处以绞刑。但是在信的末尾，皇后又乐观地表示：“虽然这场骚乱在早上10时左右较为严重，但在下午1时就已平

息。如今，一切都在哈巴洛夫的掌控之中。”最后皇后写道，近卫海军兵团营长萨布林与马克拉科夫、普罗托波波夫等人在布鲁杜可夫的家中一起吃了饭。^[174]——看来，皇后想要收集各路消息。 279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布鲁杜可夫也是个怪人。他是历朝沙皇的顾问梅西切尔斯基公爵的朋友，也是其遗产的继承人。斯皮里多维奇记录下了这场晚宴的场景。晚宴上有一位特别的来宾，他就是著名的占卜师摩根斯坦。占卜师为普罗托波波夫占了一卦，他对普罗托波波夫说：“等待你的将会是前所未有的悲惨局面，你无法避免，最后只会遍体鳞伤。”听到这话，迷信的普罗托波波夫脸色铁青，意志消沉。^[175]这次占卜也与事实完全一致。但普罗托波波夫并没有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后。

当天夜里，各民主党派得知，布尔什维克党的维堡区委员会曾召开集会。对于这场集会，斯维什尼科夫记录道：“虽然大家热情高涨，但缺少整体性的指导，对其他地区相关信息的了解也不够，非常有必要将中央委员会的革命方针以宣言的形式传达给大家。”^[176]但其实，中央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方针，仅仅是与聚集在哈巴洛夫宅邸的维堡区委员会成员打了个照面而已。^[177]

2月25日——街头冲突

2月25日，罢工罢课活动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全市，甚至有了向全国发展的趋势。从安保部的资料来看，173家工厂共计有201248人参加了此次罢工；警方的数据则显示共有24万人；而根据雷伯洛夫的研究记录，参加罢工罢课的总人数为304945人。^[178]从地域来看，涅瓦区、莫斯科区两地的工厂后来也加入了罢工，奥布霍夫工厂及钢管厂两大官营工厂也在最后参与了进来。根据表1（第172页）的记录，从参加政治罢工的首都工厂名单来看，很多过去并未参与

斗争活动的工厂都参加了这次罢工。罢工罢课活动当天，报刊停刊，电车停运，并且还有许多大学生及高专生在学校里开展罢课活动。于是，此次活动演变成了无期限罢工罢课活动。^[179]

280 对掌权者来说，这一天是决定性的转机。作为警卫长，哈巴洛夫还在当天发布了一则通知：次日之前，若工人们不回到各自岗位，则立刻召集暂缓兵役的新兵入伍。同时，获知哥萨克骑兵的一系列动向之后，他只好先将骑兵控制在军营内，派遣其他部队去镇压群众。^[180]

一位名叫康德拉季耶夫的工人称，通知发布后，维堡区工人的战斗热情更加高涨。

（在新莱斯内尔工厂的早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孟什维克党以及社会革命党的成员纷纷发表演讲。他们热血沸腾，齐声号召工人们冲向涅瓦大街，向资产阶级世界高喊出自己的宣言：“争取和平！保卫我们的孩子、父亲和丈夫！”“我们渴望自由！……所有的生命都有光明的未来，反对一切扼杀这些生命的暴行！我们已无法生存，我们是人类，而非家畜！……”工人们的激情弥漫在空气中，他们每个人，都怀抱着非生即死、顽强抵抗的决心。^[181]

当天早上，布尔什维克党人卡尤罗夫与在爱立信工厂工作的同伴进行了商议。两人买了红布，做成两面鲜红的旗帜，上面还缝上了“打倒专制”“反对战争”的字样。^[182]此外，在伊瓦苏工厂的集会上，活动家们提出要将罢工罢课延长至3月1日，并且还要在喀山大教堂前举行一场和平游行。^[183]

区联派也终于做好最后一搏的准备。早上8时，索尼亚·斯里加向年轻同志下达了命令，让这些年轻人拿着自制的红旗，到喀山

大教堂前参加游行。布店还没有开门，所以科夫纳特从一位学生朋友那里拿了一条红裙子，把它剪开，做了两面红旗，一面缝上“打倒专制”四个字，另一面则缝上“反对战争，革命万岁”的字样。^[184]

维堡区的游行队伍由上千人组成，他们计划在当天上午10时突破利特尼桥。这天，第5警区警队警官夏尔菲夫率领哥萨克连的一半骑兵以及骑兵巡查队，在利特尼桥处设置了警戒线。只要游行队伍一接近，夏尔菲夫就会冲上前，对着他们高喊，令其解散。对于之后发生的事，则有不同的记载。根据警察的报告，“群众冲向夏尔菲夫，把他拉下马，用棍棒和铁锹袭击了他”。当时在巡查队和群众中，都有人开了枪。^[185]当时在事发现场的康德拉季耶夫写道：

夏尔菲夫拿着手枪和皮鞭，冲进游行队伍中。一时间，骚乱爆发。……游行队伍不断后退，夏尔菲夫则被群众包围，开始挥舞他手上的皮鞭。这时，有人把夏尔菲夫从马上拉了下来。之后，巡查队骑马逼近，双方互相开枪。再后来，巡查队伍撤退，只留夏尔菲夫一人被包围在游行队伍里。^[186]

对面的警官一开枪，顿河哥萨克第1团第4连的骑兵没有掩护警官便撤退了。之后，其他救援的警官赶到，击退了游行队伍。夏尔菲夫被送到了医院，右臂、面部及头部均受了伤。之后，有人认为游行队伍应该会毫无阻碍地跨过利特尼桥，进入市内。^[187]但维堡区各处警队提交的报告并未记录当天中午11时之后发生的事情。

当天上午9时，在位于市区东南的奥布霍夫工厂内，有14000名左右的工人一边挥舞着“打倒专制，民主共和国万岁”的红旗，一边高唱革命歌曲，准备向市中心进发。^[188]

在骚乱爆发的当天，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认为必须向皇后报

告首都的情况。于是，他在上午给皇后寄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件并未得到保留。信的内容应该是说这场骚乱并不是什么大事，让皇后安心。而皇后又把这封信寄给了沙皇，并在信中添加了自己的感想。以下便是皇后对于这场骚乱的第一反应。

282 市内的罢工罢课活动以及种种骚乱，都已不单单是一种挑
衅，而是流氓恶棍式行为。孩子与姑娘们在街上跑来跑去，大
喊着：“我们没有面包！”我想这是为了煽动大家的情绪。之
后，肯定会有工人鼓动大家不要工作。等到气温降低，想必他们
也就不会出门了。但是，这样的情况终归有结束的一天，风波终
会过去。国家杜马只要安安稳稳地做好本职工作便可。^[189]

但是，正如大家所见，市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皇后所想的那样。

从当天上午11时开始，游行队伍陆续出现在涅瓦大街上。队伍里除了工人外，还有许多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的学生。对于当时的情况，康德拉季耶夫是这样描写的：“整条涅瓦大街全被人海淹没。”那天，街上窗户大开，许多人从窗户里探出脑袋，观看街上的游行。资产阶级的阔太太们站在阳台上，向游行队伍挥舞着手中印着俄罗斯民族图案的白色头巾。^[190]有些工人看到这一幕后，愤怒地喊道：“你们这些胆小鬼！有本事下来啊！我们可不是供人观赏的！”“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混蛋！”^[191]

工人、未成年人，还有学生们（主要是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的学生）一齐涌到了利特尼大道与涅瓦大街交会的十字路口。之后，警察车队与骑兵巡查队的士兵们挥舞着佩刀将他们驱散。康德拉季耶夫在记录中写道：“群众对警察充满了敌意。”^[192]

当天中午，游行队伍沿着涅瓦大街向西前进，他们涌向位于大街中央的一栋建筑前，要求警察释放关押在其中的60名群众。

于是，负责该处警务的5名警察向哥萨克第4团第6连的骑兵请求增援，后者当时驻扎在附近的戈斯廷民市场。但连长拒绝出兵，理由是他们只听从戈斯廷民市场管区警员的指令。最后，游行队伍轻而易举地救出了被捕的60名群众，甚至还将一名警察打到不省人事。^[193]

下午1时前后，约5000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一边向着喀山桥前进。当局调来骑兵巡查队40名士兵、顿河哥萨克第4团第1连以及狙击兵第3团预备营第1连的一半士兵前去镇压。²⁸³当时，游行队伍中有群众向警察扔掷空瓶，还有人开了6枪，导致3名警察和1名士兵受伤。之后，为了震慑众人，巡查队的带队警官也开了枪。^[194]下午2时左右，游行队伍再次向喀山桥前进，其中一部分人则向一栋建筑出发，那里关押着25名群众。游行队伍要求警察放人。这时，由部队指挥官率领的顿河哥萨克第4团第1连突然倒戈，与游行队伍结成一气，用佩刀袭击了在建筑前放哨的巡查兵，放走了被关押的群众。根据报告，当时哥萨克骑兵中曾有一名士兵大骂警察：“为了钱，你们就可以无恶不作吗！”之后，游行队伍打算闯进涅瓦大街中央的一家面包咖啡厅，进而又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工人们夺走了警察的佩刀与手枪。^[195]

当天中午12时半到下午3时，在涅瓦大街东侧的征召广场上，上千名工人聚集在亚历山大三世的铜像前召开集会。当时，顿河哥萨克第1及第4团的士兵们已将游行队伍包围，但哥萨克骑兵的士兵们却完全没有行动。下午3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亚历山大·涅夫斯卡亚区，该区的第一警察分局局长克鲁伊洛夫向哥萨克骑兵下达开枪指令，但他们依旧未行动。于是，焦躁的克鲁伊洛夫殴打了哥萨克骑兵的士兵。第1团的费拉托夫十分愤怒，用佩刀一下子就把克鲁伊洛夫砍倒。克鲁伊洛夫当场死亡，骑兵巡查队也选择撤退。^[196]这时，群众高喊万岁，发出了雷鸣般的呼声。根据卡尤罗夫的记录，

在此事件发生之前，他刚刚与莱斯内尔工厂的同志向哥萨克骑兵的士兵发出呼吁：“各位士兵兄弟，请助我们一臂之力，帮助工人们争取和平，取得斗争胜利。法拉翁是如何殴打我们饥饿的工人同胞的，大家应该知道吧。请帮助我们！”^[197] 同日，继夏尔菲夫事件后，该事件对当权者造成了第二次重大打击。

另外，第一市区第一警察分局局长报告称，当天下午4时，在利特尼大道和涅瓦大街的交叉路口，有人向宪兵巡逻队投掷了两枚炸弹。随后，炸弹爆发出巨大的声响，但破坏力很小。最后并没有人受伤，只有马匹受到了伤害。^[198] 与此同时，在市议会会场前，游行队伍举着红旗，试图冲进国家杜马。士兵们向着游行队伍开了数枪，造成四人死亡。

284 下午5时半，游行队伍高举写有“反对战争”字样的红旗，向涅瓦大街中央前进。在戈斯廷民市场附近，骑兵第9预备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的一个排的士兵拦截了游行队伍。面对士兵们的威胁，游行队伍中有人向他们开了枪，打伤了骑兵部队的一名士兵。随后，龙骑兵队的一个排赶来镇压，他们向游行队伍开枪，导致游行队伍中3人死亡、10人受伤。^[199] 以上信息来源于政府官方资料，但卡尤罗夫在记录情况时，还是稍有些夸张。当时，卡尤罗夫和其他同志从征召广场出发，比游行队伍抢先一步到了戈斯廷民市场附近。他们坚持要说服那些正准备镇压群众的士兵不向游行队伍开枪。最后，他们认为士兵应该不会开枪，于是就此作罢。

对于当时的情况，卡尤罗夫是这样写的：

游行队伍逼近，离我大概只有50步的距离，我可以看到他们的旗帜……在游行队伍中，我还看到了丘格林，与之并肩的是我的儿子（卡尤罗夫的儿子，无政府主义者，爱立信工厂旗手）。随后，士兵们将子弹上膛，并且吹响了号角。一声、两

声、三声，他们连放了三枪。……我在队伍的最前方与士兵肩并肩，顺着开枪的方向朝天空望去，我心想，我是不是看错了。但当我望向游行队伍时，发现因为刚刚的枪击，他们全都趴在雪地上。在得知没有危险后，他们又立马从雪地爬起，再次齐声高呼万岁。那呼声如同雷鸣一般，从1000名群众的心中喷发而出。之后，士兵们再次连开数枪。这次，人群里爆发出尖叫与哀号，群众四处逃散。只有少数不畏死的勇士为了带走14名伤亡的同伴，还留在原地。游行活动结束后，士兵向群众射击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

游行队伍中也有人开了枪，卡尤罗夫并未记录此事。

另外，当天，瓦西里岛区彼得格勒钢管厂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动时，与来自其他区的工人活动家发生了冲突，造成四人受伤。芬兰团的一个连出兵镇压。指挥官伊奥萨中尉在入口处被工人围堵，并且还开枪射杀了一名辱骂自己的工人。

“解散！快解散！不然我就开枪了！”伊奥萨中尉一边高喊，一边扣动了扳机。之后，这个团的士兵想用汽车将这名工人的遗体运往尼古拉陆军医院，却遭到了其他工人的阻拦。其他工人将遗体搬运到了一所私人医院。^[201] 285

在那一天，游行队伍中有四人死亡，镇压方有一人死亡。其实，游行队伍中不仅有人开了枪，而且还有人投了炸弹。但是，这场游行示威并没有演变为武装斗争。^[202]

而那天游行的口号，已不再是“我们要面包”了。苏联的历史学家明茨认为，根据警察局的报告，那天，人们的口号基本上变成了“打倒专制”^[203]。先进分子们也提出了“反对战争”的口号，与爱立信工厂的红旗上所写内容一致。但是，从那天起加入游行的人将“打倒专制”作为他们的口号，与奥布霍夫工厂红旗上的字一致。

集会上的主题演讲和鼓动活动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针对这些，卡尤罗夫记录道，在征召广场的集会上，部分发言者呼吁人们支持国家杜马，支持责任内阁的要求。^[204]另外，一名十四岁的中学生保罗·斯洛瓦钦斯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那天，在征召广场，人们喊着各种口号，包括“反对战争”“打倒专制”“打倒沙皇政府”“打倒国家杜马”“俄国革命万岁”“工人苏维埃万岁”。另外，还有人用极高的声音呼喊“大赦！”。除此之外，保罗还提到，在尼古拉火车站前，有士兵提出去兵工厂拿武器装备，也有士兵表达了自己对临时政府和工人苏维埃的支持，还有人说必须去未判决人员拘留所把被关押的人放出来。^[205]此外，戈尔坚科也对当天的情况有所记录：广场上，有一名男子将爬到路灯上的学生和工人聚集起来，对他们说：“同志们，我们苦苦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要反抗压迫人民的人，不要错过一分一秒！我们要组成地区工人苏维埃，把士兵代表拉入我们的队伍。”^[206]

286 发出这种号召的到底是哪些人？他们的主张跟当时各个民主党派的主张有所差别。这些人或许曾是1905年群众示威运动的活动家，在成为普通市民后，他们看到这一切时，终于不再沉默，发出了呐喊。

国家杜马于当天12时召开会议，就彼得格勒的粮食问题进行商讨。会议决定根据鲁杰夫斯基的建议，将首都的粮食问题交予市政府处理。为此，政府要加快推进必要的立法措施。但显而易见，这一决议为时已晚，无法阻止已经持续了三天的民众抗议活动。根据当天会议上农业大臣立契夫的发言，克伦斯基给出了意见。虽然农业大臣也主张将粮食问题交予市政府解决，但他的说话方式引起了国家杜马议员的愤怒。对此，克伦斯基提出了革命性的议案：“第一，我们不能再让国家杜马赋予现任内阁更大的权力；第二，我们要建立一个使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政府；第三，应当立即

赋予国民言论、集会、结社以及人身自由的权利；第四，要让粮食问题掌握在国民自己手中……”这种提案，无疑会遭到反对。齐赫泽站起来，表示他并不反对克伦斯基的意见，但需要进一步商讨。主席同意后，提出在28日进行二次审议，之后便宣布会议结束。这一次会议最终成了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次国家杜马会议。^[207]

那么，在这一天，左翼各党派又进行了哪些行动呢？首先看一下布尔什维克党。当天上午，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受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委托，制作了宣传单。传单上的文章基本都是之前莫斯科的奥列明斯基送来的。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又对文章做了修改，所以这些传单必然不会具有顺势的煽动性。施略普尼柯夫在文章中写道：“为了进行斗争，我们要形成一个组织。我们要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工厂，甚至在整个俄国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之后，这个组织将成为战斗委员会、自由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号召大家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文章中，他们还加入了“俄国罢工活动万岁”这样的口号。之后，为了实现目标，²⁸⁷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决定提出意见，要求向莫斯科紧急派人，支持首都的工人，帮助他们开展罢工运动。^[208]这个传单的文案经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多次审阅，到了第二天26日才印刷分发。于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又进一步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施略普尼柯夫说，当天白天，工人布尔什维克党及地区委员会的代表曾多次向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提出请求，要求至少给他们分配几十把手枪，但遭到了施略普尼柯夫的拒绝。

我们不是拿不到枪，而且要拿枪也不难。只是枪并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沙皇政府的军事力量远远强于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拿到并利用他们的武器。但我害怕的是，如果我们拿到武器后，不分时间场合随意使用，就会导致我们的斗争成果化为



彼得格勒市议会

乌有。要是那些激愤的同志向士兵开了枪，那这或许就会变成对所有部队的挑衅行为，政府就有借口派兵去镇压工人。因此，我才会坚决反对你们的要求。接下来，我会让士兵加入我们的起义，全力说服他们给大家分配一些工人使用的武器。^[209]

可是这个说法，与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坚持的起义观有些出人，也和23日晚在圣彼得堡市委

委员会、维堡区委员会联合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有所不同。托洛茨基说过：“无论那些奋起斗争的人自我牺牲了多少，流了多少血，要想改变士兵的想法，只有坚定自己胜利的决心。而想要胜利，就必须有武器，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这个决心是绝不可能实现的。”^[210]而在此之后，施略普尼柯夫却说出那样的话。有人认为，他是在见风使舵。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帝国陆军将领、服从苏维埃政权统治的
288 改革派成员马鲁图伊诺夫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当天，军队总共有两次动武，每一次都是因为游行队伍的挑衅。这些都证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指示是正确的——不要无谓地去招惹军队。”马鲁图伊诺夫还在书的结尾部分称赞了施略普尼柯夫的做法，将其称为“特别的贡献”。^[211]从游行示威爆发到此时，工人们并没有经常使用枪支，枪支也只是游行活动斗争性的一种体现而已。在2月的群众运动中，工人的武器装备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于当天傍晚在彼得格勒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斯科罗霍德夫、丘格林、修托格、加申，还有后来才

到场的扎鲁茨基、奥西斯·奥泽利。据扎鲁茨基回忆，当天先到的四个人说：“目前战斗惨烈，牺牲众多。考虑到沙皇专制制度已将军队、哥萨克骑兵及其他武装力量纳入自己麾下，所以我们决定呼吁工人们停止游行示威。”如果他的回忆属实，那就证明丘格林等人曾有过一时的动摇。他们一直站在游行队伍前列，抵抗着军队的子弹袭击，并且刚刚失去了许多工人同胞。后来加入会议的扎鲁茨基分析了其他人所掌握的信息，他认为军队还在左右摇摆，没有确定立场，并且他提出“革命就要流血”的观点，说明了“强化、深化斗争的必要性”。于是，丘格林等四人不再动摇，根据扎鲁茨基提出的方案，确定了“让男女工人与士兵打成一片，使士兵加入示威”的策略。之后，安保部门的密探奥泽利姗姗来迟，他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但已经来不及了。扎鲁茨基应其他同志的要求，“制作了几个写有短口号的标语牌”^[212]。

警卫安保局的报告^[213]大概也是按照奥泽利通报的内容写的。根据警卫安保局的报告可知，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做出了几个决定。

第一，传单上的日期要注明为2月25日。根据公布此史料的巴尔什泰因等学者注释，该决议附有圣彼得堡市委员会传单《致士兵兄弟们》的文稿草案^[214]。传单正文如下：

（斗争）进行的第三天，我们彼得格勒的工人公然要求废 289
除专制制度。它造成人民牺牲，国家粮食不足，导致各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各位士兵同志们！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只有工人阶级和革命军队的兄弟同盟，才会真正想要解放被奴役的人民，只有他们想要结束这场同胞之间毫无意义的互相杀戮。打倒沙皇君主制！革命军队兄弟同盟万岁！^[215]

虽然我们无法判断这个内容精短的传单是何时印刷的，但比起

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印发的传单，这个传单的内容更加明确，也更加契合当下的斗争形势。

第二，为了系统地指导斗争，扎鲁茨基等人决定在第二天26号的早上召开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全体大会。史料记载，他们几个人还提出：“如果政府没有积极采取措施镇压群众骚动，那我们就在2月27日星期一设置路障，并且切断市内的水电供应及电报通信。”我们可以从这个决定看出，1917年的起义是在效仿1905年的起义。

第三，“立即在工厂成立工厂委员会，并从委员会成员中选出代表派往‘情报局’。‘情报局’这一机构连接着上层组织与工厂委员会。它将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的指示传达给工厂委员会，并指导其在指示下行动。……将来，‘情报局’会成为像1905年‘工人苏维埃’一样的机构”。扎鲁茨基等人认为，“情报局”是1905年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所构想的“工人苏维埃”的延续。他们还想将其打造为党强力领导下的苏维埃机构。即便事实并非如此，但比起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只会空喊“建立党的委员会”的口号，扎鲁茨基等人还是付诸实际行动了的。只是当时市内已经有人开始号召大家建立苏维埃政权，可扎鲁茨基等人却将其看作将来的事情，这未免过于消极。

当天夜里，维堡区委员会会议再次召开。斯维什尼科夫回忆道：
290 “在工厂里，有人提出要选拔代表参加工人苏维埃。区委员会想将这个选拔权掌握在自己手里。”^[216] 在此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并不明白，区委员会的这一提议（将选拔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到底有什么深意。

另外，区联派提出在斗争过程中，要在反战的四个党派之间建立一个“信息联络中心”的想法，并成功实现。虽然具体时间并不明确，但他们最晚在24日左右召开过一次会议。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议上，区联派的尤列涅夫、初始派的索科洛夫斯基、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什维克党中属立陶宛人团体的律师波利

拉均出席会议。其间，波利拉主张建立一个“如同1905年的工人苏维埃一般”的组织，并且，他反对索科洛夫斯基召开立宪会议的提案。另外，尤列涅夫表示，他的主张与圣彼得堡市委委员会的主张在原则上一致，但他认为：“为了能够顺利向群众提出我们的口号，我们应该先静待观察，明辨形势。”^[217]很明显，如今，无论是区联派、初始派，还是社会革命党左派，大家都不看好革命的未来，而且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也持消极态度。

与之相对的是，“工人团”的后继组织提出要举行“2·14”国家杜马会议，并主张开展决定性的革命行动。他们在当天就已经定下了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明确方针。当天下午3时，在位于涅瓦大街东端144号的彼得格勒工人消费合作社总部内，30—35人在此召开了一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成员包括孟什维克的国家杜马议员、革命活动家以及市区各个地区的工人。社会民主工党的议员齐赫泽、孟什维克国防派的切列万宁、消费合作社的伊·格·沃尔科夫和卡佩林斯基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上，大家报告了各个地区的情况之后，便就如何组织运动，如何找到当下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首次确定，必须以1905年的工人苏维埃为模板来组织当下的工人苏维埃。他们迅速交换了意见后，全场一致决定：必须立刻组织建立工人苏维埃。于是，他们制订了组织的组建计划，并确定了一个中心组织（即工人消费合作社、疾病互助基金会），以此汇集各个地区代表所提供的消息。他们将这个中心组织命名为彼得格勒工人消费合作社，负责汇集每个地区组织的信息。并且，他们规定，出席该会议的各个地区代表必须将会议决定传达给自己所在地区的所有工厂。此外，他们还决定要在第二天召开苏维埃会议。^[218] 291

评论家苏汉诺夫掌握着各个左翼党派的动向。他在书中写到，他听说成立工人苏维埃组织这个方案是由切列万宁提出的，齐赫泽对此面露难色。^[219]但其实，苏汉诺夫弄错了事情的真相。事实上，成立工人苏维埃组织是对成立“工人团”这一既定方针的实践。

但是，这一方案在实施之前，受到了当局的阻挠。那天会议结束后，参会者又分成两组，再次召开了会议。一组是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的阿诺索夫斯基等人，另一组则是各个社会团体代表，他们开的是市议会会议。然而当晚，参加“工人团”会议的28人全员被捕，他们的计划也因此中止。

当天，各个党派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有所行动。《记事》杂志的主编苏汉诺夫认为24日时革命“已成事实”，并开始研究革命后的政权问题。他认为在沙皇专制时期，民主势力十分分散。首都的民主派想要行使权力时，总会受到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的阻挠。因此，当战争反对者有执掌权力的机会时，他们就只能呼吁大家立即停止战争。但这使得新政权的建立变得更加困难。可以说为停战创造条件才是革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基于这种想法，苏汉诺夫认为应该建立“资产阶级权力”，而不是民主主义派别的权力。他甚至认为，为了能让米留科夫执政，应该放弃“反对战争”的口号。^[220]

292

苏汉诺夫与律师索科洛夫商议，想在25号下午3时召开一场会议。这场会议在位于谢尔吉耶夫街（安广街）的索科洛夫家中举行，出席会议的是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民粹党派的右翼分子。会议上，大家都表示苏汉诺夫的提案令人意外。而会后，苏汉诺夫又去了作家高尔基家，与巴扎罗夫和吉洪诺夫进行了商谈，他们对当下的形势都持悲观的态度，而且也并不关注改革后的政权问题。^[221]

那么掌权者怎么想，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迄今为止，无论是内务大臣还是军区司令，都没有人向最高统帅部和沙皇报告过事态的发展。但如今，已经不得不报了。当天，在哥萨克骑兵杀害了克鲁伊洛夫后，傍晚，普罗托波波夫和哈巴洛夫两人向最高统帅部的皇宫警卫司令沃耶科夫和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发去电报，报告了23日之后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们第一次向上汇报这些情况。

首先，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在汇报时表示，首都的动乱是由面包供应不足引起的。“今天，在征召广场的亚历山大三世铜像四周，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骚乱。在这场骚乱中，警察分局的局长克鲁伊洛夫遇袭身亡。群众的游行示威是自发的。游行队伍确实做出了种种反政府的过激行为，但他们有时也向军队表达敬意，为了防止动乱进一步扩大，军队正在商讨一切可能的应对方法。”^[222]

军区司令哈巴洛夫的报告也基本相同。

军队士兵并未使用武力。其中，有四名警察受了轻伤。25日，也就是今天，工人们本来想要进入涅瓦大街，但已被我们成功阻止。哥萨克骑兵还将已经进入大街的群众驱逐了出去。今天早上，维堡区警察局副局长的手骨折了，头部也被钝器打伤。下午3时，在征召广场，正当警察们驱散群众时，警察分局的局长克鲁伊洛夫遇袭身亡。^[223]

报告轻描淡写地叙述了这十分严峻的形势。跟随沙皇的少将都本斯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陛下今日虽看上去心情愉悦，但又好像被不安的情绪笼罩着。”^[224]从这样的电报中我们能看出，他们大概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这一点上，各个将军都是如此。

而令人震惊的是，首相戈利岑和大臣们竟在25日晚上开会讨论，该怎样下达命令，让国家杜马休会。当天深夜，首相把内阁成

员以及哈巴洛夫、巴尔克召集到自己位于莫霍瓦亚大街的家中，开了一场内阁会议。其间，大家都表示，现在街头的骚乱已经十分严重。而这时，首相却将“下达解散国家杜马的命令”当作会议的主要议题。这并不是沙皇的指示，而是首相戈利岑自作主张。但是，首相本人应该不会提出如此专断强硬的政策，这恐怕是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的主张。普罗托波波夫一直认为街上的游行队伍是由国家杜马操控的，解散国家杜马，将有益于事态缓和。

首相戈利岑那里有一份既没有日期，也没有正文，只记载着有关国家杜马休会命令的文件。这份文件是前一年12月，沙皇交给上任首相特列波夫的。当时，沙皇对他说：“必要的时候就用这个。”而在内阁会议上，只有普罗托波波夫赞成解散国家杜马，其他人均表示反对。因此，该提议仅会上做了讨论，并未实施。戈利岑首相也选择了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及其他数名大臣表示，如果解散国家杜马，也必须更换内阁成员。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要罢免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会议期间，特列波夫、日林斯基、尼古拉·麦克拉夫等人及国务会议的右翼议员们也来到首相宅邸，要求首相迅速发布戒严令。而其他大臣却表示反对，要求军区司令采取强硬措施。另外，波克罗夫斯基和立契夫受首相委托，和国家杜马中有权势的议员见面，打探这些议员对休会命令的反应。¹²²⁵在之后的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上，虽然陆军大臣勃列艾夫如一位积极人士一般表示，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等人要做好辞职的心理准备，并应该与国家杜马达成协议¹²²⁶，但如果让国家杜马休会，与国家杜马之间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的，波克罗夫斯基也没有特别大的热情。这场内阁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

当天夜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位于涅瓦大街中段的市议会大楼
294 里召开了会议。原本市长列下诺夫是为了与大家探讨关于实施粮票

制的问题才召开了此次会议。除了国家杜马及市议会的议员们，市卫生监督站、社会救济署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晚上9时，会议刚开始，工人们便涌进了市议会的大楼。会议在市议会主席巴兹诺夫主持下召开。首先，市长报告了前一天晚上与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及政府共同商定的决议，他们决定让市议会负责首都的粮食管理。^[22]对此，卫生监督站的代表马格里斯、市议会议员齐思加高夫及国家杜马议员申加廖夫一致要求：允许工人派代表加入负责粮食管理的地区粮食委员会及中央粮食委员会。之后，市议会议员什尼特尼科夫表示如今的政府十分无能，应该让权给联合内阁。他的意见一出，就有一名参加游行的市民开始发表演说，高呼着：“在涅瓦大街上，警察已经向群众开枪，我们现在必须行动起来，明天就迟了！”此时，在会议上，联合了“工人团”的消费合作社的伊·格·沃尔科夫登台发言，他首先要求全场起立，为所有参加游行并无辜被杀的工人默哀。接着，他表示，这些参加示威的群众，除了要得到面包以外还有其他要求。他批判了市政府的种种态度，并且做了如下发言：“只有实行体制上的民主化，才能解决混乱的粮食问题。粮食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有一半要由工人充任。星期一应该举行粮食委员会的代表选举。”

这时，克伦斯基出现在会场上，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他表示：“提出让政府现在将粮食问题交给市自治机构解决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要小心‘达那厄公主们的礼物’（指木马计中送给特洛伊人的假木马）。”他认为，如果能让市自治机构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让政府全面同意由市民和工人来解决问题。克伦斯基为了向大家证明政府根本无意解决粮食问题，便告诉他们：工人们在利特尼大道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总部召开了一场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会议，而所有参加会议并计划来市议会的工人全被逮捕了。克伦斯基号召大家进行抗议。听到这些，国家杜马议员斯科别列夫表示：“现在的

政府茫然不知所措，我们要趁这个时候果断行动。”他还要求政府下台。此外，莱斯内尔工厂疾病互助基金会的萨摩杜洛夫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推翻”目前的政府机构。最后，克伦斯基站起身来，号召大家再次为游行中的牺牲者默哀。最后，这次会议变成了一场支持工人街头政治运动的政治集会。

与此同时，在距离市议会600米左右，位于涅瓦大街南边的皇家亚历山大剧院中，莱蒙托夫所创作的戏剧《假面舞会》正在上演，这是这部剧的首演。这所剧院中被称为奇才的梅耶荷德与舞美负责人戈洛文从1912年起就开始准备这场演出。首都上层阶级的名流贵族纷纷乘车前往观看。演出稍有推迟，但当大幕正式拉开之时，剧院内已座无虚席。层层垂幕从舞台一直架设到观众席上方，观众们仿佛身临其境地参加了这场华美盛大的假面舞会。戏剧的高潮部分是主人公阿尔别宁含恨而死的场景。他在妻子尼娜死后，被戴着鸟喙面具的“陌生男子”追究罪责陷入窘境，一口喝下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场戏剧展现了在壮丽奢靡的世界中众人一直期待的一场葬礼。对于奋不顾身与即将消亡的沙皇政权进行斗争的人来说，这场在帝国剧院舞台上演的戏剧为注定走向死亡的灭亡者们敲响了丧钟。“陌生男子”在目睹阿尔别宁倒下后说：

一直以来，我都在考虑复仇之事。今日终于得以报仇雪恨。^[228]

那天深夜，负责镇压群众运动的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坐镇海军总部前的特别市办公大楼。当天傍晚时分他接到报告称，维堡区的警察局已经基本被民众破坏了。警察可能都被杀了，不知所终。第一警察分局局长在对他唯命是从的工人的帮助下，伪装成负伤者逃了出来。火药工厂局的局长也从门卫那里买来破衣烂衫，伪装成流浪

汉逃走了。彼得格勒市东北部地区也基本被攻陷。^[229]

在这样的情形下，晚上9时，沙皇发来电报：“我国与德奥两国交战，正面临困境，在这种时候首都发生暴乱实属不可饶恕，朕命令你在明天中午之前平息暴乱。尼古拉。”^[230]哈巴洛夫说，当时这份电报给他的感觉就像“当头棒喝”一样。晚上10时，各地区警卫队队长集合起来，哈巴洛夫当众宣读了沙皇的电报，下令：“诸位，陛下有令，明天必须平息暴乱。现在我们必须尝试最后的手段了。所以，暴乱分子数量不多、不进攻、不持旗帜时，各局配备骑兵，用骑兵驱散暴乱分子。如遇暴乱分子高举旗帜、意欲进攻，就按照《演习守则》发动进攻。也就是，先数一、二、三警告，三声之后直接开枪。”^[231]就这样，政府当局最终对起义进行了镇压。 296

宪兵队逮捕了以格沃兹杰夫为代表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之后，在天亮前又一并逮捕了早已在市内被监视起来的约100名革命派人士。^[232]虽然这100个人的具体名单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聚集在维堡区库克林宅中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成员也被逮捕。由此，布尔什维克党与维堡区以外的联系彻底被斩断。

2月26日——军队开枪镇压

2月26日是星期天，商店与政府机关也都休息。清晨，署名为哈巴洛夫中将军的布告张贴到了城市各处，内容主要是：为了维护秩序，军队将不惜动用武力。军队一如前日，加强驻守市内各个关卡。不同的是，警察不再站岗放哨，而是配发步枪，列队巡逻。^[233]

上午，走在路上的工人们都穿着整洁的假日服装，整个城市仿佛又回到了悠闲的氛围中。^[234]哈巴洛夫安下心来，下午在发送给最高统帅部的电报中，汇报完25日傍晚的情况之后，在结尾又加上了一句：“今天从早上开始，市内一切平静。”^[235]

政府方面，早饭过后，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与农业大臣立契夫召集国家杜马议员商讨对策。第一位发表意见的是立宪民主党领袖马克拉科夫。“马克拉科夫认识到，事态严重，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他认为，为了规避极端事态出现，必须解散国家杜马，因为国家杜马中有太多不稳定因素。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工作是全面撤
297 换政府成员，如果不这样做而直接解散国家杜马，可能会引发革命。这样一来，国家杜马议员中的稳健派会完全失势。”马克拉科夫将阿列克谢耶夫总参谋长推举为首相候选人，提议让原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原财政大臣、首相科科夫佐夫再次进入内阁，并提议将波克罗夫斯基和伊格纳季耶夫平调到其他大臣职位。两位大臣表示欣然接受。

接下来发言的是十月党人萨维奇，他的意见与马克拉科夫基本一致，但没涉及新部长名单。第三位发言的多米托留科夫也是十月党人，他既没有明确给出自己的意见，也没有说必须解散国家杜马。波克罗夫斯基认为他过于乐观，没有认识到危险已近在咫尺。

最后发言的是民族派领袖巴拉绍夫，他主张必须解散国家杜马，但不认为应该同时撤换政府成员。^[236]

会议暴露出国家杜马的主流派议员们虽然也身处革命风暴的正中心，却完全没有认清事态的本质。可以说波克罗夫斯基听这些人发言，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吧。

这一天天还没亮，皇后就收到了普罗托波波夫的报告，她将报告中的内容写入了呈送沙皇的信中。

昨天，市内的事态愈发严峻。宪兵队逮捕了一百二三十个人，这些人都是主犯。列下诺夫（市长）在市议会上的发言被追究了责任。在昨天傍晚的集会上，大臣们和一部分右翼议员认为应当采取严厉的措施。（加里宁在凌晨4时向我提交了报

告。)他们都希望明天能够平息暴乱,正在命人布置街垒。星期一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传单。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298
着。旭日当空,我从他的墓地上感受到了宁静祥和。他是为了救我们而牺牲的。〔237〕

信中的“他”指的是拉斯普京。收到信后,沙皇在回信中写道:“我期待哈巴洛夫能迅速平息街头的暴乱。对于普罗托波波夫,必须给他做出清晰明确的指示,我只希望老戈利岑(首相)也能知道这些情况。”〔238〕

但是到了午后,工人和学生出现在首都的涅瓦大街上,开始与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安保部的报告中写道:“在发生暴乱时,暴民对军队的挑衅屡屡发生。我们要求民众立即解散时,他们却向我们扔来石头和路上的碎冰;军队向空中鸣枪示警时,他们非但不解散,反而发出嘲笑声。只有真正向他们射击才能把他们驱散,但是大部分人都躲进了建筑物里,只要射击一停就又出现在街头。”〔239〕

布尔什维克党的卡尤罗夫被枪击中。“等待着我们的是令人恐怖的景象,一小部分游行者的伏在路上。从萨多瓦亚街到喀山大教堂,从喀山大教堂前广场到征召广场,都部署有警察和持步枪的士兵,他们持续向四面八方射击;他们只想着一件事情:肃清所有暴动。游行队伍没有任何防备,无力与实行强硬对策的政府对抗。急救马车在涅瓦大街上络绎不绝,运送着伤亡人员。”〔240〕

游行队伍在征召广场上举行了集会,卡尤罗夫写道:“我还能在这里感受到革命的气息。”安保部的人在报告中称,这里出现了一个“戴着帽子骑着马”的人,号召工人们加入苏维埃,呼吁工人们有组织地进行武装斗争,并主张去解救未判决人员拘留所里的囚犯。其 299
他人也谈到苏维埃,提起这个人,学生们曾说他是克伦斯基。〔241〕但是,他不可能是克伦斯基,他的主张与25日在尼古拉火车站附近广

场上煽动群众的言论内容是一样的，可能是安保部的人写错了报告日期，也可能是同一个人。

征召广场本是一个允许集会的场所，但最终变成了人间炼狱。安保部的报告中写到，涅瓦大街的北入口利托夫斯卡亚街、涅瓦大街与弗拉基米尔大街的交叉路口、涅瓦大街与萨多瓦亚街的交叉路口、斯沃罗夫斯基大道与第一罗日杰斯特温斯克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征召广场都出现了枪击导致的人员伤亡。^[242]这表明，来自北部（即维堡区和彼得格勒区）的游行队伍都遭到了枪击。报告中还提到，涅瓦大街的南部则相对平静。^[243]伤亡人员都被游行队伍带走了，因此伤亡人数不明，不过在下午4时半肃清征召广场上的游行人员时，现场留下了40具尸体和40余位重伤者，死者多为工人和学生。佩戴红十字臂章的中学生也参与了救护伤者的行动，安保部在报告中称，他们对警察的“态度十分无礼”^[244]。

开枪射击的主要是警官和宪兵，当然军队也开了枪。负责警戒涅瓦大街中央以及西部地区的是巴甫洛夫斯克团，负责警戒征召广场的是沃利尼团，他们都出动了教导营。

在沃利尼团教导营第1连中，教导营营长拉什克维奇上尉、沃伦索夫准尉和托卡奇拉准尉对镇压游行十分积极，但克鲁皮奇尼科夫上士从前一段时间开始就对自己执行的任务感到厌恶，士兵们也是如此。克鲁皮奇尼科夫上士回忆了当时的情况。^[245]

300 下午2时半后，拉什克维奇上尉率领巡逻队来到广场，挨个殴打、猛踹广场上的人。他粗鲁地揪住年轻女孩的衣领，还命令士兵用枪殴打别的女性，但士兵没有听从，还对女孩说：“小姐，请你赶快逃走吧。”上尉责问士兵为什么不执行他的命令，还放言“再这样老子就枪毙你”。克鲁皮奇尼科夫上士对士兵们说：“如果接到要求你们开枪的命令，你们就把子弹打向天空。命令必须执行，如果拒不执行可能会被枪毙。如果运气好当晚能回军营的话，你们自己

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吧。”巡逻结束后，在沃伦索夫准尉的指挥下，士兵们开始向游行队伍开枪，但士兵们都故意打偏，无一命中。准尉向他们怒吼：“一群废物紧张些什么？都给老子瞄准了打！”恼怒之下，他一把抢过士兵的步枪，瞄准靠墙的人，一下至少杀了四人。

据克鲁皮奇尼科夫上士说，第2连的士兵没杀人，都是沃伦索夫准尉开枪打死的。若是如此，那么征召广场上那么多死者基本上都是警察们开枪打死的，但克鲁皮奇尼科夫上士的记述可能多多少少做过润饰。^[246]

枪击事件发生后，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找了农业大臣立契夫，二人一同来到陆军大臣勃列艾夫的住所。之后，罗江科打电话质问军区司令哈巴洛夫：“为什么制造流血事件？”哈巴洛夫回答，军队不能只做被暴民攻击的靶子，必须进行反击。^[247]罗江科向陆军大臣勃列艾夫提议，可以派出消防队向游行队伍喷水。勃列艾夫致电哈巴洛夫报告该项提议后，不久就得到了回复：我们接到命令，不得为镇压动乱出动消防队，而且向游行队伍喷水会起到反效果，让他们更兴奋。^[248]

特别市市长巴尔克在军队开枪镇压了游行示威者后，彻底放下心来。据记载，当天下午许多人赶到了他的市长办公楼，他当众表示对事态发展非常满意。^[249]

罗江科始料未及，当天傍晚，他给沙皇发了一封电报，该电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事态十分严重，首都正处于无政府状态，政府已经瘫痪，食物和燃料的运输也完全中断，不满情绪持续发酵。士兵们在街头肆意挥枪扫射，有的甚至互相攻击。应当立即委派可信之人组建新政府，刻不容缓，一切拖延都意味着死亡。我向神祈祷，祈愿不要让陛下您来担责。”^[250] 301

26日傍晚，发生了一起对群众运动起到决定性转变作用的事件，那就是巴甫洛夫斯克团第4连的抗命事件，此事众说纷纭。哈巴洛夫

在27日中午12时发给沙皇的电报中写道：“2月26日，近卫巴甫洛夫斯克团预备营执行任务的士兵们向连长表示，决不会再将枪口对准老百姓。现已解除了该连的武装，并实施了逮捕，现阶段正在进行审问。营长艾克斯虔上校被人群中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开枪击中受了伤。”^[251] 在之后的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中，哈巴洛夫称，这个连由1500名左右的士兵和伤员组成，他们在军营中听说了该团的教导营向民众开枪一事表示抗议，并要求召回教导营。^[252]

另一方面，特别市市长办公楼专员阿卡奥莫夫在记录中写道：“巴甫洛夫斯克团的一个连虽然离开了军营，但拒绝开枪镇压民众，最后停驻在了叶卡捷琳娜运河附近。……从一小时后的电话汇报中可以得知，这个连被强行召回军营，官兵受到监禁。在讯问该团士兵时，发现艾克斯虔营长中枪负伤，据说开枪的是一名学生。”^[253]

特别市市长巴尔克在回忆此事时误将日期记成了25日，他的记述如下：该连在“滴血救世主教会”附近停住了步伐，召开集会。在一队骑警经过时，他们开枪打伤了其中的两匹马和两名巡警，并对赶来劝说的艾克斯虔上校表示不愿与民众为敌。这时人群中有人开枪从背后袭击了上校，导致他颈部受伤。该连在这之后继续集会，但最终还是在团里牧师的劝说下回到了军营。^[254]

因此，我们很难探究出事件的真相，即使是对此事进行过详细调查的加奈林也没能得出定论。^[255]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士兵们对向民众开枪一事表示抗议，目前他们的举动已完全背离了上级的指示。

26日晚上，各民主党派又得出了什么认识、确定了什么方针呢？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表示，应当继续尽全力使士兵们加入己方阵营。施略普尼柯夫虽然收到了民主党派召开会议的通知，却没有出席。^[256] 而且，他们当时并不知晓巴甫洛夫斯克团第4连抗命的消息。当晚，卡尤罗夫在维堡区委员会写道：“有人质疑，难道

现在已经到了呼吁大众终止罢工的时候了？”装甲车部队的艾林也出席了会议，在面对卡尤罗夫“为什么不协助我们”的质问时，他表示，第二天一定提供援助。虽然大家已不再对群众运动持怀疑态度，但还没有定下具体方针就散会了，只决定27日早上8时在卡尤罗夫家中召开会议。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的修托格和各工厂40名代表都参加了早上8时的会议。卡尤罗夫写道：“多数人都认为应该继续进行斗争，基本无人持反对意见。”^[257]

安保部的报告记录了26日晚上举行的两个革命团体集会。^[258]其中一个在最北边诺瓦亚·新村地区名为“团结”的消费合作社召开，约50人参会。这次集会决定在27日举行全体工人大罢工，呼吁群众上午10时在涅瓦大街的指定地点集合，参加25日被芬兰团军官枪杀的彼得格勒钢管厂工人的葬礼。薛提宁飞机制造厂的丹尼洛夫在演讲中高呼：“同志们！勇敢团结起来！我们不应逃避！打倒沙皇！打倒政府！临时政府万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临时政府”可能是指“临时革命政府”，由此看来，它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党或区
303
联派里的一个独立团体。

而在瓦西里岛工人格利斯马诺夫家召开的集会中，聚集了28名“布尔什维克党与统一派（区联派）”成员。本次集会上给与会者分发了面向士兵的传单，并做出了如下决定：

- （1）继续罢工游行，进行彻底斗争。
- （2）为了让工人们都走上街头，强制关闭电影院和台球馆，禁止一切休闲娱乐活动。
- （3）确保作战所需武器。
- （4）突袭警察，解除警察武装。

这天夜晚，还举行了很多这样的小型集会，因规模过小，安保

部门无法一一掌握情况。

各民主党派的集会于当天晚上在克伦斯基府邸召开，齐赫泽、索科洛夫、森吉诺夫、埃尔利希（崩得派）、斯纳曼斯基（社会革命党）、尤列涅夫、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斯基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党无人出席。克伦斯基等人表示：接下来两三天可能会爆发重大事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克伦斯基和森吉诺夫认为，尤列涅夫的意见极其悲观，并声称：“反动势力正不断壮大，军队的镇压力度却在不断减弱。……我们不是在讲梦话，也不是在为革命做准备，而是为了更好的明天，才不得不在工厂内进行系统的宣传。”^[259] 尤列涅夫在回忆录中只写道：“埃尔利希极度倾向国防派，而我们的立场与他正相反。”^[260] 区联派干部们确实表现了动摇之意。当晚，苏汉诺夫在高尔基宅中与克伦斯基通了电话，他写到，克伦斯基已经清楚了解了巴甫洛夫斯克团第4连抗命事件的来龙去脉。^[261]

当天傍晚，安保部长格洛巴乔夫被叫到了警卫安保局局长府邸，因为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要见他。格洛巴乔夫进门时，内务大臣与警卫安保局局长瓦西里耶夫正在喝饭后咖啡，他报告了当天的突发事件和军队的情况。但是，普罗托波波夫对格洛巴乔夫所说之事并未表现出担心的样子，好像只沉浸于酒醉饭饱后的满足感中。从普罗托波波夫的话可以得知，他完全信任哈巴洛夫，相信哈巴洛夫能镇压住任何暴乱。那晚，格洛巴乔夫只是了解了普罗托波波夫与皇后的关系。普罗托波波夫得意扬扬地说：“皇后是一位德才兼备而又精明强干的非凡女性。”格洛巴乔夫在离开局长府邸时，仍不知自己被叫过去的原因。^[262]

当晚9时，内阁会议在戈利岑首相府召开。国家杜马议员马克拉科夫、萨维奇、巴拉绍夫发表了意见，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和农业大臣立契夫听取意见后进行了报告，认为如果国家杜马休会，那么就要彻底更换政府班子。国家监察大臣菲奥德谢夫和交通大臣

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随即表示赞成。沙皇此前已将发布敕令的空白文件交给了首相，首相在上面写下了休会的命令和日期——2月26日。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认为，必须要在27日（星期一）国家杜马议员进入会场前下令休会，因此他在首相写完后，就立刻带着敕令离开了。波克罗夫斯基觉得他似乎有些得意扬扬。

内务大臣离开后，内阁会议开始讨论更换内务大臣的问题，但莫衷一是。陆军大臣勃列艾夫和财政大臣巴尔克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提出的撤换内务大臣的要求，他们认为，只有沙皇才能决定大臣的任免。结果，此事暂被搁置，大家也决定先看看休会敕令颁布后的效果再商议更换内务大臣之事。内阁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2时，很明显，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应对事态的能力。^[263]

普罗托波波夫将沙皇的敕令以正式文书的形式呈给了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罗江科收到文书后，在晚上10时30分给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发送了一封长电报。 305

从彼得格勒开始的这场暴乱以野火之势扩散，现在的规模已对政府造成威胁。其原因是面粉供给不足导致的面包供给不足引发的恐慌。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政府无法把国家从水深火热里救出来，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政府权力运转已经完全瘫痪，无力恢复已被破坏的秩序。俄国正遭受屈辱，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无法以胜利之姿结束战争。若要摆脱现在的状态，必须且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即在全国召集可信之人，委任他们组建可以取得全体人民信任的政府。……在感受到这前所未有的可怕后果带给我们的恐怖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走光明大道。我恳请阁下向陛下转达我最诚挚真心的想法，只求能阻止随时会爆发的灾难。现下已是刻不容缓，迟疑就意味着死亡。阁下，俄国的荣耀、俄国胜

利的命运都握在您的手中！^[264]

这封电报被送到了各方面军的最高统帅部。

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是何反应不得而知，但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布鲁西洛夫上将早在27日凌晨1时就向阿列克谢耶夫发送了一封电报，要求上奏，支持罗江科的提案，他说：“风雨欲来，别无他法。”^[265] 27日早上，阿列克谢耶夫把布鲁西洛夫的电报和罗江科的电报一并上报给沙皇，沙皇的反应很冷淡。据宫廷事务大臣证言，沙皇说：“罗江科真是蠢钝如猪，又写了一堆混账话，我根本不想理他！”^[266]

306

当晚，军营中发生了更大的变动。在征召广场上向游行队伍开枪的沃利尼团教导营的两个连一整天都一言不发，疲惫不堪。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深夜12时回到了位于利切伊娜亚区基罗奇纳亚大街的军营。射杀民众，是令他们作呕的回忆。他们接到命令，第二天（27日）早上6时起床，8时出发。克鲁皮奇尼科夫上士和马尔可夫伍长召集了所有排长。克鲁皮奇尼科夫说：“此次行动，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如果这样的话，不如为了大义而牺牲。我们的父母、姐妹、兄弟、恋人，他们也与游行民众有着同样的诉求，难道我们连他们也要攻击吗？诸位都看到了路上的血吧。我建议明天不要出动，我个人也不愿再做这样的事了。”排长们都对上士的话表示赞成。接着，排长们向班长们传达了上士的计划，并获得他们的一致同意。翌日早上5时起床后，部队以排为单位召开会议，向士兵们说明：我们发誓，我们的使命是与外敌战斗，而不是将枪口指向与我们流着同样鲜血的民众。在意见达成一致后，就各自散会了。^[267]

在市中心，民众们的斗争愈演愈烈，参加斗争的群众队伍在不断扩大。奥夫塔区的工人和工匠们虽然在斗争中比较落后，但也从那天开始公然游行。“2月26日，所有人停下了工作，包括老人和孩子在内，奥夫塔区的所有人都走上街头，组成了庞大的群众游行队伍。”

与市中心的联络被完全切断，夜里各处有人纵火，人们聚集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想威吓群众的哥萨克部队被淹没在人们的骂声中，一位少年冲上前去，向士兵们砸去雪球，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中年工人说起1905年时的情形：“哥萨克部队都没法儿靠近群众，维特（首相）只能跪在诺萨利（圣彼得堡苏维埃的领导人）面前磕头。”^[268]

士兵起义——2月27日

307

国家杜马所在的塔夫利宫内有一个庭园，庭园南部毗邻基罗奇纳亚大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的大兵营和立陶宛团的小兵营都位于此处，而沃利尼团的兵营则设在基罗奇纳亚大街入口转弯处，工兵预备队第6预备营的兵营也在附近。也就是说，三大近卫团的兵营都是相邻的，这对当日发生的事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月27日，沃利尼团全体士兵早晨5时就起床集合了，听到排长和班长们前一晚达成的一致意见后，他们立即表示赞成。一名叫作帕杰特努伊夫的士兵写道：“根本无须动员，士兵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所有人都坚定地支持工人们的行动。”^[269]

教导营营长拉什克维奇上尉于早上8时10分稍过来到了士兵们列队处。在克鲁皮奇尼科夫上士留下的文字记录中，记载了有关这一决定性时刻的情形。

克洛科洛夫准尉发令：“全体都有，向右看齐。”拉什克维奇跟我打招呼：“早啊，克鲁皮奇尼科夫。”这时，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大喊：“乌拉！”上尉停下了脚步，脸上露出一抹扭曲的笑容，问道：“到底怎么了？”列队中的奥尔洛夫上等兵大声回答：“伤亡已经够多了。”上尉将右手抄在口袋中，朝列队前方走去，士兵们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上尉问马尔可夫伍长：“大

家为什么高喊‘乌拉’？给我解释清楚。”马尔可夫回答：“我们不会再向群众射击，我们不愿再制造无谓的牺牲。”拉什克维奇走到马尔可夫身边，盯着他的眼睛说道：“你说什么？”看到马尔可夫拿起枪后，上尉怔住了，直到一分钟后才重新迈开了步伐。这时，两名准尉（毕业于贵胄军官学校）走了过来，这两个蠢货是托卡奇拉和沃伦索夫。他俩看到连长心不在焉地走着，克洛科洛夫向他们示意。拉什克维奇想当众宣读尼古拉二世的电报，士兵们却并不想听，再次高呼“乌拉”。后来，拉什克维奇还是宣读了电报内容。……克洛科洛夫准尉说：“请让他走，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觉得，如果让他出去通知其他部队，我们可能会受到攻击，因此，我建议让拉什克维奇从走廊离开兵营。他出去后，快步向院内营部的方向走去。我们从窗户一齐向他射击，在刚出大门的地方把他杀了。

沃利尼团教导营的起义由此开始。这是在上午9时左右，虽然没有对第4连做什么工作，但他们也马上采取了相同的行动。^[270]沃利尼团的军官知情后，带着团里的保险柜和团旗逃走了，一部分士兵也在长官离开后各自逃命。他们徒步逃到了皇村的狙击兵第4团，该团拒绝收容他们后，他们又打算伪装成伤兵住进医院。^[271]

沃利尼团的起义迅速蔓延到相邻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立陶宛团，以及工兵第6预备营。立陶宛团26日也开赴街头，而本该在这日出动的若干个连则在营内整队待命。就在此时，从沃利尼团的方向传来了高呼“乌拉”的声音和枪声，团部还派了人过来。这个团马上加入了起义行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第4连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272]据报道，该团士兵在中午12时左右杀死了拒绝交出武器弹药的团长。^[273]这三个团的士兵们前往工兵第6预备营，与之前进行过抵抗的军官们发生了交战，营长戈林上校在这场交火中被



上：士兵们的反专制集会，主题为“打倒君主专制”

下：凯克斯霍尔姆团的士兵向国家杜马挺进，横幅上写着“向战壕里的战友致意”



杀。^[274]就这样，由市中心兵营里的四个团引发的起义爆发了。

310 这四个团来到了基罗奇纳亚大街，扫荡了宪兵队的兵营和工兵准尉培训学校。后来，他们从利特尼大道向北出发，前往利特尼桥。当时身处该桥前方的中央炮兵局内的英国武官诺克斯这样写道：

我们伸头望去，看到了两个侦察兵模样的士兵，他们走在道路中央，用枪指着大货车，要求对方让道，其中一人向那个不幸的司机连开两枪。之后，一群毫无秩序的士兵朝这边走来，把大街两边的人行道都占满了。军官们都不在，率领他们的是一个身材矮小但颇具威严的学生。他们全员武装，很多士兵都在刺刀上绑着红旗，缓缓走来，最终停在了炮兵局的正前方。许多军官和职员都从炮兵局的窗户里看着他们，士兵们也抬头看向窗户，但没有丝毫敌意。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就像在看一部场面宏大的无声电影。^[275]

当时炮兵局长官马尼科夫斯基正在炮兵局，准备与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捷列先科和英国武官诺克斯会面，他断定起义军要攻击炮兵局，所以急忙逃了出去^[276]，但也有人没有逃走。当天，在此地出差的日本高田商会的牧濑丰彦和口译员一起于上午11时在炮兵局洽谈业务。结果，在一楼休息室里的牧濑成了这次起义的第一个身亡者，子弹击穿了他的前额。^[277]

克鲁皮奇尼科夫上士认为，士兵们最终向利特尼桥的方向推进是必然的。而警察的报告中则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维堡区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武器仓库。^[278]原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委员康德拉季耶夫和布尔什维克成员芬兰人泰米则表示该提议是由自己提出的。^[279]因此，推动士兵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尚不明确。

311 当天，从维堡区向市内进发的工人们攻下了利特尼桥。据说，当

时驻守于此的莫斯科团教导营的连长与若干名士兵都被击毙。^[280]当起义军靠近时，莫斯科团半个连以上的士兵都在，他们不知道起义军向天空鸣枪只是在示威，所以把枪口瞄准了这些人，并导致了人员伤亡。但是不久后他们就明白了这只是一场误会，让起义军通过了大桥。^[281]

之后，士兵们与维堡区的工人汇合，一起去解救关在克里斯托伊监狱的政治犯。克里斯托伊监狱位于维堡区涅瓦河畔，这栋五层的监狱呈十字架形，能关押1150名犯人。关于这件事，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克鲁皮奇尼科夫上士声称这次起义是在自己的呼吁下发动的，但泰米则表示这是自己的提议。而在彼得格勒区的费菲列破甲弹厂工作的独立布尔什维克斯卡洛夫则写道，士兵们从利特尼桥向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道聚集，在看到这群“不知所措，对自己发动的这场前所未有的起义感到后怕”的士兵们后，“我们与相识的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和工人团体一起，把他们引向了克里斯托伊监狱”。根据他的说法，虽然他们也呼吁芬兰车站附近的群众和枪弹制造厂的一千多名工人一同前去，但是无人响应号召。^[282]而另一边，原布尔什维克党候补中央委员、在战争时脱党的加里宁，对于士兵占领芬兰车站的过程描述如下：

但是，群众依然迷惑，不知今后如何是好。然后，士兵们喊道：“有没有能指挥的人告诉我们怎么做？”我自身并没有下定决心，我尚且不知群众的力量之后会行至何处，不知如今紧迫的局势会如何发展。但我心里明白，一刻也不能耽误，必须马上推动革命。因为现在，全体人民大众在本质上都处于同一状态，都在等待着行动。于是我爬上车站的停车廊大喊：“想要有人指挥我们的话，就一起去‘克里斯托伊（监狱）’吧！先去解放指挥者们。”他们马上就听从了我的提议，并把我的话传播 312

开来。有人大喊：“先去解放陆军监狱里的人吧！”……于是一队向陆军监狱进发，其他人则前往“克里斯托伊”。^[283]

在克里斯托伊监狱，士兵和工人们基本没遭遇什么抵抗，就成功解救了关押在那里的人，当时是下午2时。这所监狱里关押着2400名政治犯^[284]，被解救的布尔什维克党纳尔瓦区委员雷米歇夫说：“政治犯们虽然年纪都不小了，但获得自由后都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激动得互相亲吻。”^[285]

他们在监狱周围举行了集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书记博古达诺夫应大家的要求发表了演说。他被人们高高抬起，而他直奔主题：“诸位，为了我们的使命前进吧！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286]

接下来，一部分士兵、工人和被从监狱中解救的人员向国家杜马进发^[287]，其余一部分奔向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道的莫斯科团兵营。在这个军营，教导营和军官们把士兵们关了起来，并用步枪和机关枪扫射前来鼓动起义的民众。年轻的准尉大喊：“崇尚自由的人，咱们开枪射击！”之后，克鲁皮奇尼科夫上士与其他25名士兵想要攻入兵营，却被枪林弹雨阻止，年轻的准尉被击毙。克鲁皮奇尼科夫撤退时，发现周围已经没有士兵了，于是他也撤回到了市中心。^[288]之后又有另一波工人和士兵来到军营。他们与教导营交战，杀死了营长，令该营抵抗意志大减。康德拉季耶夫到达军营后，呼吁士兵们加入民众的起义之中，但是却少有响应。之后，交火的攻势变得猛烈，士兵们才不得不从军营中出来，加入革命一方。而即使是这样，军官们也根本没有加入革命队伍。据康德拉季耶夫说，莫斯科团全员加入革命一方是在下午3时。维堡区还有自行车团在顽强抵抗，在那天一直保持着与革命派敌对的状态。^[289]

几乎在克里斯托伊监狱被解放的同时，通往国家杜马的西帕雷
313 尔那亚大街上的未判决人员拘留所也被近卫3团的士兵与工人们成功

解放。这里关押着958名政治犯，沃利尼团教导营的少数士兵在这里站岗。起义军与工人们涌过来后，哨兵们没怎么抵抗就加入了民众的队伍。^[290]从克里斯托伊监狱中释放的崩得派的拉菲斯等人过桥后来到西帕雷尔那亚大街的十字路口，遇到了从未判决人员拘留所解救出来的在押政治犯，位于十



西帕雷尔那亚大街

字路口的地方法院门前有大量人员聚集。拉菲斯在这群人中发现了1905年创建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律师弗鲁斯塔列夫·诺萨利。他主张占领地方法院，将其作为起义军的最高统帅部。拉菲斯提议保管记录文件。^[291]

就这样，到2月27日下午3时，已有五个团起义，两所监狱被解放，利切伊娜亚和维堡区都成为解放区。

但是，自从士兵们起义后，一直以来以和平的方式推进的民众斗争在傍晚时发展成了暴力行动。他们在从利特尼大道到国家杜马所在的西帕雷尔那亚大街转角处的地方法院纵火。而且，士兵和工人们占领了地方法院对面的大炮厂兵器库，夺取了4万支步枪和3万支手枪，负责守卫兵器库的玛托索夫将军在这一过程中被杀。^[292]

那么这一天，当权者发号施令的最高统帅部里又发生了什么呢？在涅瓦大街西侧的特别市市长办公楼，一直以来实际进行指挥的代理司令帕布雷恩科夫当天称心脏疼痛，没有出现。哈巴洛夫叫来了司令代理——米哈伊尔琴科上校，二人开始商讨对策。

哈巴洛夫在中午12时10分给沙皇发送了电报。在电报中，他汇报
314
了26日巴甫洛夫斯克团第4连出现的抗命举动已经被镇压，并表

示27日早晨沃利尼团教导营也发生了违抗命令的事件，并发展成了叛乱，而其他团也可能会效仿。但是，“为了镇压叛乱，我将会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我认为应该立即将前线可信的部队调过来。”陆军大臣勃列艾夫也在一小时后（下午1时15分）给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发来电报，电报中说，从早上开始数个团发生了叛乱，正由忠诚部队“镇压”，虽说现在还没有镇压成功，但“我相信不久后就会平息”，现下采取了果决的措施。^[293]这封电报充分体现了贝拉雅耶夫的不负责任。

而哈巴洛夫正在想尽办法挽回局面。为了对抗四个团的起义，凯克斯霍尔姆团的两个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两个连和狙击兵团的一个连、米哈伊尔琴科上校从斯特列利纳调来的机关枪兵第2团的一个连以及骑兵第9预备团的一个连合兵一处，组成了镇压部队，格鲁吉夫斯克骑兵上校库切波夫被任命为指挥官，指挥部队向宫殿前的广场出击。^[294]时间大约是午后。

政府部门的大臣们在得知军队起义的消息后互相联系，并于下午1时在位于莫霍瓦亚的首相戈利岑的官邸碰头，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和陆军大臣贝拉雅耶夫先后到达。哈巴洛夫也来了，他对当前的局面感到十分沮丧。之后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也到达了这里。虽然他们都到齐了，但是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最终，他们转移到了马林斯基宫。波克罗夫斯基写到，下午3时在马林斯基宫召开了内阁会议。^[295]不断有消息通过电话传来，气氛越来越紧张，最终电话联络也中断了。

前来镇压的库切波夫部队如何了？哈巴洛夫如此说道：

315 这时，这一天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在勇猛果敢的军官的率领下，军队被派去镇压革命。然而不知为什么，军队却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杳无音信。

我派人去调查，也依然一无所获。于是，我从周边的哥萨克部队中派出了三支部队。派出这些人后，我身边就没有一兵一卒了，因此为了镇压其他革命者，我必须召集另一支部队。^[296]

终于收到了来自军队的消息，库切波夫的部队称他们已经到达基罗奇纳亚大街（切尔尼舍夫斯基站附近），请求友军支援。然而，孤立无援的库切波夫率领的部队最终在革命的旋涡中消失无踪。^[297]

在特别市办公大楼中，哈巴洛夫被孤立了。这是由于此前，他还从首都南部的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和猎兵团各调了三个连。

下午3时左右，贝拉雅耶夫陆军大臣惊慌失措地来到指挥部，找哈巴洛夫商议。最终他们决定，任命赞凯维奇为代理司令，接替身体不适的帕布雷恩科夫。^[298]

最后前往特别市办公大楼探访的是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大公询问巴尔克道：“你认为现在的形势如何？”巴尔克认为，首都将在夜间被起义军控制。大公说他想见见哈巴洛夫，但他很快结束了谈话，大约十分钟后大公离开了指挥部。^[299]他也认识到政府军已经惨败。

316

临近黄昏时分，跟随哈巴洛夫的政府军担心遭到起义部队的攻击，就坚守于何处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应该死守彼得保罗要塞，然而代理司令赞凯维奇却主张坚守冬宫。作为近卫军的军官，想必他是想死守冬宫做最后一搏吧。但哈巴洛夫却主张并最终决定坚守在广场另一边的海军总部。于是，哈巴洛夫的指挥部转移到了海军

◆
库切波夫率领的部队 研究俄国史的学者长谷川毅通过梳理库切波夫的回忆录，具体推断了库切波夫部队的活动（Hasegawa, op.cit., pp.298-300），部队采取的行动几乎都是无望且无济于事的，该部队最终被消灭是毫无疑问的。



总部。^[300]关于转移的时间说法各异。布鲁杰罗夫的记录显示是下午7时左右进行的转移，马鲁图伊诺夫的记录显示是在晚上9时转移的。^[301]特别市市长办公楼的要员们也一同转移。巴尔克在离开特别市市长办公楼时，对手下的官员进行了训示，表示万一自己遭遇不测，他们能接替自己。阿卡奥莫夫也是这些官员中的一员，他也正是革命后第一部回忆录著作《旧制度的苦闷》的作者。^[302]

大臣们在马林斯基宫碰头并召开了内阁会议。然而在这天，大臣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仅仅是拟好了要发送给沙皇的电报。电报于下午6时发出，记述了以下内容：现在军队倒向工人一方，形势十分严峻。希望解散现任政府，由深得人民信任的人来组建新政府。有必要在首都颁布戒严令，并挑选一位在民众当中有威望的将领担任政府剩余部队的司令。^[303]

电报发出后，大臣们决定暂时休会，晚上9时再次召开内阁会议。虽然也有大臣回家了，但波克罗夫斯基留了下来，并有二三十



上：马林斯基宫

下：基罗奇纳亚大街



名哨兵守卫。^[304]

就这样，2月27日就要结束了。革命派控制了处在涅瓦大街和利特尼大道之间的军营、塔夫利宫、炮兵局乃至整个维堡区。而抵抗革命派的旧政权和军区司令所掌控的则是莫伊卡运河和涅瓦河之间的冬宫和海军总部所在地一带。首都除此之外的区域是中立区域。

在彼得格勒区，桥梁附近直到傍晚都有重兵把守，禁止民众前往维堡区和市中心。游行队伍止步不前，怎么也突破不了这道防线。^[305]虽然掷弹兵团的军营在这里，但说服这个团积极支持革命军则需要一些时间。从下午3时左右开始，民众一直向军营内高呼“快出来获得自由吧”，渐渐地，士兵们开始纷纷响应。^[306]但是，根据当时就在军营里的佩舍霍诺夫的回忆，“游行队伍开始时希望打开禁闭室，救出关押的人。民众的这一愿望很快得以实现，但他们最终没能把掷弹兵团的士兵带到外面去”。^[307]

可见，27日时掷弹兵团没有加入起义军行列。但在黄昏时分，革命派的装甲汽车成功地从维堡区方向突破，渡桥后进入这个地区。这辆装甲车向着位于彼得保罗要塞附近的装甲汽车部队车库行进，并将装甲汽车部队成功策反到起义军一方。此后，这辆装甲汽车好像参加了对警察局的攻击。^[308]

到了晚上，奥夫塔区的步兵第1团的士兵似乎也加入了起义军^[309]，具体情况不详。

瓦西里岛区的士兵在这一天没有任何行动。对于25日伊奥萨中尉杀害工人一事，芬兰团的士兵们感到义愤填膺。军营中也悄然进行着宣传活动。27日早晨，军官告知士兵们其他的部队也将加入起义军，并下达命令，要求各位士兵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当初的宣誓，肩负起这个地区的警备职责。一位士兵写道，他已经下定决心，“只要工人和士兵一来，我们就加入起义军”^[310]。而另外一位士兵则是这样记录的：“白天我感到非常不安。整个军营表面上看风平浪

静。我们都没有下定决心发动起义，我们一直在等待。”^[311]

然而这一天，他们最终还是没有等到来自外部的起义浪潮。第二天，也就是28日，工人和起义军才抵达兵营，该部队的士兵借此机会策反步兵第180团和第二波罗的海海军兵团加入了起义部队。^[312]

318

相对于此，27日晚上，在城市南部地区，又有三支部队加入起义之中。在第一大城区莫斯科区，当谢苗诺夫斯基团于27日早晨收到起义的消息时，士兵们被关在军营里，但到了傍晚6时，士兵们便已经下定决心加入起义，等待着外部力量的推动。晚上8时，群众聚集到军营周围，呼吁士兵加入起义行列。机关枪部队一马当先，高呼着“乌拉”走出了军营，剩下的士兵也紧随其后。士兵们摧毁了莫斯科区的警察局，杀死了警察局局长，随后向纳尔瓦区的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进发。^[313]伊兹马伊洛夫斯基部队的士兵一清早就得知了四支部队起义的消息。一名士兵写道：“大家都在等待，盼望已久的自由终于降临了，它把我们从这个令人诅咒的石头袋子里拯救了出来。那时的每一个瞬间在我们眼中都是永恒。大家都兴奋地等待着，等待着自由。”晚上11时，谢苗诺夫斯基团的士兵和工人们前来号召大家加入起义。此时军官不知去向，士兵们飞奔到街头。士兵们正在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时，遭到了附近彼得格勒部队集合点军官的攻击。士兵们展开反攻，解除了集合点里军官们的武装，解放了这支部队的士兵们。于是，三个团的士兵一齐向国家杜马进发。^[314]

转移至海军总部的哈巴洛夫和镇压部队发出了最后的告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宣布，根据陛下的命令，彼得格勒将于2月27日起实施戒严。”然而他们手中并没有用来粘贴告示的糨糊。^[315]

哈巴洛夫的部队没能在海军总部多做停留。代理司令赞凯维奇一直表示要为了守卫冬宫而战，哈巴洛夫和他想法一致。哈巴洛夫的部队于2月27日深夜转移到冬宫，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

然而，当他们到达冬宫时，冬宫司令科马洛夫却要求他们撤离。而在冬宫停留的米哈伊尔大公也劝说他们不要都一起待在冬宫。大公说，如果革命派进攻，冬宫就会被摧毁。也就是说，米哈伊尔大公
319 认为与革命派继续对抗是毫无意义的。哈巴洛夫和勃列艾夫迫不得已，只得和士兵们一起返回海军总部。^[316]

在马林斯基宫，大臣们于晚上9时再次召开内阁会议。此时，沙皇还没有任何回复，内阁无事可做。临近深夜12时，内阁会议散会，大臣们纷纷离开。首相戈利岑没有回家，不知所终。只有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和交通大臣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留在了马林斯基宫。深夜11时23分，总参谋部打来电话，告知他们沙皇回复的电报的内容。^[317]

朕已经给总参谋长下达了命令，要求彼得格勒的军务司令立刻到达首都。其军队亦然。朕将会授予军务司令在民政方面所有必需的权限。人员的变更在这种状况下是不允许的。尼古拉^[318]

虽然这封电报的文字叙述语焉不详，但是可以看出沙皇想要表达的是：军务司令将率领镇压起义的部队前往首都，请大家坚持下去。

在此之后，革命派士兵终于到达了马林斯基宫。波克罗夫斯基等人企图和宫中的宫廷官员们一起逃离，但遭到阻拦。第二天，即28日凌晨4时，革命派的士兵离开马林斯基宫，波克罗夫斯基终于可以回家了。“在宫殿前的广场上，国务会议的资料消失在熊熊烈火之中。为什么只要一爆发革命，就会发生这种事呢？道路上一片死寂，没有一个人。”^[319]

这场大火，是宣告俄国历史上专制政府倒台的狼烟。如此一来，首都的政府轰然倒塌。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 321 苏维埃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第一列左侧开始分别是弗·尼·李沃夫、鲁杰夫斯基、希德洛夫斯基、罗江科。第二列左侧开始分别是舒尔金、多米托留科夫、恩格勒格特、克伦斯基



国家杜马被迫休会

2月27日（星期一）早上，国家杜马议员们都收到了国会召集令。议员们一边诧异于休会敕令的颁布和全市革命形势的发展，一边赶往国家杜马。

早上9时，米留科夫被门卫的电话叫醒。电话中他得知，沃利尼团的情况不太稳定。米留科夫的居所位于该团所驻军营的南边，在巴塞纳亚大道和帕瓦多纳亚大道的交会处，从窗户可以看见军营的大门。国家杜马也打来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国家杜马。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当他急忙赶到国家杜马时，发现国家杜马所在的塔夫利宫已被几个团的士兵团团围住。他想，若议员们反对解散国家杜马，军队就会马上冲进国家杜马吧。当他到达塔夫利宫时，记者们已经等待多时了。一位女记者问道：“国家杜马难道不站在人民运动的最前列吗？难道不执掌权力吗？”米留科夫未做回答，直接走进了塔夫利宫。^[1]

早上9时，右翼保守派的舒尔金被与他住在同一宿舍的申加廖夫打电话叫醒，申加廖夫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二人从彼得格勒市中心的宿舍乘车前往国家杜马。在车里，申加廖夫感叹道：“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在期待着，期待着突然之间，神会赐予我们光明——那群人终将妥协。但是事情并不如人所愿，他们并没能幡然醒悟。反倒是国家杜马先被解散了，这本应是最后的机会啊。不论以怎样的形式，与国家杜马达成共识是避免革命的最后希望。”^[2]

进步同盟的曼斯利奥夫对当时的情况还一无所知，他上午11时从家里出发，前往国家杜马。在路上，他才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休会的命令，十分震惊，连忙赶到了国家杜马。“国家杜马里弥漫着茫然自失、狼狈不堪的氛围。同时，对于突然遭到解散，我们有一种

莫名的愤懑之感。……谁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无法采取任何行动，³²³对此我们感到完全束手无策。”^[3] 国家杜马的中庸派——进步同盟的议员们全都陷入到这种消极情绪中。

对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议员认为，国家杜马不应该遵从沙皇的命令解散国家杜马，而是应该进行反抗，站到革命的最前列。克伦斯基住在离国家杜马步行距离五分钟的地方，早上8时他接到涅克拉索夫打来的电话，得知了休会的命令和沃利尼团起义的消息，便立刻赶到国家杜马。^[4] 斯科别列夫被《当代世界》杂志编辑伊奥尔唐斯基的电话叫醒。因为伊奥尔唐斯基就住在沃利尼团的军营前，所以告诉了他军队起义的消息。斯科别列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忙赶往国家杜马。^[5] 克伦斯基与涅克拉索夫、叶夫列莫夫、韦尔希宁（劳动派）等人商谈，并达成一致意见：“马上打电话，拜托认识的朋友们去几处兵变部队的营地，并带领部队前往国家杜马。”^[6] 然而，他们的努力都白费了。劳动派的第6工兵预备营的斯坦科维奇上校接到电话后，立刻赶往自己管辖的第6预备营，然而在路上他的部下劝阻道：“不要去，您会死的。”他因试图说服士兵前往国家杜马而遭到怀疑，武器被士兵们没收了。因此，当他终于抵达部队时，其余的教导营的士兵也极其不信任他说的话。^[7]

国家杜马的元老会议预计在中午12时召开，而此时罗江科正在主席办公室里起草要发给沙皇的电报。

国家杜马的工作在陛下的敕令下，暂停到4月。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支柱丧失。政府在镇压社会动乱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内乱开始，暴乱的星星之火正呈燎原之势。……

请根据我昨天在电报中提到的原则，立即下令召集新政府。请下令取消陛下您之前颁布的敕令，重新召集立法部门。……

决定陛下和祖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了。如果拖延到明天，可能就为时已晚。

这封电报提出，国家杜马遵从沙皇的休会敕令，而作为回报，沙皇应颁布新敕令，宣布国家杜马提前召开国会，并采用信任内阁制组建新政府。^[8]

涅克拉索夫认为他不能这样无所事事地度日。于是，这位副主席在预算委员会会议室召开了非正式元老会议，其形式是在进步同盟联络员会议成员中加入左翼党派代表。这次会议主席由进步同盟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席希德洛夫斯基担任。^[9]也许当时涅克拉索夫和斯科别列夫曾提议无视沙皇的休会敕令，召开革命的国家杜马，认为国家杜马应该领导革命，但进步同盟的代表们持反对意见。斯科别列夫在回忆中是这么描述的：

商谈已经开始。然而在国家杜马之外，社会动乱依旧，事态正在迅速恶化。起义军占领了利特尼大道上的炮兵局大楼。这一消息传来后，申加廖夫焦躁地跳了起来，大声喊道：“只有德国人才会这样做，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对他说道：“你说话还是谨慎些好，你这样说，将来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

有人闯进会议大厅，告诉我们：起义军和工人释放了关押在克里斯托伊监狱的政治犯，随后前往未判决人员拘留所。这个拘留所在塔夫利宫旁边，起义民众随时都有可能闯入塔夫利宫。这次，罗江科大声叫喊着闯了进来。他问道：“是谁未经我的许可就召开了元老会议？”进步同盟的干部们解释，这不是正式的元老会议，只是私人之间的会面。^[10]

罗江科说道：那就都到他的办公室举行正式的元老会议。

于是，所有人都去了主席办公室。那个时候应该已经过了中午12时，也就是原定召开元老会议的时间。

在这次会议上，罗江科首先对前一天发给沙皇的电报做了说明。³²⁵涅克拉索夫、叶夫列莫夫、克伦斯基、齐赫泽等人，进步同盟、劳动派以及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主张公开无视国家杜马休会的敕令，坚持按原定时间召开国家杜马全体会议，这就是成立革命国家杜马的方案。然而，罗江科和进步同盟各党派代表都表示反对。于是，大家最终决定遵守沙皇颁布的休会敕令，但议员们没有解散，他们继续留在国家杜马内，在半圆会议厅而非全体会议厅召开非正式会议。^[11]也许大家看过罗江科所写的新电报后，都同意将电报发送给沙皇。中午12时40分，他们开始拍电报。

对于这次元老会议上的决定，俄罗斯历史学家尼古拉耶夫认为，“不解散国家杜马，所有议员留在现场”这一决定是“革命性决定”，此时的国家杜马似乎开始向革命一方迈进^[12]，其实这一看法并不正确。罗江科的电报与“革命性决定”相去甚远。此处的重点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国家杜马中有两条路线在相互抗衡。一条路线是，将变革转变为军事政变，最终实现向君主立宪制的过渡。另一条路线是借助人民革命的力量实现资产阶级市民革命，努力实现民主共和制。

起义军在下午2时以后来到国家杜马。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第一期刊登了蹲守在国家杜马的记者写下的报道。报道称：下午1

尼古拉耶夫认为 元老会议决议通过了以下事项：“现在的基本口号是旧政权的废除和新政权的交替。对此，国家杜马应以最高的积极性投入其中。”但这在当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

时，25000名起义军的代表来到国家杜马，会见了罗江科。¹¹³¹而根据其中一名记者切尔卡斯基的回忆，代表是军医大学的两个学生，他们是自己随意来的。¹¹⁴¹《消息报》还称，在下午2时左右，“强大的起义方部队与武装群众一起靠近了国家杜马所在地。”¹¹⁵¹据切尔卡斯基说，起义军的目标最初并不是国家杜马，他们只是在路过国家杜马前往附近的军营时，顺路解除了国家杜马里哨兵的武装。这时，卡拉洛夫走在最前头，与克伦斯基、齐赫泽、斯科别列夫等人一起从国家杜马的中央大门跑了出来，大雪中，他们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士兵们看到他们后停了下来。议员们说服士兵，请求士兵前往国家杜马声援。¹¹⁶¹克伦斯基表示，他以国家杜马和他自己的名义对士兵们表示欢迎，并“拜托他们进入国家杜马，接替卫兵，从沙皇的军队手中接过守卫国家杜马之责”。士兵们纷纷响应。之后，针对民众提出的关于如何处置“旧体制的代表和支持者”这一问题，克伦斯基回答道：应该逮捕像谢格洛维托夫（国务会议主席）这样的代表。¹¹⁷¹左翼议员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国家杜马主流议员的主张，但他们却始终以国家杜马的名义进行表态。

设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

国家杜马的非正式会议于27日下午2时半左右在半圆会议厅召开。在开会之前，进步同盟的布勃利科夫再次提议转到全体会议厅开会，并公开宣布不服从沙皇的敕令。然而，革命国家杜马的提议却被再次驳回。布勃利科夫严厉地说：“大家是在害怕承担责任吗？可是我们无法推卸这种责任。否则，你们只会让自己的尊严毁得一败涂地。”¹¹⁸¹

就这次非正式会议，人们最新发现了类似速记版的会议记录。¹¹⁹¹这份会议记录显示，副主席涅克拉索夫首先发言。令人深

感意外的是，他提出了实施“军事独裁”的方案。他主张要“与众多国家杜马的代表一起，将此权力移交给受大家极度信赖的人”，并提名中央炮兵局长官马尼科夫斯基。马尼科夫斯基以前在国防特别审议会上提出过如下主张：为了保障国防物资等能顺利生产，应建立一个后方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应该以被赋予了独裁权限的人为中心。出席过国防特别审议会会议的国家杜马议员恩格勒格特也曾经向大公们呼吁，希望建立这一政治体制。^[20]作为国防特别审议会的委员，涅克拉索夫对马尼科夫斯基提出的独裁方案十分了解。正如前文所述（参照第5章第304页），27日，与国家杜马结成同盟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捷列先科，在炮兵局内与马尼科夫斯基会面。涅克拉索夫提议，只要“国家机构”仍掌握在旧政府派手中，就必须寻找出“某种折中式的解决方法”。人们认为他之所以提出这一方案，是希望给那些畏缩不前、不顺应革命洪流（暴风雨般的气势）的胆小的国家杜马议员带来思想上的震慑和冲击。可以看出，涅克拉索夫想要推动这些国家杜马议员，他认为如果布勃利科夫提出的不服从休会敕令的提案遭到否决的话，至少应该接受他的意见。

然而，涅克拉索夫的提案遭到了来自激进派的主力军——进步同盟和劳动派的抨击。原进步同盟人士卡拉洛夫主张推选出国家杜马执行委员会，并将权力完全委任给国家杜马执行委员会。进步同盟人士西德罗夫和鲁杰夫斯基则主张，或是征询“民主派”议员的意见，或是与“军队和人民”进行协商，然后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劳动派的朱宾斯基最初支持国家杜马元老会议掌握权力，之后转为主张向民众宣布将国家杜马改为立宪会议。十月党人哥瓦伦克以及彼尔姆的地主、国权派的西雅霍夫斯科伊支持由元老会议掌握权力的提案。将国家杜马改为立宪会议的提案也得到了进步同盟人士曼斯利奥夫的支持。会议进行时，克伦斯基进入半圆会议厅，表示希望能与齐赫泽一同乘车前往起义军的驻地，他想让起义军支持国家

杜马，与国家杜马合作。齐赫泽附议他的提议，并明确表示必须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

进步同盟的议员们犹豫不决，动摇不定，只有极少数人做了发言。立宪民主党人沃尔科夫和阿杰莫夫反对涅克拉索夫的提议，并主张成立国家杜马议员特别委员会。十月党人萨维奇提出了类似于涅克拉索夫所提的独裁方案的建议，主张拥护原陆军大臣波利瓦诺夫领导政府，反对国家杜马采取这类“非法措施”，认为这就是自杀行为。国权派舒尔金认为，起义士兵“应该希望战争早点结束吧”，
328 “然而我们并不赞成”，所以应该从涅克拉索夫的方案和特别委员会的方案这二者中选其一。国家杜马进步同盟的领导人米留科夫对这两个方案均持反对意见，他的看法如下：

本次会议就权力问题提出了三种方案。……我自己不会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呢？是像克伦斯基提议的那样，到暴乱士兵驻地去平息暴乱吗？然而那样并不能平息暴乱。我们必须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现实方案。

3时半后，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宣布全体议员对以下四项提案进行表决：（一）宣布国家杜马改为立宪会议；（二）由元老会议掌握权力；（三）选举出权力机构组织委员会；（四）仅成立特别委员会。会议最终通过了由立宪民主党提出的设立特别委员会的方案。沉默的多数派都选择了这一提案。这意味着对于权力问题，国家杜马目前无意采取任何行动。国家杜马宣称，设立特别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恢复秩序”和“与人民及各个机构之间开展协商”。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杜马直接明确表示将保持绝对中立立场。

临时委员会是在下午4时前由元老会议选出的，最终推选出了12名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十

月党人)、副主席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左派)、书记多米托留科夫(十月党人)、米留科夫(立宪民主党人)、希德洛夫斯基(十月党左派)、舒尔金(国权派)、弗·尼·李沃夫(中央派)、柯诺瓦洛夫(进步同盟)、鲁杰夫斯基(进步同盟)、卡拉洛夫(无党派)、克伦斯基(劳动派)、齐赫泽(社民党)。^[21]

12人中,主张沙皇实施改革的有以下6人:罗江科、多米托留科夫、米留科夫、希德洛夫斯基、舒尔金、弗·尼·李沃夫;主张进行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有6人,分别为涅克拉索夫、柯诺瓦洛夫、鲁杰夫斯基、卡拉洛夫、克伦斯基、齐赫泽。两派人数相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国家杜马主席团成员之外,进步同盟各党派、左翼诸党派各有一人,进步同盟有两位代表。如此一来,进步同盟的主要派别和左派均派出了数量相同的6名代表。虽然米留科夫的书面记录显示齐赫泽拒绝加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22],但在之后正式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上。可以推测,这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综合考量苏维埃的意见后,将他推选为临时委员会成员的。然而实际情况是,自从苏维埃成立大会召开以来,齐赫泽从未参加过这个委员会的任何活动。 329

呼吁成立苏维埃

27日早晨,四支部队发动起义;下午1时到2时,起义士兵和工人袭击了两处监狱并释放了政治犯。这两个事件成为首都人民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革命性的民众运动该如何形成自己的组织,选择何种前进方向?作为人民运动领袖的民主党派该如何组织人民群众?确定今后斗争的方向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与工人斗争融为一体的民主党派的众多成员都参与到街头斗争的大潮之中,他们为了取得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而不断奋斗着。布鲁

杰罗夫引用了土耳其马乔夫（布尔什维克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委员）在3月10日信中的说法，他“被卷入革命活动的旋涡之中，被裹挟着随波逐流，仿佛是在水中不停打转的木屑”^[23]。被释放出狱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的老干部也纷纷表示，“我们一离开监狱，不知怎么就融入到普通群众中去了”。与安奇波夫一起从克里斯托伊监狱释放的施密特如是说道^[24]：扎莱西斯基和科马洛夫（二人均为布尔什维克党）从未审判拘留所中释放后，就过桥前往总部所在的维堡区。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25]：“工人团”成员格沃兹杰夫一行此时正好走在从克里斯托伊监狱前往国家杜马的路上，他们在途中与扎莱西斯基和科马洛夫擦肩而过。纳尔瓦区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的雷米歇夫从同一个监狱中出来，穿过通往圣彼得堡区的桥，加入了掷弹兵团的队伍。据说，数日之内，他都没有回到根据地普契洛夫工厂。^[26]

330 在维堡区，布尔什维克党继续进行着街头斗争，由于自行车团顽强地与群众抗争到夜晚，他们很可能因此被牵制了主要力量。

革命胜利的曙光已近在眼前，但首都各地的枪声仍未停歇。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中，一张传单开始在街头巷尾悄然流传。传单署名为“筹建中的工人苏维埃”（*Organiziruiushchiisia Sovet rabochikh deputatov*）。回想这段二月革命史，崩得派成员——27日下午来到国家杜马的扎斯拉夫斯基和康特罗维奇认为，这份传单是在局势依旧混乱时在市内开始分发的，他记录下了传单的全文。^[27]

据记录，传单的开头这样写道：“同志们，我们翘首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人民正在逐渐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革命已经爆发。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必须立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然后呼喊道：“各位士兵，工人同志们”，“首先要做的是选举代表。让代表们相互联络，在军队的保护下成立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呼吁“让我们把芬兰车站作为革命指挥中心”。这是一份呼吁成立工兵苏维埃的传

单，其特点是将维堡区的车站指定为革命指挥中心。

这份传单号召士兵和工人中的激进派“建立临时革命政府”，这一目标具有左翼特点，而对逐渐成为革命运动中心的国家杜马（塔夫利宫）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表明其立场与始于国家杜马游行的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派形成对立。从意识形态来看，他们主张的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区联派以及社会革命党左派更接近。

耐人寻味的是，这份传单的原件并没有保存在档案馆中。在1957年出版的全10卷《大十月革命资料集》收录的文本，实际转录自沙俄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总参谋部档案中的副本。^[28] 据这本资料集记录，这份传单是在首都军队内部散发的。然而，最早在1917年3月，在杂志上报道这份传单的记者谢苗诺夫曾明确表示，传单是2月27日飞机空投散发的*。^[29] 而且确实有证词表明，这天有飞机在彼得格勒上空盘旋*。^[30]

独立布尔什维克党的斯卡洛夫解放了克里斯托伊监狱后，在前往国家杜马的途中，穿过利特尼桥，在通往国家杜马的西帕雷尔那亚大街的拐角处，看到张贴的传单上写着“到芬兰车站集合”，恐怕这和上述传单是同样的传单。^[31] 张贴在这里，目的在于引导从南边来的人在国家杜马方向不要拐弯，径直向芬兰车站前进。斯卡洛夫感到，这份传单是弱小的革命力量“自己让自己陷入孤立境地”，“给予国家杜

331

飞机空投散发的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询问过布鲁杰罗夫对此事做何感想。他回答说这件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他选择无视（Interview with Burdzhakov, 1978-1979）。

确实有证词表明…… 作家鲁奇尼茨基在1917年时还是个少年，他表示在2月27日拍摄到了首都上空有飞机飞过的照片，并公开了当时的照片。

马完全的行动自由”。他对1905年苏维埃毫无掌控权力意愿的做法持否定态度，考虑到俄国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和国家杜马的存在，认为为了让“国家杜马卷入革命的洪流中”，应该让士兵们“随着起义街头的革命旋律起舞”，将之引导到国家杜马。^[32]

目前，我们对于这份传单的实际影响，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就仅限于此了。从后续发展来看，显而易见，这张传单上呼吁号召的内容最终未能实现。对于集合场所的选择，芬兰车站不是合适的地点，即使它能成为维堡区斗争的联络中心，也不能成为整个首都地区的革命中心。沙皇政府占据特别市市长办公大楼和马林斯基宫，只有国家杜马所在的塔夫利宫才能成为对抗沙皇政府的革命中心。

是谁张贴的这些宣传单呢？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总部位于远离市中心的维堡区北部郊区的塞尔多波利斯卡耶大道上（距离利特尼桥约5.5公里），他们根本没有收到四支部队兵变起义的消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们的注意力正集中在争取辖区内的莫斯科部队的行动上，但是该部队倒向革命阵营的时间是下午2时到3时。因此，丘格林（圣彼得堡市委员会）充满喜悦地手拿步枪，冲进总部高喊“终于成功了”时，传单应该已经发放完毕。施略普尼柯夫和丘格林商定的方针是袭击警察局，解救拘留所里的工人，然后解救监狱里关押的政治犯^[33]，然而这些方针已经远远落后于革命的实际进程了。在这之后，施略普尼柯夫为了“掌握革命的整体情况”前往市内。在革命成败的决定性时刻，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却成为这场革命的看客。

也有一种说法称，散发传单的并非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而是维堡区委员会。持这一说法的人有研究苏联的学者、《大十月革命资料集》的编纂者雷伯洛夫、斯图珍佐瓦以及布鲁杰洛夫等人。^[34]布鲁杰洛夫持此观点的依据是布尔什维克党工人伊瓦诺夫的回忆，但是这一观点与维堡区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卡尤罗夫的回忆相矛盾。笔

者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围绕二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精英—群众关系》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维堡区委员会分发传单的说法，认为是维堡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某个人，或是区联派，抑或社会革命党左派某个人的行为。^[35]对此，在美国的学者长谷川毅在1977年的论文中表示支持苏联研究者的论点，反对我的看法。^[36]美国的梅兰科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解析，在1988年提出可能是区联派散发的传单。^[37]这些都是基于主观想象做出的推测。

如果是印刷传单，然后包机从空中散发的话，这不可能是区区左翼活动家能单独进行的。如果说这些人是站在反对将国家杜马作为革命中心的立场上的，且又要助推这天燃起的革命烈火主体，可以推测他们与德国政府的“革命化政策”及其特工的行动有关系。

除此之外，当时还出现了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题的匿名传单。传单将政治犯被从未判决人员拘留所和克里斯托伊监狱中解救出来一事公之于世，并警告道：“不能后退，后退意味着出卖起义士兵，意味着将无法逃脱被枪杀的命运。”其主张如下：“立即在工厂里选举工厂罢工委员会，并令其代表组成工人苏维埃。工人苏维埃将在革命中担负组织领导的职责，并建立临时革命政府。”333

这份传单没有明确说明向苏维埃选派代表应依据何种标准，也没有指明这些代表要在何处集合。也就是说，这是一份对革命活动没有现实影响力的传单。1957年，人们才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研究所收藏的文件中发现了这张传单的实物^[38]，此外，没有任何材料可以判断这份传单的印发者、分发状况以及影响力。《大十月革命资料集》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机构制作散发了这份传单，但从前面提到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来看，当时他们无法做到这些。我在1968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到，虽然这可能是区联派在下午2时召开的会议上印刷散发的传单，“但是从没有署名这点来看，很有可能是布

尔什维克党或区联派的个人或者独立小集团”散发的。^[39]长谷川毅虽然认为我的观点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认为也有可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圣彼得堡市委员会里剩余的党员们散发的^[40]，梅兰科却断定这是区联派散发的。^[41]

与上述的传单相比，黄昏将近时出现的第三份传单在建立苏维埃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份传单是“工人团”和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派散发的。从克里斯托伊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工人团”成员格沃兹杰夫、布洛伊德、博古达诺夫等人立即前往国家杜马。齐赫泽、斯科别列夫把他们带到预算委员会办公室（第11、12、13号房间）。此时，彼得格勒工人消费合作社的伊·格·沃尔科夫和卡佩林斯基，初始派的格林纳维奇以及人权律师索科洛夫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工人团”和消费合作社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齐赫泽和消费合作社的两人也出席了25日在消费合作社总部召开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者决定成立工人苏维埃。不言而喻，这次会谈，各方代表达成了共识——决定以“工人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散发传单，内容如下：^[42]

334 市民同志们！会集于国家杜马的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居民代表宣布，今天下午7时在国家杜马所在地召开由我们人民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会议。站在人民一方的所有军队的每个连都要即刻选举出一名代表。各工厂每千人选出一名代表，人数在千人以下的工厂要选出一名代表。

工人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43]

这份传单提出了明确的方针，规定了选举代表的标准、代表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是那天散发的所有传单中最有针对性、要求最具体的。

但是这份传单并没有提到建立工人苏维埃的目的。不论是将之设定为与“工人团”的“全俄国工人代表大会”相结合的工人苏维埃，还是25日的会议精神，都将工人苏维埃定义为领导工人运动及革命的组织，即认定其为一个社会团体。所以在莫斯科，由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派组成的以孟什维克、律师尼基丁为中心的临时革命委员会于28日发布宣言，号召人们恪守孟什维克的传统及战略，建立纯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44]然而，这份传单是以“工人苏维埃”的名义，呼吁建立“工兵苏维埃”。确实，相较于工人，聚集在国家杜马的起义士兵人数更多，因此不容忽视，这是由首都革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然而，让士兵加入苏维埃是一项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极为重要的决定，因为，以此为分界线，苏维埃将不仅仅是“革命性的地方自治机构”和“社会团体”。

在这件事情上，参会的唯一——名非孟什维克党人、律师索科洛夫（原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见解不容忽视。他在1927年执笔撰写的回忆录开头写道：“1905年工人苏维埃的领导者们不辞劳苦，想要联合圣彼得堡的卫戍部队，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社会活动。但是，不管是个人的积极动员，还是广泛印刷传单进行宣传，终不见成效。因此，在建立俄国革命史上第二个工人苏维埃时，自然要考虑在其中设立士兵代表的分会。”^[45]索科洛夫的决策对二月革命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335

传单很快印刷完毕。不难想象，利特尼大道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总部给予了全方位帮助，消费合作社也积极配合。不到傍晚，传单便开始向市内各地散发。^[46]据说，军事工业委员会事务长曼吉里主动请缨，带“工人团”的格沃兹杰夫乘车巡视各工厂，号召说，“我们要效仿1905年的工人苏维埃，立刻选举”^[47]。当然，委员会还致电积极参与革命的各民主党派主要人物，呼吁他们加入进来。^[48]正是这一系列的号召，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左翼民主党派方面，布尔什维克与区联派没有积极响应国家杜马的号召，而是各自开展行动。布尔什维克方面，维堡区的社会活动家卡尤罗夫在下午2—3时成功说服莫斯科团，之后与哈合列夫、纳扎洛夫、列别杰夫等同志回到住处，着手制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他们认为：“必须在其他党派‘清醒过来’前完成宣言。否则，革命的主导权会落入其他党派之手。”最后，卡尤罗夫一人完成宣言，并将其递交到布尔什维克总部。莫洛托夫与扎鲁茨基说道：“你这也太心急了，卡尤罗夫同志。”但他们还是同意了卡尤罗夫的意见，收下文案，答应将宣言印刷出来。¹⁴⁹¹当天傍晚，布尔什维克党印刷工阿盖耶夫（曾被关押在克里斯托伊监狱）完成了传单印刷工作*。¹⁵⁰¹

336 这份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在开头写道：“市民们！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坚固堡垒已经坍塌。沙皇一族靠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安逸生活已灰飞烟灭。首都属于奋起反抗的人民群众。”宣言认为：“工人阶级与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领导即将诞生的新的共和体制。”在明确了斗争纲领及任务的基础上，宣言指出：“工人及军队必须立即选举代表，组成临时革命政府。”¹⁵¹¹建立由工人与士兵代表组成的临时革命政府，这是一个全新的设想。

不过，宣言并没有提及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意味着新设想与建立苏维埃背道而驰。究其原因，首先可以想到卡尤罗夫（所罗门工厂出身的激进政治活动家）对1905年圣彼得堡苏维埃的深刻批判。

印刷工作 关于传单的发行日期，布鲁杰洛夫认为，传单发行于28日（Burdzhalov, O taktike bol'shevikov v marte-aprele 1917 goda, *И*, 1956, No.8, pp.109-110）。然而阿斯特拉罕的最新说法认为传单是在27日由《日报》报社印刷厂印刷。

他在后来的《1905年10月的回忆》中写到，当他从施略普尼柯夫那里得知苏维埃的事情时，只觉这是“一群打着‘朋友’旗号接近工人和士兵的花言巧语之徒”，大失所望。而且他也没有积极参加28日在所罗门工厂举行的苏维埃选举。^[52]当时，维堡区的政治活动家大多来自所罗门工厂，他们都和卡尤罗夫采取了相似的态度。此外，这一宣言并未阐明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具体步骤。很显然，布尔什维克党也没能提出具体方针来抓住革命的决定性转机。

区联派的总部位于莫斯科区的哥罗门斯卡亚路，距离北面的涅瓦大街仅1公里，因此他们在上午10时便知晓了沃利尼团起义的消息。下午2时，区联派召开委员会，据尤列涅夫称，本次会议一致决定，号召工人和士兵发动全面起义及组成工兵代表苏维埃。随后，起义的领导者们被派往纳尔瓦、维堡、瓦西里岛这三个区。^[53]下午5时，区联派再次召开委员会，决定发放两类传单，由尤列涅夫和格雷泽罗夫执笔。^[54]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亚历山德罗维奇等人协助印刷，传单最终由区联派和社会革命党联名印制。一类传单面向军队，呼吁士兵加大斗争力度，“废除耻辱的制度，结束流血战争，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55]。另一类传单面向工人，宣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由无产阶级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同志们，立即着手选举工人苏维埃吧，军队已经在选举自己的代表了”^[56]。区联派的宣言比布尔什维克的更具前瞻性，因为他们明确提出要建立苏维埃。不过，这3万张传单^[57]直到夜里10时才散发到全市，因此没有对27日下午的苏维埃成立工作产生太大影响。

337

布尔什维克宣言、区联派和社会革命党左派向士兵发放传单的内容在此后都刊登在了圣彼得堡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的创刊号及号外上。这些都是在告知广大民众从28日开始，“苏维埃应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鉴于国家杜马位于塔夫利宫，“工人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决

定在那里散发呼吁大家选举苏维埃的传单，并展开一系列行动。临近傍晚，委员会认为“军事力量的体系化、塔夫利宫的防卫、起义兵的粮食补给”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街头的士兵从早上起义开始便没有吃饭，虽然工人、士兵以及市民苏维埃已倾尽全力为他们供应伙食，但终究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委员会散发传单，希望市民们能够自发为士兵提供食物。^[58]

此外，临时执行委员会还决定设立粮食委员会。格罗曼被推选为主席，他是孟什维克的统计员，曾作为城市联盟的代表出席粮食特别审议会。^[59] 粮食委员会成员包括消费合作社的伊·格·沃尔科夫、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书记诺沃卢斯基、粮食问题专家弗朗哥路斯基等人。^[60] 诺沃卢斯基是一位老革命家，1887年曾参与暗杀沙皇的行动，在单人牢房服刑了18年。

更为重要的是，临时执行委员会打算设立总部以“实现军事力量的组织化并指挥起义军”。总部的核心人物是索科洛夫和消费合作社的书记卡佩林斯基。卡佩林斯基致电陆军大学的高级教员姆斯蒂斯拉夫斯基（曾任消费合作社的主席），邀请他参与讨论。索科洛夫则邀请了海军上尉菲利波夫斯基。这两人在1905年都曾效力于社会革命党的军事组织。姆斯蒂斯拉夫斯基和索科洛夫都曾是共济会成员。姆斯蒂斯拉夫斯基到达国家杜马后，受到索科洛夫的热烈欢迎，并被邀请到13号房间，与众人一起参照索科洛夫找到的市区地图来分析当时的局势。过了一会儿，姆斯蒂斯拉夫斯基在另外一个房间见到了正与年轻的准尉们交谈的菲利波夫斯基，两人终于实现了“会师”。^[61]

当时的最大问题是军区司令哈巴洛夫所领导的镇压军是否会进攻塔夫利宫，如果塔夫利宫受到攻击，又该如何保卫总部。然而，此时不仅无法掌握政府军的兵力状况，且起义革命方也没有兵力来保卫总部。两人身边只有两名下士和几名作为苏维埃代表前来的士

兵。“宫殿里到处都是士兵，但这些士兵代表拒绝发令将士兵们组织整编为战斗队伍。一天下来，士兵们早已筋疲力尽，大多数人从早上开始便粒米未进。”^{162]}

因此，27日傍晚，他们并没有以苏维埃的名义直接号召士兵和普遍民众加入行动。由于苏维埃的代表开始向塔夫利宫聚集，所以在他们从第13号房间移至国家杜马另一侧的第41、42号房间——国家杜马副主席办公室之后，行动才真正开始。姆斯蒂斯拉夫斯基在此遇见了共济会的核心人物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进来了。他一如既往地缄口不语，儒雅又随和，身材圆润，面色红润且神情笃定。他露出礼节性的微笑，打过招呼，没说几句无关痛痒的客套话，转眼就把克伦斯基带了出去。”^{163]}

革命期间聚集在塔夫利宫前的军人（1917年）



国家杜马两派的努力

国家杜马议员非正式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让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派备感焦虑，因为群众革命的洪流很容易给国家杜马带来冲击。

339 首先在傍晚，柯诺瓦洛夫召集军事工业委员会、地方自治联盟、城市联盟、彼得格勒市议会等代表，以及卫生监督站和社会救济署的负责人在国家杜马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2月27日，与会的社会各团体代表做出决议，不解散国家杜马，大力支持国家杜马关于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将同工人和居民一道，依靠立场坚定的军队士兵的力量，在社会各团体的支持和协助下，最终实现攘除外敌、打击内患的完全胜利。”^[64]

虽然这项决议在过往的研究中经常被忽视，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该决议将要求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意愿委婉地表达出来。同时，决议希望给国民刻画一种国家杜马“手握权力”的形象。此外，决议还要求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既要依靠“工人和居民”，也要依靠军队，同时希望能够普及这一模式。很明显，这里的“工人和居民”指苏维埃（当时宣传“建立
340 苏维埃”的活动正在进行），而且军队不在“工人和居民”范畴内。总之，这个方案将工人苏维埃、军队以及社会各团体作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三个组成部分。基本可以确定，这一方案的构思来自柯诺瓦洛夫及他所在的智囊团。

当天下午，评论家阿维洛夫来到国家杜马，见到了柯诺瓦洛夫。

“柯诺瓦洛夫像个赌气的孩子一样满脸不悦地在圆形大厅里走来走去。‘保罗·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拒绝了这个方案。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没采纳。我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65]

柯诺瓦洛夫非常焦急。他大概一早就联系了在莫斯科的朋友里

亚布申斯基。27日晚，在莫斯科，社会各团体代表150人聚集在市议会，听取市长恰鲁努克夫和莫斯科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里亚布申斯基关于首都形势的报告。随后，市议会决定成立社会团体委员会，决定由委员会掌握莫斯科大权，并选出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与此同时，提名莫斯科省参事会主席、退役的中校格鲁吉诺夫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候选人，以取代姆罗佐夫斯基。^[66]如之前所说，在莫斯科市议会举行的这次会议上，临时革命委员会诞生了，决定于次日即28日呼吁工人举行只属于工人的苏维埃选举。莫斯科的一系列行动，均与首都彼得格勒社会各团体的决议保持一致。但是莫斯科并不允许士兵加入工人苏维埃，而通过双方代表加入社会团体委员会的方式，两个团体的目标基本能够得以实现。然而，彼得格勒的群众革命却是由工人和士兵共同推进的。

但另一方面，克伦斯基付出了诸多努力，让国家杜马参与革命成为既成事实。下午5时半，前司法大臣、相当于上议院的国务会议的主席谢格洛维托夫遭到逮捕，并被武装的学生押送到国家杜马。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众说纷纭，时任国家杜马主席的罗江科不承认此次逮捕行为，并表示坚决抗议。据国家杜马记者切尔卡斯基称，克伦斯基并没有理会抗议行为，他对谢格洛维托夫说：“我是国家杜马议员克伦斯基。是我命令他们逮捕阁下的。因为阁下迄今为止的所有行为已是人尽皆知，我担心这有损起义民众的利益。但我可以确保阁下的人身安全。”他把这名囚犯带到国家杜马的主席休息室，并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第四连下士科格罗夫负责看管。^[67]以此为契机，从旧政府高官到宪兵、警察，绝大多数被捕者都被带到了国家杜马。克伦斯基由此掌握了大权。 341

民营铁路企业家、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央办事处成员，同时也是进步同盟议员的布勃利科夫认为，沙皇很有可能会下令让军队进攻首都彼得格勒。他还认为有必要占据交通部，以确保己方拥有自己

的全国电报网。虽然他一直向罗江科、克伦斯基、齐赫泽以及涅克拉索夫等人提出这一建议，但在当晚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这个提议似乎并非与柯诺瓦洛夫等人商讨后得出的结果，而是源自布勃利科夫个人的想法，他认为讨论这一方案是否可行毫无意义且充满危险，当下最重要的是立刻掌权。¹⁶⁸¹

另一方面，罗江科在处理善后事宜，这非常符合他的作风。他联系上了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1月9日^{*}，他造访了住在加特契纳行宫的米哈伊尔大公，了解到米哈伊尔大公对当前的政治危机备感焦虑。¹⁶⁹¹革命的推动者到底是谁，对此，史料各有说辞。革命结束后，历史学家波利叶多夫的审讯结果显示，罗江科称米哈伊尔大公在26日致电给他，表示想与他见面，¹⁷⁰¹但他在之后的回忆录中写的却是：自己在25日给大公打了电话。¹⁷¹¹而涅克拉索夫在审讯中则表示，27日早上，米哈伊尔大公提出希望和罗江科面谈。¹⁷²¹在翻阅了2012年出版的米哈伊尔大公的日记后，我们发现米哈伊尔大公并没有主动参与革命的迹象。虽然其在22日、25日和26日的日记中记录着他当天往返于
342 居住地加特契纳和彼得格勒，但这完全是他的私人行为。而关于政治性行动，仅在26日日记的结尾处有记录：“彼得格勒的暴乱正在扩散。暴乱导致斯沃罗夫斯基大道和征召广场出现约200名死者。”27日下午5时，米哈伊尔大公乘快车前往彼得格勒，他的日记从此时开始记录¹⁷³¹，但他并没有写白天发生了什么。很明显，罗江科应该在中午就致电米哈伊尔大公邀请他前来首都了。由此可以推测，罗江科向第三者刻意声称是米哈伊尔大公先行给他打了电话。

1月9日 米哈伊尔在日记中提及，罗江科于1月9日前来拜访。然而根据罗江科本人所述，米哈伊尔在1月8日便来找他了（Rodzianko, *Krushenie Imperii*, pp.211-213）。

这次会谈，罗江科请来了在马林斯基宫无所作为的旧政权首相戈利岑充当见证人。晚上7时前，罗江科前往马林斯基宫。国家杜马副主席涅克拉索夫、书记多米托留科夫以及罗江科的亲信、十月党人萨维奇一同前往。当然，涅克拉索夫此行是为了监视罗江科。

会谈在米哈伊尔到场后随即开始。关于罗江科对米哈伊尔提出何种诉求，史料记载也是众说纷纭。据说，罗江科在接受波利叶多夫的调查时表示，希望大公任命信任内阁，大公当即便接受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74]但是，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他表示曾经向大公提议在圣彼得堡进行独裁统治，让整个旧内阁辞职，从沙皇掌权过渡至责任内阁制，但是大公对此“犹豫万分”。^[75]因为罗江科不可能对大公如此直言不讳，所以后人认为他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实际上他追求的是信任内阁制。

此外，涅克拉索夫在接受波利叶多夫的调查时透露，他请求大公让沙皇按照国家杜马的要求接受摄政，即让沙皇退位，同时提名有声望的将军担任临时首相。大公应允。^[76]这件事令人难以置信。《事件日志》（据传是韦尔希宁所著）中谈道：在要求将权力转交给国家杜马的时候，大公说“我本人无权应允”，他希望与首相共同协商。虽然经商议，首相提出辞职，但这并未得到沙皇的批准。随后，萨维奇和多米托留科夫向大公提出，根据国家杜马的要求，沙皇退位是必要的，希望大公能代为摄政。大公回答没有沙皇的应允绝不可能。^[77]但事实上，这两个十月党人绝不可能在罗江科面前说出这样一番话。³⁴³

不过，既然人们认为这两人确实发表过这番与事实相差甚远的言论，恐怕也就意味着在国家杜马众议员中有人赞同的是涅克拉索夫等人提出的沙皇退位以及建立责任内阁制的方案，这与罗江科的解散政府以及组建信任内阁制的方案不同，而且两者之间的分歧至少在会谈中多多少少有所涉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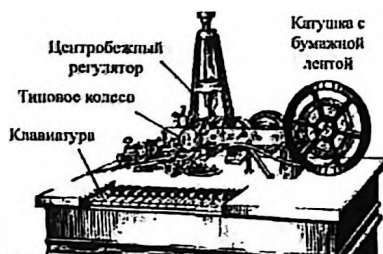


沙皇胞弟米哈伊尔大公

米哈伊尔在日记中只记录了他和罗江科、涅克拉索夫、萨维奇以及多米托留科夫会过面，而对谈论的内容只字未提。^[78]但是，在罗江科与涅克拉索夫交谈时，大公说道：“我赞同。即便我可能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我仍愿意协助你们。”大公决定将同国家杜马商议好的方案汇报给驻蹕于最高统帅部的沙皇^[79]，他的诚心诚意由此可见一斑。罗江科拜托大公，希望沙皇能认同以李沃夫为首的信任内阁，米哈伊尔大公应该对此给予了回应。由于需要使用陆军部的休斯印字电报机^{*}与沙皇联系，随后，大公前往陆军部，国家杜马成员则返回塔夫利宫。

晚上10时半，米哈伊尔叫出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要求其向沙皇转达以下

休斯印字电报机 19世纪中叶，英国发明家大卫·休斯所发明的电报机。该电报机不用摩斯电码，直接使用字母传送信号。发送信息时只需要使用类似于琴键的工具输入文字，接收信息时右侧卷轴上的纸带便会印出文字，通信过程如实时会话一般。1865年，俄国首次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两座城市间设立该电报机。由于俄军在战时曾将其用于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工作，因此休斯印字电报机记录下许多二月革命期间的历史资料。



内容：“为了立刻平息规模庞大的民众运动，我认为，必须实行内阁集体辞职。对此，戈利岑公爵也表示赞成。在内阁集体辞职的同时，必须任命继任者。目前的状况下，我提议选出一名受到陛下信任，且在各阶层备受尊敬的人出任首相一职。我们有必要委托此人依照他的判断组建新内阁。由于事态已至千钧一发之际，我希望陛下能够尽快让我以您的名义即刻宣布此事。当下，我认为李沃夫公爵是首相的合适人选。” 344

单从内容来看，罗江科的提议是妥当的。阿列克谢耶夫表示会马上向沙皇禀报，又补充说沙皇次日会回到皇村。米哈伊尔大公说他会在电报机旁等待回复，并希望沙皇能够晚几天回来。

沙皇听了弟弟米哈伊尔大公的提议后，认为这是多此一举。沙皇的回复如下：第一，返程日期不可推迟；第二，政府成员的任免工作应等其返回后再做定夺；第三，任命伊瓦诺夫将军为首都军区司令，取代哈巴洛夫，并于次日将他的军队派往首都；第四，从北部、西部方面军中派值得信赖的部队驰援首都。

阿列克谢耶夫转达了沙皇的回复，并恳请米哈伊尔大公继续斡旋，说服沙皇。最后米哈伊尔大公表示，他担心会错过最佳时机，而阿列克谢耶夫亦附和道，他自己也认为“时不待我，逝水难收”^[80]。

罗江科以一己之见，提出进步同盟的要求——组建信任内阁以缓解当前紧张的局势，却遭到沙皇的断然拒绝。戈利岑首相也表示，既然辞职不被沙皇接受，那他也不能将权力转交给他人。^[81]

米哈伊尔大公将沙皇的回复传达给国家杜马的罗江科，并打算返回加特契纳。由于市内发生了枪击事件，起义军也在到处盘查，米哈伊尔大公乘车在市内转了好大一圈后，还是朝哈巴洛夫等人所在的冬宫驶去。那里集结了1000人左右的兵力。米哈伊尔劝说哈巴洛夫等人放弃在冬宫打防卫战的想法，否则冬宫可能会沦为尺椽片瓦。^[82] 哈巴洛夫等人最终离开了冬宫，再次回到海军总部，这要归 345

功于米哈伊尔大公的极力劝说。

成立苏维埃与执行委员会

就在罗江科尝试通过米哈伊尔大公与沙皇协商期间，晚上7时，众人齐聚塔夫利宫的国家杜马第12号房间里。彼时，《记事》杂志社的苏汉诺夫正在高尔基家中，闻讯也赶到了国家杜马。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工人和士兵以外，还有众多各派别的干部以及1905年曾担任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弗鲁斯塔列夫·诺萨利等人。苏汉诺夫和同行的吉洪诺夫一同就座。^[83]记录显示，同在高尔基的家中闻讯赶来的施略普尼柯夫看到工人地区代表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相关人员都没有出席，请求推迟会议，并打算致电召集众人。^[84]

在会议开始前，大家提名以下三人担任资格审查委员：崩得派的埃尔利希、格沃兹杰夫以及弗鲁斯塔列夫·诺萨利。但是，有人对人选提出了异议。也许是因为最早参加会议的人中左派偏多，格沃兹杰夫受到布尔什维克人士以及国际派的反对。此外，还有人批评弗鲁斯塔列夫·诺萨利于1905年革命（第一次革命）后在巴黎的活动，以及其向主流报纸投稿等行为。最后，两人均被排除在资格审查委员任用人选之外。^[85]

据说会议从晚上9时开始，近10时结束。关于参会人数，有说125—150人的，也有说250人的，但绝大多数参会者是左翼知识分子，工人代表仅有40—50人。^[86]士兵代表似乎就更少了。因此，会议流程为：先由左翼知识分子发言，再由不足50人*的工人以及士

不足50人 如后文所述，这个数字是根据选举执行委员时的最高得票数为41票推算而来的。

兵代表投票。

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与内容说法各异。根据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创刊号^[87]所述，会议由著名的无党派律师索科洛夫宣布开幕。首先，大家“一致同意”推选齐赫泽为主席、斯科别列夫以及克伦斯基为副主席。大概是因为他们作为国家杜马议员最有声望吧。克伦斯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88]紧接着，格沃兹杰夫和索科洛夫以及刚刚从流放地逃回来的初始派的格林纳维奇和孟什维克党工人曼科夫当选书记。^[89]与赫赫有名的前两位相比，后两位并没有什么名气却也能够当选，大概是因为出席会议的初始派工人占大多数的缘故吧。

第一个议题是粮食问题。根据弗朗哥路斯基的报告，会议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选出委员，并选举格罗曼为负责人。第二个议题是成立军事委员会。无论哪个委员会，成员名单应该都已事先拟好，再在会议上通过。崩得派的拉菲斯写到，这两个委员会采取了“既要与国家杜马委员会合作，又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的方针，^[90]但除此之外没有证言可供辨认这一说法的真伪。第三个议题是决定成立起草委员会，首先委托其起草苏维埃成立宣言。除了索科洛夫、格林纳维奇等人被选为书记外，另选出苏汉诺夫、民粹派右翼作家佩舍霍诺夫、左翼评论家斯捷克洛夫。他们一同在别的房间里起草宣言。^[91]第四个议题是决定向各地区派遣政治委员（即全权委员）。根据《消息报》报道，这一决议是为了“组建苏维埃的区级分支机构”。苏汉诺夫记载：孟什维克党人普朗西切恩建议派工人民警驻扎各工厂，并设立地方委员会；向各地区派遣政治委员，以维持秩序。苏汉诺夫也对此提议表示支持。据施略普尼柯夫称，正是他率先建议设立“地方权力机关”，并促使执行委员会同意授予政治委员地方最高行政权力。^[92] 347

第五个议题是如何看待让苏维埃主席团的齐赫泽以及克伦斯基

加入已经成立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据拉菲斯称，由于报告非常简单，布尔什维克党对此非常不满，在讨论时苏汉诺夫也曾中途退席。但据苏汉诺夫说，克伦斯基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但是齐赫泽表示应该在和苏维埃进行商议后，再决定此事是否可行。据说在“漫长的讨论”之后，大家同意两人加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施略普尼柯夫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会后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的，‘为达到监督目的，保证实施政府制定的任何政策以及任何决定前都必须告知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政府派遣了这两名代表。”¹⁹³¹从这几行文字中我们感受到，施略普尼柯夫也是支持这一决定的。《消息报》对此事的报道如下：“最引人注目的是，本次会议围绕苏维埃代表参加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会议决定推选出两名代表：议员齐赫泽和克伦斯基。”¹⁹⁴¹不管怎样，大家一致认为，苏维埃的正副主席进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会议的最后审议了宣言，该宣言未经讨论便得到通过。宣言简明地阐述了革命今后的发展趋势。内容如下：

348 “斗争还在继续。……旧政权最终必将被打倒，并为人民当家做主让位。这是拯救俄罗斯的必经之路。为了让民主主义的斗争取得成功，人民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力机构。”此外，从“工厂、起义的军队、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中选出代表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向各地区派遣地方全权委员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全体首都市民要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周围，“实现各地区事务由人民自行管理”。该宣言的目的是实现召开立宪会议这一目标，即通过普遍、平等、直接且匿名的选举来召开立宪会议。¹⁹⁵¹但是，宣言刻意回避了中央权力归属问题、中央权力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关系问题。随后，会议决定创办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并刊登此宣言。¹⁹⁶¹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执行委员会。有关选举的详细过程众说纷纭，施略普尼柯夫笔下的内容很难令人信服，所以我参考了

苏汉诺夫和斯捷克洛夫的笔述内容。选举要选出主席1名，书记7名，共计8名。关于选举方式，斯捷克洛夫是这样说的：“先由苏维埃成员提名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简略地用一两句话介绍。这个时候，深究候选人所属党派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些候选人都是老革命家，他们能够得到很多人的赞誉和信赖，为各个阶层的苏维埃成员所认可。候选人介绍完毕后就进行举手表决。”^[97]最终，“在到场成员中多少有些声望，或是在会议中积极发言的无党派候选人”赢得了更多的选票。苏汉诺夫写到，他自己、斯捷克洛夫、卡佩林斯基获得了37—41票，排名靠前。^[98]斯捷克洛夫当选后，推荐了施略普尼柯夫、原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古典科夫。古典科夫是1905年圣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首都组织的代表人物，革命后担任劳工律师。而对于施略普尼柯夫，会场出现了“这个人是谁？谁认识他？他是何方神圣？”之类的疑问。斯捷克洛夫向大家介绍，施略普尼柯夫是他的老友，他既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家，也是非法的工人工作者。^[99]施略普尼柯夫和亚历山德罗维奇以20至22票的最低得票当选。^[100]尽管俄国革命党相关人士、原中央委员、国防派的森吉诺夫也出席了会议，最终却是左派的亚历山德罗维奇当选，这可能是得益于力量强大的工人社会革命党吧。

349

选举结果如下：^[101]

国家杜马议员——克伦斯基（劳动派）、齐赫泽、斯科别列夫（孟什维克）

“工人团”·消费合作社方面的工人——格沃兹杰夫、卡佩林斯基

孟什维克初始派——格林纳维奇、索科洛夫斯基、曼科夫
律师——索科洛夫、库拉希柯夫
评论家——苏汉诺夫、斯捷克洛夫

布尔什维克——施略普尼柯夫、扎鲁茨基
左派社会革命党——亚历山德罗维奇

从名单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三人都属于临时革命政府派。从律师、评论家群体的四人来看，除苏汉诺夫外，其他人都是原布尔什维克党人。斯捷克洛夫则是社会民主工党的老活动家，与布尔什维克党关系紧密，从大战前就与布尔什维克党合作，曾经帮助过布尔什维克议员团，但他在战争期间却完全保持了沉默。^{〔102〕}中间派的苏汉诺夫、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以及齐赫泽是执行委员会的核心人物。

执行委员会选举结束后，会议又决定从各社会主义政党中央机关和首都机构中选出一名代表进入执行委员会。^{〔103〕}

会议闭会后，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召开。执行委员会首先讨论了苏维埃大会授权的议题，决议立即成立地方委员会，并指定市内主

准备分发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的士兵们



要七个区（维堡、彼得格勒、瓦西里岛、莫斯科、涅瓦、纳尔瓦、罗日杰斯特温斯克）的工厂消费合作社、疾病互助基金会办公室、工厂食堂、职业介绍所、夜校等，作为武装工人以及士兵的驻扎地。此外，会议规定每1000名工人须组建100人规模的工人民警队，于28日上午11时、12时以及下午1时在指定驻扎地集合，并在该处等候苏维埃的指示。随后，将施略普尼柯夫派往维堡区，把斯林派往雷斯诺伊区，把佩舍霍诺夫派往彼得格勒区，还任命他们为政治委员。根据施略普尼柯夫的记述，会议还决定将索科洛夫、亚历山德罗维奇派往军事委员会。^[104]

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在被起义方占领的“戈比”印刷厂开始了报纸印刷工作。这是因为，战时无所作为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员邦齐-布鲁耶维奇在当天指挥士兵占领了这家印刷厂，并接到报告称这家印刷厂可以使用。^[105]斯捷克洛夫任命以下人员为《记事》³⁵¹的编辑：《记事》编辑部的原布尔什维克党员阿维洛夫与巴扎罗夫、邦齐-布鲁耶维奇，老布尔什维克党员戈里根贝格以及《记事》杂志撰稿人、孟什维克经济学者齐佩罗维奇。^[106]阿维洛夫等人同吉洪诺夫、奇米拉扎夫一起，于夜间前往印刷厂。^[107]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能够了解27日晚上到28日凌晨苏维埃成立时的种种动态。虽然当时苏维埃和工人、士兵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尚不紧密，但苏维埃尊重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暂时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组建地方权力组织上。

28日清晨，《消息报》创刊号刊登了工人苏维埃成立的宣言。

旧政权使国家完全陷入崩溃的边缘，人民早已饿殍载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彼得格勒的市民们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不满，迎接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子弹。沙皇政府没有给予群众面包，而是残忍地枪杀了他们。

但是，士兵们不想和人民作战，便扛起了起义革命的大旗。他们和人民一同站起来，夺取武器，占领了武器库和政府机构。

斗争还在继续，我们必须抗争到底。旧政权最终将被打倒，并为人民当家做主让位。这是拯救俄罗斯的必经之路。

要取得民主主义斗争的胜利，人民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力机构。

昨天，也就是2月27日，我们从首都的工厂、起义军队、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及其组织中选出代表，组成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在国家杜马取得绝对领导权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将把带领人民群众不断进行斗争，进而在俄罗斯最终实现政治自由与人民当家做主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

352

苏维埃将向彼得格勒各区派遣地方全权委员，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我们呼吁，全体首都市民要紧密团结在苏维埃周围，在各地区组建地方委员会，实现各地区事务自主管理。全体人民要万众一心，为彻底铲除旧政府势力，举行普遍、平等、直接且匿名的选举，召开立宪会议而奋斗。

工人代表苏维埃^[108]

这就是旨在打倒专制统治的人民革命宣言。

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各党派代表基本上都出席了28日召开的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人员详情如下^[109]：

右派——布拉姆森、柴可夫斯基（劳动派）；佩舍霍诺夫、查尔诺鲁斯基（社会革命党）；埃尔利希、拉菲斯（崩得）

右派中间派——博古达诺夫（孟什维克，右派）；巴图尔

斯基（孟什维克，中间派）；森吉诺夫（社会革命党，右派）；斯瓦茨基（社会革命党，右派）

左派——尤列涅夫（区联派）；莫洛托夫、舒特科（布尔什维克）

此外，按照惯例，名单里应该有斯图奇卡（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与科兹洛夫斯基（波兰社会民主工党），但两人直到3月11日召开执行委员会时才被追加进去。^[110] 各党代表加入执行委员会后，委员会中的右派势力得到了加强。委员会新势力分布如下：右派10人，中间派12人，左派6人。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掌权欲望

罗江科回到马林斯基宫时已将近深夜。此时的国家杜马已基本上被民众占领，进步同盟的主要活动地点——预算委员会办公室内正在召开苏维埃会议。留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只剩下主席办公室了。西德罗夫斯基称：面对民众的步步紧逼，“当时我们在楼里已经退无可退了”，“再退，就要到塔夫利大街上了”。^[111] 随后，他们在“最后的隐匿之处”召开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罗江科仍然没有下定决心承认革命，且在沙皇许可的前提下执掌政权。其他



《消息报》创刊号号外（1917年2月28日），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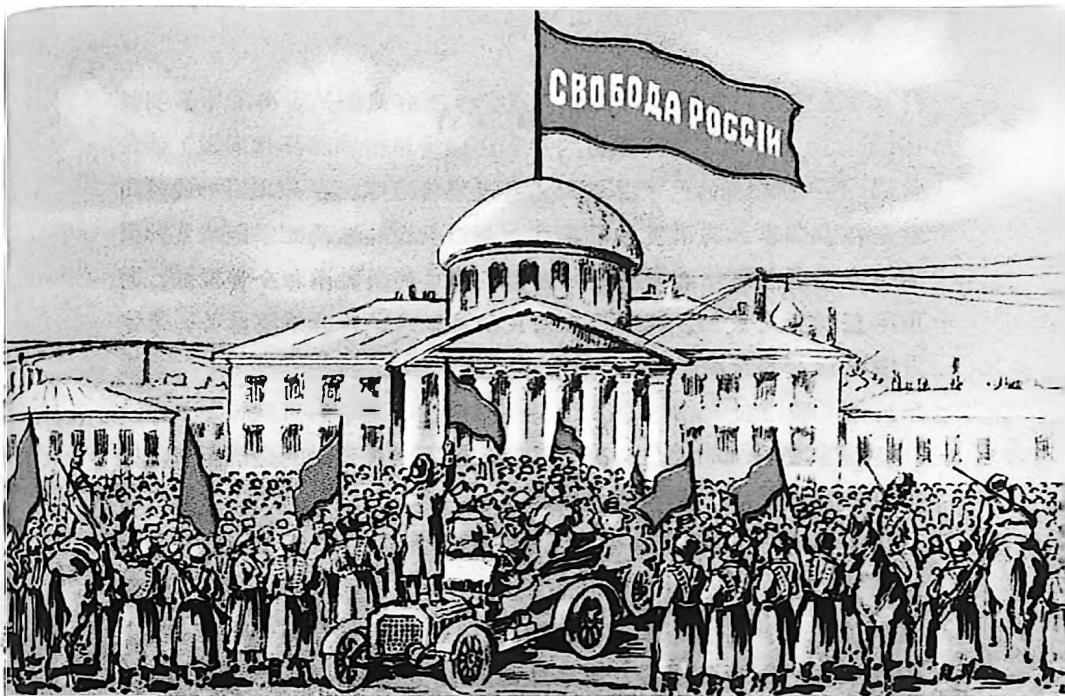
成员则认为，苏维埃已经成立，形势刻不容缓。米留科夫也步步紧逼，对他说：“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你必须做出决定了。”罗江科说：“请让我考虑15分钟。”随后，便把自己关进了主席办公室。¹¹¹² 9时过后，国家杜马议员、唯一的现任军人恩格勒格特赶到国家杜马大楼^{*}，来到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他也反复劝说罗江科掌握主导权，但是罗江科不为所动。¹¹¹³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军官致电罗江科，称军队会团结一致，接受国家杜马的领导。这一通电话坚定了罗江科的决心。¹¹¹⁴ 罗江科同意了。“好的，各位，好的。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希望诸位此后无条件服从我的指挥。”这番话明显是特意说给克伦斯基听的。克伦斯基回答说：“希望您能知晓我现在所处的情况，我现在不得不去考虑预算委员会办公室里的那些激昂的情绪。”¹¹¹⁵

罗江科于28日凌晨2时做出了决定。这个时候，军人议员是可以依靠的。于是罗江科宣布：恩格勒格特将作为新成员增补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并就任“彼得格勒起义卫戍军”司令。随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以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的名义发布了两则宣言，宣言上的日期为27日。实际上，两则宣言是28日凌晨2时公布的。

第一宣言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现恳请彼得格勒的居民和士兵们：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请不要破坏电报局、自来水管、发电站、市

恩格勒格特赶到国家杜马大楼 恩格勒格特由于当天白天身穿军服去了冬宫附近的俱乐部，所以无法在市区内通行。因此，他是回家换上便装后才赶到国家杜马的。



描绘士兵在塔夫利宫前集会的明信片。旗帜上写着“自由俄国”

区有轨电车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公共设施。同时，为了国防需要和保证公共资源的运转，国家杜马委员会请求市民保证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我们必须牢记，损毁和破坏国家机构和财产对任何人不利，这会给国家和全体市民带来巨大的危害，因为水和照明等是所有人的必需品。同时，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做出危害他人生命健康、侵害个人财产的行为。流血打斗行为以及破坏财产行为会成为施暴者内心的道德污点，给首都全体居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第二宣言

旧政府的执政导致国家接近崩溃边缘，在如此困难的时局下，国家杜马议员临时委员会必须承担起拯救国家和恢复社会秩序的重任。委员会坚决对自己下达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并坚信，居民和军队会遵循居民们的期盼，跨越重重难关，为建立深受人民信任的新政府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116]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决定掌握政权后，首先做的是确定对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的领导权。

355 菲利波夫斯基、姆斯蒂斯拉夫斯基所在的“总参谋部”是在转移到副主席办公室之后开始正式运作的。当时，主要由大约20名从前线回来休假的青年军官（以准尉为主）开展活动。^[117]克伦斯基回忆，27日傍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而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118]由此可以推测，很有可能有几名新加入的青年军官是由他召集来的。但是这时，这个军事委员会还隶属苏维埃。

然而，此时的菲利波夫斯基等人并没有工夫去强调这一点。姆斯蒂斯拉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士兵们参与起义的热情比预想的还要高。但他们提出要求，一定要以发布政府公文的形式下达命令。显然，苏维埃没有任何具有效力的印章。所以，我们就直接使用了国家杜马副主席办公桌上的公文纸，把相关的条令写在了上面。印章非常大，纸张也很厚实……看上去很正式。”^[119]军官们依照这份文件召集士兵，并执行了占领尼古拉、皇村两处火车站，对各地区进行全方位侦察的任务。军官们一路上还收缴了许多武器，男女学生帮忙予以清点归类。

28日凌晨3时到4时之间，罗江科与重新换上军装的恩格勒格

特冲进了军事委员会所在的办公室。随后赶来的索科洛夫在罗江科公布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后，立刻表示了强烈抗议。他说：“总部（军事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开始运转了，人也选好了。”他还说：“应该由那些从起义一开始就在这里工作的人来决定谁来指挥、指挥什么、指挥谁”，“但现在唯一拥有实权的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竟然被自己当初成立的……总部排除在外了，这简直不可理喻。”听罢这一番话，罗江科反驳道：“不，各位，既然你们把我们牵扯了进来，我希望你们能按照我们说的来做。”这引起了索科洛夫及其他苏维埃成员（如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不满，他们愤怒咆哮，步步逼近罗江科。先前“在一旁恭恭敬敬聆听罗江科讲话的军官们”也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将索科洛夫团团围住，形势一触即发。姆斯蒂斯拉夫斯基等人见势不妙，赶忙上前劝阻。姆斯蒂斯拉夫斯基在索科洛夫耳边低声说道：“就算恩格勒格特加入进来，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也会盯着他的，你就放心吧。”随后，罗江科、恩格勒格特以及在场一半的军官相继离开。28日早晨，恩格勒格特再次来到这个办公室。^[120]

现今公认的第一号军事委员会命令是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于28日上午8时发布的。^[121]随后，第二号命令也以军事委员会主席恩格勒格特的名义于上午8时10分发出。^[122]这天早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正式获得了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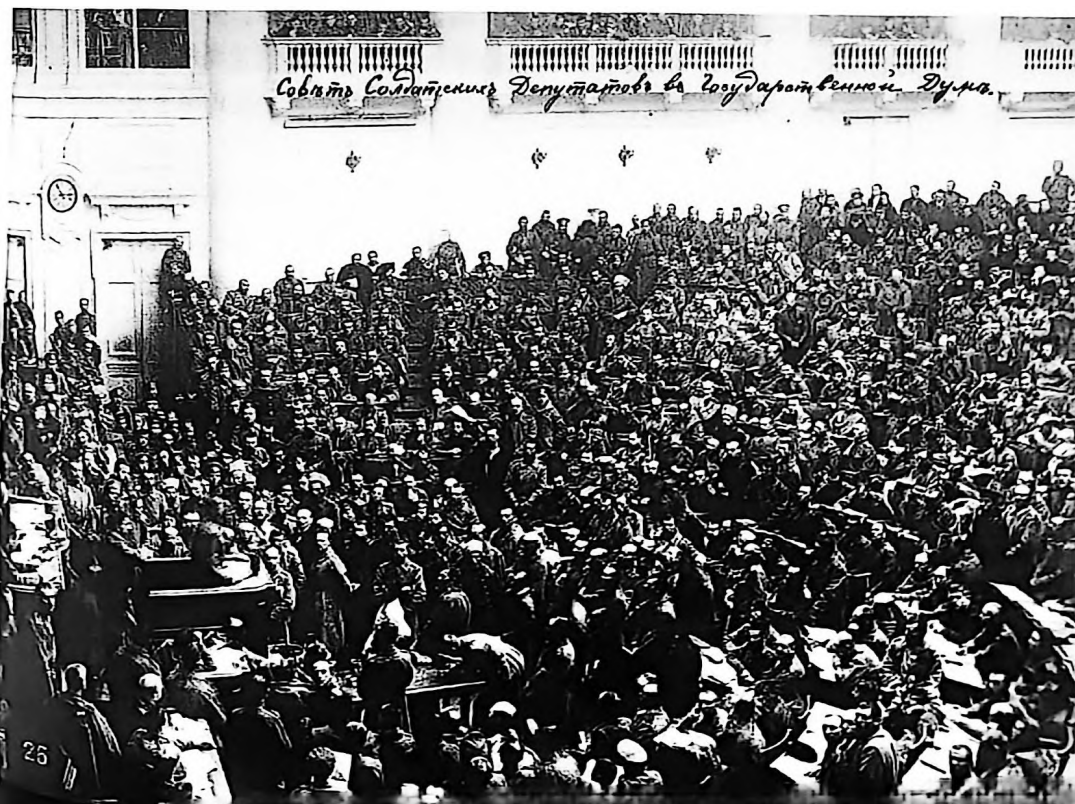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苏维埃粮食委员会的主席格罗曼要配合得多，因此对粮食委员的接管较为顺利。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安排盛加略夫等两人进入该委员会，并将委员会重新命名为“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和国家杜马执行委员会的粮食委员会”。粮食委员会首先做的事情是号召面包工立即返岗，使面包厂重新恢复生产。为保证粮食的公平分配，委员会又召集各区社会救济署的代表于28日下午3时召开市级会议，寻求他们的帮助。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会提出，今后分配

粮食的工作将委托给各区市民委员会进行。^[123] 3月1日，粮食委员会任命市议会粮食委员会主席尼卡诺洛夫为首都粮食全权委员。粮食委员会规定普通市民的人均粮食配给量为1.25俄磅（约512克）黑麦面包，体力劳动者则为1.75俄磅（约717克）。基本配给粮票由市议会发放，超额部分的粮票须由工厂委员会及其他工作单位发放。^[124] 粮食委员会在运行时虽然未能完全摆脱苏维埃，但形成了由国家杜马和市议会直接对接处理粮食问题的新机制。

两大革命 357

多种路线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士兵代表会议



首都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2月28日），在破晓时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便雷厉风行地全力行使权力，全面推进革命。

上午8时，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命令，要求纳吉莫夫上校接管皇村火车站、比利时发电厂、储蓄银行等基础设施，并维持弗拉基米尔斯基大道与扎高尔斯克大道工业技术高专之间的区域以及尼古拉耶夫斯加耶大道各区域的治安。随后，由国防委员会主席恩格勒格特签署的第二号命令于8时10分发布。该命令要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接管国家银行和中央电话局，并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和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现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周围布置岗哨。由于资料散佚，第三号命令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得知。8时40分，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第四号命令，要求预备电力工兵营营长波宾斯基上校重新接管中央电话局。而发布于8时45分、由菲利波夫斯基署名的第五号命令，则要求希曼斯基少尉逮捕前首相施蒂默尔，并将其押送至国家杜马。^[1] 军官们一接到命令，便立即带上士兵动身了。

对代表沙皇政府和旧制度主要人物的逮捕行动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当初，呼吁民众参与逮捕行动还只是克伦斯基的个人主张，而如今却成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为行使权力所采取的一项措施。结果，有的人主动联系他们，让他们把自己抓走，还有的人甚至主动现身国家杜马，因为他们认为，投靠国家杜马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27日深夜，首都宪兵总司令助理沃耶科夫中校连同总部其他人员被逮捕，28日早晨，前首相施蒂默尔被捕后，早上10时，内务部副部长库洛夫和总主教皮季里姆也随之被捕。紧接着，中午12时，国家保健总局局长雷因被捕。随后，特别市市长巴尔克及其两名助

理、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哈巴洛夫*、宪兵部队将领卡扎科夫也相继被带走。下午6时，右翼代表人物——俄国国民同盟会会长杜布罗温、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卡尔泽尔被捕。晚上8时，司法部长多布罗沃利斯基被捕。前内务大臣马卡洛夫被捕后，在任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竟主动现身。至晚上10时，前首相伊万·戈列梅金被捕。^[2]

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被捕一事，某种程度上将整个行动推向了高潮。普罗托波波夫在友人的陪同下主动现身塔夫利宫，并自报姓名。克伦斯基闻讯后，与武装士兵一同赶来。^[3]他紧张得脸色发青，但眼神咄咄逼人，大喊道：“这个人不能抓！”据说，在场的人还以为下一秒普罗托波波夫就要被拖去刑场了。^[4]

最晚被捕的是财政大臣波尔克，并且中途还充满戏剧性。3月1日下午3时，波尔克于财政部大楼自己的住所内被武装士兵抓捕。就在他被士兵押下楼时，一位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政治委员来到了财政部。该委员声称，上头并没有签发波尔克的逮捕令，因此他让士兵先把波尔克带到国家杜马，等克伦斯基重新签发相关文件后才正式逮捕了波尔克。^[5]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各国家部门的接管。28日早晨，罗江科批准了布勃利科夫前一天提出的全面接管交通部的请求（参见第6章第335页）。布勃利科夫让助手对其事先起草的致铁路工人的宣言加以修改后，带着这份文件去了交通部。^[6]据其回忆录记述，军事委员会给他配备了两辆卡车和

哈巴洛夫 28日下午4时左右于海军总部与波尔克一同被捕并被押送至国家杜马。据说当时他因使用假名而暂获释放，之后再次被捕并被带走（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I, p.191）。

360 若干名士兵，他在路上又临时征用了一辆民用卡车并乘车前往交通部。曾为布勃利科夫左右手的铁路局副局长罗蒙诺索夫则披露了更具戏剧性的细节：布勃利科夫在前往交通部的途中，叫来了他的一位技师朋友和一位律师朋友，还带上了在街上碰到的几名士兵和两名身份可疑的陌生人（其中一人为原社会革命党的铁路工作人员，另一个人是因涉嫌杀害女性而被通缉的原军官），一起进了交通部。¹⁷

布勃利科夫一踏入铁路局局长办公室，就宣布政权已经转到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手中。同时，他以保护人身安全为由，逮捕了铁路管理局局长，并将其押送至国家杜马。紧接着，他又来到大臣办公室，要求交通大臣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继续留任，但遭到对方拒绝。布勃利科夫当即再次以保护人身安全为由拘捕了克里格尔，并将其软禁在他自己家中。¹⁸ 当时有消息称，西北铁路部部长瓦卢耶夫也被民众抓了起来，并在押往国家杜马的途中被杀。闻讯后惊恐万分、惶惶不安的交通部高层在看到他们的老相识布勃利科夫议员后，着实松了一口气。第一副部长鲍里索夫感叹道：“你可终于来了。我们从昨天起就盼着你们来。”第二副部长科济列夫虽为保皇派，但也表示愿意服从布勃利科夫的指挥。¹⁹ 交通部的其他职员也纷纷效仿科济列夫的做法，于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接管了交通部。

紧接着，布勃利科夫通过铁路专用电报网向全国的铁路工作人员发送了宣言。

2月28日13时50分。

今天，我受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委托，正式接管交通部并传达国家杜马主席的如下指令：

“各位铁路工作者们，将人民的生活摧残得面目全非的旧政权已经濒临瓦解。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决定担负起组建新政

权的使命，并以祖国的名义向你们发起号召。各位肩负着救亡图存的重任，祖国不仅需要你们坚守岗位，更需要你们付出更大的努力，铁道运输一刻都不能中断，必须拿出比之前更充沛的精力来保证火车的运行。各位，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运输事业对支援前线战争和稳定后方至关重要。俄国铁路系统现存的缺陷和不足也必须依靠各位忘我的工作热情以及为国献身的决心、对祖国的热爱来弥补。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

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我相信，各位必定能够响应号 361
召，不负祖国母亲的重托，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请所有铁路工作者务必坚守自己的岗位。

国家杜马议员布勃利科夫。^[10]

这份电报立刻传遍了全俄所有火车站，也将首都正在发生革命的消息带给了全国人民。

接着，布勃利科夫再次发出电报，通知相关人员查出沙皇专列的具体位置，防止其驶入博洛戈耶—普斯科夫线以北的区域，同时禁止军用火车在距离首都250俄里（约266.7千米）以内的区域运行。^[11]此举的目的在于阻止沙皇返回首都，防止其军队镇压革命。这也成了击退伊瓦诺夫部队的决定性措施。

和交通部的情况一样，除部分保皇派人士外，大多数副部长、局长级别以下的国家部门高级干部都希望获得国家杜马的庇护。



布勃利科夫。国家杜马进步同盟议员。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政治委员的身份接管了交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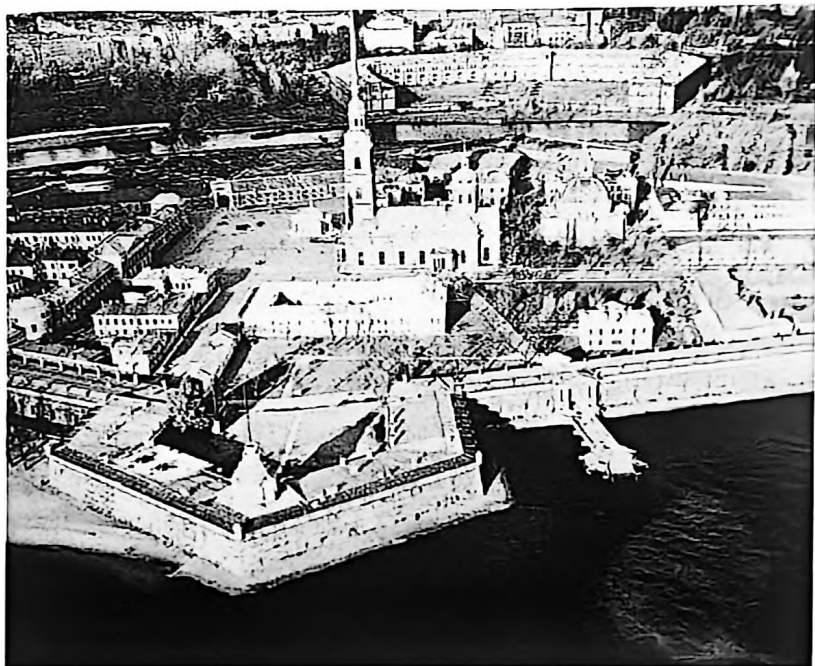
舒尔金回忆，当时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都向国家杜马发出了派出议员接管请求。^[12]面对这种状况，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采纳了布勃利科夫的建议，决定全面接管各国家部门，并选定负责执行的政治委员。针对工商部、司法部、农业部、文化部、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交通部等九个国家部门（外交部、宫廷事务部、国家监察部未被提及）以及电信局、邮局、最高法院、彼得格勒特别市市长办公楼的接管工作，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任命大部分是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26名议员为政治委员，并于28日公布了名单。^[13]实际的接管工作始于3月1日。^[14]

362 尽管政治委员接管的政府机关并不包括国家银行，但苏维埃在28日召开的全体大会上仍请求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接管国家银行，中央及地方的国库、造币厂、印刷厂。^[15]而苏维埃方面并未主动接管任何政府机关，因为官吏、公务员已经发誓效忠国家杜马。

为肃清有可能在军事上造成威胁的反革命势力，军事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被列入危险名单的就是彼得保罗要塞，因为驻扎在这里的炮兵部队随时都可能发起炮击。

恩格勒格特等人占领彼得保罗要塞后，拟订了一套解散政府军的作战计划。他们扬言要以彼得保罗要塞为据点，对军区司令哈巴洛夫麾下的政府军驻地——海军总部发起炮击。^[16]据舒尔金回忆，是涅克拉索夫28日晚上向他提出了这个点子。但他记错了日期，实际应该是27日晚上*。28日上午，舒尔金代表国家杜马赶往彼得保罗要塞，目的是与司令达成协议，让那儿的卫戍部队加入国家杜马

实际应该是27日晚上 舒尔金把这件事发生的日期记晚了一天。据军事委员会的奇科里尼回忆，舒尔金前往彼得保罗要塞的时间是28日上午。Lyanders, *The Fall of Tsarism: Untold Stories of the February 1917 Revolution*, Oxford, 2014, p.77.



彼得保罗要塞。军事委员会控制了这座要塞，并将“革命囚徒”关押在这里

临时委员会阵营。随后，舒尔金释放了19名于2月26日拒绝镇压民众并最先发动起义的巴甫洛夫斯克团的士兵。^{〔17〕}

由于革命方已经取得了彼得保罗要塞的掌控权，克伦斯基于3月1日将第一批“革命囚犯”普罗托波波夫、哈巴洛夫等12人押送至要塞并实施监禁。^{〔18〕}

但这并不代表彼得保罗要塞的炮兵部队已经完全具备对海军总

克伦斯基……并实施监禁。此次行动中，奉克伦斯基之命将第一批革命的囚犯押送至彼得保罗要塞的人是森吉诺夫。森吉诺夫将这些大臣移交给要塞监狱长伊瓦尼申上校。而伊瓦尼申正是森吉诺夫当年坐牢时的监狱长。回到国家杜马后，森吉诺夫建议克伦斯基更换监狱长。第二天，新的监狱长便上任了。

Zenzinov, *Iz zhizni revoliutsionera*, Paris, 1919, pp.84-87.

部发起炮击的能力。想必各方一定针对此事进行了多番商议。海军大臣格里戈洛维奇自始至终都深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赖，但他强烈批判沙皇专制统治末期的政治，所以支持革命。¹¹⁹¹由此可以推测，他极有可能应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请求，协助后者将镇压革命的部队逐出海军总部。

这天中午12时，海军大臣的副官抵达海军总部，声称海军大臣要求哈巴洛夫立刻离开海军总部。另外，他还威胁道：如果部队未在20分钟内撤离海军总部，这里将会遭到来自彼得保罗要塞的炮击。哈巴洛夫被逼无奈，只得命令士兵撤离海军总部。士兵们放下武器后，返回了各自所属的部队。哈巴洛夫则继续留在海军总部静候自己被捕时刻的到来，并于当天被捕。¹²⁰¹

军事委员会还为夺取军队指挥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在28日下达的一系列指令中，除了接管皇村火车站、发电厂、电信局、国家银行等机关单位的命令外，其他多数指令均属治安部队动员令。其中，1名上尉与2名准尉被任命为沃利尼团的司令一事颇具深意。¹²¹¹而另一边，政府方面的军队也已经彻底沦为一盘散沙。28日，起义士兵今后将听命于谁已经成为政府军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基于这一现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打算先让士兵们听命于军官，再通过军官来掌握卫戍部队的指挥权。

27日，参与起义的士兵达到6.67万人¹²²¹，其中，许多士兵是将军官杀死或驱逐后才走上街头开始游行示威的，而28日新增加的约6万名士兵并没有参与之前的暴动，而是直接同军官一起，参加了以整支部队为单位的游行示威。这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掷弹兵团以及骑兵第9师各团在军官的率领下，跟随走在队伍最前列的军乐队来到国家杜马。前些天未公开露面的罗江科亲自上前迎接各部队的到来，并发表了以下演讲：

俄国军队是一支拥有着光辉历史的军队。我希望诸位能保持俄国军队的优良传统。……我希望诸位能听从军官的指挥。因为一支队伍如果没有了指挥官，只会沦为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带领各位前来此地的军官与国家杜马议员在所有观点上都是一致的。请大家务必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协助我们组建一个能够赢得全国人民信任的新政权。独一无二的俄国，乌拉！祖国母亲露西（俄国），乌拉！^[23]

恢复秩序、保持传统、服从军官的指挥——罗江科的演讲始终围绕这几点展开。米留科夫也积极地给士兵们做思想工作。他强调，“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唯一一个现存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必须拥护其领导”“因为两个政权并存是很危险的”“你们必须在国家杜马的领导下回归或重新寻找自己所属的部队，并听从部队军官的指挥”。^[24]奔走于各兵营之间并迎接地方士兵到来的议员们也是以“效忠国家杜马”和“服从军官指挥”为核心内容动员士兵的。^[25]

这些号召姑且算是奏效了，士兵纷纷响应，高喊道：“乌拉！乌拉！”罗江科顿时心情大好，并于当天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下达了以下命令：

1. 所有士兵和部队立即返回军营。
2. 所有军官立即返回所属部队，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重建部队秩序。
3. 部队指挥官必须于2月28日上午11时前至国家杜马听取指示。^[26]

代表进步力量的起义士兵之前与军官对抗并投身起义之中，现在却收到这样的命令，不难想象他们有多么愤慨。28日，连颇具威

信的上校所率领的莫斯科团的士兵们也集体决定^[27]拒不执行“绝对服从军官命令”等要求。可见，罗江科此次下达的命令引发了士兵的强烈不满。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本打算通过军官来控制士兵，但这一事态使该计划以失败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支持革命的军人、军官纷纷出现在了军事委员会。28日，恩格勒格特致电总参谋部动员部长列夫·图甘-巴拉诺夫斯基上校，希望他能够来军事委员会任职，辅助自己处理军务。不过，这位上校直到3月1日才应约前往军事委员会。^[28]曾任职于总参谋部的图马诺夫上校、雅库布维奇上校以及吉利毕希上校也于同一天开始在军事委员会任职。这些来自总参谋部的上校均为改革派。他们主张废除专制制度，对立宪民主党持反对态度。^[29]

然而这些加盟军事委员会的人物中，最重量级的一位并非国家杜马议员，而是在塔夫利宫失去容身之处的古契柯夫。他于3月1日现身军事委员会。他的旧识恩格利格鲁特本打算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位子让给他，但这并非其所愿，于是，最终他与恩格利格鲁特“共掌大权”。^[30]在古契柯夫的带动下，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程师帕里钦斯基、将军波塔波夫等人也相继加盟军事委员会。除此之外，在师长米哈伊尔大公率领的高加索骑兵师中担任参谋长一职的索洛夫佐夫也加入进来。他来首都办事时正好碰上首都闹革命，听闻风声后，他主动造访军事委员会，并顺势开始了在军事委员会的工作。^[31]随着军事委员会汇集的要员愈来愈多，人员迅速壮大，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也成了最具实权的机构。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开始着手维护社会秩序和重建警察队伍。首先，他们任命库鲁伊亚诺夫斯基为政治委员，让他负责这项工作。
366 他既是一名建筑师，同时又担任市会议员。^[32]28日晚8时，他在市议会大厅主持召开了市会议员和普通市民参加的集会。在他的动员下，许多学生也参加了此次集会。会上，他推动成立了隶属于

市政府的民警组织“市民警”，并亲自出任长官。^[33]同时，他还选定了各地区的民警委员及其办事处。被任命为民警委员的有市议会议员、学生、律师、工程师等人员。比如在维堡区就有两名市议会议员、两名军医大学学生接受了任命。各位政治委员当晚便赶赴各区，着手市民警队伍的组建工作。^[34]

市议会虽然表面上没有声张，但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由于从革命一开始雷拉诺夫便因生病在家休养，格列博夫代替他出任了市长。格列博夫将市长办公室腾出供市民警总部使用，并从市里拨了一万卢布作为其日常经费。^[35]活跃在军事委员会中央总部的克里森，也是在国家杜马议员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博古达诺夫的推荐下加入市议会的。他从3月1日早上起就开始动员市里的女性员工和市议会议员夫人们动手缝制市民警的袖章。袖章由白布制成，上面绣有红色的字母“Г. М.”（意为市民警，Gorodskaiia Militsiia，简称G. M.）。在市民警总部的动员下，一些10到15岁的童子军少年以及中学生加入到市民警队伍当中。^[36]

最初，市民警号召市民回收武器。3月4日到14日之间，共回收

组建成形的市民警队伍以及加入到该行列中的工业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367



了184把步枪、307把手枪及其他500件武器。上交这些武器的300人中有233人集中分布在海军部、斯帕斯卡亚、喀山、利切伊娜亚以及科洛姆纳五个区。^[37]这一带由市民警直接管辖，而在其他地区，市民警和工人民警还在互相争夺势力范围。据说，截至3月5日，市民警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7000人。^[38]

市民警的组建，意味着国家杜马和市议会组织地掌控了部分大学生和中学生。革命初期，宣扬自由主义的名校兰特夫斯卡亚中学成为彼得格勒市中学学生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总部。^[39]不久后，该校学生梅斯内尔当选为彼得格勒中学学生青年组织的主席，该组织隶属立宪民主党。大学生中应该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如前文所述，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接管了以交通部、铁路为首的政府部门与重要设施，并掌握了市中心地区的警卫权。它得到了几乎所有有产阶层、官僚、军官以及相当一部分在校大学生、中学生的直接支持。

苏维埃与群众

苏维埃努力加强与首都革命群众的联系，而革命群众也将苏维埃视为代表群众利益的组织，为此选出了代表，并将他们推举至苏维埃。

对组建苏维埃一事，回应最为热烈的当属首都的工人。2月28日和3月1日，首都的大工厂举行了苏维埃代表选举。从选举结果看，当选的工人代表绝大多数为右派-中间派孟什维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或倾向于支持右派和中间派的无党派人士，左派人士数量较少。

当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根据地工厂里，有布尔什维克党人当选为代表。维堡区的罗森克兰茨工厂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推举了4名代表，2名布尔什维克党人（洛博夫及另一人）、1名共产主义拥护者

以及1名后来入党的无党派人士。推举至苏维埃的下设机构——地区苏维埃的3名代表也均为布尔什维克党人。^[40] 在新、旧莱斯内尔工厂举行的第一轮选举中，包括“工人团”成员布洛伊德在内的多名孟什维克党人当选为代表。然而，3月1日，康德拉季耶夫和科马洛夫等主要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返回工厂，要求进行改选。工厂应二人的要求重新组织了选举，最终，8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及其推举的1名社会革命党人（或为左派人士）当选为代表。^[41]

368

另一方面，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根据地工厂，非布尔什维克党人当选为代表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诺贝利工厂27日组织的街头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当选为临时代表，并在随后召开的大会上获得承认，而布尔什维克党人戈尔坚科则被选为地区苏维埃代表。^[42] 同样，在菲尼克斯工厂组织的选举中，有2名孟什维克党人和1名布尔什维克党人（科达茨基）被推举至彼得格勒苏维埃，当选地区苏维埃代表的反而有4名布尔什维克党人（伊瓦诺夫等）、1名孟什维克党人和1名社会革命党人。^[43] 目前暂未发现有关旧帕尔维艾宁工厂和爱立信工厂选举结果的史料，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很有可能也未当选两地代表。在爱立信工厂，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卡尤罗夫未能当选首都的苏维埃代表，他被派遣至地区苏维埃担任代表。在布尔什维克党势力较弱的伊瓦苏工厂，布尔什维克党人丘格林被推选为地区苏维埃代表。^[44]

之所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根据地工厂里仍有布尔什维克党人落选，可能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活动家当时仍未能从街头政治运动中脱身，耽误了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或是因为他们对苏维埃心存反感，没有参加选举。

另外，再来看看布尔什维克党势力较强的工厂的选举结果。彼得格勒区的杜富隆工厂为响应27日向苏维埃推举代表的号召，召开了临时集会，当时并不在场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科罗霍德夫当选为代表。^[45] 薛提宁飞机制造厂选举产生了2名代表，有1名是布尔什维

克党人。在位于维堡区的彼得格勒电装工厂，当选代表的是1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同样，当选斯特鲁克和伊克瓦里两处工厂代表的也是1名布尔什维克党人。¹⁴⁶¹ 28日早上，费菲列破甲弹厂也组织了选举，当选代表的是独立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卡洛夫。¹⁴⁷¹ 位于彼得格勒城外的伊佐拉工厂于28日选举产生了10名代表，其中8名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右派人士仅有2名。¹⁴⁸¹ 谢斯得罗列茨克工厂选举产生的2名代表均为布尔什维克党人。¹⁴⁹¹

369 但在绝大多数工厂的选举中，当选代表的都是孟什维克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彼得格勒金属制造厂选举产生的6名（或7名）代表均为社会革命党人。¹⁵⁰¹ 伊瓦苏工厂当选的4名代表恐怕也是同样的情况。28日，奥布霍夫造船厂举行了15000人规模的大型集会。会上，8名社会革命党人、1名孟什维克党人以及2名无党派人士当选为代表。¹⁵¹¹ 普契洛夫工厂也于3月2日举行了以部门为单位的代表选举，选出了约40名代表。据说其中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超过了30名，而布尔什维克党人仅有8名。其中一位名为雷米歇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正好在选举即将开始之际重返岗位并当选的。¹⁵²¹

即使是那些在革命开始前并未参与过政治罢工的工厂，也对选举苏维埃代表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热情。斯科洛赫德制鞋厂就选举产生了6名代表，但这些代表均为无党派人士。¹⁵³¹ 橡胶工厂也于3月1日选举产生了16名代表，其中绝大多数为社会革命党人，但也包括1名布尔什维克党人。¹⁵⁴¹ 波罗的海造船厂选举产生的约8名代表中，大多数为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党人代表有3名。¹⁵⁵¹

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工人们斗志昂扬，奋起行动，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作风扎实稳健的人更能为多数人接受，他们当选为代表也是情理之中。

像斯特鲁克工厂和伊克瓦里工厂的选举一样，中小型工厂的代表选举由若干个工厂联合举行，按千分之一的比例选出代表。而

规模更小的工厂则是先按行业进行分类，再由同一行业的多所工厂共同选举产生代表。这种情况下，有时选举的集会上会同步开展工会重组或新工会的筹建工作。较早开始选举代表的是那些已有行业工会，并且工会有关人员尚未停止活动的行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3月1日召开的彼得格勒印刷工人全体会议。这次全体会议有3000到4000人参加，由于主导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手中，当选的4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党人占了2个名额。^[56] 3月3日，首都土木工人全体会议召开，与会者约2000人，最终选举产生了4名代表。^[57] 尚未解散的缝纫工人工会干事会和皮革工人工会也分别于3月1日、3月2日号召工会成员召开了集会。^[58]

从以上有史可稽的选举结果来看，当选代表的工厂工人中共有 370 43名左派，包括40名布尔什维克党人、1名共产主义拥护者、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1名左派（无党派）人士。但实际上，除以上人员外应该还有一些区联派人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不从属于任何政党的左派人士也当选为代表。据苏联研究人员阿尔切米耶夫统计，首都及周边城市共有41万名工厂工人，其中，光是百人以上工厂推选出的代表就有580人。^[59] 因此，根据已知数据，左派人士不超过总代表人数的一成。

首都的许多工人参与到街头政治运动中，对革命表现出了无比高涨的热情。他们当中也产生了向苏维埃推举代表、与苏维埃建立联系的诉求。早在2月28日，彼得格勒的药剂师群体便已推选出代表。3月1日，彼得大帝医院的员工和邮局的基层员工也通过选举产生了3名代表。^[60] 3月4日的建筑工人（木工、油漆工、石匠、水泥工、泥瓦工）全体大会和3月5日的银行员工、工商业从业人员、药店员工、汽车司机等全体大会举行之后，这些行业的代表选举开始步入正轨。^[61] 当然，其中存在一个较大的问题，那就是“工人”的范畴到底该如何界定，因此，对基层选举产生代表的审查工作随即

开展。燃料特别审议会的专家也将他们的一位同事推举为苏维埃代表，但他最终并未获得正式代表的资格。^[62]除已经被推选至苏维埃的代表外，以下首都工人也参与到选举活动中。如彼得格勒铁路枢纽、市营有轨电车公司、市营企业联合公司（燃气、自来水公司）、邮局、电信局、电话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手工业的从业人员；鞋店、理发店、糕点店等店铺的师傅；在酒馆、餐厅、照相馆等工作的员工；货运马车车夫、小学教师等。^[63]

和工厂工人一样，士兵代表也纷纷会聚到苏维埃旗下，这对苏维埃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加入，使得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变为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当时，苏维埃明确提出，每个团须选举产生一名代表并将其派遣至苏维埃，因此最早确定代表人选的是主导起义的沃利尼团、第6工兵预备营、立陶宛团以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紧接着，曾在维堡区发动起义的革命支持者——莫斯科团也举行了代表选举。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对此进行了报道。28日，在团长人选确定的同时，也选出了2名前往苏维埃的士兵代表。^[64]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这些代表选举相关的史料记载却寥寥无几。

在3月1日召开的苏维埃全体大会上，士兵代表第一次正式加入苏维埃。根据发言者名单和当选执行委员的士兵代表的所属部队，可以看出较早向苏维埃派遣代表的是沃利尼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立陶宛团、谢苗诺夫斯基团、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芬兰团、猎兵团、第6工兵预备营、第1歩兵团、第1狙击兵团、波罗的海第2海军兵团、红十字汽车队等部队。可见，第一批士兵代表明显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倾向。

学生苏维埃代表的诞生也同样备受关注。2月28日下午2时，首都的大学、高等院校向学生发起了选举代表的号召。3月2日，《消息报》刊登了由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的社会民主工党、社会革命党、

犹太人社会民主工党三个党派发起的联名倡议书——《致革命学生书》。在倡议书中，他们呼吁学生将工兵苏维埃视为“革命群众的唯一权威机关”。¹⁶⁵¹这显然是在动员学生加入苏维埃，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虽然我们不知道学生们以何种形式进行选举、选举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但学生选举产生了代表，他们加入了苏维埃这一事实是确实存在的。¹⁶⁶¹学生苏维埃代表的人数及他们在苏维埃中参与的活动也同样无人知晓。这些加入苏维埃的代表很有可能主要是一些过去长期参加政治运动的左翼学生。

地区苏维埃和工人民警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件意义重大的事，那就是工人们遵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最初公布的决议，向首都层级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派遣代表的同时，还向地区层级苏维埃派遣了代表。由于旧政府的警察行政体系已经土崩瓦解，中央苏维埃和各地方都希望能够建立各地的权力机构。于是，一个不同于城市民警的组织，由工人组成的民警队伍应运而生。在革命的过程中，工人们曾手持起义士兵提供的武器，与他们一同对警察局发起过攻击，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集结组成了民警队伍，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地区治安。工人民警一般由选举产生，有时也由抽签产生。成为民警的工人还与工厂谈判，希望工厂在他们请假期间也正常支付薪水。¹⁶⁷¹

以下是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首先是维堡区。布尔什维克党人施略普尼柯夫被任命为该地区的政治委员，但实际上他没能完成相应的任务。早在2月28日，该区的地区苏维埃就已经成立了核心领导班子¹⁶⁸¹，而这一行动很有可能是以早期的地区苏维埃主席——彼得格勒枪弹制造厂的马克西莫夫（区联派）为主展开的。3月1日，罗森克兰茨工厂的工人民警队伍诞生后，与彼得格勒金属制造厂、

兵工厂、菲尼克斯工厂等组建的民警队伍共同成立了维堡第一分区委员部。¹⁶⁹¹ 此外，3月1日，新莱斯内尔工厂、伊瓦苏工厂以及旧莱斯内尔工厂也就是否组建工人民警队一事进行了商讨。当时有报纸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称后两所工厂“听取了地区委员会代表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的报告后”，推动了工人民警队伍的组建。报道中提及的“地区委员会”，有可能是当时地区苏维埃的自称。这些工厂的民警还成立了维堡第二分区委员部。¹⁷⁰¹ 这一由工人组成的民警组织在当时与地区苏维埃之间存在何种关联，目前尚不清楚。维堡第一分区委员部的政治委员是一位由市民警部门派遣来的名叫波契巴泽的学生，从中可以看出工人民警与市民警部门之间可能也存在关联。然而，波契巴泽上任不久便遭民警干部会撤职。¹⁷¹¹ 他的继任者是一名枪弹制造厂的职员，同时也是社会革命党的一名死忠派，而他的5位助手中，有3名社会革命党人（或为左派）和2名布尔什维克党人。第二分区委员部的政治委员则为布尔什维克党人。¹⁷²¹ 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很有可能是地区苏维埃和工人民警委员部通过合作，完全掌控了维堡区。

2月28日上午9时，在维堡区东边的火药工厂地区，所有工人团结起来成立了火药工厂地区临时执行委员会。该临时执行委员会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取得联系后，遵从“工人苏维埃的决定”举行了“人民民警”的选举。从选举对象来看，这实际上是由工人组成的民警队伍。该临时执行委员会还设立了书记处以及民警、粮食、经济、财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个部门。根据史料记载，3月4日该地区是有地区苏维埃的，但其与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尚不明确。¹⁷³¹

以上列举的是由工人民警全权掌管某个地区的例子，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地区是由工人民警和市民警共同掌管的。在瓦西里岛区的4个民警委员部中，第一分区委员部是以治安法官德罗兹多夫为政治委员的资产阶级市民性质的组织，第二分区、第三分区以及第四分区委

员部则为工人民警组织。另外，第二分区委员部的政治委员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第四分区委员部的政治委员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或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3月9日，该地区的地区苏维埃成立了执行委员会。^[74]

彼得格勒区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斯塔尔切夫称，该地区的工人民警一开始曾在奥拉宁鲍姆大街设置了一个临时中心，但不久后，市民警彼得格勒第二分区委员部便将办公地转移至同一地点。于是，工人民警成立了自己的地区委员部，组建了工人民警地区评议会，并将布尔什维克党人西梅特科夫选为政治委员。工人民警的地区委员部位于白俄罗斯火车站大街18号的建筑内，而该建筑也正是市民警的地区委员部和彼得格勒第一分区委员部所在地。^[75]

另一方面，据苏维埃指派的政治委员佩舍霍诺夫回忆，他曾事先请求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对自己委以全权，但国家杜马无暇顾及此事，无奈之下，他只好在3月1日与少数活动家以及一队由准尉率领的士兵一同前往彼得格勒区。他在该地区中心地带一家名叫“精英”的电影院门外挂上写有“彼得格勒区委员部”字样的牌子后，立马张贴了布告。^[76]“彼得格勒区委员部是根据新政权的命令成立的组织。委员部在此呼吁，为完成伟大事业，不论局势如何发展，居民们都应保持冷静。”接着，他要求工厂和国有企业向委员部派遣代表，并且规定工厂应按照每500人中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选举。^[77]委员部内部还设立了民警部、司法部、涉外部、食品部、出版部和卫生部。在地区委员部成立的同时，群众也带着各种各样的诉求蜂拥而至。一些被捕的人也被押送过来。佩舍霍诺夫回忆，如果不“刻意”对被捕人员疾言厉色，就无法在“群众”面前“维持自己作为革命权力代言人的权威”，“从本质上讲，权力其实完全掌握在群众手中”。^[78]

3月3日，佩舍霍诺夫在苏维埃主持召开的委员部代表会议上

进行了汇报，说明了地区内部几个种类相同的组织与委员部的关系，有哪些是从属于委员部的，而哪些组织又是被并入委员部的。¹⁷⁹¹然而，实际情况却并没有听上去的那么简单。的确，他在2月27日的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上发放传单，呼吁市民向士兵提供食物，进而控制了该地区的粮食供给网。2月28日，该地区的知识分子与在克洛维尔克斯基大街的市参事会大楼内办公的委员部进行了谈判，将后者并入了彼得格勒区委员会。而对于设在彼得罗夫岛的委员部，佩舍霍诺夫则将其定性为“辅助性组织”予以保留，并让该组织的代表加入他手下的委员部评议会。但是，“市民委员会”等组织一直与委员部对抗，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对佩舍霍诺夫领导的委员部表示屈服。“市民委员会”是一个由该地区20岁以上的市民选举产生的机构，所有成员均为知识分子，核心成员均是当初在市议会选举时，自称为“进步民主”派的候选人，是一个知识分子色彩浓厚的组织。¹⁸⁰¹据佩舍霍诺夫回忆，当时地区苏维埃只是他所掌管的一个咨询机构，是在4月之后才从委员部里独立出来的。¹⁸¹¹

彼得格勒市中心还存在一种现象：不刻意区分工人民警与市民警。国家杜马周边的罗日杰斯特温斯克区设有自己的地区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在3月3日发行的《消息报》上向群众发起呼吁。其中提到，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工人代表和疾病互助基金会、消费合作社、市卫生监督站、初中生组织等代表以及地区内社会团体代表，委员会的活动旨在推动民警队伍的组建、分配食品与燃料、保护儿童安全等。另外，该委员会还宣布，将于3月3日晚上8时在古列维奇中学召开全体大会。¹⁸²¹

由此可见，首都的中心地区有直属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工人民警，首都周边地区存在工人民警和市民警共同进行管理的情况，
375 而在工人聚集的地区则通常由工人民警维持秩序。

大公诏书的拟定与罗江科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考虑如何组建新政府时，非常关注沙皇、军队首脑和作战军队最高统帅部的动向。毋庸置疑的是，沙皇返回首都及派出镇压革命军队的消息，让临时委员会极度紧张。在这一背景下，临时委员会当中以罗江科为主的人便一力主张如下策略：先让沙皇和军队首脑认清首都的革命形势，然后根据沙皇的决定及命令组织新政权。这一主张利用首都内爆发的民众革命向沙皇施压，力图实现从立宪专制体制向立宪君主体制的转变。可以说，这是一条以军事政变的形式结束革命的自新之路，而不是以资产阶级市民革命形式结束的老路。

另一方面，涅克拉索夫、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则主张：以首都的民众革命为立足点，争取得到新成立的苏维埃组织的协助，建立临时政府，废除君主专制，实现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尚未掌握革命的主导权。

布鲁杰罗夫在发现资料后初次明确，罗江科提出的这一政治主张开始于2月28日保罗大公的使者来访。

近卫军司令保罗·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是沙皇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最小的弟弟，也是当时最年长的皇族。他更为知名的身份是德米特里大公的父亲——德米特里大公曾参与刺杀拉斯普京。保罗大公与欧嘉·帕蕾再婚后居住在皇村。律师尼古拉·伊瓦诺夫曾在保罗大公与罗江科之间进行斡旋。布鲁杰罗夫发现，1923年的苏联杂志《星火》上刊登了由保罗大公、基里尔大公、米哈伊尔大公共同签名并呈送给沙皇的诏书草稿。此外，他还找到了未公开出版的伊瓦诺夫律师的回忆录。^[83] 376

在布鲁杰罗夫研究的基础上，长谷川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虽然他没能看到伊瓦诺夫的回忆录，但他仔细查阅了保罗



保罗·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与其平民出身的第二位妻子欧嘉·帕蕾

大公的妻子欧嘉·帕蕾大公妃以及宫廷重臣本肯多夫伯爵的回忆录。长谷川毅根据帕蕾大公妃的相关记述，在自己的文章中补充到，诏书草案是由宫廷执事普查钦起草的。^[84]2012年，米哈伊尔大公的日记和书信公开出版，编者福尔斯塔廖夫为该书作注。该书内有许多宝贵资料。^[85]2014年，加奈林将伊瓦诺夫未公开的回忆录影印出版，并添加了注解。^[86]

综合所有资料来看，与其说该路线是由罗江科推进的，倒不如说是由保罗大公及他周围的宫廷事务大臣共同策划，再由律师伊瓦诺夫推进的。布鲁杰罗夫将伊瓦诺夫看作“罗江科的代理

人”，其实不然。实际上，伊瓦诺夫是保皇派的一员。

据帕蕾大公妃回忆录记述，2月27日老朋友伊瓦诺夫来访。伊瓦诺夫是俘虏委员会的副主席，会长则由帕蕾大公妃担任。他声称，为克服当时的危机，沙皇必须返回皇村。^[87]28日，伊瓦诺夫未经邀请便径直前往塔夫利宫与罗江科会面。罗江科表示，伊瓦诺夫与保罗大公是旧识，希望他替自己去和保罗大公商谈。因此，翌日，即3月1日，伊瓦诺夫便前往皇村^[88]，与保罗大公详谈。大公还叫来暂时代理沃耶科夫职务的普查钦一起讨论。^[89]最终，众人一致同意由沙皇颁布诏书，宣布建立立宪体制，并由罗江科组建政府。伊瓦诺夫当场起草了诏书草稿。他们原打算先将诏书草稿呈给皇后和大公们签署，

再上呈沙皇过目。^[90] 不过，他们将诏书草稿呈给皇后*过目后，不出 377
所料遭到了断然拒绝。^[91] 皇后在3月2日寄给沙皇的信中写下了她
对此事的看法。信中写道，保罗大公“起草了一份愚蠢至极的诏
书，他竟然妄图在战后建立宪法体制”，他要以这种“疯狂的办法”来
“拯救我们”，因此“我极为严厉地斥责了他”。^[92] 从信中
可知，皇后只看了诏书草稿的开头部分。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份诏书草稿的内容。开头写道：“沙皇一直
希望自战争结束之日起，通过国民代表制来进行国家统治的改革。
但时不我待，若没有立法机关的支持，政府将岌岌可危，故下此诏
书。”这份诏书草稿还写道：现今社会“动荡不安”，必须平定时局。
同时，草稿写明了国家的改革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朕今决定于俄罗斯帝国建立立宪体制，继续召开因敕令而
中断的国务会议与国家杜马审议。国家杜马主席须以国民信任
为基础，立即组建临时内阁。且内阁要在朕的首肯下召开立法
会议，紧急审议政府提交的俄罗斯帝国最新基本法草案。^[93]

伊瓦诺夫把誊抄的诏书草稿呈给保罗大公过目。大公看后，
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大喊道：“命运弄人，偏偏今天是我父亲的忌
日！”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遭到暗杀。又是在3月1日，
保罗大公在诏书草稿上签名。随后，伊瓦诺夫紧急赶往皇位继承人
基里尔大公身边。基里尔大公称，“我完全赞同，这是有必要的”， 378

◆
将诏书草稿呈给皇后 根据本肯多夫伯爵的回忆录，3月1日上午11时，他跟随
在皇后的身边，皇后收到了保罗大公送来的信封，里面装有誊抄好的诏书草稿。
(Paul Benckendorff, *Last Days at Tsarskoe Selo*, London, 1927, p.15)

并在诏书草稿上签下了名字。最后，伊瓦诺夫前去拜访米哈伊尔大公。¹⁹⁴¹米哈伊尔大公的日记记述：“12时半，由律师伊瓦诺夫和几名军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了这里，他们带着Pa〔保罗〕叔父和Ki〔基里尔〕签过名的诏书草稿，并希望我也签下自己的名字。在这份草稿中，陛下将与宪法相关的权力完全地交付了出去。”¹⁹⁵¹米哈伊尔大公给妻子写信道：“我在诏书草稿上签了字。……这份诏书将给俄罗斯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或者明天，我可能会去国家杜马一趟。”¹⁹⁶¹

之后，米哈伊尔大公邀请英国大使布坎南到自己的住处，并告知他，沙皇将于下午6时左右到达皇村，到时罗江科将前往皇村劝说沙皇在诏书草稿上签名。他还向布坎南解释说，这份诏书生效后会让沙皇交出与宪法相关的权力，委任罗江科选拔内阁成员。¹⁹⁷¹

伊瓦诺夫得到大公们的署名后，前往塔夫利宫将诏书草稿送给罗江科。当时应该是3月1日的傍晚。关于彼时宫殿内的气氛，伊瓦诺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随着我一步一步地向前迈开脚步，我不禁深深感到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轰然倒塌，罗江科内阁也无法挽救这一局面，人民在追求一场巨大的牺牲。此时的罗江科并不是坐在革命马车上的威风凛凛的胜利者，反而像一个丢失了马鞭的悲惨车夫。……他大致看了看诏书草稿，问我：‘你怎么看？’‘我觉得已经太迟了。’‘我也这么想。’他说。‘是的，太迟了。’”¹⁹⁸¹

伊瓦诺夫于当日深夜12时见到了米哈伊尔大公，并向他汇报结果。¹⁹⁹¹由罗江科将诏书草稿呈送沙皇一事已经毫无希望。

与其说这个计划是由罗江科谋划的，倒不如说这是皇族宫廷革命的最后一次尝试。也许保罗大公是想继续完成暗杀了拉斯普京的自己的儿子——德米特里大公的目标。他想利用民众革命的压力，使沙皇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向前进，让罗江科充当这个过程的推动者，以维护俄罗斯帝国的政权。显然，这必然走向失败。无论如何，显

而易见的是，在3月1日傍晚，保皇派的阴谋家伊瓦诺夫以及罗江科都清醒地认识到：沙皇必然要退位。

379

罗江科与沙皇

3月1日早上，罗江科想直接与沙皇见面。十月党议员、进步同盟代表委员西德罗夫斯基的记载称：当天早晨，他抵达塔夫利宫后，罗江科便向他表明，希望于8时出发拜见沙皇，并请求他一同前往。此外，他还提到，罗江科此行目的在于请求沙皇退位，这件事在昨晚的临时委员会上也已经讨论过了。^[100]

罗江科当日为了谒见沙皇，确实让人准备了一部专列。沙皇专列方面的人员也证实，他们不断地收到请求谒见沙皇的电报。（参见第8章第405页）“他们什么时候到？”面对沙皇的询问，国家杜马一方则一遍遍地答复还无法出发，在专列内待命的铁路局副局长罗蒙诺索夫愈发疲惫不堪。^[101]

罗江科无法出发的原因之一，是苏维埃方面有所警觉。斯克别列夫也证实，3月1日他曾收到来自华沙车站的问询。罗江科确实让人准备了一部开往普斯科夫站的专列。当时，铁路局职员向苏维埃方面请示是否允许罗江科出发，而收到该联络信息的正是斯克别列

夫。他以未经苏维埃批准不可让罗江科与沙皇直接商议为由，打电话向华沙车站下令不予放行。其后，在斯克别列夫与齐赫泽商讨这件事时，克伦斯基到访，就下令阻止列车发车一事提出抗议。克伦斯基称：“你这是在阻碍我们共同的事业。”^[102]

380



斯克别列夫（左）与齐赫泽

长谷川毅认为，罗江科之所以进退两难，是因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内部在如何与沙皇商谈，以及如何提出沙皇退位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且他们对罗江科的保守路线持批判态度。^{〔103〕}即使他们没有对罗江科路线明确表示反对，但也可以说，他们对罗江科路线表现出了非常高的警惕性和深度怀疑。

各方面不断向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施压，要求尽快成立政府。3月1日，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发表了声明。

“国家需要立刻组建权力机关。”并且，它只能从唯一的中央机关——国家杜马中产生。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希望：按照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而非政府机关的指令行动，恢复工商管理职能，结束罢工。“只有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国防问题，满足人民的要求，才有可能组建最终的中央政治权力机关。”^{〔104〕}

苏维埃与权力问题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27日晚表示要掌控权力，并从28日早开始积极行动，而苏维埃方面表现出的态度则较为克制保守。如果苏维埃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孟什维克党人的话，这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孟什维克党人认为，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理应由资产阶级掌权，社会主义势力绝不可参与到临时政府中。但是，苏维埃组织内部当然也有人不那么看。这场革命爆发之时，沙俄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即便是孟什维克党人，他们在思考权力问题时，也理应必须把新的因素考虑进去。此外，在2月份的群众运动中，已经出现了要求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标语口号。

可以看出，苏维埃内部存在着三种主张。第一种是新的联合执政论，即积极参与政府的组建，并使苏维埃组织的成员进入内阁。

381 第二种是左派主张的临时革命政府论，即苏维埃政府论。28

日下午，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的创刊号和创刊号号外相继出版发行。创刊号主要是宣传区联派和社会革命党的传单，而号外的一整个版面则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十分引人注目。^[105]虽然这些传单以及宣言都是27日发给报社的内容，但正如前文所述，两期报纸均只字未提苏维埃组织的相关信息，而是主张由工人和士兵代表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当时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且初具规模，这两期报纸无疑都在向众人呼吁，必须将苏维埃政府建成临时革命政府。

28日晚，社会革命党左派成员亚历山德罗维奇向评论家伊瓦诺夫-拉兹莫尼克表达想法，希望后者为“左派”集团撰写宣传文章。他声称，目前苏维埃组织内部的主要成员与国家杜马委员会正在计划推进“狡猾的政治机制”，对此，有必要向他们阐明“真正的‘工人革命’”所应采取的态度。对于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想法，伊瓦诺夫-拉兹莫尼克是这么叙述的：

亚历山德罗维奇向我说明了他们坚定的意志。他强调，目前必须立刻、马上由社会主义者接管国家权力机构。他们统一的左派联盟会竭尽全力，势必将宣言提出的内容付诸实现。但对这第三位*tertius gaudens*（坐拥渔翁之利的人）来说，当专制统治的力量发展到可以打碎革命的那一天，又该如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即便真有那一天，专制统治也绝不会长久地维持下去。比起日益奴役人民、态度强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来说，腐朽的专制统治倒也不是那么令人难以接受……^[106]

在“联合政府”论与“临时革命政府”论之间，还有第三种传统观点，那就是国家杜马权力合作论——不参与临时政府合作论，即苏维埃成员不进入临时政府，而是作为外部组织从旁协助。之

后，斯捷克洛夫在3月30日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全俄苏维埃大会）上所提出的论述^[107]，可以说和这第三种观点拥有最多的共同点。

382 首先，斯捷克洛夫提出应该将权力移交给国家杜马。他列举了三点理由作为依据。第一，革命能否胜利仍是个未知数，反革命势力仍然具有极大的威胁。“我们就像古罗马人一样，虽然能坐在这里，摆出高谈阔论的架势召开会议，但现阶段对革命能否取得成功，我们却毫无信心。”第二，“只有在稳健自由主义的纲领无法实现时，主动夺取政权的极端民主主义革命派的尝试才具备历史条件，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迹象”。第三，“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理解了目前的形势以及革命的力量，也意识到必须对这些广泛民主主义的让步做出回应”。“我们施加的压力”正在逐步生效，“从心理层面看，我们没有理由要站在他们的立场考虑”。即便对方（苏维埃）的纲领与我们相同，只要我们是实施的主体，想必还是会遭到资产阶级分子和保守派的“强烈抵抗”。在反对苏维埃进入内阁这一点上，斯捷克洛夫列举出“在资本主义体制时代，极端革命政党不得加入资产阶级政府”这种常见的理由。此外，他还提出，在目前这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战争”背景下，不能由工兵代表苏维埃来承担责任。从结论来看，第三种观点的主张是：坚持向资产阶级政府提出“特定的政治要求”，并“予以监督，让这些要求得以实现”。

在同样持第三种观点的人之中，苏汉诺夫想得更为长远。虽然目前可考的文献只有苏汉诺夫本人的回忆录，也不排除这本回忆录有经过事后美化的可能性，但其基本内容还是值得相信的。在回忆录中，他对自己28日夜晚至3月1日早晨这段时间的想法表述如下：为了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迈进，必须取得“与沙皇专制制度斗争的最终胜利”，“赢得并发展全面深入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因此，弱势

的民主主义派应当利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条件地将权力移交给他们。这一条件是，“保证民主主义派拥有能够与资产阶级组织中的核心掌权人物相抗衡的、至高的、完全的、自由的权力”。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确保其在国内拥有全面的政治自由、组织和号召群众的绝对自由”；第二，“拥有完整、全面的大赦权”；第三，拥有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即便是资产阶级，（为了权力）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些条件。此外，提出的条件如果超过上述范围，不仅可能383
会“损害民主主义派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同时也让这些计划沦为“马尼洛夫*式的理论空想”，即期待由资产阶级来实现民主主义党派的纲领。为了“在财阀政治统治下，拔除针对人民群众自主活动和各阶级自我意识的毒牙”，协议的条件必须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因为资产阶级政府势必“无法忍受人民纲领的不断发展，在人民势力的突袭下，必然会走向消亡”。^[108]

3月1日的苏维埃大会及《一号法令》

据称，苏维埃大会于3月1日中午12时至下午2时召开。士兵代表首次参会。会议明确展现了民众革命的意向，并由此决定了革命的性质。^[109]

会议伊始，索科洛夫做了主旨演讲。他宣称：我们正在推进的是一场“与资产阶级共同合作的民主主义（革命）”，并要求参会人员围绕以下三点对士兵问题进行探讨：“一、士兵对军官的态度；

◆
马尼洛夫 俄国作家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登场人物。他本性善良，却缺乏魄力。

二、是否为士兵提供武器；三、最终指挥权的归属——是我们，还是军事委员会。正常情况下，士兵须同时服从我们和军事委员会双方下达的命令，但当二者的命令产生冲突和矛盾时，究竟应该服从哪一方的指令？”^[110]

索科洛夫和涅克拉索夫、克伦斯基同为共济会成员，一直以来都以实现资产阶级市民革命为目标。他突然在此提出士兵的问题，无疑是受到了其布尔什维克身份的影响。

在这场讨论中，基本都是士兵代表在发言，共有18名士兵代表发言。在第一个问题上，社会革命党士兵马克西姆（库里瓦恩斯基）³⁸⁴发表了极具代表性的长篇演讲。他强烈批判了罗江科提出的服从军官命令的想法（参照本章第362页）。他称，“他们这群家伙视工人和农民为家畜，只想着牢牢把控住自己的权力”。“罗江科、地主和资本家”只是“想打着国家杜马的旗号掌控权力”而已，他们妄想窃取广大人民获得的胜利果实。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的目的与士兵们的根本不同”。他提议，士兵只须服从士兵苏维埃（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111]芬兰团的林杰和立陶宛团代表也发表了相同的看法。对此，红十字汽车队的库德里亚夫采夫称，“（所有的决议）最终都还需要得到我们的认可，我们才是军队的中坚力量”。此外，他还认为，“我们可以与军事委员会协商，让军事委员会挟制和管理军官”^[112]。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是否将武器上交给军官这一点，众人的意见基本没有分歧，所有发言人一致同意“不上交武器”。

第三个问题是，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归来的军官。这也是士兵代表最关心的问题。一位名为马尔琴科的士兵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应该赋予军官多大权力，士兵自己需要把握住的是什么，以及应该立即制定正确的方针对策。^[113]第1团代表指出，军官们虽然佩戴着红色的臂章，但他们实际上仍然属于帝政派，一直想着如何解除工人武装。^[114]古契柯夫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说：“忘记

过去发生的种种吧。”对此，林杰表示强烈反对。他大声呼号：“混蛋，谁能够忘记这些‘旧事’？”林杰认为军队不能接收“没有参加过革命”的军官，而应当通过“选举”的方式任命指挥官。据猎兵团代表所言，他们曾在部队内部搞过苏维埃士兵代表的选举。最初，当选者全部都是军官，且这些军官多被派往了军事委员会。但最终，部队的全体人员一致决定“将未参加过革命的人从部队里剔除出去”。^[115]对此，马克西姆主张线列步兵在执行军事任务时必须保留现役军官的职务；作战任务结束后，军官、士兵均与普通市民相同，若有军官表现恶劣，则应革除其职务。马克西姆是众多发言人中唯一一位提到“一致对外、保卫祖国”、与英法结盟、维持现有秩序的必要性等问题的人。^[116]显然，上述这些问题都与保留军官密不可分。立陶宛团代表认为，“没有军官是万万不行的”。他主张线列步兵部队可以由军官负责指挥，但是应当对其附加一定的条件，如“语言必须温和有礼，不可使用粗鄙的谰语”等。^[117]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代表称，在他们那里，军官是“一种特别的象征，是旧种族中最早的贵族”。他说，“我们希望至少能留下一位军官”，但这也很难做到。^[118]还有许多代表希望设立“连队委员会”“基层组织”“连队海军兵团委员会”等机构，以此对军官进行挟制和管理。

讨论结束后，大会推出由七人组成的编委会，负责整理最终的文件。巴杰克宣读后，该文件正式生效。

（1）不向军官上缴武器。

（2）将全体普通士兵编入工兵代表苏维埃。当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与苏维埃的指令不冲突时，可以服从其命令。同时，派遣士兵代表加入军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于今日之内下达正式命令，并于当日内对外公布。^[119]

最后，由沃利尼团代表发言。他骄傲地说：“最初，是我们拿着武器打死了拉什克维奇上尉，让他暴尸街头。”但同时他强调，对于罗江科提出的服从军官指挥的命令，他表示坚决反对。最后，他大喊着“打倒罗江科”的口号，结束了自己的发言，这在当时非常具有象征性。^[120]

在会议结束前，大会按照索科洛夫的提议，选举了10名士兵代表加入执行委员会。历史学家米勒就其成员、所属部队、此前的职业及其在苏维埃内部所属的派别进行了调查，具体结果如下：帕杰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原学生、普契洛夫工厂疾病互助基金会雇员、布尔什维克党）、萨多夫斯基（第6工兵预备营、曾为铁路工程师、国际派、6月以后转入布尔什维克党）、巴杰克（第1步兵团准尉、孟什维克党国际派）、林杰（芬兰团、知识分子、孟什维克党国际派）、波里索夫（立陶宛团、林业高专学生、孟什维克党）、库德里亚夫采夫（红十字汽车队、大学毕业、社会革命党）、瓦克连科（猎兵团、曾为工人）、巴尔科夫（第1狙击兵团、工人）、克里姆奇斯基（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普契洛夫工厂工人）、索科洛夫（波罗的海第2海军兵团^[121]）。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0人中，有5人为知识分子出身，有3人为工人出身，但没有农民出身的士兵。这些先进分子于战时被召集起来，现在则一马当先地带领众人批判俄罗斯帝国陆军的野蛮体制。另外，他们的政治倾向也具有极其强烈的左派色彩。萨多夫斯基的回忆录表明，林杰、瓦克连科、波里索夫均被当成布尔什维克党，库德里亚夫采夫也被算作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员。索科洛夫虽然属于立宪民主党，但也声称自己同时效忠于国际派。此外，施略普尼柯夫表示，波里索夫和索科洛夫已经与布尔什维克党共同进退。^[122]

苏维埃大会上做出的最终决议经执行委员会批准后，被拟成特别命令下达至卫戍部队。该命令由律师索科洛夫负责起草，由波里

索夫、帕杰林、库德里亚夫采夫等人共同商讨后定稿。^{〔123〕}这就是闻名天下的《一号法令》，其全文如下：

《一号法令》，1917年3月1日

现特拟《一号法令》以告全体彼得格勒军区卫戍部队全部近卫军、线列步兵、步兵、炮兵及海军部队人员。上述人员须严格遵守此令，立即执行，不得延误，并同时通告全体彼得格勒工人。

工兵代表苏维埃决议如下：

（1）所有连、营、团、特种兵部队、兵工厂、炮兵连、骑兵连、军部管理局各部及海军战列舰均须立刻选举出该部队的士兵代表并成立委员会。

（2）对于尚未选出工人苏维埃代表的各部队，须以连为单位，每连各选举出一名代表，并派该代表于3月2日上午10时携带书面证明到国家杜马大楼前集合。

（3）各部队的一切政治行动须服从于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其隶属的委员会。

（4）若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命令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和决定不冲突，则允许执行。

（5）步枪、机关枪、装甲车等一切武器均应由连及营委员会进行统一管理和处置，任何情况下不得交付给军官。 387

（6）士兵在线列步兵部队执行军务时必须严格遵守军纪，但在执勤以外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中，士兵享有与全体公民相同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限制。此外，废除所有执勤时间以外的立正军姿和敬礼规定。

（7）同时，废除一切“阁下”“殿下”等此前对军官使用

的敬称，改为“将军”“上校”等称呼。禁止以粗暴的态度对待部队士兵，尤其严禁对士兵使用“你这东西”等措辞。此外，所有士兵均有义务向连队委员会通报一切违规行为，包括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纠纷在内。

此令须在全体连、营、团、海军兵团、炮兵连及其他线列步兵部队或非线列步兵部队宣读。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124]

3月1日苏维埃大会上做出的决定和基于该决定拟定的《一号法令》旨在使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革命士兵向工兵代表苏维埃靠拢，最终效忠于苏维埃。《一号法令》还明确规定，只有在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定不相违背时，广大士兵才可以执行其命令。对于为反对世界大战和俄罗斯帝国军队而扛起革命



摄于《一号法令》内容拟定完成时。律师索科洛夫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众人

旗帜的广大士兵来说，这是他们向军队民主化迈出的第一步。

这项举动在当时被看作对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所下命令的公然反抗，并且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自然遭到罗江科和古契柯夫的强烈反对。但是，恩格勒格特则对士兵们的这一行为表示了同情。他说，在《一号法令》诞生之前，他曾经和士兵代表一起编写过军队改革方案，但并没有获得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批准。因此，士兵们表示，“那么就由我们自己来写吧”，之后就回到部队并最终推出了《一号法令》。^[125] 他的说法虽然与现实有所出入，却表明了恩格勒格特的个人立场。

《一号法令》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对士兵们产生了巨大影响。

基里尔大公访问国家杜马

3月1日下午4时，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率领近卫海军兵团司令等人抵达国家杜马。根据帝位继承法，在米哈伊尔大公拒绝即位的情况下，由第二顺位继承人亚历山大三世的次弟——弗拉基米尔大公一支继承皇位，而基里尔大公正是在该分支的第一继承人。基里尔大公请出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并做出了如下声明：

见到您我很高兴，我愿意服从您的管理。我的心愿同全国人民一样，希望俄罗斯能有一片光明的未来。今天早上，我向近卫海军兵团的全体士兵讲述了革命的意义。现在我可以明确表示，近卫海军兵团全体士兵将完全服从国家杜马的指挥。



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

听到这席话，在场的人们都齐声大喊“乌拉！”。随后，近卫海
军兵团的直系部队抵达国家杜马，他们身上均佩戴红色领章。当天，
在军事委员会工作的波洛夫佐夫也到了国家杜马，对于当时的情景，
389 他回忆道：“大公在红旗下的言行昭示着皇族放弃了自己对大权的争
夺，承认革命这一既成事实。这让君主制的拥护者们大失所望。”^[126]

3月1日傍晚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在3月1日傍晚召开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众人围绕政权
问题展开了正式讨论。这次会议从下午6时开始，但当天会议内容
的议事记录并没有留存下来。目前的主要资料均是根据当天出席会议
的苏汉诺夫、施略普尼柯夫、拉菲斯的回忆录，以及此前介绍过的斯
捷克洛夫的全俄苏维埃大会报告（参照本章第380页）整理而成。^[127]

苏汉诺夫称，执行委员会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三点进行。第一，
革命政府的“性质以及阶级构成”；第二，应该向革命政府提出的
“条件”；第三，组阁人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出现的意见分歧，苏汉诺夫、拉菲斯、斯捷
克洛夫和施略普尼柯夫四人的叙述大不相同。苏汉诺夫及拉菲斯称，
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采用联合政府论还是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论。
联合政府论由崩得（拉菲斯、埃尔利希）、孟什维克国防派、社会革
命党国防派（森吉诺夫）、民粹主义派提出；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论
是多数派的政治主张。斯捷克洛夫的报告中也曾提到，围绕这两种
主张，会议意见出现了分歧。^[128] 苏汉诺夫强调，尽管布尔什维克党
出席了本次会议，但该党派无人主张“苏维埃民主主义派政府论”。
最终，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论以13对8或13对7的票数胜出。拉菲
斯的记述中并未提及是否有人提过“苏维埃民主主义派政府论”一
390 事。另一方面，施略普尼柯夫认为，苏汉诺夫、格林纳维奇等人提

倡的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论和布尔什维克党主张的“革命民主主义派权力论”互相对立。

若想探究苏汉诺夫和施略普尼柯夫二人记述的不同之处，就必须了解其背后的原因。事实上，施略普尼柯夫当晚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圣彼得堡市委员会重组会议，因此他并未出席此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据记载，施略普尼柯夫出发之前，分别单独会见了格林纳维奇和齐赫泽。随后，又与出席此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同志莫洛托夫、扎鲁茨基商议。他们认为在权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在会上必须始终坚持“由包括苏维埃在内的各党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张。但是，即使上述所言属实，在其本人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其余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员在会上究竟是否积极地坚持该论点，这是不得而知的。此外，他们协商的内容也仍有存疑。因为施略普尼柯夫本应该在圣彼得堡市委员会重组会议上按计划发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制定的方针，但是该会议的议事记录中根本没有相关记录。另外，当晚布尔什维克党的另一位执行委员修托格因参加维堡区委员会重组会议，也未能出席上述执行委员会会议。因此便可想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会议的莫洛托夫、扎鲁茨基二人并没有坚持临时革命政府论。

由此可知，原本应有28人参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但实际上参与当天表决讨论的只有20人或21人。10名士兵执行委员应当也是在上述表决结束之后才到场。大约有七八人未出席会议，其中，已确认未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博古达诺夫、佩舍霍诺夫、克伦斯基、索科洛夫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位代表。如此一来，与会的联合政府论派共有7人，分别为拉菲斯、埃尔利希、森吉诺夫、布拉姆森、格沃兹杰夫、卡尔诺夫斯基及柴可夫斯基。而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论派共有11人与会，分别是齐赫泽、斯克别列夫、卡佩林斯基、曼科夫、索科洛夫斯基、格林纳维奇、库拉希柯夫、斯捷克洛夫、苏汉诺夫、巴托尔斯基、苏维彻茨基。此外，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位代

391

表应该也参加了会议。也就是说，最为强硬的两位临时革命政府派代表尤列涅夫和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并未出席此次会议。

在这次决定权力分配的会议中，左派只有2位成员出席。当时，坚持联合政府和反对联合政府的两种观点并无太大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站在了反对派一边。而崩得派苏维埃派代表议员扎斯拉夫斯基及康特罗维奇2人并未出席此次会议，他们可能听说了左派的2位成员支持反对派一事，所以选择支持苏汉诺夫及斯捷克洛夫所代表的反对派。最终，布尔什维克党代表（扎鲁茨基及莫洛托夫）寡不敌众，“联合”派以7：13的票数落败。以上记述内容也与推断一致。

关于第二点——应该向革命政府提出的“条件”，苏汉诺夫提出的原方案包含三条内容。第一，“确保其在国内拥有全面的政治自由、组织和号召群众的绝对自由”；第二，“拥有完整、全面的大赦权”；第三，拥有召开立宪会议的权力。为了实现民主革命，苏汉诺夫没有触及战争问题，这自然招致诸多不满。崩得派的拉菲斯作为犹太人，对于苏汉诺夫没有提到民族压迫问题这一点感到非常惊讶，他坚持主张民族平等。最终，所提条件中加入了“废除一切对于身份、信仰及民族的歧视”这一条。据记载，拉菲斯还指出条件中应当涉及农民问题，但并未获得大家的支持，这可能是因为委员会的讨论以苏汉诺夫提出的各项条件为中心。为了进一步加强苏汉诺夫提议的三个条件，分别又补充了两点：一是“必须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及匿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地方自治机构代表”；二是“必须严格规避一切诸如重新制定未来统治形式的行为”。之所以补充第二点，是因为他们推测共和制很可能会被否定，因此至少要努力阻止政府向沙皇妥协。

此外，增加了与警察和军队相关的条款，其意义十分重大。虽然，原本就警察事宜提出的条件——“通过负责人选举制选出警

察，以代替地区自治机构下属民警”这一点非常模糊，但如果能够通过负责人选举制选出民警，就可以勉强维持工人民警体制。与此相对，与军队相关的条件则非常明晰。苏汉诺夫称，其中一条是由中途参会的士兵代表执行委员提出的，但实际上恐怕都是他们根据苏维埃大会的决议和《一号法令》的内容而提议的，其内容具体如下：第一，在政治自由这一条中附加条款，即“政治自由的对象也应该包括军人”；第二，“军队的编制必须立足于自治原则（samo-upravlenie）”，这指的应当是营部、连部委员会的选举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武器管理问题；第三，“对于所有参加过革命运动的部队，保留其武装设备且不得离开彼得格勒”。而基于《一号法令》所提出的最后一个条件对于此后的革命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

苏汉诺夫称，之后，有人表示只要政府遵守右派提出的这些条件，便同意支持政府。但他认为这是放弃发展民主纲领的自杀式行为，因此表示反对。最终，该问题不了了之。

最后，重点转移到了第三点——关于组阁人选的问题。据记载，对于这一点，苏汉诺夫决定不加干涉，由资产阶级政党自由组建。但是，斯捷克洛夫认为即使不推荐候选人，也应当保留否决权。究竟哪一方正确，至今还未有定论。

最终，苏维埃政党向革命政府提出了共计九项条件。其中除了苏汉诺夫最初提出的三条以外，还有拉菲斯提议的“废除歧视”，两项苏汉诺夫所提条件的附加条款，以及“民警”的组织构成要求和与军队相关的两个要求。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上述内容竟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载。

截至3月1日，便可以明显看出在首都发生的革命包含两大不同性质的革命。其中，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旨在建立临时政府，代表着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则代表工人及

士兵的革命运动。在这两大革命阵营中，又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路线。资产阶级市民革命阵营方面，有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推行的路线。
393 若该路线取得成功，那么这场革命很可能会重新变回一场军事政变。而在工人及士兵的革命运动阵营中，推动军队民主化、反对战争的倾向明显。若此派占据主导，那么工人及士兵革命与主张继续战争的资产阶级市民革命之间，势必面临一场巨大冲突。两大革命力量虽有内部分裂的风险，但他们即将签署协议，共同建立临时政府。双方便将迎来缔结协议、创建革命权力的决定性时刻。

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



镇压部队司令伊瓦诺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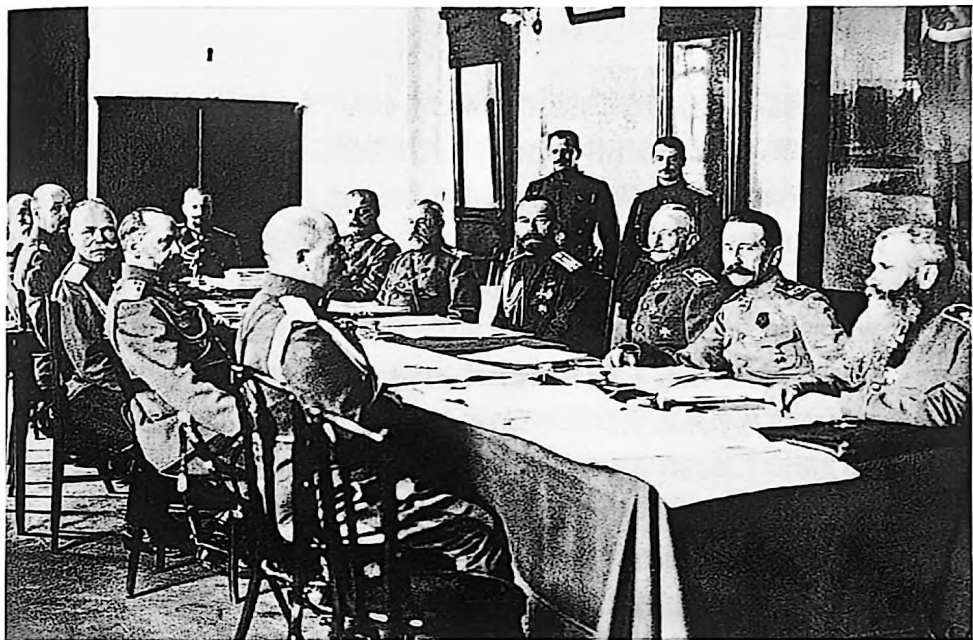
2月27日，首都的沙皇政府被群众运动推翻。但沙皇被军队将领和全军保护在莫吉廖夫的最高统帅部中。首都的革命、身处最高统帅部的沙皇及军部三者间的对立该如何化解？靠武力吗？这会引发内乱。还是靠劝说和谈判？

沙皇身处莫吉廖夫的最高统帅部，身边有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列克斯伯爵（上将）和皇宫警卫司令沃耶科夫少将左右侍奉。实质上的最高总司令、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上将，副总参谋长克勒博夫斯基上将，后勤部长鲁科姆斯基中将以及最高军司令、海军军令部长卢辛中将等沙皇俄国军队的最高层将领也在最高统帅部。此外，北部方面军最高统帅部驻扎在普斯科夫，由总司令鲁兹斯基上将、参谋长丹尼洛夫上将统率。西部方面军最高统帅部驻扎在明斯克，由总司令埃弗特上将、参谋长伯奇斯基中将统率。西南方面军最高统帅部驻扎在基辅附近，布鲁西洛夫上将任总司令，苏霍姆利诺夫中将任参谋长。另外，罗马尼亚方面军驻扎在罗马尼亚的雅西，罗马尼亚王任总司令，萨哈罗夫上将任参谋长。高加索方面军最高统帅部驻扎在高加索地区的第比利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任总司令、亚努希科维奇上将任参谋长。

波罗的海舰队最高统帅部设在芬兰的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由司令涅佩宁上将统率。黑海舰队最高统帅部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由司令高尔察克上将统率。

这些人组成了当时俄国军部的领导核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五位：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和四个方面军的总司令。

397 退役陆军少将、侍奉沙皇的侍从都本斯基负责记录当时的历史，他留下的日记记录了1917年2月27日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他在日



于莫吉廖夫最高统帅部召开的会议。照片最右侧起第四位是尼古拉二世，其左边坐着的分别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布鲁西洛夫、副总参谋长克勒博夫斯基上将、被任命为镇压部队司令的伊瓦诺夫。左侧一列左起第三位是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其右边是西部方面军总司令埃弗特

记中写道，这天下午，最高统帅部的气氛令人窒息。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似乎终于认识到彼得格勒“正处于起义的旋涡中”这一形势，但他完全想不出对策。伊瓦诺夫上将从开战到1916年3月期间担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如今住在莫吉廖夫。都本斯基和沙皇的御医费奥多罗夫拜访伊瓦诺夫上将并鼓动其告诉沙皇：如果向彼得格勒派遣几支忠诚的部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还可以扭转当下局势。伊瓦诺夫上将最终答应了他们。^[1]晚餐时，坐在沙皇旁边的伊瓦诺夫悄悄向沙皇陈述了这一建议。都本斯基写道：伊瓦诺夫表示他的建议已被沙皇采纳。^[2]

就在晚上7时半的时候，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收到了陆军大臣勃列艾夫发来的急电，其中提及“彼得格勒的情况已经非常严

398

重”。随后他又收到电报，电报称现已发布戒严令，因哈巴洛夫精神几近崩溃，作战状态不佳，已任命赞凯维奇少将担任副手辅佐他。¹³¹

8时，哈巴洛夫的电报到了。

请向陛下传达我没能完成恢复首都秩序的任务，大多数部队接二连三地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拒绝和叛乱者作战。……傍晚时分，叛乱者已经控制了首都的大部分区域。只有剩下的少数部队仍然遵守誓言，他们都在赞凯维奇少将的指挥下向冬宫附近集结。我准备和这些部队一起继续战斗。¹⁴¹

至此，沙皇政权对首都革命形势的最后幻想彻底破灭了。

沙皇的决定

接到这些电报，沙皇和最高统帅部终于开始采取行动。晚餐后，沙皇在9时到10时之间召见了伊瓦诺夫，任命他为彼得格勒军区的司令，取代哈巴洛夫，并命令他带领从前线派来的步兵和骑兵的几支部队，于第二天早上前往彼得格勒。阿列克谢耶夫颁发的任命书上写明，伊瓦诺夫的任务是“维护首都及周边地区的良好秩序”。¹⁵¹

阿列克谢耶夫即刻选定了随同伊瓦诺夫一起进攻首都的部队，并命令北部方面军和西部方面军分别派出两支步兵团、两支骑兵团和一支机关枪部队。这个时期，他所下达命令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求以旅长的身份将这些“可靠的将军”（*prochie generaly*）派往首都，他们将出任伊瓦诺夫的副官。¹⁶¹ 晚上10时25分，阿列克谢耶夫发了一封电报给身处首都的陆军大臣，传达了这项决定。¹⁷¹

399 傍晚，身处皇村的本肯多夫给沃耶科夫打了一通电话，告诉他皇后担心首都的形势，希望能带孩子们一起去沙皇身边。沃耶科夫

向沙皇尼古拉报告了此事，沙皇考虑到孩子们患了麻疹，决定立刻赶赴皇村。^{*181} 沙皇可能认为，之前已经秘密派遣伊瓦诺夫部队前往首都，此时如果自己也回到首都附近的话，应该更有助于镇压革命。

大约10时半的时候，身处首都的米哈伊尔大公（沙皇的弟弟）给阿列克谢耶夫发来电报。米哈伊尔大公提议应立即改组内阁，承认以李沃夫公爵为首的信任内阁。米哈伊尔大公从阿列克谢耶夫那里听到沙皇要去皇村的消息之后，请求沙皇将行程延后几天。阿列克谢耶夫把此事上奏给沙皇（参考第6章第338—339页）。都本斯基写道：此时，沙皇、阿列克谢耶夫、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列克斯、皇宫警卫司令沃耶科夫4人正在会谈。¹⁹¹ 沙皇命令阿列克谢耶夫按照以下内容回复：沙皇赴皇村之事绝不延后。沙皇抵达之前不接受更换内阁成员一事。沙皇将同时派遣伊瓦诺夫以及前线的步兵、骑兵的8个团前往首都。阿列克谢耶夫向米哈伊尔大公传达了沙皇的旨意，同时拜托后者今后反复向沙皇奏陈刚刚提出的建议，他还补充说自己打算次日再次向沙皇上奏，建议沙皇必须采取某些措施。¹¹⁰¹ 首相戈利岑也给沙皇发来电报，提出了与之前米哈伊尔大公所提内容相似的建议，他以内阁决议的形式，请求全体内阁成员辞职。

夜里11时半，沙皇给已经没有实权的首相发去电报，明确驳回内阁辞职的请求（参考第6章第339页）。其中写道：“当前形势下绝

决定立刻赶赴皇村 文献记载，鲁科姆斯基从沃耶科夫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后，就叫醒了正在发烧的阿列克谢耶夫，让他向沙皇进谏，但是沙皇称，自己担心皇后和皇太子，已经决定前往皇村（*Vospominaniia generala A.S. Lukomskogo*, Vol.1, Berlin, 1922, pp.129-130）。但都本斯基认为，沙皇之所以决定前往皇村，是因为收到了罗江科恳请他前往皇村拯救俄国的电报。A.Blok, *Poslednie dni Imperatornoi vlasti*, Soch., Vol.6, Moscow, 1962, p.244.

不允许更换内阁成员。”

400 沙皇始终推行武力镇压革命的方针，拒绝一切让步，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伊瓦诺夫和其率领的镇压部队上。

关于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支持组建信任内阁一事，无法判断这是他本人的想法还是受他人鼓动的结果。但是，鲁科姆斯基在日记中写道：“在阿列克谢耶夫高烧到39摄氏度以上，精神不济想卧床休息时，他的副官都本斯基非常积极地劝说他向沙皇进言。”^[11] 鲁科姆斯基的回忆中有一些地方不准确，但是这里的记录是可信的。

这或许是受到了北部方面军司令鲁兹斯基上将于夜里9时半发来电报的影响。这封电报先讲述了罗江科提出的要求，然后指出，“现在，我们的军队里有着来自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信仰的形形色色的人。所以，人民的情绪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我们的军队里”，“我们必须采取应急措施”来安抚民众并获得他们的信任。^[12]

西部方面军司令埃弗特上将在这一天的白天发来电报称：“我就是个军人，我从未参与过政治，今后也决不会参与。”^[13]

总之，阿列克谢耶夫、鲁科姆斯基、布鲁西洛夫、鲁兹斯基这些军队最高层达成了原则性共识，认为必须进行改革。

可是另一方面，阿列克谢耶夫又遵从沙皇的命令，在派遣伊瓦诺夫镇压军一事上十分积极。他害怕首都陷入混乱与无序，故而他敌视会带来混乱与无序的群众革命。选择派遣部队镇压革命固然有其政治思想上的问题，但因为部队需要依靠铁路将食品和弹药从后方运往前线，此时他当然最害怕的是铁路运输中断和瘫痪，因此对他来说，组建一个值得信任的内阁和派遣部队镇压革命是完全不矛盾的。

401 派军镇压

2月27日至28日深夜，凌晨3时，在出发前往皇村之前，沙皇召

见了伊瓦诺夫，并向他下了一道特别命令：“所有大臣必须忠实地执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伊瓦诺夫上将的所有指令。”^[14]——伊瓦诺夫含泪宣誓一定完成任务，沙皇与之拥抱并吻别。^[15]沙皇的专列于凌晨5时出发。^[16]

阿列克谢耶夫授予了伊瓦诺夫军法特权，允许他在军事法庭上对任何一个平民进行审判。^[17]28日上午10时50分，格鲁吉夫斯克营的一个梯队（三个连）和沙皇直属团的一个连搭乘军用专列离开了莫吉廖夫。^[18]该梯队从沙皇的亲卫队中挑选，并划归伊瓦诺夫指挥。

格吉耶夫斯基营的营长博加尔斯基以忠心耿耿闻名。然而，同队的柴可上尉的证言表明，博加尔斯基于出发前一天召集了手下的军官并同他们约定：即使是伊瓦诺夫下达了指令，自己也决不下令向首都民众开枪。^[19]

与伊瓦诺夫在首都会师的部队中，从北部方面军来的有：旅长瑞斯朵夫斯基麾下的步兵第67塔尔京斯基团、步兵第68博罗季诺团，师长马蒂诺夫麾下的第15鞑靼枪骑兵团、第3乌拉尔哥萨克团以及一支机关枪部队。^[20]第67塔尔京斯基团的先遣队于28日上午8时从德文斯克出发，预计于3月1日凌晨到达首都。第68博罗季诺团直到28日下午6时才出发，所以预计3月1日下午抵达。第15鞑靼枪骑兵团尚未做好出发准备。^[21]从西部方面军来的有：勒什诺夫第9师师长麾下的步兵第34亚夫斯基团、第36奥廖尔团，旅长尤里耶夫和师长特鲁别茨柯伊麾下的第2巴甫洛格勒骠骑兵团、第2顿河哥萨克团以及一支机关枪部队。^[22]第2巴甫洛格勒骠骑兵团率先出发，于28日正午离开明斯克，预计3月2日深夜抵达。步兵第34亚夫斯基团于28日傍晚在米亚夫卡上车，预计3月3日傍晚抵达。^[23]

402

北部方面军行动迟缓，这可能是因为北部方面军总司令鲁兹斯基没有斗志，又或者是由于北部方面军里值得信赖的部队比较少

吧。总之，用这种速度行动，前往镇压的部队必定跟不上事态恶化的速度。

伊瓦诺夫向北部方面军派遣来的部队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在皇村集结。^[24]

出发前，上午11时半左右，伊瓦诺夫通过休斯印字电报机和哈巴洛夫通话，向后者询问了首都的情况。这就是著名的十问十答，它明确、清晰地说明了当时首都的情况。以下是谈话内容节选：

伊瓦诺夫 哪些部队依然秩序井然？哪些部队已经失去控制？

哈巴洛夫 在我指挥之下并驻扎在海军总部的有近卫4连、骑兵5连、哥萨克1连、炮兵2连。其他的部队或是投奔了革命派，或是和革命派达成共识，保持中立。部分士兵和犯罪团伙正在城里游荡，他们向行人开枪，还解除了军官的武装。

伊瓦诺夫 哪个车站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哈巴洛夫 所有车站都处于革命派的控制之下。他们对这些车站严加防守。

伊瓦诺夫 市内哪些区域还秩序井然？

哈巴洛夫 全市都处于革命派控制之下，电话也打不通。无法与市内的任何区域取得联系。

伊瓦诺夫 中央各部门都还在正常运转吗？

哈巴洛夫 大臣们都被革命派逮捕了。^[25]

403 其实在镇压部队出发前，首都的事态就已经发展到无力回天的地步了。尽管如此，伊瓦诺夫上将还是于2月28日下午1时从莫吉廖夫出发，并在奥尔沙站与先行出发的部队会合了。他们预计于3月1日早上8时到达皇村。^[26]

此后，阿列克谢耶夫仍以沙皇的名义，要求各方面军增派部队。他要求北部、西部方面军分别增派两个炮兵连，并给鲁兹斯基和海军大臣发电报，告诉他们如果伊瓦诺夫需要，就从维堡要塞炮兵部队、喀琅施塔得要塞炮兵部队分别派遣一支“最强悍的”营交由伊瓦诺夫指挥。^[27]同时他还要求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布鲁西洛夫派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第3及第4近卫狙击兵团这三个团。^[28]

下午2时半，陆军大臣勃列艾夫报告说，海军大臣希望海军总部免受炮击，应这一要求，剩余的兵力（近卫4连，哥萨克1连，炮兵1连，机关枪1连）于28日中午将武器留在海军总部后撤离，返回了各自的兵营。^[29]虽然勃列艾夫解释说，将武器留下是为了防止士兵在返回兵营的路上遭到革命派缴械，但其实这是政府军自发解除了武装。至此，首都的沙皇政府已经彻底垮台了。不久，武装起来的群众占领了海军总部，逮捕了哈巴洛夫和特别市市长巴尔克等人，并将他们押送到塔夫利宫（参见第7章第354—355页）。

在这之前，下午1时50分，布勃利科夫向全国的火车站发送了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电报宣布由自己接管了交通部，并下达命令——不得让沙皇的专列进入博洛戈耶—普斯科夫线以北（参见第7章第357页）。但在当天下午，这一消息既未送达最高统帅部，也未能送抵沙皇的专列和伊瓦诺夫的军队。

从阿列克谢耶夫于28日下午1时到2时发给各方面军司令的电报，就能知晓最高统帅部对首都的情况了解、掌握了多少。这封电报称，司法大臣谢格洛维托夫被逮捕，“国家杜马成立了各党派领袖组成的评议会，与革命政府的各个机关及个人进行谈判，并规定在工人和叛军中增补选举代表”^[30]。此时，最高统帅部仍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苏维埃方面的行动视为同一革命运动，并认为这是一场左翼革命。这种误判源于布勃利科夫的电报没有及时送达沙皇方面。阿列克谢耶夫在当天傍晚还向陆军大臣勃列艾夫发送

404

电报，商议派遣部队的事情，并催促其尽快按原计划派遣北部和西部方面军的部队。^[31]

前行的沙皇专列

沙皇的专列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平稳地行进着，并于28日下午3时到达维亚济马。在这里，沙皇悠闲地给皇后发了一份电报：“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已经有很多部队正从前线奔赴首都。深爱你的尼基。”^[32]

但是到了晚上9时，沙皇的专列抵达位于尼古拉铁路线上的利库斯拉夫尔时，收到了首都方面的详细消息。通过勃列艾夫白天所发的电报，沙皇一行得知哈巴洛夫的军队已经解散、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并掌握了委员会的人员信息。除此之外，他还阅览了布勃利科夫给各火车站发的电文。侍奉沙皇的都本斯基认为，到托斯诺后再往前就太危险了，应该在博洛戈耶调整专列的行进路线，向西行驶，去北部方面军最高统帅部所在的普斯科夫，最好“对彼得格勒采取一些行动”。^[33]但是沙皇在这一站又悠闲地给皇后发了一份电报：“你那边没事就行了。希望明天早上就能回到家。”接下来^[34]，沙皇的专列朝着博洛戈耶前进。随从人员乘坐的先行列车一进入博洛戈耶，就收到了来自沙皇专列的电报，要求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向皇村进发，因此他们继续前进。^[35]

最高统帅部方面，新传来的消息让人们意识到，一夜之间，形势已经发生剧变。将近晚上10时，最高统帅部接到了来自驻守芬兰
405 的第42军军长古列维奇的报告——他们和首都之间的铁路联系中断了。这意味着维堡要塞炮兵部队的首都派遣任务将被迫流产。^[36]还有更让人震惊的消息称：在国家杜马，“由罗江科担任主席的临时政府”正式成立，“所有军队支持临时政府，正在维持秩序”，“2月28

日，彼得格勒恢复了和平”。“临时政府向国民发布的宣言中强调君主制原则不可动摇”。这一消息也博得了最高统帅部方面的好感，虽然这一消息美化了以罗江科为核心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存在，但是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份真实的情报。不过，对于最高统帅部的军队首脑来说，这样的情况是他们希望看到的。3月1日凌晨1时15分，阿列克谢耶夫给伊瓦诺夫发报说：“如果这些消息是真的，阁下可调整行动方针，争取通过谈判恢复和平。”*可见他希望停止镇压革命的作战计划，他还请伊瓦诺夫向沙皇报告说：“确信此次事件能够和平巩固沙皇俄国统治，以完美结局收尾。”¹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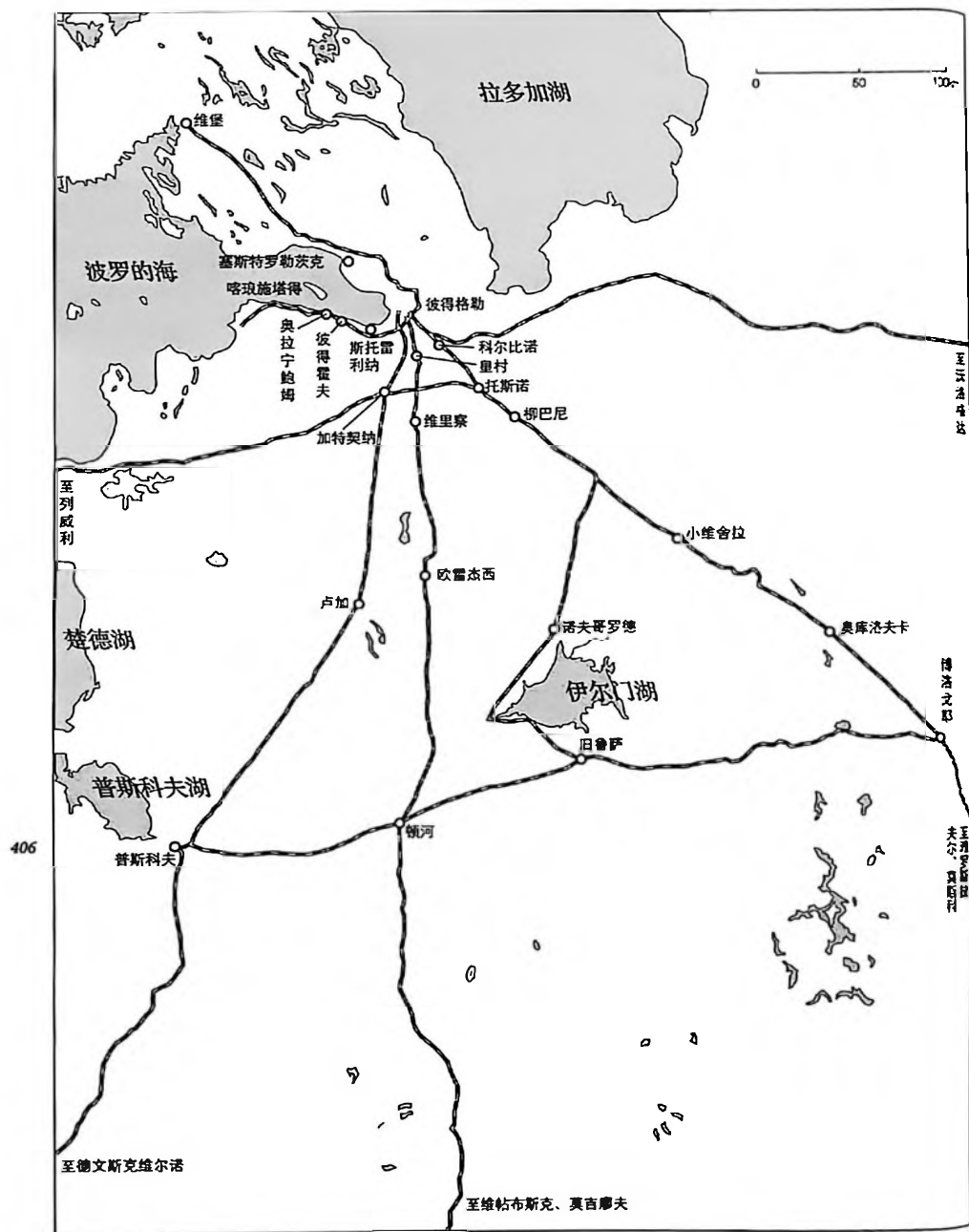
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列克斯

凌晨2时，沙皇专列的先行列车到达距首都154俄里（约164公里）的小维舍拉站，之后便再无法前行。因为前方的柳巴尼有叛军，随行人员觉得很危险。¹³⁸他们商讨后一致决定在此处等候沙皇的专列抵达，然后再前往普斯科夫站。凌晨3时45分，沙皇的专列到达小维舍拉站。沙皇同意了沃耶科夫等随行人员的意见，决定停止前进。此时，随从人员中已经没有人提议要对首都发起进攻了。根据都本斯基的记录，以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列克斯为首，几乎所有人都主张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成员进行谈判。“沙皇既无意争论也未反驳。”此时，沙皇一行依然没有和最高统帅部取得联系。¹³⁹

与此同时，接管交通部的罗蒙诺索夫等人得知沙皇的专列到了

阿列克谢耶夫……卡特科夫认为，阿列克谢耶夫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罗江科虚报实情（Katkov, op. cit., p.304），但也许并非如此。

彼得格勒周边铁道路线图



小维舍拉，便将此事汇报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询问应该如何应对，引发了一番激烈争论。逮捕沙皇，或是将其围困？只需要控制列车运行之人的一个指令，就可以决定沙皇的命运。但是最终，临时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沙皇的专列得以返回了博洛戈耶。^[40] 407

罗江科的电报——涟漪微泛

历史学家晓戈列夫引用侍从武官莫尔多维诺夫的话写道：“3月1日早上，天刚露白，沙皇就给罗江科发了电报。”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任命罗江科为首相，要求他到途中的某一站拜见沙皇，来进行上任后的首次上奏。然而，这并非事实。^[41] 根据罗蒙诺索夫的回忆，上午9时，他得知沙皇专列抵达博洛戈耶站的消息之后，就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取得了联系。临时委员会对他下达命令，要求将沙

尼古拉二世乘坐的“沙皇专列”



皇专列截停在博洛戈耶，向其发送罗江科的电报，并准备好一趟前往博洛戈耶的特别列车。罗江科在电报中强调了如今俄罗斯帝国所面临的危机，并请求觐见沙皇。这封电报虽然发了出去，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在此期间，临时委员会得知沙皇专列开始朝着普斯科夫方向行驶，非常慌张。^[42]

莫尔多维诺夫写道：“沙皇专列在下午3时5分到达顿河站时，收到了罗江科发来的电报。”电报内容是：因为情况有变，敝人无法在顿河站觐见沙皇。^[43]沃耶科夫的记述略有不同。车站负责通信的工作人员将电报呈送给沙皇，沃耶科夫去沙皇所在的车厢询问电报内容，沙皇回答说是罗江科的电报，并询问他罗江科什么时候到。沃耶科夫致电彼得格勒询问后，得知专列在几个小时前就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但是并不知晓罗江科什么时候可以出发。沃耶科夫向沙皇禀报了这个消息，沙皇说：“我们的专列接下来将开往普斯科夫站，去和那边联系，让罗江科来普斯科夫站。”列车发动后，沙皇询问沃耶科夫：“成立责任内阁制怎么样？”^[44]

沙皇专列朝着普斯科夫站出发了，预计将于3月1日下午7时到达。^[45]

席卷皇村的紧张氛围

沙皇和伊瓦诺夫的军队准备驰援皇后、皇太子以及4位公主驻蹕的皇村。在行动开始之前，这里便已经萦绕着动荡的阴云。很多部队被派遣至宫殿周边以加强警备，除了驻扎在此的近卫狙击第1、第3、第4兵团的预备营，还有沙皇护卫骑兵部队直接保护宫殿的安全。这些部队中，率先表示支持革命的，是近卫狙击兵团。

2月28日晚上7时，费奥多罗夫斯基大教堂举行了祈求皇太子病愈的仪式。9时，狙击兵团的兵营附近响起了枪声，沙皇护卫骑兵

部队在亚历山大宫前匆忙集结。指挥官了解情况后，得知枪声是喝醉了士兵向天上放的空炮，而第2、第3狙击兵团预备营在《马赛曲》的伴奏下前往第4团兵营，并在那里举行了集会。代理皇宫警卫司令戈洛特听到枪声，认为叛乱已经开始，于是立即行动，向火车站派出侦察队，并在通往皇宫的路上架设了大炮和机关枪。但这天并没有发生更大的骚乱。^[46] 409

3月1日，受米留科夫指示，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出的两位特派专员——候补议员斯捷潘诺夫和杰米多夫来到了皇村。路上非常安静，见不到警察的踪影。两位议员受到军官们的欢迎，他们访问了兵营，向士兵做了演讲。他们说：“我们是国家杜马派来的。如今圣彼得堡的权力已经移交到国家杜马手中。”支持革命运动的士兵高喊着“乌拉”，并宣誓向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效忠。

尽管如此，当士兵乐队开始演奏《马赛曲》时，杰米多夫仍然感到强烈的不安。当看到士兵住处凄凉景象后，他更加焦虑了。后来，当他见到代理皇宫警卫司令戈洛特时，戈洛特悲壮地表示自己已经抱着必死之心去保护皇后、皇太子和公主们，这是他的天职。杰米多夫等人承诺，决不让这些卫戍部队进攻皇宫。戈洛特希望杰米多夫进宫拜见皇后，但杰米多夫考虑到，自己能告诉皇后的事情只有权力如今掌握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手中，与皇后殿下已无共同语言，便打消了进宫的念头。支持革命运动的士兵们包围着宫殿，让人感到极度的不安与焦虑，危机四伏，于是两位议员当天傍晚就撤离了皇村。^[47]

伊瓦诺夫军的结局

上文曾提到，阿列克谢耶夫发出的一封暗示停止镇压革命的电报误发到了皇村，所以伊瓦诺夫军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收到电报。伊瓦诺夫在3月1日早上6时到7时终于到达了顿河站。到顿河站 410

的还有首都方向驶来的列车，车上有很多拿着武器的士兵和被缴械的军官，还有变装逃出首都的巡查。伊瓦诺夫将四五十名穿着便装的士兵强行塞入己方车厢，继续向皇村进发。3月1日下午6时左右，伊瓦诺夫到达维里察后给皇村致电，得知北部方面军的步兵第67团已经抵达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皇村的卫戍部队发动了哗变。^[48]因此，伊瓦诺夫决定放弃率部强攻计划，改为只身前往皇村拜见皇后。他提出申请，希望能够乘坐由一节火车头和一节客车车厢组成的火车前往皇村车站。交通部的布勃利科夫知道此事后和国家杜马商议，国家杜马同意了伊瓦诺夫的申请。^[49]

伊瓦诺夫不知道的是，从北部方面军派来的步兵第68团也被劫停在卢加，无法向首都前进。卢加位于首都到普斯科夫站的铁路沿线，距离彼得格勒有120俄里（约128公里）。这里原是骑兵部队的集结地，最高指挥官是门登伯爵。直到3月1日早上，一名军官从首都返回，带来最新消息，指挥部这才掌握了首都的消息，并立刻召开了指挥官会议。虽然最高指挥官门登宣布骑兵部队将遵守部队纪律，与革命派展开对决。但是这一命令并未奏效，汽车部队和预备炮兵师很快就高举红旗，冲向骑兵部队。骑兵和步兵们一听说首都爆发了革命，都开始高喊“乌拉”。3月1日傍晚，卢加的起义全面爆发，军官们被逮捕，门登被捕后，被闯入拘禁室的士兵杀死。^[50]

因此，从前线而来的第68团的火车一到卢加，就一定会被这里的起义军截停，军官以及全团所有士兵都将被缴械。

3月1日夜晩，伊瓦诺夫乘坐只有一节车厢的火车抵达皇村。在车站，伊瓦诺夫和市警卫队长、从北部方面军派来的第67团的旅长、宪兵总部部长、总参谋部的参谋等人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伊瓦诺夫得知皇村的卫戍部队中除了皇宫警卫骑兵部队，其他部队已经全部倒向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这种情况下，让格奥尔基营和哗变士兵接触就太危险了，因此伊瓦诺夫决定率部折返。伊瓦

诺夫秘密进宫拜见了皇后。皇后想知道沙皇此时身在何处，但伊瓦诺夫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随后伊瓦诺夫立刻率部队撤回了维里察。^[51]

3月1日的最高统帅部

3月1日，最高统帅部方面越来越明确表示将支持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这天上午，罗江科给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司令发送了两封电报。一封电文很短，内容是：“鉴于旧大臣会议的所有成员已经失去了各自所管辖领域的权力，现在，政府权力已移交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52] 根据鲁科姆斯基所说，另一封的内容是“呼吁军队保持冷静”，其言下之意是呼吁军队力量勿介入当前政局。阿列克谢耶夫对第二封电报强烈不满。据鲁科姆斯基说，这样的电报会“在军中形成全然不可容忍的态度”，虽然他打算回复对方，要求其不要再发这种电报，但这封回复电报最终并没有发出。^[53]

另外，让阿列克谢耶夫异常气愤的是，临时委员会不仅掌握着铁路，甚至连沙皇的专列也想截停；此外他们还切断了最高统帅部和皇村以及陆军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而且他们还未经最高统帅部的许可就多次向军队下达行动指令。阿列克谢耶夫在发给罗江科的第一封电报中就表达了对这些事的抗议。^[54]

然而就算事实的确如此，最高统帅部也不得不接受革命爆发这一事实。

莫斯科革命

究其原因，首先就是莫斯科的革命可能在这一天发展为全面暴动，这一局势给最高统帅部带来了巨大冲击。下午稍早的时候，莫

412

斯科军区司令姆罗佐夫斯基发来了电报。电报中说，因为首都的革命以及信息真空，莫斯科市民“极度亢奋”，并且报纸也停止发售。2月27日莫斯科还没有陷入混乱，但到了28日中午，所有工厂全部罢工，市区内爆发了示威游行。“我认为政府必须立刻发表声明，说明彼得格勒的局势。……再继续保持沉默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多违法行为。”^[55]

莫斯科方面于27日夜里，由列布辛斯基（莫斯科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等人组成了社会团体委员会，掌握了实权。委员会罢免了姆罗佐夫斯基的军区司令一职，并任命格鲁吉诺夫（莫斯科省参事会主席）为新的候选人，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莫斯科的革命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姆罗佐夫斯基也许并没有认清这一形势，他直到这一天才仓促向沙皇报告，称革命若引发社会动乱，沙俄将陷入一片恐慌。即便如此，这份迟来的报告也足以让最高统帅部的众人惊慌不已。

阿列克谢耶夫做出了如下判断：“毫无疑问，莫斯科的这种动乱状态会向俄国其他的重要城市传导下去。如果事态发展到那一步，本来就无法满足运输需求的铁路系统恐怕也会陷入彻底混乱。军队驻地的店铺里已经基本没有什么物资了，士兵完全依靠运送来的物资生存，如果后方补给线遭到重创，那将给军队带来毁灭性打击。俄国的这场革命——一旦后方陷入动乱状态，这将是不可避免的——俄国将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以可耻的方式结束战争。……一旦后方爆发革命，就不可能要求军队在前线专心作战。”

他把这些事项——写下发送给沙皇，并提出了以下的请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使用武力镇压骚乱风险很大，会给国家和军队带来毁灭性打击。眼下，国家杜马正在尽可能维持秩序。但如果陛下您仍然不下达旨意要求全面恢复秩序的话，权力很可能明天就会被激进分子夺走，如此一来，俄国将陷入革命带来的各类恐慌。

本人在此跪求陛下，为了拯救这片土地和沙皇俄国，请您任命一位 413
值得信任的人出任内阁首相，让他全权负责组建内阁。这是现在唯一的出路。”^[56] 简而言之，就是请求沙皇组建信任内阁。

3月1日下午3时55分，各方面军司令都收到了这封电报。电报中还要求北部方面军最高统帅部在沙皇专列抵达附近时，派人将电报呈送沙皇御览。但是不知道此事有没有顺利实现。

在此期间，莫斯科的事态进一步恶化。姆罗佐夫斯基居然愚蠢到在3月1日早上宣布实施戒严令，并且通知卫戍部队举行祈祷会，纪念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分子刺杀37周年。^[57] 不知道他为何会采取这些对缓解局势毫无助益的措施。这天，莫斯科的工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士兵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之中。

3月1日下午1时20分和2时30分，姆罗佐夫斯基向最高统帅部接连发出了两封电报汇报莫斯科的情况。第一封的内容是：第一预备旅的几千名炮兵抢走了大炮，并将其中一部分交给了革命阵营。这封电报于3时15分送达。第二封电报的内容是：“莫斯科已实现彻底革命，部队正在逐渐倒向革命阵营。”这封电报于4时10分送达。^[58]

喀琅施塔得的革命

3月1日傍晚，最高统帅部得知，继莫斯科爆发革命之后，喀琅施塔得也爆发了革命。海军军令部部长卢辛首先收到了海军大臣转来的喀琅施塔得要塞警卫队长克罗希的电报*。电报中说：“从昨晚

◆
喀琅施塔得要塞警卫队长克罗希的电报 下午5时到6时之间，这封电报辗转送到了沙皇的手上。

开始，一些陆军部队和舰队的陆上勤务部队爆发了动乱。部队士兵边演奏着音乐，边在路上缓慢游行。卫戍部队中没有队伍能够前往镇压，因为没有队伍值得信任。”^{159]}

414 这是3月1日清晨的一份报告：2月28日的白天，喀琅施塔得的工厂工人开始罢工，结果到晚上时，已经发展成了全面冲突。一开始，工人们走出工厂，上街游行并提出他们的要求。军港司令维纶回应将于次日在亚克力（锚地）广场给工人们答复。到了深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卫戍部队的士兵也开始游行。鱼雷训练部队召开了集会，并开始行动。他们前往第1海军兵团号召海军士兵和他们一起行动，但是遭到了军官开枪镇压，双方爆发冲突。以此为导火索，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夜里，喀琅施塔得的海军士兵全面起义。3月1日早上6时，起义军在亚克力（锚地）广场召开了一场大型集会。司令维纶被带到广场，被士兵用刺刀刺死。这天晚上大约有50名军官被杀。^{160]}

最高统帅部在收到喀琅施塔得方面发来的第一份报告的大概一小时后，又收到了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涅佩宁的报告*。“从3月1日早上4时开始，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失去了和喀琅施塔得的联系。喀琅施塔得最高司令被杀害，军官被逮捕。喀琅施塔得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叛乱士兵占领了当地的通信局。”^{161]}涅佩宁也给沙皇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表示，将服从罗江科的提议，军队方面停止介入政局，并说，“我认为我必须和国家杜马保持一致”，“因为若不这样做，今后不要说让军队继续保持战斗状态，就连让部队听从指挥都无法保证”。^{162]}这是前线部队对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最初

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涅佩宁的报告 这份报告在下午6时前转送给了沙皇。

的忠诚宣誓。

在波罗的海舰队最高统帅部里，司令涅佩宁身边有伦格尔腾等开明派军官向涅佩宁建言献策。因此，涅佩宁在3月1日下午4时半左右就早早地宣布了自己支持革命、支持国家杜马的立场。^[63]

喀琅施塔得的革命，成为让阿列克谢耶夫进一步改变想法的决定性因素。

最高统帅部和司令们

3月1日下午6时多，阿列克谢耶夫的副总参谋长克勒博夫斯基⁴¹⁵首先向布鲁西洛夫等各方面军司令发送了1854号电报，内容如下：

莫斯科爆发了大规模起义，政府被推翻，以罗江科为主席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取而代之，并逐渐取得军队的支持。喀琅施塔得也爆发了叛乱，波罗的海舰队征得舰队司令的同意后开始拥护临时委员会。是为了挽救舰队，涅佩宁司令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向沙皇发了一封电报，请求陛下颁布敕书，安抚国民并平息革命。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想要证明，只有政府领袖里出现可以组建人民信赖的内阁的人物，才有可能拯救沙皇俄国，继续战争。陛下眼下还没有到达皇村，列车行驶到了顿河站附近。^[64]

这封电报虽然对形势有了清楚认识，但依旧在提议恳请沙皇批准组建值得信赖的内阁。而这封1854号电报中提到的给沙皇的电报，发送于3月1日下午3时55分。

各方面军司令又持怎样的态度呢？对于阿列克谢耶夫发给伊瓦诺夫的暗示其停止镇压革命的行动电报，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尼古

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晚上7时前回复：“完全同意您的意见。”^[65]

西南方面军司令布鲁西洛夫的看法，可以从发送给下午7时半抵达顿河站的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列克斯的电报中得知。“一场令人恐惧的战争正在沙皇俄国内部爆发，它关系到我们的祖国和沙皇一家的命运。我完全不能想象在这样残酷的战争中竟爆发内乱，这意味着即使整体战局对我们有利，终归也会以无条件的战败收尾。”他请求“认清既定事实，和平且快速地结束这可怕的局面”。^[66]

下午7时半，西部方面军司令埃弗特的参谋长克维辛斯基用休斯印字电报机向鲁科姆斯基传讯：前线各种消息、谣言泛滥，让人无法辨别事实与谣言，1854号电报虽然清晰地说明了当前的情况，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埃弗特司令表示：“我很担心那些宣称目前处于骚乱状态的消息会以各种形式传到前线，尤其是预备部队那里，因此我认为要尽快做出明确的决定。此时，任何延迟都是致命的。”紧接着，克维辛斯基又询问了沙皇、伊瓦诺夫以及西部方面军派出部队现在的位置。鲁科姆斯基回复道：“阿列克谢耶夫也向罗江科发了电报，请求改变目前使用的通信联络方式，不再直接与各部队联络，而是由最高统帅部向各方面军统一下发通知。”^[67]

沙皇到达普斯科夫

3月1日下午7时，沙皇乘坐的专列终于抵达了普斯科夫。罗江科发电报称无法前去迎接沙皇。北部方面军司令鲁兹斯基和参谋长丹尼洛夫到车站迎接沙皇，并在沙皇的邀请下与之共进晚餐。晚餐过后，鲁兹斯基和沙皇进行了交谈^[68]，并转交了刚收到的阿列克谢耶夫写给沙皇的电报（1865号）。阿列克谢耶夫电报的内容如下：

无政府状态正在全国蔓延，军队将继续分崩离析，在这样

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继续战争的，总之，形势在不断恶化。恳请陛下颁布诏书安定民心。只有承认责任内阁，委任国家杜马主席组建内阁，才能安定民心。

阿列克谢耶夫断言，如果委派罗江科去领导国家杜马相关人员，则有望阻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有根据的。此外，阿列克谢耶夫还在电报里附上了诏书草稿，恳请沙皇颁布诏书。诏书草稿写到，为了“取得最终胜利，用尽一切方法将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必须推行责任内阁制。^[69] 417

沙皇对阿列克谢耶夫提议的回应似乎显得不真诚，始终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鲁兹斯基离开后，沙皇召来沃耶科夫，让他给罗江科发送电报。内容如下：允许组建责任内阁，但外交大臣和陆海军大臣要直接对沙皇负责。换言之，沙皇否决了阿列克谢耶夫的提议。^[70]从晚上10时30分到11时20分，最高统帅部和北部方面军最高统帅部的休斯印字电报机一直在工作。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最高统帅部一直在反复询问有没有得到沙皇的回复。^[71]沃耶科夫申请使用北部方面军最高统帅部的休斯印字电报机发送给罗江科的电报时，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因为鲁兹斯基司令规定，在北部方面军最高统帅部里使用休斯印字电报机时必须获得司令的许可。^[72]

由此也可以看出，鲁兹斯基对沙皇的决定感到焦躁。之后，在和罗江科电报联系时，鲁兹斯基只传达了沙皇有意承认责任内阁制的内容，并没有提及外交大臣、陆海军大臣不听命于责任内阁等保留条款。^[73]

3月1日深夜12时过后，沙皇向皇村发送了一封给伊瓦诺夫的电报：

我想你已经平安到达。在朕抵达及处理当前奏陈之前，切

勿采取任何行动。尼古拉¹⁷⁴¹

沙皇在明白自己已经无法镇压起义的情况下，还对负责镇压起义的司令发送这样的电报，简直让人费解。伊瓦诺夫在维里察收到了这封电报。如果他在3月2日凌晨4时再次向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方向前进的话¹⁷⁵¹，那么他可能是误判沙皇还未放权力。

418 蔓延到莫斯科、喀琅施塔得以及皇村的起义让军队高层感到恐惧，他们开始期待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能够控制局势。为了能够继续前线正在进行的战争，他们甚至允许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实行责任内阁制。但是，起义的浪潮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3月1日傍晚时分对政权问题进行分析后的结论本应该在第二天召开的大会上进行表决。拉菲斯称，在大会召开之前他们本应再次召开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进行审议。^[1]但是，苏汉诺夫认为事不宜迟，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和风险”。于是，他自作主张地与涅克拉索夫沟通，提出了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会谈的要求。涅克拉索夫表示可以在深夜12时同苏汉诺夫会面商谈。苏汉诺夫与在场的执行委员们商量了这件事，决定和齐赫泽、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三人出席这次会谈。^[2]由此可以看出，参与会谈的人员并不是由执行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领导们自己决定的。

这次会谈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办公室举行。国家杜马方面，罗江科、米留科夫、涅克拉索夫、舒尔金、戈德涅夫、阿杰莫夫、希德洛夫斯基、弗·尼·李沃夫、首相候选人李沃夫出席。^[3]据说在会议过程中克伦斯基也进过办公室，但并没有参与谈判。国家杜马方面谈判的核心人物始终是米留科夫。谈判的第一个环节是由斯捷克洛夫朗读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总结的九项条件（参见第7章第391页）并对此发表意见。双方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第三条提到的“临时政府不得预先决定未来政体形式”。米留科夫激烈反对这项要求，因为他极力主张沙皇退位，让位给皇太子阿列克谢，并由米哈伊尔大公摄政。苏汉诺夫的记录显示：他对米留科夫“从反政府派的领袖转变为极右翼派”感到震惊，在国家杜马中，没有人支持米留科夫的⁴²¹这一言论，所以，他的提议“以失败告终”。^[4]但是米留科夫在另一份资料中提及，在自己的要求下，第三项条件被删除了。^[5]在这个问题上，米留科夫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设想是维持帝制，在保持帝制连续的基础上推进改革。也就是说，他的设想和军事政变派的

目标是一致的。他所希望的并不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确立君主立宪制。米留科夫的此番言论其实也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米留科夫极力主张沙皇让位给皇太子阿列克谢，并且让米哈伊尔大公摄政。双方虽然没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但苏维埃方面还是退让了，没有发出拒绝的最后通牒。

双方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第九项条件中提到的“军队自治制”。米留科夫和舒尔金都在资料中将其表述为“军官选举制”。两人均对此表示强烈反对。¹⁶¹ 不过，这可能是个误会。苏维埃谈判代表团的4个人不可能把在3月1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中通过的《一号法令》里没有提及的内容加到“军队自治制”里。但不论事实真相如何，斯捷克洛夫等人还是放弃了通过这项条件。也就是说，他们撤回了由起义士兵组成的士兵委员会来管理武器等条件。作为交换，斯捷克洛夫等人接受了米留科夫总结的如下内容：“士兵在军队中以及执行军务时要严格遵守军规，但他们同样享有市民所拥有的各项社会权利，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限制。”

而对于其他条件，米留科夫在有关保障士兵政治自由的要求中添加了“在军事技术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这一附加条件。除此之外，国家杜马接受了苏维埃在其他方面提出的所有条件。关于国家杜马最难以接受的第八项条件，即禁止调动参加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这一条，米留科夫在资料中写道，“这为我们取得胜利提供了保
障”，因而这条顺利通过了。¹⁷¹ 虽然斯捷克洛夫等人在有关士兵委员会的问题上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因为在第八项条件上双方达成了
422
共识，客观来说，最低限度的要求已经得到了保证。

米留科夫虽然接受了以上条件，但是他要求苏维埃方面发布宣言，在宣言中明确表示新政府是基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双方协议诞生的，并呼吁士兵信赖军官，服从军官指挥。¹⁸¹ 他希望在发表政府公告，即公布双方协商后均同意的条款的同时，苏维埃



苏维埃执行委员苏汉诺夫
(左)和斯捷克洛夫(右)

方面也一并发布上述宣言。苏维埃方面接受了米留科夫的要求，让苏汉诺夫开始撰写宣言，中途索科洛夫接手完成。但是，国家杜马对这份宣言的内容并不满意。索科洛夫本打算在宣言里写清楚军官的社会形象，并得出军官应该和政府保持联系的结论。但是，最后文本的结论却是军官不可能和政府保持联系。^[9] 经过激烈的讨论，担心得脸色发白的克伦斯基最终说服了苏汉诺夫，苏维埃方面也开始全面妥协，同意将米留科夫重新修改后的宣言作为苏维埃宣言。虽然苏汉诺夫说自己和索科洛夫也对宣言内容做了修改润色，但应该已无足轻重。^[10]

宣言将新政府称为“由社会中温和的人民群众所构建的新政权”，“诞生的新政权会履行他们的义务，和旧政权做斗争。为响应新政权，民主主义派应给予支持”。此外，“为了防止（社会）分裂和无政府状态”出现，防止反革命势力抬头，特别呼吁士兵和军官加强团结。其中虽然也提到了军官，但主要的号召对象还是士兵，“时刻谨记只有士兵和军官齐心协力，军队才能变得强大”，不能因为个别军官的劣迹而“否定所有的军官”，对军官“认为民主主义派不重要的错误认识”应给予“宽容和忘却”。^[11]

我们可将以上文件看作临时政府成立之际，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并且双方决定在新政府成立时发表这一内容。

塔夫利宫之外

423

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自作主张、独断专行地与国家杜马谈判时，苏维埃内部的左派和右派在3月1日晚上到3月2日上午也开展了一些新的政治行动。

首先，孟什维克党组织委员会在律师库洛夫马里的家中召开了会议。共计12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既有支持“联合政府”派的执行委员，也有反对“联合政府”派的执行委员。拉菲斯的记录中称：经过讨论，决定建立联合政府。^[12] 巴图尔斯基也在这次会议中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与右派的行动相呼应，机关报《消息报》3月2日刊登了巴扎罗夫匿名投稿的评论文章《民主主义派参与临时政府》。而同一版面还刊登了一篇反对君主立宪制、要求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文章，名为《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能否继续下去》。巴扎罗夫在评论中提到：“现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中的资产阶级各政党没有燃起足够的热情将革命进行到底，来实现民主主义的彻底胜利。”为了让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巴扎罗夫主张让革命民主主义派加入临时政府的内阁，“临时政府内的民主主义派成员”需要“民主主义派强有力的独立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帮助。同时，需要谨防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彻底切断关系，因为这会使资产阶级因恐惧“红色幻影”而倒向专制势力，这是“相当于自杀的致命错误”。^[13]

左派也采取了行动，布尔什维克党在这天夜里举行了两场公开集会。其中一场集会在彼得格勒区克洛维尔克斯基大道的一家职业

介绍所召开，讨论了重建圣彼得堡委员会的问题。^[14] 这次集会共有40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维堡、纳尔瓦、瓦西里岛这三个地区的正式代表和拉脱维亚人组织、立陶宛人组织、学生组织、印刷工工会的正式代表，以及圣彼得堡委员会前任干部、相关人士等。这之中有在“一战”前曾参与合法报刊的工作，但开战后离开苏维埃的人，比如战时担任职业介绍所所长的艾力·艾姆·米哈伊洛夫、《记事》
424 杂志集团的阿维洛夫等；还有曾是干部，革命爆发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比如施密特、安蒂洛夫、奥尔洛夫等。此外，在“一战”期间作为保险集团的成员和纳尔瓦区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波多夫斯基，作为圣彼得堡委员会在任成员参加革命的吐鲁马科夫、波利拉、奥西斯·奥泽利（安保部门的密探）等人也参加了集会。

根据施略普尼柯夫的回忆录，在这次集会上，他汇报了他们与苏维埃方面的一些来往。这份报告充满懊恼和无奈。他认为，虽然临时革命政府所追求的基本方针与宣言一致，但是“该宣言必须经得起具体情况的考验”。所谓具体情况指的是，苏维埃已落入“国防派或者说半国防派的手中”，布尔什维克党所掌握的权力很小。虽然布尔什维克党渴望参与临时革命政府，但苏维埃的多数人都表示“我们不希望掌控权力，我们惧怕权力”。施略普尼柯夫并没有对这种想法感到失望，他主张要“使我们的工作方法适应‘革命后’的新条件”，加强党组织建设，集中精力在工人农民群众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组建组织。^[15] 会议记录里并没有施略普尼柯夫进行主要汇报的记载，只记录为“几位苏维埃成员”做了报告。或许苏维埃的机关报编辑阿维洛夫也做了报告。此外，会议中还有人提到左派的原则论。还有一些会议记录的内容和施略普尼柯夫回忆录中的内容相互印证。会议商讨环节中出现了两种相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苏维埃如果游离于国家杜马之外，就应该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划清界限；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苏维埃应该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

会“保持紧密联系”。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刻改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但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表示，党的实力还不够强大，改选为时尚早。在讨论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人做了如下发言：

近期必须尽快重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的谈判策略，甚至苏维埃的整体面貌都需要革新。要在各地区贯彻落实宣传号召的各项活动，召回代表更换现任成员，以实现苏维埃整体面貌的变革。圣彼得堡委员会必须做报告，评估苏维埃的作为，找出苏维埃决策中不清晰的地方。圣彼得堡委员会不是外交官，而是民主主义者。 425

最终，圣彼得堡委员会重建大会并没有就政权问题达成任何决议。中央委员会的施略普尼柯夫也认为，此时尚不具备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的力量。况且，刚从牢狱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干部们一定也对目前革命的形势感到很困惑。

这天夜里，维堡区一共召开了两次集会，另一次集会由维堡区的工人和士兵召开，氛围和这边完全不同。他们是革命的先锋，战斗热情极其高涨。早在当天下午，地区苏维埃就在乌拉尔电影院召开了2000人规模的工兵集会，布尔什维克党人辛格利西切特和帕霍莫夫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党宣言，呼吁尽快实现革命的中心要求，同时呼吁工人和士兵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气势上完全碾压了在演讲中宣称革命是“全民参与的气势高昂的运动”的保守派。^[16]

接着，这天夜里，他们又在圣普索涅夫斯基大道上基督教团体的一座大楼内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员会重建会议，同样也有2000人参会。大会选举丘格林为委员会主席。修托格就推翻沙皇

专制制度后的形势做了报告，主张必须由苏维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扎莱西斯基也做了发言。¹¹⁷ 这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为了完成革命大业，要在起义的工人和军队中尽快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二、为了完成革命大业而起义的军队成员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忠于沙皇，为了铲除这些依旧忠于沙皇专制制度的势力，必须重组我们的军队。

426 三、新生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要不断吸收起义的人民和军队的干部（重要成员），要对外公布我们组建了临时革命政府，并立即将由12名国家杜马成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划分到临时革命政府的直接管辖下。

四、基于选举法设立的国家杜马曾是被推翻的沙皇专制制度的支柱，要取消国家杜马作为国民代表机构的权限。¹¹⁸

以上内容作为维堡区委员会的决议于翌日，即3月2日，被印在传单上发放到了大街小巷。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区联派的尤列涅夫好像也在响应维堡区布尔什维克党的行动，他们在3月1日晚上向士兵们发放了大量传单。

传单开头写道：“这一刻终于来临，大家站起来了。一直以来被套上枷锁、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站起来了，专制政府轰然倒塌，模样狼狈地走向了灭亡。”“我们要的是全部的土地和自由，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罗江科、米留科夫是不会给我们这些的。”“为了不受贵族、军官和罗曼诺夫‘王朝’同伙的欺压，我们必须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要先选出团队委员会，由这些人负责排长、连长、团长的选举和粮食、军官的管理。传单的末尾还重申了军官

选举制的要求¹¹⁹：“我们只信赖把人民当作朋友的军官，只服从工兵代表苏维埃所派遣的代表的命令。”此外，他们还希望选出士兵代表苏维埃，认为士兵代表和工人代表“必须建立由人民当家做主的临时革命政府，唯有通过这个政府，你们才能得到土地和自由”。

这份传单以区联派和俄国社会革命党圣彼得堡委员会的名义，呼吁实行军官选举制，呼吁由苏维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这足以令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流派感到战栗。俄国社会革命党国防派佩·奥·弗雷德里克赶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办公室，大声吼道：“这是全面虐杀，是大屠杀（对犹太人的集体暴力）。是摧毁整个革命的蓄意挑衅。”克伦斯基也表示自己“被愤怒和绝望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认为这一定是沙皇安保部的计谋，要求对此加以严惩。苏汉诺夫也认为这是在“肯定暴力，是在呼吁和军官决裂”，这对“高度政治”，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签订的协议来说构成了致命威胁。当时在场的执行委员决定查扣传单，苏汉诺夫不顾莫洛托夫的抗议，强行没收了传单。¹²⁰在两天后的上午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尽管施略普尼柯夫强烈抗议，由于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最终还是通过了焚烧传单的处理决议。¹²¹但是，传单已经被大量发放到城里，和《一号法令》一样，它也为军官选举制思想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份传单，人们才意识到《一号法令》是在呼吁实行军官选举制。 427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要求沙皇退位

在苏维埃方面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协商时，3月2日凌晨2时半，罗江科应北部方面军司令鲁兹斯基的邀请，使用休斯印字电报机与后者进行了交流。¹²¹

鲁兹斯基问罗江科：“沙皇陛下今天下午7时到达了普斯科夫，

陛下非常期待您的到来，但阁下为什么没有出现呢？”此外，他还告诉罗江科，沙皇已经同意建立责任内阁，并由罗江科担任内阁首相，此时正在准备诏书。

对此，罗江科态度骤变，他回答道：“很明显，陛下和您尚未理解此地发生的剧变。”“一场史无前例且令人战栗的革命已经爆发了。”“为了将左右局势变化的主导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持续发酵导致国家灭亡，国家杜马的所有人，尤其是我，只能身先士卒。但是，很遗憾，我没有成功。人民起义的热情无法压制且不断高涨，军队也丧失了士气，不仅不服从军官的命令，甚至杀害了军官。人民对皇后和陛下恨之人骨。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不得不将所有的大臣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我担心迟早有一天我也会沦落到和他们一样的境地……您提出的方案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现在是罗曼诺夫王朝生死攸关的时刻，请您将这一点转达给陛下。”

紧接着，罗江科突然话锋一转，强调虽然人民“对王朝的憎恶
428 感”很强，“但是全体人民……决心战斗到底，取得胜利，决不能输给德国人”。彼得格勒、皇村的卫戍部队已经开始支持国家杜马。让米哈伊尔大公摄政、皇太子阿列克谢继位是他们已经提出的“明确要求”。

罗江科继而沉重地补充道：“我要重申，现在我的处境千钧一发，权力正急速从我的手中溜走。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区域已大到超乎所有人的预料，今天我已经被迫同意成立临时政府。很遗憾，诏书来得太晚了。”

罗江科并没有直言要求沙皇退位是他们这些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的要求。米留科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罗江科说那是发动起义的人提出的要求，而他只是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沙皇。^[23]

鲁兹斯基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他回答，自己只是服从命令将诏书交付印刷，须观察形势，并表示会择机将罗江科的话禀告沙皇。

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罗江科和鲁兹斯基的通信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结束时已经凌晨3时半多了*。^[24]

通话后，鲁兹斯基深感罗江科与自己的想法完全一致。罗江科反复强调不要让起义影响到军队，要尽快平息国内混乱的局面。他的原话是：“此事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春天要来了，我们必须积极投入到战事筹备工作中去，且要和协约国保持步调一致。我们有义务考虑协约国的想法。”

429

鲁兹斯基决定接受罗江科的建议。凌晨5时30分，鲁兹斯基指派参谋长丹尼洛夫上将，先将他与罗江科谈话的内容传达给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并告诉他在沙皇下令前，最好不要印制诏书。之后，鲁兹斯基小睡了一会儿。^[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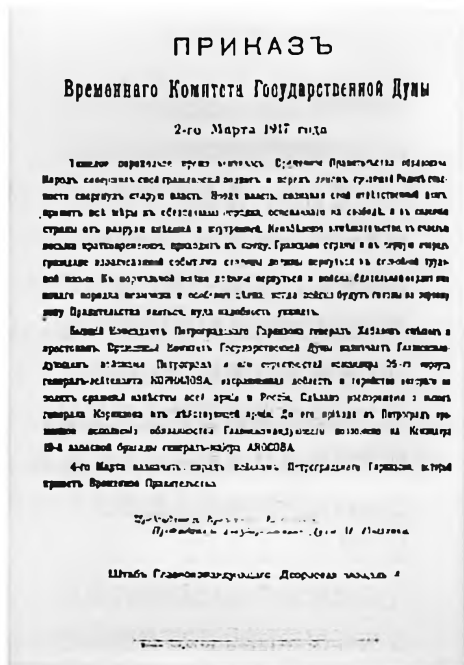
这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中心人物古契柯夫想选拔有领导能力且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将军接替被捕的哈巴洛夫，担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此来平息军队内部的混乱。他提出的候选人分别是克雷莫夫和科尔尼洛夫。之后，在质询巴齐利的公开听证会上，古契柯夫表示：“我想任命克雷莫夫担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但是他立即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离开哥萨克师。并且，我们必须重视军队等级制度，他还年轻，如果任命他为军（区）司令，或许会引起军队有关人员的不满。”“之后我征召了科尔尼洛夫，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26]

科尔尼洛夫出生于1870年，曾在波斯、中国等地进行情报收集工作，担任驻外武官，1911年受军队内部改革派马鲁图伊诺夫的邀

◆
已经凌晨3时半多了 3月2日、凌晨3时20分，北部方面军供给部长波尔多耶列夫把罗江科和鲁兹斯基正在进行沟通的消息告诉了最高统帅部的鲁科姆斯基。



科尔尼洛夫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任命科尔尼洛夫为首都军区司令的任命书（1917年3月2日）

请，到阿穆尔河（黑龙江）地区的国境警卫队任职。在此期间，他做了很多工作，如举报中东铁路总裁霍尔瓦特贪污渎职等。“一战”爆发后，他担任师长，在战争中被俘，但在1916年8月成功越狱回国。回国后，他立即回归军队，担任第25步兵军军长。^[27] 科尔尼洛夫因其丰富的经历，被称为富有改革创新精神且骁勇善战的将军。古契柯夫或许在“一战”前就熟知此人。古契柯夫向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司令人事调动的申请，并获得了委员会的支持。

430 临时委员会讨论决定，向最高统帅部发送电报，迫使沙皇发布命令，同意任命科尔尼洛夫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此外，向最高统帅部汇报国家杜马此时的情况。3月2日5时半到6时左右，国家杜

马临时委员会向最高统帅部发送了如下内容的电报：“现在是时候把权力移交给以格奥尔基·李沃夫为首的临时政府了。”“军队已经宣布服从新政府的管辖统帅。”“为了建立完善的秩序，为了让首都摆脱无政府状态，必须任命在民众中有声望、有权威、骁勇善战的将军担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我们希望立刻任命第25步兵军军长科尔尼洛夫中将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28]阿列克谢耶夫向沙皇提出申请，希望沙皇能批准以上内容并召回伊瓦诺夫。^[29]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这边，罗江科正在汇报自己和鲁兹斯基的电报通信记录时，未等天亮，古契柯夫突然折返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这一天，古契柯夫本来要和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一起去会见某个人。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曾和古契柯夫一起策划发动军事政变，他是古契柯夫非常信赖的合作伙伴。但当他们的汽车在市内行驶时，坐在副驾驶、身着军装的维亚泽姆斯基公爵遭遇狙击，当场中弹身亡*。舒尔金在回忆录中述及，古契柯夫“当时的样子十分狼狈”^[30]，他确实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古契柯夫向临时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希望面见沙皇，请求沙皇退位，并传位给皇太子。他呼吁：“在这样混乱和动荡的形势下，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挽救君主制。没有君主制，俄国将走向灭亡。但是，很明显现在的沙皇已经不能继续掌握统治权了。”^[31]

古契柯夫想劝说大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一定要在君主制被推翻之前掌握主动权。他的设想是，沙皇在退位之前除了要任命科

◆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遭遇狙击，当场中弹身亡 根据舒尔金的记录，死亡时间在凌晨4时左右，其他资料记载的时间为上午6时左右。

尔尼洛夫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还应该任命李沃夫为责任内阁的首相。古契柯夫其实在谋划另一场武装政变，即利用首都的民众起义向沙皇施压，迫使沙皇对国家进行改革。古契柯夫和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从1916年年末就开始一起谋划军事政变。此次公爵的意外身亡也让古契柯夫痛下决心做最后一搏。如果能成功，起义就如同一场梦一样烟消云散，君主制经过改造，仍能继续存在。舒尔金赞同古契柯夫的提议，并提出愿与其同行，一起去面见沙皇。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涅克拉索夫、克伦斯基、柯诺瓦洛夫对此持何种态度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古契柯夫去普斯科夫面见沙皇不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正式决定，但罗江科和米留科夫对此一定是表示支持的。虽然古契柯夫的人阁呼声渐起，但他并非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成员舒尔金陪同古契柯夫一起面见沙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肯定了这次行动的“半官方”性。

3月2日凌晨4时左右，古契柯夫和舒尔金离开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首先去了古契柯夫的家里。按照舒尔金的记录，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就乘坐专列从波罗的海车站出发了*。^[32]古契柯夫想赶在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之前让沙皇做出最后的决定，因此他必须尽早见到沙皇。

3月2日的最高统帅部和北部方面军最高统帅部

在收到罗江科深夜用休斯印字电报机传来的消息之后，最高统帅部于3月2日早晨召开了高层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接受罗江科

天快亮的时候……专列从波罗的海车站出发了 根据米留科夫的记录，古契柯夫一行是下午3时从车站出发的。

的要求。做出此决定的原因有很多，正如之后阿列克谢耶夫在发给各方面军司令的电报中所写的那样：“我们要拯救即将分崩离析的军队，将与外敌的战争（‘一战’）进行到底，保卫俄国的独立。我们在其他方面可以妥协，但是要时刻把维护王朝统治的任务放在首要位置。”^[33]

要想继续战斗（“一战”），首先就要防止军队分崩离析，同时即便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也要继续维护帝制。鲁科姆斯基还强调，⁴³² 皇村宫殿已落入起义军的手中，这相当于皇后及皇太子等人已经成了人质。^[34]

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传到了北部方面军参谋长达尼洛夫那里。达尼洛夫暗示自己和鲁兹斯基意见大致相同，但也指出要说服沙皇接受那些要求是相当困难的。^[35]

3月2日清晨，鲁兹斯基从小睡中醒来。上午10时45分，他面见沙皇，向沙皇报告了他和罗江科的电报通信内容。皇宫警卫司令沃耶科夫也陪同在场。鲁兹斯基用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逐字逐句地向沙皇汇报，明确地传达了罗江科的原话——沙皇必须退位。鲁兹斯基告诉沙皇，要求沙皇退位之事也已经通知了最高统帅部，此时正在向各方面军司令征求意见。沙皇默不作声地听着鲁兹斯基的汇报。自不用说，沙皇一定深受打击。汇报结束后，沙皇命令鲁兹斯基在站台上等待沃耶科夫并征询他的意见。两人在站台见面后，鲁兹斯基向他表示，现在沙皇只能接受罗江科的意见，这一事实着实让沃耶科夫大感震惊。沃耶科夫回到驻地向沙皇报告完这一情况，沙皇的脸色早已煞白一片，似乎已经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这天早上，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列克斯位于首都彼得格勒的宅邸在深夜遭暴民纵火焚毁的消息传到了普斯科夫站，听闻这一消息，在场众人无不震骇。^[36]

3月2日上午10时至11时半，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从最高统

帅部发电报给西部、西南、罗马尼亚、高加索方面军的司令和参谋长，向他们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决议，即已决定向沙皇谏言退位，要求各将领若同意则须立即向沙皇发送请愿电报。西部方面军司令埃弗特由副总参谋长克勒博夫斯基、西南方面军司令布鲁西洛夫由阿列克谢耶夫、罗马尼亚方面军参谋长萨哈罗夫由鲁科姆斯基分别发电报劝说沙皇。只有萨哈罗夫表示想在知晓其他司令的回复后再做出答复，其他三位司令都主动回复支持劝说沙皇退位。^[37]于是，包括埃弗特在内的所有司令的回复由阿列克谢耶夫汇总，于下午2时30分以电报形式呈送至北部方面军最高统帅部。

433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称，这是为了“拯救俄国和您的继承人”；布鲁西洛夫称，“这是为了挽救目前的事态，也为了今后能继续和外敌进行斗争”；埃弗特称，“这是为了保卫俄国和拯救王朝，现在完全没有其他办法去阻止在首都发生的革命”，因而请求沙皇退位，由皇太子即位。^[38]

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内容如下：

迟迟不下“决断”可能会使俄国走向灭亡。现在还可以从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喀琅施塔得以及其他城市蔓延的瘟疫（指革命思潮）中拯救军队。但是不能保证今后还可以让军队继续严守军纪。如果军队参与国内政治，那么退出战争（“一战”）之事将不可避免，这不仅会令俄国蒙羞，还会使俄国走向灭亡。陛下深爱着祖国。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祖国的独立，为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为了使事态和平地终结，恳请陛下做出决断。静待您的决断。^[39]

萨哈罗夫的电报直接发给了鲁兹斯基。萨哈罗夫曾在日俄战争时期担任陆军大臣，他称罗江科的要求“带有犯罪性质，令人感到

厌恶”，并痛心疾首地表示，“一伙自称国家杜马的强盗，为了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正在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他们是叛徒”。萨哈罗夫感到很不甘心，但他还是表示“为了与外敌的战争能继续下去”，他不得不同意这个方案。^[40]

3月2日下午2时30分，鲁兹斯基带着阿列克谢耶夫和各方面军司令的联名电报觐见沙皇。同时受命出席的还有参谋长达尼洛夫和北部方面军后勤部长萨维奇。鲁兹斯基坐在沙皇的对面，“有条不紊、清晰明了地”向沙皇说明了时下情况。当谈及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发来的电报时，鲁兹斯基把自己与罗江科的电报通信记录铺放在桌上，让沙皇亲自过目。同时，他还“斩钉截铁、明确地”说道：“在这种形势下，陛下已经别无他法，您只有退位这一条路。”“南部对此作何反应？”沙皇问道。沙皇之所以如此发问，是因为在俄国南部，有一支忠于沙皇的哥萨克部队。鲁兹斯基起身说道：“陛下，恳请您听一听我的幕僚——那些将军的意见。他们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为人正直而又坦率。他们深爱着我们的祖国。”等他说完，沙皇催促另外两人发表意见。达尼洛夫十分紧张，声音微颤着说道：“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拯救我们的王朝，为了能推动战争走向胜利，我坚信陛下会应形势所需，做出必要的牺牲。”接着，萨维奇也用好似从牙缝中挤出的声音哽咽着说道：“我，我是个直率的人。我想陛下从备受您信赖的杰朱林将军（沃耶科夫的前一任将军）那儿也有所耳闻。我本人，完全赞同达尼洛夫将军刚才的意见。”达尼洛夫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的：“现场立刻陷入一片‘如扫墓默哀般的沉默’。”沙皇的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凝重神情，他的目光聚向卷帘垂落的窗户那侧。大家都任由这难以忍受的静默的时间慢慢流淌。突然，沙皇转过身来说：“我决定了。我将退位，并将皇位传给我的儿子阿列克谢。”说罢，他在胸前画了十字，将军们也在胸前画了十字。他还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忠心效劳，并表示希望大

434

家能继续支持自己的下一代。^[41]

沙皇回到自己的车厢，给罗江科和阿列克谢耶夫写了电报电文，表示自己决定退位，传位给皇太子，并由米哈伊尔大公摄政。之后，沙皇把手写的电报文本交给鲁兹斯基等人，吩咐其传电给罗江科和阿列克谢耶夫。在给罗江科的电报中，沙皇的表述不同寻常，他写道，“为了实现真正的幸福，为了挽救我们的祖国，我愿意做出任何牺牲”。下午4时左右，鲁兹斯基离开沙皇的车厢。就在这时，他收到消息，得知古契柯夫等人即将抵达普斯科夫站，于是，他又回到沙皇的车厢和沙皇商量，最终他们决定等古契柯夫等人到达之后再发送沙皇退位的电报。^[42]

苏维埃大会与权力问题

在3月2日召开苏维埃大会之前，苏汉诺夫因为担心受到来自左派的攻击，于是事前与参会者进行沟通以获得支持，同时，他还建议汇报者斯捷克洛夫尽量拖长汇报时间，缩短讨论时间*。^[43] 本次大会约有400名工人和士兵代表出席。^[44] 在会议主席齐赫泽致辞后，斯捷克洛夫开始做汇报，他讲述了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谈判过程。然后说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拒绝加入临时政府，并在满足以下要求的基础上，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一致。

第一，立刻进行全面大赦。第二，实现包括军人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政治自由。但就有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条件——按照自主管理原则建立军队这一点，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表示拒绝实行指

◆
缩短讨论时间 原文为“为了能砍掉讨论时间”。

挥官选举制。对此，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谴责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舒尔金是“基辅的迫害者”（意为反犹太主义者，右翼）。第三，扩充民警队伍来取代已被解散的警察。第四，废除民族与宗教歧视。接着，报告又谈到了政体问题，“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沙皇退位，由皇太子即位并设立摄政王”，同时着手筹备召开立宪会议。最后，他表示：“具备革命精神的卫戍部队不调离彼得格勒，也不会解除武装。”^[45] 这之后，斯捷克洛夫宣读了李沃夫首相为首的临时政府成员名单，并介绍了司法部长克伦斯基和劳动部长齐赫泽。在此基础上，斯捷克洛夫还在报告中说到，他曾受托传话，邀请克伦斯基加入内阁，不过他拒绝了。^[46] 据机关报《消息报》，斯捷克洛夫最终声明：“要新成立的政府遵循宣言，组建权力机关，拒绝非法行为，并落实前述纲领，解决以上三点任务，人民就应支持临时政府。”^[47] 由于会议记录有缺漏，此处的“宣言”极有可能是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米留科夫等人达成的协议文件（参见本章第418—420页）。

斯捷克洛夫报告完毕后，克伦斯基突然要求发言。他向大家呼吁：“诸位，你们相信我吗？各位，我打心底说，当有需要时，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

之后，克伦斯基称因为只有5分钟考虑时间，于是在没有得到苏维埃批准的情况下，他宣布就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同时，他立刻命令释放以社会民主工党议员团为首的全部政治犯，并表示在立宪会议之前暂任司法部长，在此期间确保与政体问题相关的“宣传鼓动的完全自由”。虽然他辞掉了苏维埃副主席的职位，但克伦斯基说道：“对于我来说，没有人民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大家有需要，我准备再次担任副主席。”并且，他表示对临时政府而言“我本人是代表民主主义派的”。最后，他又说道：“请容我向临时政府宣告：我是代表诸位而加入内阁的，且已经获得诸位首肯！”^[48]

436

克伦斯基的这些言论与斯捷克洛夫的汇报内容大相径庭，因此苏汉诺夫理所当然认为克伦斯基在搞“政变”。¹⁴⁹ 参会的代表们却喝彩鼓掌，高喊“我们信任你”“拜托你了”“司法部长万岁”“克伦斯基万岁”等口号，最后众人还把他抬起来，扛进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克伦斯基的个人威信和他的雄辩在此发挥了关键作用。苏维埃代表大会实质上已经认可“让苏维埃副主席代表苏维埃加入临时政府”，这答案已经十分明了。

此后的讨论给人的大致印象就是左派的批判之声非常强烈。据施略普尼柯夫称，布尔什维克党的演讲者们首先批评了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一致之事，接着又对谈判中没有涉及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制问题提出批评。还有人宣读了要求扩大苏维埃权力的提议。¹⁵⁰ 就布尔什维克党人批评的谈判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一致之事，对布尔什维克党持批判态度的拉菲斯表示反对，他反对这种把权力移交给资产阶级的政策，同时还写道，“我要求推翻国家杜马委员会并建立新的临时政府”。他称，正因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去讨论是否加入临时政府的问题了”，讨论的焦点变成了“是推翻它还是支持它”。¹⁵¹ 但是，崩得派的扎斯拉夫斯基和康特罗维奇却写道，布尔什维克党的莫洛托夫和区联派的尤列涅夫虽然反对向临时政府妥协，但并没有直接号召大家组建自己的政府并夺取政权。他们称，因为会场完全被“革命气氛”“激进气氛”笼罩，所以作为支持联合政府的派别，他们只强调支持临时政府，联合执政问题则一概没有涉及。¹⁵²

437 查阅会议记录后发现，会上确实几乎没有人提出采取联合路线、积极参与临时政府的意见。康特罗维奇说道：“革命还没有结束，这才刚刚开始。”另外，他还表示，革命成功与否在于是否能让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和军队团结一心。他强调“不信任会使革命运动分崩离析”¹⁵³。扎斯拉夫斯基也引用“胆怯的乌鸦害怕草丛”

这句话，借此批判三类怀疑论者——认为立宪民主党将垄断权力的人、反对克伦斯基言行的人以及陷入盲目恐慌的人都是“胆怯的乌鸦”。^[54]终于，有两位发言人表达了自己的期待，称“有克伦斯基的加入而形成的政府，将允诺赋予我们一定的自由”，伊瓦诺维奇也表示“我很高兴克伦斯基加入政府”。^[55]孟什维克党的埃尔曼斯基则表示希望通过今后召开的立宪会议来推动解决土地问题。^[56]

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对临时政府比较反感，但其意见也是各种各样。化名为彼得罗夫斯基的施略普尼柯夫说，“作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反对临时政府”，“你们没能以人民的名义建立革命性的临时政府”，此外，他还提及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等应该致力去解决的议题。莫洛托夫则将不满和盘托出：“临时政府毫无革命性，因为古契柯夫、工厂主、罗江科、柯诺瓦洛夫这些人都在临时政府里，他们正在嘲笑人民。这是准备不给农民土地，反而给农民石块吗？”但是，接下来发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修托格却只说道，“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把临时政府当作唯一的合法权力机关，对此我没有理由反对”。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代表尤里亚齐夫在发言中也仅仅表示，我们必须“采用我们自己的战术，也就是从工人苏维埃中建立临时革命政府”^[57]。区联派的尤列涅夫不同意克伦斯基的主张，质疑他有追逐名利的企图，并批评他让古契柯夫成为部长。最后，他仅用一句话简洁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反对临时政府。”^[58]由此可见，在苏维埃内部，丝毫没有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提案。

随后，斯捷克洛夫汇报的议案经过审议后新增了四处关键修改。第一处添加了该条款的“但书”，内容为“即便处于战争状态，临时政府也必须执行所有明文规定的改革措施”，即不允许把处于战争状态作为拖延改革的借口。这一修改也使己方立场稍显强硬。第二处是临时政府的宣言还须让罗江科签字。第三处是增加相关必要条目，

438

承认“民族自治、文化自治”。第四处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成员组成监督委员会，以监察临时政府的一切行动”。^[59]

修改后的议案在大会上通过。会议记录显示，有15票反对。^[60]据施略普尼柯夫称，这次大会有40多名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出席。^[61]而原本就有数名来自区联派和社会革命党左派的代表。也就是说，到最后，有很大一部分左派转而赞成了这项议案。

米留科夫的演讲

代表大会进行到下午3时的時候，米留科夫应叶卡捷琳娜宫金色大厅内民众的要求，就当时正在组建的临时政府发表了演讲：^[62]

我们，正处于伟大的历史性时刻。仅三天前，我们还谨言慎行，我们是卑微的政府反对派，当时的沙俄政府看上去无可匹敌，坚不可摧。然而现在，这个政府已经瓦解，尘封于历史。此外，我们和我们左翼的朋友们通过革命，依靠军队和人民，非常光荣地成为了俄国首届民选内阁的成员。

在座听众欢呼喝彩，掌声经久不息。米留科夫介绍了临时政府的成员。首先介绍了首相李沃夫，称其“一直以来遭到旧政府的无情迫害”，是“全俄地方自治会联盟大会的领头羊”；接着，介绍完司法部长克伦斯基之后，说到由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随后，米留科夫表示，“我知道接下来介绍的一位会遭到大家的反对”，然后详细解释了陆军和海军部长古契柯夫的情况。虽然当他说到古契柯夫“曾是我的政敌”时，台下听众起哄道：“你们明明是好朋友吧。”但
439 听完米留科夫的解释后，很多听众都表示认同。此后，他又介绍了“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工商部长柯诺瓦洛夫和财政部长捷

列先科；接着，又介绍了负责粮食问题的农业部长申加廖夫，最后在介绍交通部长涅克拉索夫时，还特地讽刺他是“特别受左翼同志爱戴的国家杜马副主席”。

在演讲的最后，米留科夫提到了敏感的罗曼诺夫王朝问题。“诸位都很关心王朝问题。我也知道我的回答并不能使诸位都满意。但我还是要做出回应和声明。那个将俄国置于毁灭边缘的旧专制君主要么自愿退位，要么被推翻。”这时台下响起了掌声。但是当米留科夫接着说到“权力将移交给摄政王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时候，大厅瞬间爆发出愤怒的吼叫与喊声，经久不息。当他接着补充说“皇位继承者为阿列克谢”时，大厅内“打倒罗曼诺夫王朝”“这不还是原来的君主专制吗”等奚落之声响彻全场。米留科夫拼命辩解道：“没错，诸位，现在还是之前的王朝。恐怕大家都不喜欢，我也一样。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现在谁喜欢这个王朝。我们只有回应并解决国家政体问题，才能解决王朝问题。我们正在将其规划为议会制君主立宪制。”

虽然米留科夫在表示这个问题最终应该由“立宪会议”来决定后就结束了演讲，但他已经明确宣示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君主立宪制。^[63]

临时政府此前已与苏维埃达成协议，并承认苏维埃新增的附加条件。在此基础上，临时政府的成立得到了苏维埃方面的认可与支持，成立一事已成定局。在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得以确定的同时，一场有关革命性质的重大对立就此爆发。

退位诏书草稿

这一天，最高统帅部正在进行沙皇退位的相关工作。向沙皇提议退位的阿列克谢耶夫要求隶属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外交事务主管 440

尼古拉·巴齐利起草沙皇的退位诏书，为届时沙皇允诺退位做准备。巴齐利事先已经研究过国家基本法和皇位继承法，于是他只用了一个小时便完成了诏书草稿，并将其提交给了阿列克谢耶夫。阿列克谢耶夫只修改了诏书的开头部分，其余内容则保持不变。^[64] 诏书的核心内容如下：

在这个决定俄国未来命运去向的重要日子里，为了俄国能迅速取得胜利，朕认为帮助我国人民团结一心、齐聚力量是朕的道德义务。因此，朕与国家杜马达成共识，朕同意放弃俄国皇位，放弃最高权力。朕将遵从基本法的规定，让朕亲爱的儿子——皇太子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继承皇位。祝福他登上俄国皇位。此外，在他成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朕要求朕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代行帝国摄政王之职。最后想说的是，无论是朕的儿子，还是在他未成年期间担任帝国统治者的人，国事治理都要遵守今后制定的规定，与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毫无罅隙、团结一致。^[65]

这份退位诏书草稿于晚上7时40分送到了普斯科夫的达尼洛夫参谋长手中。^[66] 人事任免通知于晚上9时20分左右公布，召回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伊瓦诺夫，任命科尔尼洛夫接替其职。^[67]

沙皇反悔

听闻沙皇向鲁兹斯基表明了退位之意，沙皇的随从们都愤然反对，皇宫警卫司令沃耶科夫和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列克斯也表示反对。

为了解皇太子阿列克谢的病情，沙皇向御医费奥多罗夫询问。

441 沙皇说：“格里高利·埃菲莫维奇（拉斯普京）总是说皇太子阿列克

谢到了13岁就会痊愈。我和皇后十分信赖格里高利·埃菲莫维奇，因为他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费奥多罗夫明确回答道：“如果陛下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倒是可以对皇太子的全面康复抱有希望，但是在现代医学当中，从未有过此类患者全面康复的先例。先天性血友病患者一生都无法摆脱此病，当前从未有患者成功根治。但即便如此，也可以活几十年。”

据说，沙皇当时表示，“站在朕本人的立场来说，今后想和皇后、亲人在克里米亚利维亚宫生活，如果皇太子的病无法痊愈，朕也想带他一起去”^{◆168}。

然而，俄国历史学家斯皮里多维奇认为，二人的对话还有一段后续。虽然他没有说明信息来源，但他可能参考了费奥多罗夫的其他史料。费奥多罗夫说：“新成立的政府不允许阿列克谢与沙皇和皇后一起生活，恐怕皇太子阿列克谢将与摄政的米哈伊尔大公一起生活。”尼古拉听后大吃一惊：“我明确且坚决声明，我绝不把儿子交到米哈伊尔大公的妻子手中，人们对她的评价十分不好。”¹⁶⁹

米哈伊尔大公的妻子布拉索娃，传言是一名离过两次婚的有犹太血统的女性。由于与布拉索娃结婚，米哈伊尔失去了皇位继承权（参见第1章第53页）。如此看来，尼古拉极力反对皇太子与她一起生活也在情理之中。

两人的这番对话坚定了沙皇将皇位让给米哈伊尔大公、不让儿子继承皇位的想法。但这完全就是胡来。因为按照俄国法律，如果沙皇驾崩，皇太子将自动继承皇位，法律不允许沙皇自行指定皇位继承人。所以，阿列克谢在即位后如果不亲自签署退位文件，皇位

据说，沙皇当时表示…… 来自费奥多罗夫给予马尔蒂伊诺夫的记录本。

就不能传给下一任皇位继承人，因此，尼古拉代替阿列克谢宣布退
442 位无任何法律效力，是不可能的。况且，米哈伊尔大公已被剥夺皇
位继承权。如果沙皇违反皇位继承法，帝制就会分崩离析，尼古拉
就是一位彻头彻尾不负责任的君主。

此后，下午直至晚上，沙皇都未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最新决定。

古契柯夫使节的到来

古契柯夫和舒尔金来得很晚，3月2日晚上10时左右才到达普斯科夫车站，他们乘坐的是车头仅带一节车厢的火车。来自首都的两位代表没有与鲁兹斯基等人事先碰头就进入了沙皇乘坐的火车。晚些被召唤而来的鲁兹斯基和达尼洛夫两位将军进入车厢时，沙皇和古契柯夫一行人正对面坐在餐桌两侧，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列克斯也守在一旁。古契柯夫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表示需要沙皇退位、皇太子阿列克谢即位和米哈伊尔大公摄政。这时，沙皇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朕已在今日下午3时下达了朕要退位的圣旨，这跟之前一样。之前，朕决定将皇位让给皇太子阿列克谢，但考虑到以后的形势，朕改变了主意。现在朕宣布朕和皇太子退位，将皇位让给吾弟米哈伊尔。因为朕想让皇太子和自己一起生活。想必诸位也能体恤驱使朕做出这一决定的心情。”^[70]

听完沙皇的这番话，在场所有人都相当吃惊，但最吃惊的当属白天与沙皇约定让位给皇太子的两位将军。但是，他们并无立场介入这场谈话。达尼洛夫写道：“无论是古契柯夫还是舒尔金都没有提出抗议。”舒尔金则在回忆录中写道：“古契柯夫好像试图反驳些什么。我当时好像表示想和古契柯夫商量一刻钟，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没商量成。于是，我们不得不同意了，如果那也能称为‘同意’的话。”^[71]

古契柯夫在面对巴齐利的取证质询时也辩解了一番。“我尝试过反驳。但意识到我们的论据无足轻重，无论我们同意与否，陛下都会执行他自己的决定，因为他的意志才是最终决定。”^[72]

古契柯夫内心希望沙皇让位给阿列克谢，但他清楚沙皇退位和指定皇位继承人更为重要，因为这关乎他的军事政变路线能否实现。沙皇进入自己的房间修改诏书，20分钟后，他走出房间，将诏书交给了古契柯夫。诏书内容由原来的“朕将遵从基本法的规定，让朕亲爱的儿子——皇太子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继承皇位。祝福他登上俄国皇位”，变更为：“朕因不愿与亲爱的儿子分离，故令朕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继承皇位。祝福他登上俄国皇位”。在誊写诏书期间，古契柯夫请求尼古拉沙皇任命李沃夫公爵为首相，任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最高总司令。沙皇同意了。^{•[73]}

3月2日深夜12时前，沙皇签署了退位诏书和任命李沃夫为首相、尼古拉大公为最高总司令的敕令。^[74]诏书、敕令的签署时间都提前至2日下午3时。^[75]制作多份诏书副本后，其中一份交给了古契柯夫。古契柯夫请求总参谋长把会议结果用电报的方式告知国家杜马委员会主席罗江科。电报具体内容如下：陛下……承诺退位，将皇位让与米哈伊尔大公。建立新政府的任务将交给李沃夫公爵，同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将被任命为最高总司令。诏书将立即公布。^[76]

这份诏书十分重要。沙皇命令由李沃夫建立新政府，并任命了最高总司令，指定了皇位继承人后退位。制度依旧是君主制。古契

沙皇同意了 来自古契柯夫署名的证词。

柯夫的这份电报通过最高统帅部传向塔夫利宫，另外，最高统帅部还将沙皇的诏书用电报传给了各方面军最高统帅部、莫斯科军区长官、海军军令部以及各省长官。^[77]

古契柯夫一行人乘坐的列车从普斯科夫站驶离。3月3日凌晨1444 时，已经退位的沙皇所乘坐的列车开始驶向莫吉廖夫站。尼古拉让沃耶科夫在列车开动后过来找他。当沃耶科夫来到尼古拉的车厢时，车厢里只有神像前的灯微微亮着。在黑暗中等待的尼古拉紧紧抱住了沃耶科夫，哭了起来。^[78]

沙皇在这趟列车上写下了3月2日的日记：

早上鲁兹斯基来了，我听他读了他与罗江科之间通过休斯印字电报机收发的极长的通信记录。据他所说，就连由国家杜马组建的内阁都对彼得格勒目前的形势无能为力，社会民主党正以工人委员会的形式发动攻势，因此我必须退位。鲁兹斯基把这段通信记录转发给最高统帅部，阿列克谢耶夫用电报通知了各个方面军司令。下午2时半之前，全体司令都予以了回复，回复的核心意见都是，要想拯救俄国，稳定前线军心，退位是唯一选择。我同意了。最高统帅部送来了诏书草稿。傍晚，古契柯夫和舒尔金从彼得格勒来到普斯科夫站。在与他们谈判后，我重写了一份诏书，签署后交给了他们。凌晨1时，因这一切而心情沉重的我坐上了从普斯科夫站出发的列车。我的身边充斥着背叛、怯懦和欺骗。^[79]

废除沙皇专制统治

凌晨3时，沙皇决定让位给米哈伊尔的消息传到首都。留在塔夫利宫的临时政府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深切意识到王朝问题会

被提及。临时政府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有关人员进行磋商后，决议必须确认诏书的内容。罗江科和李沃夫首相前往陆军部，在休斯印字电报机前等待来自最高统帅部的消息。^[80]留在塔夫利宫的人当中，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和米留科夫聚集到了一起。涅克拉索夫给米留科夫看了一张写着“走共和国之路”的纸条。克伦斯基抓着米留科夫的手腕，征求他的意见。米留科夫愤而将纸条扔掉，并怒斥涅克拉索夫。克伦斯基大吃一惊，把手松开。^[81]他们的分歧显而易见。承认沙皇的权威，让沙皇任命首相并接受退位和让位，是致力于将国体改为君主立宪制、把革命活动扭曲为军事政变的一条道路。与此相对，拒绝接受沙皇的诏书、否认沙皇让位，是废除帝制、走向共和的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另一条道路。米留科夫支持前者，而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以及柯诺瓦洛夫主张后者。

3月3日早上6时，前往陆军部的罗江科和李沃夫请求最高统帅部暂缓颁布沙皇退位诏书。罗江科对最高统帅部的阿列克谢耶夫说：“该提议可能招致内乱，很多人并不接受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个皇储。我们本来提议由皇太子继位，关于这一点还未达成协议，所以当前只能说是立即休战。有人建议我们应立即召集立宪会议，并在那之前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内阁大臣会议暂负执政之责。”^[82]

阿列克谢耶夫虽然同意延迟颁布诏书，但他提出抗议：“阁下所告，实在难以令人欣然接受。今后风云莫测的形势和在立宪会议上进行决议二事，对现役军人来说无异于两件危险的玩物。”^[83]

但是迫于形势，早上6时45分，阿列克谢耶夫不得不立即行动，请求延期颁布诏书。^[84]

8时45分，罗江科和李沃夫还与鲁兹斯基进行了电报交流。对于鲁兹斯基的抗议，罗江科表示，“一场我们没有预想到的、空前绝后的士兵暴动爆发了，他们高喊‘给我们土地和自由’‘推翻王

朝’‘打倒罗曼诺夫家族’‘打倒军官’”，但这其实都是罗江科编造的谎言，他想以此威胁鲁兹斯基，从而压制他。此外，他还说，与工人和士兵代表进行长期谈判后最终达成一致，双方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在会上决定政体问题。^[85]

446 鲁兹斯基问罗江科：“既然如此，可以公开任命尼古拉大公为最高总司令吗？”罗江科对此表示不反对。^[86]

临时政府宣布成立

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公布于3月3日早上发行的杜马公报之中。除了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协商后确定的协议文本内容，临时政府成员的名单也一同登载于公报中。与此同时，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第四期也刊登了苏维埃的声明。^[87]

首相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

外交部长：米留科夫（立宪民主党）

陆军和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十月党）

交通部长：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左翼）

工商部长：柯诺瓦洛夫（进步同盟）

财政部长：捷列先科

教育部长：马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

东正教事务管理局总监：弗·尼·李沃夫（十月党、民族派）

农业部长：申加廖夫（立宪民主党）

司法部长：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

不知为何，这份政府成员名单中没有劳动部长齐赫泽与国家监察总局的戈德涅夫的名字。



上：正式公布的临时政府宣传海报

下：左起为农业部长申加廖夫、教育部长马努伊洛夫、东正教事务管理局总监弗·尼·李沃夫



447

临时政府领导层中，属于进步同盟主流派的成员有4人（米留科夫、申加廖夫、马努伊洛夫、戈德涅夫），属于反对派的成员有4人（柯诺瓦洛夫、涅克拉索夫、克伦斯基、齐赫泽）。除了杜马议员以外，首相兼内务部长李沃夫、财政部长捷列先科、教育部长马努伊洛夫偏向反对派，陆军和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则偏向进步同盟主流派。这意味着政府高层成员形成了6对7的格局。按照他们对当时君主专制制度的态度来分类，算上李沃夫首相，君主立宪派即军事政变派的成员共7人；而支持共和派即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派的共有5人。马努伊洛夫的政治取向不明。

说服米哈伊尔大公

3月3日早上6时，克伦斯基打电话给米哈伊尔大公，请求一个小时后到访。而临时政府官员的实际到访时间是9时半。古契柯夫等人10时回到首都的波罗的海车站时，接到一通电话后被直接叫到了米哈伊尔大公的住所。参加这次拜访的人有罗江科、李沃夫（首相）、涅克拉索夫、克伦斯基、米留科夫、柯诺瓦洛夫、申加廖夫、戈德涅夫、卡拉洛夫等人，之后古契柯夫和舒尔金也加入其中。在临时政府成员中，捷列先科、马努伊洛夫、弗·尼·李沃夫、齐赫泽4人是否出席尚不清楚。♦

参加这次拜访的人有…… 关于本次会议的史料，主要有古契柯夫的署名证词（Nicolas de Basily, *Diplomat of Imperial Russia 1903-1907: Memoir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1973, pp.143-145），安德烈·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于1917年3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的在场者卡拉洛夫的讲述（*Istchnik*, 1998, No.3, pp.53-54），同样记录下出席人员讲述内容的法国大使1917年3月4日的日记（M. Paleologue, *La Russie des tsars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Tome III, pp.240-247）以及舒尔金的回忆（V. V. Shul'gin, *Dni*, Leningrad, 1925, p.103. Moscow, 1989, pp.271-274）。

罗江科、李沃夫（首相）、克伦斯基和柯诺瓦洛夫认为米哈伊尔大公不该即位。米留科夫极力主张米哈伊尔大公应当即位。据舒尔金说，克伦斯基说了以下这番话。

“殿下，我信仰共和主义，反对君主制。然而，我现在……”克伦斯基说到这里欲言又止，“请原谅我作为一名俄罗斯人向俄罗斯人说出如此话语。米留科夫是错的。殿下即位是无法拯救俄罗斯帝国的。我不赞成殿下即位。我深知工人和士兵们的感受。他们对君主制强烈不满。正因如此，才会发生流血暴动、王朝覆灭。……请您三思。为了俄罗斯帝国，还请您做出牺牲。……无论怎样，我连殿下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88]

古契柯夫能清楚地回忆起^[89]柯诺瓦洛夫对罗江科（的意见）给予了积极支持。大多数人都认为米哈伊尔大公不应该即位，主张大公应该即位的只有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两人。争论久久没有结果，米哈伊尔大公提出想去别的房间独自思考，随后，米哈伊尔大公又折回来说想听听罗江科和首相李沃夫的意见。最后他回到房间称“决定不即位”，并哭了起来。^[90]古契柯夫的政治路线以失败告终，他留下“诸位，我无法追随你们了。你们正在将国家引向灭亡”的话后离开了房间。克伦斯基追了出去，说服古契柯夫暂时留任。^[91]

米留科夫离开后，剩下的人就米哈伊尔大公应公布的文书进行了商议。涅克拉索夫展示了他准备好的文书草稿。如果让涅克拉索夫执笔，他必会按照自己主张的革命路线来撰写。舒尔金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认为涅克拉索夫的文书内容不妥，并提出修改意见。最终，涅克拉索夫、克伦斯基以及舒尔金三人受委托修订文书。然而，大家此时已疲惫不堪，无法继续修订，因此舒尔金与首相李沃夫商议后，决定请立宪民主党党内干部兼法律方面的专家纳博科夫参与文书的修改工作。^[92]

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一起乘雪橇离开了。米留科夫已暗自在心

中决定继续支持临时政府，但自己不参与其中。两人商量此事时，感到彼此的想法不谋而合。^[93] 首相李沃夫察觉到不只是古契柯夫，米留科夫也决意辞去政府职位。古契柯夫由于被士兵憎恨，不得不辞职，但首相李沃夫认为米留科夫对于政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思索着劝说他继续担任政府职务。

接到命令的纳博科夫赶到米哈伊尔大公的住所时已是下午3时左右。首相李沃夫要求纳博科夫首先劝说米留科夫打消其辞职的想法。纳博科夫接受了这项任务，但他认为应首先写好米哈伊尔大公的备忘录。纳博科夫还建议为了商议文件的具体内容，最好能得到法律领域专家鲍里斯·诺里杰教授的协助，并打电话邀请了他。^[94]

米哈伊尔大公的备忘录

纳博科夫是前司法大臣的儿子，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至1906年担任皇家法律学校刑法专业的教授，于1906年加入立宪民主党，任党委副主席，并长期从事机关报《言语报》的编辑工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退出政界，曾服务于军队。鲍里斯·诺里杰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裔男爵，曾在圣彼得堡帝国大学学习国际法，并在皇村中学、别斯图热夫女子学院*、综合技术高专执教，曾在战争期间担任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的顾问。^[95] 这两人清楚地认识到，按照沙俄国家基本法，沙皇让位于皇太子、令皇太子退位并让位于米哈伊尔大公的一系列行为是违法的。然而在撰写米哈伊尔大公拒绝继承皇位的相关文书时，他们致力于明确规定即将诞生的临时政府的权力边界，并且将立法权纳入政府职能。他们因此自以为荣，纳

* 别斯图热夫女子学院：1878年创立的俄国第一所女子学校，以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别斯图热夫·留明的名字命名。

博科夫称这份文书为“历史性的文书”，鲍里斯称其为“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唯一的宪法”。修改文书的工作直到傍晚才结束。米哈伊尔大公审阅了文书原稿并做了少许修改确认后，由纳博科夫誊写。这时，罗江科抵达现场，在其见证下，米哈伊尔大公签署了文书。罗江科拥抱米哈伊尔大公，并称赞说：“您真是高洁傲岸之人。”3月3日下午6时，纳博科夫将文书带到塔夫利宫给米留科夫过目，获得了米留科夫的批准。^[96]

451

这份备忘录与沙皇退位诏书一起刊载在3月4日的早报上。^[97]

这一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战争和民众动乱，我的哥哥也将俄国皇位的重担托付给了我。与全国人民一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祖国的幸福。因此，只有当伟大的人民通过其代表以全民公投的形式表明意愿时，我才会下决心接受这份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伟大的人民需要在立宪会议中由人民代表举行全体投票，以确定新俄国的国家治理形态和基本法。

俄国所有公民在国家杜马的组织下，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按照普选、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召开立宪会议，通过投票明确人民意志，决定国家治理形态。在此期间，我将服从于被赋予全权的临时政府，诉诸神灵并请求神的祝福。

452

这份备忘录是米哈伊尔大公拒绝继承皇位的声明，代表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终结。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被俄国革命推翻，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份备忘录提到：必须通过召开立宪会议决定俄国的治理形态，在此之前需要全体国民服从于“由国家杜马组织建立、赋予全权的临时政府”，这只是拒绝继承皇位的“我个人的愿望”。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纳博科夫与诺里杰打算在备忘录上写明临时政府可依据



因推翻专制而喜出望外的前线士兵们

的法律基础，然而，这种行为是毫无法律效力的。

米留科夫与古契柯夫放弃辞职

米留科夫回到家后，足足睡了5个小时。傍晚时分，申加廖夫等立宪民主党的重要成员来访，劝说他不要辞去临时政府的职位。最后，纳博科夫也带着米哈伊尔大公备忘录的草案来访，劝说他留在政府。于是，米留科夫改变了主意。^[98]

与此同时，由于古契柯夫此前表示要辞去陆海军部长一职，涅克拉索夫便联系了恩格勒格特并拜托他来做陆海军部长。而恩格勒格特在前一天凌晨5时与古契柯夫发生冲突后，就立即辞去了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返回家中，所以感到很为难。^[99]但古契柯夫在傍晚前改

变主意，决定留任陆海军部长。所以，提拔恩格勒格特为陆海军部长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古契柯夫将米哈伊尔大公拒绝继承皇位的消息告知了最高统帅部。3月3日傍晚将近6时，古契柯夫用休斯印字电报机联系了最高统帅部的阿列克谢耶夫^[100]，告诉后者自己和米留科夫的提议被否决、米哈伊尔大公已经拒绝继承皇位一事，希望得到他的理解。阿列克谢耶夫着急地说：“你们怎么就不能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说服大公继承皇位呢？”他强调米哈伊尔大公继位对保护整个军队至关重要，“现在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对军队来说毫无用处，不仅危害国家，还会危害彼得格勒”。古契柯夫虽然表示赞同阿列克谢耶夫的想法，但还是说：“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老老实实在地去完善新的体制，以避免给全军带来重大损失。”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3月4日，阿列克谢耶夫把沙皇的退位诏书和米哈伊尔大公的备忘录交给方面军司令并指示道^[101]：“俄国正与强大的敌人决一死战……所有的士兵都应有必胜的决心，请务必全力防止任何内部矛盾的激化。”为了继续参与世界大战，军方最终接受了革命。

就这样，临时政府的成员最终稳定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但这些成员之中还有人不知道自己是根据哪条相关规定来制定法律的。3月3日，在国家杜马临时政府的办公室内，诺里杰从农业部长申



1917年的明信片——“翘首以盼的专制垮台”

加廖夫和戈德涅夫处听到立法依据是国家基本法第87条——“国家杜马休会期间，最高权力者可以制定法律”——后大吃一惊。^{〔102〕}临时政府中位高权重的成员竟都尚未意识到革命已经成功，自己已经被赋予了权力。

革命胜利的日子 455

为在二月革命中牺牲的市民举办的葬礼。

“我们将铭记为自由献出生命的战士”



革命期间，首都最令人震撼的是一次火攻。位于科洛姆纳区的立陶宛城堡监狱和坐落于利特尼大道的地方法院被付之一炬。华美的建筑被烈焰吞噬，一切暴行的痕迹都随之湮灭。冬宫的屋顶红旗飘飘。革命总部、国家杜马大楼、塔夫利宫皆被皑皑白雪覆盖。在涅瓦大街的建筑顶层，反革命派曾用机枪狙击下方的路人，如今这样恶劣的暴行终被肃清。市民们在市区里的街道上漫步就像做梦一般不切实际。士兵们每天都挤在红旗飘飘的卡车上巡游首都。每个人都沉醉在革命带来的奇迹中。^{◆[1]}

1917年3月4日，政府发表了沙皇退位诏书、米哈伊尔大公拒绝即位的备忘录以及新政府首相李沃夫对于这些文件的说明。这些文件首先在首都和莫斯科传播开来，然后传至全国各地。几乎所有人都喜极而泣。有些人告诉自己，不能太高兴，必须保持冷静。当然，也有人气到颤抖，甚至还有人因太过绝望而选择了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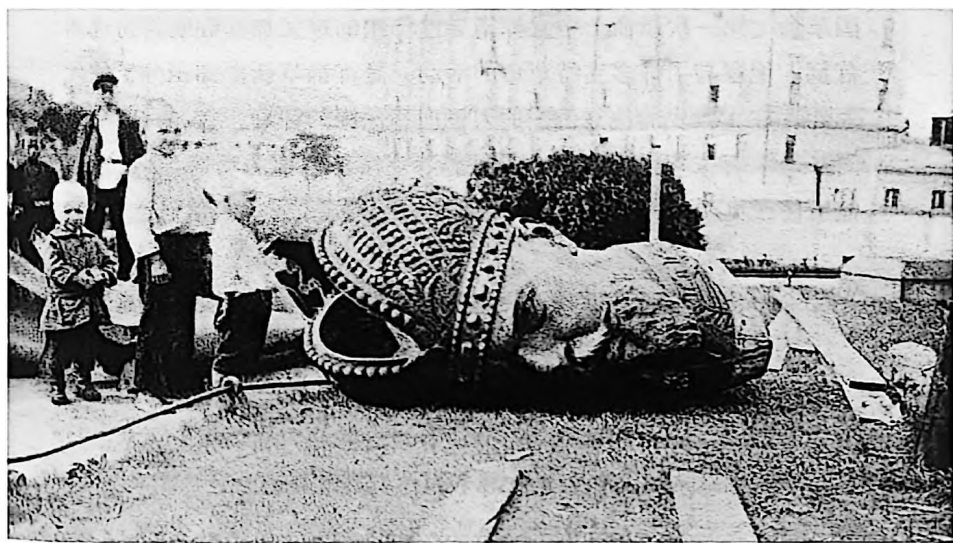
吉霍米洛夫曾任政府系右翼报纸《莫斯科新闻》的主编，他年轻的时候曾是组织暗杀沙皇的恐怖主义革命党理论家，后遭流放，65岁时才被允许回国。他回国后住在莫斯科，成为一名普通作家。他关注着俄罗斯帝国的政治，对尼古拉二世的政治统治感到绝望。在3月2日的日记中，他陈述了对于临时政府成立的感想。

每个人都沉醉在革命带来的奇迹中 此处参考了居住在彼得格勒的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当时37岁）1917年3月23日寄给母亲的信中的内容。



上：二月革命胜利后利特尼大道上的革命士兵

下：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之父）雕像的头部被砍。二月革命点燃了群众对君主专制统治的不满，各地的历代沙皇雕像被捣毁。这是位于莫斯科的雕像



显然，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这次变革。所有人都厌倦了忧心俄罗斯帝国命运的日子。不幸的沙皇，将是最后一任沙皇了。但是，我认为实施君主立宪制更为实际。如今这个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倘若沙皇的行为引起了民愤，其专制统治自然无法实现。……现在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存续。……如果之前的统治力量仍有残存，那么这场变革本应由他们推行。但现实却将其引向另一条路。如果新政府真是天意所授，我希望它坚如磐石，牢不可破。^[2]

458 当天，当吉霍米洛夫从莫斯科的家中给谢尔吉耶夫镇波萨德市的家人打电话时，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和他的女儿娜杰日达高兴得忘乎所以，他女儿在电话里大喊“变革万岁”。吉霍米洛夫想：“如果临时政府强大稳固的话（显然毫无疑问），尼古拉二世的倒台将受到全俄国的欢迎。”^[3]

作家高尔基多年来一直参与革命运动，比如帮助曾在1905年俄国革命（第一次革命）中发挥指导性作用的神父加邦乔装扮逃离首都。他参与了许多支持革命的活动，是首都革新派知识分子的代表性存在。49岁的他对俄国的人民抱有深深的怀疑。在二月革命期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静静观察着首都的动荡。3月1日，他给住在莫斯科的前妻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寄了一封信。

现在，正发生着一起表面声势浩大，时而也会令人感动的事件。但其意义并不像每个人看到的那么深远。我对此充满了怀疑。当然，当看到与随军乐队一起向国家杜马进军的士兵们，我还是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我无法信任所谓的革命军队。似乎许多人都认为松散的纪律和组织就是革命的特性。^[4]

下面是3月11日的信，语气差不多，
但比上一封稍微乐观一些。

情况非常复杂和危险。在新形势下，“反对战争”是一个愚蠢的口号。因为德国的胜利是反动派的胜利，人们不应该对士兵抱有期待，他们也不过是穿上了军装的愚蠢俄国百姓。他们不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也不能迅速理解其含义。所以，我正考虑通过社会民主工党派的报纸、大报刊和右派报纸发起倡议，告诉众人我们必须建立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政府还是以前的人在统治，这些人里只有三个人有能力：首相李沃夫、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然而，仅靠他们的力量，国家无法取得长远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给他们以支撑。^[5]



作家高尔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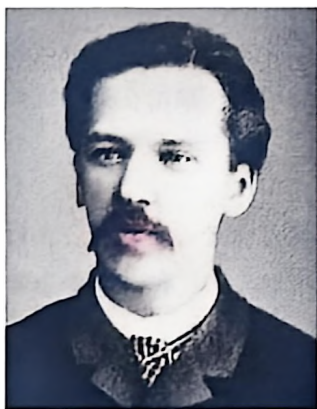
唯一对废除君主专制制度感到愤怒的人是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3月3日，皇后咬牙切齿地从皇村的宫殿给在最高统帅部的尼古拉寄了一封信。

我感到四周一片漆黑，但上帝一定凌驾于众生之上。我们不知道神之道，也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们，但是上帝会听见所有人的祈祷。

……新的、令人发狂的消息不断传来。最新的消息是，陛下您离开了已经稳坐二十三年的位置。有人碰到这种事会失去理智，但我们没有。因为理性使我们相信，即便如此，仍然有

光明的未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刚才，保罗（大公）过来告诉了我一切。我完全理解你的做法。啊，我的英雄。我知道你不会违反你在加冕仪式所立誓言文件上的签字。我们彼此完全了解，无须语言明说。我以生命起誓，你会在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下重返皇位，使帝国重现荣耀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因为，你拯救了你儿子的帝国，也拯救了这个国家和你的圣洁。（鲁兹斯基如同犹大）你将在这片土地上，在自己的国家，接受上帝的加冕。¹⁶¹

460 前莫斯科安保部长祖巴托夫，是唯一一位为人所知的为君主专制制度陪葬的人。他是将神父加邦推向政治舞台的“警察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当时，祖巴托夫已离开警界很长一段时间，53岁的他生活在莫斯科，仍然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据说，他在吃饭时得知米哈伊尔大公拒绝继承皇位的消息后，突然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间饮弹自尽。¹⁷¹



前莫斯科安保部长祖巴托夫在听到君主专制政体崩溃后用手枪自尽

除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波罗的海舰队最高统帅部所在地赫尔辛福斯发生的悲剧也震动全国。前面已经说过，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涅佩宁早已于3月1日下午4时30分宣布支持革命、支持国家杜马。3月3日凌晨4时，新政府下达了逮捕芬兰总督泽恩的命令，与此同时，末代沙皇任命李沃夫公爵为首相、尼古拉大公为最高总司令的消息也传播开来。5时以后，最高统帅部的一位开明军官伦加鲁登在日记中

写道：“就这样我们迎来了自由的、伟大的俄罗斯新生活的曙光。”沙皇退位诏书也在早上7时20分被宣读。然而，30分钟后，他们又接到了暂缓发布诏书的命令。^[9]这引发了严重混乱。这天下午3时半，水兵们开始惶恐不安。下午6时半时，“大家神经越来越紧绷，到处都能听到发生骚乱的谣言”。过了晚上7时，司令涅佩宁向水兵们发表演讲，表示支持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他说：“统治着这个国家的人是恶魔，我一贯这么说。”^[9]但那天晚上，水兵们的暴动升级。有军官被他们抓走，甚至被处死。3月4日凌晨，零点后，涅佩宁和水兵代表进行了谈判。涅佩宁精疲力竭，忍无可忍，他直截了当地说：“杀害军官是地痞流氓的做法，朝天鸣枪是怯懦的表现。我鄙视这种怯懦行动，我无所畏惧。”这使得司令和水兵们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黎明时分，克伦斯基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水兵们能够服从司令涅佩宁的命令，因为涅佩宁长官承认临时政府。^[10]3月4日，政府公461
布了沙皇的退位诏书和米哈伊尔大公拒绝继承皇位的备忘录。然而，赫尔辛福斯的悲剧迎来了最糟糕的时刻。3月4天亮之后，上午11时40分，水兵们推选马克西莫夫中将做舰队总司令，取代原来的司令涅佩宁。涅佩宁虽然表示同意，但也称这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下午1时45分，涅佩宁被水兵们押走并处死。其余军官也均被押走，幸存的只有伦加鲁登与其同伴。下午3时35分，古契柯夫部长批准马克西莫夫中将担任波罗的海舰队新司令。^[11]

但是，与赫尔辛福斯地区不同，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平静地接受了变革。在前几年爆发了令人生畏的叛乱事件的中亚塔什干地区，土耳其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在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沙皇陛下退位之后，李沃夫公爵担任首相（由国会执行委员会选出）。李沃夫内阁因为有文书证明而变得名正言顺。古契柯夫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应沙皇陛下要求，所有地区都要服从

新政府的领导。到此时为止处处都还是一片秩序井然的景象。军队没有反抗，被纳入到新建立的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体系下。我，一位对俄罗斯帝国新制度深有共鸣的老公务员，仍然很难背弃所立下的誓言。但我的决定只关乎我自己，而军队和人民在沙皇权力被暴力倾覆的时候就应该已经认可了新政府。现如今，我已经可以保持一颗平常心为我的国家工作，眼下，这也算顺应了新政府的意图。¹¹²¹

462 大赦及废除旧政权的压迫

3月3日，临时政府宣布政府活动的诸项原则，第一条是“立即赦免所有政治犯和宗教犯（包括因恐怖活动、军队哗变、农村暴动等的被捕者）”，第二条是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罢工自由”。当首都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以及临时政府诞生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时，俄罗斯帝国所有地方的监狱和劳改营大门大开，政治犯重获自由，服刑期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城镇和村落的多数前政治犯也以自由公民的身份开始生活。全国人民摆脱了君主专制国家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和监视，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因此，二月革命第一个任务“大赦”和第二个任务“政治自由”瞬间得以实现。临时政府于3月6日正式颁布大赦令。司法部长克伦斯基于3月7日发布指令，要求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立即释放政治犯和宗教犯。¹¹³¹

采勒切利是一名流放囚犯，住在距离伊尔库茨克60公里的一个贫寒村庄。他曾是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工党议员，于3月2日被叫到伊尔库茨克，得知了首都革命的消息。在这里，一位孟什维克的重要干部丹以及社会革命党的干部艾弗拉姆·戈茨合作组建了伊尔库茨克社会团体委员会、工人苏维埃以及军人组织，实现了伊尔

库茨克的革命。3月15日过后，他们就登上专列奔赴首都。^[14]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比伊尔库茨克位置还要靠西，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加米涅夫、斯大林以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穆拉诺夫被流放到距该地130公里处的阿钦斯克。这三人没有在当地开展活动，而是在3月12日回到了首都。^[15]

之后就是流亡国外的政治家和革命者的回归。3月只有少数人回国，包括社会革命党左派的卡姆科夫和孟什维克最强硬的国防派普列汉诺夫。大部队于4月返回。

463

因革命大赦，许多政治犯被释放，但前政权官员、军队人员和高级官员却被逮捕。所以，临时政府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这些被转移到彼得保罗要塞的新囚犯。这个难题落在了司法部长克伦斯基身上。他采取的策略是，不进行革命审判，而是以革命之名盘问旧政权相关官员，揭露专制势力犯罪的真相。3月5日，临时政府发布了^[16]一项决定，称“将设立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前部长、市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在任职期间的非法行为”。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判定无须接受审讯。3月11日，通过了成立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法案，该委员会主席的地位等同于司法部副部长，另设两名委员会副主席，再加四名成员共同组成该委员会。^[17]

委员会主席由莫斯科的资深人权律师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担任。副主席为元老院（参议院）法官伊瓦诺夫和扎瓦茨基，委员会成员包括军事检察总长阿普希金，哈尔科夫高等法院检察官苏米斯钦，克伦斯基的心腹、



人权律师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曾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

社会革命党骨干森吉诺夫。后来，在对内务部警卫安保局的调查开始后，历史学家晓戈列夫也加入了委员会。罗季切夫代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人权律师索科洛夫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加入了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还有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18]

临时政府接连颁布了废除君主专制政府的监控制度、废除和撤销压迫人民的法律条款与机构等决议。临时政府首先在3月4日解除全国各省省长和副省长的职务，改为任命各地方自治机构的参事会主席为临时政府省特派专员，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事务。^[19]此外，临时政府在3月12日废除了死刑。政府规定：“现行民事刑法及陆海军刑法中，因刑事处罚而判定为死刑的所有案件，一律替换为无期或有期徒刑。”^[20]这意味着军事法庭不能再做死刑判决，这是战争期间划时代的一个决定，让士兵们欣喜异常，但对军方而言，这一决定是致命的。

废除旧政权的监控制度、撤销压迫机构等决议也立即开始执行。首先，3月10日，内务部直属的秘密警察机构警卫安保局被裁撤^[21]，接着警卫安保局的下属机构——全国26个安保部也被撤销。大多数秘密特工都停止了活动。3月14日，巴黎的驻外代表安保部关闭。^[22]3月19日，属沙皇暴力机器核心的宪兵团被正式解散。^[23]

临时政府宣布战争方针

由于革命发生在世界大战期间，掌权的临时政府必须向人民和盟国阐明其战争基本政策。新任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对此倾注了极大心力。3月4日，他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向俄国驻外使馆发送电报，传达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在电报中明确表示新内阁会“继续履行旧体制允诺的国际义务，忠实践行俄国做过的承诺”，俄国虽“不愿

战争发生”，但是“一定会击破掠夺性种族不可饶恕的妄想侵占邻国的征服计划”，俄国会同“光荣的盟国”一起，“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同我们共同的敌人战斗到最后”。^[24]这则声明的出台其实是米留科夫独断专行的结果。

米留科夫必然强力推动了政府正式宣布战争方针。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政府通过了发布《告全体国民书》的决议。《告全体国民书》的起草工作由涅克拉索夫负责。^[25]涅克拉索夫将起草工作托付给了参与起草米哈伊尔大公备忘录的纳博科夫和自由主义法学家拉扎列夫斯基、立宪民主党议员多布罗沃利斯基三人，并于第二天在临时政府的内阁会议上公布了拟好的初稿。但是，由于教育部长马努伊洛夫的反对，初稿并没有通过。于是，马努伊洛夫代替他继续这项工作，要求立宪民主党议员科科什金和维那维尔起草新声明。新声明被称为“马努伊洛夫方案”，但实际上由维那维尔执笔起草。该声明通过了内阁审议。政府将在3月6日发表这份《告全体国民书》。^[26] 465

该声明以“俄罗斯帝国的所有居民”开头，是宣布临时政府将继续战争的宣言。由于“俄罗斯人民的奋起”，“一个新的自由的俄罗斯诞生了”，“多年斗争终于取得了成果”。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国家被专横跋扈、恣意妄为之流所桎梏”，动弹不得。因此，人民终于站了起来，把权力握在自己手中，是人民的爆发和国家杜马的决心创造了临时政府。“政府坚信，人民在与旧政权的斗争中展现出来的高水准的爱国主义精神，会激励我们战斗在战争前线的勇敢士兵。政府也会尽全力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一切必要的保障，直到战争胜利。政府一定会如同守护神物般守护其他强国同我们的联盟，坚定履行和盟国之间的协定。”^[27]

这份声明充分展现了立宪民主党主流派成员、外交部长米留科夫支持二月的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心路历程。他主张：为取得战争（“一战”）胜利，有必要进行革命。他认为，临时政府可以通过革命

获取俄国军队和全国各地市民的支持。但是，在领导了革命的涅克拉索夫和克伦斯基等人看来，革命民众和工人士兵的反战立场才是一个重要事实。如何协调政府的战争方针和人民的反战诉求之间的矛盾，是临时政府必须去深思熟虑的问题。然而，在这份声明公布之际，临时政府似乎已经没有余力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临时政府的声明使协约国松了一口气。3月9日（公历2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临时政府。3月11日（公历2月26日），驻俄国的英、法、意大使一同造访临时政府，表示本国政府正式承认临时政府。英国大使布坎南致辞：“现在，俄国进入了一个发展和辉煌的新时代，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466 关注德国。因为德国的胜利将意味着俄国人民为自由建立的雄伟纪念碑轰然倒塌。大英帝国坚信，在取得战争最后胜利之前，临时政府一定会忠实地履行先行者承担的义务，包括努力维持秩序、促进人民团结、恢复工厂运转、恢复军队训练以及维持法纪法规，会竭尽全力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应该为临时政府提供帮助。”外交部长米留科夫表示感谢，并承诺会遵守与协约国之间的约定，发誓将会“坚持战斗，直到取得最终胜利”^[28]。

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未保持沉默。此时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苏汉诺夫和斯捷克洛夫的牵头下，正在准备他们自己的宣言——《告全世界人民书》。对他们来说，临时政府发表“坚持战斗，直到取得最终胜利”的声明早已在意料之中。他们要考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应该表明什么样的立场。3月14日，宣言草案拟提交至苏维埃全体大会审议表决。身为报告人的苏汉诺夫由于未能调配到前往海军军校会场的车，在大会延至下午6时开始后依然没有抵达会场，所以，紧急改由斯捷克洛夫代替前者进行汇报，大会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份宣言。^[29] 苏维埃宣言的开头部分如下：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工人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是集结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旗下的俄国工人和士兵。我们向你们致以炽热的革命敬礼，并向诸位郑重宣告这项伟大的历史变革。俄罗斯的民主主义力量彻底粉碎了持续数个世纪的沙皇专制暴政！如今，我们完全成为诸位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与诸位共同致力于解放斗争的一股强大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我们取得的胜利，就是全世界自由及民主主义取得的伟大胜利。^[30]

俄罗斯人民即将享受“完整的政治自由”，马上可以在外交事务中阐明自己的主张。宣言中说道：“战争犹如洪水猛兽般席卷而来，让各位无家可归、疲惫不堪。诸位，我们在此郑重声明！与所有国家 467 和政府的侵略野心做坚决斗争的时刻到来了！我们每个人自己把握战争与和平的时刻到来了！”

该宣言直接向奥匈帝国的无产阶级发出呼吁，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过去，你们被告知要为捍卫欧洲文化免遭东方专制政治侵蚀而战”，但是现在内容已有所变化。“目前，这种企图将战争正当化的说辞已经彻底破产，民主的俄罗斯绝不会成为自由和文明的威胁。”这份宣言彰显出苏维埃对战争的态度，内容如下：

无论威胁来自内部还是外部，我们必定毅然决然地保护自身自由不受一切反动的侵略行为侵害。俄罗斯革命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枪支炮弹，决不任由外部军事强权蹂躏践踏。但是，我们在此向你们郑重呼吁：……各位！快挣脱半专制制度的桎梏吧！不要再充当君王、地主和银行家手中发动侵略和实施暴行的工具！让我们齐心协力终止这场践踏人类尊严……的滔天屠杀！

遭遇袭击时，我们将坚决自卫。但是，我们再也不会主动发起攻击，沦为侵略的工具。我们更要向敌军将士呼吁：请你们也这样做！在1916年的秋天，士兵们曾用生命呐喊：“我们拒绝攻击”，“我们只求守护阵地，决不主动出击”，“我们决不前推战线，也决不会在德国军队面前后退半分”，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语已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向世界发出的第一波宣言。

在讨论中，由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选举出的高级军官担心发生军事冲突，提出了反对意见。一名军官认为决议的内容本身很好，但从与德国对峙的严峻形势来看，此提案时机尚不成熟。还有一名军人表示，此项决议作为一个建议无可厚非，但也不过是“荒野中响起的弱小之声”。由于只有3名军官反对，其他人均表示赞成，因此该决议予以通过。^[31]苏维埃宣言获得了广泛支持，诗人吉皮乌斯也在日记中评价道：“非常不错……本质理念和我的想法非常相似。”
468 对于宣言中主张的“不割地，不赔款”以及“不急于‘反对战争’”这两点，她深表赞同。^[32]

但如何协调临时政府声明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宣言之间的分歧，成了一项亟待解决的难题。

逮捕沙皇一家

双方对待战争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在他们着手解决这个难题之前，沙皇及其家人被捕一事令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的关系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沙皇在退位诏书上签名之后，于3月3日凌晨1时从普斯科夫车站出发，前往位于莫吉廖夫的最高统帅部。此时，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首次通过了关于逮捕尼古拉和其他罗曼诺夫家族成员的决议。决议内容为：苏维埃决定逮捕末代沙皇，并向临时政府申请

进行联合抓捕，但即使临时政府拒绝本提议，苏维埃也会单独行动。具体来说，米哈伊尔大公在形式上由军队监视控制，实际上进行逮捕；传唤人在高加索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至首都并将其逮捕；对皇室女性成员采取渐进式处置措施等。

3月3日晚上11时，末代沙皇乘坐的火车抵达莫吉廖夫。最高统帅部所在城市的建筑上早已经插上了象征革命的红旗。4日上午10时，阿列克谢耶夫总参谋长命令莫吉廖夫卫戍部队的所有人员于广场集合，宣布了沙皇退位、米哈伊尔大公拒绝继承皇位以及临时政府已经成立等事宜，他的讲话中提到了“新时代”和“自由”等词语。随后，尼古拉也抵达最高统帅部并听取了阿列克谢耶夫的报告。^[34]

同一天，尼古拉向阿列克谢耶夫提出，他愿意与临时政府谈判，希望临时政府保证他一路通畅地抵达皇村，允许孩子们待在同一个地方直到恢复健康，并要求在战争结束后定居在克里米亚。^[35]阿列克谢耶夫立即将尼古拉的诉求转达给李沃夫首相。^[36]李沃夫回复说，他将在3月6日接受这三项要求。^[37]

与此同时，苏维埃仍在继续要求对末代沙皇采取严厉措施。这一天，苏维埃主席齐赫泽同临时政府就执行委员会批准逮捕一事进行了谈判。在听取齐赫泽的报告后，执行委员会决定立即通知苏维埃军事委员会逮捕废帝。^[38]

469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临时政府终于在3月7日决定剥夺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自由，将他们押送到皇村，派遣布勃利科夫等4名国家杜马议员前往莫吉廖夫，负责押送尼古拉二世等人。^[39]当天克伦斯基访问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发表了如下讲话：

现在，尼古拉二世掌握在司法部长也就是我的手中。同志们，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俄国革命是不流血革命。我不希望，也

不允许它被玷污。我绝对不会成为俄国革命的马拉。……再过不久，尼古拉二世将在我的亲自监督之下从港口遣送英国。^[40]

克伦斯基一直认为，俄国革命是胜过法国大革命的，但他遭到了许多要求处罚沙皇及其家人的革命派人士的排斥。在3月8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上，彼得格勒苏维埃再次决定逮捕尼古拉二世所有家族成员，没收财产并剥夺公民权。3月9日，他们正式决定，即使与临时政府发生冲突也要坚决实施逮捕尼古拉家族的行动。^[41]

3月8日，临时政府终于有所行动。那天，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科尔尼洛夫前往皇村，向皇后宣读了逮捕尼古拉家族的决议书。沙皇由临时政府派来的布勃利科夫等4名国家杜马议员押送，于3月8日下午，乘坐4时45分从莫吉廖夫出发的火车前往皇村。^[42]3月9日中午11时30分，沦为阶下囚的沙皇乘列车抵达皇村车站，之后这位前朝沙皇被送进宫殿监禁起来。^[43]

事情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但如何处置末代沙皇等人依旧是革命政权悬而未决的问题。

470 承认芬兰的独立诉求

3月7日，临时政府发布了一份全面承认《芬兰大公国宪法》生效的国家文件，实质性接受了芬兰的独立诉求。“我们通过这份文件正式承认芬兰人民基于宪法享有不可动摇的内政自主权及有关芬兰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权利。我们确信，今后，俄国和芬兰会为了增进双方友情，提升自由的两国民众的幸福感，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结成亲密关系。”^[44]

俄国仍打算与芬兰继续保持国家联盟关系。但承认芬兰独立的诉求并不意味着完全承认芬兰独立。

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的忧虑

在临时政府的各部长中，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负责解决一个最艰巨的难题——如何回应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士兵们所提出的军队改革的要求，以及如何在推行军队改革的同时重建军队。如何处理这个难题是对古契柯夫能力的考验。3月6日，古契柯夫率领陆军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军人以《第115号省令》成立了波利瓦诺夫委员会^[45]，专门解决军队改革问题。波利瓦诺夫曾于1915年担任陆军大臣，同时也是古契柯夫的朋友。就这样，以波利瓦诺夫为首，穆易希拉夫斯基、米夫内维奇、阿维里亚诺夫、阿尔汉格尔斯基等改革派将领，以及以工程师法利钦斯基为核心，包括雅克博维奇、图马诺夫、恩格勒格特、吉里皮西、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等在内，被称为总参谋部的“青年土耳其党”的改革派军官聚集到了一起。高加索骑兵师参谋长波洛夫佐夫也列席参会。

对于古契柯夫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制定《一号法令》相关内容的具体实施措施。波利瓦诺夫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由法利钦斯基撰写的草案，之后由古契柯夫署名通过，3月5日签署发布《陆军部第114号命令》^[46]，核心内容如下：

471

（1）禁止使用“兵卒”（nizhnii chin）一词，统一使用“士兵”（soldat）。

（2）禁止对上级使用“阁下”称号，改为称呼“将军先生”（gospodin general）和“上校先生”（gospodin polkovnik）。

（3）无论是否处于执行军务期间，将军必须称呼士兵为“你”（Vy），不能再称呼“你小子”（Ty）。

（4）废除“士兵禁令”；允许街头吸烟、参加俱乐部或聚会、乘坐市区电车以及自由加入各种工会和团体。^[47]



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
(左)邀请友人、前
陆军大臣波利瓦诺夫
(右),成立了解决军事
改革问题的波利瓦诺夫
委员会

临时政府为了实施《一号法令》，不得不首先从改善对待士兵的态度这一基础性改革着手。俄国军队的等级制度之森严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3月6日通过了《二号法令》。这是基于《一号法令》已引起军队混乱的判断而制定的，此条法令
472 的核心内容如下：

(1)《一号法令》建议在各部队选出一个委员会，但选出该委员会的目的不是推选军官。

(2)在部队军官选举制确立之前，苏维埃承认各委员会拥有否决军官任命的权力。

(3)《一号法令》要求士兵在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时服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指示，并且“涉及军事指挥权时，士兵必须服从所有作战命令”。^[48]

执行委员会决定派代表与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协商《二号法令》的内容。协商内容还包括支持军官选举制度、设立第三方委员会来

处理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冲突事件等。此外，还提到废除近卫部队、取消敬礼制度等事宜。于是，当天傍晚，斯克别列夫、索科洛夫、格沃兹杰夫、斯捷克洛夫、库德里亚夫特塞夫等人拜访了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49]

果不其然，协商毫无进展。古契柯夫明确拒绝苏维埃提出的要求，并以“接受了这些条件，我还怎么继续任职”为由在协商过程中多次离席。最终，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波塔波夫将军代古契柯夫在协商会议上做最后总结，并协商召回古契柯夫共同拟定《三号法令》。^[50]

以下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发给前线军队的公告，内容如下：

军队内部不和、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对立是阻碍自由确立的最大威胁。每一位公民均有义务在军官和士兵承认俄国新体制的基础上，协助调整官兵关系。因此我们希望，军官们无论是否正在执勤，都要尊重每位公民与士兵的人格。我们呼吁军官们能严肃对待我们的要求，并呼吁在队伍中执行军令的士兵履行军事义务。同时，委员会通知前线部队，《一号法令》和《二号法令》……仅适用于彼得格勒军区部队。陆军部长与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协商并承诺，将立即制定适用于前线部队的协调士兵与指挥官之间关系的最新准则。

上述文件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斯克别列夫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塔波夫少将签署。此外，由于“该公告也是与陆军部长古契柯夫达成共识之后制作而成”，古契柯夫也在文件上签了字。^[51]3月8日，这份文件被刊登于各大报刊。

当此军事改革推进之际，古契柯夫得知德国军队可能会对彼得

格勒发动攻击，遂起草告军民书，呼吁部队和公民一定与临时政府团结一致保卫祖国。呼吁草案由时任临时政府内阁秘书长的纳博科夫起草，于9日在内阁会议上获得批准。但不得不说，蓄意夸大战争的危险性，让人害怕，使得法案得以通过是多余的，旨在达到一定的政治效果而已。草案中有这样一段话：

请大家相信，我们会拼尽全力保卫国土。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听从临时政府的指挥。首都某些团体煽动民众闹事，不听从临时政府的政令并阻碍施行……请各位不要听信居心叵测者的挑拨离间，因为有许多穿着我军制服的德国间谍正在尝试误导大家，蛊惑人心。^[52]

然而，纳博科夫却认为想要继续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他感觉到古契柯夫已陷入绝望。在3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古契柯夫表示

474 “Ne do zhiru, byt'by zhivu（奢侈的生活就不要想了，能活下去就好）”。在内阁会议之后，古契柯夫向纳博科夫征求意见。纳博科夫



临时政府内阁秘书长纳博科夫

说，如果你对当下局势判断准确的话，那就只能与德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了。古契柯夫不同意谈判，但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恰恰凸显出他和米留科夫的立场差异。纳博科夫在回忆录中沉重地写道：“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俄国在战争中以令人绝望的失败收场，如果能清楚意识到想要继续战争的所有尝试都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的话，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的答案还有其他可能吗？我们能避免以失败收场吗？谁能知道呢？”“我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无论

以何种形式继续战争以求胜利，都与完成革命在国家内部提出的根本任务难以两全。甚至与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条件也水火不容。我能感觉到古契柯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53]

尼古拉二世在退位之前，应罗江科主席和古契柯夫的要求，任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总司令。这在废除专制制度之后的俄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最先对此任命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克伦斯基，他在3月7日的莫斯科演讲中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最高统帅部认为尼古拉大公出任总司令可以稳定军心，并全力推动任命尼古拉大公。3月7日，阿列克谢耶夫向首相李沃夫和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发出电报，报告了最高统帅部的请求。^[54]古契柯夫立即回电报说：“我将尽全力确保军队取得战争胜利所需要的一切。”^[55]然而，首都反沙皇的民意高涨，反对尼古拉大公任职总司令的声音此起彼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于3月11日早上抵达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部将此事报告给了临时政府。^[56]李沃夫不同意尼古拉出任总司令，并告诉他，希望他能立即主动辞去这一职务。李沃夫在与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电报通信时也表达了这一想法，阿列克谢耶夫被迫接受了现实。^[57]这件事大概使古契柯夫愈发感到无力。之后，在4月2日，临时政府任命阿列克谢耶夫为总司令。^[58]

“赋予妇女选举权”

475

在俄国迎来解放曙光之际，俄国的女性也挺身而出发出了呐喊。3月19日，妇女们走上街头，在首都彼得格勒举行游行，要求在立宪会议上赋予妇女选举权。妇女同权同盟会会长西基那·雅威因、积极为女性争取权利的立宪民主党女性活动家图尔科瓦·威廉姆斯在涅瓦大街上面向聚集在首都市议会门前参加游行的人们发表了演

讲。当天参与游行的人中最重要的一位嘉宾是薇拉·妃格念尔，她因1881年曾参与民意党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而被囚于施吕瑟尔堡要塞监狱20年。刚过中午，4万名妇女跟随在怀抱鲜花的妃格念尔和西基那·雅威因乘坐的汽车后面，同两支军乐队一起朝着塔夫利宫开始了游行。她们高举的标语牌上写着“如果妇女不能参与立宪会议，选举徒有其名”“立宪会议上应有女性一席之地”“为自由而战的女性战士们无比光荣”“战斗到最终胜利”“妇女们，不要离开工作岗位”等字样。

塔夫利宫前，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和苏维埃政府主席齐赫泽会见了游行群众。妇女同权同盟会会长西基那·雅威因以妃格念尔等人的斗争事迹为例，要求给予妇女选举权，如不准许妇女参与立宪会议的选举，她们就绝不离开。就在此时，一个女工突然冲出人群，并开始高声演讲：“（我们）和资产阶级妇女的想法有所不同，

476 要求立宪会议赋予妇女选举权的游行（1917年3月19日）。标语牌上写着：“自由俄国的女性要求选举权”“立宪会议上应有女性一席之地”





俄国革命胜利后举行的另外一场妇女游行（3月中下旬）。横幅上写着：“士兵们正在保卫国家自由及人民安全，应该增加士兵家属的定量供应”“为国土兵的子女提供食物”

妇女并没有所谓‘特殊利益’。”说完她还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呼吁工人们团结一致。这一演讲激起群众的强烈愤慨，导致现场秩序混乱。^[59]

尽管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但俄国史上首次妇女游行终以雷霆之势昭告了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废除宗教歧视及民族歧视

3月20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废除宗教歧视、民族歧视的法令。

“在自由的国家，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临时政府坚信国民的良知决不会允许公民权利因其信仰和血统而受到限制，因此制定了



犹太学者杜布诺夫

现行法令，废除此前法律中因不同信仰或不同民族对俄国公民权利设置的一切限制条例。”其下列举了第一款九项条款、第二至第十款中被废除的具体限制条款。^[60]

犹太学者杜布诺夫在法令发布两天后才得知这一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此生的梦想终于实现，四十年来受尽磨难、为之奋力抗争的一切努力终于有所回报。此刻，这巨大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尚无法预测。不过将来，当与信仰、民族歧视相关的法令从历史中消失，当站在俄国门口的汉尼拔*军队和反革

命、无政府状态的空想全都消失不见，或许那时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新政府的光辉和温暖。”^[61]

废除宗教、民族歧视的相关法令中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废除等级制度*。废除等级制度需要废止贵族会议、农民村社、乡镇等各基于身份等级的自治团体，其复杂性远超表面认知。经过革命洗礼的俄国
478 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等级制度依旧根深蒂固。

汉尼拔（北非古国）迦太基的统帅。古罗马最强大的敌人。

废除等级制度 十月革命胜利的结果。1917年11月10日（公历同月23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废除等级和官阶制度的法令》，宣布废除旧的等级制度。

为革命烈士举办葬礼和追悼会

3月末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歌颂革命的仪式，就是为革命牺牲者举行的市民葬礼仪式。

俄国城市联盟彼得格勒市委员会的统计部门统计了革命中的伤亡人数。苏联历史学家雷伯洛夫称，统计结果显示伤亡人数共计1443人。^[62]也就是说，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一书中所写的伤亡人数1443名是引用了俄国城市联盟的统计数据。托洛茨基指出，伤亡人数1443名中有869名军人，其中包括60名军官。这意味着牺牲或负伤的士兵只有809人，而普通市民的伤亡人数更是低至574人。托洛茨基认为，从该数据来看，这次革命虽然称不上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革命牺牲者的数量却着实少得惊人。^[63]

查询未公开资料后，马鲁图伊诺夫发现了一份根据医院记录制成的伤亡人员名单，共有1656人。但是，其中有265人死于一般疾病，与革命并无关联，还有76人的姓名出现了不止一次。马鲁图伊诺夫去除以上人员后，最终得出革命伤亡人数共有1315人。^[64]其中，军官53人，士兵602人，警察73人，包含工人在内的市民共有587人。我曾在一本1917年出版的名为《社会主义者对目前局势的主张》的宣传册上看到过俄国城市联盟进行的相关调查。该调查显示，伤亡人数共计1164人，其中死亡人数为169人，包括22名工人、59名士兵、55名普通市民、6名大学生、5名未满15岁的少男少女以及11名军官和11名警察。负伤人数为995人，其中包括202名工人、15名未满15岁的少男少女以及40名军官和50名警察。这样算来，负伤的士兵以及大学生、普通市民共有688人。根据这个数字可以计算出伤亡的1164人中，有军官51人，警察61人，工人224人，少男少女20人，士兵、大学生、普通市民808人。而且将这808人按士兵和普通市民分别计算的话，士兵有500人，普通市民有308人，这一数据与

480 马鲁图伊诺夫所给出的数据基本吻合。而且伤亡的普通市民中还包
括充当警察眼线的门卫。^[65] 由于这份调查只统计了被运往医院救治
的人数，还有很多伤亡者被工人和学生自行送回家中，因此这份名
单还有遗漏。

在最新的研究中，雷伯洛夫参考特别市市长办公楼的档案资料
后统计出的结果显示，伤亡人数共计1740人。其中，死亡313人，
包括106名工人，87名海军士兵，28名大学生，此外还有92名市民。
负伤1427人，包括429名工人，745名海军士兵，69名大学生以及
184名市民。^[66] 但是雷伯洛夫的数据中，军官、警察和普通市民被归
为一类，因而不够详尽。

我发现169名牺牲者中工人占13%，士兵占35%，普通市民占
32.5%，大学生占3.5%，未满15岁的少男少女占3%，军官占6.5%，
警察占6.5%。综合以上数据来看，这一比例可以说是二月民众革命
的真实写照。除了工人和学生以外，很多普通市民也参与了革命，
并将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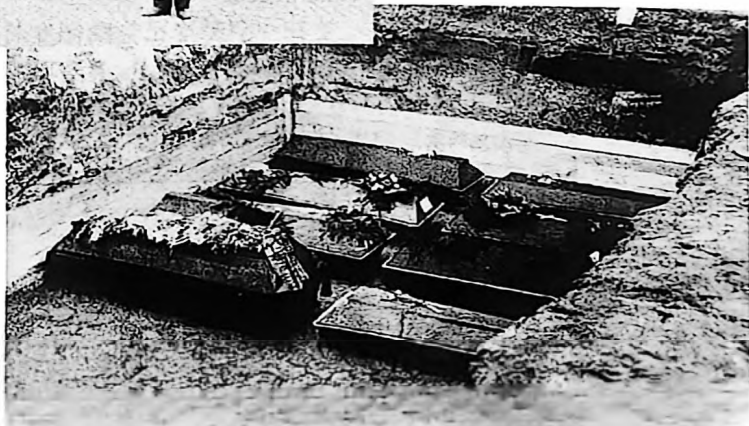
3月5日，苏维埃召开全体代表大会，讨论为革命牺牲者举行哀
悼和安葬仪式的相关事宜。最终，大会决定在3月10日举行市民公葬
仪式，将遗体安葬于冬宫广场。^[67] 但是，有人对安葬地点定为冬宫广
场提出了异议。因此在3月7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上，苏维埃大会重
新讨论了延迟公葬仪式日期和更换安葬地点的问题。^[68] 考虑到代表大
会上作家高尔基的发言，并出于保护文化遗产的考量，委员会提议将
安葬地点改为练兵场，即战神广场。^[69] 最终，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
修改了3月5日的决定，公葬仪式将于3月23日在战神广场举行。

3月23日（公历4月5日），整个首都非常隆重地举办了这场盛
大的公葬仪式。二月革命中的牺牲者将安葬于战神广场。当天阴云
密布，工人、学生、市民和士兵从早晨8时开始分区集结，之后从
医院抬出亡者的棺木，列队向战神广场出发。打头阵的是瓦西里岛



1917年3月23日，涅瓦大街
上为二月革命牺牲者举办的市
民葬礼游行

上：金属工人工会总部成员
准备出发参加市民葬礼游行
右：这一天，共有184副棺
木在战神广场下葬



481 区的游行队伍，他们用了两个半小时到达战神广场。彼得格勒区的游行队伍紧随其后，于中午12时半到达战神广场。这支队伍的领头车里坐着居住在彼得格勒的19世纪民粹派革命家维拉·扎苏里奇、格尔曼·罗帕钦以及薇拉·妃格念尔。同乘该车的还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赛锐特里和彼得格勒区的区长西尼特科夫。人们纷纷为老革命家们的到来热烈欢呼。报纸上刊登了扎苏里奇对民众的致辞：“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远比第一阶段更加精彩。”^[70]在纪录片中，扎苏里奇已然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婆婆，脸上带着平和慈祥的笑容，而妃格念尔则如往常一样冷静，神情坚毅地走向挖好的墓穴。^[71]广场上挖好的每个墓穴中都埋放了4副棺木。游行开始4个小时后，紧跟在彼得格勒区的游行队伍之后到达战神广场的便是打响了二月革命第一枪的维堡区的游行队伍。公葬游行的参与人数达到了数十万人，但令人惊讶的是，所有人都井然有序、协调统一。这一天，共有184副棺木埋入战神广场。

日本人今井政吉*目睹了这次游行并记录下自己的感想，寄回了日本：

四个人扛着一副棺木走在前面，死者家属紧随其后。失去丈夫的妻子戴着罩有黑纱的帽子，穿着黑色的衣服，低着头

在纪录片中…… 这一画面可以在Axelbank拍摄的纪录片《苏联与列宁》（*Soviet Union and Lenin*）中看到。

今井政吉 今井政吉是三井物产公司职员，曾因工作常驻俄国。《东京朝日新闻》（1917年5月12日—6月1日）曾连载他用笔名“埋花畔人”撰写的《俄国革命见闻录》，讲述了他在俄国的见闻。

静穆地跟在棺木后面。道路两旁的路人组成了一道道人墙，当红色棺木经过时，便在胸前画着十字脱帽致敬。当游行队伍一齐唱起意义特殊的沉痛挽歌时，道路两边围观的人群都按照要求脱帽默哀。就这样，送葬队伍从位于涅瓦大街的西亚历山大公园的尽头出发，前往战神广场，绵延不绝。我站在波利策夫斯基桥上遥望东方，蜿蜒的送葬队伍和林立的红旗望不到尽头。……

整个送葬队伍由几十万人组成，规模宏大，前所未有。那天的景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时至今日，每当我回忆起那天的送葬队伍时，脑海中就会清晰地浮现出这几个画面：大道上连绵不绝的红旗，军乐队吹响着嘹亮号角以及女人们吟唱着悲痛不已的歌。这一切都让我不得不去想象将来的壮观景象：在他们的墓地之上，不久将会建起象征着自由的摩天高塔。在这座高塔的周围，新生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将巍然耸立起来。^[72] 482

两天后，也就是3月25日，在点燃士兵起义导火索的沃利尼团的主持下，马林斯基剧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追悼在革命中牺牲的人。剧院二楼正前方的座席曾是沙皇专用席位，这次音乐会有30多位老革命家受邀出席。坐在最前排的是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曾一同被关押在要塞监狱长达20年的莫洛佐夫与罗帕丁、扎苏里奇（维拉·伊瓦诺夫娜·扎苏里奇）以及妃格念尔等。音乐会在《马赛曲》的旋律中拉开了帷幕。司法部长克伦斯基的长篇演讲结束后，便到了音乐会的中场休息时间。下半场刚开始，65岁的薇拉·妃格念尔便走上了管弦乐队的指挥台。法国大使莫里斯·帕雷奥洛格在他的日记体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她的衣着打扮十分朴素，灰白的头发从中间梳到左右两侧。她穿着黑色丝绸衣服，披着白色披肩，

一派名门望族出身的老妇人的风范，让人难以想象她年轻的时候曾是令人胆寒的女性虚无主义者。”^[73]

妃格念尔用沉稳的语调开始了她的演讲：

483

在俄国迎来解放，举国欢庆新生活开启之际，我很荣幸能在这个悼念音乐会上致辞。如今，我们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我们的祖国已经迎来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获得自由的道路无比艰辛，但是保卫自由、巩固自由的道路将会更加艰难。曾经，沙皇俄国没有法律，不赋予人民权利，那样的环境深深影响着我们的观念。我们并不习惯尊重法律，也不知道怎样去行使权利。我们甚至没有学习过怎样尊重别人的权利。但是，只要我们一同努力，共同建立民主共和国，切实保证国家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我们不仅可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幸福的国家，

而且还可以确保整个欧洲民主主义的推行，国际关系也将随之焕然一新。也许到那时，我们心底最深处的梦想将得以实现，像现在一般让人民痛苦不堪的流血战争再也不会发生。我们身边的某些人对革命过程中只有极少数人牺牲这一事实感到意外，他们惊叹于人们能够如此齐心协力，革命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其实，这只是一部分仅仅将目光锁定在“此时现在”的人的想法，若他们能回顾一下俄国革命的历史，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了。^[74]



薇拉·妃格念尔

妃格念尔还介绍了作家安德烈夫的小说。在小说中，人们挑战自我，攀登高墙，其间不断有人坠亡，尸体越堆越高，后人踩着前人的尸体继续攀爬，来到尸山的山顶，最后终于登上了高墙。她说：“实现自由的道路也是如此。几代先烈用他们宝贵的生命和专制制度抗争，才换来了如今焕然一新的俄国。”接下来，她还朗诵了自己为歌颂牺牲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监狱的人所作的诗歌：

那些逝者的记忆，仍始终存活在我的心中。年轻一代都因革命的胜利而备感振奋，而我却不能尽情地沉浸在这喜悦之中。……

“死者的骨灰，正叩击着我的心扉”。

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在我讲话的最后，我提议大家一同起立，缅怀所有为自由而亡的人，所有未被我们注意到的、因饥饿而慢慢死去或是在监狱中被杀害的人！^[75]

帕雷奥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后这段话，她讲得很缓慢，语气中交织着悲痛、决绝和怜悯，没有人能把这段话中所蕴含的情绪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恐怕只有斯拉夫人的灵魂才能发出这样直击人心的声音了。”妃格念尔的讲话结束后，在场的人们全体起立缅怀那些逝去的生命。管弦乐队演奏了《你们已英勇牺牲》这首葬礼进行曲，多数人都在乐声中泪流满面。^[76]

妃格念尔在欢呼二月革命的同时，预言了革命将要走的路充满艰难险阻，呼吁为民主事业加倍努力。她对往昔的追忆，最终都化作对未来的战斗号角。

我的二月革命研究之路

485 我出生于1938年1月，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当时攻陷了南京城，全日本都处于狂热之中。1945年，日本战败，日之间长达50年的战争、日俄之间长达40多年的战争和日美之间持续了5年的战争就此结束。那时我只有7岁，正在读小学二年级，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我是日本“二战”后的第一代人。而1950年我刚上中学的时候，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 I 升高中那年。1953年，朝韩签署了停战协议。我成长于这两场战争之后，并成了一名历史学家。因此，对于已经80岁的我来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伴随了我整个历史研究生涯的基本问题。

我读的第一本有关俄罗斯历史的书是英国的俄罗斯历史学界权威人士伯纳德·帕雷斯（Bernard Pares）所著的《俄罗斯——过去和现在》（*Russia: Its Past and Present*）。1952年，岩波新书出版了它的日译本（上下册，内山敏译）。1954年，我对照着读完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和日文译本。在俄国爆发革命前，帕雷斯就与俄国人有过深入交流，他是被革命打倒的自由主义者的朋友，也是他们的支持者。当然，帕雷斯曾强烈反对过十月革命，但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崛起后，他开始支持英苏两国的合作。即使在冷战期间，他也呼吁国际社会理解苏联，避免与苏联开战。这本书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并于“二战”后进行了修订。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帕雷斯写道：“放眼世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俄罗斯更迫切希望世界和平。”在结尾处他还写道：“如果我们只是知晓这个事实，⁴⁸⁶但并未真正理解事实的话，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填补裂痕，否则将付出昂贵的代价”。我用红色铅笔在这几句话处画了下划线。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便决定大学要攻读西洋史专业，研究俄罗斯历史。那个时候，我读了今井登志喜主编、林健太郎编写的《西洋史学入门》（上下册，大月书店，1948年）。我的父亲曾做过高中历史老师，这本书是他为数不多的藏书之一。书中刊登了一篇岩间彻写的题为《俄国革命》的文章。文章生动、翔实地介绍了有关俄国二月革命的丰富研究资料，也正是这篇文章让我对历史学家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6年，我考进大学。第二年，我便加入了民间研究者团体——俄罗斯历史研究会，开始关注俄国革命，还有幸见到了岩间老师。之后，我去拜访了岩间老师巢鸭（位于日本东京都丰岛区）的宅子，见识到了老师的藏书。那个时候，我在神保町的旧书店——崇文庄书店，买下了帕雷斯的巨著《俄国君主制度的崩溃》（*The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y*, 1939年）。读完之后，我才知道岩间老师那篇介绍二月革命研究资料的文章，那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文章，就是这本书的序言，而且序言里的日语非常忠实于原文。

有关二月革命的记录中，流亡在外的人写了很多回忆录，苏联也在20世纪20年代公开了一批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资料。在帕雷斯着手写《俄国君主制度的崩溃》一书之前，市面上就已经出版了旧政府有关人员在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上的陈述——《沙皇政府的垮台》七卷本（莫斯科，1924—1927年）。其后，还出版了沙皇的日记，沙皇与皇后之间的往来书信（英文版），沙皇与皇太后之间的

往来书信，皇后之友——女官维鲁博娃的回忆录，太子的老师吉利亚尔和莫索洛夫的回忆录，大公们的书信，沙皇堂弟亚历山大·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的回忆录，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的回忆录，拉斯普京的犹太人秘书西马诺维奇、与拉斯普京为敌的神父伊里奥多尔的回忆录，刺杀拉斯普京的尤斯波夫公爵与普利斯科维奇议员的回忆录，首相维特与科科夫佐夫、外交大臣伊兹沃斯基与萨佐诺夫以及警卫安保局局长瓦西里耶夫等人的回忆录，内务大臣普罗托波夫的最后陈述，米留科夫的著作《俄国第二次革命史》（1934年），
487 克伦斯基的回忆录，右翼议员舒尔金的回忆录，漫画家卡利奎的日记，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与法国驻俄大使帕雷奥洛格的回忆录，以及戈洛文、丹尼洛夫、布鲁西洛夫、古柯、波利瓦诺夫等将军的回忆录。

帕雷斯在大量参考此类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出俄国君主制度崩溃的原因。岩间老师将这一结论转述为：“我坚信沙皇统治崩溃的原因并非在于下层社会，而是在于上层社会。”帕雷斯的确在序言的结尾处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再重申一次吧。提议推翻君主制度的，是来自上层社会的人，因为在上层社会里纠葛着最为奇妙的人际关系，拉斯普京、沙皇、皇后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且扭曲的关系。”岩间老师认为这一结论“美中不足”，他说：“这就是因为（帕雷斯）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在推翻君主制度中的作用。”我这才明白老师所指的不足之处在哪里。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常常受到岩间老师的教诲，毕业后老师还给了我一些工作机会。1959年，我有幸成为《图说世界文化史大系》（角川书店）一书第12卷《东欧——俄国》的助理编辑。到了1962年，在岩间老师的介绍下，我负责改写帕雷斯的《俄国君主制度的崩溃》，和老师负责撰写的“彼得大帝传略”一起组成了新书《少男少女的世界历史》（茜书房出版）第9卷《俄国革命故事》的内

容。后来，这本书经常领跑畅销书榜，我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收到这本书的版税。这一切都让我心怀感激。

我在1956年考进大学。那年召开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掀起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同年秋天，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历史学界中最先站出来批判斯大林的历史学家布鲁杰罗夫后来受到了苏联党中央的批判，1957年被学界开除，他也因此成为我心中的英雄。1957年正值俄国革命胜利40周年，我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俄国革命史的诸问题》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为之后要进行的有关俄国革命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假设。内容虽然有些幼稚笨拙，但我从俄国社会的特点出发，来探寻当时还是发展中国的俄国爆发革命的原因。受到筱原一先生当时刚出版的新书《德国革命史序说》的影响，我认为应从旧政治体制的抵抗能力、革命领导者的引领作用和群众的革命动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推动革命发展的力量。这篇论文也是我研究生涯的起始点。 188

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原想通过研究农民对沙皇的崇拜来探寻群众革命的动力源泉，但是由于很难找到参考资料，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于是，我将研究方向转向革命知识分子，并最终把民粹派定为论文研究的对象。在此期间，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重新考证布鲁杰罗夫的论文《关于1917年3—4月布尔什维克的战术研究》（《历史诸问题》1956年4月刊），这篇文章一直广受诟病。因为关东大地震之后，我在苏联政府捐赠给东京大学的图书中发现了七卷本的《沙皇政权的垮台》、施略普尼柯夫的回忆录以及卡尤罗夫刊登在杂志上的回忆录，可以在相同参考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考证。

1959年春天，我把重新考证布鲁杰罗夫的论文后的成果写成了《围绕二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精英—群众关系》（研究会会报，1959年4月、5月）一文，并在俄国历史研究会的月例会上

进行了汇报。1957年，在苏联出版的革命资料集里刊登了三张布尔什维克党发放的传单，我在文章中考证的就是这三张传单真正的发放主体，并得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向群众呼吁要“组建苏维埃”的结论，以此来声援布鲁杰罗夫。这份报告是日本国内首个对俄国革命进行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后，又陆续涌现出很多俄国革命的研究者。在这篇报告发表5年之后的1964年，长谷川毅在俄国历史研究会的例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双重政权与布尔什维克”的报告。这也是他在东京大学时的毕业论文。长谷川毅先生在考上研究生后不久，便去了美国的华盛顿大学留学，在日本刚刚开始俄国研究也在美国的历史学界大放异彩。长谷川毅之外的另外一名研究者就是长尾久先生，他在1965年的例会上汇报了自己的硕士论文《二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的混乱以及列宁的〈四月提纲〉》。

1967年，是俄国革命胜利50周年，也是俄国历史研究会成立10周年。于是，研究会决定发动所有会员，合力出版一本研究俄国革命的论文集。我写的二月革命、长尾久先生写的十月革命以及菊地昌典先生写的有关农民革命和共产国际的论文组成了这本论文集的核心论文。我与菊地昌典先生一同成了东京大学的讲师、副教授。那年，发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10年前消失不见的布鲁杰罗夫在第二次批判斯大林浪潮中重出江湖，出版了《第二次俄国革命——彼得格勒的叛乱》一书。他搜寻了大量的苏联资料作为参考，甚至找到了二月革命刚结束后不久，历史学家波利叶多夫和参与二月革命的人留下的录音资料。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从平民、民主党派等民众的角度出发去考查二月革命的名著，对我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由于研究进展较慢，还有菊地昌典先生《俄国革命》（中公新书）的失败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论文集一直拖到1968年才出版。这部名为“俄国革命的研究”（中央公论社）的论文集由江口朴郎编

写，是一部超过了900页的巨著。

我在论文《二月革命》中主要分析了民众的动向和各民主党派。论文证实了在世界大战前夕，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首都工人的领导权。但苏联政府仅公开了与布尔什维克党相关的资料和研究，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此外，我还在论文中指出，当时在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股以柯诺瓦洛夫和里亚布申斯基为中心的左翼自由主义势力，这一势力后来形成了包括柯诺瓦洛夫和克伦斯基等人在内的共济会性质的秘密政治团体，最终，这股势力通过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控制、主导了群众运动。在领导二月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没能发动一次决定性行动，反而是与左翼自由主义有联系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在与柯诺瓦洛夫等人商议后，召集群众在重开国家杜马的2月14日举行示威游行这个举措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虽然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没有响应他们的号召，但是这次失败的行动却引发了2月23日工人的爆发性行动。因此，我认为应当改写对这段革命历史的叙述方式，于是在这篇论文中写道：二月份的群众运动不应该从2月23日算起，而应该从召集工人2月14日去国家杜马示威游行这一举措开始算起。

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正值越南战争。我家上空不断有直升机飞过，这些直升机要将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伤兵运往美军医院，那家美军医院位于我家北边3公里处一个叫朝霞的地方。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中，我在论文中写下了50年前拒不服从攻击命令的俄国士兵被移交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最终被枪决的故事。论文一完成，我就开始参与抗议美军医院和反对越南战争的市民运动，还帮助坚定反战的美军士兵出版了《反战GI报》（美军的反战报纸）。在越南战争中，美军士兵振臂高呼反对战争的行动，是自俄国革命以来世界历史上的又一大壮举。

那之后，我一直在花时间修改我之前写过的论文，并打算将它

们整理成册。1978—1979年，我在苏联待了一年。这一年，我在档案馆查阅书写时要用到的民粹党的相关历史资料。除此之外，我还尽数收集了布鲁杰罗夫在书中提及的所有与二月革命相关的文献。

1981年，已经成为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的长谷川毅先生出版了一本巨著《二月革命：彼得格勒，1917》（*The February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 Seattle, 1981）。长谷川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几乎搜罗遍了所有保存在美国的革命流亡者的资料，查阅了保存在苏联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当然他也参考了我之前的研究论文。这本厚达650页的巨著对二月革命做了最为彻底的研究，代表了当时世界上二月革命研究的最高水平。我在《俄国历史研究》36号（1982年）上发表了为这部巨著而写的长篇书评。

长谷川和布鲁杰罗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和我的论文一样，都选择将研究二月革命的侧重点放在民众和民主党派的活动上。但是，长谷川先生并没有从否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这一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因此忽视了该自由主义势力创立的具有共济会性质的秘密社团的历史意义。虽然其著作中也提到了柯诺瓦洛夫等人与“工人团”号召群众在国家杜马重开日举行示威游行的事情，由于行动并未取得成功，长谷川先生还是否定了其历史意义，但是，整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论述2月23—27日的革命过程，其详细程度甚至超过了布鲁杰罗夫著作中相关的内容。最能体现出这本书学术水平的部分就是对革命胜利后，沙皇、军队、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三方协商过程的分析。由于长谷川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了新的资料，所以这部分的分析尤为精彩。

491 1983年，我第一次赴美时，先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集了一些历史资料，还看到了在长谷川先生的巨著中提及的文献以及资料，我特意抄写了特别市市长巴尔克的回忆录。随后，我在华盛顿的议会图书馆里找到了有关拉斯普京的文献，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的图书馆查找资料时，找到了彼得格勒安保部长格洛巴乔夫的回忆录，还在纽约市立图书馆约翰·里德的收藏品中找到了揭露拉斯普京的宣传册。这次访美收获颇多，但我最终也没能用这些资料来完成对二月革命的研究。之后，我也仅在1986年写了一篇文章《拉斯普京、皇后、沙皇——读皮库里的历史小说》（和田春树编《俄国史的新世界》，山川出版社）。

1990年，美国学者、奥本大学的迈克尔·梅兰科副教授出版了著作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Russian Anti-War Movement 1914-1917*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他是继布鲁杰罗夫、和田春树、长谷川毅之后，研究群众历史、民主党派的最后一位代表性人物。他以2月27日印发的传单为依据，主要考察了我基于1957年苏联出版的革命资料集中的三份传单所做的研究，同时他在详细查证了长谷川先生在1977年做的考察研究之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成为这一议题的第三代研究者。这本书选取很多新的历史资料，给出的分析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之所以没能完成二月革命的总结性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我新着手的朝鲜研究，另一方面是1980年后，我完全改变了之前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我认为如果将20世纪看作“世界战争的时代”，那么俄国革命是反抗世界战争才爆发的革命，虽然这场革命试图借助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来促进空想社会主义的实现，却因未打破时代环境的局限而告终。当时，我的研究重心被重新审视“始于十月革命的列宁式飞跃”所吸引，也就因此放缓了对二月革命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俄国进入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一改革最终导致苏联剧变，俄国史上的苏联社会主义时代就此结束。我从80年代初萌生的想法出发，写了《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岩波新书，1992年）一书。

俄罗斯国内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也产生了很大变化。对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评价一落千丈，而民主主义革命——二月革命却备受推崇。此外还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自由主义者的浪潮。2002年，圣彼得堡盖尔岑州立教育大学的教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夫在专著《二月革命中的国家杜马》（梁赞出版）中通过对新资料的研究提出：国家杜马在二月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且有革命意义的作用。长谷川先生对尼古拉耶夫提出的这一观点感到十分震惊。比尼古拉耶夫还要年轻的库利科夫也从这一新视角入手进行了研究。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二月革命前夕及革命过程中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祖国史》，2012年1号）。论文肯定了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他将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归功于古契柯夫等人的指示和支持，并没有关注到古契柯夫和柯诺瓦洛夫立场的不同，这是因为他过于简单地看待这部分的历史。

之后，塞缪尔·廖德尔斯编写的《沙皇政权的垮台——1917年二月革命中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Fall of Tsarism: Untold Stories of the February 1917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出版了。他重新发掘整理了布鲁杰罗夫所挖掘的波利叶多夫所做的口述史项目成果，增补学术注释后出版，也以此为契机，获得了自由主义者和军人们最新提供的宝贵证言。这些证言也是已知最晚出现的证言。

多年来，加奈林一直都是历史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列宁格勒学派的中心人物，但他在生命中最后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埋头研究二月革命的进程，远赴美国搜集并影印、整理珍贵的史料。2014年，他这项研究的成果被收录进他的最后一本论文集《在20世纪的俄国》。此外，这项成果还和尼古拉耶夫、库利科夫的研究一起被汇编收录进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时出版的《世界战争中的俄国》第3卷《二月革命》。2014年，88岁高龄的加奈林离开了人世，他本
493 想厘清二月革命的真实面貌，但遗憾的是，我认为他的研究很难说取

得了彻底的成功。

2016年，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讨会，时隔30年再次前往该大学图书馆查阅巴赫梅捷夫文库，并得到了加奈林推荐参考的外交大臣波克罗夫斯基回忆录的相关文件。我收集二月革命史料的旅程也就此结束了。

最终，我在2017年，也就是俄国革命爆发100周年的时候开始了这本关于二月革命的专著的写作。为了写这本书，我修改了50年前的论文，并加入了很多新资料、新研究和新设想。东京大学文学系西洋史专业的石井规卫教授是我的研究生学生，他也曾想写一本有关二月革命的大部头著作。而石井所带的研究生中有一位现在是西洋史专业副教授的池田嘉郎先生，他在那年年初出版了《俄国革命——悲剧的八个月》（岩波新书）。纪念俄国革命100周年的大背景带来了许多研究机会，石井和池田两人曾就俄国革命进行了很多讨论和研究。我则在提出自己对二月革命看法的同时，展示了俄国革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再到列宁的第三次革命三个阶段的革命轨迹。

二月革命由两个部分组成，包括与君主专制制度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与世界大战及帝俄军队斗争的工人士兵革命。二月革命既是19世纪拉下帷幕的最后的市民革命，也是将世界战争的世纪——20世纪大幕拉开的反战、反军的人民革命的开始。推翻了与市民革命的共同成果——临时政府的反战、反军的人民革命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列宁政府掌握了政权，于1918年1月解散了立宪会议，并以内战的形式展开了第三次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2017年，我应邀参加了10月9日至1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纪念革命爆发100周年的“大俄国革命”国际研讨会。在会上，我以“二月革命——日本历史学家的新看法”为题做了报告，以此阐述我对俄国革命的新看法。

在本书从写作到出版的过程中，我做了多次修改和补充，给出版社编辑部的内田真人先生添了很多麻烦。在我的上一本书《斯大林批判》之后，内田真人先生又负责了本书《俄国革命》的编辑工作。我十分感谢他包容我多次修改和补充，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本书对于已经80岁的我来说，是此生的最后一本书。我很高兴能够写完并出版这本书。

俄国革命年表

- 日期后标注（公元）为公历，（俄历）为俄历，未标注者均为俄历。
- 年表内容依据各个章节涉及内容的大致时间段划入各章，并不严密。
- 粗体字内容代表俄国之外的地区发生的事件。

第 1 章	
1773—1775年	普加乔夫起义
1789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三级会议改组为国民议会 巴黎市民举行示威游行，攻占巴士底狱 8月26日（公元），通过《人权宣言》
1790年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作者拉吉舍夫被捕
1791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与王后企图逃亡国外被捕 制宪会议制定君主立宪制宪法；革命战争爆发
1792年	9月21日（公元），国民公会通过成立共和国的决议
1793年	经过审判，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被处死；雅各宾派统治确立
1794年	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派成员被捕
1796年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病逝，保罗一世即位
1799年	雾月政变；拿破仑建立执政府
1801年	3月11日（俄历），宫廷政变，保罗一世被杀，皇太子亚历山大一世即位
1804年	拿破仑加冕称帝
1812年	拿破仑一世军队进攻俄国；卫国战争爆发
1814年	俄军进入法国巴黎
1825年	12月14日（俄历），十二月党人起义以失败告终；尼古拉一世即位
1848年	法国二月革命
1853年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1855年	尼古拉一世逝世，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塞瓦斯托波尔沦陷
1857年	“大改革”开始
1861年	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法令“二一九改革法令”
1863年	波兰起义
1864年	设立地方自治机构，进行司法改革
1866年	4月4日（俄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遇刺杀
1874年	民粹派发起“到民间去”运动
1876年	“土地与自由社”成立
1881年	3月1日（俄历），民意党成员成功刺杀亚历山大二世 4月29日（俄历），亚历山大三世颁布加强君主专制的诏书《关于专制制度不可侵犯》
1891年	西伯利亚铁路开始修建
1894年	亚历山大三世逝世，尼古拉二世即位
1904年	日俄战争爆发
1905年	
1月9日（俄历）	“流血星期日”事件发生；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
8月23日（俄历）	9月5日（公元），俄日双方签订《朴次茅斯和约》
10月17日（俄历）	国家杜马成立；给予政治自由的诏书（《十月诏书》）颁布
1906年	
2—3月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
4月23日（俄历）	颁布宪法
1908年	
10月7日（公历）	奥匈帝国单方面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
1911年	
9月5日（俄历）	首相斯托雷平遇刺身亡
1912年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协商会议上，形成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 进步同盟成立，第四届国家杜马开始选举 共济会组织“俄国人民大东方”成立
1913年	
2月21日（俄历）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

1914年	
6月28日（公历）	15日（俄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遭到暗杀
7月20—29日（公历）	7—16日（俄历），首都工人罢工示威
23日（公历）	10日（俄历），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24日（公历）	11日（俄历），俄国大臣会议就动员部分军队达成共识
25日（公历）	12日（俄历），沙皇出席六大臣会议；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通牒做出回应
28日（公历）	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29日（公历）	16日（俄历），沙皇批准发布总动员令；接到德国皇帝电报之后将其取消，下令动员部分军队
30日（公历）	17日（俄历），沙皇批准发布总动员令
8月1日（公历）	德国向沙俄宣战
2日（公历）	7月20日（俄历），沙俄向德国正式宣战
3日（公历）	德国对法国正式宣战；法国对德国正式宣战
30日（公历）	17日（俄历），坦能堡战役中，俄军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
31日（公历）	18日（俄历），首都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
21日（俄历）	沙俄军队占领利沃夫
10月22日（俄历）	沙皇驾临明斯克
11月20日（俄历）	沙皇驾临斯摩棱斯克。
26日（俄历）	驾临第比利斯市
1915年	
1月	最高总司令颁布的敌视犹太人的公告张贴在加里西亚各地
2月	布尔什维克国会议员团成员遭逮捕
3月20日	格里高利·米亚索迪夫宪兵上校以间谍罪被处死
4月19日	德军在加里西亚击退俄军
4月	作家高尔基成立孤帆出版社；西部各省的犹太人被驱逐
5月	强化枪支炮弹补给特别审议会成立
26日	第九届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
6月5日	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卸任，继任者为谢尔巴托夫
10日	皇后亚历山德拉给沙皇写信，劝说其听从拉斯普京的意见并采取强硬态度
18日	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卸职，继任者为波利瓦诺夫
7月5日	东亚教事务管理局总监撒布雷尔卸任，继任者为萨默林

16—17日	全国民粹派组织代表会议在克伦斯基家中召开
19日	向重新召开的国家杜马会议提交国防特别审议会成立法 布尔什维克党的首都协商会议召开
25—27日	第一届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让工人代表参与大会； 古契柯夫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柯诺瓦洛夫被任命为副主席
23日	华沙沦陷，在波兰开始了大撤退
8月1日	国家杜马通过了国防、燃料、粮食、运输四个特别审议会成立法
13日	《俄国晨报》公布了国防内阁成员名单
19日	格罗德诺沦陷
21日	八位大臣联名上书，劝谏沙皇勿担任最高总司令
23日	沙皇罢免尼古拉大公，并亲自出任最高总司令
23—26日	9月5—8日（公历），反战社会主义者国际会议于瑞士齐美尔瓦尔德村召开
25日	进步同盟向政府提出纲领
9月3日	国家杜马休会
3—5日	首都爆发反对沙皇政府逮捕工人的罢工运动，来自59家工厂的69817人参与罢工
19日	布伊利诺被德军攻陷
26日	皇后与拉斯普京任命赫沃斯托夫为代理内务大臣
27日	军事工业委员会举行工人代表选举人集会，但最终未选举产生代表
29日	政府颁布敕令，解除妇女和未成年人在军需产业上的就业限制
10月19日	“甘古特”号战列舰的水兵哗变
11月29日	军事工业委员会重新召开选举人会议并选举产生了代表
12月	高尔基创办杂志《记事》，苏汉诺夫担任主编
年末	喀琅施塔得水兵中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员遭逮捕
1916年	
1月9日	首都工人为纪念“流血星期日”举行罢工，共计55家工厂、66767人参加
20日	皇后和拉斯普京任命施蒂默尔为首相
2月	在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第二次大会期间，工人代表也召开会议并发表宣言
3月	地方自治和城市联盟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7—12月	中亚发生叛乱
9月16日	皇后和拉斯普京任命普罗托波波夫为内务大臣
第2—4章	
10月	前线士兵开始反抗，拒绝执行进攻命令，一直僵持至12月
10月中旬	古契柯夫和涅克拉索夫会面商谈，就推进军事政变一事达成共识。随后，捷列先科也加入该计划
13日	古契柯夫为养病前往基兹洛沃茨克
17日	步兵第181团预备营的士兵在首都袭击了一名镇压工人示威活动的警察
月末	俄英协会重建大会在彼得格勒市议会大厅举行，英国大使布坎南致辞
10月26日—11月1日	喀琅施塔得海军的军事法庭对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中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20名成员做出判决
11月1日	国家杜马再次召开会议；米留科夫发表“这是无能还是背叛”的演讲
2日	在“工人团”和左翼议员的会议上通过建立“救国政府”的决议
10日	施蒂默尔首相被解除职务，特列波夫继任
18日	齐娜伊达·尤苏波娃给儿子费利克斯·尤斯波夫写信，称如果不处死拉斯普京，不制止皇后的话就什么都干不成
19日	右翼议员普利斯科维奇在国家杜马会议上发表指责拉斯普京的演说
21日	费利克斯拜访普利斯科维奇，邀请其加入行动 傍晚，费利克斯、德米特里大公、普利斯科维奇等四人在费利克斯宅邸会面，讨论暗杀拉斯普京事宜
22日	12月5日（公历），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沦陷
29日	12月12日（公历），德意志帝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向协约国提出和平提案
12月1日	尤斯波夫等人决定于16日暗杀拉斯普京 第十二届贵族联合会通过了弹劾“黑暗势力”的决议
3日	伊丽莎白夫人与妹妹亚历山德拉皇后会面，忠告其要铲除拉斯普京
5日	18日（公历），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交战各国提出和平停战条件
9日	全国地方自治会联盟大会被禁止召开，格·叶·李沃夫公爵在抗议集会上发表演讲 晚上，李沃夫公爵请求第比利斯市市长哈提索夫说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发动军事武装政变
12日	尼古拉二世向陆海军队发出了不得讲和的命令

13日	克伦斯基在国会演讲台上讲述革命的必要性
13—15日	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于彼得格勒召开；工人代表主持会议，大会通过了“彻底废除旧体制和实现国家彻底的民主化”的决议
16日	拉斯普京在尤斯波夫府邸遭暗杀，尸体被抛入涅瓦河中
17日	当日清晨拉斯普京依旧未归，皇后陷入恐慌 下午4时半，皇后向沙皇发送电报 尤斯波夫请求和皇后面谈，被皇后拒绝；随后尤斯波夫给皇后送去信件 皇后下令禁止尤斯波夫离开首都，尤斯波夫在车站乘车时被拒 《交易所新闻》（晚报）报道了拉斯普京死亡的消息
18日	各晨报报道拉斯普京死亡的消息 下午3时，沙皇从最高统帅部所在地莫吉廖夫出发，前往皇村
19日	正午过后，拉斯普京的遗体被发现 皇族聚集在一起商议，要求停止对德米特里大公的审判 下午6时，沙皇回到皇村
20日	古契柯夫从疗养院返回莫斯科
21日	拉斯普京的遗体被埋葬在皇村
23日	德米特里大公遵从沙皇的命令，出发前往波斯边境，并任职于附近的部队
25日	首相更替，戈利岑公爵被任命为首相
29日	16名皇室成员上书，请求取消对德米特里大公的处分 皇后的姐姐伊丽莎白夫人向沙皇写信表示支持处死拉斯普京
30日	沙皇驳回16名皇室成员的请愿 莫斯科市议会及各行业权威人士于里亚布申斯基公馆会合，众人有意反对沙皇提出的国会解散令
年末	古契柯夫的支持者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于前线中弹后住院
第5章	
1917年	
1月	哈提索夫在第比利斯拜访了尼古拉大公，向其送上新年祝福，并传达了李沃夫公爵提议的军事政变计划；次日，尼古拉大公表示拒绝 在首都，乌苏里骑兵团旅长克雷莫夫向要员们强调了军事政变的重要性；捷列先科表示将予以合作，他们达成一致，将于3月初发动军事政变
3日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向召开政治集会的“工人团”发出警告
7日	在国防特别审议会上，中央炮兵局局长马尼科夫斯基提出燃料危机可能导致军需生产产量锐减

9日	彼得格勒的工人举行罢工示威，纪念“流血星期日”；共有111家工厂、145301人参加
16日	“工人团”决定号召工人在2月14日赴国家杜马所在地示威游行 英国的米尔纳子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前总理杜梅格、意大利的夏洛伊亚不管部大臣等三国代表到达彼得格勒
18日	协约国召开彼得格勒会议
26日	“工人团”的办公室遭到政府搜查，所有干部均被逮捕。柯诺瓦洛夫、古契柯夫等人向尼古拉·戈利岑首相抗议
28日	在国防特别审议会上，库尔潘斯基委员提议在沙皇出席的情况下召开所有特别审议会的联席会议，以解决危机
29日	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对逮捕“工人团”表示抗议 此时，加利弗林在自己家中召开了民主党派的恳谈会
2月4日	在国防特别审议会上，古契柯夫支持库尔潘斯基的提案，17人联名的意见书转交至沙皇手中
8日	协约国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会议结束，各代表离开首都
9日	哈巴洛夫司令宣布国家杜马召开期间禁止游行
10日	布尔什维克党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提出的“纪念党议员团受审罢工”号召未收到民众的任何回应 罗江科最后一次向沙皇上奏
13日	科洛姆纳聚集起来的500名国家民团兵（兵种不详）进行示威游行，并升级为暴力打斗活动
14日	国家杜马再次召开，会议围绕希德洛夫斯基的观点展开了讨论 58家工厂、89576人参与罢工；国家杜马示威游行遇阻；学生们首次在涅瓦大街游行
15日	克伦斯基在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时表示，“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我们必须摒弃中世纪的体制”
17日	克伦斯基在国家杜马的演讲中再次提到，“专制权力迎来了终结”
21日	普契洛夫工厂全面罢工，政府于22日关闭工厂
22日	维堡区北部召开了国际妇女节集会
23日	维堡区纺织工厂的女工罢工。附近的机械工厂也响应号召，参与罢工，随后工人们开始游行 下午，维堡区进入大规模集体罢工状态；游行队伍试图跨过涅瓦河；共有50家工厂共87534人参加罢工（根据警方记录）
24日	罢工规模全面扩大，131家工厂总计158583人参加罢工（根据安保部记录）。 工人们在涅瓦大街上游行

25日	彼得格勒罢工升级为总罢工。参加人数共计24万 上午10时，维堡区的游行队伍企图冲过利特尼桥，击伤了一位名为夏尔菲夫的警官；下午3时，警察分局局长克鲁伊洛夫于尼古拉车站前广场被哥萨克骑兵杀害；军队在涅瓦大街上首次开枪射击。在彼得格勒钢管厂，军官向工人游行队伍开火。当晚，市议会会议厅举行市民集会，克伦斯基发表演讲 莱蒙托夫的作品《假面舞会》（梅耶荷德导演）于皇家亚历山大剧院首演。沙皇的命令抵达：“于明天中午之前平息动乱。”当局逮捕了工人团体、布尔什维克党员
26日	星期天。哈巴洛夫司令宣布将动用军队武力镇压示威游行队伍 下午，军队向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开火，造成伤亡。 傍晚，巴甫洛夫斯克团第四连提出抗议，拒绝执行开枪镇压游行示威者的命令，但该行为遭到镇压 当晚，内阁会议决定公布国家杜马休会命令。罗江科向阿列克谢耶夫发来电报，希望组建对国家杜马负责的信任内阁
27日	早上，沃利尼团的士兵宣布拒绝执行命令并杀死一名军官，发动了起义。此事件波及附近的三个团，士兵们袭击了炮兵局，并释放了克里斯托伊监狱里的犯人。首都起义就此开始
第6章	
2月27日	清晨，政府向国家杜马议员下达了国家杜马休会令并公布了士兵起义的消息 上午9时，议员们开始陆续到达国家杜马 上午12时，虽然到了预定召开元老会议的时间，但未能如期召开。涅克拉索夫在预算委员会会议室召开了非正式元老会议。罗江科对此提出抗议，但元老会议仍正式召开 下午2时左右，起义军开始向塔夫利宫聚集 下午2时半左右，国家杜马非正式会议在半圆会议厅举行 下午3时半，罗江科提议对国家杜马提出的4个提案进行表决，并决定成立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 当时，格沃兹杰夫、博古达诺夫、卡佩林斯基、索科洛夫等人在国家杜马会晤，决定号召组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市内分发了署名为“筹建中的工人苏维埃”的传单，部分传单由飞机分发 下午稍晚些时候，市内分发了署名为“工人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传单（工人、士兵代表号召大家下午7时在国家杜马集合） 市内分发了署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传单，呼吁成立苏维埃。傍晚，印刷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号召选出临时革命政府

2月27日	下午5时，罗江科通知身处加特契纳的米哈伊尔大公回到首都 下午5时半，国家杜马委员会主席谢格洛维托夫被带至国家杜马，克伦斯基宣布他将被逮捕 下午7时，罗江科等人在马林斯基宫会见米哈伊尔大公，要求他说服沙皇实施信任内阁制 夜晚，莫斯科爆发了革命。社会团体委员会掌权，决定解除军区司令的职务，任命格鲁吉诺夫为新司令。临时革命委员会呼吁成立工人苏维埃 晚上9时到10时，工兵代表苏维埃成立会议在塔夫利宫召开，会议选出执行委员会 沙皇在最高统帅部命令伊瓦诺夫指挥革命镇压军 晚上10时半，米哈伊尔大公与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通电报，要求其向沙皇传达罗江科等人希望转而实行信任内阁制的请求。这一请求遭沙皇否决
28日	凌晨1时前，罗江科等人从米哈伊尔大公处回到国家杜马 凌晨2时，罗江科决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掌权 凌晨5时，沙皇专列从最高统帅部所在地莫吉廖夫出发，前往皇村
第7—8章	
2月28日	上午8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颁布第一号命令 前首相施蒂默尔被押送至国家杜马。议员布勃利科夫出发前去接管交通部。向各部委派出全权委员，即政治委员 上午10时50分，格鲁吉夫斯克营从莫吉廖夫的最高统帅部出发，与伊瓦诺夫的革命镇压军会合 上午11时30分，伊瓦诺夫与哈巴洛夫用电报通信，得知首都已被起义军控制 中午，海军总部哈巴洛夫的军队解散，士兵返回各自原来的部队 下午1时，伊瓦诺夫接到镇压起义的命令，从莫吉廖夫的最高统帅部出发 下午1时50分，国家杜马议员布勃利科夫向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发电报下令，要求“宣告革命”并“落实职务”。这是首都革命的第一则告示，向所有国民宣告革命 下午3时，沙皇专列到达维亚济马；沙皇给皇后发送电报 下午，《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出刊，报上呼吁人们加入苏维埃 当天，保罗大公的使者兼律师——伊瓦诺夫拜访了罗江科，并拜托他替大公说服沙皇推行责任内阁制 晚9时，沙皇专列抵达利库斯拉夫尔车站 皇村的狙击兵团转向革命阵营 当晚，喀琅施塔得起义全面爆发；多名高级军官被杀

3月1日	凌晨1时15分，阿列克谢耶夫向伊瓦诺夫发电报，暗示其停止镇压革命计划 凌晨3时45分，沙皇专列到达小维舍拉车站 凌晨6时，起义的步兵与水兵在喀琅施塔得的亚克力广场召开大型集会，司令维纶被揪出后被刺死 上午9时，沙皇专列到达博洛戈耶车站。罗江科向沙皇发电报请求觐见 上午，律师伊瓦诺夫前往皇村拜访保罗大公，讨论相关事宜，起草责任内阁制诏书草案；保罗、米哈伊尔、基里尔三位大公联合署名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全权委员到达皇村，与革命团队会合 中午至下午2时，士兵代表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士兵问题进行商讨；会议通过两项决定，选出10名士兵代表加入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索科洛夫与执行委员会将通过的两项决议命名为《一号法令》，并予以公布 下午3时05分，沙皇专列到达顿河车站。罗江科发电报表示其无法谒见沙皇 下午3时55分，阿列克谢耶夫发电报给沙皇，告知其莫斯科的革命情况，并争取实行信任内阁制 下午4时，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和近卫海军部队的官兵一起前往国家杜马表明忠心 莫斯科军区司令姆罗佐夫斯基向最高统帅部发电报称，“莫斯科的革命全面爆发” 下午6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讨论了政权问题，表示反对联合政府，并制定了国家杜马成立的临时政府为获取其认可所需遵守的条件；伊瓦诺夫的军队于当日到达维里察车站 下午6时过后，副总参谋长克勒博夫斯基就首都、莫斯科、喀琅施塔得的革命情况向各方面军司令发送电报 傍晚，律师伊瓦诺夫将三大公爵联合签署的责任内阁制诏书草案交给罗江科。当天，在卢加的骑兵部队驻扎地，起义全面爆发。最高指挥官门登被杀身亡。喀琅施塔得爆发起义的消息传到最高统帅部 下午7时，沙皇专列抵达普斯科夫。鲁兹斯基拜见沙皇。伊瓦诺夫独自前往皇村，与相关人员进行协商。之后，他又去暗中拜见皇后，随后返回维里察 晚上10时20分，鲁兹斯基将阿列克谢耶夫请求建立责任内阁制的电报交给沙皇 晚上，重建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员会的大会召开，会上决定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区联派向士兵发放传单，谋求建立以苏维埃为基础的临时革命政府
-------------	---

第9章

3月1日	深夜12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围绕政权问题进行协商
2日	凌晨2时半，罗江科和鲁兹斯基通过休斯印字电报机沟通。罗江科以形势突变为由，请求沙皇退位 为了请沙皇退位并让位于皇太子，古契柯夫向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提议亲自前往沙皇所在的普斯科夫，得到应允 上午5时半—6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通知阿列克谢耶夫将成立以李沃夫为首相的临时政府，并请求任命科尔尼洛夫担任首都军区司令 上午10时45分，鲁兹斯基向沙皇传达了罗江科请求皇帝退位的意见 上午10—11时半，阿列克谢耶夫向各方面军司令传达了希望沙皇退位这唯一的意见 正午后，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了政权问题；斯捷克洛夫就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讨论后的协议内容进行汇报；协议修改后得以通过 下午2时30分，鲁兹斯基和阿列克谢耶夫向沙皇传达了各方面军司令要求皇帝必须退位的意见。沙皇表示同意让位给皇太子 下午3时，米留科夫在叶卡捷琳娜宫进行了关于临时政府的首次演讲 晚上9时20分，沙皇任命科尔尼洛夫代替伊瓦诺夫成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 晚上10时，古契柯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拜见沙皇。沙皇宣布皇太子的退位，并明确表示将让位给米哈伊尔大公 半夜12时，沙皇发布退位诏书，任命李沃夫公爵为临时政府首相，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最高总司令，并在任命诏书上签字
3日	凌晨1时，已退位的尼古拉二世乘坐火车从普斯科夫出发 凌晨3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收到尼古拉二世将让位于米哈伊尔大公的消息 早上，临时政府成立并公布政府成员名单，同时公布了政府的运行原则 上午9时半，罗江科同临时政府成员前往拜访米哈伊尔大公并与其协商。 米哈伊尔大公接受建议，决定拒绝继承皇位 晚上11时，尼古拉乘火车抵达莫吉廖夫的最高统帅部

第10章

4日	早上，报纸刊登了沙皇的退位诏书及米哈伊尔大公拒绝继承皇位的备忘录 下午1时45分，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涅佩宁被起义水兵处决 下午3时35分，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任命马克西莫夫为新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 临时政府免除了全国各省省长及副省长的职务，将各省的地方自治机构参事会主席任命为临时政府省特派专员 外交部长米留科夫给俄国驻外使馆发电报，传达临时政府的外交方针
----	--

5日	“为调查前部长、市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在任职期间的非法行为”，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成立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并颁布《陆军部第114号法令》；苏维埃全体代表大会决定于3月10日将革命烈士埋葬在冬宫广场
6日	临时政府颁布大赦令 临时政府发布“坚持战斗，直到取得最终胜利”的宣言 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发布《第115号省令》。波利瓦诺夫委员会成立，商讨军队改革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通过《二号法令》
7日	司法部长向全国司法机关下达“立即释放政治犯和宗教犯”的指令 临时政府决定剥夺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并将他们遣送至皇村 临时政府发布国家文件，全面承认《芬兰大公国宪法》生效
8日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共同发布《三号法令》 首都军区司令科尔尼洛夫前往皇村，宣布软禁末代沙皇、皇后、皇太子
9日	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承认临时政府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专列到达皇村，尼古拉其后被监禁在宫中
10日	废除内务部警局
11日	2月26日（公元），驻俄国的英、法、意大使访问临时政府，表明正式承认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首相不同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就任最高总司令
12日	临时政府废除死刑
13日	布尔什维克干部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人到达首都
14日	召开苏维埃大会，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书》 关闭巴黎的驻外代表安保部
15日以后	采勒切利、艾弗拉姆·戈茨从伊尔库茨克出发
19日	废除宪兵团。女性团体在首都街头进行示威游行，要求“给予女性在立宪会议选举时的投票权”
20日	颁布法律，废除宗教和民族歧视
23日	为革命烈士举行葬礼。将革命烈士埋葬在战神广场
25日	在马林斯基剧院举办革命烈士追悼音乐会。由老革命家薇拉·妃格念尔宣读追悼词
二月革命后	
1917年	
3月28日	首相李沃夫发表宣言，向市民讲述战争的目的

4月3日	列宁回国
18日	米留科夫发出照会《将世界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
20—21日	首都工人、士兵游行示威（四月危机）
5月5日	古契柯夫与米留科夫辞职；联合政府成立；克伦斯基担任陆海军部长
6月18日	克伦斯基命令全军向德军发起攻击（六月攻势）
7月3日	首都士兵发动反政府武装起义，并发生枪战（七月流血事件）。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被捕
24日	首相克伦斯基领导下的联合政府诞生
8月12日	莫斯科全国会议召开
27日	克伦斯基解除科尔尼洛夫的最高总司令职务 科尔尼洛夫部队向首都进发
9月2日	科尔尼洛夫被捕
十月革命	
9月14—15日	召开民主会议
25日	临时政府进行最后改组
10月7日	预备议会召开
9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革命防护委员会（后改名为军事革命委员会）
10—16日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采纳列宁的提议，进行武装起义
25日	上午10时，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张贴题为“打倒临时政府”的告示， 内容由列宁起草 克伦斯基逃离冬宫；其他内阁成员继续坚守 下午2时半，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大会，托洛茨基和列宁发表演说 临近夜晚11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凌晨2时，冬宫的临时政府放弃抵抗，大部分成员被捕 凌晨3时，苏维埃大会继续召开。在卢那察尔斯基的提议下，大会通过了 《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明确革命的五项政策 上午9时—27日凌晨5时，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 《土地法令》，建立临时工农政府
11月12日以后	全国各地举行立宪会议选举
12月2日	立宪民主党非法化
7日	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契卡”成立
16日	颁布《关于全体军人权利的法令》《关于军队选举制与权力组织的法令》

列宁的“第三次革命”之后

1918年	
1月5日	召开立宪会议
6日	列宁政府解散立宪会议（第三次革命开始）
15日	组建志愿制的工农红军
3月3日	俄德签署《布列斯特和约》
6—8日	第七届党大会，党名更改为“俄罗斯共产党”
5月13日	颁布《粮食垄断令》
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军发动叛乱
6月11日	颁布《贫农委员会组织令》
28日	颁布《大型企业国有化令》
6—7月	红军转为征兵制
7月6日	左翼社会革命党叛变
7日	列宁向斯大林发电报，指示“要毫不留情地镇压冒险主义者”
17日	末代沙皇一家于乌拉尔被处决
8月2日	日本宣布出兵西伯利亚
3日	美国宣布出兵西伯利亚
30日	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卡普兰刺杀列宁
9月5日	帝政派政客、军人等512人被处死
1919年	
3月2—6日	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召开
18—23日	第八届党大会制定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目标，推进构建党及国家体制
3月	高尔察克率领军队发动进攻
5月	苏维埃红军击败高尔察克军
7月	邓尼金白卫军发动进攻
10月	苏维埃红军击败邓尼金白卫军
1920年	
7月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
8月	坦波夫省爆发农民起义

1921年	
3月8—16日	第十次党大会决定征收粮食税（实施新经济政策）
夏	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饥荒
7月21日	决定成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
8月27日	解散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
1922年	
4月	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
5月	列宁第一次中风
10月6日	党中央确定成立苏联的原则
12月22日	列宁第二次中风
24日	列宁写下政治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
1923年	
1月4日	列宁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3月6日	列宁给斯大林写“绝交信”，要求其道歉，否则绝交
3月10日	列宁第三次中风，对其而言这是致命的
1924年	
1月21日	列宁去世，终年53岁

注 释

第1章 俄罗斯帝国与世界大战

- (11) 有关法国革命的内容出自柴田三千雄「フランス革命」(《法国革命》), 岩波书店, 1989年(研讨会书籍版), 2007年(现代文库版)。
- (12) *Sbornik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istoricheskogo obshchestva*, Sankt-Peterburg, VII. p. 345, cited by Natan Eidel'man, *Gran'vekov. Politicheskaia bor'ba. v Rossii. Konets XVIII-nachalo XIX stoletii*. Moscow, 1986. p. 9.
- (13) 赫尔岑(金子幸彦、长绳光男译), 「過去と思索」(《往事与随想》) 1, 筑摩书房, 1998年, 94页。
- (14) 赫尔岑(金子幸彦译), 「ロシアにおける革命思想の発達について」(《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 岩波文库, 1950年, 114—115页。
- (15) P. Valuev, *Duma russkogo (vo vtoroi polovine 1855 goda), Russkaia starina*, 1891, Vol. IXX, May, pp. 353, 354.
- (16) 详见和田春树「ロシアの「大改革」時代」(《俄国的“大改革”时代》),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岩波講座世界历史》) 20, 岩波书店, 1971年。
- (17) 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大杉荣译), 「一革命家の思出」(《一位革命者的回忆录》), 「クロポトキン全集」(《克鲁泡特金全集》) 6, 春阳堂, 1928年, 195页。
- (18) 详见和田春树「テロルと改革——アレクサンドル二世暗殺前後」(《恐怖政治和改革——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前后》), 山川出版社, 2005年。
- (19) 关于日俄战争开战的过程, 详见和田春树「日露戦争——起源と開戦」(《日俄战争: 起源和开战》), 岩波书店, 2009—2010年。
- (10) 详见和田春树、和田あき子「血の日曜日——ロシア革命の発端」(《流血星期日——俄国革命的开端》), 中公新书, 1970年。
- (11) 1906年宪法全文详见 *Novoe vremia*, 26 April (9 May) 1906. pp. 1-2。关于宪法的制定过程及其内容, 详见加纳格「ロシア帝国の民主化と国家統一——二十世紀初頭の改革と革命」[《俄罗斯帝国的民主化与国家统一——二十世纪初的改革与革命》(御茶水书房, 2001年)的第六章]。加纳格认为, 1906年宪法“效仿了近代宪法的规定, 企图实

现权力分立”。

- (121) A. Neznamov, *Iz opyta Russko-iaponskoi voiny (Zametki ofitsera General'nago Shtaba)*. Sankt-Peterburg, 1906. E. Martynov, *Iz pechal'nogo opyta Russko-laponskoi voiny*. Sankt-Peterburg, 1906.
- (123) Ch. M. Ioksimovich, *Manufakturnaia promyshlennost' v proshlom i nastoiashchem*. Vol. I, Moscow, 1915, pp. 95-107, 133-135.
- (124) E. D. Chermenskii, *Burzhuaizii i tsarizm v revoliutsii 1905-1907 gg.* Moscow-Leningrad, 1939, pp. 98-99, 187-188.
- (125) P. A. Buryshkin, *Moskva kupecheskaia*. New York, 1954, pp. 293-301.
- (126) Ibid., pp. 289-290. *Utro Rossii*, 1 January 1912, p. 2.
- (127) V. Ia. Laverychev, *Po tu storonu barrikad*. Moscow, 1967, p. 91.
- (128) Ibid., p. 80.
- (129) Laverychev, *Monopolisticheskii kapital v tekstil'noi promyshlennosti Rossii (1900-1917 gg.)*. Moscow, 1963, pp. 69-71.
- (130) *Svod otchetov fabrichnykh inspektorov za 1913g.* Sankt-Peterburg, 1914, p. LXXII. *Statisticheskii sbornik za 1913-1917 gg.* Vyp. 2, Moscow, 1922, pp. 140-141.
- (131) A. Ia. Avrekh, *Tsarizm i IV Duma 1912-1914 gg.*, Moscow, 1981, p. 25. I. V. Lukolanov, *U istokov rossiiskogo parlamentarizma*, Sankt-Peterburg, 2003, pp. 292-293.
- (132) 党成立大会的记录详见 *Partii demokrati-*

cheskikh reform, mirnogo obnoveniia, progressistov. Dokumenty i materialy 1906-1916 gg. Moscow, 2002, pp. 282-301.

- (123) V. I. Startsev, *Tainy russkikh masonov*. Sankt-Peterburg, 2004, pp. 86, 90.
- (124) *Iz sledstvennykh del N. V. Nekrasova 1921, 1931 i 1939 godov*, VI, 1998, No. 11-12, pp. 38.
- (125) V. I. Startsev, *Tainy russkikh masonov*. Sankt-Peterburg, 2004, pp. 83-84, 90-95.
- (126) A. Kerensky, *Russia and History's Turning Point*, New York, 1965, pp. 89-90.
- (127) A. M. Volodarskaia, *Lenin i partiia v gody nazrevaniia revoliutsionnogo krizisa*. Moscow, 1960, pp. 38-47. *IA*, 1959, No. 2, pp. 13-17.
- (128)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1, Moscow, 2013, p. 738. V. F. Dziunkovskii, *Vospominaniia*, Vol. II, Moscow, 1997, pp. 149-150.
- (129) *Zapiska Durnovo, Krasnaia nov'*, 1922, No. 6, pp. 187-189, 195-196.
- (130) Luigi Arbertin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Vol. 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apter I. 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 and the Sarajevo Outrage, pp. 1-38. Greg King and Sue Woolmans, *The Assassination of the Archduke*,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13.
- (131) N. P. Poletika, *Vozniknovenie pervoi mirovoi voiny (liul'skii krizis 1914 g.)*. Moscow, 1964, pp. 18-35. Arbertini,

- op, cit., Chapter II. The Threads of the Conspiracy, pp. 39-88. 大卫·马肯兹 (柴宜弘他译)「暗殺者アビス——第一次世界大戦をおこした男」(《刺客阿皮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男人》), 平凡社, 1992年。David MacKenzie, *The "Black Hand" on Trial Salonika*, 191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32] Arbertini, op. cit., pp. 18-35. King and Woolmanis, op. cit., pp. 163-209.
- [133] Arbertini, op. cit., pp. 35-38. King and Woolmanis, op. cit., pp. 227-251.
- [134]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v epokhu imperializma* (下文简称为MO), Series III, Vol. IV, Moscow-Leningrad, 1931, p. 15.
- [135]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Moscow, 2013, p. 39.
- [136] MO, Series III, Vol. IV, pp. 345-346.
- [137] MO, Series III, Vol. V, pp. 3-5.
- [138] Ibid., 外相日记, 1914年7月24/11日, p. 45。
- [139]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 45.
- [140] P. L. Bark, *Vospominaniia. Iiul'skie dni 1914 goda. Vozrozhdenie*, No. 91, Juillet 1959, Paris, pp. 19-21.
- [141] Ibid., pp. 21-22.
- [142] Ibid., p. 23.
- [143] MO, Series III, Vol. V, 外相日记, 1914年7月24/11日, p. 46。
- [144] *Vozrozhdenie*, No. 91, pp. 25-26.
- [145] N. N. Golovin, *Iz istorii kampanii 1914 goda na russkom fronte*, Praha, 1926, p. 6.
- [146] MO, Series III, Vol. V, pp. 85-95.
- [147] *Vozrozhdenie*, No. 91, pp. 28-29.
- [148]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 46.
- [149] MO, Series III, Vol. V, No. 120, 尼古拉二世致塞尔维亚国王, pp. 145-146。
- [150]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 46.
- [151] KA, 1923, No. 4, p. 19.
- [152]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 47.
- [153] KA, 1923, No. 4, p. 20.
- [154] Ibid., p. 21.
- [155] Ibid., p. 24.
- [156] Ibid., p. 22.
- [157] Golovin, op. cit., p. 8.
- [158] KA, 1923, No. 4, p. 25.
- [159] Ibid., pp. 29-31.
- [160] Golovin, op. cit., p. 15.
- [161] *Perepiska Vilgel'ma II s Nikolaem II 1894-1914*, Moscow, 2007, pp. 458-459.
- [162] *Vozrozhdenie*, No. 91, pp. 35-37.
- [163] *Rech'*, 23 July 1914, p. 1.
- [164] Maurice Paleologue, *La Russie des tsars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Tom I, Paris, 1922, pp. 46-47.
- [165] Ibid., pp. 51-52.
- [166] *Gosudarstvennata Duma. IV-i sozyv*, 26 July 1914, col. 1-36. 池田嘉郎「コーポラティブな専制から共和制の帝国ソ連へ」(《从合作型专制到共和制的苏联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と帝国の遺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帝国的遗产》), 山川出版

- 社, 2014年, 169—171页。
- 1671 A.P. Pogrebinskii, K istorii soiuzov zemstv i gorodov v gody imperialisticheskoi voyny, *IZ*, Vol.12, 1941, pp. 40, 42. Laverychev, *Po tu storonu barrikad*, pp. 96-97.
- 1681 Paleologue, *La Russie des tsars*, Tom I, p.106.
- 1691 *Rossiiia v mirovoi uoine 1914-1918 goda (v tsifrakh)*. Moscow, 1925, p.18.
- 1701 Golovin, op. cit., p. 26.
- 1711 Ibid., p. 55.
- 1721 V. A. Emets, O roli russkoi armii v pervyi period mirovoi voyny 1914-1918 gg. *IZ*, Vol. 77, 1965, pp. 60-71. Golovin, op. cit., pp. 80-107.
- 1731 Golovin, op. cit., p.111.
- 1741 巴巴拉·塔奇曼(山室まりや译)「八月の砲声」(《八月炮火》)下, 筑摩书房, 1965年, 72页。
- 1751 *Istoriia pervoi mirovoi voyny 1914-1918*, Vol.1 Moscow, 1975, p. 318.
- 1761 Ibid., p. 325.
- 1771 同上, 塔奇曼「八月の砲声」(《八月炮火》)下, 88—89页。
- 1781 *Istoriia pervoi mirovoi voyny 1914-1918*, Vol.1, pp. 326-328.
- 1791 Ibid., pp. 329-352.
- 1801 *Rossia v mirovoi voine*, p.18.
- 1811 Ibid., p. 30.
- 1821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p. 67-69.
- 1831 Ibid., p. 74-79.
- 1841 Perepiska V.A. Sukhomlinova s N. N. Ianushkevichem, *KA*, 1922, Vol.1, p.246.
- 1851 Ibid., p. 249.
- 1861 Ibid., p. 258.
- 1871 *KA*, 1922, Vol.2, pp.143-144.
- 1881 *Istoriia pervoi mirovoi voyny 1914-1918*, Vol.2. Moscow, 1975, pp. 28-36.
- 1891 D. V. Verzhkhovskii and V. F. Liakhov, *Pervaia mirovaia voina 1914-1918 gg.* Moscow, 1964, pp. 123-131.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s drevneishikh vremen do 1917 goda. Entsiklopediia*, Vol.1, Moscow, 1994, p. 388.
- 1901 K. F. Shatsillo, Delo polkovnika Miasoedova, VI, 1967, No. 4, pp.103-116. G. Katkov. *Russia 1917.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London, 1967, pp. 119-132.
- 1911 *Rossia v mirovoi voine*, p. 30.
- 1921 *Doklad po evreiskomu voprosu Ts. Komiteta Partii K.D.*. *Istoriia odnogo pogroma*. Izdanie Zagranichnogo Komiteta Bunda. 1916, pp. 20-22.
- 1931 Ibid., p. 26.
- 1941 Ibid., pp. 38-39.
- 1951 G. B. Sliozberg, *Dela minuvshikh dnei. Zapiski russkogo evreja*, Vol.III, Paris, 1934, pp. 324-342.
- 1961 K. N. Tarnovskii, *Formirovanie gosudarstvenno-monopolisticheskogo kapitalizma v Rossi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yny*. Moscow, 1958, pp. 43-46.
- 1971 I. F. Gindin, *Russkaia burzhuaziia v period kapitalizma, ee razvitie i osobennosti*, *IS*, 1963, No. 3, p.55.
- 1981 Pogrebinskii, *Voenno-promyshlennnye komitety*. *IZ*, Vol.11, 1941, pp.

- 160-164. V. S. Diakin, *Russkaia burzhuaziia i tsarizm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yny*. Leningrad, 1967, pp. 72-76, 91-96. Lewis H. Siegelbaum,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in Russia, 1914-17: A Study of the War-Industries Committees*, Oxford, 1983, pp. 40-49. *Osobyie zhurnaly Soveta ministrov Rossiiskoi Imperii. 1915 god*. Moscow, 2008, pp. 362-363. A. I. Iakhontov. *Tiazhelye dni. Sekretnye zasedaniia Soveta ministrov 16 iuliia—2 sentiabria 1915 g.* ARRS Vol. XVIII, p. 36.
- (109) Diakin, op. cit., pp. 87-90.
- (110) Tarnovskii, op. cit., pp. 48-51.
- (111) 出自1915年的陆军部报告。 *Voennaia promyshlennost' Rossii v nachale XX veka 1900-1917*. Vol. 1, Moscow, 2004, p. 545.
- (112)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Moscow-Leningrad, 1927, pp. 21-23. Iakhontov, op. cit., p. 82.
- (113) KA, 1932, Vol. 1/2, pp. 117-160. Iakhontov, op. cit., pp. 109-110. P. N.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 II, New York, 1955, pp. 206-218.
- (114) Iakhontov, op. cit., pp. 69-71. A. A. Polivanov, *Iz dnevnikov i vospominanii po dolzhnosti voennogo ministra i ego pomoshchnika 1907-1916 gg.* Vol. 1, Moscow, 1924, pp. 203-339.
- (115) Iakhontov, op. cit., pp. 105-116.
- (116) Ibid., pp. 119-125.
- (117) Ibid., pp. 132-133.
- (118) 和田春树「日露戦争——起源と開戦」(《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 上，岩波书店，2009年，398—400页。
- (119)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1, p. 68.
- (120) 有关拉斯普京的内容，详见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斯密奇恩（スミツチエン）报告书。 *Poslednii vremennik poslednego tsaria (Materialy Chrezvychainoi sledstvennoi komissii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o Rasputine i razlozhenii samoderzhavii)*, *Voprosy istorii*, 1964, No. 10, 12; 1965, No. 1, 2. 以及深入研究上述委员会资料文件的著述。 Eduard Radzinskii, *Rasputin: Zhizn' i smert'*. Moscow, 2000. 据沼野充义、望月哲男译「真説ラスプーチン」(《拉斯普京真相》) (上下，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4年)。关于1912年10月的情况， *Dnevnik i vospominaniia Anny Vyrubovoi*, Moscow, 1991, pp. 130-132.
- (121) V. M. Khrustalev, *Velikii kniaz' Mikhail Aleksandrovich i ego dnevnik, Dnevnik i perepiska Vel. Kn. Mikhaila Aleksandrovicha*, Moscow, 2012, pp. 30-46. 1910年的传闻见 *Tri poslednikh samoderzhitsa. Dnevnik A. V. Bogdanovich*, Moscow/Leningrad, 1924, p. 482.
- (122)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Romanovykh*. Vol. III. 1914-1915 g-g., Moscow-Petrograd, 1925, p. 199. *Pis'ma Imperatritsy Aleksandry Fedorovny k Imperatoru Nikolatu II*, Vol. I, Berlin, 1922, p. 462.
- (123)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 III, p. 200. *Pis'ma Imperatritsy*, Vol. I p.

- (114) 西洛夫的大臣履历, 依据D. N. Shilov. *Gosudarstvennye deiateli Rossiiskoi Imperii 1802-1917. Glavy vysshikh i tsentral'nykh uchrezhdenii. Biobibl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 Sankt-Peterburg一书在2001年确认。
- (115) 传记部分的事实见Ibid., pp. 550-551。与业界的关系见Lavrychev, *Monopolisticheskii kapital*, pp. 98-101, 171, 293. V. S. Diakin, op. cit., pp. 150-151, 176-177. Predsmertnaia zapiska A. D. Protopopova, *Golos minuvshogo na chuzhoi storone*, 1926, No. 2(XV), pp. 181-182.
- (116) *Za kulisami tsarizma. Arkhiv tibetskogo vracha Badmaeva*. Leningrad, 1925, pp. 17-18. 普罗托波波夫的陈述见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 Leningrad, 1924, p. 115。
- (117) S. P. Mel'gunov, *Legenda o separatnom mire. Kanun revoliutsii*. Moscow, 2006, pp. 283-300. I. I. Kolyshko, *Velikii spad. Vospominaniia*, Sankt-Peterburg, 2009, pp. 104-109. 科里席科是一位政治评论家, 他参与了在斯德哥尔摩的单独媾和活动。
- (118)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Romanovykh*, Vol. IV. 1916 god, Moscow-Leningrad, 1926. p. 381.
- (119) Ibid., Vol. 1916-1917, g.g., V. Moscow-Leningrad, 1927, pp. 11-12.
- (120) Ibid., Vol.V, pp. 73-75.
- (121)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Manuscript. Bakhmetiev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pp.

- (122)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V, p.146.
- (123) Ibid., Vol.V, pp. 148-149, 151.
- (124) A. I. Spiridovich, *Velikaia voina 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4-1917 g.g.*, Vol. II, New York, 1962, p.176.
- (125)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p. 264, 266.
- (126)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 V, pp. 154-155.
- (127) *Rossia v mirovoi voine*, p. 30.
- (128) Ibid., p.18.
- (129) V. A. Petrov, *Ocherki po istori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v russkoi armii v 1905 g.* Moscow-Leningrad, 1964, p. 33.
- (130) 这份意见书由鲍里斯·恩格勒格特保存, 后捐赠给了卡耐基国际和平财团图书馆, 并在N. N. Golovin, *Voennye usilia Rossi v mirovoi voine*, Vol. I, Paris, 1939, pp. 97-105上首次公开。其写作过程中, 部分内容由恩格勒格特口述。Semen Lyanders, *The Fall of Tsarism: Untold Stories of the February 1917 Revolution*, Oxford, 2014, pp. 56-57. 另外, 在L.M. Gavrillov, V. V. Kutuzov, *Istoshchenie liudskikh rezervov russkoi armii v 1917 g., Pervaia mirovaia voina 1914-1918*. Moscow, 1968, pp. 152-154中, 其作为档案馆的文件被介绍到苏联史学界。
- (131) Golovin, *Voennye usilia Rossii*, pp. 121-123.
- (132)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armii i*

- na flote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yny.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1966, pp. 204-205, 424.
- (133) Ibid., pp. 205-206.
- (134) Aleksandr Astashov, *Russkii front v 1914—nachale 1917 goda: voennyye opyt i sovremenost'*, Moscow, 2014, pp. 683-684.
- (135)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armii i na flote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yny*, pp. 247-253.
- (136) Ibid., p. 237.
- (137) *Razlozhenie armii v 1917 g.* Moscow-Leningrad, 1925, p. 7. *Istoriia pervoi mirovoi voyny*, Vol.2, pp. 304, 308-309.
- (138) Astashov, op. cit., pp. 688-691.
- (139) Ibid., pp. 691-692.
- (140) *Istoriia pervoi mirovoi voyny*, Vol.2, p. 307.
- (141) 全文参见 *Vosstanie 1916 goda v Srednei Azii i Kazakhstane.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1960, pp. 25-26。
- (142) 全文参见 Ibid., pp. 87-100。
- (143) Ibid., pp. 87-88.
- (144) Ibid., p. 88.
- (145) Ibid., pp. 88-89.
- (146) Ibid., pp. 89-90.
- (147) Ibid., pp. 90-92.
- (148) Ibid., pp. 93-94.
- (149) Ibid., pp. 95-96.
- (150) Ibid., pp. 97-98.
- (151) 关于这一点的大致情况, 参见和田春树「ニコライ・ラッセル——国境を超えるナロードニキ」(《尼古拉·罗素——超越国境的民粹主义者》)下, 中央公论社, 1973年,

288—291页。

第2章 革命的序幕

- (1) G. Buchanan, *My mission to Russia, and Other Diplomatic Memories*. Cassell: London, 1923, p. 29.
- (2) 国家杜马的议事录是正式记录, 但内容有所删节。 *Gosudarstvennaia Duma, IV-i sozyv*, 1 November 1916, col. 35-50. 完整版见 A. S. Rezanov, *Shturmovoi signal* P. N. Miliukova, Paris, 1924, pp. 45-61。
- (3) Rezanov, op. cit., p. 56.
- (4) Buchanan, op. cit., p. 30.
- (5) *Obedinennoe dvorianstvo: Sezd upolnomochennykh gubernskikh dvorianskikh obshchestv*. Vol.3, Moscow, 2002, p. 713.
- (6) 关于吉霍米洛夫这一时期的活动, 参见 Wada Haruki, Lev Tikhomirov: *His Thought in His Later Years 1913-1923,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No. 28, 1987。
- (7) GARF, F. 634. Op.1, Ed. khr. 27, L. 67.
- (8) Ibid., L. 69.
- (9) *Tsarevichstvo 11 marta 1801 goda*. Sankt-Peterburg, 2001.
- (10) 有关尤斯波夫公爵家, 详见费利克斯·尤斯波夫于1952年出版的回忆录 (Felix Youssoupoff, *Memoires*, Paris, 1952, 1954)。这里使用的是1998年出版的俄语译本。Kniaz' Feliks Iusupov. *Memuary*. Moscow, 1998, pp. 9-28.
- (11) 画像来源于 I. A. Murav'eva, *Vek moderna*, Vol.1, SPb., 2001, p. 55。

- [121] A. N. Bokhanov, *Pravda o Grigorii Rasputine*, Moscow, 2011, p. 462.
- [132] Iusupov, op. cit., pp. 63-64, 75-80.
- [143] Ibid., pp. 101-104, 126-137.
- [154] Ibid., pp. 143-152.
- [166] Ibid., pp. 166-167. V. F. Dzhunkovskii, *Vospominaniia*, Vol. II, Moscow, 1997, pp. 552-562. 此外, 参见 E. E. Iudin, *Iusupovy i Nikolai II (1890-1916 gg.)*, VI, 2009, No. 7, pp. 126-128.
- [177] Iusupov, op. cit., pp. 163, 166.
- [188] Iusupov, *Konets Rasputina. Vospominaniia*, Paris, 1927, p. 55.
- [199] Iusupov, *Memuary*, p. 168.
- [201] Richard Cullen, *Rasputin: the Role of Britain's Secret Service in His Torture and Murder*. Dialogue: London, 2010, pp. 16-17.
- [211] K istorii poslednikh dnei tsarskogo rezhima (1916-1917 g. g.), KA, 1926, No. 1(14), p. 236.
- [221] Katkov, op. cit., p. 100, 484. *Dnevnik i perepiska Velikogo kniazia Mikhaila Aleksandrovicha 1915-1918*, Moscow, 2012, p. 763.
- [231] Iusupov, *Memuary*, p. 177.
- [241] 关于姐弟俩和伊丽莎白的关系, 详见 Grand Duchess Marie of Russia, *Things I Remember*, Cassell: London, 1931. 「最後のロシア大公女マリーヤ——革命下のロマノフ王家」(《最后的俄国大公女玛丽亚——革命时期的罗曼诺夫皇室》)(平冈绿译), 中央公论社, 1984年。
- [251] Iusupov, *Memuary*, p. 178.
- [261] V. A. Maklakov, *Tragicheskoe polozenie, Russkie Vedomosti*, 1915, No. 221.
- [271] V. A. Maklakov, *Nekotorye dopolneniia k vospominaniiam Purishkevicha i kn. Iusupova ob ubiistve Rasputina, Sovremennye zapiski*, 1928, Vol. XXXIV, pp. 262-265. Iusupov, *Memuary*, p. 193.
- [281] *Gosudarstvennaia Duma*, IV-i sozyv. 19 September 1916, col. 286-288. 全文见 col. 260-288.
- [291] KA, 1926, No. 1, p. 234.
- [301] V. M. Purishkevich, *Ubiistvo Rasputina (Iz dnevnika)*, Moscow, 1990, pp. 38-42. 原著 1924 年在里加出版。
- [311] A. I. Spiridovich, *Velikaia voina 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4-1917 gg.*, Vol. II, New York, 1962, p. 214.
- [321] Iusupov, *Memuary*, pp. 193-194. Purishkevich, op. cit., pp. 42-44, 48-52.
- [331] Purishkevich, op. cit., pp. 64-68.
- [341] S. P. Mel'gunov, *Legenda o separatnom mire. Kanun revoliutsii*, Moscow, 2006, p. 419.
- [351]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 pp. 85-186.
- [361] KA, 1926, No. 1, p. 235.
- [371] Maklakov, *Nekotorye dopolneniia*, pp. 268-272.
- [381] Ibid., p. 275.
- [391] Samuel Hoare, *The Fourth Seal: The End of Russian Chapter*, London, 1930, p. 68.
- [401] Iusupov, *Memuary*, pp. 216-217.
- [411] Cullen, op. cit., pp. 18-19, 209-211. 其

- 他详见查尔斯·米尔顿（筑地诚子译）「レーニン対イギリス秘密情報部」（《列宁与英国秘密情报部》），原书房，2016年，12—30页、430页。
- [42] Mel'gunov, *Legenda o separatnom mire*, pp. 415-416.
- [43] *Utro Rossii*, 16 December 1916, p. 6.
- [44] 相关人员所说内容，整体脉络一致。Purishkevich, op. cit., pp. 107-108. Iusupov, *Konets Rasputina. Vospo-minaniia*, pp. 135-172. Iusupov, *Memuary*, pp. 200-210.
- [45] 笔者希望卡伦的疑问和他的结论能为人所知。Cullen, op. cit., pp. 167-211.
- [46] Ibid., pp. 212-213.
- [47] 两张照片最初是由爱德华·拉津斯基公布的。Edward Radzinsky, *The Rasputin File*, Doubleday, New York, 2000, pp. 334-335. 日语版见ラジンスキー（沼野充义、望月哲男译）《拉斯普京真相》下，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4年。该书封面刊有一张。卡伦发表了3张照片。Cullen, op. cit., pp. 108-109.
- [48] A. A. Ivanov, *Vladimir Purishkevich—opyt biografii pravogo politika (1870-1920)*. Moscow-Sankt Peterburg, 2011, p. 260. 伊瓦诺夫也表示，尤斯波夫、普利斯科维奇的说明中包含了虚假内容，他并不赞同英国人的说法。
- [49] I. Kobyl'-Bobul', *Vsia Pravda o Rasputine*. Petrograd, pp. 89-90.
- [50]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 pp. 217-218.
- [51] Cullen, op. cit., p. 213.
- [52] Ibid., pp. 161, 165, 199.
- [53] Iusupov, *Memuary*, p. 210.
- [54] A. Simanovich, *Rasputin, der almaechtige Bauer*, Berlin, 1928, S. 274.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 p. 199.
- [55] *Dnevnik i vospominaniia Anny Vyrubovoi*, p. 172.
- [56]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 V, pp. 203-204.
- [57] Ibid., Vol. V, p. 205.
- [58] Lili Dehn, *The Real Tsaritsa*, London, 1922, pp. 117-119.
- [59] Iusupov, *Memuary*, pp. 214-215.
- [60]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 pp. 200-202. 这封信的全文参见 K istorii ubiistva Grigoriia Rasputina, *KA*, 1923, No. 4, pp. 425-426.
- [61] Iusupov, *Memuary*, pp. 216-217.
- [62]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 V, p. 206.
- [63] Zapiski N. M. Romanova, *KA*, 1931, Vol. 6, p. 97.
- [64] *Utro Rossii*, 18 December 1916, p. 4.
- [65]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 p. 206.
- [66] V. N. Voeikov. *S tsarem i bez tsaria. Gel'singfors*, 1936, p. 180.
- [67]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 pp. 210-211.
- [68] Ibid., pp. 212-217.
- [69]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 271. Voeikov, op. cit., p. 182.
- [70] "Duma—tak Dumal...": Khudozhnik Varelii Karrik i ego karrikatury. *Istochnik*, 1994, No. 3, pp. 32-34.
- [71] V. Karrik, *Voina i revoliutsiia. Zapiski 1914-1917 gg., Golos minuvshego*, 1918, No. 6, pp. 46-47.

- (172) Ibid., p. 48.
- (173) 安德烈·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的日记见 KA, 1928, Vol. I, pp. 187-188.
- (174) *Dnevnik i vospominaniia Anny Vyrubovoi*, p. 175.
- (175)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 p. 221.
- (176) Ibid., pp. 223-224.
- (177) Princess Parley, *Memories of Russia, 1916-1919*, London, n. d. p. 37.
- (178) 书信全文见 KA, 1928, No. 1, pp. 191-192.
- (179) Spiridonovich, op. cit., Vol. II, pp. 228-229.
- (180) 全文参见 *Istochnik*, 1994, No. 4, pp. 37-38.
- (181)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 pp. 225-226.
- (182) Zapiski N. M. Romanova, KA, 1931, Vol. 6, p. 102.
- (183)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 285.
- (184) Buchanan, op. cit., Vol. II, pp. 50-51.
- (185) Karrik, op. cit., GM, 1918, No. 6, p. 51.
- (186) GARF, F. 634, Op. 1, Ed. Khr. 27, L. 88, 88ob. *Dnevnik L.A. Tikhomirova 1915-1917 gg.*, Moscow, 2008, p. 329.
- (187) *Nikolai II i Velikie Kniaz'ia*. Lenin-grad-Moscow, 1925, p. 119.
- (188) M. V. Rodzhianko, *Krushenie imperii i gosudarstvennaia duma i Fevra'skaia revoliutsiia*, Moscow, 2002, p. 220.
- (189) KA, 1926, No. 1, pp. 246-247.
- (190) Mellunas and Mironenko, op. cit., p. 526.
- (191) *Iz vospominanii A. I. Guchkova. Poslednie novosti*, 9, 12, 16, 19, 23, 26, 30 August 1936, p. 2.
- (192)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VI, 1991, No. 7, 8, 9-10, 11, 12. 后被装订成册出版。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Moscow, 1993, 以下参考的均是本书。
- (193) 以上见 A. Senin,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Moscow, 1996.
- (194) 根据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pp. 14-15, F. A. Gaida, *Liberal'naia oppozitsiia na putiakh k vlasti (1914-vesna 1917gg.)*, Moscow, 2003, p. 253, 这次会议是10月中旬召开的。
- (195)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pp. 15-16.
- (196) Ibid., pp. 16-17.
- (197) Mikh. Lemke, *250 dnei v tsarskoi stavke*. Peterburg, 1920, p. 545.
- (198)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pp. 18-20.
- (199) I. S. Vasil'chikov, *To, chto mne uspomnilos'*. Moscow, 2002, pp. 123-124.
- (100)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p. 20.
- (101) Diakin, op. cit., p. 301.
- (102) *Utro Rossii*, 18 December 1916, p. 4.
- (103) Vasil'chikov, op. cit., p. 124.
- (104)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p. 20.
- (105) A. I. Verkhovskii, *Na trudnom perevale*, Moscow, 1959, p. 147.
- (106) 经历见 O. R. Airapetov, *Uchastie Rossiiskoi imperii v Pervyi mirovoi voine*, 1916, Moscow, 2016, pp. 356-

- 357。日俄战争后的感想由古契柯夫讲述。*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p. 23.
- (107) Rodzianko, *Krushenie imperii*, p. 208.
- (108) M. I. Tereshchenko o gen. Krymove, *Den'*, 2 September 1917, p. 2. Martynov, *Tsarskaia armiia v Febr'al'skom perevorote*, Moscow, 1927, p. 56.
- (109) *Zapiski P. N. Vrangl'*, *Beloe delo*, kn, 5, 1928, p.11.
- (110)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p. 23.
- (111) M. I. Tereshchenko o gen. Krymove, *Den'*, 2 September 1917, p. 2.
- (112) Verkhovskii, op. cit., p. 228.
- (113) Kn. G. E. L'vov, *Vospominaniia*, Moscow, 1998, pp. 5-18.
- (114)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p. 155-157.
- (115)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pp. 30-32.
- (116)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I, pp.15-16.
- (117) Mel'gunov, *Na putiakh k dvortsovom perevorotu*, Paris, pp. 105-112.
- (118) 从以下开始数。*Zhurnaly Osobogo soveshchaniia po oborone gosudarstva. 1916 goda*. IV, Moscow, 1977。这是苏联科学院苏联史研究所的出版物。
- (119) *Zhurnaly Osobogo soveshchaniia po oborone gosudarstva. 1917 goda*. I. Moscow, 1978, pp. 41-42.
- (120) *Ibid.*, pp. 138, 142, 144, 145.
- (121) *Ibid.*, pp.158-159, 161.
- (122) *Ibid.*, pp. 170-173.
- (123) *Ibid.*, pp.178-180.
- (124) 质询恩格勒格特的听证会(1917年) 见 Semen Lyanders, op. cit., pp. 57-58。此外, 还有恩格勒格特的回忆录(1956年) 和 B. Engel'gardt, *Potonuvsii mir,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964, No. 1, pp. 80-81。
- (125) P. N.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 II, p. 332.
- (126) *Iz sledstvennykh del N. V. Nekrasova 1921, 1931 i 1939 godov*, VI, 1998, No. 11/12, p. 38.
- (127) Startsev, op. cit., pp. 90, 253.
- (128) 涅克拉索夫的经历见 *Rossiiskii liberalizm serediny XIX-nachala XX veka. Entsiklopediia*. Moscow, 2010, pp. 629-632。
- (129) 柯诺瓦洛夫的经历见 *Ibid*, pp.443-445。*Dekoi mir Rossii. Istorikob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 Sankt-Peterburg, 1998, pp. 203-205.
- (130) 克伦斯基的传记见 Richard Abraham, *Alexander Kerensky: the First Lo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87; S.V. Tiutiukin. *Aleksandr Kerenskii: stranitsy politicheskoi biografii (1905-1917 gg.)*. Moscow, 2012。
- (131)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p. 29-31.
- (132) *Ibid.*, p. 40.
- (133) *Aleksandr Feodorovich Kerenskii (Po materialam Departamenta Politsii)*, Petrograd. 1917, pp. 19-20.
- (134)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p. 94-95.
- (135) *Ibid.*, p. 91.
- (136) *Ibid.*, p. 89.
- (137) *Ibid.*, p. 95.

- [138] Ibid., pp. 139-140.
- [139] Ibid., pp.141-142.
- [140] KA, 1926. No. 4, pp. 29-30.
- [141] KA, 1934, Vol.6. p.90.
- [142] Ibid., pp. 91-92. Shliapnikov, *Kanun semnadtsatogo goda*, ch. II. Moscow-Petrograd, 1923, p.175.
- [143] M. Rafes. *Moi vospominaniia. Byloe*. No. 19.1922, p.170.
- [144] O. A. Ermanskii. *Iz perezhitogo, 1887-1921*, Moscow-Leningrad, p.137. 发行者写的是“Petrogradskoe ob'edinenie rabochikh kooperativov”, 这被理解为“彼得格勒消费合作社”。
- [145] *Gosudarstvennaia Duma. IV-i sozyv*, 13 December 1916. col.1220-1226.
- [146] Abraham, op. cit., p.119.
- [147] *Kanun revoliutsii*. pp. 79-81.
- [148] Ibid., pp. 81-83.
- [149] Ibid., pp. 5-6.
- [150] V ianvare i fevrale 1917 g. Iz donesenii sekretnykh agentov A. D. Protopopova. *Byloe*, 1918, No.13, p. 94.
- [151]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 1, Moscow-Petrograd, 1923, p. 273.
- [152] Doneseniiia L. K. Kumanina iz Ministerskogo pavil'ona Gosudarstvennoi dumy, dekabr' 1911—fevral' 1917 goda, VI, 2000, No. 3, pp. 28.
- [153] Ibid., pp. 29-30.
- [154] *Burzhu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p. 164-165.
- [155] A. Kerenskii, *Nechto o demagogii, Severnye zapiski*, 1917, No.1, p. 203. 丘秋金注意到了这篇随笔。他认为, 虽然克伦斯基在其结尾处写道, 拖

延等于死亡, “除了民主主义之外没有出路”(Tiutiukin, op.cit., p.93), 但原文中没有这样的表述。一般的杂志并不会刊登这样口无遮拦的发言。

第3章 首都彼得格勒的民众

- [1] *Ocherki istorii Leningrada*, Vol. III, Moscow-Leningrad, 1956, p.105. *Istoriia Moskvy*, Vol.V, Moscow, 1955, p.15.
- [2] *Goroda Rossii za 1910 g.* SPb., 1914. p.3.
- [3] O. R. Airapetov, *Uchastie Rossiiskoi imperii v pervoi mirovoi voine. 1917 god*. Moscow, 2016, p. 403.
- [4] Tsuyoshi Hasegawa,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p.160.
- [5] A. T. Wassiljew, *Ochrana: Aus den Papieren des letzten russischen Polizeidirektors*. Zürich, 1930, S.195-197.
- [6] Iakov Dlugolenskii, *Voenno-grazhdanskaia i politseiskaia vlast' Sankt-Peterburga*, Sankt-Peterburg, 2001, pp. 384-388.
- [7] *Protokoly o K. I. Globacheve*, VI, 2002, No. 7. pp.103-113.
- [8] A. G. Rashin, *Formirovanie rabochego klassa Rossii*. Moscow, 1958, p. 83.
- [9] Ibid., pp. 64-65.
- [10] Rashin, op. cit., p. 83.
- [11]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Dokumenty i materialy*. Leningrad, 1958, pp. 274-275.

- [121] Stepanov, *Rabochie Petrograda v period podgorovki i provedeniia Oktiabr'skogo voozruzhennogo vosstaniia*. Moscow-Leningrad, 1965, p. 34.
- [131] A. I. Dabilenko, K voprosu o chislennosti i sostave proletariata Peterburga v nachale XIX veka. *Istoriia rabocheho klassa Leningrada*, vyp.II. Leningrad, 1963, pp. 110-111.
- [141] E. E. Kruze, *Peterburgskie rabochie v 1912-1914 godakh*. Moscow-Leningrad. 1961, p.71.
- [151] 根据表1(第172页)计算。
- [161] Stepanov, *Rabochie Petrograda*, p. 32.
- [171] Ibid., p.31.
- [181] Kruze, op. cit., p.119. Stepanov, *Voprosy chislennosti*, p.86.
- [191] Ibid., pp. 58-60.
- [201] Kruze, op. cit., p.103.
- [211] B. B. Grave, Militarizatsiia promyshlennosti i rossiiskii proletariat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In *Iz istorii rabocheho klassa 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Moscow, 1958, pp. 416, 420.
- [221]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 315.
- [231] Grave, op. cit., p.417.
- [241] Kruze, op. cit., pp. 118-120.
- [251] *Ocherki istorii Leningrada*, Vol. III, Moscow-Leningrad, 1956, pp.950-951.
- [261] 斯大林「ベテルブルク労働者クーリヤの選挙の総決算によせて」(《关于圣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结果》),《斯大林全集》2卷,大月书店,1952年,285—291页。A. Badaev, *Boľsheviki v Gosudarstvennoi dume. Vospominaniia*. Moscow, 1954, pp. 24-46.
- [271] B. S. Seiranian, *Bor'ba boľshevikov protiv voenno-promyshlennykh komitetov*. Erevan, 1961, pp. 60, 61, 64. 在这一点上,不能参考西格尔鲍姆的最新研究。Lewis H. Siegelbaum,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in Russia, 1914-17: A Study of the War-Industries Committees*, Oxford, 1983, pp. 166-167.
- [281] Shliapnikov, *Kanun*, ch.1, pp.112, 130.
- [291] *Statisticheskii sbornik za 1913-1917 gg.*, vyp. II, Moscow, 1922, pp.140-141, 150-151, 160-161.
- [301]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p.145-149, 155, 158-161, 170-173.
- [311] Ibid., pp. 298-299.
- [321] Ibid., pp. 173-178, 617-618.
- [331] Ibid., pp. 185-189, 190-194.
- [341] Kruze, op. cit., p. 318.
- [351] *Iiul'skie volneniia 1914 g. v Peterburge*, PR, 1924, No. 7, pp. 181-214; No. 8-9, pp. 306-323. 此外还有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p.215-218, 221-225, 230-231. Rech', 12 July 1914, p. 2. KA, 1939, Vol.4, pp. 137-155.
- [361] PR, 1924, No. 7, p. 203.
- [371] Rech', 19 July 1914, p. 2.
- [381]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p. 247-248.
- [391] A. Kondrat'ev, *Vospominaniia o podopol'noi rabote peterburgskoi*

- organizatsii RSDRP(b) v period 1914-1917 gg., *KL*, 1922, No. 5, pp. 229-230. Badaev, op. cit., p. 339.
- [40] Kondrat'ev, op. cit., p. 229.
- [41] *Rabochee dvizhenie v gody voyny*. Moscow, 1925, pp. 255-258.
- [42]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p. 325-328, 335.
- [43] Leiberov, O vozniknovenii revoliutsionnoi situatsii v Rossi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yny (iiul'-sentiabr'1915 g.), *IS*, 1964, No. 6, p. 53.
- [44]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p.336-345.
- [45] Ibid., pp. 398-404.
- [46] Ibid., pp. 431-432, 435-437, 439-440, 441-444.
- [47] Ibid., pp. 445-446.
- [48] Ibid., pp. 447-451.
- [49]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p. 57-59.
- [50] *Petrogradskii proletariat i bol'shevistskaia organizatsiia v gody imperialisticheskoi voyny. Sbornik materialov i dokumentov*. Leningrad, 1939, p.166.
- [51] *KA*, 1934, Vol.6, pp. 84-85. *Petrogradskii proletariat i bol'shevistskaia organizatsiia*, p.166.
- [52]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p.490-493.
- [53] Ibid., pp. 493-505, 507-508.
- [54] Ibid., pp. 510-514, 636.
- [55] Ibid., pp. 523-526, 529.
- [56]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p. 48-50. 党员数量参见 *Petrogradskie bol'sheviki v trekh revoliutsiiakh*. Leningrad, 1966, p.134.
- [57] A. A. Babitsin, Podopol'naia rabota partiinoi organizatsii zavoda "Novyi Parviainen" v 1915 g. In *V ogne revoliutsionnykh boev*, pp. 93, 100, 106-107.
- [58] S. Lobov and I. Gavrilov, Iz istorii partiinoi organizatsii na "Krasnom Vyborzhte" ! *KL*, 1926, No. 5, pp. 134-137.
- [59] A. Efimov, Iz istorii partiinogo kollektiva na petrogradskom zavode Staryi Parviainen. *KL*, 1926, No. 3, pp. 41-43.
- [60]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V osveshchenii Petrogr. Okhrannogo otdeleniia), *KL*, 1927, No.1, p.45.
- [61] G. Borisov and S. Vasil'ev, *Stankostroitel'nyi imeni Sverdlova*. Leningrad, 1962, pp. 66-73. *V ogne revoliutsionnykh boev*, pp. 109, 112-114, 127.
- [62] I. Iurenev, "Mezhraionka" (1911-1917), *PR*, 1924, No. 2, p.123.
- [63] *Ocherki istorii Leningrada*, Vol. III, pp. 548, 552.
- [64] Ibid., pp. 548-552.
- [65] Ibid., pp. 555-559.
- [66] Mikh. Slonimskii, *Kniga vospominanii*, Moscow-Leningrad, 1966, p. 9. N. K. Krupskaiia, Samoubiistva sredi uchashchikhsia i svobodnaia trudovaia shkola. *Pedagogicheskie sochineniia*, Vol.1. Moscow, 1960, pp. 135-142.

- [67] M. G. Roshal', *Na putiakh revoliutsii. Vospominaniia bol'shevika*. Moscow, 1957, pp. 13-15.
- [68] A. Shliapnikov, *Kanun semnadsatogo goda*. ch. I, Moscow-Pgd., 1923, p. 20.
- [69] Slonimskii, op. cit., p. 11.
- [70] D. Meisner, *Mirazhi i deistvitel'nost'*. *Zapiski emigrantia*. Moscow, 1966, p. 24.
- [71] *Ocherki istorii Leningrada*, Vol. III, pp. 561-562.
- [72] *Ibid.*, pp. 564-565.
- [73] *Ibid.*, p. 562.
- [74] B. M. Kochakov, *Sostav petrogradskogo garnizona v 1917 g. Uchenye zapiski LGU*. No. 205, Leningrad, 1956, p. 82.
- [75] S. G. Strumilin, *Statisticheskie ekonomicheskie ocherki*, Moscow, 1958, p. 222.
- [76] *Ocherki istorii Leningrada*, Vol. III, pp. 567-570. P. S. Gusiatsnikov, *Studencheskoe dvizhenie v 1905 godu*. VI, 1955, No. 10, pp. 75-81.
- [77] Strumilin, op. cit., p. 223.
- [78] *Ocherki istorii Leningrada*, Vol. III, p. 571. *Russi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1929, pp. 149-150.
- [79]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pp. 160-161.
- [80] *Ibid.*, p. 249. *Russi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pp. 158-159.
- [81] *Vysshie zhenskii (Bestuzhevskie) kursy*. Moscow, 1966, pp. 120-121.
- [82] 当然也有人想参与进去从事政治活动。Roshal', op. cit., pp. 33-37.
- [83] *Russi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pp. 159, 161, 190-192.
- [84] KA, 1926, Vol. 4, pp. 31-34.
- [85]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pp. 513-514.
- [86] Kochakov, *Sostav petrogradskogo garnizona v 1917 g.* p. 64.
- [87] 和田春树「二月革命」(《二月革命》), 357页。
- [88] E. N. Burdzhakov, *Vtoraia msskaia revoliutsiia. Vosstanie v Petrograde*. Moscow, 1967, p. 96.
- [89] G. A. Sobolev, *Petrogradskii garnizon v bor'be za pobedu Oktiabria*. Leningrad, 1985, pp. 6-14.
- [90] Kochakov, op. cit., pp. 67-77.
- [91] Sobolev, op. cit., p. 9-10.
- [92] 「露国研究」(《俄国研究》), 同文馆, 1916年, 53—54页。Kochakov, op. cit., p. 64.
- [93] *Ibid.*, p. 57.
- [94] *Ibid.*, pp. 59-60. 「露国研究」(《俄国研究》), 68—69页。
- [95] *Ibid.*, pp. 61-64, 69.
- [96] V. B. Stankevich, *Vospominaniia 1914- 1919 gg.*, Berlin, 1920, p. 37.
- [97] Kochakov, op. cit., p. 77.
- [98]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Brokgauz-Efron*, Vol. XXXV, Sankt-Peterburg, 1902, pp. 106-107.
- [99] *Zametki soldata o revoliutsionnykh dniakh. Pravda*, 10 March 1917, p. 2. *Ocherki istorii Leningrada*, Vol. III, pp. 977-978.
- [100] V. Shklovskii, *Sentimental'noe*

puteshestvie. Vospominaniia 1917-1922. Moscow- Berlin, 1923, p.10.

- (101) E. I. Martynov, *Tsarskaia armia v fevral'skom perevorote*, Leningrad, 1927, p. 59.
- (102) Shklovskii, op. cit., p.10.
- (103) A. I. Denikin, *Ocherki russkoi smuty*. Vol. I, vyp.1, Paris, p. 8.
- (104)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pp.494, 499.
- (105) Sobolev, op. cit., p.27.
- (106) V. V. Petrash, *Moriaki Baltiiskogo flota v bor'be za pobedu Oktiabria*, Moscow-Leningrad, 1966, p.14.
- (107) Ibid., p.16.
- (108) Ibid., pp. 18-19.
- (109) Ibid., pp. 20-21.
- (110) Ibid., p. 31.
- (111) N. A. Khovrin. *Baltiitsy idul na shturm*, Moscow, 1966, p. 9.
- (112) *Sankt Peterburg. Petrograd. Leningrad. Entsiklopedicheskii spravochnik*. Moscow, 1992, pp. 299-300.
- (113) 和田春树「ニコライ・ラッセル——国境を越えるナロードニキ」(《尼古拉·罗素——超越国境的民粹主义者》)下, 中央公论社, 1973年, 169—170页。
- (114) Iv. Egorov, *Matrosy-bol'sheviki nakunne 1917 goda*. KL, 1926, No. 3, p.9.
- (115) Ibid., pp.10-11.*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armii i na flote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e*, pp. 320-322, 437.
- (116) Ibid., pp. 319-320, 436-437.
- (117) Egorov, op. cit., pp. 14-24.
- (118)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armii i na*

flote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e. pp. 379- 380.

- (119) Ibid., p. 443.
- (120) Ibid., p. 385.
- (121) Ibid., pp. 386-387.
- (122) Ibid., pp. 396-398.
- (123) Rashin, *Naselenie Rossii za 100 let*. Moscow, 1956, p. 325.
- (124) *Ocherki istorii Leningrada*, Vol. III, p.105.
- (125) Roshal', op. cit., pp. 32-34.
- (126) KA, 1926, Vol.4, p. 8.
- (127) *Soiuz russkogo naroda*. Moscow-Leningrad, 1929, pp.10, 15-16.
- (128)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p. 248.
- (129) KA, 1926, Vol.4, p. 6.
- (130) N. Kuznetsov, *Okhtenskii raion v fevral'skie dni 1917 g*. KL, 1926, No. 3, p. 58.

第十章 首都的民主党派

- (1) 出自第三次大会决议(*Tretii s'ezd RSDRP. Protokoly*. Moscow, 1959, pp. 450-452.) 以及列宁为第四次大会所写的决议案(*Chetvertyi s'ezd RSDRP. Protokoly*. Moscow, 1959, pp.480-483, 490-491)。
- (2) Ibid., p. 484.
- (3) *Piatyi s'ezd. RSDRP. Protokoly*. Moscow, 1963, p. 724.
- (4) L. Martov, *Istoriia Rossiiskoi sotsialdemokratii*. Petrograd-Moscow, 1923, pp. 115, 132-135, 140-142.
- (5) I. I. Popov, *Ocherki istorii VKP(b)*,

- 12th ed., vyp.1, Moscow-Leningrad, 1931, pp. 132-152.
- [16] Ibid., pp. 158-159.
- [17] 克鲁普斯卡娅「レーニンの思い出全集」(《列宁回忆录》)下,青木文库,1954年,97—98页。V. T. Loginov, Lenin i “Pravda”, in *Bol'shevistskaia pechat'i rabochii klass Rossii v gody revoliutsionnogo pod'ema 1910-1914*, Moscow, 1965, p.55.
- [18] *Istoriia KPSS*, Vol.II, Moscow, 1966, p.372. A. Kiselev, V iiule 1914 g. PR, 1924, No.7, p. 42.
- [19] Loginov, op. cit., pp. 193, 224. W. Bassow, The Pre-revolutionary PRAVDA and Tsarist Censorship, *American Slavic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XIII, No.1, p. 61. Zhendarmy o Pravde. PR, 1933, No 2, p. 463.
- [10] 普契洛夫工厂是其典型。E. I. Kashchevskaja, Bol'nichnaia kassa Putilovskogo zavoda. VIK, 1963, No. 8, p. 101.
- [11] M. K. Korbuto, Strakhovye zakony 1912 goda i ikh provedenie v Peterburge. KL, 1928, No. 2, pp. 173-174.
- [12] 「レーニン全集」(《列宁全集》)第20卷,414、416页。Kruze, op. cit., pp. 227-228. A. Mitrevich, Vospominaniia o rabochem revoliutsionnom dvizhenii. PR, 1922. No. 4, pp. 225- 227.
- [13] Kruze, op. cit., pp. 232-236. G. Shiklovskii, Peterburgskii komitet bol'shevikov v kontse 1913 g. i v nachale 1914 g. KL, 1926, No. 7, pp. 124-125.
- [14] Shiklovskii, op. cit., pp. 126-138.
- [15] 克鲁普斯卡娅「レーニンの思い出」(《列宁回忆录》)下,青木文库,143—149页。V. I.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48, pp. 295-332. A. Kiselev, V iiule 1914 g. PR, 1924, No. 7, pp 39-43.
- [16] *Listovki peterburgskikh bol'shevikov, 1902-1917*, Vol.2, Leningrad, 1939, pp. 106-108. PR, 1924, No. 7, pp. 185-186. *Bol'shevistskaia pechat'*, vyp. III, p. 508. A. Badaev, *Bol'sheviky v Gosudarstvennoi dume, Vospominaniia*, Moscow, 1954, pp. 300-302.
- [17] Kiselev, op. cit., pp. 44-45, 47-48.
- [18] Ibid., pp. 48-50.
- [19] PR, 1924, No. 7, p. 213. *Listovki peterburgskikh bol'shevikov*, Vol.2, pp. 109-110.
- [20] PR, 1924, No. 8/9, pp. 314-315, 318-319. *Pamiatniki agitatsionnoi literatury Ross, sots.-dem.rabochei partii*, Vol.6, vyp. 1. Proklamatsii 1914 g. Moscow-Petrograd, 1923, p.79. 传单的署名是“D. K. L. B.”。
- [21] *Pamiatniki agitatsionnoi literatury*, pp. 80-81. Shliapnikov, *Kanun*, ch. I, p. 28. Kondrat'ev, op. cit., KL.1922, No. 5, p. 229.
- [22] *Gosudarstvennaia дума. IV-i sozyv,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27 July 1914, col.19-20. N. N. Krestinskii, Iz vospominanii o 1914 gode. PR, 1924, No. 7. pp. 59-60. A. Kerensky,

The Crucifixion of Liberty, London, 1934, p. 209.

- [23] 全文见 *Pamiatniki agitatsionnoi literatury*, pp. 86-88. Badaev, op. cit., p.350.
- [24] Krestinskii, op. cit., pp. 60-64. D. Baevskii, *Partiia v gody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In *Ocherki po istorii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Vol. I, Moscow-Leningrad, 1927, p. 353. *Pamiatniki agitatsionnoi literatury*, p. 279.
- [25] 「レーニン全集」(《列宁全集》)第21卷, 3—7页。
- [26] Baevskii, op. cit., p. 356. F. N. Samoilov, *Protsess bol'shevistskoi fraktsii IV Gosudarstvennoi dumy*. PR, 1926, No. 3, pp.156, 159.
- [27]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 40. Shliapnikov, *Kanun*, ch.1, p. 180.
- [28] Krestinskii, op. cit., pp. 61, 64.
- [29] Podopol'naia rabota v gody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v Petrograde. *KL*, 1922, No. 2-3, pp. 116-117, 129-131, 136-137. Kondrat'ev, op. cit., *KL*, 1922, No. 5, pp. 230-232, 241-242. 传单见 *Pamiatniki agitatsionnoi literatury*, pp. 84-85。
- [30]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 32. M. G. Fleer, *Peterburgskii komitet bol'shevikov v gody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KL*, 1926, No. 4, pp. 112-118.
- [31]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p. 36-37.
- [32] R. Arskii, *V Petrograde vo vremia voiny*. *KL*, 1923, No. 7, pp. 80-81.

Shliapnikov, *Kanun*, ch. I, pp.183, 188.

- [33]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p. 34, 37, 49-53.
- [34] V. Vasil'evskaia, *Zabastochnoe dvizhenie v Peterburge za 1914-1916 gg. Po agenturnym dannym*. PR, 1923, No.1, p. 65.
- [35] V. Vinogradov, *Organizatsiia bol'shevikov na peterburgskoi Metallicheskom Zavode v 1915 godu*. *KL*, 1926, No. 3, p. 34.
- [36] 「レーニン全集」(《列宁全集》)第21卷, 417页。
- [37] Lenin, *Polnoe sobranie socinenii*, Vol. 49, p.160.
- [38] *Listoki peterburgskikh bol'shevikov*, Vol. 2, pp. 173-175.
- [39]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p. 235. *Rabochee dvizhenie v gody voiny*, pp. 392, 631.
- [40]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pp. 419-420.
- [41] Shliapnikov, *Kanun*, ch. I, pp. 188-198. P. Arskii, op. cit., p. 81.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 40.
- [42]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gg.*, pp. 435-436.
- [43] *Listovki peterburgskikh bol'shevikov*, pp. 197-198.
- [44] *Petrogradskii proletariat i bol'shevistskaia organizatsiia v gody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p.166.
- [45]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p. 61-62. A. Ia. Tikhonov and Tkacheva, *Podopol'naia bol'shevistskaia pechar'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VIK, 1963.

- No. 9, pp. 87-88.
- (146) 指示和传单见 *Listovki peterburgskikh bol'shevikov*, pp. 220-224.
- (147) *Petrogradskii proletariat i bol'shevistskaia organizatsiia v gody imperalistticheskoi voiny*, p.167. F. Lemeshev, Na Putilovskom zavode v gody voiny. *KL*, 1927, No. 2, p. 32.
- (148) *Listovki peterburgskikh bol'shevikou*, pp. 225-226.
- (149) *Rabo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 508.
- (150) *Deiateli SSSR 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Rossii.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GRANAT*. Moscow, 1989, pp. 553- 557, 766-769. Shliapnikov, *Kanun*, ch.1, pp. 249-250. P. A. Zalutskii, V poslednie dni podpol'nogo Peterburgskogo komiteta bol'shevikov v nachale 1917 g., *KL*, 1930, No. 2, p. 34.
- (151) E. D. Stasova, *Stranitsy zhizni i bor'by*. Moscow, 1960, pp. 60-61.
- (152) Shliapnikov, *Kanun*, ch. II, pp. 35-42. *VIK*, 1965, No. 9, p. 81.
- (153) Shliapnikov, *Kanun*, ch. II, pp. 26-34.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 1, Moscow-Petrograd, 1923, pp. 60-61.
- (154) Shliapnikov, *Kanun*, ch.II, pp. 72-75.
- (155) P. A. Zalutskii, V poslednie dni poslednego Peterburgskogo komiteta bol'shevikov v nachale 1917 g. *KL*, 1930, No. 2, pp.34-35. I. Menitskii,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oennykh godov 1914-1917*. Vol. 2, Moscow, 1925, pp. 192-193.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 61. Fleer, op.cit., p.112. M. G. Skorodnikov, A. K. Skorokhodov. *Bipigraficheskii ocherk*. Leningrad, 1965, pp.160-181. A. P. Konstantinov, Rabochii bol'shevik (K 80-letiiu I. D. Chugurina). *VIK*, 1963, No. 8, pp. 97-99.
- (156) Tikhanov and Tkacheva, op. cit., pp. 88-89.
- (157) Lemeshev, op. cit., p. 34.
- (158) Leiberov, *Petrogradskii proletariat v bor'be za pobedu Fevral'skoi burzhuazno-demo kraticheskoi revoliutsii v Rossii*, *IS*, 1957, No. 1, p.55. V ogne revoliutsionnykh boev (*Raionny Petrograda v dvukh revoliutsiakh 1917 g.*) *Sb. Vospominanii starykh bol'shevikov-pitertsev*. Moscow, 1967, pp.81, 83.
- (159) *Pravda*, 7 March 1917, p. 4; 8 March 1917, p. 3.
- (160) V. N. Kaiurov, *Sormovo v pervoi revoliutsii*, Nizhni-Novgorod, 1920, pp. 23-27, 162-164, 172-173. 下面这篇论文首次指出这件事情说明了“索尔莫沃·尼古拉耶夫同乡会”的存在。James D. White, *The Sormovo-Nikolaev zemliachestvo 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oviet Studies*, Vol. XXXI, No.4, pp. 475-504.
- (161) Lemeshev, op. cit., pp. 21-25. Kashchevskaia, op. cit., pp. 101-104.
- (162) Narvskaia zastava v 1917 godu. Leningrad, 1960, pp. 59, 62.
- (163) S. I. Tsukerman, *Petrogradskii raionnyi komitet bol'shevikov v 1917 godu*, *KL*, 1932, No. 4, p. 32.

- 1641 *Petrogradskie bol'sheviki v trekh revoliutsiiakh*, Leningrad, 1966, p. 137.
- 1651 A. P. Taimi, Strainitsy proshlogo. In *V gody podpol'ia*. Moscow, 1964, p. 349.
- M. M. Koronen, Finny-uchastniki Oktiabria. VI, 1967, No 6, pp. 19, 22.
- 1661 Shliapnikov, *Kanun*, ch. II, p. 267.
- 1671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Granata*, Vol. 41, ch.1, col. 225.
- 1681 *Sed'maia (Aprel'skaia) Vserossiiskaia konferentsiia RSDRP(b). Protokoly*. Moscow, 1959, p. 201.
- 1691 *Kanun revoliutsii*, Petrograd, 1918, pp. 15-16.
- 1701 Lenin, *Sochineniia*, 3-d edition. Vol. XVII, p. 761. *Politicheskie deiateli Rossii. 1917. Biograficheskii slovar'*, Moscow, 1993, pp. 76-77. Theodore Dan,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London, 1964, p. 393.
- 1711 Lenin, *Sochineniia*, 3-d edition, Vol. XVI, p. 756.
- 1721 *Kanun revoliutsii*, p.16. *Rabochee dvizhenie v gody voyny*, p. 276. Lenin, *Sochineniia*, 3-d edition, Vol. XVI, pp. 707, 778-779; Vol. XIX, p. 452.
- 1731 Theodore Dan, op. cit., pp. 391-394.
- 1741 全文见 Shliapnikov, *Kanun*, ch.1, pp. 128-129.
- 1751 *Kanun revoliutsii*, pp. 17-21.
- 1761 *Ibid.*, pp. 21-23.
- 1771 *Ibid.*, pp. 25-26.
- 1781 *Ibid.*, pp. 26-27.
- 1791 *Ibid.*, pp. 27-32.
- 1801 *Ibid.*, pp. 38-41.
- 1811 *Ibid.*, pp. 41-42.
- 1821 *Ibid.*, pp. 43-46.
- 1831 *KA*, 1934, Vol.6, pp. 46-47.
- 1841 *Kanun revoliutsii*, pp.59-61.
- 1851 *Ibid.*, pp. 61-62.
- 1861 *KA*, 1933, Vol.2, pp. 49-63. Gvozdevshchina v dokumentakh, *Izvestiia obshchestva arkhologii, istorii i etnografii pri Kazanskom gosudarstvennom universitete*, No. 34 (1929), pp. 246-255.
- 1871 *KA*, 1933, Vol.2, p. 63.
- 1881 I. Iurenev, "Mezhraionka" (1911-1917 gg.), *PR*, 1924, No.1, pp. 115-117, 123-125. 尤列涅夫是波兰籍, 见 R. Kovnator, Nakanune "Fevralia" (Otryvki iz vospominanii), In *Revoliutsionnoe iunoshestvo. Sbornik I*, Leningrad, 1924, p.182.
- 1891 *Ibid.*, p.127. A. Popov. Stranichka vospominanii o rabote v "Mezhraionke", *PR*, 1923, No.10, p. 96. *Pamiatniki agitatsionnoi literatury Ros.sots.-dem. rabochei partii*, Vol.6, pp. 81-82.
- 1901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1, pp.128-136.
- 1911 Popov, op. cit., pp. 97-100.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116.
- 1921 L. Leont'eva, V riadakh "Mezhraionki", *KL*, 1924, No. 2, pp. 143-144.
- 1931 *Ibid.*, p.134.
- 1941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123.
- 1951 *KA*, 1926, Vol.4, p.8.
- 1961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p.116-117, 119, 124.
- 1971 *Ibid.*, pp.118, 128.

- (198) *Politicheskie deiateli Rossii*, 1917, pp. 366-367.
- (199)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p. 126-128.
- (1100)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 45.
- (1101)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1, pp. 135-136.
- (1102) 1916年10月的传单见Shliapnikov, *Kanun*, ch. II, pp. 136-137。
- (1103)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1, pp. 265-268.
- (1104) Lenin, *Sochineniia*, 3-d edition, Vol. XVI, p. 707.
- (1105) *Pamiatniki agitatsionnoi literatury Ros. sots.-dem. rabochei partii*, Vol.6, pp. 95-96.
- (1106) O. A. Ermanskii, *Iz perezhitogo, 1887-1921 gg.*, Moscow-Leningrad, 1927, pp. 112-113, 121-122. 格林纳维奇有关信息是依据 *Mensheviki v 1917godu*. Vol. I, Moscow, 1994, p. 664 的问卷调查(本名 K. S. Shekhter)做出的推测。
- (1107) *IA*, 1961, No. 5, p. 78.
- (1108) Shliapnikov, *Kanun*, ch. II, pp. 17-18.
- (1109) Ermanskii, op. cit., pp. 129-134.
- (1110) *Ibid.*, p. 127.
- (1111) Shliapnikov, *Kanun*, ch. I, p. 293.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 I, pp. 264-265.
- (1112) *Politicheskie deiateli Rossii*, 1917, pp. 353-354.
- (1113) *Ibid.*, p. 290.
- (1114) Startsev, *Tainy russkoi masonov*, pp. 235-236.
- (1115) Shliapnikov, *Kanun*, ch. I, p. 103. 施略普尼柯夫指出了契恒凯里和豪斯托夫的爱国主义。
- (1116) Ermanskii, op. cit., pp. 119-121.
- (1117)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 46.
- (1118) *Protokoly pervogo s'ezda Partii sotsialistov-revoliutsionerov*, 1906, p. 360.
- (1119) 「レーニン全集」(《列宁全集》)第12卷, 63—67页, 83—89页。
- (1120) P. P. Maslov, *Narodnicheskie partii. Obshchestvennoe dvizhenie v Rossii v nachale XX veka*, Vol. III, Sankt-Peterburg, 1914, p. 128.
- (1121) 和田春树「歴史の中のエスエル党」(《历史中的社会革命党》), 「思想」1977年12月号, 4—6页。
- (1122) N. Sviatitskii, *Voina i predfevral'e, Katorga i ssylka*, No. 75(1931), p. 9.
- (1123) *Gosudarstvennala Duma. IV-i sozyv.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26 July 1914, col. 18-19.
- (1124) *Aleksandr Feodorovich Kerenskii (Po materialam Departamenta Politsii)*, Petrograd, 1917, pp. 18-19.
- (1125) Hasegawa, op. cit., p. 136. L. M. Shalaginova, *Esery-Internatsionalisty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In *Pervaiia mirovaia voina 1914-1918*. Moscow, 1968, p. 330. Melancon, op. cit., pp. 94-97.
- (1126) Melancon, op. cit., pp. 99-100.
- (1127) *Aleksandr Feodorovich Kerenskii*, pp. 35-36.
- (1128)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405.

- [129] Melancon, op. cit., pp.108-110.
- [130] Sviatitskii, op. cit., p. 39.
- [131] Shliapnikov, *Kanun*, ch.1, pp. 208-209, 293; ch. II, pp. 139-140.
- [132] Sviatitskii, op. cit., pp. 40-42.
- [133] KA, 1926, No. 4, p. 8.
- [134]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 I, pp. 160-161.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138.
- [135] *V gody podopol'ia*, Moscow, 1964. p. 250.
- [136] 关于当时的索科洛夫, 参见 Ia. Martov, *Zapiski sotsial-demokrata*, Moscow, 1924, pp. 74, 81.
- [137] D. Sverchkov, *Na zare revoliutsii*, Leningrad, 1925, p.194.
- [138] Ermanskii, op. cit., p.115.
- [139] Shliapnikov, *Kanun*, ch.1, pp. 103-104, 294-295.
- [140] 和田あき子「ゴーリキーと二人の妻」(《高尔基与两位妻子》), 《图书》1968年6月号, 46—51页。
- [141] A. Ovcharenko, *Publitsistika M. Gor'kogo*, Moscow, 1965, pp. 316-317.
- [142] M. Gor'kii,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24, pp.159-160.
- [143] *Letopis' zhizni i tvorchestva A. M. Gor'kogo*, Vol.2. Moscow, 1958, pp. 492, 499-500, 507, 522.
- [144] 和田春树「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と革命ロシア」(《马克思、恩格斯与革命俄国》), 劲草书房, 1975年, 406—408页。「レーニン全集」(《列宁全集》)第20卷, 494—498页。N. Sukhanov, *Nashi levye gruppy*

i voina, Petrograd, 1916. 著者科尔尼科夫的介绍如下: Sukhanov, *Zapiski o revoliutsii*, Vol.1, Moscow, 1991, pp. 16-23.

- [145] Ermanskii, op. cit., pp. 123-125. Arskii, op. cit., pp.82-83. *Letopis' zhizni i tvorchestva A. M. Gor'kogo*, Vol.2, pp. 514, 518, 522, 566, 576-577, 583.
- [146] Sviatitskii, op. cit., pp. 28-37.
- [147] V. Zenzinov, *Iz zhizni revoliutsionera*. Paris, 1919, pp. 77-80.

第5章 首都的革命

- [1] Buchanan, op. cit., Vol.II, p. 52. M. Paleologue, op. cit., tome III, p. 177.
- [2]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 288.
- [3] Buchanan, op. cit., pp. 52-53.
- [4] Paleologue, op. cit., tome III, p.181.
- [5] Buchanan, op. cit., pp. 53-54.
- [6] Paleologue, op. cit., tome III, p.187.
- [7] Airapetov, op. cit., 1917, Moscow, 2016, pp.38-39.
- [8] Bruce Lockhart, *Memoirs of a British agent*, London and New York, 1932, pp. 163-167.
- [9]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L. 151-152.
- [10] Paleologue, op. cit., tome III, p.198.
- [11] KA, 1933, Vol. 2, pp. 70-72.
- [12] *Byloe*, 1918, No.13, pp.103, 109.
- [13] *Burzhu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p. 174, 179.
- [14] 全文中署名为“被组织起来的劳动

- 者社民派”(Organizovannnye Rabochie S, -D.) 的部分, 收录在 *Kanun revoliutsii*, pp.94-100 中。目前已在档案馆发现了署名为“被组织起来的社民劳动者的会议 (Soveshcharde Organi-zovannykh rabochikh s-d.)”的内容相同的文件, 该文件已收录在资料集中。在 RGARSPI, F.451, Op.2, D.143, L.7, 7ob., 8.8ob. *Mensheviki v 1917godu*. Vol.1, Moscow, 1994, pp.108-112, 两者都没有日期。
- [151] 全文参见和田春树、和田あき子「血の日曜日」(《流血星期日——俄国革命的开端》) 91—98 页。
- [161] Evg. Maevskii, Obshchaia kartina dvizheniia. In *Obshchestvennoe dvizhenie v Rossii v nachale XX-go veka*. Vol.II, ch.1, S.-Peterburg, 1910, pp. 34-184.
- [171] 这篇发表在 Shliapnikov, *Semnadsaty god*, kn.I, pp. 279-280 上。档案馆收录了内容大致相同、结语很长的异本文章。RGASPI, F.451, Op. 2, D.143, L. 3ob. *Mensheviki v 1917 godu*. Vol.1, pp. 120- 122.
- [181]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KL, 1927, No.1, p. 43.
- [191] KA, 1933, Vol. 2, p. 72.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VI, pp. 286-287. *Kanun revoliutsii*, p.101.
- [201]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VI, pp. 285.
- [211] *Burzhuaizii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185.
- [221] Ibid., pp. 180-184.
- [231] *Novoe vremia*, 30 January 1917.
- N.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Khronika sobytii)*, Vol.1, Moscow-Petrograd, 1923, pp. 14-15.
- [241] Paleologue, op. cit., tome III, p.192.
- [251] 全文见 Shliapnikov, *Semnadsaty god*, kn.I, pp. 280-281。
- [261] *Burzhuaizii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184.
- [271] Ibid., p.186.
- [281] Shliapnikov, *Semnadsaty god*, kn.I, pp.52-53.
- [291] Ermanskii, op. cit., p.136.
- [301] Shliapnikov, *Semnadsaty god*, kn.I, pp. 53-54.
- [311] Ermanskii, op. cit., pp. 136-137.
- [321] Shliapnikov, *Semnadsaty god*, kn.I, p. 38.
- [331]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 43.
- [341] *Burzhuaizii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185.
- [351]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i Okhrannoe otделение, *Byloe*, 1918, No.1, p.160.
- [361] PR, 1923, No.1, pp.275-278. Shliapnikov, *Semnadsaty god*, kn.I, pp. 287-290.
- [371] 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行动, 最可靠的资料是2月11日施略普尼柯夫寄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书信。
- [381] 全文见 Ibid, No. 147, pp. 243-245。此外可见 Shliapnikov, *Semnadsaty god*, kn.I, pp. 41, 42。
- [391] VIK, 1965, No. 9, p.81.
- [401] *Bol'sheviki v gody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Moscow, 1939, p.172.
- [411] Shliapnikov, *Semnadsaty god*, kn.I,

- pp. 41, 47.
- [42] Ibid., p.81. A. Blok, *Poslednie dni imperatorskoi vlasti. Sobranie sochinenii*, Vol.6, Moscow-Leningrad, 1962, p. 215. 原著于1921年出版。
- [43] *PR*, 1923, No.1, pp. 273-274. 在Iurenev, op. cit., *PR*, No. 2的第131页中出现了支持2月13日罢工的内容, 但这可能是错误的。
- [44] R. Kovnator, *Nakanune "Fevralia"*, pp. 185-186.
- [45] V. Karrik, *Voina i revoliutsiia. Zapiski 1914-1917 gg. Golos minuvshogo*, 1918, No. 7-9, p.56.
- [46] Ibid., p.58.
- [47] Blok, op. cit., p. 213.
- [48] Ibid., pp. 211-212. Burdzhakov, op. cit., p.104.
- [49]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pp. 534-539.
- [50] *Rech'*, 10 February 1917, p. 3.
- [51] *Byloe*, 1918, No.1, pp. 160-161.
- [52] Karrik, op. cit., p. 59.
- [53] *Rech'*, 10 February 1917, p. 3.
- [54]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KL*, 1927, No. 1, p.44.
- [55] 全文见 A. Blok, *Poslednie dni Imperatorkoi vlasti*, Peterburg, 1921, pp. 158-166。
- [56] Block, op. cit., Moscow, 1962, pp. 217-218.
- [57]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 311. *VIK*, 1965, No. 9, p. 81.
- [58]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 44.
- [59]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133.
- [60]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186.
- [61]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 41.
- [62] Ibid., p.42.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188.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 312.
- [63]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p. 185-186.
- [64] Ibid. pp. 186-187.
- [65] Kovnator, op. cit., p.186.
- [66] A. P. Konstantinov, *Rabochii bol'shevik (K 80-letiiu I. D. Chugurina)*, *VIK*, 1963, No. 8, p. 98.
- [67] A. Ia. Avdeev, *Revoliutsiia 1917 goda (Khronika sobytii)*, Vol.1, Moscow-Petrograd, 1923, pp. 22-23.
- [68]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pp. 541-542.
- [69]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133.
- [70] RGIA, F.1282, Op.1, D. 741, L.1.
- [71] Kovnator, op. cit., p.186.
- [72] *Byloe*, 1918, No.1, p.160.
- [73]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p.542.
- [74]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 311.
- [75] *Pravda*, 5 March 1917, p. 2.
- [76]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 42.
- [77] RGIA, F.1282, Op.1, D. 741, L.1ob.
- [78]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 312.
- [79]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 42.
- [80]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 revoliutsii, pp. 187-188.
- [181]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 44.
- [182] Sviatitskii, op. cit., p. 50.
- [183] Kovnator, op. cit., p.187.
- [184]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 293.
- [185]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1, pp. 57-58.
- [186] *Rech'*, 14 February 1917, p. 2; 15 February 1917, p.1.
- [187] *Gosudarstvennaia Duma*, IV-i sozyv, 15 February 1917, col. 1344-1345.
- [188] Ibid., col. 1345-1353.
- [189] Kerensky, *Russia and History's Turning Point*, New York, 1965, p.186.
- [190] *Gosudarstvennaia дума*, IV-i sozyv, 15 February 1917, col. 1352. Abraham, op. cit., pp. 121-122. Tiutiukin, op. cit., pp.96-97.
- [191] *Utro Rossii*, 16 February 1917, p. 4.
- [192]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1, p.312.
- [193]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 1917 gg.*, p. 546.
- [194] Ibid., pp. 546-547.
- [195] 全文见 *Listovki peterburgskikh bol'shevikov*, Vol.2, pp. 247-249。
- [196] I. A. Aluf, O nekotorykh voprosakh Fevral'skoi revoliutsii, *VIK*, 1967, No.1, p. 24.
- [197]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pp. 543-546.
- [198] *Gosudarstvennaia дума*, IV-i sozyv, 17 February 1917, col. 1525-1531.
- [199] Ibid., col. 1550-1551.
- [100]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 V, p. 215.
- [101] *Novoe vremia*, 15 February 1917, p. 6; 16 February 1917, p. 5.
- [102] Rodzianko, *Krushenie imperii*, p. 222.
- [103] M. Mitel'man, B. Glebov and A. Ul'ianskii, *Istoriia Putilovskogo zavoda*. Moscow, 1961, pp. 543-546.
- [104] Abraham, op. cit., p.122.
- [105] Voeikov, op. cit., p.192.
- [106]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294.
- [107]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p. 160.
- [108] Voeikov, op.cit., p.193. 普罗托波波夫在1918年8月被契卡枪毙之前写下的笔记中讲述了自己向沙皇说明当前形势的危险之处,并希望缩短去最高统帅部的时间。Predsmertnaia zapiska. A. D. Protopopova, *Golos minuvshogo na chuzhoi storone*, 1926, No. 2, pp.191-192. 但是沃耶科夫的证据更可靠。
- [109] *Dnevnik i vospominaniia Anny Vyrubovoi*, p.173.
- [110] *Istoriia Vtorogo Internatsionala*, Vol. II, Moscow, 1966, pp. 378-379. KA, 1938, Vol.2, pp. 8-12.
- [111] *Listovki peterburgskikh bol'shevikov*, Vol.II, pp. 143, 198-201.
- [112]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p. 132-133.
- [113]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1, p. 74.
- [114] 全文见 Ibid., pp. 306-308 和 PR, 1923, No. 1(13), pp. 282-284; *Fevral'skaia*

- revoliutsiia* 1917.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1996, pp. 19-21.
- (1151) Byloe, 1918, No.1, p.163.
- (1161) Ermanskii, op. cit., p.138.
- (1171) Iuren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p. 132-133.
- (1181) V. Kaiurov, *Shest' dnei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R, 1923, No.1, p.158.
- (1191) RGIA, F.1282, Op.1, D. 741, L.114.
- (1201) A. Balk, *Poslednie plat' dnei tsarskogo Petrograda* (23-28 fevralia 1917 g.). *Dnevnik poslednego Petrogradskogo gradonachal'nika*,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L.1. 这段回忆经加奈林复述。 *Sumerki*. Sankt-Peterburg, 1991, Vyp.13, pp. 126-159.
- (1211) I. I. Mints, *Istoriia Velikogo Oktiabria*, Vol.1, Moscow, 1967, p. 490.
- (1221) Kaiurov, op. cit., p.158.
- (1231) *Petrogradskie bol'sheviki v trekh revoliutsiakh*, pp. 154-155.
- (1241) M. Gordienko, *Iz boego proshlogo*, M., 1957, pp. 56-57. 孟什维克说“因为是妇女节，所以只让妇女们来做”这一记述恐怕不准确。
- (1251) 维堡区警察第二分局局长的报告见 RGIA, F.1282, Op.1, D. 741, L. 10. 关于这天运动的基础史料来自上述各警察局局长的报告。
- (1261) 根据各警察局发给安保部的文件报告汇总，见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 1, p. 84, 这是二级基本史料。除此之外，还有安保部长给内务大臣的报告书。 Ibid., pp. 316-319.
- (1271) I. Markov. *Kak proizoshla revoliutsiia* (Zapis' rabocheho), *Volia Rossii*, 1927, No. III, pp. 67-70. 作者是新兵工厂的工人，是社会革命党人士。
- (1281) RGIA, F.1282, Op.1, D. 741, L.111ob.
- (1291) Ibid., L.128.
- (1301) Ibid., L.111ob.
- (1311) Ibid., L.131-131ob.
- (1321) Ibid., L. 118-118ob.
- (1331) A. P. Balk, op. cit., L.1.
- (1341) Globachev, *Pravda o russkoi revoliutsii*. *Vospominaniia byvshego Nachal'nika Petrogradskogo Okhrannogo otdeleniia*, Bakhmet'ev colle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p. 77. 这段回忆公开在 VI, 2002, No. 7-10 上。
- (1351) R. Sh. Ganelin, *V Rossii dvadtsatogo veka*, Moscow, 2014, pp. 503, 510.
- (1361)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 1, pp. 79-80.
- (1371) RGIA, F.1282, Op. 1, D. 741, L.119-119ob.
- (1381) Ibid., L.133.
- (1391)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 1, p. 78. I. P. Leiberov, *Na shturm. samoderzhaviia. Petrogradskii proletariat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i Fevral'skoi revoliutsii*, Moscow, 1979, p.131.
- (1401) I. O. Akaemov, *Agoniia starogo rezhima*, *Istoricheskii vestnik*, 1917, April, pp. X-XI.
- (1411) Martynov, op. cit., p.71.
- (1421) 克伦斯基的演讲见 *Gosudarstvennala дума*, IV-i sozyv, 23 February 1917, col. 1649-1653.

- (1143) Ibid., col.1660.
- (1144) I. P. Leiberov, *Na shturm camoderzhaviia*, pp. 154-155. Hasegawa, op. cit., p. 229.
- (1145) N. Sveshnikov, Otryvki iz vospominanii, *Petrogradskaia Pravda*. 14 March 1923, p.10. 全文收录在 *Krushenie tsarizma. Vospominaniia uchastnikov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v Petrograde*. Leningrad, 1986 中。该词条在 233—234 页。扎鲁茨基虽然弄错了本次会议和 24 日市委、地区委员会的联合会议，但内容是 23 日晚上会议的内容。Ialutskii, op. cit., 37.
- (1146)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140. 尤列涅夫错误地认为，这一决定是在 24 日晚做出的。传单见 Burdzhakov, op. cit., p.155.
- (1147) Balk, op. cit., LL.1-2, Ganelin, op. cit., pp. 506-507.
- (1148) 全文见 Blok. op. cit., Moscow, 1962, p. 223.
- (1149) Ibid., p. 224.
- (1150) 当天运动的基础史料包括来自各警察局的报告 (RGIA, F.1282, Op.1, D. 741)、各警察局给安保部的文件报告汇编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p. 91-101)、安保部长报告 (Byloe, 1918, No.1, pp. 164-167)、提交给特别市市长的报告 (Akaemov, op. cit., pp.XI-XVII)。
- (1151) Byloe, 1918, No. 1, p.164. Akaemov, op. cit., p. XI. Leiberov, *Na shturm camoderzhaviia*, p.144.
- (1152) Byloe, 1918, No. 1, p.165.
- (1153) Ibid. p.167.
- (1154) Kalurov, op. cit., p.159. Gordienko, op. cit., p. 57.
- (1155) Akaemov, op. cit., p. XI. RGIA, F. 1282, Op. 1, D. 741, L.16, 24-24ob.
- (1156) Sveshnikov. Op. cit., p.10.
- (1157) RGIA, F.1282, Op.1. D. 741, L. 34, 34ob., 35.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 97.
- (1158) RGIA, ibid., L. 162. Shliapnikov, op. cit., p. 95.
- (1159) RGIA, ibid., L. 52-52ob. Shliapnikov, op. cit., p. 98.
- (1160) 哈巴洛夫的陈述见 *Padenie tsarskogo rezhina*, Vol. I, pp.184-185.
- (1161) Ibid., pp. 186-189. Martynov, op. cit., p. 75, Avdeev, op. cit., p. 34.
- (1162) RGIA, F.1282, Op.1, D. 741, L. 38, 38ob., 39, 39ob.
- (1163) Byloe, 1918, No.1, p.164.
- (1164) RGIA, F.1282, Op.1, D. 741, L. 51-51ob.
- (1165) Ibid., L. 40.
- (1166) Byloe, 1918, No.1, p.162. Mints, op. cit., p. 510.
- (1167) Kalurov, op. cit., p.161.
- (1168) Avdeev, op. cit., p. 33.
- (1169) *Vospominaniia generala A. S. Lukomskogo*, Vol.1, Berlin, 1922, p.121.
- (1170) Martynov, op. cit., p. 73.
- (1171) Akaemov, op. cit., pp. XVI-XVII.
- (1172) Balk, op. cit., L. 4/a-4/b.
- (1173) Blok, op. cit., Moscow, 1962, p. 223. Avdeev, op. cit., p. 35. 但在罗江科的回忆和哈巴洛夫、戈林的陈述中都

- 没有出现。
- [174]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 V, pp. 214-215.
- [175]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I, pp. 87-88.
- [176] Sveshnikov, op. cit., p.10.
- [177]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p. 87-88.
- [178] Ibid., p. 320. Akaemov, op. cit., p. XVII. Leiborov, *Na shturm camoderzhaviia*, p.189.
- [179] 这一天运动的基础史料包括来自各警察局的报告(RGIA, F.1282, Op.1, D. 741)、各警察局汇报给安保部的文件报告汇编(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p. 110-118)、特别市市长处收到的报告总结(Akaemov, op. cit., pp. XVII-XXII)。
- [180] Avdeev, op. cit., p. 36.
- [181]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 64.
- [182] Kaiurov, op. cit., p.162.
- [183]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117.
- [184] Kovnator, op. cit., pp. 187-188. Hasegawa, op.cit., p. 248. 长谷川解释说, 科夫纳特是男性, 收到了女性朋友的裙子。
- [185] RGIA, F.1282, Op.1, D. 741, L. 74-74ob. Akaemov, op cit., p. XVIII.
- [186]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65. 巴尔克回忆说, 这起事件发生在24日, 自己25日去探望了夏尔菲夫。Balk, op. cit., L. 4b. 这是错误的。
- [187] Akaemov, op. cit., p. XVIII.
- [188] RGIA, F.1282, Op.1, D. 741, L. 99.
- [189]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 V, pp. 217-218.
- [190]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p. 65-66.
- [191] Iu. Trifonov, *Mal'chik vel dnevnik. Literaturnaia gazeta*, 6 November 1965, p.2. 瓦西里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阿基特的女主人的儿子写的初中生日记。
- [192]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111.
- [193] Akaemov, op. cit., p. XIX.
- [194] Ibid., p. XX.
- [195]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p.110-111.
- [196] 从时间上看, 哈巴洛夫于3时左右给最高统帅部发出了报告(KA, 1927, Vol.1, p. 4)。此处参考了首次公开卡扎克名字的调查(E. Efremov, *Podvig na Znamenskoï, Neva*, 1962, No. 2, pp. 218-219)。
- [197] Kaiurov, op. cit., pp. 162-163.
- [198] RGIA, F.1282, Op.1, D. 741, L.73.
- [199] KA, 1927, Vol.1, p. 5.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 323.
- [200] Kaiurov, op. cit., p.164.
- [201] RGIA, F.1282, Op.1, D. 741, L.105.
- [202] Burdzhakov, op. cit., p.152.
- [203] Mints, op. cit., Vol.1, p. 514.
- [204] Kaiurov, op. cit., p.162.
- [205] *Literaturnaia gazeta*, 6 November 1965, pp. 2, 4.
- [206] Gordienko, op. cit., p. 58.
- [207] *Gosudarstvennaia Duma*, IV-i sozyv, 25 February 1917, col. 1755-1758.

- (1208)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p. 101-102.
- (1209) Ibid., p.105.
- (1210) L. Trotskii, *Istoriia russkoi revoliutsii*, Vol.1, Berlin, 1931, p.148. 藤井一行译, 岩波文库版, 第1卷, 234—235页。
- (1211) Martynov, op. cit., p. 80.
- (1212) Zalutskii, op. cit., pp. 36-37.
- (1213) 报告的原文参见 E. K. Barshtein, L. M. Shalaginova, Departament polititsii o plane petrogradskikh bol'shevikov v fevrale 1917 g. VA, 1962, No.1, pp. 111-112。
- (1214) Barshtein and Shalaginova, *Partiia bol'shevikov v period podgotovki i provedeniia Fevral'skoi burzhuzno-demokraticeskoi revoliutsii*, VIK, 1957, No.1, p.135.
- (1215) *Listovki peterburgskikh bol'shevikov*, Vol.2, p. 201.
- (1216) Sveshnikov, op. cit.
- (1217)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p. 138-139.其提出者被认为与立陶宛活动家 Vladas Pozela (1879—1960) 是同一个人。他曾在布尔什维克的圣彼得堡市委委员会工作, 革命结束后脱党。
- (1218) Kak obrazovalsia Petrogradskogo Soveta, *Izvestiia*, 27 August 1917, p. 6.
- (1219) N. Sukhanov, *Zapiski o revoliutsii*, kn.1, Berlin-Peterburg-Moscow, 1922, pp. 34-35.
- (1220) Ibid., pp. 20-25, 28-30.
- (1221) Ibid., pp. 38-39, 49.
- (1222)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I, pp. 98-99.
- (1223) KA, 1927, Vol.1, pp. 4-5.
- (1224) Blok, op. cit., Moscow, 1962, p. 231.
- (1225) 戈利岑的陈述见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II, p. 265,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p.161。普罗托波波夫的日记见 KA, 1925, No. 3(10), p.12, 他把日期错写成2月24日。
- (1226) 亚历山大·勃列艾夫的陈述见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II, pp. 232-233。
- (1227) 关于这个会议, 安保部长的报告记载很详细。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1996, pp. 51-56. 此外还有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p. 329-335。
- (1228) 布尔扎罗夫最先引用了 A.Kugel', *Poslednii maskarad, Ogonek*, 1927, 24 April, 指出了这场公共讲演的政治意义。Burdzhalov, op. cit., pp. 150-151。我读了莱蒙托夫的文本, 他在为走向毁灭的人送葬的同时, 也表现了祈求复仇的人的胜利。“陌生男人”的最后一句话, 见 M. Ju. Lermontov, *Stikhotvoreniia. Poemy. Maskarad*, Moscow, 1976, p. 294。
- (1229) Akaemov, op. cit., p. XIX.
- (1230) Blok, op. cit., Moscow, 1962, p. 228.
- (1231) 哈巴洛夫的陈述见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 pp. 190-191。
- (1232)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129.
- (1233) Martynov, op. cit., p.85. Blok, op. cit., p.231.
- (1234) Mints, op. cit., Vol.1, p. 523.

- [235] KA, 1927, Vol.1, p. 5.
- [236]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pp. 161-163.
- [237]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V, p. 222.
- [238] *Ibid.*, p. 224.
- [239]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1, p.130. 只有安保队长的报告成为记录了这一天情况的基础资料。
- [240] Kaiurov, op. cit., p.165.
- [241] *Byloe*, 1918, No.1, p.172.
- [242]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1, pp. 129-130.
- [243] Akaemov, op. cit., p. XXII.
- [244]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1, p.130.
- [245] T. Kirpichnikov, *Vosstanie 1.-gv. Volynskogo polka v fevrale 1917 g.*, *Byloe*, 1917, No. 5-6, pp. 6-10.
- [246] 1917年5月, 该团士兵的证词与克鲁皮奇尼科夫的回忆如出一辙。 *Bol'shevizatsiia petrogradskogo garnizona*. Leningrad, 1932, pp. 37-39.
- [247] Blok, op. cit., p. 232.
- [248] 依据亚历山大·勃列艾夫的陈述。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II. Moscow-Leningrad, 1925, p. 226.
- [249] Balk, op. cit., L. 7.
- [250] Rodianko, *Krushenie imperiii*, p.299. Blok, op. cit., p. 232. Avdeev, op. cit., p. 39.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I, pp. 162-163.
- [251] KA, 1927, No. 2(XXI), p. 8.
- [252]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 p.195. 彼得保罗要塞监狱长伊瓦尼辛的日记中记载, 26日, 哈巴洛夫打电话要求收容巴甫洛夫斯克团士兵800人, 但实际上27日凌晨5时半仅有19人被送来。 *Zapiski knizhnika G. A. Ivanishina, Minuvshee*, Vol.17, Moscow-Peterburg, 1994, pp. 536-537.
- [253] Akaemov, op. cit., pp. XXII-XXVIII.
- [254] Balk, op. cit., LL. 5a-5/b.
- [255]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pp. 136-138.
- [256]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1, pp.126-129.
- [257] Kaiurov, op. cit., pp. 165-166.
- [258] *Byloe*, 1918, No.1, p.171.
- [259] Kerensky, *The Crucifixion of Liberty*, London, 1934, p. 236. V. Zenzinov, *Fevral'skie dni*, in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Vol.1, pp. 32-33.
- [260]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p. 137-138.
- [261] Sukhanov, op. cit., kn.1, p. 58.
- [262] Globachev, op. cit., p. 81.
- [263]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pp.164-165. 勃列艾夫的陈述见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II, pp. 236-238.
- [264] KA, 1927, kn. 2, p. 5-6.
- [265] *Ibid.*, p. 7.
- [266] Blok, op. cit., p. 232.
- [267] Kirpichnikov, op. cit., pp. 10-11.
- [268] Kuznetsov, op. cit., pp. 61-62.
- [269]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Vol.1, Moscow, 1935, p. 66.
- [270] Kirpichnikov, op. cit., pp. 10-14. *Byloe*, 1918, No.1, pp. 175-176.
- [271] G. V. Lomonossoff, *Memoirs of the*

-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19, p.12.
- (1272) Vpechatleniia soldata zapasnogo batal'ona leib-gvardii Litovskogo polka, *Pravda*, March 1917, p. 2.
- (1273)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 p.198. Byloe, 1918, No.1, p.176.
- (1274) Slonimskii, op. cit., p.13.
- (1275) A. Knox, *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917*. Vol.II, London, 1921, pp. 553-554.
- (1276) 从舍甫琴科那里听来。Lyanders, op. cit., pp. 256-257.
- (1277) 埋花畔人「露都革命見聞録」(《俄都革命見聞録》) 17 (《朝日新聞》, 1917年5月28日), 「歴史と人物」(《历史与人物》) 1971年9月号, 第232页。菊地昌典「ロシア革命と日本人」(《俄国革命与日本人》), 筑摩书房, 1973年, 12页。
- (1278) Kirpichnikov, op. cit., p.14. Byloe, 1918. No.1, p.176.
- (1279)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 67. Taimi, op. cit., p. 354.
- (1280) Dnevnik soldata na Vyborgskoi storone, *Pravda*, 11 March 1917, p. 2.
- (1281) Kirpichnikov, op. cit., pp. 14-15.
- (1282) S. Skalov, 27 fevralia 1917 g. v Peterburge.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vosstanii. *Krasnaia nov'*, 1931, No. 3, pp. 115-116. 斯卡洛夫在十月革命时,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执行委员 [*Protokoly Tsentral'nogo komiteta PSDRP(b)*]. Moscow, 1958, p.117]。二月革命时, 他的党籍还没有确定。他写道: “我是在二月事件发生前的四五个月才去的首都, 所以和党之间的联系还不紧密。”
- (1283) M. I. Kalinin, *Za eti gody*, kn. 3, Moscow, 1929, p. 432.
- (1284) Burdzhakov, op. cit., p.190.
- (1285) Lemeshev, op. cit., p. 38.
- (1286) Rafes, op. cit., p.185.
- (1287) V. Shmidt, V “Krestakh” , *Pravda*, 12 March 1917, p.4.
- (1288) Kirpichnikov, op. cit., p.15.
- (1289)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p. 67-68. *Pravda*, 11 March 1917, p. 2.
- (1290) *Bol'shevizatsiia petrogradskogo garnizona*, p. 36.
- (1291) Rafes, op. cit., p.185.
- (1292)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etrograd, 1917, p. 2. 这是复制了革命初期的 *Izvestiia revoliutsionnoi nedeli*, 使用了革命时人在俄国首都的埋花畔人、今井政吉带回日本后捐赠给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物品。
- (1293) *KA*. 1927, No. 2, p. 8.
- (1294)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 p. 198.
- (1295)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p. 167.
- (1296)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 p.199.
- (1297) *Ibid.*, pp. 202-203.
- (1298) Balk, op. cit., L.10. 据哈巴洛夫说是下午5时或6时。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 p. 201.
- (1299) Balk, op. cit., L.11.
- (1300)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 pp. 202-203.

- [301] Burdzhakov, op. cit., p.198. Martynov, op. cit., p.106.
- [302] Balk, op. it., L.12.
- [303] 戈利岑的陈述见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II, p. 267。Blok, op.cit., p. 240.
- [304]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pp. 167-168.
- [305] A. Peshekhonov, Pervye nedeli, in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Moscow, 1926, p. 430.
- [306] I. Golubev, Kak grenadery prisoedinilis' k narodu, *Pravda*, 12 March 1917, p. 2.
- [307] Peshekhonov, op. cit., pp. 431-432.
- [308] Gordienko, op. cit., p. 63. Shklovskii, op. cit., pp. 16-17.
- [309] Kuznetsov, op. cit., p. 66.
- [310] B. Starkov, Prisoedinenie finliandtsev. *Pravda*, 1 April 1917, p. 3.
- [311] Vystuplenie leib-gvardii Finliand-skogo zapasnogo polka. Ibid., 11 April 1917, p. 3.
- [312] *Pravda*, 1 April 1917, p. 3; 12 April 1917, p. 3.
- [313] I. N. Zhuravlev, Prisoedinenie semenovtsev, *Pravda*, 17 March 1917, p. 3.
- [314] S. D. Izmailovets, Vystuplenie izmailovtsev, *Pravda*, 21 March 1917, p. 4.
- [315]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 p.207. Martynov, op. cit., p.107.
- [316]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I, pp. 203-204. Martynov, op. cit., pp. 107-108.
- [317]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pp. 169-170.

[318] KA, 1927, Vol. 2, p.13.

[319]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pp. 169-170.

第6章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

- [11] P. Mihukov, Pervyi den, *Poslednie novosti*, 12 March 1927.
- [12] V. V. Shul'gin, *Dni*, Leningrad, 1925, p.103; Moscow, 1989. p.173. 冈野五郎译《革命の日の記録》(《革命日的记录》), 河出书房, 1956年, 135页。
- [13] S. Mansyrev, Moi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 Gosudarstvennoi Dume, *Istori i sovremennost'*, III, Berlin, 1922, pp. 25, 26.
- [14]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New York, London, 1927, p. 7.
- [15] M. I. Skobelev, Gibel's tsarizma, *Ogonek*, 1927, No. 11 (207) , 13 March, p. 9.
- [16]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p. 8.
- [17] V. B. Stankevich, *Vospominaniia 1914-1919 gg.*, Berlin, 1920, pp. 66-67.
- [18] KA, 1927, Vol.2. pp. 6-7.
- [19] Burdzhakov, op. cit., p. 229.
- [10] Skobelev, op. cit., p. 9.
- [11]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pp. 11-12. Shul'gin, op. cit., pp. 156-157. Moscow, 1989, pp. 177-178. 冈野五郎译《革命の日の記録》, 140—141页。
- [12]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pp. 208, 211-216.
- [13]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p.

- 2-3.
- (141) A. M. Cherkasskii, *Pervye dni russkoi revoliutsii*, Petrograd, 1917, p. 26.
- (151)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 3.
- (161) Cherkasskii, op. cit., pp. 28-32.
- (171)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p.15.
- (181) A. A. Bublikov, *Russkaia revoliutsiia. Vpechatleniia i mysli ochevidtsov i uchastnika*, New York, 1918, pp. 17-18.
- (191) *Volia Rossii*, Praha, No. 153, 15 March 1921,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Documents*. Edited by R. P. Browder and Alexander Kerensk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Vol.1, pp. 45-47.
- (201) B. Engel'gardt, *Potonuvshii mir*, VIZ, 1964, No.1, pp. 80-81.
- (211)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 4.
- (221) P. N.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russkoi revoliutsii*, Vol. I, ch.1, Sofia, 1921, p. 42.
- (231) Burdzhakov, op. cit., p. 381.
- (241) Shmidt, op. cit., p. 4.
- (251) V. Zalezhsii, *Pervyi legal'nyi Pe-Ka*, PR, 1923, No.1, p. 139.
- (261) Lemeshev, op. cit., p. 38.
- (271) 全文见 D. O. Zaslavskii, V. A. Kantrovich, *Khronika Fevral'skoi revoliutsii*, Vol. I, Petrograd, 1924, p. 281。
- (281) *Velikaia Oktiabr'skaia sotsialisticheskaia revoliutsiia. Dokumenty i materialy.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posle sverzheniia samodержavii* (以下缩写为 VOSR RDPSS), Moscow, 1957, p. 5. 原出处为 Ts-GAVME, F. 92, Op.1, D.128, L. 86。编者署名读作“Organiziruite Sovet rabochikh deputatov”(筹建中的工人苏维埃)。
- (291) E. P. Semenov, *Fevral'skie i martovskie dni*, *Istoricheskii vestnik*, Vol. 147, No. 2, March 1917, p.19. Michael Melancon, Who wrote What and When? Proclamations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Petrograd, 23 February-1 March 1917, *Soviet Studies*, Vol. XL, No. 3, July 1988, p. 493.
- (301) P. Luchinskii, V ob'ektive—revoliutsiia, *Literaturnaia gazeta*, 1967, No.2, p. 3.
- (311) Skalov, op. cit., p.118.
- (321) Ibid., pp. 117-118.
- (331)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1, pp. 134-135.
- (341) Leiberov, *Petrogradskii proletariat v bor'be za pobedu Fevral'skoi burzhuazno- demokraticeskoi revoliutsii v Rossii*, IS, 1964, No. 6, pp. 65-66. E. E. Studentsova, V bor'be za sverzhenie tsarizma, in *Vyborgskaia storona. Sbornik statei i vospominanii*. Leningrad, 1957, p. 29. Burdzhakov, op. cit., p. 210. 我在1968年的论文中误将斯图珍佐瓦当作了回忆录的作者。
- (351) 该报告于1959年5月和7月在俄国史研究会进行报告,同时刊登在会报6月、8月号上。这一主张在后一篇论文(和田春树「二月革命」,「ロシア革命の研究」,中央公论社,1968年)中得到进一步论述,也曾以英文发表。Haruki Wada,

- The Russian February Revolution of 1917,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No.15, 1974, p. 83.
- [36] T. Hasegawa, The Bolshevik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etrograd Soviet 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oviet Studies*, Vol. XXIX, No.1, January 1977, p. 98. 此外可参见Hasegawa,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pp. 333-334.
- [37] Michael Melancon, Who wrote What and When?, pp. 489-493. Melanco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Russian Anti-war Movement, 1914-1917*,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9-270. 此外还有 D. A. Longley, The mezhrainka, the bolsheviks and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In response to Michael Melancon, *Soviet Studies*, Vol. XLI, no. 4, October 1989.
- [38] VOSR RDPSS, pp. 4-5.
- [39] 上述见和田春树「二月革命」(《二月革命》), 422页。
- [40] Hasegawa, The Bolshevik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etrograd Soviet, pp. 97-98.
- [41] Melancon, Who wrote What and When?, pp. 486-489.
- [42] Kak obrazovalsia Petrogradskogo Soveta, *Izvestiia*, 27 August 1917, p. 6. 契恒凯里的演讲见 *Izvestiia Bakinskogo Sov. rab. i voenn. dep.*, No. 23, cited by E. B. Genkina, Fevral'skii perevorot. In *Ocherki istorii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Vol.II, Moscow-Leningrad, 1927, p. 82.
- [43]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 5.
- [44] A. Ia. Grunt, Vozniknovenie Moskovskogo Soveta rabochikh deputatov v 1917 g., *IS*, 1967, No. 2, pp. 13-14.
- [45] N. D. Sokolov, Kak rodilsia prikaz No. 1, *Ogonek*, 1927, No.11.
- [46]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 68.
- [47] N. I. Iordanskii, Voennoe vosstanie 27 fevralia, *Molodaia gvardiia*, 1928, kn. 2, p.169.
- [48] Sukhanov, op. cit., kn.1, p. 89.
- [49] Kaiurov, op. cit., p.167. 此外还有 Zalezhs-kii, op. cit., p.140. 莫洛托夫的证词参见 *IA*, 1956, No. 5, p.148.
- [50] Kh. M. Astrakhan, O pervom izdanii Manifesta TsK RSDRP (b) "Ko vsem grazhdanam Rossii", *VIK*, 1964, No. 6, pp. 64-65.
- [51] VOSR RDPSS, pp. 3- 4.
- [52] Kaiurov, op. cit., pp.169, 170.
- [53]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p. 141-142.
- [54] *Ibid*, p.143.
- [55] *Izvestiia*, No.1, 28 February 1917, p. 2.
- [56] Burdzhakov, op. cit., p. 211.
- [57] Iurenev, op. cit., *PR*, 1924, No. 2, p.143.
- [58] *Izvestiia*, 27 August 1917, p. 6. 此外见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 5.
- [59] *Izvestiia*, 27 August 1917, p. 7. M. Vishniak, *Dan' proshlomu*. New York, 1954, pp. 234-236.
- [60] Iu. S. Tokarev,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 marte-aprele 1917 g. Leningrad, 1976, pp. 50-51. Hasegawa, op. cit., p. 334.*
- [61] *Izvestiia*, 27 August 1917, p. 6. S. Mstislavskii, *Piat'dnei. Nachalo i konets Fevral'skoi revoliutsii*. 2nd ed., Berlin-Peterburg-Moscow, 1922, pp.17- 21.
- [62] Mstislavskii, op. cit., p. 22.
- [63] *Ibid.*, p. 24.
- [64]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 5.
- [65] *Novaia zhizn'*, 27 August 1917, p.1.
- [66] *Istoriia Moskv*y, Vol.V, Moscow, 1955, p. 350. Mints, op. cit., Vol. I, pp. 666-667.
- [67] Cherkasskii, op. cit., pp. 41-43.
- [68] Bublikov, op. cit., p. 21.
- [69] *Dnevnik i perepiska Velikogo kniazia Mikhaila Aleksandrovicha*, p. 379.
- [70] Lyanders, op. cit., p.109.
- [71] Rodzianko, *Krushenie imperii*, p. 296.
- [72] Lyanders, op. cit., p.146.
- [73] *Dnevnik i perepiska Velikogo kniazia Mikhaila Aleksandrovicha*, pp. 394-396.
- [74] Lyanders, op. cit., p.109.
- [75] Rodzianko, *Krushenie imperii*, p. 296.
- [76] Lyanders, op. cit., pp. 146-147.
- [77]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g.*, pp. 115-116.
- [78] *Dnevnik i perepiska Velikogo kniazia Mikhaila Aleksandrovicha*, p. 396.
- [79] Lyanders, op. cit., p.110.
- [80] *KA*, 1927, No. 2, pp, 11-12.
- [81] Rodzianko, *Krushenie imperii*, p. 297.
- [82] *Dnevnik i perepiska Velikogo kniazia Mikhaila Aleksandrovicha*, p.397.
- [83] Sukhanov, op. cit., kn.1, pp. 122-126.
- [84]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1, pp. 142-144.
- [85] Rafes, op. cit., pp. 188-189.
- [86] Sukhanov, op. cit., kn.1, p.127.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1, p.146. *Izvestiia*, 27 August 1917, p. 6.
- [87] *Izvestiia*, pribavlenie k No.1, 28 February 1917, p.1.
- [88]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p. 29.
- [89] *Izvestiia*, 27 August 1917, p. 6. Sukhanov, op. cit., kn.1, p.128.
- [90] Rafes, op. cit., pp.190.
- [91] Sukhanov, op. cit., kn.1, pp. 133-134, 141, Peshekhonov, op. cit., pp. 434-435.
- [92] Sukhanov, op. cit., kn.1, p.132.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1, p.150.
- [93] Rafes, op. cit., p.190. Sukhanov, op. cit., kn.1, pp. 145-146.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1, p.153.
- [94] *Izvestiia*, pribavlenie k No.1, 28 February 1917, p.1.
- [95] *Izvestiia*, 28 February 1917, p.1.
- [96] Sukhanov, op. cit., kn.1, p.147.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1, p.150.
- [97] Iu. Steklov, *Po povodu stat'i A. G. Shliapnikova*, *PR*, 1923, No. 4, p.177.
- [98] Sukhanov, op. cit., kn.1, p.149.
- [99] Steklov, op. cit., p.177.
- [100] Sukhanov, op. cit., kn.1, p.149.
- [101] Steklov, op. cit., pp. 176-177.
- [102] *Ibid.*, pp. 176-177.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1, p.150.

- [103] Sukhanov, op. cit., kn.1, p.159.
- [104] *Izvestiia*, 28 February 1917, p. 2. Shliapnikov, *Semnadtsatyi god*, kn.1, pp. 151-152.
- [105] Kpatkaia avtobiografiia chlena partii V. D. Bonch-Bruевичa. *IS*, 1967, No. 2, p. 100. Shliapnikov, *Kanun*, ch. I, p.179.
- [106] Steklov, op. cit., p.181. Steklov, *Vospominaniia i publitsistika*. Moscow, 1965, p. 78.
- [107] *Novaia zhizn'*, 27 August 1917, p.1.
- [108]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 9.
- [109] Sukhanov, op. cit., kn.1, p.179. 但是, 社会革命党一人是鲁沙诺夫这一认识得到了修改。因为斯瓦茨基在3月5日确实是执行委员。 *Izvestiia*, 5 March 1917, p.1. Rafes, op. cit., pp. 191. 此外, 他还纠正了布尔什维克党一人是斯大林的说法。舒特科在3月4日确实是执行委员。 *Peterburgskii komitet RSDRP(b) v 1917 godu. Protokoly i materialy zasedanii*, Sankt-Peterburg, 2003, p. 59.
- [110]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Protokoly zasedanii IK*, Moscow-Leningrad, 1925, p. 42.
- [111] S. I. Shidlovskii, *Vospominaniia*, Vol. II, Berlin, 1923, p. 55.
- [112]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II, p. 298. 此外见 Shul'gin, op. cit., pp. 181-182.
- [113] Lyanders, op. cit., pp. 58-59.
- [114] Cherkasskii, op. Cit., p. 60. Shidlovskii,

op. cit., pp. 67-68.

- [115] Burdzhalov, op. cit., p. 236.
- [116]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p. 7-8.
- [117] Mstislavskii, op. cit., pp. 23-24.
- [118]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p. 25.
- [119] Mstislavskii, op. cit., p. 26.
- [120] *Ibid.*, pp. 29-31.
- [121] *KA*, 1930, Vol. 4-5, p. 78.
- [122] *Ibid.*, pp. 78-84.
- [123] P. V. Volobuev,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Moscow, 1962, p. 390. *Izvestiia*, 28 February 1917, p. 2.
- [124] *Izvestiia*, 2 March 1917, p. 2.

第7章 两大革命 多种路线

- [1] *KA*, 1930, Vol. 4-5, pp. 78-79.
- [2] G. P. Peretts, *V tsitadeli russkoi revoliutsii. Zapiski komendanta Tavricheskogo dvortsa*. Petrograd, 1917, p. 37. *Izvestiia*, Pribavlenie k No.1, 28 February 1917, p.2.
- [3] *Iz dnevnika A. D. Protopopova, KA*, 1925, Vol.3, p.180.
- [4] Shul'gin, op. cit., Moscow, 1989, p. 200. 岡野译, 171 页。
- [5] *Vozrozhdenie*, No.183, pp. 95-97.
- [6] Bublikov, op. cit., p. 21.
- [7] *Ibid.*, p. 22. Iu. V. Lomonosov, *Vospominaniia o martovskoi revoliutsii 1917 g.* Stockholm and Berlin, 1921; Moscow, 1994, p. 229.
- [8] Lomonosov, op. cit., pp. 229-230.
- [9] Bublikov, op. cit., pp. 22-23.

- [110] KA, 1927, Vol.2, pp. 32-33.
- [111] Bublikov, op. cit., p. 24.
- [112] Shul'gin, op. cit., p. 198. 岡野译, 168页。
- [113]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18.
- [114] Ibid., pp. 31-32.关于这一点, 请参照尼古拉耶夫最新的研究成果。A. B. Nikolaev, *Gosudarstvennaia дума v Fevral'skoi revoliutsii: ocherki istorii*, Riazan', 2002, pp. 75-92.
- [115] G. I. Zlokazov, O zasedanii Petrogradskogo Soveta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28 fevralia 1917 g. In *Oktibr' i grazhdanskaia voina v SSSR*, Moscow, 1966, pp. 55-56. VOSR RDPSS, pp.190-191.
- [116] Martynov, op. cit., p.119.
- [117] Shul'gin, op. cit., pp. 204-208. 岡野译, 177—184页。
- [118] Zapisnye knizhki G. A. Ivanishina, p. 539.
- [119] 关于格里戈洛维奇此时的心情, 请参考 N. K. Grigorovich, *Vospominaniia byvshego morskogo ministra 1853-1917*, Kronshtadt-Moscow, 2005, p.120.
- [120]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I, pp. 205-206.
- [121] KA, 1927, Vol.2, pp. 79, 20.
- [122] *Bol'shevizatsiia petrogradskogo garnizona*, p. VI.
- [123]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13.
- [124] Ibid., p.15.
- [125] Ibid., pp. 10-11, 19.
- [126] Burdzhakov, op. cit., pp. 275, 288-289. Rafes, op. cit., p.193. Sukhanov, op. cit., kn.1, p. 207.
- [127] *Pravda*, 11 March 1917, p. 2.
- [128] 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证词见 Lyanders, op. cit., p.121。
- [129] Ibid., p.122. 桥克尼的证词见 Ibid., pp. 78, 84。
- [130] 恩格勒格特的证词见 Ibid., pp. 60-61。尼古拉耶夫根据恩格勒格特的其他回忆, 说古契柯夫从3月1日起就任军事委员会主席。A. B. Nikolaev, op. cit., p.124.
- [131] P. A. Polovtsov, *Dni zatmenii*, Paris [n. d.], pp. 14-16.
- [132] A. Efimov, *Problema vlasti v pervye dni Fevral'skoi revoliutsii 1917 g.*, *Revoliutsiia prava*, 1928, No. 3, p. 59.
- [133]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p. 16, 29. *Rech'*, 5 March 1917, p. 3.
- [134] Z. S. Kel'son, *Militsiia Fevral'skoi revoliutsii*, *Byloe*, 1925, No.1, p.162.
- [135] Ibid., p.164. *Rech'*, 5 March 1917, p. 3.
- [136] Kel'son, op. cit., pp. 162-163.
- [137] V. I. Startsev, *Ocherki po istorii petrogradskoi Krasnoi gvardii i rabochei militsii*. Moscow-Leningrad, 1965, pp. 50-51.
- [138] *Rech'*, 5 March 1917, p. 3.
- [139] *Izvestiia*, 5 March 1917, p. 5.
- [140] Lobov, Gavrilov, op. cit., p.137.
- [141] Kondrat'ev, op. cit., *KL*, 1923, No. 7, p. 69.
- [142] Gordienko, op. cit., p.70.
- [143] *Vogne revoliutsionnykh boev*, p.131.
- [144] *Paionnye Sovety Petrograda v 1917 godu*. Vol. I, Moscow-Leningrad, 1964, p.125.
- [145] Skorodnikov, op. cit., p.165.
- [146] D. V. Oznobishin, *Bor'ba bol'shevikov*

- s soglashteliami v Petrogradskom Sovete. *Iz*, Vol.73, p.117.
- [47] Skalov, op. cit., p.121. Potekhin, op. cit., p. 324.
- [48] Zlokazov, Sozdanie Petrogradskogo Soveta, *IS*, 1964, No. 5, p.106.
- [49] *Bastiony revoliutsii*, Leningrad, 1957, p. 226.
- [50] S. A. Artem'ev, Sostav Petrogradskogo Soveta v marte 1917 g., *IS*, 1964. No. 5, p. 124.
- [51] *Bastioizy revoliutsii*, p.138.
- [52] Lemeshev, op. cit., p.123.
- [53] Artem'ev, op. cit., p.124.
- [54] *Bastiony revoliutsii*, p. 273.
- [55] Zlokazov, op. cit., p.108.
- [56] *Izvestiia*, 5 March 1917, p. 5. Tikhonov, Tkachev, op. cit., p. 88.
- [57] *Ibid.*, pribavlenie k No. I, p. 2; 2 March 1917, p. 4.
- [58] *Ibid.*, 4 March 1917, p. 5.
- [59] Artem'ev, op. cit., p.126.
- [60] *Ibid.*, p.121. Zlokazov, op. cit., p.110.
- [61] *Izvestiia*, 4 March 1917, p. 6; 5 March 1917, p. 5.
- [62] S. G. Strumilin, *Iz perezhitogo*, Moscow, 1957, p. 280.
- [63] Artem'ev, op. cit., pp. 120-121.
- [64] *Pravda*, 11 March 1917, p. 2.
- [65] *Izvestiia*, pribavlenie k No.1, p. 2; 2 March 1917, p. 4.
- [66] Artem'ev, op. cit., p.121.
- [67] Startsev, op. cit., pp. 54, 58.
- [68] *Raionnye Sovety Petrograda v 1917godu*. Vol. I, p.123.
- [69] Startsev, op. cit., pp. 43-44.
- [70] *Ibid.*, p. 44. *Izvestiia*, 2 March 1917, p.3.
- [71] Startsev, op. cit., p. 56.
- [72] *Ibid.*, p. 70,
- [73] *Izvestiia*, 5 March 1917, p. 4.
- [74] *Raionnye Sovety Petrograda v 1917 godu*. Vol. I, p. 72. Startsev, op. cit., p. 43.
- [75] Startsev, op. cit., pp. 44-45.
- [76] Peshekhonov, op. cit., pp. 438-439.
- [77] *Izvestiia*, 2 March 1917, p. 4.
- [78] Peshekhonov, op. cit., pp. 442, 449.
- [79] *Izvestiia*, 5 March 1917, p. 4.
- [80] Peshekhonov, op. cit., pp. 454-456.
- [81] *Ibid.*, p. 461. *Raionnye Sovety Petrograda v 1917 godu*. Vol. III, pp. 8-11.
- [82] *Izvestiia*, 2 March 1917, p. 4.
- [83] Burdzhhalov, op. cit., pp. 308-309. *Ogonek*, 1923, No.1.
- [84] Hasegawa, op.cit., pp.444-446. 此外参考了Hasegawa, Rodianko and the Grand Dukes'Manifest on 1 March 1917,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18, no. 2(1976)。
- [85] *Dnevnik i perepiska Velikogo kniazia Mikhaila Aleksandrovicha*, pp. 397-398, 498-499, 611-612.
- [86] Ganelin, *V Rossii dvadtsatogo veka*, Moscow, 2014, pp. 603-621.
- [87] Princess Paley, *Memories of Russia, 1916-1919*. London, 1924, pp. 46-47.
- [88] N. Ivanov, Manifest Velikikh kniazei, Ganelin, op. cit., pp. 614-615.
- [89] Princess Parley, op. cit., p. 52.
- [90] N. Ivanov, op. cit., pp. 615-617.
- [91] Princess Parley, op. cit., p. 53.
- [92]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V,

- p. 227.
- [193] *Ogonek*, 1923, No.1. Burdzhhalov, op. cit., p.309. Hasegawa, op. cit., p. 445.
- [194] Burdzhhalov, op. cit., p.309. Ivanov, op. cit., p. 619.
- [195] *Dnevnik i perepiska Velikogo kniazia Mikhaila Aleksandrovicha*, p. 397.
- [196] *Ibid.*, p. 469.
- [197] Buchanan, op. cit., Vol. I, p. 68.
- [198] Burdzhhalov, op. cit., p.310. Ivanov, op. cit., p. 621.
- [199] *Dnevnik i perepiska Velikogo kniazia Mikhaila Aleksandrovicha*, p. 611.
- [100] Shidlovskii, op. cit., pp. 294-295.
- [101] Lomonosov, op. cit., pp. 235-238.
- [102] 质询斯克列列夫的听证会见 Lyanders, op. cit., pp. 181-182.
- [103] Hasegawa, op. cit., pp. 452-454.
- [104] S. V. Kulikov, Tsentral'nyi Voenno-promyshlennyy komitet nakanune i v khod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1917 goda, *OI*, 2012, No.1, p. 83.
- [105] *Izvestiia*, No.1, 28 February 1917, p. 1; pribavlenie k No.1, 28 February 1917, p.1.
- [106] Ivanov-Razumnik, *Pered grozoi, 1916-1917 gg.* Petrograd, 1923, pp. 134-135.
- [107] *Izvestiia*, No.32, 31 March 1917, p. 3.
- [108] Sukhanov, op. cit., kn.1, pp. 223-225, 229-240.
- [109] 以下来自大会的会议记录。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odu, Vol. I, Sankt-Peterburg, 1993, pp. 46-55.
- [110] *Ibid.*, p. 48.
- [111] *Ibid.*, p. 49.
- [112] *Ibid.*, p. 52.
- [113] *Ibid.*, pp. 48-49.
- [114] *Ibid.*, p. 54.
- [115] *Ibid.*, p. 51.
- [116] *Ibid.*, p. 50.
- [117] *Ibid.*, p. 51.
- [118] *Ibid.*, p. 52.
- [119] *Ibid.*, p. 54.
- [120] *Ibid.*, pp. 54-55.
- [121] *Ibid.*, p. 55. 关于士兵的说明来自首篇研究了会议记录的论文。V. I. Miller, Nachalo demokratizatsii staroi armii v dni Fevral'skoi revoliutsii. Zasedanie Petrogradskogo Soveta 1 marta 1917 g. i prikaz No.1, *IS*, 1966, No. 6, p. 41.
- [122]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1, p.194.
- [123] 帕杰林的回忆录见 *PR*, 1925, no. 8-9, p. 401。此外参考了 N. D. Sokolov, Kak rodilsia prikaz No.1, *Ogonek*, 1927, No.11。索科洛夫还写道, 制定命令文件的委员会成立后, 索科洛夫、林杰、帕杰林、萨多夫斯基等人也加入了。N. D. Sokolov, Kak rodilsia prikaz No.1, *Ogonek*, 1927, No.11, p.10.
- [124] *Izvestiia*, 2 March 1917, p. 3.
- [125] 恩格勒格特的口述历史见 Lyanders, op. cit., p. 62。
- [126] P. A. Polovtsov, *Dni zatmeniia*, Paris, pp. 17-18.
- [127] Sukhanov, op. cit., Vol. I, pp.240-241, 254-256. Shliapnikov, *Semnadtsaty god*, kn.1.1, pp.215-220. Rafes, op. cit., p.195. Zaslavskii, Kantrovich, op. cit.,

pp.42-43.

(128) *Izvestiia*, No.32, 31 March 1917, p. 3.

第8章 军部与沙皇

(11) D. N. Dubenskii, *Kak proizoshel perevorot v Rossii*, in *Otrechenie Nikolaia II. Vospominaniia ochevidtsev*, Leningrad, 1927, pp. 49-52. 都本斯基偏日记风格的回忆录于1922年刊登在杂志上, 均收录于此书。

(12) *Ibid.*, p. 51.

(13) 全部出自 KA, 1927, Vol.2, p. 9。

(14) *Ibid.*, pp. 9-10.

(15) *Proval popytki Stavki podavit' Fevral'skuiu revoliutsiu 1917 goda v Petrograde*, VA, 1962, No.1, p. 104.

(16) 这一天与北部方面军参谋长丹尼洛夫的直通电话 (KA, 1927, Vol.2, pp. 9-10)。28日阿列克谢耶夫给各军司令发的电报 (*Ibid.*, p.23)。

(17) *Ibid.*, pp. 10-11.

(18) Voeikov, op. cit., pp. 200-201.

(19) Dubenskii, op. cit., p. 49.

(10) KA, 1927, kn. 2, p.12.

(11) Lukomskii, A. S., *Vospominaniia generala A. S. Lukomskogo*, Vol. I, Berlin, 1922, pp. 126-128.

(12) KA, 1927, kn.2, pp. 13-14.

(13) *Ibid.*, p. 9.

(14) *Ibid.*, pp. 18-19.

(15) Dubenskii, op. cit., p. 53.

(16) 给皇后的电报。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V, p. 225.

(17) *Proval popytki Stavki podavit' Fevral'skuiu revoliutsiu*, p.102.

(18) *Ibid.*, p.103.

(19) *Ibid.*, p.105.

(20) Danilov to Alekseev, KA, 1927, kn. 2, p.14.

(21) *Proval popytki Stavki podavit' Fevral'skuiu revoliutsiu*, p.103.

(22) Evert to Alekseev, KA, 1927, kn. 2, p.17.

(23) *Proval popytki Stavki podavit' Fevral'skuiu revoliutsiu*, p.103.

(24) Ivanov to Ruzskii, and Ivanov to Evert, KA, 1927, kn. 2, p. 21.

(25) 哈巴洛夫的回答见 *Ibid.*, p. 20。伊瓦诺夫的问题见 Martynov, op. cit., pp. 117-119。

(26) Ivanov to Ruzskii, and Ivanov to Evert, KA, 1927, kn. 2, p. 21. *Proval popytki Stavki podavit' Fevral'skuiu revoliutsiu*, p.104.

(27) Alekseev to Ruzskii and Alekseev to Grigorovich, KA, 1927, kn. 2, p.19.

(28) Alekseev to Brusilov, *Ibid.*, p. 24.

(29) KA, 1927, kn. 2, pp. 22-24.

(30) *Ibid.*, p. 27.

(31) *Ibid.*, pp. 27-28, 29.

(32) Blok, op. cit., p. 252. 这是从英文原文引用的。

(33) Dubenskii, op. cit., p. 54.

(34)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 V, p. 225.

(35) Dubenskii, op. cit., p. 54.

(36) KA, 1927, kn. 2, p. 35.

(37) *Ibid.*, p. 31.

(38) Dubenskii, op. cit., pp. 54-55.

(39) *Ibid.*, p. 55-56. Voeikov, op. cit., pp. 204-205.

(40) Lomonosov, op. cit., pp. 233-234.

- [41] P. E. Shchegolev, *Poslednii reis Nikolaia Vtorogo*, Moscow-Leningrad, 1928, p. 45. 莫尔多维诺夫的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录。A. A. Mordvinov, *Poslednie dni Imperatora. In Otrechenie Nikolaia II. Vospomitanii ochevidtsev*. Leningrad, 1927, pp. 103-104.
- [42] Lomonosov, op. cit., pp. 234-235.
- [43] Mordvinov, op. cit., p.103-104.
- [44] Voeikov, op. cit., pp. 205-206.
- [45] KA, 1927, kn. 2, p. 48.
- [46] K. Zershchikov, *Sobstvennyi Ego Velichestva konvoi v dni revoliutsii, Chasovoi*, No. 205.
- [47] I. Demidov, *Tsarskoe selo 1-go marta 1917 goda. Poslednie novosti*, 12 March 1927.
- [48] *Proval popytki Stavki podavit' Fevral'skuiu revoliutsiu*, p.106.
- [49] Lomonosov, op. cit., p. 239.
- [50] 关于卢加的情况, 参见N.Voronovich, *Zapiski predsedatelia Soveta soldatskikh deputatov, Arkhiv grazhdanskoi voiny*, vyp. II, Berlin [n. d.], pp. 11-28 和 A. P. Sheliubskii, *Severnyi front v dni Fevral'skoi revoliutsii, IS*, 1967, No.1, p. 20.
- [51] *Proval popytki Stavki podavit' Fevral'skuiu revoliutsiu*, pp. 106-107.
- [52] KA, 1927, kn. 2, p. 36. 北部方面军司令发来的电报参见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ol. III, p. 252.
- [53] 埃维尔特和鲁科姆斯基的电报。KA, 1927, kn. 2, p. 37.
- [54] Ibid., pp. 44-45.
- [55] Ibid., p. 39.
- [56] Ibid., pp. 39-40.
- [57] Burdzhakov, *Vtoraia russ Ka ia reuoliutsiia. Moskva, front, periferia*, Moscow, 1971, p. 23.
- [58] 都出自 KA, 1927, kn. 2, p. 45.
- [59] Ibid., p. 43.
- [60] Burdzhakov, *Vtoraia russ Ka ia reuoliutsiia. Moskva, front, periferiia*, pp. 110-111.
- [61] KA, 1927, kn. 2, p. 43.
- [62] Ibid., pp. 43-44.
- [63] *Fevral's Ka ia revoliutsiia v Baltiiskom Flote(Iz dnevni Ka I. I. Rengartena)*, KA, 1929, No.1, p.102.
- [64] KA, 1927, kn. 2, pp. 40-41.
- [65] Ibid., p. 48.
- [66] Ibid., p. 47.
- [67] Ibid., pp. 50.
- [68] Voeikov, op. cit., p. 207.
- [69] KA, 1927, kn. 2, pp. 53-54.
- [70] Voeikov, op. cit., p. 208.
- [71] KA, 1927, kn. 2, pp. 51-52.
- [72] Voeikov, op. cit., p. 209.
- [73] KA, 1927, kn. 2, p. 96.
- [74] Ibid., p. 53.
- [75] *Proval popytki Stavki podavit' Fevral'skuiu revoliutsiu*, p.107.

第九章 成立临时政府与废除帝制

- [11] Rafes, op. cit., p.194.
- [12] Sukhanov, op. cit., kn.1, p. 267-271.
- [13] Ibid., p. 272.
- [14] Ibid., pp. 275-278.
- [15]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II, p. 307.

- [61]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II, p. 307. Shul'gin, op. cit., p. 227.
- [71]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II, p. 307.
- [81] Ibid., pp. 307-308.
- [91] Sukhanov, op. cit., Kn. I, pp. 281-283.
- [101]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 II, p. 308.
- [111] *Izvestiia*, 3 March 1917, p.1.
- [121] Rafes, op. cit., p.195.
- [131] [Bazarov] Uchastie demokratii v Vremennoe pravitel'stvo, *Izvestiia*, 2 March 1917.
- [141] 会议记录见 VOSR RDRPSS, pp. 9-12.
- [151]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Vol.1, pp. 223-225.
- [161] F. Dingel'shtedt, *Vesna proletarskoi revoliutsii*, KL, 1925, No, 1, p.193.
- [171] Zalezskii, op. cit., pp. 142-143.
- [181] 决议见 VOSR RDRPSS, p. 6。
- [191]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1, pp. 330-331.
- [201] Sukhanov, op. cit., Kn. 1, p. 294.
- [211] Shliapnikov, *Semnadsatyi god*, Kn.1, pp. 231-234.
- [221] KA, 1927, Vol. 2, pp. 55-59.
- [231]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II, p. 296.
- [241] KA, 1927, Vol. 2, p. 55.
- [251] Ibid., pp. 52-53.
- [261]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p. 72.
- [271] 关于科尔尼洛夫, 见 F. A. Gushchin, S. S. Zhebrovskii, *Plennye generaly Rossiiskoi imperatorskoi armii 1914-1917*, Moscow, 2010, pp. 221-227。
- [281] Protokol sobyti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pp.136-137.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给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见 VOSR RDRPSS, pp.409-410.
- [291] KA, 1927, Vol.3, p.7.
- [301] Shul'gin, op. cit., p. 232. 英文译本, 216 页。
- [311] Shul'gin, op. cit., pp. 232-234.
- [321] Ibid., p. 235.
- [331] KA, 1927, Vol. 2, p. 67.
- [341] Ibid., p. 75.
- [351] Ibid., p. 75.
- [361] Voeikov, op. cit., pp. 209-211.
- [371] KA, 1927, Vol.2, pp. 67-70.
- [381] Ibid., pp. 72-73.
- [391] Ibid., p. 73.
- [401] Ibid., p. 74.
- [411] In. N. Danilov, *Moi vospominaniia ob Imp. Nikolae II i Vel. Kn. Mikhaile Aleksandroviche.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ol. XIX, Berlin, 1928, pp. 230-231.
- [421] Ibid., pp. 231-232. Martynov, op. cit., p. 231.
- [431] Sukhanov, op. cit., Kn. 1, p. 309.
- [441] 本次大会的内容报道见 *Izvestiia*, 3 March 1917, p. 4, 收录于 VOSR RDPSS, pp. 194-195。另外, 目前会议记录已被发现并出版。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odu, Vol. I, Sankt-Peterburg, 1993, pp. 61-75. 理解谈话内容需要把两种资料合在一起看。
- [451]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odu, Vol. I, pp. 63-65.
- [461] Ibid., p.66.

- 147) VOSR RDPSS, p.195.
- 148)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p. 50-52.
- 149) Sukhanov, op. cit., Kn. I, p. 314.
- 150) Shliapnikov, *Semnadtsati god*, kn. I , pp. 240-242.
- 151) Rafes, op. cit., p.197.
- 152) Zaslavskii, Kantrovich, op. cit., pp. 44-45.
- 153)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odu*, pp. 67-68.
- 154) Ibid., p. 69.
- 155) Ibid., pp. 68, 69.
- 156) Ibid., p. 73.
- 157) Ibid., p. 67.
- 158) Ibid., pp. 72-73.
- 159) VOSR RDPSS, p.195.
- 160)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odu*, p. 74.
- 161) Shliapnikov, *Semnadtsati god*, kn. I , p. 241.
- 162)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II, p. 314.
- 163)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p. 44- 48.
- 164) Nicolas de Basily, *Diplomat of Imperial Russia 1903-1917: Memoir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1973, p.122.
- 165) KA, 1927, Vol.3, p. 7.
- 166) Ibid., pp. 9-10.
- 167) Ibid., p.10.
- 168) Martynov, op. cit., p.160.
- 169) Spiridovich, op. cit., Vol. III , p. 298.
- 170) Danilov, op. cit., pp. 236-237.
- 171) Shul'gin, op. cit., p. 253. 岡野译, 225—226页。
- 172)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kazyvaet*, p. 69.
- 173) Nicolas de Basily, op. cit., pp. 129-130.
- 174) KA, 1927, Vol. III, p.15.
- 175)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ol. III, p. 265.
- 176) KA, 1927, Vol.3, pp. 15-16.
- 177) Ibid., p.19.
- 178) Voelkov, op .cit., p. 229.
- 179)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Vol. II, ch. 2, p. 296.
- 180) P. N.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russkoi revoliutsii*, Moscow, 2001, pp. 50-51.
- 181)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II, pp. 314-315.
- 182) KA, 1927, Vol.3, p. 26.
- 183) Ibid., p. 27.
- 184) Ibid., p.19.
- 185) Ibid., p. 28.
- 186) Ibid., p. 29.
- 187) *Izvestiia revoliutsionnoi nedeli*, No. 7, 3 March 1917, p.1. 转引自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Documents*, Vol. I, 1961, pp. 135-136。
- 188) Shul'gin, op. cit., p. 274.
- 189) Nicolas de Basily, op. cit., p.143.
- 190) Shul'gin, op. cit., p. 276.
- 191) Nicolas de Basily, op. cit., pp. 144-145.
- 192) Shul'gin, op. cit., p. 277.
- 193)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 .II, p. 318.
- 194) B. D. Nabokov, *Vremennoe pravitel'stvo*,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ol.1, pp.17-18.

- (95) 两个人的履历见 *Rossiiskii liberalism serediny XVIII—nachala XX veka. Entsiklopediia*, Moscow, 2010, pp. 606-607, 651-652。
- (96) Nabokov, op. cit., pp.20-21. B. E. Nol'de, V. D. Nabokov in 1917, in *V. D. Nabokov and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Edited by V. D. Medlin and S. L. Pars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9-20.
- (97) *Izvestiia*, 4 March 1917, No. 5, p.1.
- (98) Miliukov, *Vospominaniia*, Vol.II, p. 318.
- (99) 质询恩格勒格特的听证会见 Lyanders, op. cit., p. 63, 但是, 恩格勒格特在他的晚年回忆录中对想辞去军事委员会工作一事只字未提, 说因为三天没睡, 回去睡觉了。Vospomnaniia predsedatelia voennoi komissii Vremennogo komiteta Gosudarstvennoi Dumy o Fevral'skoi revoliutsii 1917 g. *Klio*, 2003, No. 1(20), p.188。
- (100) KA, 1927, Vol.3, p. 36-39.
- (101) Ibid., p. 44.
- (102) Nol'de, op. cit., p.17.

第10章 革命胜利的日子

- (11) Aleksandr Blok, *Sobranie sochinenii*, Vol.8, Moscow-Leningrad, 1963, p. 480.
- (12) GARF, F. 634, Op.1, Ed. Khr. 27, L.114, 114ob.
- (13) Ibid., L.115.
- (14) *Arkhir A. M. Gor'kogo*, Vol.IX, Moscow, 1966, pp. 194.这是寄给彼

什科娃的书信集 (1906—1932)。

- (15) Ibid., p.195.
- (16)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Vol.V, p.232.
- (17) Spiridovich, *Zapiski zhandarma*, Moscow, 1991, p.107. 另 F. Ovchenko, Sergei Vasil'evich Zubatov, VI, 2005, No. 8, p. 66.
- (18)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v Baltiiskom flote (Iz dnevnika I. I. Rengartena), KA, 1929. Vol. I, p.105.
- (19) Ibid., p.106.
- (10) Ibid., pp. 107-108.
- (111) Ibid., pp. 109-110.关于赫尔辛福斯的悲剧, 可参考 David Longley,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the Baltic Fleet at Helsingfors: "Vosstanie" or "Bunt?"*,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Vol. XIX, No. 2 (June 1977)。
- (12) Iz dnevnikov A. N. Kuropatkina, KA, 1927, Vol.1, p. 59.
- (13)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Vol. I, pp. 196-198.
- (14) I. G. Tsereteli, *Vospominaniia o Fevral'skoi revoliutsii*, kn.1, Paris, 1968, pp.15-18, 25-26.
- (15) *Deiateli SSSR 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Rossii.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GRANAT, Moscow, 1989, pp. 429, 699.
- (16)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 I, p. V.
- (17) *Zhurnaly zasedanii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Vol. I, Moscow, 2001, pp. 79-80.
- (18)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Vol.I, pp. V-VI. Aleksandr Blok, *Sobranie*

- sochinenii, Vol.8, p. 481.
- (191) VOSR RDRPSS, p. 422.
- (120)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Vol. I, pp.199-200.
- (121) *Zhurnaly zasedanii Vremennnogo Pravitel'stva*, Vol.1, Moscow, 2001, pp. 66-67.
- (122) Ibid., p. 95.
- (123) Ibid., p.133.
- (124) VOSR RDRPSS, pp. 422-424.
- (125) *Zhurnaly zasedanii Vremennnogo Pravitel'stva*, Vol.1, p. 23.
- (126) Ibid., p. 38. V. Nabokov, op. cit., p. 30.
- (127) VOSR RDRPSS, pp. 424-425.
- (128) Buchanan, op. cit., Vol.II, pp. 91-92.
- (129) Sukhanov, op. cit., kn. II, pp. 266-269.
- (130)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g.*, Vol. I, pp. 323-324.
- (131) Ibid., pp. 301-302, 312-313, 315.
- (132) Zinaida Gippius, *Dnevnik*, Vol.1, Moscow, 1999, p. 496.
- (133)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 Vol. I, pp. 81-82.
- (134) G.A. fon Tal', *Memuary ob otrechenii ot prestola Rossiiskogo Gosudaria Imperatora Nikolaia II* 1925, manuscript,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pp. 59-61.
- (135) KA, 1927, Vol.3, pp. 53-54.
- (136) Ibid., p. 54.
- (137) Ibid., p. 55.
- (138) Ibid., p.154.
- (139) *Zhurnaly zasedanii Vremennnogo Pravitel'stva*, Vol.1, pp. 49-50.
- (140) *Skorbnyi put' Romanovykh 1917-1918 gg. Gibel' tsarskoi sem'i. Sbornik domumentov i materialov*, Moscow, 2001, p. 67.
- (141)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 Vol. I, pp. 205, 218.
- (142) Avdeev, op. cit., pp. 76-77.
- (143) Ibid., p. 78.
- (144) VOSR RDRPSS, pp. 427-428.
- (145) Avdeev, op. cit., p. 70.
- (146) P. A. Polovtsov, *Dni zatmenia*, Paris, n. d., pp. 26-27.
- (147) VOSR RDRPSS, p. 424.
- (148)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 Vol. I, pp. 156-157.
- (149) Ibid., pp.153-154, 155.
- (150) Avdeev, op. cit., p. 71.
- (151)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 Vol. I, pp. 178-179.
- (152) Nabokov, op. cit., pp. 40-41. Avdeev, op. cit., p. 79.
- (153) Nabokov, op. cit., p. 41.
- (154) KA, 1927, Vol.3, p. 65.
- (155) Ibid., p. 65.
- (156) Iu. N. Danilov, *Velikii kniaz' Nikolai Nikolaevich*, Paris, 1930, p. 326.
- (157) KA, 1927, Vol.3, pp. 68-69.
- (158) VOSR RDRPSS, p. 449.
- (159) *Rech'*, 21 marta 1917 g., p. 5. Richard Stite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 292-293. 施泰茨把游行示威的日期误记为3月20日。
- ¹⁶⁰¹ Zhurnaly zasedanii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Vol.1, pp. 142-146.
- ¹⁶¹¹ S. M. Dubnov, *Kniga zhizni. Materialy dlia istorii moego vremeni. Vospominaniia i razmyshleniia*, Moscow, 2004, p. 410.
- ¹⁶²¹ I. P. Leiberov, *Na shturm samoderzhavii*, Moscow, 1979, p. 272.
- ¹⁶³¹ 托洛茨基(藤井一行译)「ロシア革命史」(《俄国革命史》)1, 岩波文库, 2000年, 263—264页。
- ¹⁶⁴¹ Martynov, op. cit., p.148.
- ¹⁶⁵¹ *Sotsialisty o tekushchem momente*. Moscow-Petrograd, 1917, p. 5. 和田春树「二月革命」(《二月革命》), 「ロシア革命の研究」(《俄国革命研究》), 中央公论社, 1968年, 417—418页。
- ¹⁶⁶¹ Leiberov, op. cit., p. 273.
- ¹⁶⁷¹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 Vol. I, pp. 132, 151.
- ¹⁶⁸¹ Ibid., p.177.
- ¹⁶⁹¹ Ibid., pp. 193, 196.
- ¹⁷⁰¹ *Rech'*, 25 March 1917, p. 3.
- ¹⁷¹¹ Axelbank拍摄的纪录片 *Soviet Union and Lenin* (《苏联与列宁》)的一个画面记录了这一幕。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 ¹⁷²¹ 埋花畔人「露都革命見聞録」(《俄都革命見聞録》)17, 「朝日新聞」(《朝日新聞》)1917年5月28日。「歴史と人物」(《历史与人物》)1971年9月号, 246页。
- ¹⁷³¹ Maurice Paleologue, *La Russie des tsars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tome III, Paris, 1922, p. 293.
- ¹⁷⁴¹ Vera Figner,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5, Moscow, 1932, p. 437.
- ¹⁷⁵¹ Ibid., p. 439.
- ¹⁷⁶¹ Paleologue, op. cit., p. 293. *Rech'*, 28 marta 1917, p.4.

参考文献

省略语

- ARR :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俄国革命档案》)
- GARF : *Gosudarstvennyi arkhiv Rossiiskoi Federatsii*.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
- IA : *Istoricheskii arkhiv*. (《历史档案》)
- IS : *Istoriia SSSR*. (《苏联历史》)
- IZ : *Istarieskie zapiski*. (《历史学报》)
- KA : *Krasnyi arkhiv*. (《红色档案》)
- KL : *Krasnaia letopis'*. (《红色纪事》)
- OI :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俄罗斯历史》)
- PR : *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 (《无产阶级革命》)
- RGIA :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istoricheskii arkhiv*.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
- VA : *Voprosy arkhivovedeniia*. (《档案学问题》)
- VI : *Voprosy istorii*. (《历史问题》)
- VIK : *Voprosy istorii KPSS*. (《苏共历史问题》)
- VIZ :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军事史杂志》)
- VOSR RDPSS : *Velikaia Oktiabr'skaia sotsialisticheskaia revoliutsiia.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posle sverzheniia samoderzhavii*.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专制后的革命运动》)

文书

- GARF (Gosudarstvennyi arkhiv Rossiiskoi Federatsii).
F.634. Op.1, Ed, khr. 27.
- RGIA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Istoricheskii Arkhiv).
F.1282. Op. I. D. 741.
- Bakhmetiev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Globachev. *Pravda o russkoi revoliutsii*.
Vospominaniia byvshego Nachal'nika Petrogradskogo Okhrannogo otdeleniia.

Vospominaniia N. N. Pokrovskogo.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Balk, Poslednie piat' dnei tsarskogo Petrograda (23-28 fevralia 1917 g.).

Dnevnik poslednego Petrogradskogo gradonachal'nika.

G.A. fon Tal'. Memuary ob otrechenii ot prestola Rossiiskogo Gosudaria Imperatora Nikolaia II.1925.

报纸

Den'. (《日报》)

Izvestiia Petrogradskogo Soveta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Literaturnaia gazeta. (《文学报》)

Novoe vremia. (《新时报》)

Petrogradskaia pravda. (《彼得格勒真理报》)

Poslednie novosti. (《最新消息》)

Pravda. (《真理报》)

Rech' (《言语报》)

Utro Rossii. (《俄国晨报》)

资料

Akaemov, L. O. Agoniia starogo rezhima, *Istoricheskii vestnik*, 1917, April.

Aleksandr Feodorovich Kerenskii (Po materialam Departamenta Politsii), Petrograd, 1917.

Arkhiv A. M. Gor'kogo, Vol.IX, Moscow, 1966.

Barshtein, E. K. and Shalaginova, L. M. Departament politsii o plane petrogradskikh bol'shevikov v fevrale 1917 g. VA, 1962, No. 1.

Blok, Aleksandr. *Sobranie sochinenii*, Vol.8, Moscow-Leningrad, 1963.

Bol'sheviki v gody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Moscow, 1939.

Bol'shevizatsiia petrogradskogo garnizona. Leningrad, 1932.

Burzhuaziia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Moscow-Leningrad, 1927.

Cherkasskii, A. M. *Pervye dni russkoi revoliutsii*, Petrograd, 1917.

Dnevnik L. A. Tikhomirova 1915-1917 gg., Moscow, 2008.

Doklad po evreiskomu voprosu Ts. Komiteta Partii K.D.. Istoriia odnogo pogroma. Izdanie Zagranichnogo Komiteta Bunda.1916.

Dnevnik imperatritsy Marii Fedorovny (1914-1920, 1923 gody). Moscow, 2005.

Doneseniia L. K. Kumanina iz Ministerskogo pavil'ona Gosudarstvennoi dumy, dekabr' 1911—fevral' 1917 goda, VI, 2000, No. 3.

-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i Okhrannoe otdelenie, *Byloe*, 1918, No.1.
-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1996.
-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Dokumenty stavki verkhovnogo glavnokomanduiushchego i shtaba glavnokomanduiushchego armiiami Severnogo fronta), *KA*, 1927, Vol. 1-2.
-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v Baltiiskom flote (Iz dnevnika I. I. Rengartena), *KA*, 1929. Vol.1.
- Figner, Vera.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ol. 5, Moscow, 1932.
- Goroda Rossii za 1910 g. Sankt-Peterburg, 1914.
- Gosudarstvennaia duma. IV-i sozyv.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Petrograd, 1917.
- Gvozdevshchina v dokumentakh, *Izvestiia obshchestva arkheologii, istorii i etnografii pri Kazanskom gosudarstvennom universitete*, No. 34 (1929).
- Iakhontov, A. I. Tiazhelye dni. Sekretnye zasedaniia Soveta ministrov 16 iuliia—2 sentiabria 1915 g. *ARR*, Vol. XVIII.
- Iiul'skie volneniia 1914 g. v Peterburge, *PR*, 1924, No. 7.
- K istorii gvozdevshchiny, *KA*, 1934, Vol.6.
- K istorii poslednikh dnei tsarskogo rezhima (1916-1917 gg.), *KA*, .1926, No. 1(14).
- K istorii ubiistva Grigoriia Rasputina, *KA*, 1923, No. 4.
- Kak obrazovalsia Petrogradskogo Soveta, *Izvestiia*, 27 August 1917.
- Kanun revoliutsii*, Petrograd, 1918.
- Kobyl' -Bobul', I. *Vsia Pravda o Rasputine*. Petrograd, 1917.
- Krupskaia, N. K. Samoubiistva sredi uchashchikhsia i svobodnaia trudovaia shkola. *Pedagogicheskie sochineniia*, Vol.1.Moscow, 1960.
- Listovki peterburgskikh bolshevikov*. 1902-1917, Vol.2, Leningrad, 1939.
- Martynov, E. *Iz pechal'nogo opyta Russko-Iaponskoi voiny*. Sankt-Peterburg, 1906.
- Menshevik v 1917 godu*. Vol.1, Moscow, 1994.
- Mezdunarodnye otnosheniia v epokhu imperializma*, Series III, Vol.IV-V, Moscow-Leningrad, 1931.
- Nachalo voiny 1914 g. *KA*, 1923, No. 4.
- Neznamov, A. *Iz opyta Russko-Iaponskoi voiny (Zametki ofitsera General'nago Shtaba)*. Sankt-Peterburg, 1906.
- Obedinennoe dvorianstvo: Sezd upolnomochennykh gubernskikh dvorianskikh obshchestv*. Vol. 1-3, Moscow. 2002.
- Osoby zhurnaly Soveta ministrov Rossiiskoi Imperii. 1915 god*. Moscow, 2008.
- Pamiatniki agitatsionnoi literatury Ross, sots.-dem.rabochei partii*, Vol.6, vyp.1. *Proklamatsii 1914 g.* Moscow- Petrograd. 1923.
- Partii demokraticheskikh reform, mirnogo obnoveniia, progressistov. Dokumenty i materialy 1906-1916 gg.*, Moscow, 2002.

- Perepiska V.A. Sukhomlinova s N. N. Ianushkevichem, KA, 1922, Vol. 1-2.
- Perepiska Vilgel'ma II s Nikolaem II 1894- 1914*, Moscow, 2007.
- Peterburgskii komitet RSDRP(b) v 1917 godu. Protokoly i materialy zasedanii*, Sankt-Peterburg, 2003.
- Petrogradskii proletariat i bol'shevistskaia organizatsiia v gody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Sbornik materialov i dokumentov*. Leningrad, 1939.
-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Protokoly zasedanii IK*, Moscow-Leningrad, 1925.
-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1917 godu*, Vol. I, Sankt-Peterburg, 1993.
- Politicheskoe polozhenie Rossii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v zhandarmskom osveshchenii. KA, 1926, No. 4.
- Proval popytki Stavki podavit' Fevral'skuiu revoliutsiu 1917 goda v Petrograde, VA, 1962, No.1.
- Rabochee dvizhenie v gody voiny*. Moscow, 1925.
- Rabochee dvizhenie v Petrograde v 1912-1917 gg. Dokumenty i materialy*. Leningrad, 1958.
- Paionnye Sovety Petrograda v 1917 godu*. Vol. I-III, Moscow-Leningrad, 1964.
- Razlozhenie armii v 1917 g.* Moscow-Leningrad, 1925.
-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 armii i na flote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1966.
- Rossia v mirovoi voine 1914-1918 goda (v tsifrakh)*. Moscow, 1925.
-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Documents*. Edited by R. P. Browder and Alexander Kerensky, Vol. 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Semenov, E. P. Fevral'skie i martovskie dni, *Istoricheskii vestnik*, Vol. 147, No. 2, March 1917.
- Skorbnii put' Romanovykh 1917-1918 gg. Gibel' tsarskoi sem'i. Sbornik domumentov i materialov*, Moscow, 2001.
- Soiuz russkogo naroda*. Moscow-Leningrad, 1929.
- Sotsialisty o tekushchem momente*. Moscow-Petrograd, 1917.
- Statisticheskii sbornik za 1913-1917 gg. Vyp. 2*, Moscow, 1922.
- Svod otchetov fabrichnykh inspektorov za 1913 g.* Sankt-Peterburg, 1914.
- V ianvare i fevrale 1917 g. Iz donesenii sekretnykh agentov A. D. Protopopova. *Byloe*, 1918, No.13.
- V Petrograde nakanun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V osveshchenii Petrogr. Okhrannogo otdeleniia), KL, 1927, No.1.
- Velikaia Oktiabr'skaia sotsialisticheskaja revoliutsiia. Dokumenty i materialy.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posle sverzheniia samoderzhavii* (缩写为 VOSR RDPSS) Moscow, 1957.

Velikie dni Rossiiskoi revoliutsii. Petrograd, 1917.
Voennaia promyshlennost' Rossii v nachale XX veka 1900-1917. Vol.1, Moscow, 2004.
Vostanie 1916 goda v Srednei Azii i Kazakhstane.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1960.
Zapiska Durnovo, Krasnaia nov', 1922, No. 6.
Zhurnaly Osobogo soveshchaniia po oborone gosudarstva. 1916 god. IV, Moscow, 1977; 1917 god. I, Moscow, 1978.
Zhurnaly zasedanii Vremennnogo Pravitel'stva, Vol.1. Moscow, 2001.
 《俄国研究》同文馆，1916年。

百科辞典

Deiateli SSSR 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Rossii.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GRANAT, Moscow, 1989.
Delovoi mir Rossii. Istoriko-b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 Sankt-Peterburg, 1998.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 Brokgauz-Efron. Vol. XXXV, Sankt-Peterburg.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s drevneishikh vremen do 1917 goda. Entsiklopediia, Vol.1, Moscow, 1994.
Politicheskie deiateli Rossii. 1917. Moscow, 1993.
Rossiiskii liberalism sredi XVIII-nachala XX veka. Entsiklopediia. Moscow, 2010.
Sankt Peterburg. Petrograd. Leningrad. Entsiklopedicheskii spravochnik. Moscow, 1992.
 Shilov, D. N. *Gosudarstvennye deiateli Rossiiskoi Imperii 1802-1917. Glavy vysskhkh i tsentral'nykh uchrezhdenii. Biobibl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 Sankt-Peterburg, 2001.

日记、书信、回忆录等

[皇帝皇后、皇族和宫廷事务大臣]

Benckendorff, Paul. *Last Days at Tsarskoe selo*, London, 1927.
 Dehn, Lili. *The Real Tsaritsa*, London, 1922.
Dnevnik Imperatora Nikolaia II 1894-1918, Vol.I (1894-1904), Moscow, 2011; Vol.II, ch. 1(1905-1913)-2(1914-1918), Moscow, 2013.
Dnevnik i perepiska Velikogo kniazia Mikhaila Aleksandrovicha 1915-1918, Moscow, 2012.
 Dubenskii, D. N. *Kak proizoshel perevorot v Rossii, in Otrechente Nikolaia II. Vospominaniia ochevidtsev*, Leningrad, 1927.
 "Slava BOGU za vse...". *Pis'ma velikoi kniagini Elizavety Fedorovny k imperatoru Nikolaiu II, Istochnik*, 1994, No. 4.
 Iz dnevnika A. V. Romanova za 1916-1917 gg., KA, 1928, Vol.1.
 Marie, Grand Duchess of Russia, *Things I Remember*, Cassell: London, 1931. 玛丽亚大公女 (平冈绿译)「最後のロシア大公女マーリヤ——革命下のロマノフ王家」(《最后

的俄国大公女玛丽亚——革命时期的罗曼诺夫皇室》), 中央公论社, 1984年。

Nikolai II i Velikie kniaz'ia. Leningrad-Moscow, 1925.

Parley, Princess. *Memories of Russia*, 1916-1919, London, n.d.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Romanovykh. Vol. III. 1914-1915 gg., Moscow-Petrograd, 1925; Vol.IV.1916 god, Moscow-Leningrad, 1926, Vol.V.1916-1917 gg., Moscow-Leningrad, 1927.

Pis'ma Imperatritsy Aleksandry Fedorovny k Imperatoru Nikolaiu II, Vol. I, Berlin, 1922.

Voeikov. V. N. *S tsarem i bez tsaria*. Gel'singfors, 1936.

Zapiski N. M. Romanova, KA, 1931, Vol.6.

Zershchikov, K. Sobstvennyi Ego Velichestva konvoi v dni revoliutsii, *Chasovoi*, No. 205.

[拉斯普京相关内容]

Dnevnik i uospominaniia Anny Vyrubouoi, Moscow, 1991.

Iusupov, Feliks. *Konets Rasputina. Vospominaniia*, Paris, 1927.

Iusupov, Kniaz' Feliks. *Memuary*. Moscow, 1998.

Maklakov, V. A. Nekotorye dopolneniia k vospominaniam Purishkevicha i kn. Iusupova ob ubiistve Rasputina, *Sovremennye zapiski*, 1928, Vol. XXXIV, pp. 262-265.

Purishkevich, V. M. *Ubiistvo Rasputina (Iz dnevnika)*, Moscow, 1990.

Simanovich, A. *Rasputin, der almächtige Bauer*, Berlin, 1928.

Za kulisami tsarizma. Arkhiv tibetskogo vracha Badmaeva. Leningrad, 1925.

[帝政政治家、官僚]

Bark, P. L. Vospominaniia. liul'skie dni 1914 goda. *Vozrozhdenie*, No. 91, Juillet 1959, Paris, de Basily, Nicholas. *Diplomat of Imperial Russia 1903-1917: Memoir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1973.

Dzhunkovskii, V. F. *Vospominaniia*., Vol. I-II, Moscow, 1997.

Globachev, K. I. Pravda o russkoi revoliutsii, VI, 2002, No. 7, 8, 9, 10.

Protokoly o K. I. Globacheve, VI, 2002. No. 7.

Padenie tsarskogo rezhima. Stenograficheskie otchety doprosov i pokazanii, dannykh v 1917 g. v Chrezvychainoi Sledstvennoi Komissii Vremennogo Praviel'stva, Vol. I-VII Leningrad, 1924-1927.

Iz dnevnika A. D. Protopopova, KA, 1925. Vol. 3.

Predsmertnaia zapiska A. D. Protopopova, *Golos minuvshago na chuzhoi storone*, 1926, No. 2(XV).

Spirldovich, A. I. *Velikaia voina 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4-1917 gg.*, Vol. 1-3, New York, 1962.

Spiridovich. *Zapiski zhandarma*, Moscow, 1991.

Wassiljew, A. T. *Ochrana: Aus den Papieren des letzten russischen Polizeidirektors*. Zurich, 1930.

Zapiski knizhnika G. A. Ivanishina. *Minuvshee*, Vol. 17. Moscow-Peterburg, 1994.

[国会议员、自由主义者]

Bublikov, A. A. *Russkaia revoliutsiia. Vpechatleniia i mysli ochevidtsa i uchastnika*. New York, 1918.

Buryshkin. P. A. *Moskva kupecheskaia*. New York, 1954.

Demidov, I. Tsarskoe selo 1-go marta 1917 goda, *Poslednie novosti*, 12 March 1927.

B.E. [Engel'gardt, B.] *Revoliutsionnye dni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fevral'skikh dnei 1917 g.)*, *Obshchee delo*, 1921, No. 244. 16 March.

Engel'gardt, B. *Potonuvshii mir*, *VIZ*, 1964. No.1.

Engel'gardt. B. *Vospominaniia kamer-pazha*, *VIZ*, 1993, No.12:1994. No. 2, 3, 5, 7.

Engel'gardt, B.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Klio*, 2003, No. 1(20).

Iz vospominanii A. I. Guchkova. *Poslednie navosti*, 9, 12, 16, 19, 23, 26, 30 August 1936.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VI*, 1991, No.7, 8, 9-10, 11, 12.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rasskazyvaet..., Moscow, 1993.

Kerenskii, A. *Nechto o demagogii*, *Severnye zapiski*, 1917, No.1.

Kerensky. A. *The Catastrophe*, New York, London, 1927.

Kerensky, A. *The Crucifixion of Liberty*, London, 1934.

Kerensky, A. *Russia and History's Turning Point*, New York, 1965.

Lomonosoff. G. V. *Memoi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19.

L'vov, Kn. G. E. *Vospominaniia*, Moscow, 1998.

Lyanders, Semen. *The Fall of Tsarism: Untold Stories of the February 1917 Revolution*, Oxford, 2014.

Mansyrev, S. *Moi vospominaniia o rabote v Gosudarstvennoi Dume, Istorik i sovremennost'*, III, Berlin, 1922.

Miliukov, P. *Pervyi den'*, *Poslednie novosti*, 12 March 1927.

Miliukov, P. N. *Istoriia vtoroi russkoi revoliutsii*, Moscow, 2001.

Miliukov, P. N. *Vospominaniia*, Vol.II, New York, 1955.

Nabokov, V. *Vremennoe Pravitel'stvo,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ol. I. Berlin, 1922.

Iz sledstvennykh del N. V. Nekrasova 1921, 1931 i 1939 godov, *VI*, 1998, No. 11/12.

Nol'de, B. E. V. D. Nabokov v 1917g.,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ol. VII. Berlin, 1922.

Nol'de, B. E. V. D. Nabokov in 1917, V. D. Nabokov and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Edited by V. D. Medlin and S. L. Pars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Rodzhianko, M. V. *Krushenie imperii i gosudarstvennaia дума 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Moscow, 2002.

Shidlovskii, S. I. *Vospominaniia*, Vol. II, Berlin, 1923. In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Moscow-Leningrad, 1926.

Shul'gin, V. V. *Dni*, Leningrad, 1925; Moscow, 1989. 冈野五郎译《革命の日の記録》(《革命日的记录》), 河出书房, 1956年。

Skobelev, M. I. Gibel' tsarizma, *Ogonek*, 1927, No. 11(207), 13 March.

M. I. Tereshchenko o gen. Krymove, *Den'*, 2 September 1917.

[军人]

Danilov, Iu. N. *Rossia v mirovoi voine 1914- 1915 gg.*, Berlin, 1924.

Danilov, Iu. N. *Moi vospominaniia ob Imp. Nikolae II i Vel. Kn. Mikhaile Aleksandroviche*. *Arkhiv russkoi revoliutsii*, Vol. XIX, Berlin, 1928.

Danilov, Iu. N. *Velikii kniaz' Nikolai Nikolaevich*, Paris, 1930.

Denikin, A. I. *Ocherki russkoi smuty*. Vol. I, vyp.1, Paris, 1921.

Grigorovich, N.K. *Vospominaniia byvshego morskogo ministra 1853-1917*, Kronshtadt-Moscow, 2005.

Iz dnevnikov A. N. Kuropatkina, *KA*, 1927, Vol.1.

Lemke, Mikh. *250 dnei v tsarskoi stavke*. Peterburg, 1920.

Vospominaniia generala A. S. Lukomskogo, Vol. 1-2, Berlin, 1922.

Peretts, G. P. V *tsitadeli russkoi revoliutsii*. *Zapiski komendanta Tavricheskogo dvortsa*. Petrograd, 1917.

Polivanov, A. A. *Iz dnevnikov i vospominanii po dolzhnosti voennogo ministra i ego pomoshchnika 1907-1916 gg.*, Vol.1, Moscow, 1924.

Polovtsov, P. A. *Dni zatmeniia*. Paris, n. d..

Verkhovskii, A. I. *Na trudnom perevale*, Moscow, 1959.

Zapiski P. N. Vrangel', *Beloe delo*, kn. 5, 1928.

[学者、作家、知识分子]

Gippius, Zinaida. *Dnevnik*, Vol.1, Moscow, 1999.

Dubnov, S. M. *Kniga zhizni. Materialy dlia istorii moego vremeni. Vospominaniia i razmyshleniia*, Moscow, 2004.

Karrik, V. *Voina i revoliutsiia*. *Zapiski 1914-1917 g.*, *Golos Moinuvshogo*, 1918, No. 5-6.

Shklovskii, V. *Sentimental'noe putestvestvie. Vospominaniia 1917-1922*, Moscow- Berlin, 1923.

Slonimskii, Mikh. *Kniga vospominanii*, Moscow-Leningrad, 1966.

[革命家、社会运动家]

- Arskii, P. V. Petrograde vo vremia voiny. *KL*, 1923, No. 7.
- Badaev, A. *Bol'sheviki v Gosudarstvennoi dume. Vospominaniia*. Moscow, 1954.
- Kratkaia avtobiografiia chlena partii V.D. Bonch-Bruevica. *IS*, 1967, No. 2.
- Dingel'shtedt, F. Vesna proletarskoi revoliutsii, *KL*, 1925, No.1.
- Efimov, A. Iz istorii partiinogo kollektiva na petrogradskom zavode Staryi Parviainen. *KL*, 1926, No. 3.
- Egorov, Iv. Matrosy-bol'sheviki nakanune 1917 goda. *KL*, 1926, No. 3.
- Ermanskii, O. A. *Iz perezhitogo, 1887-1921 gg.*, Moscow-Leningrad, 1927.
- Gordienko, M. *Iz boego proshlogo*. Moscow, 1957.
- Iordanskii, N. I. Voennoe vosstanie 27 fevralia, *Molodaia gvardiia*, 1928, kn. 2.
- Iurenev, I. "Mezhraionka" (1911-1917), *PR*, 1924, No. 2.
- Ivanov-Razumnik, *Pered grozoi*, 1916-1917 gg., Petrograd, 1923.
- Kaiurov, V. N. Shest' dnei Fevral'skoi revoliutsii, *PR*, 1923, No.1.
- Kaiurov, V. N. *Sormovo v pervoi revoliutsii*, Nizhnii-Novgorod, 1920.
- Kalinin, M. I. *Za eti gody*, kn. 3, Moscow, 1929.
- Kel'son, Z. S. *Militsiia Fevral'skoi revoliutsii*, *Byloe*, 1925, No.1.
- Khovrin, N. A. *Baltiitsy idut na shturm*. Moscow, 1966.
- Kirpichnikov, T. Vosstanie 1.-gv. Volynskogo polka v fevrale 1917 g., *Byloe*, 1917, No. 5-6.
- Kondrat'ev, A. Vospominaniia o podopol'noi rabote peterburgskoi organizatsii RSDRP(b) v period 1914-1917 gg., *KL*, 1922, No. 5; 1923, No. 7.
- Kovnator, R. Nakanune "Fevralia" (Otryvki iz vospominanii), in *Revoliutsionnoe iunoshestvo*. Sbornik I, Leningrad, 1924.
- Lobov, S. and Gavrilov, I. Iz istorii partiinoy organizatsii na "Krasnom Vyborzhtse" , *KL*, 1926, No. 5.
- Markov, I. Kak proizoshla revoliutsiia (Zapis' rabochego), *Volia Rosstii*, 1927, No. III.
- Mil'chik, I. *Rabochii fevral'*, Moscow-Leningrad, 1931.
- Mstislavskii, S. *Piat' dnei. Nachalo i konets Fevral'skoi revoliutsii*, 2nd ed., Berlin-Peterburg-Moscow, 1922.
- Peshekhonov, A. Pervye nedeli, in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Moscow, 1926.
- Rafes, M. Moi vospominaniia, *Byloe*, No.19. 1922.
- Roshal', M. G. *Na putiakh revoliutsii. Vospominaniia bol'shevika*, Moscow, 1957.
- Shliapnikov, A. *Kanun semnadsatogo goda*, ch. 1-2, Moscow-Petrograd, 1923.
- Shliapnikov, A. *Semnadsatyi god*. Kn.1, Moscow-Petrograd, 1923.
- Shmidt, V. V. "Krestakh" , *Pravda*, 12 March 1917.

Skalov, S. 27 fevralia 1917 g. v Peterburge.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vosstaniia. *Krasnaia nov'*, 1931, No. 3.

Sokolov, N. D. Kak rodilsia prikaz No.1, *Ogonek*, 1927, No.11.

Stankevich, V. B. *Vospominaniia 1914-1919 gg.*, Berlin, 1920.

Steklov, Iu. Po povodu stat'i A. G. Shliapnikova, *PR*, 1923, No. 4.

Steklov, Iu. *Vospominaniia i publitsistika*, Moscow, 1965.

Sukhanov, Nik. *Zapiski o revoliutsii*, kn.1, Berlin-Peterburg-Moscow, 1922 .

Sukhanov, N. N. *Zapiski o revoliutsii*, Vol.1, kn. 1-2, Moscow, 1991.

Sveshnikov, N. Otryvki iz vospominanii, *Petrogradskaia Pravda*, 14 March 1923.

Sviatitskii, N. Voina i predfevral'e, *Katorga i ssylka*, No. 75(1931).

Tsereteli, I. G. *Vospominaniia o Fevral'skoi revoliutsii*, kn.1, Paris, 1968.

V ognе revoliutsionnykh boev (Raiony Petrograda v dvukh revoliutsiiax 1917 g.). Sbornik vospominanii starykh bol'shevikov pitersev, Moscow, 1967.

Vishniak, M. *Dan' proshlomu*, New York, 1954.

Voronovich, N. Zapiski predsedatelia Soveta soldatskikh deputatov, *Arkhiv grazhdanskoi voyny*, vyp. II, Berlin, n. d..

Zalezhsii, V. Pervyi legal'nyi Pe-Ka, *PR*, 1923, No.1.

Zalutskii, P. A. V poslednie dni podpol'nogo Peterburgskogo komiteta bol'shevikov v nachale 1917 g, *KL*, 1930, No. 2.

Zenzinov, V. *Iz zhizni revoliutsionera*, Paris, 1919.

Zenzinov, V. Fevral'skie dni, in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Vol.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外国人]

Buchanan, G. *My mission to Russia and Other Diplomatic Memories*. Vol. I-II, Cassell: London, 1923.

Hoare, Samuel. *The Fourth Seal: The End of Russian Chapter*, London, 1930.

Knox, A. *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917*, Vol.II, London, 1921.

Lockhart, Bruce. *Memoirs of a British agent*, London and New York, 1932.

Paleologue, Maurice. *La Russie des tsars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Tom I-III, Paris, 1922.

芦田均《革命前夜のロシア》(《革命前夕的俄国》),文艺春秋新社,1950年。

埋花畔人「露都革命見聞録」(《俄都革命見聞录》)17,「朝日新聞」(《朝日新聞》)1917年5月28日。「歴史と人物」(《历史与人物》)1971年9月号再刊。

[其他]

Tri poslednikh samoderzhitsa. Dnevnik A. V. Bogdanovich, Moscow/Leningrad, 1924.

- Kolyshko, I. I. *Velikii spad. Vospominaniia*, Sankt-Peterburg, 2009.
- Krushenie tsarizma. *Vospominaniia uchastnikov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v Petrograde*, Leningrad, 1986.
- Kugel', A. Poslednii maskarad, *Ogonek*, 1927, 24 April.
- Kuznetsov, N. Okhtenskii raion v fevral'skie dni 1917 g. *KL*, 1926, No. 3.
- Meisner, D. *Mirazhi i deistvitel'nost'*. *Zapiski emigranta*, Moscow, 1966.
- Sliozberg, G. B. *Dela minuvshikh dnei. Zapiski russkogo evreia*, Vol.III, Paris, 1934.
- Strumilin, S. G. *Statisticheskie ekonomicheskie ocherki*, Moscow, 1958.
- Strumilin, S. G. *Iz perezhitogo*, Moscow, 1957.
- Trifonov, Iu. *Mal'chik vel dnevnika. Literaturnaia gazeta*, 6 November 1965.
- Vasil'chikov, I. S. *To, chto mne vspomnilos'*, Moscow, 2002.
- Vysshie zhenskie (Bestuzhevskie) kursy, Moscow, 1966.

研究

- Abraham, Richard. *Alexander Kerensky: the First Lo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87.
- Airapetov, O.V. *Uchastie Rossiiskoi imperii v Pervyi mirovoi voine(1914-1917)*. 1916 god, Moscow, 2016; 1917 god, Moscow, 2016.
- Aluf, L. A. O nekotorykh voprosakh Fevral'skoi revoliutsii, *VIK*, 1967, No.1.
- Arbertini, Luig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Vol.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Artem'ev, S. A. Sostav Petrogradskogo Soveta v marte 1917 g., *IS*, 1964, No. 5.
- Astashov, Aleksandr. *Russkii front v 1914- nachale 1917 goda: voennii opyt i sovremennost'*, Moscow, 2014.
- Astrakhan, Kh. M. O pervom izdanii Manifesta TsK RSDRP(b) "Ko vsem grazhdanam Rossii", *VIK*, 1964, No. 6.
- Avdeev, N. *Revoliutsiia 1917 goda (Khronika sobytii)*, Vol.1, Moscow-Petrograd, 1923.
- Avrekh, A. Ia. *Tsarizm, i IV Duma 1912-1914 gg.*, Moscow, 1981.
- Barshtein and Shalaginova, *Partiia bol'shevikov v period podgotovki i provedeniia Fevral'skoi burzhuazno-demokraticheskoi revoliutsii*, *VIK*, 1957, No.1.
- Blok, A. *Poslednie dni imperatorskoi vlasti*, Peterburg, 1921; *Sobranie sochinenii*. Vol.6, Moscow- Leningrad, 1962.
- Bokhanov, A. N. *Pravda o Grigorii Rasputine*, Moscow, 2011.
- Borisov, G. and Vasil'ev, S. *Stankostroitel'nyi imeni Sverdlova*, Leningrad, 1962.
- Buldaikov, V. P. and Leont'eva, T. G. *Voina porodivshata revoliutsiiu. Rossiia, 1914-1917 gg.*, Moscow, 2015.
- Burdzhalov, E. N, O taktike bol'shevikov v marte-aprele 1917 goda, *VI*, 1956, No.4 ,
- Burdzhalov, E. N. *Vtoraia russkaia revoliutsiia. Vosstanie v Petrograde*, Moscow, 1967.

- Burdzhalov, E. N. *Vtoraia russkaia revoliutsiia. Moskva, front, periferiia*, Moscow, 1971.
- Chermenskih E. D. *Burzhuaziia i tsarizm v revoliutsii 1905-1907 gg.*, Moscow-Leningrad, 1939.
- Chermenskii, E. D. *Burzhuaziia. i tsarizm v pervoi russkoi revoliutsii. 2-e izd.*, Moscow, 1970.
- Chermenskii, E. D. *IV gosudarsivennaia дума i sverzhenie tsarizma v Rossii*, Moscow, 1976.
- Chernov, Viktor. *Rozhdenie revoliutsionnoi Rossi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Paris, Prague, New York, 1934.
- Cullen, Richard. *Rasputin: the Role of Britain's Secret Service in His Torture and Murder*, Dialogue: London, 2010.
- Dan, Theodore.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London, 1964.
- Diakin, V. S. *Russkaia burzhuaziia i tsarizm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Leningrad, 1967.
- Dlugolenskii, Iakov. *Voenno-grazhdanskaia i politseiskaia vlast' Sankt-Peterburga*, Sankt-Peterburg, 2001.
- Efimov, A. Problema vlasti v pervye dni Fevral'skoi revoliutsii 1917 g., *Revoliutsiia prava*, 1928, No. 3, p. 59.
- Efremov, E. Podvig na Znamenskoj. *Neva*, 1962, No. 2.
- Gaida, A. *Liberal'naia oppozitsiia na putiakh k vlasti (1914-vesna 1917 g.)*, Moscow, 2003.
- Ganelin, R. Sh. *V Rossii dvadtsatogo veka. Stat'i raznykh let*, Moscow, 2014.
- Gindin, I. F. Russkaia burzhuaziia v period kapitalizma, ee razvitie i osobennosti, *IS*.1963, No. 3.
- Golovin, N. N. *Iz istorii kampanii 1914 goda na russskom fronte*, Prague, 1926.
- Golovin, N. N. *Voennye usiliia Rossii v mirovoi voine*, Vol. I-II, Paris, 1939.
- Grave, B. B. Militarizatsiia promyshlennosti i rossiiskii proletariat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in *Iz istorii rabocheho klassa 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Moscow, 1958.
- Grunt, A. Ia. Vozniknovenie Moskovskogo Soveta rabochikh deputatov v 1917 g., *IS*. 1967, No. 2.
- Gushchin, F. A. and Zhebrovskii, S. S. *Plennye generaly Rossiiskoi imperatorskoi armii 1914-1917*, Moscow, 2010.
- Guslatnikov, P. S. *Studencheskoe dvizhenie v 1905 godu*. VI. 1955, No.10.
- Emets, V. A. O roli russkoi armii v pervyi period mirovoi voiny 1914-1918 gg., *IZ*, Vol.77, 1965.
-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problem istorii i istoriografii. Mezhdunarodnaia nauchnaia konferentsiia. Sbornik dokladov*. Sankt-Peterburg, 2017.
- Haimson, L. The Problem of Social Stability in Urban Russia, 1905-1917, *Slavic. Review*,

- Vol. XXIV, No.1(March 1965).
- Hasegawa, Tsuyoshi. The Bolshevik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etrograd Soviet 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oviet Studies*, Vol. XXIX, No.1.January 1977.
- Hasegawa, Tsuyoshi.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 Hasegawa, Tsuyoshi. Rodianko and the Grand Dukes' Manifest on 1 March 1917,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18, no. 2(1976).
- Hasegawa, Tsuyoshi.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of 1917 in Petrograd Revisited: the Duma Committee,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Birth of Dual Pow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July 11, 2014.
- Ioksimovich, Ch. M. *Manufakturnaia promyshlennost' v proshlom i nastoiashchem*. Vol. I, Moscow, 1915.
- Istoriia grazhdanskoi voiny v SSSR*, Vol.1, Moscow, 1935.
- Istoriia Moskvyy*, Vol.V, Moscow, 1955.
- Istoriia pervoi mirovoi voiny 1914-1918*, Vol. 1-2, Moscow, 1975.
- Istoriia rabocheho klassa Leningrada*, vyp. II. Leningrad. 1963.
- Iudin, E. E. Iusupovy i Nikolai II(1890-1916 gg.) .VI, 2009, No. 7.
- Ivanov, A. A. *Vladimir Purishkevich—opyt biografii pravogo politika (1870-1920)*. Moscow-Sankt Peterburg, 2011.
- Katkov. G. *Russia 1917.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London, 1967.
- King, Greg and Woolmans, Sue. *The Assassination of the Archduke*,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13.
- Kochakov, B. M. Sostav petrogradskogo garnizona v 1917 g. *Uchenye zapiski LGU*. No. 205, Leningrad, 1956.
- Kruze, E. E. *Peterburgskie rabochie v 1912- 1914 godakh*. Moscow-Leningrad, 1961.
- Kulikov. S. V. Tsentral'nyi Voennno-promyshlennyi komitet nakanune i v khode Fevral'skoi revoliutsii 1917 goda, *OI*, 2012, No.1.
- Laverychev, V. Ia. *Monopolisticheskii kapital v tekstil'noi promyshlennosti Rossii (1900- 1917 gg.)*, Moscow, 1963.
- Laverychev, V. Ia. *Po tu storonu barrikad*. Moscow, 1967.
- Leiberov, I. P. *Na shturm samoderzhavlia. Petrogradskii proletariat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i Fevral'skoi revoliutsii*, Moscow, 1979.
- Leiberov, I. P. O vozniknovenii revoliutsionnoi situatsii v Rossi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iiul'-sentiabr' 1915 g.), *IS*, 1964, No. 6.
- Leiberov, I. P. Petrogradskii proletariat v bor'be za pobedu Fevral'skoi burzhuazno-demokraticeskoi revoliutsii v Rossii, *IS*, 1957, No.1.

- Leiberov, I. P. Stachechnaia bor'ba Petrogradskogo proletariata v period pervoi mirovoi volny, in *Istoriia rabocheho klassa Leningrada*, vyp. II, Leningrad, 1963.
- Leiberov, L. P. and Shkaratan, O.I. K voprosu o sostave petrogradskikh promyshlennykh rabochikh v 1917 godu. VI, 1961, No.1.
- Letopis'zhizni i tvorchestva A. M. Gor'kogo*, Vol.2, Moscow, 1958.
- Longley, David.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the Baltic Fleet at Helsingfors: Vostanie or Bunt?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Vol.20, No.1(1978).
- Lukoianov, I. V. *U istokov rossiiskogo parlamentarizma*, Sankt-Peterburg, 2003.
- MacKenzie, David. *The "Black Hand" on Trial Salonika, 191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大卫·马肯兹(柴宜弘他译)《刺客阿皮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男人》平凡社, 1992年。
- Maevskii, Evg. *Obshchaia kartina dvizheniia, in Obshchestvennoe dvizhenie v Rossii v nachale XX-go veka*. Vol. II, ch.1, S.Peter-burg, 1910.
- Martov, L. *Istoriia Rossiiskoi sotsial-demokratii*, Petrograd-Moscow, 1923.
- Martynov, E. I. *Tsarskaia armiiia v Febr'ial'skom perevorote*, Leningrad, 1927.
- Melancon, Michael. Who wrote What and When? Proclamations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Petrograd, 23 February-1 March 1917, *Soviet Studies*, Vol. XL, No. 3, July 1988.
- Melancon, Michael.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Russian Anti-war Movement, 1914-1917*,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Melancon, Michael. Rethinking Russia's February Revolution: Anonymous spontaneity or socialist agency?, in *Politicheskie partii v rossiiskikh revoliutsiiax v nachale XX veka*, Moscow, 2005.
- Mel'gunov, S. P. Legenda o separatnom mire. *Kanun revoliutsii*, Moscow, 2006.
- Mel'gunov, S. P. *Martovskie dni 1917 goda*, Paris, 1961.
- Mel'gunov, S. P. *Na putiakh k dvortsovomu perevorotu*, Paris, b. g.
- Menitskii, I. *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voennykh godov 1914-1917*. Vol.2, Moscow, 1925.
- Miller, V. I. Nachalo demokratizatsii staroi armii v dni Fevral'skoi revoliutsii. Zasedanie Petrogradskogo Soveta 1 marta 1917 g. i prikaz No.1, *IS*, 1966, No. 6.
- Mints, I.I. *Istoriia Velikogo Oktiabria*, Vol.1, Moscow, 1967.
- Mitel'man, M., Glebov, B. and Ul'ianskii, A. *Istoriia Putilovskogo zavoda*, Moscow, 1961.
- Nikolaev, A. B. Vospominaniia predsedatelia voennoi komissii Vremennogo komiteta Gosudarstvennoi Dumy o Fevral'skoi revoliutsii 1917 g. *Klio*, 2003, No.1(20).
- Nikolaev, A. B. *Gosudarstvennaia дума v Fevral'skoi revoliutsii: ocherki istorii*, Riazan', 2002.
- Nikolaevskii, B. I. *Russkie masonry i revoliutsiia*, Terra: Moscow, 1990.

- Ocherki istorii Leningrada*, Vol. III, Moscow-Leningrad, 1956.
- Ovchenko, Iu. F. Sergei Vasil'evich Zubatov, VI, 2005, No. 8.
- Oznobishin, D. V. Bor'ba bol'shevikov s soglasyateliymi v Petrogradskom Sovete, IZ, Vol.75.1965.
- Pares, Bernard. *The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9.
- Pervaya mirovaya voina i konets Rossiiskoi imperii*, Vol. II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Sankt-Peterburg, 2014.
- Pervaya mirovaya uoina: Prolog XX veka*, Moscow, 1998.
- Petrash, V. V. *Moriaki Baltiiskogo flota v bor'be za pobedu Oktiabria*, Moscow-Leningrad, 1966.
- Petrogradskie bol'sheviki v trekh revoliutsiakh*, Leningrad, 1966.
- Petrov, V. A. *Ocheki po istorii revoliutsionnogo dvizheniia v russkoi armii v 1905 g.*, Moscow-Leningrad, 1964.
- Pogrebinskii, A. P. K istorii soiuзов zemstv i gorodov v gody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y, IZ, Vol.12, 1941.
- Pogrebinskii, A. P. Voenno-promyshlennye komitety, IZ, Vol. 11, 1941.
- Poletika, N. P. *Vozniknovenie pervoi mirovoi voiny (Iiul'skii krizis 1914 g.)*, Moscow, 1964.
- Popov, I. I. *Ocherki istorii VKP(b)*, 12th ed., vyp.1, Moscow-Leningrad, 1931.
- Radzinsky, Edward. *The Rasputin File*, Doubleday, New York; 2000. 拉津斯基 (沼野充义、望月哲男译)《拉斯普京》下,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2004年。
- Rashin, A. G. *Formirovanie rabochego klassa Rossii*, Moscow, 1958.
- Rashin, A. G. *Naselenie Rossii za 100 let*, Moscow, 1956.
- Repnikov, Aleksandr and Milevskii, Oleg. *Dve zhizni L'va Tikhomirova*, Moscow, 2011.
- Russi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1929.
- Shchegolev, P. E. *Poslednii reis Nikolaia Vtorogo*, Moscow-Leningrad, 1928.
- Seiranian, B. S. *Bor'ba bol'shevikov protiv voenno-promyshlennykh komitetov*, Erevan, 1961.
- Senin, A. *Aleksandr Ivanovich Guchkov*, Moscow, 1996.
- Shalaginova, L. M. *Esery-internationalisty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in *Pervaya mirovaya voina 1914-1918*, Moscow, 1968.
- Shatsillo, K. F. *Delo Polkovnika Miasoedova*, VI, 1967, No. 4.
- Sheliubskii, A. P. Severnyi front v dni Fevral'skoi revolutsii, IS, 1967, No.1.
- Siegelbaum, Lewis H.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in Russia, 1914-17: A Study of the War-Industries Committees*, Oxford, 1983.
- Slonimskii, A. G. *Katastrofa russkogo liberalizma: Progressivnyi blok nakanune i vo vremia Fevral'skoi revoliutsii 1917 goda*, Dushanbe, 1975.
- Sobolev, G. A. *Petrogradskii garnizon v bor'be za pobedu Oktiabria*, Leningrad, 1985.

- Solzhenityn, Aleksandr. *Krasnoe koleso. Avgust chetyrnadsatogo*. Kniga 1-2, Moscow, 2007; *Oktiabr' shestnadsatogo*. Kniga 1-2, Moscow, 2007; *Mart semnadsatogo*. Kniga 1-2, Moscow, 2008 (Polnoe sobranie, Vol. 7-12).
- Startsev, V. I. *Ocherki po istorii petrogradskoi Krasnoi gvardii i rabochei militsii*. Moscow-Leningrad, 1965.
- Startsev, V. I. *Tainy russkikh masonov*, Sankt-Peterburg, 2004.
- Stepanov, Z. V. *Rabochie Petrograda v period podgotovki i provedeniia Oktiabr'skogo vooruzhennogo vosstaniia*, Moscow-Leningrad, 1965.
- Stepanov, Z. V. *Voprosy chislennosti i struktury rabochikh Petrograda v 1917 g. Rabochii klass i rabochee dvizhenie v Rossii u 1917 g.*, Moscow, 1964.
- Stites, Richar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Studentsova, E. E. *V bor'be za sverzhenie tsarizma, in Vyborgskaia storona. Sbornik statei i vospominanii, Leningrad*, 1957.
- Tarnovskii, K. N. *Formirovanie gosudarstvenno-monopolisticheskogo kapitalizma v Rossi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 Moscow, 1958.
- Tiutiukin, S. V. *Voina, mir, revoliutsiia. Ideinaia bor'ba v rabochem dvizhenii Rossii 1914-1917 gg.*, Moscow, 1972.
- Tiutiukin, S. V. *Aleksandr Kerenskii: stranitsy politicheskoi biografii (1905-1917 gg.)*, Moscow, 2012.
- Tokarev, Iu. S. *Petrogradskii Sovet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v marte-aprele 1917 g.* Leningrad, 1976.
- Vada Kharuk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n Politicheskaiia istoriia Rossii. Izbrannye trudy 1960-2017*, Moscow, 2018.
- Vada Kharuki, *Fevral'skaia revoliutsiia: novaia kontseptsiiia iaponskikh istorikov, in Politicheskaiia istoriia Rossii. Izbrannye trudy 1960-2017*, Moscow, 2018.
- Verzhkhovskii, D. V. and Liakhov, V. F. *Pervaiia mirovaia voina 1914-1918 gg.*, Moscow, 1964.
- Volobuev, P. V. *Ekonomicheskaiia politika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Moscow, 1962.
- Wada, Haruki, *The Russian February Revolution of 1917,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No.15, 1974.
- Wada Haruki, *Lev Tikhomirov: His Thought in His Later Years 1913-1923,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No. 28, 1987.
- White, James D. *The Sormovo-Nikolaev zemliachestvo i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Soviet Studies*, Vol. XXXI, No. 4.1979.
- Zaslavskii, D. O. and Kantrovich, V. A. *Khronika Fevral'skoi revoliutsii*, Vol. I, Petrograd,

1924.

Zlokazov, G. I. O. zasedanii Petrogradskogo Soveta rabochikh i soldatskikh deputatov 28 fevralia 1917 g, in *Oktiabr' i grazhdanskaia voina v SSSR*, Moscow, 1966.

Zlokazov, G. I. Sozdanie Petrogradskogo Soveta, *IS*, 1964, No. 5.

池田嘉郎「コーポラティブな専制から共和制の帝国ソ連へ」(《从合作型专制到共和制的苏联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戦と帝国の遺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帝国的遗产》),山川出版社,2014年。

池田嘉郎「ロシア革命——破局の8か月」(《俄国革命——悲剧的八个月》),岩波新书,2017年。

石井規卫「ロシア革命と第一次世界大戦時の過剰動員」(《俄国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动员过剩》),『歴史評論』(《历史评论》)810号,2017年10月。

加納格「ロシア帝国の民主化と国家統合——二十世紀初頭の改革と革命」(《俄罗斯帝国的民主化与国家统一——二十世纪初的改革与革命》),御茶水书房,2001年。

菊地昌典「ロシア革命と日本人」(《俄国革命与日本人》),筑摩书房,1973年。

巴巴拉・W.塔奇曼「八月の砲声」(《八月炮火》)下,筑摩书房,1965年。

托洛茨基「ロシア革命史」(《俄国革命史》)1,岩波文库,2000年。

和田春樹「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江口朴郎編「ロシア革命の研究」(《俄国革命研究》),中央公論社,1968年。

和田春樹「ニコライ・ラッセル——国境を越えるナロードニキ」(《尼古拉・罗素——超越国境的民粹主义者》)下,中央公論社,1973年。

和田春樹「ラスプーチン、皇后、皇帝——ピークリの歴史小説を読む」(《拉斯普京、皇后、沙皇——读皮库里的历史小说》),『ロシア史の新しい世界——書物と史料の読み方』(《俄国史的新世界——书籍与史料的读法》),山川出版社,1986年。

和田春樹「日露戦争——起源と開戦」(《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上下,岩波书店,2009—2010年。

和田春樹、和田あき子「血の日曜日——ロシア革命の発端」(《流血星期日——俄国革命的开端》),中公新书,1970年。

人名解说与索引

(人名后的数字为本书边码)

A

阿杰莫夫, M. S. 129, 231, 232, 327, 420

Adzhemov, M. S. (1878—1950) 出生于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曾就读于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和莫斯科国立大学, 毕业后成为预备律师, 后加入立宪民主党, 任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时, 成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和司法部全权委员、法律协会成员; 1917年9月和纳博科夫、诺里杰成为即时讲和派的成员; 1919年, 任前往巴黎的立宪民主党代表。

阿列克谢耶夫, M. V. 65, 69, 78, 118, 122, 200, 292, 297, 305, 314, 343, 344, 396-401, 403-405, 409, 411, 412, 414-417, 429-434, 439, 440, 444, 445, 452, 453, 468, 474, 504, 506-509, 531, 533
Alekseev, M. V. (1857—1918) 陆军上将。1915年任总参谋长; 1917年任最高总司令; 后加入反布尔什维克军队, 死于疾病。

埃利利希, G. M. 303, 345, 352,

389, 390

Erlikh, G. M. (1882—1942) 崩得派干部。犹太人。二月革命后任苏维埃执行委员。十月革命后, 前往波兰; 1939年返回苏联, 于1941年被逮捕。

埃尔曼斯基(柯岗), O. A. 139, 211-213, 217, 221, 234, 235, 259, 260, 437

Ermanskii (Kogan), O. A. (1867—1941) 犹太人, 毕业于新俄罗斯帝国大学, 流亡至瑞士。孟什维克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持国际派立场, 是首都初始派的领导人; 二月革命后, 成为孟什维克党干部; 十月革命之后转变立场, 主张支持苏维埃统一政府, 协助布尔什维克政权。后持续撰写著述, 著有回忆录。

埃弗特, A. E. 396, 397, 400, 416, 432, 433, 532

Evert, A. E. (1857—1926) 陆军上将。日俄战争中为库罗帕特金最高统帅部成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第四集团军司令和西部方面军司令。

B

巴德马耶夫, 扎姆萨兰 73, 74

Badmaev, Zhamsaran (1851—1920) 出生于中国西藏, 医生。想通过为俄国皇族、位高权重者治疗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与拉斯普京关系亲近, 曾为提拔普罗托波波夫出过力。

巴尔克, A. P. 110, 150, 239, 260, 265, 266, 269, 271, 275, 278, 293, 300, 301, 315, 316, 359, 403, 491, 542

Balk, A. P. (1866—1957) 彼得格勒特别市市长。二月革命时被捕, 不久被释放。在俄国内战期间逃往南斯拉夫, 逝于巴西。著有个人回忆录。

巴尔克, P. L. 47, 224, 304, 359

Bark, P. L. (1869—1936) 财政部部长。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曾就职于财政部。1911年晋升为工商部副部长, 1914年晋升为财政大臣。二月革命时因主动向临时政府投案被逮捕, 于1920年流亡海外。留有回忆录。

巴齐利, N. A. 119, 122, 429, 440, 442

Bazilii, N. A. (1883—1963) 外交部秘书长, 曾在“一战”中担任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外交事务主管。二月革命时起草了沙皇退位诏书, 后担任巴黎大使馆参赞, 参与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流亡美国后, 就职于银行。曾审讯古契柯夫。

邦奇-布鲁耶维奇, M. D. 350, 351

Bonch-Bruevich, M. D. (1873—1955) 布尔什维克党人, 毕业于库尔斯克土地测量学校。19世纪90年代开始流亡。

曾在国外研究旧礼仪派学说。二月革命时参与了苏维埃报纸的发行; 十月革命后担任人民委员会秘书长。他的兄长是协助过红军的陆军少将。

本肯多夫, P. K. 376, 377, 398

Benkendorf, P. K. (1853—1921) 伯爵。皇宫警卫司令部临时代理司令。

博古达诺夫, B. O. 202, 217, 221, 227, 231, 312, 333, 352, 366, 390, 505

Bogdanov, B. O. (1884—1960) 孟什维克党员、取消派-国防派成员、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书记。1917年2月14日, 因推动国家杜马和平示威游行而被捕; 二月革命中被释放。后致力于苏维埃的组建, 并任执行委员。反对十月革命, 同年12月被捕。1918年脱离孟什维克党, 同年12月被捕, 后又于1922年被逮捕, 最终于1955年被释放, 在莫斯科病故。

波利拉, 弗拉达斯 201, 290, 424

Pozela, Vladas (1879—1960) 立陶宛人。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在塔爾圖法科大学学习。立陶宛组织成员, 因参加革命被捕。“一战”中接触到布尔什维克党, 后成为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立陶宛代表。红军占领维尔尼斯后, 加入立陶宛政府。1919年波兰军队占领立陶宛后, 参与了民族主义运动。1941年逃亡国外, 于奥地利逝世。

波利瓦诺夫, A. A. 62, 64, 327, 470, 487, 498, 510

Polivanov, A. A. (1855—1920) 曾任陆军副部长(1906—1912)及陆军大臣(1915—1916)。二月革命后,主管陆海军部下属的军事改革委员会。十月革命后仍留在国内,于1920年加入协助红军的协议会。著有回忆录。

波特波夫, A. S. 365, 472, 473

Potapov, A. S. (1872—1924之后) 陆军少将。“一战”时任第64师旅长。二月革命时进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担任古契柯夫的副手,后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其后进入陆军部工作;十月革命后,效力于苏俄政府。据称其曾作为情报军官与中国共产党军队联络。

波洛夫佐夫, P. A. 365, 388, 470

Polovtsov, P. A. (1874—1964) 陆军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高加索骑兵师塔塔尔骑兵团团长;二月革命时加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5月任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任特维尔州军事总督,是当地军队的司令;1918年逃往国外。著有回忆录。

波克罗夫斯基, N. N. 16, 217, 224,

226, 249, 257, 293, 296, 297, 304, 314, 316, 319, 493

Pokrovskii, N. N. (1865—1930) 帝国政府最后一任外交大臣。曾在莫斯科帝国大学及圣彼得堡帝国大学学习。后进入财政部。1904年担任副部长,1916年任职国家监察大臣,后成为外交大臣。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

在立陶宛任大学教授。著有未公开的回忆录。

勃列艾夫, M. A. 116, 130, 224, 249, 257, 272, 277, 293, 300, 304, 314, 315, 319, 397, 403, 404, 541, 542

Beliaev, M. A. (1863—1918) 陆军上将。“一战”时任总参谋部总务局局长;1917年1月任陆军大臣,镇压二月革命失败后被逮捕;后遭枪决。

勃洛克, A. A. 457, 463

Blok, A. A. (1880—1921) 象征主义派诗人,社会革命党左派的支持者,为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

布勃利科夫, A. A. 231, 326, 327, 341, 359-361, 403, 404, 410, 469, 506

Bublikov, A. A. (1875—1941) 交通部职员之子。毕业于圣彼得堡高等交通工程学校,之后进入交通部。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隶属于进步同盟。在二月革命中成为交通部政治委员,掌管俄国铁道部门。十月革命后逃亡。留有回忆录。

布鲁杰罗夫, E. N. 170, 172, 316, 329, 331, 332, 335, 375, 376, 487-492, 541

Burdzhalov, E. N. (1906—1985) 俄国历史学家。亚美尼亚人。1953年担任《历史诸问题》杂志副主编,因在史学界发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被政府撤销职务。1967年出版了研究二月革命的知名著作。

布鲁西洛夫, A. A. 66, 81, 122, 305, 396, 400, 403, 415, 432, 433, 487

Brusilov, A. A. (1853—1926) 陆军上将。“一战”时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西南方面军司令;二月革命后任俄军最高总司令;1920年开始帮助红军。著有回忆录。

布鲁伊斯基, P. A. 34

Bryshkin, P. A. (1887—1955) 莫斯科资产阶级。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曾任贸易公司董事长。1912年担任莫斯科市议会的议员。曾任《俄国晨报》编辑,是进步同盟中央委员、共济会成员。“一战”时任军事工业委员会成员;十月革命后,曾担任高尔察克政权的财政大臣,后流亡。著有回忆性文章。

布坎南, 乔治·W. 92, 93, 114, 115, 224, 225, 378, 465, 487, 500

Buchanan, George W. (1854—1924) 英国大使。支持二月革命,后来干预过革命时期政局,于当年12月回国。留有回忆录。

C

长谷川毅 317, 332, 333, 376, 380, 488, 490-492, 543

はせがわ つよし (1941—) 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在东京大学俄国史研究会时开始着手研究二月革命,于美国完成研究。1976年取得美国国籍,1981年出版了关于二月革命的巨著,之后研究北方四岛问题和日本战败的

过程。曾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2016年退休。

柴可夫斯基, N. V. 136, 137, 218, 220, 352, 390

Chaikovskii, N. V. (1850—1926) 在圣彼得堡帝国大学学习期间,组建了最早的民粹党社团。后因倾向于神学而去往美国。1878年回到欧洲,在流亡人团体开展活动。第一次革命时加入社会革命党,在乌拉尔策划游击队斗争被捕。1910年恢复自由,参加合作社运动,成为社会革命党干部。二月革命时成为苏维埃执行委员。1918年因参加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成为阿尔汉格尔斯克白色政权的领导人,后持续流亡生活。

D

丹尼洛夫, Iu. N. 302, 396, 416, 429, 432-434, 440, 442, 487, 533

Danilov, Iu. N. (1866—1937) 陆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时,担任最高总司令尼古拉大公的后勤部长。1915年,在大公卸任后担任第25军军长;1916年开始担任北部方面军参谋长。十月革命后,与列宁政府合作,与托洛茨基不和,离开后,成为弗兰格尔政府的军队领导人;后逃亡。撰写了多本回忆录。

德恩, 莉莉·A. 109

Den, Luliia A. (1885—1963) 立陶宛鞑靼贵族之女。皇宫护卫武官之妻。侍奉皇后,革命结束后仍继续侍奉沙皇家族,之后开始流亡生活。著有回

忆录。

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大公 99, 102,
104-115, 378

Dmitrii Pavlovich, vel. Kn. (1891—1942) 保罗大公与第一任大公妃生育的长子,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弟。从“一战”开始, 他就作为近卫骑兵团的军官参战, 后因参与杀害拉斯普京而被派赴波斯前线。二月革命后留在克里米亚的领地, 后流亡海外。

迪亚金, V. S. 123

Diakin, V. S. (1928—1994) 苏联历史学家。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 供职于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后改名为圣彼得堡分所), 在包括二月革命在内的自由与专制政府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都本斯基, D. N. 292, 397, 399,
404, 405, 533

Dubenskii, D. N. (1857—1923) 陆军少将。在总参谋部负责调查研究, 大量参与了记录资料的编辑工作。在“一战”爆发后, 负责为前往最高统帅部的沙皇做随行与记录工作。二月革命时被捕, 释放后加入反布尔什维克军队, 后流亡国外。著有回忆录。

杜尔诺沃, P. N. 41

Durnovo, P. N. (1842—1915) 毕业于军事法大学。在军事法庭上工作, 后调任司法部, 在法院担任法官和检察官。1883年任安保局副局长, 后任局长。1900年担任内务部副部长,

1905年开始主管内务部工作, 1906年卸任。作为国务会议议员, 反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与进步同盟对抗, 尝试组建反动团体, 最终失败。寿终正寝。

多米托留科夫, I. I. 37, 63, 64,
297, 328, 342, 343

Dmitriukov, I. I. (1872—1918) 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为地方自治机构议员, 十月党人。曾任第四届国家杜马书记, 隶属于进步同盟。二月革命时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

E

恩格勒格特, B. A. 76, 129, 130, 326,
353, 355, 356, 358, 362, 365, 388,
452, 470, 530, 534-556, 559

Engel'gart, B. A. (1877—1962) 军人。曾就读于贵胄军官学校、陆军大学。曾参加日俄战争, 时任中校; 1906年因伤退役, 后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 二月革命时加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 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月革命后开展反布尔什维克活动, 失败后流亡至法国; 后移居拉脱维亚, 随拉脱维亚并入苏联, 在苏联度过后半生, 并撰有回忆录。

F

法利钦斯基, P. I. 365, 470

Pal'chinskii, P. I. (1875—1929) 矿业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采矿工程师。1905年革命后, 因叔叔柴可夫斯基事件牵连而去往国外。是南俄罗斯矿业

主大会评议会的驻外代表，曾在伦敦与库罗帕特金交流。1915年起，活跃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国防特别审议会。因实际业绩、人脉关系出色，进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担任古契柯夫的代理人。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期间被任命为彼得格勒代理总督，十月革命时负责保卫冬宫，被逮捕，释放后协助苏维埃政权。1928年被再次逮捕并遭枪毙。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阿历克丝）（皇后） 29, 31, 39, 65-75, 77, 93-100, 103-105, 109-118, 120, 125, 128, 238, 256, 258, 264, 277-281, 297, 304, 376, 377, 398, 404, 409-411, 427, 459, 469, 498, 501

Aleksandra Fedorovna (Aliks) (1872—1918) 德意志帝国黑森和莱茵大公国大公之女。于1894年成婚。同家人一道被革命派处决于乌拉尔。留有与沙皇之间的书信。

图格奈尔, V. N. 475, 481-484

Figner, V. N. (1852—1943) 民粹派女革命家。曾留学于苏黎世大学，归国后从事农民组织工作。作为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成员活动，于1883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在施吕瑟堡要塞监狱服刑20年，1904年被释放。在休养一段时间后，开始为俄国社会革命党行动。1910年起，以瑞士为中心，开展解救政治犯的运动；1915年回国。二月革命过后，为解救政治犯、争取女性参政权、保护革命博物馆等开展各种活动。十月革命过后，在解

救苏维埃政治犯的政治救助红十字会、克鲁泡特金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和组织活动，对体制持有批判的态度。著有长达7卷的回忆录。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牺牲于莫斯科。

菲利波夫斯基, V. N. 337, 338, 354, 355, 358

Filippovskii, V. N. (1882—1940) 海军上尉。1905年革命期间，是社会革命党军人组织的成员。二月革命时，开始在军事委员会活动，于3月末成为苏维埃执行委员。在立宪会议上负责会议的安保工作，担任萨马拉政府工商部长。1920年被捕后又获释，后在苏联担任学校教师。20世纪30年代又多次被捕。1936年下狱，同年死于狱中。

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太后） 31, 39, 99, 113, 118, 127, 486

Mariia Fedorovna (1847—1928) 亚历山大三世之皇后，出身于丹麦皇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出资组建红十字列车，并在基辅开设医院。二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留有日记。

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 69, 114, 315, 376-378, 507

Kirill Vladimirovich vel. kn. (1876—1938) 沙皇尼古拉二世叔父的长子。皇位继承顺序次于米哈伊尔大公。与表姐维多利亚·费奥多罗芙娜成婚。结婚时未得到沙皇的许可，两年后获得沙皇承认。以海军军人身份参加了日俄战争。在“一战”中担任近卫海軍兵团司令。革命爆发时，不顾皇族

高位身份仍表明支持革命。后流亡，主张应该保留皇位继承制。

弗列杰列克斯, V. B. 396, 399, 405, 415, 432, 440, 442

Frederiks, V. B. (1838—1927) 伯爵。骑兵上将。1897年担任宫廷事务大臣，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流亡。

G

高尔基, 马克西姆 113, 216, 217, 234, 292, 303, 345, 458, 480, 498, 499, 547

Gor'kii, Maksim (1868—1936) 作家，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后成为无党派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创办《新生活报》。批判十月革命，后移居意大利，1932年回国并协助斯大林。

戈德涅夫, I. V. 120, 420, 446, 448, 453

Godnev, I. V. (1854—1919) 医生。毕业于喀山帝国大学。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十月党人。第一届临时政府国家监察部长。

戈尔坚科, I. M. 263, 273, 285, 368

Gordienko, I. M. (1884—1957) 布尔什维克工人活动家。“一战”期间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来到俄国首都。曾在诺贝利工厂工作。十月革命时任维堡区红军参谋长。著有回忆录。

格洛巴乔夫, K. L. 151, 266, 271, 275, 304, 491

Globachev, K. I. (1870—1941) 彼得格勒安保部长，参军后加入宪兵队。

1905年，任罗兹宪兵队总部部长和安保部长。1909年，调任华沙安保部长。1915年调任至彼得格勒。二月革命中被捕，十月革命后被释放，逃往南方。1920年去往土耳其，1923年去往美国。著有回忆录。

戈利岑, N. D. 99, 113, 143, 144, 231, 272, 293, 298, 304, 314, 319, 342, 344, 399, 502, 503, 540, 542, 543

Golitsyn, N. D. (1850—1925) 公爵。俄国帝政时期最后一位首相。曾历任省长、最高法院法官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俄国战俘救济委员会主席，自1916年12月起担任俄国首相一职。二月革命中被捕。后居住在首都，以鞋匠身份生活，被苏维埃政权逮捕并枪决。

格林纳维奇 (修科特勒), K. S. 211, 333, 346, 349, 390, 548

Grinevich (Shekhter), K. S. (1879—?) 犹太人，隶属孟什维克党。工会组织运动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属于国际派。1915年来到首都加入了初始派，后被捕，在流放途中逃脱；1917年2月中旬回到首都，任苏维埃执行委员。

戈列梅金, I. L. 47, 51, 65, 359

Goremykin, I. L. (1839—1917)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任俄国首相。毕业于俄国皇家法律学校。就职于最高法院，于1867年进入内务部。1895年任内务部副部长、内务大臣事务干事，1899年卸任。1905年革命后，1906年

出任首相,1914年1月再次被任命为首相,1915年卸任。二月革命时被捕,释放后居住在索契,后全家被非法武装势力杀害。

格里戈洛维奇, I. K. 47, 224, 362, 536

Grigorovich, I. K. (1853—1930) 海军上将。日俄战争中担任“皇太子号”战列舰舰长。1911年成为海军大臣,二月革命后卸任;十月革命后在海军历史委员会工作;1923年出国后未回国。著有回忆录。

格罗曼, V. G. 337, 346, 356

Groma, V. G. (1874—1940) 孟什维克党的统计学家,在城市联盟工作。二月革命时于苏维埃设立的粮食委员会担任主席,粮食委员会被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接管后仍任主席一职,苏维埃政权时期亦承担此工作。1930年被逮捕,获刑15年。

戈洛特, P. P. 409

Groten, P. P. (1870—1962) 侍从少将,近卫掷弹兵团团长。沃耶科夫离岗期间,暂任皇宫警卫司令一职。

戈洛文, N. N. 487

Golovin, N. N. (1875—1944) 陆军中将军。俄军杰出人才。二月革命后出任罗马尼亚方面军代理参谋长。在参加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后流亡国外。著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的重要著作。

格沃兹杰夫, K. A. 135, 201-207, 210, 221, 231, 237, 296, 329,

333, 335, 345, 346, 349, 390, 472

Gvozdev, K. A. (1882—1956) 金属工人。1909年以社会革命党员的身份组建金属工人工会,担任工会会长。转向孟什维克党后,在“一战”中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组织代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起致力于号召工人起义。革命后任苏维埃执行委员。曾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长。苏维埃时期在合作社工作。1931年被捕入狱,1941年重审入狱,1956年被释放,两个月后死亡。

古柯, 瓦西里·I. 78, 118, 129, 130, 224-226, 487

Gurko, Vasilii I. (1864—1937) 沙俄陆军中将。幼年就读于贵族学校,后毕业于陆军大学。日俄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席。“一战”时担任第5集团军司令,后担任最高统帅部代理总参谋长。二月革命后出任西部方面军司令,同年5月卸任。被捕后,于9月被驱逐出境。

古柯, 弗拉基米尔·I. 76

Gurko, Vladimir I. (1885—1927) 古柯中将军的弟弟。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后进入内务部工作,1906年出任副部长。后因挪用公款嫌疑而引咎辞职。1912年成为国务会议议员。支持进步同盟。十月革命结束后被流放。著有回忆录(内容截至“一战”前)。

古契柯夫, A. I. 17, 35-37, 62-64, 118-130, 139, 206, 227, 231, 232, 365, 384, 388, 429-431, 434, 437,

438, 442-444, 446, 448-450, 452, 453, 461, 470, 472-474, 492, 499, 500, 502, 503, 508-510, 511, 535, 556

Guchkov, A. I. (1862—1936) 出生于莫斯科的商人之家, 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曾任莫斯科市议员, 并于1907年成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十月党主席。1912年落选国家杜马; 1915年, 被选为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并复出政坛, 并被任命为国务会议议员; 1916年曾策划政变, 但未实现。在临时政府担任陆海军部长, 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存有据其口述记录编写的回忆录。

H

哈巴洛夫, S. S. 150, 175, 227, 239, 240, 241, 269, 271, 272, 275, 277-279, 292, 293, 295, 296, 298, 300, 301, 304, 313-316, 318, 319, 338, 344, 345, 359, 362, 363, 398, 402-404, 429, 503, 504, 506, 533, 540-543

Khabalov, S. S. (1858—1924) 陆军中将。1903年起担任士官学校校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乌拉尔的军事总督, 1916年担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 镇压二月革命失败后遭革命政府逮捕。十月革命之后被释放, 后开始流亡海外。

J

吉霍米洛夫, L. A. 95, 116, 117, 456-458, 559

Tihomirov, L. A. (1852—1923) 民粹派,

民意党理论家。刺杀沙皇后流亡国外, 后写下请愿书而得以回国。是右翼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投稿人, 之后成为主笔。因拉斯普京问题而对沙皇持批判态度, 辞去主笔一职, 后支持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时, 期待俄国借机壮大。后作为学者受到苏联政府资助。

季娜依达·吉皮乌斯, Z. N. 467

Gippius, Z. N. (1869—1945) 象征主义派女诗人, 梅列日柯夫斯基之妻。和立宪民主党关系密切。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存有日记。

加里宁, M. I. 110, 192, 195, 201, 220, 297, 311

Kalinin, M. I. (1875—1946) 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活动家, 布拉格协商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国防派后退出布尔什维克党, 二月革命时重新入党, 1919年成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一直担任国家元首至离世。

加米涅夫(罗森菲尔德), L. B. 191, 194, 195, 220, 462, 511

Kamenev (Rosenfel't), L. B. (1883—1936) 犹太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被捕; 二月革命后回到首都彼得格勒从事党的工作; 十月革命前夕反对列宁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方针; 十月革命后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20世纪20年代中期, 与季诺维也夫等结成“新反对派”后失败, 被流放, 经莫斯科最高军事法庭重

审后判处死刑。

加奈林, R. Sh. 266, 271, 302, 376,
492, 493, 544

Ganelin, R. Sh. (1926—2014) 俄国
历史学家。犹太人。毕业于列宁格勒
大学。终身在历史研究所圣彼得堡分
所就职, 专业为近现代史研究。2014
年出版了研究二月革命的著作。

捷列先科, M. I. 62, 121, 122, 124-
127, 131, 132, 310, 327, 439,
446, 448, 500, 502, 540

Tereshchenko, M. I. (1888—1956)
基辅制糖工厂主。在首都彼得格勒经
营一家出版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 参加了红十字会第一线的救援工
作, 任基辅地区军事工业委员会主
席, 参与了古契柯夫谋划的军事政变
计划。二月革命后, 任临时政府的财
政部长、外交部长、副首相。十月革
命中被捕, 释放后流亡国外, 在法国
和马达加斯加经商, 大获成功。

K

卡拉汉, L. M. 208, 210

Karakhan, L. M. (1889—1937) 亚美
尼亚人。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
加入区联派后被捕。二月革命后加入
布尔什维克党; 十月革命后成为军事
革命委员会成员, 曾任《布列斯特和
约》谈判代表团书记; 1918年任代理
外交人民委员; 1921年与中国签订
《加拉罕宣言》; 20世纪30年代被捕
处决。

卡拉洛夫, M. A. 326-328, 448, 449

Karaulov, M. A. (1878—1917) 哥萨
克贵族。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
军人, 后参加日俄战争。历任第二
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曾隶属于
进步同盟, 后成为无党派人士。二
月革命时担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
成员, 曾任特维尔州政治委员; 十月
革命后任特维尔州州长, 最终被士兵
杀害。

卡佩林斯基, N. Iu. 139, 142, 221,
290, 333, 337, 348, 349, 390, 505

Kapelinskii, N. Iu. (生卒年不详) 孟
什维克党成员, 初始派成员之一。二
月革命时期任苏维埃执行委员。

卡特科夫, 乔治 39, 405

Katkov, George (1903—1985) 生于
俄国, 全家一同流亡至捷克, 毕业
于布拉格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移居英国, 后成为牛津大学三一学
院讲师。出版有研究二月革命的相关
书籍。

卡尤罗夫, V. N. 200, 260, 262,
263, 274, 277, 280, 283-285, 298,
302, 332, 335, 336, 488

Kaiurov, V. N. (1876—1936) 布尔什
维克党的工人活动家。于索尔莫沃工
厂参与1905年革命, 后在首都参与了
1917年革命, 1921年起就职于经济部
门; 1932年, 与子A.V.卡尤罗夫一同
参加柳廷的斯大林批判组织, 被捕;
后被党除名, 死于狱中。其子被枪
杀。1962年, 恢复其名誉的平反请求

被驳回。1988年，其名誉被正式恢复。

康德拉季耶夫, T. K. 160, 195, 280-282, 310, 312, 367

Kondrat'ev, T. K. (1892—1937) 布尔什维克工人活动家。就职于新莱斯内尔工厂。1913年入党。内战时期活跃在军事领域。著有回忆录。

康特罗维奇, V. A. 330, 391, 436, 437

Kantrovich, V. A. (1886—1923) 犹太人。波兰立陶宛联盟(崩得派)成员。二月革命时在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发言。曾撰写二月革命研究的相关论著。

科尔尼洛夫, L. G. 17, 429, 430, 440, 469, 508-510, 512, 532

Kornilov, L. G. (1870—1918) 陆军上将。曾作为情报部门军官活动于中亚、伊朗、印度一带。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担任俄国驻华武官。1911年起在马鲁图伊诺夫的边境警卫部队就职。任职期间揭发了军中的贪污问题。“一战”时担任师参谋长,被奥地利军队俘虏后逃脱。随后担任西南方面军第25步兵军军长。二月革命时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但仅任职两个月便卸任。7月,从西南方面军司令升职为俄军最高总司令。8月,发动科尔尼洛夫政变,但最终失败。十月革命后,组织反布尔什维克军。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战役中阵亡。

克勒博夫斯基, V. N. 396, 415, 432, 508

Klembovskii, V. N. (1860—1921) 陆军上将。“一战”时从西部方面军参谋长升至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二月革命结束后出任北部方面军司令;十月革命结束后协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委员会开展工作;1920年号召群众积极配合红军。

克雷莫夫, A. M. 122, 124-126, 429, 502

Krymov, A. M. (1871—1917) 陆军中将。任乌苏里骑兵旅旅长,隶属于西南方面军。曾试图发动武装政变迫使沙皇退位,但未能如愿。二月革命结束后,参与了科尔尼洛夫将军领导的政变,进攻首都失败后自杀身亡。

克里沃申, A. V. 46, 47, 51, 65

Krivoshein, A. V. (1857—1921) 农民出身的军人之子。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曾在铁路公司工作,与莫洛佐夫家族的女子结婚。进入内务部后,开始推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1908年担任农业部长官,1915年担任农业大臣,但因批判沙皇而被解职。之后成为俄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十月革命后参与反布尔什维克党活动,后流亡海外。

克鲁皮奇尼科夫, T. I. 299, 300, 306, 307, 310-312, 541

Kirpichnikov, T. I. (1892—1917年或1918年初) 沃利尼团预备营指挥队陆军上士,二月革命中反对政府对游行队伍的镇压,组织了士兵

起义。据悉，在俄国内战时被白卫军枪杀。

克伦斯基, A. F. 15, 17, 18, 36-39, 124, 131-135, 138, 140, 145, 195, 214-216, 218, 220, 232, 234, 235, 250-253, 255-257, 269, 270, 278, 286, 292, 294, 299, 303, 323, 325, 326-328, 338, 340, 341, 346, 347, 349, 353, 355, 358, 359, 362, 363, 375, 379, 380, 383, 390, 420, 422, 426, 431, 435-438, 444-446, 448, 449, 458, 460, 462, 463, 465, 469, 474, 482, 486, 489, 499, 501, 504, 505, 511, 512, 544, 555

Kerenskii, A. F. (1881—1970) 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政治人权律师。俄国劳动派、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后加入共济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派的发言人。领导推动了二月革命，曾担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临时政府司法部长，不久成为联合政府主席兼陆军部长。发动六月攻势。后依靠苏维埃的力量粉碎科尔尼洛夫政变。十月革命中被推翻，逃到彼得格勒。反攻失败后流亡国外。1940年移居美国，1970年死于纽约。著有回忆录。

柯诺瓦洛夫, A. I. 34, 36-38, 62-64, 122, 129-139, 142-144, 204, 206, 207, 227, 231, 232, 234, 254, 328, 339, 340, 341, 375, 431, 437, 439, 445, 446, 448, 449, 489, 490, 492, 499, 503, 556

Kononov, A. I. (1875—1949) 莫斯科资产阶级代表。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在科斯特罗马州经营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1905年革命后，作为自由主义左派开始活动；1911年，推动成立进步同盟；1912年加入共济会组织，成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帮助过“工人团”，与涅克拉索夫、克伦斯基等人一起推动资产阶级市民革命路线；二月革命时，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任临时政府工商部长；7月进入立宪民主党，主张停止战争、单方面讲和；9月再次担任工商部长、副主席，但没能改变当时的政治局面。十月革命中被捕，释放后流亡国外。1924年起，任《霞光报》编辑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移居美国，客死他乡。

科瓦列夫斯基, M. M. 36

Kovalevskii, M. M. (1851—1916) 历史学家、人类学学者、社会学学者。1887年获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职位，在欧洲开展活动。1901年，在法国加入共济会组织“俄国人民大东方”。1905年因革命回国，创立民主改革党。国务会议议员。

库鲁洛夫, P. G. 150, 359

Kurov, P. G. (1860—1923) 曾任检察官，1907年出任内务部副部长，十月革命结束后流亡国外。著有回忆录。

库罗帕特金, A. N. 83, 87, 88, 461

Kuropatkin, A. N. (1848—1925) 先

后毕业于士官学校、陆军大学，任中亚军区参谋长。1899年任俄国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期间担任俄军远东军总司令；1916年出任土耳其斯坦总督、军区司令。革命结束后担任乡村教师，后被盗贼杀害。留有日记。

库斯科巴，E. D. 38, 39, 137

Kuskova, E. D. (1869—1958) 自学成才。和民粹派的普罗柯波维奇相遇、结婚后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后加入“解放同盟”，成为自由主义者。未加入立宪民主党，保持独立立场，后加入共济会。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开展了合作社运动。反对十月革命，1922年被驱逐到国外。

L

拉斯普京，G. E. 61, 65, 66, 68, 70-74, 77, 93-116, 118-120, 142, 175, 228, 246, 298, 375, 378, 440, 486, 487, 491, 498, 499, 500-502, 516, 517, 524, 557, 560

Rasputin, G. E. (1869—1916) 西伯利亚人，宗教人士。1904年来到首都。1905年通过关系入宫拜见沙皇与皇后；之后，拉斯普京因施展催眠术，使饱受血友病折磨的皇太子出现好转，因此得到皇后极大的信任；1915年夏，沙皇与诸位大臣对立时，与皇后介入大臣的人事安排。拉斯普京反对与德国开战，并反对迫害犹太人。此外，据称他与女教徒私通。后被主张进行宫廷革命的尤斯波夫公爵与德米特里大公暗杀。

雷伯洛夫，I. P. 161, 268, 272, 332, 478, 480

Leiberov, I. P. (1928—) 俄国历史学家。研究二月革命前彼得格勒的工人运动。

雷米歇夫，F. A. 201, 312, 329, 369

Lemeshev, F. A. (1891—1954) 布尔什维克党工人活动家。1914年开始在普契洛夫工厂工作，后来成为纳尔瓦区委员。1917年1月被捕，二月革命时被释放。

雷纳，奥斯瓦尔德 98, 99, 105, 106, 108, 109

Rayner, Oswald (1888—1961) 英国秘密情报局(SIS)驻俄成员，尤斯波夫在牛津大学留学时的朋友。拉斯普京遭遇暗杀时他正在彼得格勒，并与尤斯波夫有着密切联系。二月革命后，他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访问俄国。1927年翻译了尤斯波夫的回忆录。

李沃夫，G. E. 15, 36, 53, 63, 127, 128, 226, 328, 343, 344, 399, 420, 430, 435, 438, 443-446, 448-450, 456, 458, 460, 461, 468, 474, 498, 501, 502, 508, 509, 511

L'vov, G. E. (1861—1925) 公爵。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主要在图拉经营土地，同时参与地方自治机构活动。1900年当选图拉州地方自治机构参事会主席；日俄战争时作为全俄地方自治机构救护团体的总代表开展各种活动；1905年革命后，被立宪民主

党推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国家杜马解散后，没有回到国家杜马。他在“一战”中作为全俄地方自治会联盟的领导者，发挥重要作用，曾想发动军事政变。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首相，辞任后隐居，后逃往国外。

李沃夫, V. N. 63, 64, 120

L'vov, V. N. (1872—1934) 地主贵族。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十月党人，担任过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后来由独立派的十月党转向中央派。曾担任国家杜马东正教会问题委员会主席。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担任东正教事务管理局总监。因在科尔尼洛夫政变事件中立场不明被逮捕。1920年逃往国外避难，1922年回国，效力于苏维埃政权。

立契夫, A. A. 245, 272, 286, 293, 296, 300, 304

Rittikh, A. A. (1868—1930) 毕业于皇村中学，后进入财政部。曾参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16年担任农业大臣事务员；1917年出任农业大臣；二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里亚布申斯基, P. P. 34-36, 62, 64, 133, 144, 340, 412, 489, 502

Riabushinskii, P. P. (1871—1924) 莫斯科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名下拥有棉纺织企业和机关银行^{*}，系财阀领袖。进步派成员，担任日报《俄国晨报》

^{*} 机关银行，指集中对该企业及相关企业融资的银行。

报社社长和莫斯科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二月革命后为俄国工商业组织奔波活动。科尔尼洛夫政变发生后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最终逃亡国外。

罗江科, M. V. 37, 39, 40, 52,

61, 63, 64, 72, 92, 99, 110, 117, 118, 120, 125, 129, 130, 241, 242, 245-257, 272, 278, 294, 300, 301, 304, 305, 323-325, 328, 340-345, 353-356, 359, 360, 364, 365, 375, 376, 378-380, 383-385, 388, 392, 399, 400, 405, 407, 408, 411, 414-417, 420, 426-434, 437, 438, 443-446, 448-450, 474, 475, 486, 503-509, 543

Rodzianko, M. V. (1859—1924) 十月党人。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从旁见证了尤斯波夫谋杀拉斯普京的计划。二月革命期间，作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全程贯彻逼迫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捍卫君主制的政治路线，但最终未果；后成功鼓动米哈伊尔大公拒绝继承皇位；十月革命后，参加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并逃亡国外。著有回忆录。

罗蒙诺索夫, M. V. 360, 379, 405, 407

Lomonosov, M. V. (1876—1952) 铁路工程师。毕业于高等交通工程学校，后进入交通部。著有多部与技术相关的著作，极富创新精神。1912年成为交通部技术审议会成员；二月革命时作为革命发起方，站在革命阵

哲，掌控整个交通部；十月革命后，帮助苏维埃政权开展活动。1923年开始在国外活动，在加拿大逝世。著有回忆录。

罗谢利，S. G. 165

Roshal', S. G. (1896—1917) 犹太人。就读维特梅尔中学期间被捕，后进入精神神经病学研究所。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旋即被捕并被强制征入军队；1915年，借休假来首都时被捕，二月革命时被释放，后被派往喀琅施塔得开展活动；十月革命后，作为罗马尼亚战线政治委员被派往战场，后遭白军俘虏并被杀害。

伦南坎普夫，P. K. 55, 56

Rennenkampf, P. K. (1854—1918) 骑兵上将。曾参与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西北方面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因未支援萨姆索诺夫军致使其全军覆灭而受到诟病，自己所率军队也败北撤军；1915年10月遭免职；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时被释放，但在塔甘罗格被革命军逮捕击毙。

鲁科姆斯基，A. S. 111, 394, 396, 399, 400, 411, 416, 429, 432, 532

Lukomskii, A. S. (1868—1939) 陆军中将。1916年年底起担任最高统帅部参谋部后勤部长；二月革命后，担任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后因参与科尔尼洛夫政变被捕；逃跑后加入反布尔什维克军的组织。曾帮助过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弗兰格尔。于巴黎去世，留有回忆录。

卢辛，A. I. 396, 413

Rusin, A. I. (1861—1956) 海军上将。日俄战争前夕被任命为驻日海军武官；开战后兼任满洲军总司令部海军联络官；1913年任海军总参谋部军令部部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最高统帅部海军顾问；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鲁兹斯基，N. V. 56, 80, 396, 400, 402, 403, 416, 417, 427-430, 432-434, 440, 442, 444-446, 459, 508, 509

Ruzskii, N. V. (1854—1918) 陆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第3集团军司令和西北方面军司令；1916年8月任北部方面军司令；二月革命时，在罗江科的授意下要求沙皇退位；革命后退役，定居基兹洛沃茨克。未参与内战；后被革命派抓获，被处决。

M

马克拉科夫，V. A. 70, 101, 104, 105, 142, 143, 278, 293, 296, 297, 304

Maklakow, V. A. (1869—1957) 立宪民主党律师。弟弟为内务大臣。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曾任第二、三、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对杀害拉斯普京的人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和建议。二月革命后几乎销声匿迹；同年7月被任命为法国大使；十月革命时流亡。留有回忆录。

马鲁图伊诺夫，E. L. 33, 125, 288, 316, 401, 429, 441, 478

Martynov, E. I. (1864—1937) 沙俄陆军中将, 曾参与日俄战争。1906年出版了一本强烈抨击军队的书籍; 1913年在举报军队贪污事件后离开军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回归军队, 在一次侦察德军的任务中, 因搭乘的飞机被击落而成为俘虏。“一战”结束后回国, 效力于苏维埃政权, 出版了研究二月革命的相关著作。因参与多项恐怖主义活动最终被逮捕并枪毙。

马尼科夫斯基, A. A. 129, 130, 310, 326, 327, 503

Manikovskii, A. A. (1865—1920) 炮兵上将。“一战”前夕任喀琅施塔得港要塞司令, 1915年任陆军炮兵局局长; 在国防特别审议会上, 提议建立战时特别体制; 二月革命后担任陆军部副部长。十月革命后协助苏维埃政权, 担任中央炮兵局局长、红军供给部部长。死于火车事故。

马努伊洛夫, A. A. 34, 93, 136, 446, 448, 464, 465

Manuilov, A. A. (1861—1929) 贵族。毕业于新罗西斯克帝国大学, 曾在德国留学。农业经济学者、莫斯科帝国大学教授、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08年任莫斯科帝国大学校长; 1911年因抗议政府干预学术自由而辞任; 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文化部长; 十月革命后不断提议帮助苏维埃政权并为之出力。

马耶夫斯基, E. 202, 205, 221, 227, 230, 231

Maevskii, E. (生卒年不详) 孟什维克党人。1905年革命中首都组织的核心人物。1905年从事“革命研究”(全五卷)的编辑发行工作。“一战”时担任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的书记, 积极推动人民在国家杜马重新开会时进行和平示威游行; 二月革命后, 不再公开从事政治活动; 十月革命后行踪不明。

梅兰科, 迈克尔 203, 332, 333, 491

Melancon, Michael (1940—) 美国历史学家, 奥本大学教授, 于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学位。著有《社会革命党与俄国反战运动 1914—1917》(1990年)。

梅里古诺夫, S. P. 128

Mel'gunov, S. P. (1880—1956) 俄国历史学家, 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 革命社会党党员。十月革命后于1921年被驱逐出境。著有以历史本体研究为主的多部与二月革命相关的著作。

梅耶荷德, V. E. 295, 504

Meierhol'd, V. E. (1874—1940) 犹太人。戏剧导演, 曾任职于皇家亚历山大剧院。俄国革命后苏联知名导演之一。因参与大量恐怖主义活动而被逮捕, 死于狱中。

尼古拉·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 99, 110, 114-116, 118

Nikolai Mikhailovich vel.kn. (1859—1919) 沙皇尼古拉二世祖父的幺弟之子。亚历山大·米哈伊尔洛维奇大公的哥哥。终生未娶。陆军上将, 历史

学家。曾任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皇家历史学会会长。暗杀拉斯普京后，被命令蛰居在自己的领地。支持二月革命。后被布尔什维克党枪决。

亚历山大·米哈伊尔诺维奇大公 98,

112, 117, 118, 124, 486

Aleksandr Mikhailovich, vel. kn. (1866—1933) 亚历山大二世最小弟弟的儿子，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朋友。海军上将。与沙皇的妹妹成婚。1918年开始流亡生活。著有回忆录。

米留科夫, P. N. 16, 17, 39, 63, 64,

92-94, 101, 120, 121, 131-133, 135, 138, 217, 231, 232, 241, 250-252, 270, 291, 322, 328, 329, 340, 353, 364, 409, 420-422, 426, 431, 435, 438, 439, 444-446, 448-452, 464-466, 474, 486, 500, 509-511

Miliukov, P. N. (1859—1943) 历史学家。立宪民主党领导人。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后留校任教。1895年被大学开除。1905年革命后，担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任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立进步同盟，主张成立信任内阁，执意推行向政府施压的合法路线；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拥护君主制并贯彻俄国继续参战的方针。君主制被废除后，使俄国继续参战成为临时政府的方针。后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四月危机中，迫于苏维埃方面的压力辞职。因反对十月革命而流亡国外，是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支持者。苏德战争时表示支持

苏联。客死法国，留下回忆录及二月革命相关研究资料。

莫洛托夫 (斯克里亚宾), V. M. 199,

335, 352, 390, 391, 427, 436, 437, 538

Molotov (Skriabin), V. M. (1890—1986) 布尔什维克党人。从综合技术高专辍学。因参与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活动而被捕。1916年重新参与党的活动，并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二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时期以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身份参与革命；其后先后担任党的书记、组织局委员、政治局委员。作为斯大林的忠诚部下，曾任首相、外交部长。由于对斯大林批判有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党籍。

姆斯蒂斯斯拉夫斯基 (马斯洛夫斯基), S.

D. 337, 338, 354-356

Mstislavskii (Maslovskii), S. D. (1876—1943) 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在人类学、文献学领域多有著述。曾参与1905年革命，是共济会的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职于陆军大学图书馆，曾任彼得格勒消费合作社主席；二月革命期间响应号召，支持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十月革命后并未逃亡国外，在国内以写作为生。

N

纳博科夫, V. D. 449, 450, 452,

464, 473, 474

Nabokov, V. D. (1870—1922) 自由主义者。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皇家法律学校教师。1905年俄国革命时开展自由主义活动,曾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内阁秘书长。十月革命后,在克里米亚参加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后流亡。因试图阻止刺杀米留科夫的恐怖行动而代其赴死。著有回忆录。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父亲。

尼古拉二世(俄国沙皇) 14, 15, 26-33, 39, 40, 42, 44, 47-52, 56, 57, 61, 64, 66, 83, 95-122, 127-133, 137, 148, 149, 169, 172, 175, 217-227, 238, 242, 249, 256-258, 281, 292-298, 300-305, 308, 314, 319, 323-325, 331, 341-345, 358, 361, 362, 369, 375-381, 391, 396-418, 427-434, 439-446, 451, 453, 456-458, 460-463, 468-469, 474, 482, 486-487, 496, 501

Nikolai II (1868—1918) 1894年,其父亚历山大三世逝世后继位,同年结婚。曾推动召开海牙万国和平会议,积极推行远东政策,领导了日俄战争。1905年俄国革命时签署《十月诏书》,决定向君主立宪制过渡,从而实现改革。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加之皇后和拉斯普京扰乱朝政,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被软禁于皇村,7月被转移至托波尔斯克关押。1918年,沙皇全家被革命派秘密处决于乌拉尔山脉的叶卡捷琳堡。

尼古拉耶夫斯基, B. I. 39

Nikolaevskii, B. I. (1887—1966) 孟什维克党员,十月革命后流亡。历史学家,致力于收集社会民主工党史和共济会的相关资料,著有多种相关书籍。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皇太子)

15, 39, 66-78, 88, 94-100, 104, 111, 122, 399, 408, 409, 420, 421, 428, 430, 432-435, 440-443, 445, 450, 486

Aleksei Nikolaevich (1904—1918) 尼古拉二世的儿子。患血友病。与家人一起在乌拉尔被革命派杀害。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31, 51, 52, 55, 61, 64, 70-72, 112, 123, 128, 396, 415, 433, 443, 446, 460, 468, 474, 499, 501, 509, 510

Nikolai Nikolaevich, vel. kn. (1856—1929) 沙皇尼古拉二世祖父之弟的儿子。骑兵上将。在1905年革命中向沙皇进言颁布《十月诏书》,1905年开始担任近卫军总司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俄国最高总司令,于1915年大撤退中卸任。后担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十月革命后开始流亡生活。

涅克拉索夫, N. V. 36, 38, 39, 64, 120, 122, 129, 130-136, 138, 140, 165, 206, 234, 252, 323-328, 338, 341-343, 362, 375, 383, 420, 431, 439, 444-446, 448, 449, 452, 458, 464, 465, 500, 505, 556

Nekrasov, N. V. (1879—1940) 神父之子。毕业于高等交通工程学校，就职于托木斯克理工学院。在德国进行研究工作时，曾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参加活动；后加入立宪民主党，任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并组建了共济会在俄国的组织。其间与米留科夫对立，坚持左派立宪民主党立场。“一战”时，曾担任国家杜马副主席；1916年年末起，走上策划军事政变和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道路；二月革命后，成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并担任临时政府交通部长；秋天，因与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意见不合，辞去交通部长一职，担任芬兰总督；十月革命时，拒绝签署临时政府的反苏维埃声明，滞留俄国。1919年开始在消费合作社活动。1930年以后，多次被捕。1939年被捕后，于1940年被处以死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留下了供述。

涅佩宁, A. I. 396, 414, 415, 460, 461, 509

Nepenin, A. I. (1871—1917) 海军中将军。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他支持二月革命，但后被起义水兵处决。

诺里杰, B. E. 450, 452, 453

Nol'de, B. E. (1876—1948) 男爵。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毕业后就职外交部，之后任研究国际法的教授。“一战”时担任萨佐诺夫外交部长的顾问，在二月革命中参与起草了米哈伊尔大公退位的备忘录，成为临时政府法律理事会成员之一，主张停战。

虽未参与十月革命，但一直在圣彼得堡帝国大学任教至1919年，之后流亡国外。著有回忆录。

P

玛丽亚·帕芙洛芙娜公爵夫人 113, 114

Mariia Pavlovna, vel.kn. (1854—1920)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之妃，1920年流亡国外。

玛丽亚·帕芙洛芙娜大公女 100, 114

Mariia Pavlovna, vel.kn. (1890—1958) 保罗·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之女，曾与瑞典国王的第二位王子结婚，后离婚。二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留有回忆录。

帕杰林, A. N. 385, 386, 534

Padelin, A. N. (生卒年不详) 布尔什维克党的士兵活动家，隶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预备营，后加入二月的士兵起义，担任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参与起草了《一号法令》。

帕蕾公爵夫人(欧嘉·帕蕾) 113, 115, 375, 376

Palei, O. V. (1865—1929) 第一次婚姻时改姓为皮斯特克里斯。和保罗大公再婚后，因为非门当户对的婚姻而未得到沙皇认可，但其后受到认同并被授予帕蕾一姓和公爵身份。在丈夫和儿子被杀害后流亡。留有回忆录。

帕雷奥洛格, 莫里斯 52, 226, 233, 482, 484, 487

Paleologue, Maurice (1859—1944) 法国大使。起初支持二月革命,后又支持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离开俄国。出版过3卷本日记式回忆录。

佩舍霍诺夫, A. V. 138, 166, 220, 317, 346, 350, 352, 373, 374, 390

Peshkhonov, A. V. (1867—1933) 神学院毕业。温和的民粹派。《俄罗斯财富》杂志编辑。1906年参与了社会革命党的组建;二月革命时任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

佩列尔韦尔泽夫, P. N. 232

Pereverzev, P. N. (1871—1944) 律师。十月党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共济会成员。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高级检察官、司法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

普查钦, M. S. 376

Putiatin, M. S. (1861—1938) 公爵、少将。自1911年起担任宫廷执事,二月革命后流亡。

普利斯科维奇, V. M. 37, 101-106, 108-110, 118, 246, 486, 500, 501, 557

Purishkevich, V. M. (1870—1920) 暗杀拉斯普京的右翼国家杜马议员。毕业于新罗西斯克帝国大学。曾任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组织红十字医疗专列救助伤兵。十月革命后发起复辟运动被捕。被释放后去了俄国南部,1920年因伤寒病故。著有回忆录。

普罗托波波夫, A. D. 72-74, 75, 99, 101, 109-111, 113, 117, 118, 137, 150, 151, 230, 233, 238, 241, 242, 251, 257, 258, 279, 281, 292, 293, 297, 298, 304, 314, 359, 362, 486, 500, 542, 545, 560

Protopopov, A. D. (1866—1918) 十月党人,曾任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第四届国家杜马副主席。曾加入进步同盟。经营有纺织厂。后任金属加工业代表会议主席。接受过巴德马耶夫的医治,由此结识拉斯普京。受到皇后的提拔,于1916年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因其为皇后和拉斯普京一派效劳,遭到民众厌恶。二月革命后被捕入狱,之后遭枪决。

普契洛夫, A. I. 61, 63

Putilov, A. I. (1866—1937) 俄国保守派,拥护专制制度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初在司法部任职,后转到财政部。被维特起用担任财政部副秘书长,后升为秘书长。1905年10月起担任财政部副部长,1908年任华俄银行理事,后升为专务理事,并在1910年成为俄亚银行行长,同时担任普契洛夫工厂厂长。二月革命后成立俄国经济振兴协会,支持科尔尼洛夫发动政变。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

Q

齐赫泽, N. S. 37, 38, 138, 212, 216, 221, 232, 234, 235, 246, 269, 286, 290, 291, 303, 325-329, 331, 341, 346, 347, 349, 350, 379, 390, 420, 434, 435, 446, 448, 468, 475

Chkheidze, N. S. (1864—1926) 格鲁吉亚人。孟什维克领导人，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共济会成员。支持克伦斯基。二月革命时，在苏维埃阵营开展活动，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委员；后被提名为临时政府劳动部长，不过该提案最终被否决。十月革命后返回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任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红军进入格鲁吉亚后流亡国外。

恰鲁努克夫, M. V. 53, 63, 130,
134, 226, 340

Chelnokov, M. V. (1863—1935) 莫斯科的资产阶级，属于立宪民主党，与进步同盟关系密切。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一战”开始后，任全俄城市联盟的总代表、莫斯科市市长。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莫斯科政治委员。十月革命后，开始进行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后流亡国外。

丘格林, I. D. 199, 200, 245, 253,
284, 288, 331, 332, 368, 425

Chugurin, I. D. (1883—1947) 原为索尔莫沃工厂工人。隶属于孟什维克党护党派，但曾在列宁的隆格瑞莫党校学习，回国后被捕。1916年到首都，进入艾瓦兹（Ayvas）工厂工作，任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员。十月革命后，在契卡工作。

S

萨德夫斯基, A. D. 385, 386, 534

Sadovskii, A. D. (1880—1927) 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铁路工程师，支持社会民主工党，并应召入伍。二月革命时持“国际派”立场，6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

萨哈罗夫, V. V. 396, 432, 433

Sakharov, V. V. (1853—1920) 陆军上将，在日俄战争中任对日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第二军军长，最后任罗马尼亚方面军参谋长，内战时在克里米亚被杀。

萨姆索诺夫, A. V. 55, 56, 125

Samsonov, A. V. (1859—1914) 骑兵上将。日俄战争中任卡夫卡索旅旅长、师长。日俄战争后担任土耳其斯坦总督以及军区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第2集团军司令，在坦能堡战役中兵败自杀。

萨维奇, N. V. 120, 129, 297, 304,
327, 342, 343, 433, 434

Savvich, N. V. (1869—1942) 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十月党议员团书记，古契柯夫的同事。十月革命后参加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后流亡国外。

萨佐诺夫, S. D. 44-50, 65, 94, 297,
450, 486

Sazonov, S. D. (1860—1927) 毕业于皇村中学。进入外交部后，190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11年任外交大臣，1916年卸任。1917年任驻英大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后在高尔察克政权出任“外交部长”。著有回忆录。

森吉诺夫, V. M. 218, 219, 257,
303, 349, 352, 363, 389, 390, 463

Zenzinov, V. M. (1880—1953)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曾就读于一所德国的大学。多次被捕并被流放, 最终于1915年回到首都协助克伦斯基。二月革命之后, 任苏维埃执行委员和社会革命党首都委员会主席。立宪会议解散后, 参与了在萨马拉成立拥护立宪会议政府的行动。被高尔察克政权打败后开始流亡生活。著有回忆录。

施略普尼柯夫, A. G. 196-220, 234-237, 248, 250, 279, 286, 287, 302, 332, 336, 345, 347, 348, 350, 372, 386, 389, 390, 424, 425, 427, 436, 437, 438, 488, 546, 548

Shliapnikov, A. G. (1885—1937) 布尔什维克金属工人活动家、二月革命时期党的负责人。1916年从国外秘密返俄, 于莫斯科成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二月革命时期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十月革命时期任苏维埃政府的劳动人民委员。1921年, 与柯伦泰共同成立“工人反对派”, 受到批判。1933年被开除党籍, 1935年被流放, 1936年再次被捕并被枪决。著有回忆录。

施密特, V. V. 192, 195, 201, 329, 424

Shmidt, V. V. (1886—1938) 布尔什维克工人活动家, 出生于首都。多次被捕, 释放后仍重返首都继续开展运动。1916年被捕, 后在二月革命期间获释。十月革命后, 任工人人民委

员。1928—1933年, 任苏联副主席。1937年被捕后遭枪决。

施蒂默尔, B. V. 72-74, 93, 94, 100, 112, 135, 251, 358, 500, 506
Shturmer, B. V. (1848—1917) 德裔。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 后进入司法部。1878年, 担任宫内部礼典司书记官; 1896年任雅罗斯拉夫尔州州长; 1904年担任国务会议议员; 1916年任首相、内务大臣、外交大臣, 属于拉斯普京一派。二月革命被捕后, 一直未能获释, 十月革命后死于狱中。

申加廖夫, A. I. 63, 64, 120, 125, 130, 166, 294, 322, 324, 356, 439, 446, 448, 452, 453

Shingarev, A. I. (1869—1918) 立宪民主党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 毕业于莫斯科帝国大学, 任中央黑土带的乡村医生。1901年出版著作《走向死亡的农村》。共济会成员、进步同盟核心人物。二月革命时进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 先后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财政部长。1918年1月, 从关押地彼得保罗要塞转移到马林斯基宫中后, 被革命派士兵杀害。

舒尔金, V. V. 37, 76, 322, 327, 328, 361-363, 420, 421, 430, 431, 435, 442, 444, 448, 449, 486, 509

Shul'gin, V. V. (1878—1976) 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民族派议员, 出生于基辅, 毕业于基辅帝国大学。曾就职于《基辅人》报社, 逐步成为稳健派。于“一战”时期加入进

步同盟。二月革命时期成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后与古契柯夫一同拜访沙皇，要求其退位。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1945年秘密返苏，被捕入狱，1950年获释。著有回忆录。

斯捷克洛夫（纳可汉姆科斯），Iu. M.

346, 34-350, 381, 382, 389-392, 420-422, 434-437, 466, 472, 509

Steklov (Nakhamkes), Iu. M. (1873—1941) 犹太人。作为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参与各项活动，被逮捕，后被流放。途中逃往欧洲，结识了列宁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了1905年革命，其间被逮捕并被驱逐到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到俄国，在杂志社工作。二月革命爆发后，到塔夫利宫为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做出贡献，成为执行委员。从事报纸出版工作。在苏联时期是一名作家，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下狱。

斯克别列夫，M. I. 36, 37, 212,

221, 234, 269, 294, 323, 324,

326, 333, 346-349, 379, 390, 472, 473, 534

Skobeev, M. I. (1885—1938) 出生于巴库的摩洛肯派家庭，孟什维克党员。参加1905年革命后流亡国外，就读于维也纳的一所理工学院。曾帮助托洛茨基编辑出版《真理报》，回国后成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共济会成员。二月革命中为苏维埃成员，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长。他虽不认可十月革命，但1920年在巴黎时仍积极促进苏法两国建交。1922年加入俄国共产

党，1925年开始在苏联生活。后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并遭处决。

斯里奥兹贝格，G. B. 61

Slizberg, G. B. (1863—1937) 犹太律师。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与立宪民主党关系密切，并在保障犹太人人权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组织开展各种运动救助战时受迫害的犹太人。十月革命后被迫逃亡。著有回忆录。

斯科罗霍德夫，A. K. 199, 200,

288, 368

Skorokhodov, A. K. (1880—1919) 布尔什维克工人活动家。在索尔莫沃工厂参加了1905年革命。曾在尼古拉耶夫的“黑海”造船厂工作。1916年来到彼得格勒，成为圣彼得堡市委员会成员并参加了二月革命。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北部地区特别委员会（契卡）主席。被白军枪杀。

斯皮里多维奇，A. I. 103, 108, 127,

128, 279, 441

Spiridovich, A. I. (1873—1952) 宪兵少将。1899年成为宪兵，隶属于莫斯科安保局。1903年任基辅安保局局长，1906年成为皇宫警卫司令助理，任皇宫安保局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程侍奉沙皇出行，但于1916年8月被降职为雅尔塔特别市市长。二月革命后被捕，释放后过着流亡生活。“一战”时著有俄国社会革命党党史、布尔什维克党党史。1960—

1962年间出版了3卷本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月革命 1914—1917》。著有回忆录。

斯塔尔切夫, V. I. 39, 373

Startsev, V. I. (1931—2000) 俄国历史学家。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84年开始在列宁格勒教育大学任教授。起初的研究对象为工人红军, 之后开始研究俄国临时政府。戈尔巴乔夫改革后, 他利用美国的资料发表了关于共济会的研究成果。

斯瓦茨基, N. V. 215, 218, 219, 249, 352, 390, 537

Sviatitskii, N. V. (1887—1937) 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自1905年革命起开始地下工作, 后流亡国外, 1912年回国。通过哈尔科夫帝国大学的毕业考试, 在首都成为一名律师助理, 并在首都进行社会革命党的组织重建工作。在亚历山德罗维奇潜入首都后, 以国际派的立场协助亚历山德罗维奇建立了社会革命党左派的工人小组。二月革命期间任苏维埃执行委员。十月革命后拥护立宪会议。之后协助苏联政府的工作。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并遭处决。著有回忆录。

斯维什尼科夫, N. F. 200, 279, 289

Sveshnikov, N. F. (1888—1969) 布尔什维克工人活动家。在索尔莫沃工厂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3年来到圣彼得堡, 以布尔什维克党维堡区委员的身份参与了二月革命。

苏汉诺夫(吉姆美尔), N. N. 208,

210, 217, 291, 292, 303, 345-350, 382, 389-392, 420, 422, 426, 427, 434, 436, 466, 499

Sukhanov (Gimmer), N. N. (1882—1940) 父亲是德国人, 母亲是犹太人。父母是托尔斯泰小说《行尸走肉》的原型。曾于巴黎自由大学学习, 回国后, 进入莫斯科帝国大学就读。社会革命党人。1905年革命后, 以经济学家身份从事写作。共济会成员。1913年, 进入《同时代人》编辑部, 结识高尔基。二月革命时担任苏维埃执行委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孟什维克党成员。苏联时期致力于研究经济、农业问题。1930年因“孟什维克事件”被捕入狱。1940年被枪杀。著有回忆录。

苏霍姆林诺夫, V. A. 47, 49, 54, 57, 59, 62, 70, 251, 396, 498

Sukhomlinov, V. A. (1848—1926) 骑兵上将。1908年任俄军总参谋长, 1909年任陆军大臣, 1915年离任, 1916年被捕, 二月革命后再次被捕。获释后流亡。著有回忆录。

索科洛夫, N. D. 38, 133, 134, 138, 194, 195, 211, 213, 216, 217, 234, 250, 290, 292, 303, 333-335, 337, 338, 346, 349, 350, 355, 356, 383, 385, 386, 390, 420, 422, 463, 472, 505, 507, 534
Sokolov, N. D. (1870—1928) 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第一代马克思主义青年。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 是人权辩护律师的代表人物。共济会成员。亲布尔什维克党, 但在战争期间

脱党，成为无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的中心人物。二月革命后，成为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参与制定《一号法令》。曾任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听证官。在苏维埃政权下积极参与外交事务。

T

特列恰科夫, S. N. 34, 62

Tretiakov, S. N. (1882—1944) 莫斯科企业家、自由主义者。曾就读于莫斯科帝国大学，中途退学。经营有科斯特罗马州的一家亚麻织物工厂，是里亚布申斯基的支持者。《俄国晨报》编辑、进步同盟中央委员、莫斯科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经济会议主席。十月革命时遭逮捕，后流亡。曾参与反布尔什维克运动，高尔察克政权时期任副主席、工商部长；1929年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的代理长官，德军占领苏联后遭逮捕，后被枪杀。

特列波夫, A. F. 74, 94, 102, 113, 251, 293, 500

Trepov, A. F. (1862—1928) 沙皇俄国时期的首相。父亲曾任圣彼得堡特别市市长，后遭扎苏里奇刺杀。毕业于贵胄军官学校，后入伍，1889年进入内务部，后供职于国务会议等机构，1916年1月任交通大臣，9月任代理首相，12月离任。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W

瓦西里耶夫, A. T. 150, 151, 202,

486

Vasil'ev, A. T. (1869—?) 内务部警卫安保局局长，革命后流亡。著有回忆录。

维尔霍夫斯基, A. I. 124, 126

Verkhovskii, A. I. (1886—1938) 陆军少将。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军区司令；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后，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9年加入红军；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著有回忆录。

维鲁博娃, A. A. 109, 111, 115, 116, 118, 258

Vyrubova, A. A. (1884—1964) 宫廷女官。与皇后共同倾心于拉斯普京。二月革命后被捕并驱逐出境，后在边境再次被捕；获释后在皇后的支持下进行地下活动，开始流亡生涯，后成为修女。著有回忆录。

维那维尔, M. M. 465

Vinaver, M. M. (1862—1926) 犹太人。毕业于华沙帝国大学，律师。曾参与立宪民主党的创建，任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被捕，释放后开始流亡。

维亚泽姆斯基, D. L. 123-125, 430, 431, 502

Viazemskii, D. L. (约1885—1917) 公爵。毕业于圣彼得堡帝国大学。就任于最高法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红十字会。受古契柯夫邀请，参与策划军事政变。二月革命期间经过市

区时遭枪击身亡。

沃尔科夫, N. K. 327, 337

Volkov, N. K. (1875—1950) 农业工程师。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 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 共济会成员。十月革命后开展反布尔什维克活动, 后流亡国外。

沃耶科夫, V. N. 101, 109-111, 257, 292, 376, 396, 398, 399, 405, 408, 417, 432, 434, 440, 444, 545

Voeikov, V. N. (1868—1947) 陆军少将。克里姆林宫警卫司令。与内务大臣之女结婚。二月革命后被捕, 十月革命中逃脱, 后流亡国外。著有回忆录。

X

希德洛夫斯基, S. I. 63, 64, 120, 125, 245, 324, 328, 353, 379, 420, 503

Shidlovskii, S. I. (1861—1922) 毕业于皇村中学。曾任内务部特别委任官、农民土地银行评议员, 后担任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作为十月党人, 加入进步同盟, 同时任该组织主席。二月革命期间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十月革命后被捕, 获释后流亡国外。著有回忆录。

谢格洛维托夫, I. G. 70, 118, 130, 251, 326, 340, 403, 505

Shcheglovitov, I. G. (1861—1918) 皇家法学院毕业, 进入司法界, 1900年任司法部副局长, 1905年任局长,

1906年任司法大臣, 1915年卸任。二月革命中被捕, 1918年被枪决。

Y

亚历山德罗维奇, P. 213, 215, 219, 234, 235, 290, 303, 336, 348-350, 356, 381, 391, 426

Aleksandrovich, P. (Dmitrievskii, P. A.) (1881—1918) 社会革命党左派成员。1916年经瑞士潜入俄国, 在首都组建了活动团体; 二月革命后任苏维埃执行委员; 十月革命后任非常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 1918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左派的叛乱活动, 被枪决。

克塞尼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公之妃)·98

Kseniia Aleksandrovna (1875—1960)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妹妹。亚历山大·米哈伊尔洛维奇大公的妃子。费利克斯·尤斯波夫之妻伊琳娜的母亲。后逃亡国外。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96, 97

Sergei Aleksandrovich, vel. kn. (1857—1905)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父。莫斯科总督。死于社会革命党战斗队的暗杀。妻子是皇后的姐姐伊丽莎白。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34, 69, 113, 388, 566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vel. kn. (1847—1909)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父。军人。在“流血星期日”事件中担任近卫军总司令, 兼任圣彼得堡军

区司令。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15,
68-70, 122, 318, 341-345, 353, 365,
376, 378, 388, 399, 420, 421, 428,
434, 439, 440-445, 448-450, 452,
453, 456, 460, 461, 464, 468, 505-
507, 509

Mikhail Aleksandrovich, vel.kn. (1878—
1918) 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弟, 曾任陆
军中将。1912年, 由于与一位离过
婚的庶民女性结婚, 被剥夺皇位继承
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 他回到
俄国并担任高加索骑兵师师长; 二月
革命时, 沙皇尼古拉二世本想将皇
位传给他, 但是他同意了临时政府
请求, 拒绝继承皇位。十月革命时
被捕, 并在1918年6月被流放至乌拉
尔。此后在乌拉尔被契卡杀害。留有
日记。

保罗·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23, 99,
100, 112-115, 375-378, 459, 507

Pavel Aleksandrovich, vel. kn. (1860—
1919) 沙皇祖父亚历山大二世的玄子。
骑兵上将。与第一任大公妃育有玛丽
亚和德米特里两个孩子。大公妃死
后, 与庶民通婚续弦, 娶奥丽加·皮
斯托里考鲁斯(后称帕蕾公爵夫人)。
在二月革命中, 未能成功迫使沙皇下
诏实行君主立宪制。1918年被布尔什
维克党逮捕, 作为人质被杀。

亚努希科维奇, N. N. 49, 58, 61,
65, 128, 396

Ianushkevich, N. N. (1868—1918)

陆军上将。1905年任陆军部事务局立
法部部长; 1911年任陆军部御前办
公厅总管; 1914年任总参谋长, 后成为
最高统帅部参谋长; 1915年任高加索
总督代理后又被任命为同军区的司令
代理; 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叶夫列莫夫, I. N. 36-38, 64, 134,
143, 246, 323, 325

Efremov, I. N. (1866—1945) 贵族
地主, 稳健的自由主义者。曾任第一
届、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
共济会成员。曾于1916年参与组建进
步同盟的活动; 二月革命后, 担任俄
国司法部长、国家安全部长; 其后被
任命为俄国驻瑞士大使; 十月革命爆
发后旅居国外。

伊瓦诺夫, N. I. 344, 361, 397-
403, 405, 408-411, 415-417, 430,
440, 463, 506-508

Ivanov, N. I. (1851—1919) 陆军上将。
“一战”时任西南方面军司令; 二月
革命中任革命镇压军司令, 未到首都
便被逮捕; 释放后加入反布尔什维克
军, 后因伤寒去世。

伊瓦诺夫, N. N. 376-378, 507, 508

Ivanov, N. N. (生卒年不详) 律师。
与保罗大公关系密切, 是大公起草
沙皇诏书工作的中心人物。著有回
忆录。

伊瓦诺夫-拉兹莫尼科, R. V. 213,
214, 381

Ivanov-Razumnik, R. V. (1878—1946)
俄国社会革命党评论家, 协助社会革

命党左派工作。二月革命时曾在塔夫利宫参加苏维埃活动，支持十月革命，加入社会革命党左派；1919年以后致力于文化活动，后来频繁受到政治迫害；1937年被逮捕，后被释放。在苏德战争中成为德军的俘虏，被押解到德国。著有回忆录。

尤列涅夫（科洛托夫斯基），K. K.

208, 210, 221, 234, 235, 238,
243, 245, 246, 260, 290, 303,
336, 352, 391, 426, 436, 437,
541, 543, 549

Iurenev (Krotovskii), K. K. (1888—1938) 波兰人，区联派的领导人。二月革命后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执行委员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了十月革命；曾担任驻捷克、意大利、伊朗、奥地利、日本、德国的大使。在苏俄非常时期遭逮捕并被判处死刑。

尤苏波娃，Z. N. 96, 103, 111, 118,
500

Iusupova, Z. N. (1861—1939) 公爵。丈夫为莫斯科总督费利克斯·尤斯波夫伯爵。是伊丽莎白大公妃的挚友，暗杀拉斯普京行动的主要人员。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尤斯波夫，F. F. 96, 98, 99, 103,
105, 118, 486, 501, 557, 558

Iusupov, F. F. (1887—1967) 尤斯波夫公爵的继承人。曾在英国牛津大学

留学，与英国秘密情报局驻俄的雷纳为好友。暗杀拉斯普京的凶手。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留有回忆录。

Z

扎鲁茨基, P. A. 199, 270, 288, 335, 350, 390, 391, 543

Zalutskii, P. A. (1888—1937) 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活动家。1912年出席布拉格会议；1916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二月革命时担任苏维埃执行委员。属于季诺维也夫派，因1934年基洛夫刺杀事件被捕入狱，1937年被处决。

扎斯拉夫斯基, D. I. 330, 391, 436, 437

Zaslavskii, D. I. (1880—1965) 犹太人。先进入社会民主工党，后进入崩得派。虽反对十月革命，但留在苏联，以职业作家身份活动。著有研究二月革命的书籍，后成为御用作家。

祖巴托夫, S. V. 460

Zubatov, S. V. (1864—1917) 莫斯科安保部长，内务部警察局特别局局长。曾是革命青年，后来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成为一名警察，推进并提倡由官方批准的工人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祖巴托夫组织。后被警察局驱逐，活跃于文坛。二月革命中自杀。